

太平天国史类（11）

忠王自传原稿 考证与论考据

题 记

《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共收论文三篇，一、《从太平天国史的考证体会到新旧考据的不同》，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三、《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

说 明

这一部论文集共收论文三篇：一、《从太平天国史的考证体会到新旧考据的不同》，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三、《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第一篇论文是从太平天国史考证的实践工作中，体会到新旧考据的不同，第二、第三两篇论文是对《忠王自传原稿》的考证，所以把它们编成一个集子就叫做《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

关于考据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今天史学界还没有得到一致看法的大问题。新旧考据究竟有怎样的不同，考据用的是什么方法，做考据如何去发现问题，又如何去解决问题，考据的对象是什么等等，很少有人论及。这应该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不揣浅陋，谨把我个人研究太平天国史考据的经历，写成这一篇《从太平天国史的考证体会到新旧考据的不同》，以向同志们请教。

自从去年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后，学术界呈现了空前的活跃。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方面，对《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也展开了争论。这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说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经过这一次争论之后，大家作深入的彻底的研究，预卜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结论。因此，我也不揣浅陋，写成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这两篇论文，以向同志们请教。

1957年6月12日罗尔纲谨志于北京

目 录

从太平天国史的考证体会到新旧考据的不同	9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	40
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	
——《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	90

从太平天国史的考证体会到 新旧考据的不同

一 引言

新考据是与旧考据不同的。必须明确认识了新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然后才能够认识清楚新考据在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中的作用与地位，也才有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

关于考据的作用与地位，今天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其中有一种，虽然还没有成为定论，但却得到了多数人同意，它包括两方面。

第一，把乾嘉学派的考据过高估价了。他们虽然指出乾嘉学派考据方法不能探求本质与规律的局限性，但却认为它可以完全担任鉴定史料、诠释史料、考证史事等显示史事的真实现象的任务。

第二，不加区别地把今昔的考证方法都认为只限于使用形式逻辑。

其实，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在它所使用的形式逻辑所能为力的小范围内，是会得到一些正确的结果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书，不出名物训诂校勘等的范围，大都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他们谨严地运用这一个方法，因此就能够做得比较谨严、比较正确的结果。但一超出这个界限，这种旧考据方法就无能解决。

至于乾嘉学派旧考据所用的方法，和今天新考据所用的方法二者是不同的：乾嘉学派旧考据用的只是形式逻辑，在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指导之下进行考据；而今天新考据以辩证逻辑居于领导地位，形式逻辑只作为技术性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之下进行考据。二者所用方法的

不同，指导思想的不同，是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所决定了的。说得明白些，是阶级立场所决定了的。

为了要说明乾嘉学派旧考据方法的局限性，和今天新考据方法跟它有何不同，首先要在下节把我从太平天国史考证的实践中得来的体会提来说。

二 从今昔工作的对照中看出新旧考据方法的不同

我在解放前做的太平天国史考据工作，长期受了乾嘉学派旧考据方法的局限和深重的束缚。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有一段话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说道：

形而上学者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绝对互相排除的，原因和结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理的，因为它正是合乎所谓常识的。可是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虽然在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程度要看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定）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迟早它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了；因为它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见它们相互的联系；只看到它们的存在，而看不见它们的产生和消灭；只看到它们的静止状态，而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①

这段话正好用来说明乾嘉学派旧考据方法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旧考据方法所能做到的只是在用“人的常识”可以处理的范围中，也就是说初等的形式逻辑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吴黎平译本二十页。

辑的思维方法可以运用的范围中，再加上研究者的详细占有材料和谨慎的工作，那是可以得到一些正确的结论的。这是因为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某一历史现象是可以被视为已经形成的相对地分离的、稳固的和确定的史实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这里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是可以合用的。但这种方法“迟早地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一超过那一个界限，那时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中”。所以运用旧考据方法只能解决一些简单的寻常关系的事项，例如一部史料的辨伪，如《江南春梦庵笔记》的考伪、《太平天国战纪》的考伪等；一件文物的辨伪，如《太平天国货币辨伪》、《石达开假诗考》等；一部书的校勘，如《天条书》版本的校勘、《资政新篇》版本的校勘等；历日的对照，如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的问题等等。如果问题的关系比较错综复杂时就没有解决的能力了。旧考据方法通常用的都是举例为证的列举式的归纳法，不仅这种列举式的归纳法如此，即使是有原则地选取归纳材料的科学的严格的归纳法，它所能达到的成就和辩证法相比较，也还是不完备的。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曾经指出：“用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不完备的。”可见要研究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复杂的科学知识，旧考据所用的初等的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是无能为力的，而必须进一步应用高级的逻辑——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

我通过六年来重写和新写太平天国史考据论文，我体会到新旧考据方法的不同，我检查出了旧考据方法的片面性、局限性，认识到新考据方法的全面性、正确性；我看出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破产，认识到唯物辩证法的优越。兹分述于下。

（甲）旧考据方法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

旧考据方法本身既有片面性、局限性，它又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指导之下做考据，就只能够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而不可能得到历史的真实，甚至导引到错误的结论去。

例如我在1937年1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里，曾经指出太平天国是“贫农革命”（九八页），太平天国代表贫农，曾国藩代表

地主，这次革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六七页）。我这一个看法，原则上还没有错误。到1944年我用旧考据方法进行《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这个专题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探求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原因。可是，我所能看见的只是个别的事物，而看不见它们的互相联系：我所看见的只是一大串纷乱的因素，而抓不住那一个作为太平天国革命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来做研究的中心环节，从而舍本逐末，迷失方向，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罗列为：人口压迫、豪富兼并、耶稣教与鸦片、灾荒、政治黷废、民族思想与会党六个因素，平均对待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分散力量去注意各种支离破碎的孤立的问题。结果，没有考据得出阶级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原因，却一直向着各种支离破碎的问题去钻牛角尖：从人口压迫追溯到明代番薯、玉蜀黍的输入及清代乾隆后的传播；从长江水灾追溯到长江水患的起源；从鸦片战争追溯到鸦片的输入与对资本主义国家诬蔑吸食鸦片始自中国人的订谬。这样，就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原因的目的离题十万八千里！当时我在前社会研究所工作，写成这本稿子，送给所长陶孟和先生看。他看了说：“可惜化费了这样大力，得来的结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自己也十分迷惘，自叹无能。一直到今天检查，才知道原来是旧考据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给我的局限，给我的束缚。

又如我在二十年前就曾经考证过《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反封建的纲领，包括有废除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土地法，废除私有财产的圣库制度，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工业归国营的诸匠营、百工衙制度，还有人民选举乡官的民主制度和妇女解放等等，而其中则贯串着一个反封建的纲领。如果把这些内容割裂开来孤立地去看，就看不出它的内部的联系，也就看不清楚这一个贯串其中的反封建的纲领。我那时候，在旧考据方法的局限之下去从事考据，正是这样错误地把其中的土地法、圣库制度、诸匠营与百工衙制度、乡官制度、妇女解放等等割裂开去一个个地单独地去做考据。因此，我所能考得出来的当然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史实，而无从看得出它们正是从一个纲领出发的一系列的政纲、政策，因而就不可能在这一个作为太平天国革命最主要的纲领考证里面，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提得出是一个反封建的农民革命的科学说明出来。

旧考据方法不仅在研究大问题上有着那样的局限性，就是以考证一个人物的问题来说吧，例如关于太平天国有无天德王洪大全这一个人物的考证，我用的力量不能说不专，时间不能说不久，但是，我从前考证这一个问题，完全不懂得应该从天地会的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大领袖，太平天国在广西永安州的时候领导集团里面并没有一个代表天地会势力的领袖参加，在洪大全被俘之后，太平天国也没有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加入的事等方面去考察问题，而仅仅是从《洪大全供》的真伪一点上拼命去钻牛角尖，1935年第一次写《洪大全考》时是这样，到1946年重写《天德王洪大全考》时也是这样，所以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直到1954年我第三次写《洪大全考》时，我初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看问题的方法不同了，才检查得出过去在考证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因而才把问题解决了。从我过去所做的洪大全考证上，也具体地说明了旧考据方法所给我的局限，使我只懂得片面去钻牛角尖，而不懂得全面地去看问题。

由此可见，旧考据方法只能个别地、孤立地看问题，而不可能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所以不可能解决具有复杂错综性的历史考据问题，就是那些牵涉范围较广的历史考据问题也难于得到解决。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担负起这种任务。

（乙）旧考据方法是从现象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

旧考据方法是从现象看问题，所以只能够考出浮在表面的历史现象，只有新考据方法才从本质去看问题，探求得出史事的真相。试举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绘人物这个问题的考据为例。

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问题，自从1952年南京堂子街发现太平天国壁画考出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这一件史实之后，观众就提出：“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绘人物呢”这一个问题来。最初我们以为：中国以前的人物壁画，是给佛、道宗教和封建礼教做宣传，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太平天国的壁画却是专为宫室建筑物的美观装饰服务的，故不准绘人物，而专取宜于做装饰性的山水花鸟之类的自然景物作为画题。这一个看法，我们不久看出是陷于形而上学孤立的、割裂的看问题的错误，把它放弃了。后来，我们从《旧约》进行

考据，考出《旧约》禁止绘人物，得出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是遵守《旧约》的禁条，是为了尊崇上帝。但是，《旧约》不但不准制作神像和人像，也不准制作“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的形象；《旧约》不但反对壁绘人像，也同样反对壁绘“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而太平天国只根据《旧约》不准绘人物，然而却大绘特绘飞禽走兽，并没有完全遵守《旧约》的禁条。这就可见太平天国虽然抬出了《旧约》的上帝，但它只利用了这一个上帝对它有利的方面，而对它的革命斗争没有好处的方面却毫不理会。这就可见太平天国利用《旧约》不准绘人物的宗教信仰，只是现象形态，而不是事物本质。所以这一个“为了尊崇上帝”的看法，仍然是受了旧考据方法从现象看问题的局限。于是我们突破了这一个束缚，以新考据方法从本质看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得出了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目的是为了革命的斗争。它并不是什么宗教的信仰，而是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反封建作用。它是在思想战线上经常地（不分早期、晚期）普遍地（不分中央、地方）使用的对外打击敌人对内集权的武器之一这一个结论。

我们从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绘人物这个问题的考据，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旧考据方法只能够从现象看问题，考得出浮在表面的现象形态，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探求得出掩蔽在现象后面的历史真相。

（丙）旧考据方法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

历史事实往往是复杂错综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矛盾存在的。由于旧考据方法是用形而上学的“是则是，否则否”地去看问题，所以不可能解决此种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之下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探寻得出史事的真象。试举浙江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考据为例。

绍兴市内现在相传有二十多处太平天国绘的壁画。这些壁画，绘有龙、凤、狮、象、虎，还绘有神怪故事。龙、凤等壁画，十分残破，但神怪故事壁画却保存得还完整。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根据许多方面已经肯定的事实，肯定了龙、凤、狮、象、虎等壁画确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而对那些存在着种种疑问的人物神怪壁画，则提出了是由于绍兴地主阶级诬蔑太平天国用人血绘壁画，诬蔑太平天国在房子里杀人埋死尸，所以在太平天国退出绍兴

后，有些地主阶级的家，便在太平天国绘过壁画的墙壁上，另绘上与太平天国信仰对立的东西而为他们所崇奉并且认为可以“辟邪”的神佛人物故事来加以“厌胜”。因为这些壁画，是当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就在太平天国绘过的壁上绘的，所以一代代传下来便误传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这一个假设性的解释。我们处理这个复杂、矛盾的问题，是把真的肯定它是真的，把假的提出它是假的，而假之所以作真，是由于假的是在真的位置之上绘的，所以才把假的误传为真的。这是必须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才看得出来的。可是，我在1953年初研究这问题的时候，还受着旧考据方法“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的束缚，我那时候看来，认为这些壁画应该全部否定的，完全看不出假中有真，假的还是从真的遗迹上重绘误传下来的这一个事实。后来经过一年多长的时间，极力地打破旧考据方法的束缚，不断地思考，才在复杂、矛盾的问题之中，逐渐地看得出来。

我考证绍兴壁画的经历，说明了旧考据方法“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的方法的无能为力，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探寻得出历史的真相。

（丁）旧考据方法是静止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

旧考据方法静止地看问题，不可能了解史事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探求得出史事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真相。

例如研究太平天国思想有两部主要的文献，一部是《太平诏书》，另一部是《天条书》。这两部书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版本引用了不少儒家的话；另一种版本把这些话都删去了。萧一山在1933年做《太平诏书》和《天条书跋》，凭他的主观臆断硬说太平天国原来是宗教性很浓厚的，“当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为事，举中国一切之圣经贤传胥毁灭之”，后来曾国藩起湘军以名教奇变为号召对抗太平天国，所以太平天国“积数年之经验，因社会之情形，不得不翻然变计”，就在这两部作为教育宣传的主要的文件上，多“增入中国典训名言”，“故为佐证”，付之重刻，以迁就人心。^①

① 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诏书跋》。

萧一山这一种说法是主观臆断。我用旧考证方法从《太平诏书》和《天条书》两种版本的校勘，从太平天国所行的旧丧礼和新丧礼的制度，再参以太平天国刊刻的《旧遗诏圣书》的初刻本和改正重刻本的校勘，指出萧一山说法的错误，证实了《太平诏书》和《天条书》援引儒家经典的是初刻本，不引儒家经典的为改正重刻本。但是，旧考据方法所能为力的到此为止，而不可能解释其原因。只有掌握新考据方法，从发展看问题，才能够提得出：洪秀全本来是儒生，久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虽以耶稣教发动革命，而起初所认识的教义仅限于梁阿发的《劝世良言》，因此，那时候他写的教育宣传文件就多援引儒家思想与术语，不能出其范围，后来宗教性越来越浓厚，到癸好三年建都天京后，草创渐定，“万样更新”，于是乃有删书之举，以谋思想上的统一这一个解释出来。从这一个例子，旧考据方法虽然可以考证得出事实的现象，但由于受着静止地看问题的方法所局限，不可能探求得事实发生的底蕴。要探求事实发生的底蕴，就必须进一步使用新考据方法。

我受旧考据这一种看问题方法的束缚是很深的，解放后还未能把束缚完全解除，这就表现于1954年重写的《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一文上。《天朝田亩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太平天国依据自己革命运动中实践的经验而来。金田起义的时候，参加革命的人都带了全家老小到军队中间来。既然全家都参加了军队，一切衣食都只能依靠公家供给，太平天国适应这种需要，实行统一供给制。这种严格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使太平天国军费开支节省，帮助了革命获得初期的胜利。等到定都天京后，就把在军队中行之有效的供给办法，依附原始基督教义，文饰以《周礼》的条文，颁布了一套《天朝田亩制度》。这种制度，土地全归国有，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土地的收获物除足“所食可接新穀外，余则归国库”，所有婚娶、丧葬、生孩子等事，都照一定限额向公库支领。对工业和商业也都收归国有，禁止私营。这是一种阻碍生产发展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结果造成天京粮食匮乏、物资断绝的情况。太平天国了解这种情况后，就不得不把《天朝田亩制度》的推行停止，准许农民“照旧交粮纳税”，也准许工商业的私营。所以考据这一个问题，必须以发展观点作为指导思想，研究它的产生、发展、变化的底蕴，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认识。我没有这样做，却把《天朝田亩制度》的产生、发展、变化个别地孤立地进行考据，而没有从发展观点去解释

问题，因此，在我的考据论文中，虽然考得出事实，但对事实之所以产生、发展、变化的底蕴却没有解释得出来，这样，就使读者对这一个制度得不到一个发展的观念，也就对它得不到完整的认识。这说明了那时候仍不能解除旧考据方法静止地看问题的方法的束缚，也说明了旧考据方法静止地看问题的方法对研究问题的极大的局限性。

（戊）旧考据方法是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

旧考据方法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发掘出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看出历史的真相。

例如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有一件大事，就是天京之所以不能保守，是由于生产遭了彻底的破坏。当时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几乎到处都是“村市平毁，农田全荒，白骨荆榛，绝无居人”^①的可怖现象。这三省是给谁破坏了呢？地主阶级口口声声说是太平天国破坏。我在1944年做了一篇《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谬》^②，虽然极力在替太平天国辩诬，但是，我那时候由于受了旧考据方法的局限，停留在现象的阶段上，而不懂得从本质上看问题，深入地去追索。到1954年重写这篇考证的时候，我再看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③才恍然大悟，大杀、大烧正是以曾国藩为首的反革命武装进攻太平天国的一个极毒辣的手段。据曾国藩说，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反革命发动进攻以前，太平天国的情况是：“擅长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安之若素”。但是，为什么一到反革命进攻之后，就会造成“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呢？不管曾国藩如何地歪曲事实，如何地诬蔑太平天国，而这一种烧杀的罪行都完全是反革命干的，因为反革命的目的，是要使太平天国军队“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④，太平天国政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⑤，所以就

① 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七十一李鸿章奏。

② 此文收在1948年出版的拙著《太平天国史考证集》内。

③ 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

④ 见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

⑤ 见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

用抢光、烧光的毒辣手段把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生产彻底破坏了。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粉碎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的诬蔑，而且可以明确地断定这一件残民以逞的大罪恶正是以曾国藩为首的地主阶级干的。但是，如果不从本质上去看问题，就不可能剥开曾国藩的诬蔑，而从诬蔑的言辞里面看出了事件的真相。这是旧考据方法所不能为力的，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才能够看得出阶级斗争的历史真相。

又如王韬，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同情太平天国的人，所以他才向太平天国上书论攻上海事。我在1934年写《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的时候，用的是旧考据方法，所以只考得出黄畹就是后来办申报的王韬为止，至于王韬为什么要向太平天国献策却无法考得出来。这一次重写《黄畹考》便不同了，我能够初步从本质上去看问题，把那些隐蔽的事实看出来了。首先是从王韬向太平天国献策前就在上海吃了英国侵略者的先锋队传教士的饭共十二年之久，他跟英国侵略者有过长期的关系。就在献策那一年，他又跟英国海军提督何伯(I. Hope)、参赞巴夏礼(H. S. Parkes)做随员到天京去窥探太平天国和到汉口去与清朝统治者勾结。据王之春《中外通商始末记》说，美国侵略分子华尔(F. T. Ward)统率的洋枪队便是清朝苏松太道吴煦采纳王韬的建议来建立的。根据王韬这样的历史与行动来分析，他断不会替太平天国打算而向太平天国献策的。又据英国公使卜鲁斯(Bruce)所说，知道王韬所以向太平天国献策是因为当时王韬全家从外国侵略者霸占的上海搬回他的家乡——太平天国治下的苏州去，为了避免太平天国对他的嫌疑，故献此策假作与太平天国“同心之论”。而王韬之所以全家搬回苏州，是由于太平天国大军进攻上海，英国侵略军的增援军队还没有赶到，上海情况慌乱，故搬回苏州来。再根据英国增援军到沪后，王韬就返上海，与后来清政府因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要逮捕他时，英国公使对王韬极力保护等事看来，王韬向太平天国献这一个主张用兵上游不攻上海的策略，很可能是受英国侵略者的指使，企图延缓太平天国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争取时间，等候增援的。这一件事，对太平天国反侵略战争是有关联的，应该作为这一篇考证的主要问题之一。可是，在用旧考据方法去考证这一个问题，却不可能接触得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把事实发掘出来。

由此可见，旧的考据方法是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为封建主义、资本主

义服务。只有新考据，才能够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发掘得出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看出历史的真相。

（己）旧考据方法是无视或蔑视群众，只有新考据方法才会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

旧考据方法无视或蔑视群众，看不出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难免引导到错误的结论，更不知道走群众路线，去解决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具有人民群众的观点，才知道依靠群众。

例如用旧考据方法去研究太平天国采用明白易晓的语文的问题，得出的是洪秀全个人提倡的结论。而我们用新考据方法去研究，才看出洪秀全原来是一个深受古典文体束缚的知识分子，他在最初图谋革命的时候写的几篇文章还不曾打破封建古典文体的束缚，特别是《原道救世歌》一篇，更是典实连篇。这些文章，当然不是人民群众所能领会的，但当时洪秀全是关门写作，他没有认识到群众的要求。到了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六月，他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设立拜上帝会机关，分送他所写的文件到附近各县农村进行宣传之后，他接触到群众的面一天比一天广，一天比一天深了，才深切地认识到他的作品中所用的那些文体不是群众所能领会的，群众所要求的是听得懂看得懂的明白如话的文体。因此，他就打破封建古典文体，写作明白如话的文章以符合群众的要求。洪秀全通过他的革命实践，明确了群众的要求，到了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建都天京后，就提出反对封建文学提倡白话体文学的革命政策。这就可知太平天国反对封建文学的主张，并不是洪秀全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反映人民的要求、站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①又如用旧考据方法去研究太平天国提倡壁画的问题，得出的是太平天国因为壁画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艺术，所以就大力提倡壁画的结论。而我们用新考据方法去研究，才看出这一个作为农民革命的群众所痛恨的是那标志着对农民的血腥掠夺的挂在地主阶级高楼大厦的卷轴画，而为他们所理解的、所“喜闻乐见”的却是中国老百姓向来所爱好的壁画，在革命斗争中，又增加他们对壁画形式的爱好。因此，到建都天京后，就在一些

^① 请参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编《太平天国文选·自序》。

新建筑和广大的旧建筑上普遍地绘制壁画起来，它剔除了与革命斗争抵触的佛、道人物画和封建人物画的旧内容，而发扬了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和美化生活的山水花鸟画和富于战斗性的飞禽走兽画的新内容，从墙壁栋梁以至门扇，无一不绘。天京以外，各地也普遍地绘制壁画，只以天京一地而论，在失陷之后，经过清军焚烧毁坏，还有一千多处。当时壁画的盛况可以想见。这就可知，太平天国的提倡壁画，不是主观盲目的，而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太平天国壁画所以得到这样的蓬勃的发展，就是建筑在这一个群众的基础上。

旧考据方法更想不到走群众路线，只有新考据方法才知道依靠群众去解决问题。我们几年来做浙江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调查、南京如意里太平天国壁画的调查等，都是依靠群众解决了问题。而最突出的一件事例，是南京普渡菴的调查。原来南京市民魏伯和在1950年提出一个所谓“天王元妃”——兴义尼出家普渡菴的事件，他自己以兴义尼皈依弟子的身份向政府报告，他纠约了几个生存的人作证，他举出了几个过去的实有其人的人或无事迹可查的人作证，他还举出了一些无可追寻的文件和捏造了一些文件作证。他建议政府在普渡菴建碑纪念，保护革命遗迹，并申请政府照顾他个人的生活和他两个堂妹的就业问题。政府把他的意见交我们研究，我们从历史考证指出他所说的事件的虚假。他不服，一次又一次地向政府上书，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根据历史事实指出他的虚假。他仍不服，最后一直上书到毛主席。政府为慎重对待革命传说及人民意见起见，交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大家研究这问题，认为魏伯和所提出的事件，是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经过历史的考证完全证实他的虚假了的。但是，魏伯和是生存的人，他捏造这样事迹被揭穿了，他还可以再捏造另一样事迹；他可以纠约活人作证，他也可以捏造死人作证，他还可以捏造假文件来做证明，总之，历史考据可以否定他的种种虚假，但历史考据却无法揭穿他作伪的根由。必须揭穿了他作伪的根由，他才再没有话说。而要把他作伪的根由追寻到水落石出，只有依靠群众，深入到群众中去作缜密的细致的调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观察是尖锐的，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因此，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决定组织人力，深入到当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工作。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详细地访问了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的人物，结果，揭穿了魏伯和捏

造所谓“天王元妃”的动机的秘密，就是曾经一度给魏伯和作证的果修也不敢再在群众面前再作“假见证”。这一事件，终于依靠群众彻底地解决了问题。

由此可见，旧考据方法无视群众，看不出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难免引导到错误的结论，更不知道走群众路线，去解决问题。只有新考据才具有人民群众的观点，探求得出历史的真相，才知道依靠群众，去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

*

*

*

以上所举六项，只是就我个人实践中的体会举出来说的，当然不只这些。但是，只就这六项看来，就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了新考据方法和旧考据方法的不同：旧考据方法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是从现象看问题，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是静止地看问题，是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是无视或蔑视群众，它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只有新考据，才能够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才能够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才会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它具有极大的正确性和优越性。新考据方法，所以得具有这样的正确性和优越性，是由于它所用的是高级的辩证逻辑，同时不仅不排斥有局限性的初等的形式逻辑，并且把旧考据方法所用的形式逻辑的技术，作为宝贵的遗产而予以批判的接受。

三 考据的技术问题

旧考据方法用的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乃是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的科学，它的对象是正确思维的规律，而正确思维是毫无矛盾的、互相联系的、首尾一贯的、根据充足的，并且导引到正确的与现实适应的结论。形式逻辑规定着思想的必要条件，不论思想的对象为何，不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律，思维便不能正确，不能导引到正确的结论，不能达到对现象的认识。但是只遵循形式逻辑底规律，却不能保证对现实的认识。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是对现实的认识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对于认识现实是不够

的。要正确而完整地认识现实，必须应用探讨现实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唯物辩证方法。

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地思维的，对于他们，在其研究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辩证法。但是，科学思维、研究，在应用唯物辩证方法时，是不能忽视形式逻辑规律的，因为忽视形式逻辑规律就会在思维中起错误，会引起关于各种现实现象的不正确的结论。

显然地，必须规定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互相关系，确定它们的差别及其联系。不正确地解决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底相互关系，就能导引到最有害的、否定的结果，就能引起对现实的不正确的认识，对现实的歪曲的和曲解的说法，就是说，不是导引到真理，而是导引到错误的结论。相反的，如果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便可能利用形式逻辑规律作为认识现实的工具。^①

新考据方法不排斥旧考据方法所用的形式逻辑，正同唯物辩证法不排斥形式逻辑一样。而在新考据方法中，起领导作用的乃是唯物辩证法，那些形式逻辑的方法，却只是属于技术性的方法，不能与起领导作用的唯物辩证法等同。但是，必须规定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确定它们的差别及其联系，然后才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技术性的方法作为考据的工具。

关于在新考据方法中作为领导作用的唯物辩证法与作为技术性的形式逻辑的方法底差别及其联系，在论新旧考据方法的不同一节中已经大略地说过了。在这里，要专对属于形式逻辑的技术性考据的方法说说。

说到技术性的考据方法，在中国，乾嘉学派的学者毕生尽瘁于考据，但却没有一人写过一部论考据方法的专著。如果说他们只绣鸳鸯给人家看，而不肯把金针度给人，那不会是事实。一种虽然可说是含有科学萌芽性质的学术，而没有理论指导把它总结起来，也难于谈到方法的。乾嘉学派的学者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所以他们虽然毕生尽瘁于考据，他们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埋头做他们的工作，而不可能总结一个方法出来。我自己，在解放前做了长期的考据，也糊里糊涂地跟前人差不多。直到解放后，开始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理论，经过了六年多改写旧作和考据新题目的实践，对自

① 此处论述，节录自苏联斯特罗果维契著《逻辑》第三章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

己所用的技术性的考据方法不能说没有初步的认识，但是，由于理论水平很低，我的认识就难免于十分肤浅的。

现在把我对技术性的考据方法那些十分肤浅的认识分为怎样去发现问题、怎样去考证问题和怎样去检验假设三方面写出来请读者指教。

（甲）怎样去发现问题？

考据最大的一个作用是“去伪存真”，因此，谈考据方法第一步就是怎样去发现问题。

问题在于伪造的史料、虚假的史事和错误的论著。要发现出那些伪造的、虚假的、错误的问题，首先就要抓住它的破绽，也就是与真实历史矛盾的地方。毛主席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①这就必须小心翼翼地观察，小之可以从一事一物发现问题，大之可以从阶级立场发现问题。

例如自清末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出版之后，《石达开诗钞》、《无生诗话》、《龙潭室诗话》、《说元室述闻》、《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诗文钞》等书都竞相转载，石达开诗名喧腾一时，没有人指出它的虚伪。我根据石达开的出身和一生历史，抓住那些伪作的破绽，发现了问题，于是进行考据，考出了今天所见石达开诗，除广西庆远《白龙洞题壁》一首外，全部都是后人伪造的。后来柳亚子发表《题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后》和《题卢冀野辑石达开诗钞后》两篇跋文，告诉读者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除其中《答曾国藩》五首见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外，余二十首都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时假造的，当时集钱印千册，流布四方，柳亚子便是参加刊布的一人。柳亚子的跋文，证实了我的考据。^②

又如在太平天国史料里有一部最眩迷人们的大伪书，叫做《江南春梦庵笔记》，署名武昌沈懋良撰。这部大伪书首先虚构说著者沈懋良是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在武昌被编入赞王蒙得恩部下，后来做蒙得恩的亲近侍从，直到天京失陷前一天还在天京。书中用了种种障眼法来欺骗读者，使读者深信它的真实性。接着就肆意虚构了许多太平天国事迹，从而诬蔑了太平天国革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六〇页，《反对党八股》。

② 请参看拙著《石达开假诗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内。

命，混乱了太平天国史实。三十多年来，凡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或评论介绍太平天国史料的人，没有一人不深信这部大伪书。有人根据它来考证太平天国的律法与印行的书籍，有人根据它来考证《天朝田亩制度》与太平天国的考试制度和省制等等，有人根据它来证明太平天国曾追封洪大全为愍王，证明确有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人们在考据太平天国史的工作上，几乎没有例外都把它的记载作为断定太平天国史事最重要的根据，即使遇到文献俱在，记载分明，千真万确的史事，而因为它独有的异说也竟引以为疑。因此，这部大伪书由于大家受了它的欺骗，才致于以伪乱真，紊乱了太平天国的真实历史，发生了严重的恶影响。其实，这部大伪书虽然用尽了欺骗的伎俩，但是，如果读者小心地去观察它，任何障眼法都遮掩不了它的欺骗；就一定能够拿得住它的破绽。关于这部大伪书，我已经写了一篇长篇的考证，不仅证实了它的种种虚伪，而且直追出了它作伪的娘家。^①在这里不能把那些考证列举出来，只说我是从什么地方发现它的作伪出来。我发现作伪者作伪首先是在书中所述叙赞王蒙得恩的事迹上，据著者自述说他是蒙得恩最亲近的侍从，连蒙得恩“内室”情况都知道的那样一个关系密切的人，可是，他记载蒙得恩金田起义时的年岁“仅十九岁”，而我们根据蒙得恩的儿子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说，金田起义时，蒙得恩在金田入营，蒙时雍在平南县花洲入营。如果金田起义时蒙得恩确如所说仅十九岁，他那里会生得一个少年儿子蒙时雍出来分路参加革命呢！又如书中记蒙得恩家庭说：“无子，生三女”，而实在蒙得恩不但生了这一个曾经在太平天国晚期与干王洪仁玕共同执掌朝政的蒙时雍，据蒙时雍家书，他还生了蒙时安、蒙时发、蒙时和、蒙时泰四个儿子。蒙得恩是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病死的，而此书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天京失陷前，在他妄逞污辱太平天国的叙事里面，还叙述了蒙得恩的种种行动，蒙得恩已经死去三年了，他还不知道。如果确如著者所说与蒙得恩那样亲密的关系，他会连蒙得恩的年岁、家庭都完全弄错，连蒙得恩那个在天朝执政的儿子蒙时雍都不知道，甚至连蒙得恩死了三年还说亲在蒙得恩的家中看见蒙得恩的种种行动那样荒唐的话吗？这就使我看出了作伪者的欺骗，追寻出作伪的破绽，我从作伪者在自叙

① 详见拙著《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一书内。

中所记的年月日上拿住了他作伪的马脚。原来作伪者是特地设计要在这几条年月日上来欺骗读者的，他先写了一句“懋良于咸丰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尚羁白下”的年月，在最后两条记事，又写“十四日记”、“十五日记”两个日子。这个作伪者伪装不知清咸丰已死，同治改元已经三年的事，他还大书特书“咸丰十四年”，以表示他是久居天京与外面消息隔绝，使读者相信他自述的种种身份。他又知道天京失陷是在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所以他自序的日子是六月初七日，而最后两条记事又注明是“十四日记”、“十五日记”，以表示他这部书是在天京破城前几天做的，而在破城前一天还在写他的记事。果然读者就在这个地方都给他骗住了。朱希祖在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序》中引证这部大伪书说：“懋良湖北武昌人，被掠留于太平军中，赞王蒙得恩部下十三年，天京将破，在危城中成此笔记，其书称太平当局为贼者，盖以预为出城逃死计，然其所载事迹，则多真确。”我们从朱希祖的话中，可以知道作伪者这一条设计是怎样地欺骗了读者。但是，也正在这一处地方，被我拿住了作伪者的马脚！因为这个骗子只知道天京失陷是在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夏历日子；他却不知道太平天国天历的日序与夏历不同，天京失陷之日，太平天国的天历却是六月初六日。如果确有沈懋良其人其事，他在天京危城之中，既不知有清同治三年，又何从而知夏历的日序？倘系获得阴历通书以为纪日，那么，就应该知有清同治三年，而不应该写“咸丰十四年”。如果说所写的年为清元，而日子是天历日序，则天京已在六月初六日失陷了，自序不应有六月初七日，更不会有十四、十五两日记事。可知这个骗子是不知道太平天国天历与夏历日序不同的一回事的，他所写的日子都是夏历，所以才露出作伪的马脚来。我之所以拿得住作伪者的马脚，是由于我在细心的观察看见了她的欺骗之后，就追寻出他的破绽，拿得到他的马脚，从而进一步去证实他的种种虚构，揭穿了他的欺骗，而给太平天国的史料清除了这一部大伪书。

又如天京因缺粮，守城军队只一万多人，能作战的仅三四千人，城陷后，大部分都得冲出，战死的没有多少，在城陷以前，全城人口，连居民在内也不过三万人，而曾国藩向清廷报告，却虚报说攻破天京，杀了太平军“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当时纷传天京金银如海，清廷正贪婪地垂涎着，而曾国藩匪帮却把天京抢光了，就放火烧了天京灭迹。曾国藩反

向清廷报告，把放火烧天京的罪行推给太平天国。关于曾国藩这一篇奏报，后来写太平天国史的人都根据了它。我是怎样发现问题呢？我是从地主阶级的欺骗性、贪婪性发现了问题。因为曾国藩围攻天京的匪帮只有五万人^①，而太平天国陆军的战斗力强于曾国藩匪帮，连曾国藩自己也低头承认^②，若果天京守城军队还有十多万人，就不会被敌人攻破，即被攻陷也一定可以全军撤退，断不会有十馀万人束手被杀之理，杭州失守时，康王汪海洋、听王陈炳文两军十万之众全数撤出便是证明。^③ 曾国藩之所以要虚报，目的是要向他的主子虚冒战功，这是地主阶级一贯的欺骗性。至于曾国藩把放火烧天京的罪行推归太平天国一事，我首先是看见曾国藩给他朋友郭嵩焘的信说他搪塞清廷所追问的天京库藏的话说得不好^④，也就是说这一件放火灭迹的蠢事瞒不了他的主子。清廷垂涎天京的金银，曾国藩匪帮又先抢光了天京的金银，放火企图灭迹，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欺骗的行动。我不相信曾国藩的虚报，发现了问题，于是进行考据，种种证据证实了曾国藩的虚报，揭穿了曾国藩的虚报。^⑤

以上所举三例，前两例是从一事一物看出破绽，发现问题，后一例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欺骗性、贪婪性看出破绽，发现问题。

（乙）怎样去考据问题？

问题发现之后，怎样去考据问题呢？

考据问题通常是先建立假设。假设是理解事实的一种形式，是从认识个别事实过渡到认识规律的一种形式。假设不是虚构，它是反映客观现实。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把假设看做是一般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种形

① 据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克复金陵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② 案同治二年曾国藩《致彭杏南》述忠王李秀成说他的匪帮“全不能战”，他自己也低头承认说：“昨夜接庐江吴长庆禀，并钞寄伪忠王文书……称曾某之兵，守则有余，战则不足。此实忠酋确有所见之言”（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一）。

③ 据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裁撤湘勇查洪福填下落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④ 案同治三年曾国藩覆他的朋友郭嵩焘信说：“金陵储蓄之奏，措辞诚多未善”（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覆郭筠仙中丞》）。这就是说他捏报的话不能欺骗清廷。

⑤ 请参看拙著《曾国藩奏报攻陷天京事考谬》，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一书内。

式。科学知识是借助于假设而发展和充实起来的。

通过假设形式的思维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第一，积累实际材料，必须概括这些材料，以便进一步发展知识和发现新的现象；第二，根据研究过的事实提出关于事实的规律性联系的假定；最后第三，进一步证实和检验所提出的假定，从这种假定中引申出结果，并通过新事实的发现来检验这些结果。^①

在考据方法中所用的假设，与唯物辩证法把假设看成是物质世界的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形式，看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看成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一种假定的说明大不相同^②，它只是一种逻辑标准，它只是初等的形式逻辑的一种推理形式，但所用的形式过程，却是与高级的辩证逻辑的假设相同的。

考据方法所提出的假设，通常是从不充分的证据归纳出来的。它只作为一种待证的假定，必须积累更多的证据和经得起反证，才得成为定论。考据提出假设，必须从实际材料出发，而不允许凭空提出的；假设的证实，必须依靠更多的证据，并且尊重反证来做检验，而不允许主观臆断的。

例如我做的《天历与夏阳历对照考》，是从我把所见太平天国的天历与夏阳历对照的记载来与日本人田中萃一郎以天历干支与夏历干支、天历礼拜与阳历礼拜对合编成的《天历与阴阳历对照简表》对勘发现了问题，经过收集到二十多条证据归纳出了初步的意见，我才提出一个假设：天历的干支、礼拜并不是如同田中萃一郎所编排那样与夏阳历相合的，而实际是比夏阳历早了一天。我这一个假设，经得起七条反证的考验，解释得通那七条反证为什么会致于错误，后来并且积累了一共五十多条的证据，就证实了这个假设。^③

又如我鉴定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我在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向老屋主李奉先访问，得了他家传下来的口碑，再经过仔细观察壁画，看出两个最显著的可以代表全部壁画的特点：一个是壁画上必须有人物或应该有人物的画面都不绘人物，另一个是与清代的和古代的形式不同的望楼建筑。我就

① 据钱文幹、易克信译苏联普科普宁著《假设在认识中的地位和意义》。

② 据钱文幹、易克信译苏联普科普宁著《假设在认识中的地位和意义》。

③ 详细考证见拙著《天历考及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一书。

根据这两个有代表性的特点提出了一个假设：壁画不绘人物可能是太平天国壁画的特色，这一个望楼也可能是太平天国望楼的特殊建筑。后来我从那一个在天京住过几年的涤浮道人（又署名知非子）著的《金陵杂记》考出太平天国壁画制度正是专绘山水花鸟、不准绘人物的；又从另一个也在天京住过几年的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和《金陵杂记》考出这一壁五层高、其上平顶、周围有红栏杆的望楼壁画，又正是太平天国军事上重要防御工事，正反映出当时伟大的尖锐的军事斗争现实。因此，我才证实了这些壁画确是太平天国的壁画。^①

又如1954年在浙江绍兴发现两张太平天国结婚证书——李大明柴大妹合挥、翟合义祝大妹合挥，我根据陈庆甲《金陵纪事诗》证实了确是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但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为什么不叫做“合婚”而叫做“合挥”呢？“挥”字作怎样解释呢？我没有得到材料进行解释。有一天，王淑慎先生告诉我说：“在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发现的一封吴寿春致抚天豫徐少蘧的信里面有‘是以特备粮挥一纸’的话，太平天国的粮凭叫做粮挥，研究合挥的意义，这一条材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我就根据这一条材料提出合挥的“挥”字可能是作“凭证”解这一个假设。于是我再去求证，又在安徽博物馆筹备处藏的真忠报国启天福兼中军安徽省文将帅张潮爵发给怀宁县朱玉桂、朱物吝榨坊照凭中有“领取印挥，以备查核”的话，丁葆和《归里杂诗》^②有“挥纸随身出复归”句，自注说：“贼出入皆用伪凭，名曰挥纸”的话。我们根据了这两条材料，看出太平天国的榨坊照凭叫做“印挥”，通行证叫做“挥纸”，丁葆和并且特别注明太平天国的凭证叫做“挥纸”，与粮凭叫做“粮挥”完全相合，所以“合挥”的“挥”字确是作“凭证”解，“合挥”就是“结婚证书”。这样就初步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后来周定一先生提出“挥”字作为凭证解，是客家方言里常用的词；刘日波先生也指出现在广州方言也把“挥”字作为凭证或票证解。^③这样，又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① 详细考证见拙著《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调查记》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一书内。

② 见《庚辛泣杭录》。

③ 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七期关于太平天国文献中“挥”字意义的解释。

（丙）怎样去检验假设？

在考证的过程中，我们要对最后一步过程：怎样去检验假设提来说。说。

怎样去检验假设？就是把新发现的证据来检验原来的假设，看看是否相合，如不相合，就要看原来的假设经得起还是经不起新证据的反证；如经不起反证，就必须服从新证据放弃旧假设而另从新证据提出新假设。这样做考证才不致于陷到主观的武断。

例如关于金田起义日期的考证，最初我看见八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为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清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之说最可信，因此我就假定这一天为金田起义的日子。到1937年，《天情道理书》、《干王洪仁玕自传》都发现了，由于新史料提出了新证据，使我对各种不同说法得到一种融会贯通的解释，我拿新证据来检验从前的假设，它经不起反证，于是便把它放弃了，而根据《洪仁玕自传》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起义之说另提出了新假设。这一个新假设，到1944年我得看见《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钞本之后初步得到证实。到1954年我修改这篇考证时，又发现一条重要的证据，就是洪秀全做的一首明白说出他生日那天就是“天父天兄开基日”，也就是说是太平天国起义日子的诗，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假设。^①

又如我考证天历干支、礼拜较阴历的干支、阳历的礼拜早一日始于何时的问题，1947年我根据太平天国颁行天历之日，正在广西永安州被困紧急，并且由于制度的新旧交替，特别是夏历大建小建的不易记忆等等情况，提出了太平天国大约是在颁行天历之日，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而无意错前一日的假设。到1954年，我在重写的一部《太平天国史稿》里面提到这个问题，曾次亮先生对我的假设提了意见。他批评我的假设不十分合理，他指出《旧约》的安息日本相当于阳历的礼拜六，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是否原于《旧约》的安息日，值得考虑。我检验了我的假设，看出它站不住，于是我放弃了这一个旧假设，而接受了曾次亮先生的意见另提出新假设。我去蒐寻证据，果然在太平天国自己颁行的文献里证实了太平天国天历的礼拜确是守《旧约》

^① 详细考证见拙著《金田起义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

以一周的第七日做礼拜的制度的，而与阳历以一周的第一日做礼拜的算法不同，所以天历的礼拜就比阳历的礼拜早一天，天历的礼拜、干支也比夏历的星期、干支早一天，从而也就可知天历礼拜、干支比夏历、阳历早一天是在开始颁行天历之日就如此的。于是这一个经了四十二年之久的争论，到此才得到全部的解决。^①

有时根据一种材料，可能提出两个假设的，但是，哪一个假设是真实的事实，则取决于历史事实的证明。例如苏州忠王府的大门经同济大学建筑系陈从周教授的调查研究，断定现在的大门为太平天国前建筑物，其大门柱与柱础形制不符，系在旧基础上重建。我们根据陈从周教授的鉴定，可以提出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太平天国利用旧建筑作为忠王府大门建筑；第二个假设，是李鸿章攻陷苏州后，占忠王府为江苏巡抚衙门，故拆毁了忠王府大门原建筑改建为清朝衙门式的大门建筑，而从别处移来旧大门嵌上。于是我们进行求证，先从现存的忠王府大门与忠王府内部建筑作比较研究，忠王府的正殿、后殿是建筑得十分壮丽的，巍然宫殿的气象，而忠王府现存的大门却是一座卑隘的清朝衙门式的大门，在建筑的规模上是绝不相配的。从历史事实来考证，苏州忠王府外部规模是完全照天京王府的规制的，在宏伟的大门外建有两座鼓吹亭，东西两旁又建有两辕门，其上各建有凌空飞展的角楼。所以这一座大建筑，曾经被地主阶级分子一方面不得不赞叹它“极其壮丽”，同时却又要诅咒它“规模僭越”。这又可知现存忠王府大门并不是原来的大门。经过这样地检验之后，第一个假设是被否定了的。我们放弃了第一个假设，根据忠王府现在的大门与忠王府内部建筑的对比，并与历史事实的考据对证，证实了第二个假设是真实的事实，得出苏州忠王府今天这一座清朝衙门式的大门建筑是李鸿章把忠王府原来具有王府规模的宏伟建筑拆毁改建，而从别处移来一副旧大门嵌上去的结论。^②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见发现问题，建立假设，寻求证明，检验假设，乃是全部考据的过程。这也就是为马克思主义所武装了的新考据所用的技术性的方法。

① 详细考证见拙著《天历考及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一书。

② 请参看拙著《苏州忠王府小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遗迹调查集》一书内。

四 考据的对象问题

接着，我们还要谈谈考据的对象问题。

关于这一个问题，就我个人的体会归纳起来约有史料辨伪须要考据、史料和史迹的鉴定须要考据、史料的诠释须要考据、史事须要考据等四项。兹分述于下。

（甲）史料辨伪须要考据

史料整理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工作，而史料辨伪又是整理史料的第一步工作。就我个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体验，首先碰到的困难便是作伪者伪造的鱼目混珠的伪史料问题。

太平天国史料伪作之多，具备了形形色色的面目：有的是同时起义的天地会要假托太平天国名义来号召群众而伪造太平天国的文件，如广东天地会张平湖等的伪造洪秀全敕谕；有的是后人为了鼓吹革命而伪造太平天国文件，如清光绪末年南社诗人高旭的伪造石达开诗；有的是自己要写太平天国史事，却不老老实实说是自己作的，而要捏造一个乌有的人，说是太平天国中人的记载，并且捏造了许多假事迹来证明他自己的说法以骗人，其中最著名的一种便是所谓沈懋良著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有的是伪托太平天国首脑人物家里人的著作以见重，如罗惇齋撰《太平天国战纪》伪托是从北王韦昌辉嫡子韦以成所撰的《天国志》修饰而成；有的是因为知道太平天国原有某种文件，或轻信传说某人曾向洪秀全献策，乃伪造此种文件来欺世，前者如李秀成的《十要十误》，后者如所谓钱江的《上天王书》及《兴王策》；有的是为牟利起见，如古董商人伪造太平天国的钱币、圣钞、墓碑，如书商伪造太平天国文献钞本等等。这种种作伪，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了。

太平天国史料伪作既如是其多，种类既如是其繁，如果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不首先加以辨伪的工作，就把这些伪史料与真史料混同整理起来，并且进一步根据来写历史，那末，得出来的分析、批判以至于结论，就必然的免不了错误，那怎样说得上科学的信史呢？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部题名为樗园退叟编的《盾鼻随闻录》，自称是从广西就在清军襄办文案，

一直从广西追太平军，经过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与太平军作战，“将目击躬亲之事编辑成帙”的。其实，这一部诬书却是一个当时在四川做清朝永宁道官员的汪堃捏造太平天国虚事假事来攻击他的仇人何绍基的。这一部诬书对太平天国极肆诬蔑，所以太平天国政府下令禁止，凡有收藏的都治罪。而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都很重视这一部书，他们虽然也知道是汪堃做的，但完全没有稽考汪堃的历史，就完全相信了他在序言上的欺骗，认为他据亲见亲闻写出此书，可供参考之处极多，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太平天国资料》还把此书收入。我们表扬太平天国革命，却反把太平天国政府严禁的诬书来传布，这当然是一件大错误，而所以会犯这错误，就由于没有考据。^①

所以，我们面对着这一个问题，就必须把那些已经发现了有伪造嫌疑的史料加以考证，予以否定，从而清除出真实的史料之外，这样，我们就必须进行考据，提出证据，并且打破沙锅问到底，追出它作伪的根据。我们不仅要在以前相信那些伪史料的人们面前揭穿了作伪，如果伪造者还生存，我们还要使作伪者在真凭实据之前低头承认。我在南京就曾经这样向作伪的古董商进行过说服。必须这样，然后才能够扫清伪造的史料，然后伪史料才不致于鱼目混珠混乱了真实的史料。

我们举的是太平天国史的例，其他方面，也或多或少会有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史料必须辨伪，而从发现作伪嫌疑以至于证实，就必须进行严肃的考据。

（乙）史料和史迹的鉴定须要考据

史料和史迹必须经过鉴定，然后伪假的或讹传的方能清除，而真实的方得确定。一个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的历史工作者，断不应该对任何一件史料或一个史迹不加鉴定就肯定它的真实性的。而要进行鉴定史料和史迹就必须考据。关于史料的辨伪方面已经在上节说过了，现在专说真实的史料和史迹的鉴定。

我想从太平天国的史料和史迹的鉴定中举出三个例子来说。1944年

^① 详见拙著《一部太平天国的禁书》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内。

前广西通志馆从湘乡曾家摄照了一部分和钞录了全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回来，请我去做考证。当时有许多人不相信曾家肯把真本借摄借钞，我也有同样的怀疑；还有人根本否定湘乡曾家收藏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实性，说是曾国藩伪造的赝品。十多年来，经过我们三番五次地进行考据，首先从形式方面作鉴定，包括字迹、语汇、用词、语气等鉴定，再进一步从内容方面作鉴定，即文件的阶级性质的鉴定，结果证实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实性。^①

又如 1952 年南京堂子街发现太平天国壁画，去看的人几乎一致的都说：“上面没有半个题字，茫然一片，如何能够说是太平天国的壁画呢？”还有人说：“这些壁画寺庙里多得很咧，那末，寺庙里的壁画也可以说是太平天国的壁画了！”当然，我初时也同大家一样感到茫然一片，但我认为必须经过考据，提出证据，然后才能够得到否定或肯定的结论。因此我进行考据，结果，证实这些壁画确是太平天国的壁画，大家都同意我的鉴定。于是经过考据就确定了这一个对于人民艺术的传统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的发现。^②

再举一个例，如 1954 年 1 月浙江绍兴发现了两张太平天国合挥。合挥上登记一个男的和一个人的姓名、年岁和籍贯，在女的姓名上有“配妻”二字。发现之后，大家交换意见，认为应该是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但是，当时还没有文献为之证明，因此，大家不敢断定。于是我进行考据，结果，在一部曾经居住过天京的人陈庆甲《金陵纪事诗》中，叙明太平天国“男女配合须由本队主稟明婚娶官，给龙凤合挥方准”的事实，这就证明了这两张合挥确是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由于这两张太平天国结婚证书的发现得到证实，不仅是证明太平天国结婚制度的严肃，彻底地扫除了地主阶级记载对太平天国男女关系的种种诬蔑，而且，从证书上所写的内容与封建社会买卖式婚姻的礼书帖上所写的内容正表现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婚制度，而说明了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是一种反对封建的基于男女自愿结合的婚姻制度。^③

① 详见《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一文的考证。

② 详细考证见拙著《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调查记》一文的考证。

③ 详细考证见拙著《李大明柴大妹合挥翟合义祝大妹合挥跋》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拙著《太平天国文物图录》一书内。

由此可见，史料和史迹的鉴定必须要考据，因为经过考据，对那些受怀疑的、或半信半疑的、或未经过鉴定的真史料和真史迹的真实性提得出证明，从而依靠证据，予以确定。

（丙）史料的诠释须要考据

要了解史料的内容，许多地方都须要诠释，不加诠释往往看不出内容，而要进行诠释，就必须考据。这些史料的诠释，看来好像是片段的、枝节的，其实，如果我们不把它滑过去，把诠释做得好，就常常可以从它里面考得重要的史实出来。

试举两个例子来做说明。例如 1953 年发现的《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锬北伐报告》，这是今天发现的第一篇有关太平天国北伐的重要报告。我们把它研读起来是遇到困难的，必须把那些困难的地方加以诠释，然后才能够明了内容，这就必须进行考据。我只举其中一句话来说便可知。报告中说克复河南归德城那一天，“林凤祥、李开芳二人带五车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只，有旗兵对江把守，仍在对江小村驻扎一夜”，这里所说的“黄河四十里之遥”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报告中没有说明，这是必须要考据的。在那里的行军详细情况也应该有进一步的考据。经过了考据才知道那一个地方叫做刘家口。刘家口是个什么地方呢？不仅现代的地图上找不出来，就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绘的地图上也找不出来。于是又得去考查，经过一番稽考，才考查出刘家口乃是离归德城西北四十多里的黄河南面的口岸，是当时山东、河南各省商船云集的所在，属山东曹县辖境，过河就可以向山东省挺进，所以太平军打算在这里过黄河，取道山东，进攻北京。不料清军采取防守黄河战略，先把船只尽收泊北岸，到太平军抵刘家口时，就放火把船只烧光，使太平军无船可渡，而不得不改变计划从河南渡黄河向直隶进军，以后就在怀庆、山西、保定等地处处受阻，到深秋才到天津，又遇大水阻碍进军。如果当时太平军在五月中旬就得从刘家口渡过黄河，从清朝北方防御力薄弱的山东向北京迅速进军，就不致于处处受阻，很可能在六、七月间就挺进到北京。那时候，正是粮熟的时候，清朝无法封锁，当不致于如同后来那样在静海、独流因粮尽不得不退兵的事。可知当时太平军不能在山东刘家口渡过黄河是使以后作战发生了重大的困难，阻碍了有利的进军的。

这是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史中的一件大事，倘使我们研读这篇报告时，匆匆地就把这句话滑过去，而不加以不畏艰辛的考据，我们怎样能够看出这一件大事呢？^①

又如我从前做《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工作时，对原稿本忠王自述被俘说：“因此我藏不住，被两国（个）奸民查获，解送前来”那一句没有去做考据，当然就完全不注意到这一句话的重要。到1953年南京举办太平天国克复南京百周年展览的时候，江宁县文教科陈枫林先生根据他的实地调查告知我逮捕忠王那两个奸民是丁村王小二和润东村陶大赖（《赵烈文日记》作陶大兰）。我得了陈枫林先生的调查，再去稽考曾国荃的机要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赵烈文也说是曾国荃部将提督萧孚泗的冒功。经过了这样的考据才引起我对这一句话的密切注意，于是我就把原稿钞本与曾国藩刻本校勘，才发现出曾国藩把忠王原来写的“被两国（个）奸民查获”七个字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情况完全两样的八个字。曾国藩为什么要偷改这七个字呢？因为清政府对攻下天京第一件大事是要捉忠王，赵烈文当时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捉不到忠王就好像考试交不了卷。捉得忠王是第一大功劳，而忠王的被捉是由于奸民查获送来，功劳便减了，所以曾国藩就不得不把《忠王自传原稿》“被两国（个）奸民查获”一句话偷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于是经过这样一改，曾国藩就得封了一个侯爵，曾国荃得封了一个伯爵，萧孚泗也得封了一个男爵。汉奸们的拜爵封侯，就在于这几个字的轻轻一改！由于这一件事的考据清楚，就使我们了解曾国藩所以不得不删改《忠王自传》的原因，而前广西通志馆从湘乡曾家借摄和借钞的《忠王自传》确为原稿本也提供了一条强有力的证明。^②

由此可见，史料的诠释必须进行考据；如果不进行考据，就会不了内容，就会把重大的史事轻轻地滑过去。

（丁）史事须要考据

历史事实常常有隐蔽不明的或异说纷歧的，还有虚捏的或歪曲的，特别

① 详细考证见拙著《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锬北伐报告跋》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内。

② 详细考证见《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一文。

是封建统治者对革命的诬蔑更是连篇累牍地充满在封建统治者编著的记载上，这些都必须加以考据，然后才能够看见历史的真相。

试举几个例子来说说。例如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不仅是始终没有拒绝过天地会的参加，反之，主动地去争取天地会的参加，太平天国从广西北出湖南，是由于得到湖南天地会的参加，增加了宏厚的势力，才能够席卷湖湘，东下江南；太平天国把曾国藩紧困在南昌，同时并调动得兵力回天京打垮清朝江南大营，是由于得到广东天地会到江西来参加；太平天国在浙江慈谿打死美国侵略者华尔（F. T. Ward）之役，是由于广东天地会在慈谿起义加入；太平天国曾在仪征马头制造皮蓬小船预备冲过清军水营去上海接应刘丽川起义军队；天地会加入太平天国的群众一般的都成为太平天国基本队伍，就是那一支在江西加入石达开部下还保存原来旗帜被清统治者叫做“花旗”的天地会队伍，也一直战斗到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天京失陷后转战闽、粤时为止。但是，二十多年来，却有些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本着他们的主观臆断就肯定说：太平天国在壬子二年天德王洪大全在广西永安州被俘之后，就拒绝天地会的参加，上海刘丽川起义请援也遭拒绝。他们的臆说就成为近今批判太平天国不知讲求统一战线的事实根据，指为太平天国失败原因之一。这一个臆说，就是由于那些人们没有认真做过钩沉索隐的考据工夫，所以真实的历史便看不出来。^①

又如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原因之一是种根在个人权威与封建性的等级观念上。这是历史上农民革命难于避免的悲剧。这就表现于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的矛盾，杨秀清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位的争夺。内讧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在革命内部的反映。这就表现在韦昌辉乘机夺取革命政权的事变上。我们今天对内讧全部经过虽然还有若干事实不够清楚，不过，对主要的原因却已经清楚的考出来。但是，却有人以为太平天国内讧乃是萌芽的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洪秀全、杨秀清代表萌芽的无产阶级，而韦昌辉、石达开代表地主阶级，也有人以为是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有人根据无根的野史以为是由于杨秀清和洪宣娇、傅善祥的三角恋爱所引起。我们要忠实于历史，就必须进行考据，深入去发掘史料，去

① 详细考证见拙著《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

否定荒谬的史料，考得出真确可信的史事，然后才能够得出真确可信的结论。^①

又如1951年1月《人民画报》第二卷第一期为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年而刊载了清光绪十九年癸巳永安刘福姚编的《永安苏公仁轩褒忠崇祀图》中《州城御寇》和《巷战成仁》两幅插图。第一幅图，城上旌旗林立，高扬着一面代表清统治的“永安州正堂吴”大旗，守城的清军在永安州知州吴江的领导下，面对着太平军大炮的轰击，英勇无畏地守卫着城垣。城下是太平军在仰攻，只有大炮的火焰向城上频频地发射，而作战的太平军却没有英勇的表现。第二幅图，太平军从城门大队打进了城，城内高扬着一面代表地主阶级的“苏”字大旗，由统率团练的苏保德带领人马当先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表现出了清军人马顽强的战斗。这两幅插图强烈的表现出地主阶级对抗革命的凶顽的思想意识，但是却完全不是事实。当时真实的事实是这样的：太平天国进攻广西永安州，清军是没有什么抵抗的，太平军第一天到了城外，第二天连枪炮都没有放，只放了爆竹就把永安州攻下。在打进城后，清军也没有什么巷战，当时清朝守卫永安州的武将是统领平乐协军队的副将阿尔精阿，文官是永安州知州吴江，就跑到关帝庙上吊而亡，至于那些带民团辅助正规军守城的地主阶级分子苏保德、汤慎德、陈德翰等逃跑不了，都在城内被杀了。当时的事实如此，而地主阶级编纂的《褒忠崇祀图》为了企图要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就歪曲历史，颠倒事实。然而这一件真实史事必须经过考据才能够指得出地主阶级编纂历史颠倒事实的虚诬，而《人民画报》没有进行考据就把这两幅插图刊载出来，于是本来是着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的，反恰恰是替清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对抗太平天国作了宣传。^②

由此可见，那些隐晦不明的或异说纷歧的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歪曲事实的史事，必须进行考据，否则看不到历史的真相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和上了封建统治阶级反动记载的当。

① 详细考证见拙著《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案此文所考主要是事实的经过，但解释不够全面，有待再版修改。

② 详见拙著《褒忠崇祀图无耻地歪曲历史》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一书内。

五 试说新考据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与地位

根据上面各节的论述，我们可以对新考据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与地位得到初步的认识了。

首先从方法来看，新考据批判地接受了旧考据所用的形式逻辑的方法，它把这些方法只作为技术性的方法，而在新考据方法中，起领导作用的乃是唯物辩证法。指导考据的已不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而是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其次从任务来看，新考据不但考据史料，还考据史事；不但考据史事的现象，还进一步考据史事发生的底蕴。

这样看来，不仅可见新考据与旧考据有截然不同的崭新的面貌，也可见新考据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与地位。

新考据不同于史学：“历史科学底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底规律。”^①而新考据所研究的只是单独的史事，它是为史学做了研究事实、对比事实、积累事实的工作。

新考据不同于史料学：“史料学底任务，是把史料分类，予以批判的分析，确定其来源、阶级性质和用途以及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最后就史料的多样性，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综合研究整个的史料。”^②而新考据只是鉴定史料，它是为了史料学做了研究史料的第一步工作。

史学、史料学和新考据是三个不同的范畴，绝不能混淆的。但是，史学须有事实做根据，没有事实，就成为空谈；史料必须考订，不考订，就会以伪乱真。而事实须依赖于新考据，史料的考订也须依赖于新考据，所以史学、史料学和新考据又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因此，必须明确新考据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与地位，然后才有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

可是，我国今天史学界对这一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有些史学家专“凭

①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② 苏联大百科全书《史料学》。

主观想像”，专“凭死的书本”，而不“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①，忘记毛主席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谆谆告诫，致造成了一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作风。要扭转历史科学工作中这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作风，就必须遵循毛主席论研究工作必须“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的指示。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有一封教诫青年科学工作者的信很可供我们今天体会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时的参考，他说：

你们要养成谨严和忍耐的习惯。要学会做科学工作中的细小工作。要研究事实、对比事实、积累事实。

无论鸟翼多么完美，但如果不凭藉空气，牠是永远不会飞翔高空的。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你们如果不凭藉事实，就永远也不能飞腾起来的。如果没有事实，那你们的“理论”就会成为虚枉的挣扎。

但是在研究、实验和观察的时候，要力求不停留在事实的表面上。切勿变成事实的保管人。要洞悉事实发生的底蕴。要坚持不懈地寻求那些支配事实的规律。^②

巴甫洛夫这一篇语重心长的话也可以做我国今天有些史学家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作风的砭针。巴甫洛夫所说的“研究事实、对比事实、积累事实”，“要洞悉事实发生的底蕴”的工作，在历史科学说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考据所担负的工作。固然，这种工作，只是“科学中的细小工作”，但却是科学中的基本工作，不学会做这种“科学中的细小工作”，就绝不可能做科学的研究工作，而要扭转我国今天有些史学家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作风，新考据工作尤其是对症下药的好方针。

只有明确新考据方法的真正作用与地位，才能够扫清旧考据的流毒；也只有明确新考据方法的真正作用与地位，才能够有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二一至八二二页，《改造我们的学习》。

② 见《巴甫洛夫选集·给青年们的一封信》。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

一 我鉴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忠王自传原稿确是忠王亲笔自传的根据

考证《忠王自传原稿》第一个大问题是鉴定真伪的问题。一件经过反动统治者之手的历史文献，首先必须鉴定它的真伪，而这一部掌握于反革命头子曾国藩手里的《忠王自传原稿》尤其应该如此。

我鉴定《忠王自传原稿》，是从两方面去作鉴定：一、从形式方面作鉴定，包括字迹、语汇、用词、语气等；二、从内容方面作鉴定。

形式方面的鉴定，先说笔迹的鉴定。笔迹的鉴定首先要树立鉴定的标准，就是说必须先确定了真的笔迹，把它作为鉴定的标准，然后才有一个标准去鉴定那些被鉴定文件的真伪。案现存忠王文件计有十六种，兹表列于下。

下表现存忠王文件连与慕王谭绍光覆戈登（C. G. Gordon）一种算在内，共计十六种。其中《自传原稿》一种系待鉴定的文件，我们在这十五种之中应该选择哪一种作为鉴定忠王笔迹的标准呢？

我们知道，文书有亲笔代笔之分。考太平天国制度，设有“掌书”、“书理”，专担负造作文告、撰拟禀奏的职任^①，所以用忠王名义颁布的文告，应该是专职人员撰写，而给部下的书谕中则有忠王的亲笔。今案下面十五种文件，除十一、十二两种未见原件或照片不论外，就我们辨认，现存忠王文件，实出自多人的手笔，因此，断不能认为用忠王名义颁发的文件就都是他

^①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同职官总表》。

现存忠王李秀成文件表^①

编号	年 月 日	文件名称	收藏处所	著 录	附 记
一	太平天国戊午年十月廿七日	副掌率后军主将李秀成钧谕李昭寿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有封套
二	太平天国庚申年四月初三日	忠王书致张洛行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有封套
三	太平天国庚申年四月初三日	忠王淳谕康玉吉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四	太平天国庚申年六月十二日	忠王覆英国教士艾约瑟杨笃信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书翰》影印	
五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忠王淳谕赖文光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书翰》影印	有封套
六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忠王淳谕容椿侄容发男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书翰》影印	有封套
七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	忠王淳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八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	忠王淳谕赵景贤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九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初六日	忠王淳谕刘肇均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十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初五日	忠王瑞批徐少遵	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	未著录	
十一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初六日	忠王书致陈坤书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刘半农编《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排印	
十二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忠王书致黄子隆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刘半农编《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排印	
十三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月廿六日	忠王给凭英国洋兄弟吟喇	不详	A. F. Lindley(吟喇) <i>Taiping Tien Kwoh</i> 影印	
十四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	忠王亲笔答辞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影印 罗尔纲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印十五页	
十五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	忠王自传原稿	原存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	梁启超编《忠王李秀成自传真迹》影印	
十六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 ^②	忠王慕王书覆英国戈登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太平天国书翰》影印	

① 本表参照丁云青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一文附表编制，刊于1957年《文史哲》第三、第四两期。
 ② 此件未著年月，按书中有“自齐文所带数人，因前受伤，各愿回去医治，已于初四日送南潞，令上洋船”等语，知为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所发。

自己写的；我们要从其中考查出有没有忠王的亲笔，哪一种是忠王的亲笔，是必须有根据，并且经过确凿的考证才能够确定出来的。

在这十五种忠王文件之中，原件上记明是忠王亲笔写的只有第十四种《忠王亲笔答辞》。案《忠王亲笔答辞》收在《忠王答辞手卷》内。《忠王答辞手卷》原为庞际云家藏，传子庞芝阁，庞芝阁歿后，归其内侄李鄂楼^①，1937年春天，在苏州吴中文献展览会展出，现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此卷末庞际云跋说：

同治甲子六月，湘乡伯克复金陵，生擒忠酋李秀成，湘乡侯相自安庆移节东下，李廉访鸿裔与际云实从，奉委会鞠。其忠酋手供一册，已进呈御览。其时对簿复有数纸，亦可备考。第一纸乃湘乡侯相手书，其中小注，则际云随讯随录；第二纸乃忠酋口操土音，语不可解，际云令其自书者；第三纸乃际云手录之供；第四、五、六纸则李眉生廉访奉湘乡侯相之命，问辞供辞均已分晰注明矣。辛未八月装潢（潢）成卷，嘉平立春日际云谨识。

案“湘乡伯”称曾国荃，曾国荃封威毅伯，“湘乡侯相”称曾国藩，曾国藩封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此份文件全文分七纸：第一纸是曾国藩手写问辞及庞际云注录忠王答辞；第二纸是忠王亲笔答辞；第三纸是庞际云录忠王答辞；第四、五、六纸是李鸿裔录曾国藩问辞及忠王答辞；第七纸是庞际云跋语。考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六月廿七日记里记道：

傍晚夕倦甚，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

曾国藩所开的问条，便是这份手卷里面第一纸曾国藩所写的问辞。我们把这一页曾国藩手写问辞和他的手书日记字迹对照，也确实是曾国藩的手笔。至于庞际云、李鸿裔两人被曾国藩委派会鞠忠王事，俱见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

^① 据李国瓌《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见《学风》第七卷第五期。案李国瓌是庞际云儿子庞芝阁的内侄，李鄂楼是他的从兄。

初七日《贼酋分别处治蠲筹善后事宜折》^①说：

李秀成之就擒也……臣二十五日甫至金陵亲讯一次，旋派候选道庞际云、候补知府李鸿裔、候补同知周悦修等鞠讯累日。

这份文件的原藏者及加跋语的人便是候选道庞际云，而写第四、五、六纸问辞和答语的人便是候补知府李鸿裔。又考曾国藩《贼酋分别处治蠲筹善后事宜折》说：

据李秀成供……李世贤系李秀成堂弟，与之约定八月以前则掳江西之粮以救侍党之饥，八月以后全数回甯，图解长围，则掳宁国之粮以救金陵之饥等语。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

案第五纸李鸿裔所录忠王答辞有两段话说：

侍逆各党之甯江西，乃李酋所使。八月以前则就江西之粮，八月以后仍复回甯，则徽、宁、句、溧一带秋稻熟矣。其意仍在回顾南京之粮，而不思甯楚、甯粤也。

官军多杀两广人，则贼氛愈团结不散，军务永无了期。

我们把上面曾国藩奏报清廷的话来对照，便知道他是据自这份文件里面李鸿裔所录忠王这两段答辞说的。

根据上面对文件来源、曾国藩笔迹、文件内容等方面考证，都证明了这一份《忠王答辞手卷》的真实性，而保存在这份手卷内的《忠王亲笔答辞》确为忠王的亲笔字迹。

因此，要树立鉴定忠王亲笔字迹的标准，只有以这一种《亲笔答辞》为标准。案《忠王亲笔答辞》写的是豫王、燕王事，共二十八字说：

胡以晄即是豫王，前是护国侯，后是豫王。

秦日昌即是秦日纲，是为燕王。

^①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५५७

早午後與沈事相三卷中數次在沈家作伴因於一局與沈
德祥兄客于餘庚己刻夕睡約一時許午正陪客吃飯
沈亦稱片一掃客客于去滬易時告其昌叔陳鶴仙等
志甚散天氣尚熱又至昨午睡中正室紀澤兄信一件開
批稿十餘件與沈事因棋一局又兄客三次旋省三書台
生未起飯後再與沈人德祥沈事十言而返克復重慶云

性一智成交接年昌福商社又与老生等一叙早晚

附記

孔教人盡欲同其建道 他部深雅

歌德之詩集

[illegible]

遊名山記

周應麟名震

咸丰二年九月方家鎮林鳳祥王季子細
所授傷文並舟上步趨多何以括其王係孫日昌
此本已細已年而後封侯王日昌子
林紹璋形咸丰二年五湖澤戰敗其人并其年
值其後何年海封事王
曹文春与林紹璋同到湖南死於岳州其人生一幼子
省在客家深何以林紹璋權心
林鳳祥打平事死於建鎮者聞方死於岳州林紹璋死於
平年死於九江所以後者林鳳祥又稱平王曹文春之子也
此王林紹璋父死於平王何年王封的

日 記
三 治 回 年 手 摺 國 柳
六 廿 六 年

忠王答辞手卷第一纸曾国藩手书问辞

胡以旼即是豫王前是護國侯
後是豫王

秦曰昌即是秦曰綱是為

燕王

今将湘乡曾家所藏《忠王自传原稿》字迹来与这一份《忠王答辞手卷》中亲笔答辞对照，正是同出自忠王的手笔。后来我把《忠王自传原稿》来与现存以忠王名义颁布的原文件对照，又鉴定出那份故宫博物院在清朝军机处档案发现出来的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忠王《谕李昭寿书》也是忠王的亲笔。

其次，从语汇、用辞、语气等地方去考察。我们看出了《忠王自传原稿》有它的特殊语汇，和运用一些广西省潯州、梧州一带的方言，例如：

一、格·格而 “格”作“更加”解，“而”助词，如“度日不能，度月格难”，“见其弟至，格外欢喜”，“格而深信”，“格而不信”。

二、其各 《忠王自传原稿》说：“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其各实因食而随”，“其各易办”，“其各肯从成此事”，“其各记话而从”。案“其”字忠王用作第三身代名词，“其各”连作一个词汇颇费解，体会文意似应作“他们各人”解。至“其各”读音，我疑与客家方言有关，曾请教过一位客家同志，据说客家方言称第三身单数的读音作“极”，这是一个在“渠”与“其”之间的音，称第三身众数作“极丢”，也有些似“其各”的音，但是否从客家方言写出来的词汇未能肯定。这一个辞汇，还应该加以研究。

三、少何 “少何”作“少有”解，如“自成知情之事，俱一全登，少何失漏”。

四、押制 “押制”作“掣肘”解，如“押制翼王”，“有安、福王押制”。

五、揣沓 “揣沓”即“揣度”，如“揣沓来情”。

六、转 “转”作“回”字解，如“我由太平门败转”。

七、好惜 “好惜”即“可惜”，如“尔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

八、本事 “本事”即“本领”，如“若我有此本事”。

九、契爷 “契爷”即“干爸”，如“张国樑与向帅拜为契爷”。

十、定疊 “定疊”是把要做的事情完全办妥了的意思，如“过到金山，齐名定疊”。

《忠王自传原稿》所用的代名词也颇特别，第二身用“爾”，如“爾奉爾主

之命镇守杭州，我奉我主之命来取，各扶其主，爾我不得不由”。第三身用“其”，如“其定用手枪”。在现存原稿照片上，曾国藩把忠王原来所写的“其”字都改为“渠”字，其中有一处原稿作：

其等在外路阔，尔兵到此，其又去彼，何不有乱于民。

曾国藩改为：

渠等在外路阔，尔兵到此，渠又他去，扰乱于民。

案“爾”字古代用作第二身代名词，《论语》：“惟我与爾有是夫”。客家方言也同以“爾”字做第二身代名词（忠王写的是简体的“尔”字，曾国藩刻本改用繁体的“爾”字）。考太平天国广西起义群众，大多数是客家人。《忠王自传原稿》用有简体字，写不文不白的文体，正是遵守太平天国反对“古典之言”的文化政策^①，他断不会特地用古典的“爾”字。而从他不用“汝”字或“你”字看来，他应该是客家人，所以用客家方言的“爾”字来做第二身代名词。至于忠王用“其”字作第三身代名词，大约是由于浔州、梧州一带称第三身作“渠”，“渠”“其”音近，又客家方言称第三身单数作“极”，这一个字的读音在“渠”“其”之间，故忠王作“其”。“其”字本等于语体文“他的”，是第三身代名词的所有格，忠王用做主格是不合文法的，但在他全部自传看来，却成为特殊的用字。不过忠王在上引句子中，以“去彼”与“到此”相对，在文法上和语意上都没有错，曾国藩也都把它改了。据上所引各例看来，《忠王自传原稿》是有它的特殊语汇和运用了一些广西省浔州、梧州一带的方言的。这些地方，就是懂得浔州、梧州一带方言的人，还须要细细地去体会，而况曾国藩，即使他囫圇吞枣地知道它的大意，也很难于懂得它的语源，更断断不是他所能伪造的了。

我们把《忠王自传原稿》来与《谕李昭寿书》对勘，又看出：一、忠王

① 见洪仁玕等《戒浮文巧言谕》述洪秀全的指示。

喜欢用叠字,《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相同;二、《自传原稿》用的虚字表达文句的神情与《谕李昭寿书》相同;三、《自传原稿》用字用辞有与《谕李昭寿书》相同的地方;四、《自传原稿》用“爾”字做第二身代名词与《谕李昭寿书》相同(详见《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我们根据这四项,从文笔的鉴定上证明《谕李昭寿书》为忠王的亲笔书信,反过来同样也可以证明《自传原稿》确是忠王的亲笔自传。

以上是从形式方面的鉴定。现在,再进一步从内容方面去作鉴定。

内容方面的鉴定,是文件的阶级性质的鉴定。一部《忠王自传原稿》显示出了对鉴定它的真实性至有关系的几项重要内容:第一,《忠王自传原稿》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强烈的革命情感;第二,《忠王自传原稿》记载了太平天国革命反封建反侵略的业迹;第三,《忠王自传原稿》对反革命诬蔑太平天国杀人放火的恶毒宣传用事实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第四,《忠王自传原稿》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

关于第二、第三、第四三项,读过《忠王自传原稿》的人都知道,惟第一项应该加以说明。因为忠王在自传里面,为了要达到他的政治企图,避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起见,而不得不写了许多伪饰的话,泛泛看过去,似乎在词句上甚至内容上立场都变了。要是仔细检查,它的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如自传开端说:“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忠王就坚定地不写清朝的纪元,遵照太平天国的制度用甲子纪年(全部自传都用天历,只有最后两处用阴历,当是曾国藩改的)。又如自传中处处以“天朝”与“清朝”、“天朝官兵”或“我兵”与“清军”对立,就是到了最后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里,也仍然是以“我京城”与“贵营”、“我兵”与“爾兵”对称。凡太平天国攻克的地方都大书作“克复”,而被清兵攻陷的地方则作“失”、或“失守”。这些地方都是十分显著的敌我分明的坚定的立场的表现。要明白这一点,不仅是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我们还应该和当时的叛徒的书法去作比较研究,例如在天京失陷之后,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奖王陶金会在江西向敌人谈判投降时,就在给敌人的文书上写了清朝纪元“同治三年七月”,就把称谓清皇朝的“钦命”、“国法”高抬四格,就自称为“伪听王陈炳文”、“伪宁王张学明奖王陶金会”,就骂太平天国为“广西贼匪猖乱”,就



忠王自传原稿真迹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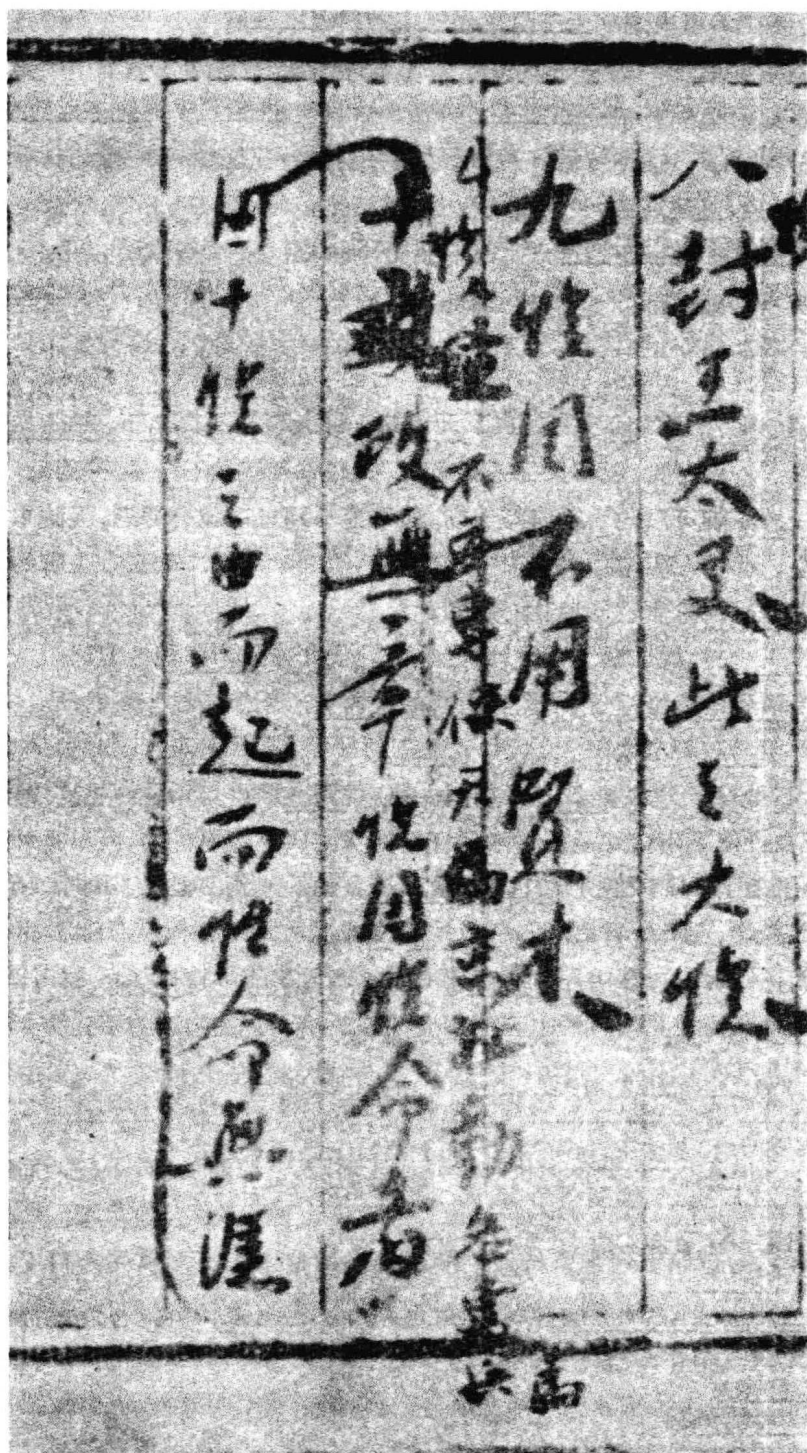
忠王谕李昭寿书真迹第二页

骂太平天国的军营为“贼垒”。^①忠王在囚笼之中，极力要避免对敌人的刺激的时候，在自传的字里行间还掩藏不住他一贯的敌我分明的坚定立场，而叛徒则在向敌人谈判的时候，就完全变了立场。在这一个鲜明对比之下，最充分地也最具体地说明了忠王的阶级立场。又如叙金田起义说：“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首先明确了阶级对立。又如叙述叛徒郇永宽等在苏州叛变说：“这班反臣不义”，如叙述青浦得保说：“幸此将可嘉”，嘉兴不失说：“幸将兵合力”，这些地方，显然包含着强烈的革命感情。至于“起义”这一个光辉的语汇，在自传中屡屡写上，就是在“招齐章程”的第一条里，也还同样地写上。我们又读他在郇永宽等叛变之前对他们的训话说：“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这一个声明，就是明白地坚决地表明了他的阶级立场。又如在向敌人提出“招齐章程”的时候，他说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又说：“被为（围）严紧尚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忠王一再向敌人显示出人民的力量，迫使敌人不得不放下屠刀，以图暂时保存革命的力量，也仍然是完全站稳立场。而为了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在这一段话里面，忠王就把自己称为“罪将”，并且一连写了五处。我认为这一个地方我们必须十分细心去体会。首先要体会忠王向曾国藩自称“罪将”，是不是向曾国藩低头说，罪在革命革错了呢？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忠王在写了第一个“罪将”之后，他立刻就对他自称这两个字加以注解：“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在外，我不能卫天国，又听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他自认的罪只是不能保卫太平天国，与国破身俘之后，不能指挥自己的军队，他完全没有向敌人低头认罪。其次，我们还要体会到忠王在敌人面前写这两个字时的委屈的沉痛的心情。他在写这一

① 见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小明、奖王陶金会致清朝浙江提督鲍超禀，原件存故宫博物院。案《忠王自传》中有一句“捻匪作乱，举手而平”的话，与叛徒陈炳文等所说“广西贼匪猖乱”完全不同，因为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面扰害人民的分子，忠王在自传上所说的“我天国坏者一是李昭寿，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害起”，又说“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其中所说的“招得张乐行之害”，就是指蒙、亳起义群众里面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说的。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至于忠王在自传中指出这一件事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因为当时蒙、亳群众起义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忠王不得不利用这一件事来诱动曾国藩。这就可见忠王这一句话的含义、用意与叛徒们所说的话丝毫没有相同之处。

段“招齐章程”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写这两个字，到了写这一段“招齐章程”，在总叙里他写上了第一个“罪将”，招齐章程第一条劝曾国藩不杀两广人，第二条谈收他的儿子，第三条谈收他的堂弟李世贤，第四条谈收他的部众，第五条谈幼主，第六条和第七条谈具体办法，第八条劝曾国藩不要屠杀天京军民，他都自称“我”，没有写“罪将”两字。到第九条劝曾国藩不要杀太平天国将兵，他才再写了一个“罪将”，到第十条劝曾国藩对中国各省远近州县乡村，都不可以杀为威，他就一连写上了三个“罪将”。这就了然可见忠王写到他的儿子、兄弟、部众和范围比较小的天京的时候，他的心境还比较平静，到写到天朝全国将兵的时候，他的心境迫切起来了，到写到全国人民的时候，他的心境更迫切了。这也就了然可见忠王不是为自己的亲属、部将和一部分地方打算，而是为天朝全国兵将，为全中国人民打算。忠王为了要保存革命力量，拯救全国人民，向反革命头子刽子手曾国藩要求放下屠刀，而不得不忍受耻辱，忍受比万箭穿心，千刀剐骨的痛苦还大的痛苦，我们从这一个地方细细地体会起来，忠王的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①我们还必须一再提出，忠王在自传里面，是特意地细心地讲求斗争的方式的，他还对曾国藩的僚幕说：“恐有违忌字样亦烦改除”。我们知道，忠王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克复杭州之后，他檄谕清朝守湖州的赵景贤，以识时务的俊杰、达事机的贤豪企望赵景贤，他檄谕守上海、松江的清军，称为“清朝兵勇”。忠王为什么不用太平天国一般称谓敌人的口吻叫他们为“妖头”、“妖兵”呢？这是因为忠王要争取他们，就只有根据对方所能接受的程度去说服他们。这是斗争的一种手段。忠王在革命胜利时尚且如此，到了处在革命低潮之时，身系囚笼之中，他就必须更要讲究这些手段了。所以忠王在自传中，什么“老中堂”，什么“中丞大人”，什么“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什么“实见中丞大人有德之人深可佩服，救世之人”，我们只能体会是忠王对敌人斗争的一种手段，而断不可认为他向敌人低头。我们不妨再检查《忠王自传原稿》，他尽管向曾国藩过意恭维，但是他仍然是坚持原则的，例如原稿第一页，第一次写上帝、天王时，都遵照太平天国定制把上帝抬四格，天王抬二格，而称谓曾国藩的

① 关于忠王写“罪将”这两个字的体会，我是根据丁云青先生给我的提示写的。



曾国藩盗改忠王自传原稿“天朝十悞”第十悞墨迹

“老中堂”只抬一格，这说明了忠王对敌人虽作了适当的让步，但他却是坚持原则的。我们必须这样去体会，才能够了解忠王的委屈曲折的心情，才能够了解《忠王自传》的坚定的革命立场。

总之，这四项重要内容，条条都显著地表现出忠王的阶级性，条条都说明了只有同忠王这样的一个人站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阶级立场的人物才写得出来的一部丰富的革命文献，而断断不是反革命头子曾国藩所能伪造得出来的。

接着，我们要指出的是《忠王自传原稿》有揭露曾国藩冒大功的地方。今所见湘乡曾家所藏《忠王自传原稿》里面，除了撕毁的部分不论外，在现存部分还有一条对曾国藩极为不利的记载。这条记载，就是忠王自述被俘的实情。湘乡曾家藏《忠王自传原稿》记道：

那（这）帮百姓密藏于我，那帮百姓得我宝物……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被两国（个）奸民查获，解送前来。

我们对照曾国藩刻本《忠王自传》，却把这一段话改为：

那（这）帮百姓密藏于我，那帮百姓得我宝物……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

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被两国（个）奸民查获”七个字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情况完全两样的八个字呢？因为清政府对攻下天京第一件大事是要捉忠王，赵烈文在日记里论这一件事做了一个譬喻，说如果捉不到忠王，就好像考试交不得卷。^①因此，曾国藩及其走狗捉到了忠王就可以向清政府报大功，如果捉不到忠王就有罪过，捉到忠王而不是他的部下捉获，他也就没有功。所以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奏的《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②里就向清政府虚报说：

①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记说：“幸中丞如天之福，民人得忠酋而缚之，方得交卷出场，不然，此局不独无赏，其受谴责定矣。”

②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伪忠王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萧孚泗亲自搜出。

案萧孚泗是清福建陆路提督^①，围攻天京的曾国荃部下最高的一个将领。曾国藩奏报忠王被俘是萧孚泗亲自搜出，这就是说忠王的被捉，是曾国藩自己和他的走狗的功劳。因此，萧孚泗得封了男爵，曾国藩的得封侯爵，曾国荃的得封伯爵^②，也与擒获忠王有关。现在，忠王在自传里明白说他是被两个奸民捉送到曾国荃军营的，而不是曾国藩的走狗捉获的，如果照这句原文送给清政府，曾国藩和他的走狗不但得不到功，而恰恰揭穿了他的奏报的欺骗，还有欺君之罪。所以曾国藩对这几个对他极为不利的字，就非改去不可。我们从这一件事可以了解到曾国藩不得不删改《忠王自传原稿》的原因，而前广西通志馆从湘乡曾家借摄和借钞的《忠王自传原稿》确为真本，在内容方面也提供了一条极强有力的证明。

在曾国藩所改《忠王自传原稿》里面，我们还可以举出一条对曾国藩自己利害有关的特意改动的地方。案《忠王自传原稿》天朝十悞第十条原本本来是：

十、悞立政无章，悞国悞命者，因十悞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

曾国藩却把这一条全部勾去，改为：

十、悞不_レ应_レ专_レ保_レ天_レ京，扯_レ动_レ各_レ处_レ兵_レ马。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改呢？这是因为曾国藩以大军围攻天京经年累月才攻下，当时曾经被清政府屡次下旨督责，所以他就窃改忠王这一条原稿，作为忠王的话，说太平天国扯动各处兵马，专保天京，以见他的部队是和太平天国的主力作战的，因此久战才攻下。曾国藩这样一改，不仅可以掩盖他的无能，而且可以表示他的功劳。同时还可以暗示清政府，左宗棠的攻陷浙江，李鸿章的攻陷江苏，是由于太平天国调动了各处兵马，回来专保天京，所以

① 据朱洪章《从戎纪略》。

② 据《曾文正公手书记》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记。

他们才得乘虚攻下，这样，也就压低了左宗棠、李鸿章，而抬高了自己和自己的兄弟曾国荃的功劳。曾国藩改动这一处，可能是杀忠王时就改的，也可能是后来他补钞十要十悞送清政府时才改的。曾国藩老奸巨猾的用心，在这一条的修改上，是怀藏有他的深意的。曾国藩这一条盗改，也证明了《忠王自传原稿》的真实性。

根据上面的考证，无论从形式方面的鉴定，或内容方面的鉴定，都同样肯定了《忠王自传原稿》的真实性，并不是曾国藩伪造的赝品。

二 对《忠王自传原稿》为曾国藩伪造说法的讨论

我在1944年初步鉴定了《忠王自传原稿》，1951年把它笺证发表。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是曾国藩伪造，曾经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多次讨论。1956年第四期的《华东师大学报》发表年子敏先生《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文，又提出伪造的问题。

我们知道，问题是越讨论而越彻底，真理是越讨论而越彰明，反对的意见是值得尊重和欢迎的。现在，为使问题得到更彻底更彰明起见，我们应该对年子敏先生的意见进行讨论。

年子敏先生否定《忠王自传原稿》真实性的论据可分为两大部分：即笔迹鉴定和史事考察，而以笔迹鉴定为主要根据，史事考察为辅助根据。他的全部理由是：首先从笔迹鉴定上看，《忠王自传原稿》“不是真的而是假的”。其次，根据史事考察，第一，从时间先后看，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已经取了“忠王详供”，而曾国藩说《忠王自传》是六月二十七日才开始写的，今天所见的《忠王自传原稿》显然“不是真的”，也就是说忠王根本没有写自传这回事。第二，从受伤情况和文化程度看，“每天一气呵成七千字”，“实在也是难以置信的”。第三，从忠王一贯忠贞的表现上看，“突然的写出如此充满卑躬乞降语句的供词，显然是不合逻辑的”。第四，从太平天国敬避与新创的字上看，写法“是有漏洞”，“也难使人置信的”。第五，从描述战役的详略上看，“很难使人相信它的真实性的”。第六，从反革命分子对《忠王自传》的意见上看，“如李鸿章、沈葆楨之流，也都怀疑《李供》的真实性的”。“从以上几个方面考察，也可有力地证实笔迹的鉴

定，说明此项《李秀成供词》不是真的”。因此，年子敏先生作出结论说：“《李秀成供词》既然不是出自李秀成亲笔，那么此项所谓《李秀成供状原稿》，显然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伪造的”。又说：“所谓《李秀成供词原稿》，乃是反革命巨魁曾国藩为了掩饰自己的丑事，进行伪造的。”

我们先来讨论年子敏先生最主要的论据，笔迹的对证。年子敏先生认为忠王《谕李昭寿书》是“忠王唯一之遗墨”，把它作为鉴定忠王笔迹的依据，然后把要鉴定的《忠王自传原稿》和《忠王答辞手卷》中的《忠王亲笔答辞》与它对照。经他送到司法部法医研究所去鉴定。鉴定结果：《忠王自传原稿》是与《亲笔答辞》相同的；而《忠王自传原稿》、《亲笔答辞》两文件写的是草书，《谕李昭寿书》写的是楷书，将前两文件与后者对照，“草书比对，虽然难获其相同之点，但从熟练程度上来看，则有老练与生涩之别”，“应有差异”，“非同一人之手笔所书写”。年子敏先生据此作出《忠王自传原稿》“不是真的，而是假的”结论。他说：

据司法部法医研究所 (56) 法医物字第 0124 号函附之笔迹检查说明书称：所谓“原供”与所谓《亲笔答辞》，“字迹潦草不甚熟练”，而《忠王谕李昭寿手书》则“书写整齐而老练，笔势挺而有力”，由于字体与所谓原供及所谓《亲笔答辞》“草书比对，虽然难获其相同之点，但从熟练程度上来看，则有老练与生涩之别”。“按一人之书法能写正楷者，其草书大都熟练，纵使对草书不习惯者，亦不致显出生涩或呆板等现象，这点可以理解，因此从熟练程度上来分析，认为与”所谓《原供》及《亲笔答辞》“应有差异”。据此，法医研究所的结论是：《忠王谕李昭寿手书》与所谓“原供”及《亲笔答辞》笔迹“非同一人之手笔所书写”。因而从决定所谓《李秀成供词》是真是假之笔迹的科学鉴定来看，罗尔纲先生所说系出自一人手笔系原稿无疑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结论应该是：所谓《李秀成供词》及所谓《亲笔答辞》与目前忠王唯一之遗墨《忠王谕李昭寿手书》笔迹不符，故应断定此项所谓《李秀成供辞》并非出自忠王手笔。此项所谓《李秀成供词》，不是真的，而是假的，那更不是什么“忠王自传”了。

案法医研究所对《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及《忠王亲笔答辞》的书法“应有差异”的鉴定是对的；但他们不问前者与后两者书写时有无不同的情况，他们完全没有根据前者与后两者书写时的全部不同的条件进行分析，就做出“非同一人之手笔所书写”的结论，那却错误了。这是一个没有掌握到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的理论所造成的错误的结论。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人写的字会有差异。这一个道理，中国古代书法名家老早已经指示给我们。如唐代著名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里指出书写时的健康和心情、境遇、气候、纸墨、兴趣五种条件，条件好的叫做“合”，不好的叫做“乖”。如果“五乖同萃，思遏手蒙”，在“手蒙”的情况下，“蒙无所从”，就会写出“彫疎”的字；如果“五合交臻，神融笔畅”，在“笔畅”的情况下，“畅无不适”，就会写出“流媚”的字，所以“乖合之际，优劣互差”。这是一条指出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人写的字会有差异的理论。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器用》章里指出没有好的纸、笔、墨、砚四种工具，虽名书法家也不能写得好字，他尤其强调纸、笔的重要性，他做了一个譬喻说：“纸不光细，譬之驍将骏马，行于荆棘泥泞之场，驰骤当先，弗能也；笔不颖健，譬之志奋力壮，手持折缺朽钝之兵，斩斫击刺弗能也”，他批评俗语所说“能书不择笔”的话，是“断无是理”。考忠王《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不仅是字体的不同，《谕李昭寿书》是楷书（间有几个行书），《自传原稿》是楷书和行书，而两者书写的全部条件都不同：《谕李昭寿书》是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廿七日写的，《自传原稿》是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夏历六月廿七日）后写的，这是时间的不同。《谕李昭寿书》是在两个月前在浦口打垮清朝钦差大臣德兴阿江北大营和二十天前在安徽庐州三河镇歼灭曾国藩部下最凶狠的李续宾全军取得了两役决定性的大胜利，粉碎了敌人攻取天京的企图，稳定了太平天国后半期的大局之后兴高采烈、志得意满的情况下写的；而《自传原稿》却是在被俘之后，被囚在木笼里面，既身受国破家亡的惨痛，又为部众、为人民和民族的危机等等问题痛苦地反复筹谋，经历着万箭穿心似的惨痛的时候写的。至于在体力方面，被俘前就受了伤，被俘后，全身又受锥刺、臂股被刀割、血流如注的酷刑，身体衰弱了，腕力一定受了影响，这是处境、健康、腕力的不同。《谕李昭寿书》是在连续获得了决定性的大胜利之后，以临池

学书的从容工夫去写的,《自传原稿》却是忠王在知道曾国藩要杀害他,为了要完成政治任务,而望敌人“宽限”,“我亦赶写”的迫切情况下,以每天约七千字的速度仓猝草成的,这是心情、速度的不同。《谕李昭寿书》是用好笔好纸写的,而《自传原稿》却是用一支“破坏了”到“不能”用的笔写在账簿上的,这是工具的不同。《谕李昭寿书》是在十月小阳春的天气写的,而《自传原稿》却是在六月酷暑蒸热的木笼里写的,这是气候的不同。综看忠王写《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全部条件种种不同的情况,更远过于孙过庭所指出的健康和心情、境遇、气候、纸墨、兴趣五种不同的条件。以孙过庭所说的五种不同条件的情况,还会产生“优劣互差”的结果,那么,忠王《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应有差异”更是当然的了。案法医研究所的鉴定,对字体的不同一点,尚知道“难获其相同之点”,而两者书写时全部条件如此的不同,则“应有差异”更何待说。

我鉴定《谕李昭寿书》是正确地掌握着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我从笔迹鉴定的限制性去看出它与《自传原稿》“差异”的一面。我同时又细心地用八法分析,在《谕李昭寿书》和《自传原稿》中,看出忠王书法“侧”、“勒”、“策”、“掠”、“磔”五种笔法都有他个人的特别风格,从几个偏旁的字、相同的字和行书的字以至变体的字对比,《谕李昭寿书》也与《自传原稿》相同,从笔迹鉴定的有效性去看出它与《自传原稿》相同的一面。由于同是一人所写,尽管有“优劣互差”,但个人的笔法和表现的风格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笔迹鉴定的有效性。由于书写时的条件不同,虽同一人所写,而“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合则流媚,乖则彫疎”,这就是笔迹鉴定的限制性。只有正确地掌握着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鉴定《谕李昭寿书》,不仅从笔迹作鉴定,还从文笔上和内容上作鉴定。在文笔上和内容上的鉴定,提出了七项证据:第一,忠王喜欢用叠字,《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相同;第二,《谕李昭寿书》用的虚字表达文句的神情与《自传原稿》相同;第三,《谕李昭寿书》用字用辞有与《自传原稿》相同的地方;第四^①,《谕李昭寿书》中用有广西浔州、梧州的方

① 此处有缺漏、误排,对照《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文中相关文字,应更正如下:第四漏排小标题原作《谕李昭寿书》用“尔”做第二身代名词,与《自传原稿》同;现“第四”改作“第五”。——编者

言；第六，《谕李昭寿书》文笔有些地方欠通，正是忠王文章本色。忠王有能文的秘书，这封信不是秘书代笔；第七，《谕李昭寿书》不是他人所能代笔，只有忠王本人对李昭寿才写得出这封充沛革命热情爱憎分明动人心弦的书信。我根据这七项证据，得出了《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自己写的书信的结论。文笔上和内容上的鉴定，也证实了笔迹鉴定的正确。我在《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一文中，已经详细地予以论证，在这里不多说了。

年子敏先生最大的证据是根据法医研究所的鉴定。现在，法医研究所的鉴定经过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出它的错误，年子敏先生的根据被否定了，他的结论也就被否定了。

在年子敏先生的论文中，他提出了忠王笔迹鉴定的标准问题。他说：

我认为此项《李秀成供》不是真的，主要也是根据笔迹的鉴定，而且也是以此项吕集义先生所拍摄的所谓“原供”照片与庞际云所保留遗存下之所谓《亲笔答辞》及《忠王谕李昭寿手书》之笔迹相互对比的。不过我在对比之前，先研究了一下出自忠王手书之笔迹，那个真的可能性大，就应以那个为主要依据。所谓“原供”与庞际云保留之所谓《亲笔答辞》，都是在忠王被俘，遭受杀害后，从反革命分子后代的家中发现的，而《忠王谕李昭寿》，则是忠王被俘前手书的。由此可见，是应以《忠王谕李昭寿手书》为主要依据，然后再拿那据所谓“原供”拍摄的十五张照片及所谓《亲笔答辞》，与之笔迹对比。如果后两者之笔迹，确与《忠王谕李昭寿手书》笔迹相同，就可以肯定吕集义先生据以拍摄十五张照片之《李秀成供词》原稿，确系出自忠王手笔。如果与《忠王谕李昭寿手书》笔迹不相同，则显然此所谓《李秀成供词》不是真的。

年子敏先生反对我们以《忠王亲笔答辞》为鉴定忠王笔迹的标准，他的理由是这份文件是“从反革命分子后代的家中发现的”，请问：现存忠王文件原文件，包括只见照片的给呤喇的凭照在内，除了呤喇凭照一种由本人收在著作中之外，有哪一种不是经过反革命分子之手，或存于反动统治的机关，或存于反革命分子的后代的家中？如果说这些文件都不可信，我们今天所依靠

的研究太平天国的材料十分之九以上都不可信了。我们对任何一件太平天国文物都必须经过鉴定而后相信它，当然存于反革命后代家中的太平天国文物尤其要如此，但是，决不能因为是存于反革命分子后代家中就否定它。这是研究革命史的工作者都知道的。至于年子敏先生以《谕李昭寿书》作为鉴定忠王笔迹的标准，他的理由是这份文件“是忠王被俘前手书的”。不错，据我把《忠王亲笔答辞》作为鉴定忠王笔迹的第一个标准去鉴定出《忠王自传原稿》确是忠王的亲笔自传之后，又把《忠王自传原稿》作为鉴定忠王笔迹的第二个标准去鉴定出《谕李昭寿书》也是忠王的亲笔书信。现在，我们要请问年子敏先生是怎样去鉴定出《谕李昭寿书》“是忠王被俘前手书的”？请把鉴定的根据与全部过程公布出来。据金毓黻先生的推测，年子敏先生是根据自我的鉴定的。^①如果金先生的推测不错，那末，我请告年子敏先生：我鉴定《谕李昭寿书》为忠王的亲笔是根据鉴定忠王笔迹的第二个标准《自传原稿》去鉴定出来的，而《自传原稿》又是从鉴定忠王笔迹的第一个标准《忠王亲笔答辞》鉴定出来的。年子敏先生就不可能既根据了我的鉴定结果，又利用我的鉴定结果反过来反对我的鉴定结果所得出的鉴定标准。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固然，《谕李昭寿书》经过我们根据鉴定标准去鉴定它确是忠王的亲笔之后，它也可以作为鉴定忠王笔迹的第三个标准，但是，它却没有具有作为鉴定忠王笔迹的第一个标准的资格，而是在根据第二个标准去鉴定出来之后才取得第三个鉴定标准的资格。

年子敏先生还提出了否定《忠王亲笔答辞》的真实性的意见。《忠王亲笔答辞》收在《忠王答辞手卷》内，在原文件上记明是忠王的亲笔，并经过我们考据证明了它的真实性，因而以它作为鉴定忠王笔迹的标准，而年子敏先生却指为“曾国藩伪造《李秀成供》之一部分”，他根本否定了我们的鉴定标准。因此，我们必须把年子敏先生的说法郑重地提出来讨论。

年子敏先生根据什么提出他否定《忠王亲笔答辞》真实性这一个说法呢？他先提出两点疑问说：

第一，“这个《亲笔答辞》，前后附了不少忠王‘供词’，如果说忠

① 见金毓黻先生《关于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再商榷》，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一期。

王李秀成说话不易懂，为什么录下的许多供词，都能听得懂？而只有这几句无关重要的话听不懂？

第二，“据赵烈文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日记道：‘伪忠酋李秀成伏法……傍晚赴市，复作“绝命词”十句，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为什么这个绝命词不保存，而偏要保存这个只有几句无关重要的答辞及所谓口供呢？

他提出这两点疑问之后，就立刻论断说：

庞省三也是曾国藩亲信之一，并且是奉派审讯与监斩忠王的人，因而他也完全可能是参与将忠王“不俟旨”“就地正法”及制造伪供的主谋之一，况且是奉命审讯与监刑的人，为了怕主子翻脸追究，他是不得不把那“绝命词”真迹毁去，而把当时同出一个伪造者手笔的这一个所谓《亲笔答辞》保留。这不仅在主子追究时可以脱掉干系，而且还可以与曾国藩所保留的伪稿互为奥援。因此对待这个所谓《亲笔答辞》，我们只能看作是曾国藩伪造《李秀成供》之一部分，顶多也只能说明这些反革命分子狡猾而已。

现在，我们先来回答年子敏先生的疑问。年子敏先生第一个疑问是想不通庞际云为什么叫忠王写这两句《亲笔答辞》。案庞际云是堂上的问官，忠王是“阶下囚”，据庞际云的跋语说，他是拿着曾国藩这一张问辞讯问忠王，在问辞上，“随讯随录”地写上“小注”的。曾国藩问辞的第一个问题，里面有“燕王秦日纲”，“何以称燕王系孙日昌，岂秦日纲已革而后封孙日昌乎”的爵名人名。忠王是广西梧州府藤县人，梧州一带方言“燕”字和“豫”字读音截然不同，而听起说国语的人说“燕”字时却很容易与“豫”字声音相混，因此，忠王把庞际云所说的“燕王”误听为“豫王”，他觉得奇怪庞际云怎么把根本没有此人的“孙日昌”作为豫王呢？怎么又把秦日昌（即秦日纲）误作为“孙日昌”呢？^① 所以他就回答庞际云说：

① 此处参照丁云青先生的解释，见《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一文。

胡以晄即是豫王，前是护国侯，后是豫王。

秦日昌即是秦日纲，是为燕王。

我们知道，在对话的时候，用方言说到专门名词时本来是难于使人听得懂的，只有听者集中注意力去听取答者对答他所问的问题时才听得出来，但是，一遇到答者在问话之外另提起其他专门名词时，或者所答的是与问话参差的专门名词时，便难于听得出来了。忠王说的是广西梧州、浔州一带的方言，他的乡音不改，说国语区域的人听他的话是有困难的。拿我作为一个例证，也可提供证明。我说的也是广西梧州、浔州一带的方言，乡音难改，我与同志谈话，说一般对话，同志们还可以听得懂，但一说到专门名词时，同志们却很难听得懂了，所以我经常放有纸片在口袋里，以便与同志谈话时写专门名词之用。而况忠王在这两句短短的二十八个字的对话里面，就包括了七个专门名词，并且是在问话之外的或与问话参差的专门名词，庞际云听不懂，更是自然的事了。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一种情况，《曾国藩问辞》开首第一条就问这件事，忠王最初回答的也就是这两句话。初听一种方言，开首几句是最难听懂的，这也是有关系的。所有上述情况，我想接触过各省方言的同志们，或自己方言改不了的同志们，都能够体会得到的。庞际云因为听不懂忠王回答的话，所以叫他用笔写出来。庞际云在跋语内说：“第二纸乃忠酋口操土音，语不可解，际云令其自书者。”至于年子敏先生以为忠王所写的这两句话是“无关重要的话”，案这一条问辞，曾国藩列在第一条，问道：

咸丰四年九月守田家镇系伪燕王秦日纲，所搜伪文在船上者极多，何以称燕王系孙日昌？岂秦日纲已革而后封孙日昌乎？

考田家镇战役是曾国藩向太平天国进犯的一场大战役，当时在田家镇抗击曾国藩的太平军主帅便是燕王秦日纲，后来曾国藩得到讹误的情报说燕王系孙日昌，所以他要查问这件事。曾国藩既要追查，被他派遣来审问忠王的走狗庞际云为了确切地完成曾国藩交给他的任务，所以就特地叫忠王用笔另纸写出来。

年子敏先生第二个疑问是想不通庞际云为什么毁灭忠王就义时交给他的“叙其尽忠之意”的“绝命词”，“而偏要保存这个只有几句无关重要的答辞”。我们认为年子敏先生这一个疑问，是模糊了阶级性。因为太平天国与以曾国藩为首的地主阶级的斗争，是阶级的斗争，庞际云是一个反革命的刽子手，他当然不会替革命英雄的忠王李秀成保存就义时写的表示尽忠革命的歌辞。要求庞际云把忠王的就义歌保存下来，那就等于要求反革命刽子手的庞际云背叛他的阶级，把忠王的就义歌广事宣传，来鼓励广大劳动人民去革掉地主阶级的命，这是一件不可以想象的事。这就是庞际云“为什么这个绝命词不保存”的道理。至于庞际云为什么却要保存忠王那二十八个字的《亲笔答辞》呢？案《忠王答辞手卷》共六纸，第一纸是《曾国藩手书问辞》和庞际云随讯随录的小注，第二纸是忠王回答第一纸曾国藩第一条问题的答语，第三纸是庞际云手录忠王答语，第四、五、六纸是李鸿裔写的曾国藩问辞和忠王的答辞。在这一份文件里面，如果庞际云把第二纸《忠王亲笔答辞》去掉，则“讯”和“供”便对不起头来，以曾经做过刑部秋审处的庞际云^①，他更不会把本来完整的一套文件搅成了残缺不全示人的。这就是说：庞际云并不是“偏要保存”这一张《忠王亲笔答辞》，而是为了要保存完整的一套文件而保存下来的。我们还要谈谈庞际云为什么要把这一份《忠王答辞》装饰成为手卷而保存起来呢？据他自己在跋语里说，是为“备考”起见。他好像是为要保存资料而保存的；其实这只是门面话，他的真正企图实在是要炫耀他的“奉委会鞠”做过曾国藩的帮凶身份罢了。^②庞际云为要炫耀他的帮凶身份，所以才保存《忠王答辞手卷》；而为了要保存《忠王答辞手卷》这份文件的完整，所以不得不附带地保存了这一张《忠王亲笔答辞》。

由此可见，年子敏先生所提两点疑问都是不成问题的，他根据不成问题的疑问所推想出来的结论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了。但是，我们为尊重反对意见起见，还应该对他的结论不殚繁地来进行讨论。年子敏先生说庞际云是“制造伪供的主谋之一，况且是奉命审讯与监刑的人，为了怕主子翻脸追究，他是不得不把那‘绝命词’真迹毁去，而把当时同出一个伪造者手笔的这一个所谓《亲笔答辞》保留。这不仅在主子追究时可以脱掉干系，而且还

① 据曾国藩《贼酋分别处治蠲筹善后事宜折》。

② 此处参考丁云青先生的解释，见《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一文。

可以与曾国藩所保留的伪稿互为奥援”。年子敏先生这一个说法，完全是他想当然的主观的论断，我们可以从庞际云装潢这一份手卷的时间和手卷的内容两方面，说明它没有丝毫的事实作根据。先说手卷的装潢时间，庞际云在跋文里说：“辛未八月，装潢（潢）成卷，嘉平立春日际云谨识”。案他所说的“辛未八月”，即清同治十年八月，“嘉平立春日”，即清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据此知道庞际云把这一份文件装潢成卷是在清同治十年八月，加跋语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六立春日，即上距清同治三年六月忠王被俘之日已经过七年之久，而下离清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之死^①不过一个多月。又考曾国藩于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杀害忠王后，他奏报清政府。清政府接到奏报，在七月十四日就命令曾国藩“将《李秀成供词》及夺获伪印等物奏送军机处备查”。^②曾国藩没有遵从清政府的命令，他先在七月初七日已把删改过的《忠王自传》钞了一份送呈清政府。后来清政府看了他的附记，知道是删节过的本子，又下谕叫他细钞，不要节录，咨送军机处。曾国藩奉到谕旨，把删节的“十要十悞”等语于清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补呈清政府。^③以后清政府即不再向曾国藩追询《忠王自传》了。假使果如年子敏先生的说法，这一张《忠王亲笔答辞》与《忠王自传原稿》都是曾国藩等所伪造，而其目的是为了“互为奥援”的，那么，庞际云便应该在曾国藩把《忠王自传》钞本进呈清政府的时候，即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便要装潢成卷的，至迟到同月十四日清政府下谕命令曾国藩将《忠王自传》进呈的时候就必须赶紧装潢成卷，以预备做年子敏先生所说“互为奥援”的勾当的。但庞际云并不在此时装潢成卷，而却在清政府已经不追问，时过境迁，经过了七年，直到曾国藩将死的时候才加以装潢，并加跋语，这正说明了庞际云之所以要保存这一份文件，完全不是为了对付他们的主子，而只是为了要炫耀自己的帮凶身份而已。

在手卷的内容方面来看，如果确如年子敏先生所说，这份手卷与《忠王自传原稿》都是曾国藩等伪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应付清政府追查时，可以拿出来交给清政府看，以“互为奥援”的。那么，在这份手卷里面，就断不会

① 据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十二同治十一年二月记事。

② 见钞本《求阙斋奏稿》。

③ 据曾国藩《钦奉谕旨分条覆陈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

反有暴露曾国藩欺骗清政府的地方和曾国藩的丑态的地方了。这一点，是大家都共同理解的。现在，请翻看一下这份手卷的内容，就看出了暴露曾国藩极大的欺骗与丑态。如第六纸李鸿裔录曾国藩问：“破城时城中尚有若干人？”同纸李鸿裔录忠王答辞说：

城破时，城中不过三万人，除居民之外，贼兵（尔纲案“贼兵”两字，乃李鸿裔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改换了忠王的词语，并非忠王的本来词语）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

考曾国藩以五万大军围攻天京，于清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攻陷天保城后，即把全城合围，断绝接济^①，开掘地道三十多处分道进攻，都被太平天国堵破，合围了半年之久，“伤亡极多”直到全军“筋力将疲”的时候，攻陷了地保城，离城墙不过十多丈，再在此处掘地道埋地雷进攻，并靠猛烈的炮火日夜不断地向城内轰击，使太平天国守军立脚不住，无法堵破地道，才把天京攻陷。^②而天京城内太平天国的军队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到城陷之后，除了当天晚上大队一千多人跟随忠王保护幼主从太平门城缺冲出之外，随后从城上四面缒下出走的还有很多，据赵烈文在攻陷天京后七日的日记述他亲见的情况说，太平军“死者寥寥”。在攻陷天京之前，曾国藩就屡被清政府下谕督责，所以他为了要掩罪图功起见，就只好夸大敌人的力量，铺张他的战绩，以向主子陈报他的汗马功劳。因此，他向清政府驰奏《克复金陵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里面，就撒了一个大谎说：

奏为克复金陵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恭折详细情形仰祈圣鉴事……城破后……两广、两湖、江北多年悍贼，十七、十八等日……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餘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餘名，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

①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二月初八日记，及曾国荃营中的李作士、王必昌给朋友少岩信。

② 据曾国藩《克复金陵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

据上引《忠王答辞手卷》李鸿裔所记忠王的话，并参证以在天京失陷后六日，镇江英国代理领事亚德金 (Adkin) 到南京来调查，他向英国外务大臣罗塞尔 (Russell) 的报告所说：“我可断言，在南京将陷落的时候，城中的太平军不多。……我估计有一万人与清军五万作战”的话^①，确切知道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那末，即使全部牺牲也不过一万多人罢了，而况城陷后保护幼主冲出的有一千多人，从城上四面缒下的又有很多，太平军被杀的实在很少，那里有曾国藩奏报所说：“三日之间”，杀了太平军“共十馀万人”的事。我在《曾国藩奏报攻陷天京事考谬》一篇考证里，证明曾国藩奏报此事的虚谬，就以这一份《忠王答辞手卷》里面李鸿裔所记忠王这一段话为最主要的证据。那么，假使如同年子敏先生所说这一份文件是曾国藩等伪造以与所谓伪造的《忠王自传原稿》“互为奥援”，以预备清政府的追查的，请问：曾国藩会在这一件特地作伪以作证明的文件里面，却不打自招地自己暴露出他对清政府最大的欺骗吗！

又如在第六纸上李鸿裔所录的曾国藩问辞其中有一条问道：

城中窖藏金银能指出数处否？

这一条问辞已圈去，当是后来庞际云装裱时，觉得这是一件会被嫌疑的事，所以圈去。从前著录者都没有把它著录出来，1953年我得见原卷，始把它补录。案当时反革命分子纷传天京“金银如海”，清政府正垂涎着，而天京陷落之后，全部被曾国藩军队抢光了，清政府却完全落空，曾国藩不得不向清政府辩解，他在《贼酋分别处治麤筹善后事宜折》说：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常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以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

① 请参看拙著《曾国藩奏报攻陷天京事考谬》，此文收在拙著《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一书内。

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储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谕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料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曾国藩在此奏中，向清政府陈述太平天国只有圣库之名，并没有“公帑”存贮的地方，其次述“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说了忠王毫无积蓄，又自己提出“窖金”，并且说曾经下令：“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他在奏稿里面，委婉曲折地陈说，企望清政府对天京财富一事不再追究，他是竭尽了他生平做奏折的伎俩的。但是，尽管曾国藩怎样地辩解，都不可能取得清政府的相信，曾国藩答复他的朋友郭嵩焘的信也说：“金陵储蓄之奏，措辞诚多未善”^①，就是说他的撒谎说得不好，无法取得清政府的相信。而在此文件中，曾国藩自己却要向忠王追问窖金，要忠王指出城中窖藏金银的地方。假使果如年子敏先生所说这一份文件是曾国藩等所伪造以与所谓伪造的《忠王自传原稿》“互为奥援”，以预备清政府的追问的，请问：曾国藩会在这一件特地作伪以作证明的文件里面，却自己暴露出这一件大嫌疑吗？

由此又可见，年子敏先生所提否定《忠王亲笔答辞》的说法也是从主观臆断出发，完全没有事实作根据的。年子敏先生对《忠王亲笔答辞》所提出的疑问与否定的说法，都丝毫不能撼动它的真实性；反之，由于年子敏先生提出他的意见，经过了详细地反复地探讨，使《忠王亲笔答辞》的真实性愈为显著。《忠王亲笔答辞》是在原文件上记明是忠王亲笔的，它是经过了我們再三考证确定了它的真实性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笔迹上去鉴定《忠王自传原稿》的真伪，只有以这一张《亲笔答辞》为依据。我们的鉴定标准年子

^①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覆郭筠仙中丞》。

敏先生既然推翻不了，我们的鉴定结果他当然是不可能否定的了。

年子敏先生自述他否定《忠王自传原稿》的真实性主要是根据笔迹的鉴定。他这一项主要的论证，我们在上面已经予以否定。他除了笔迹鉴定之外，还在史事方面举出六项论证。现在，我们还要对这些论证加以简要的讨论。

年子敏先生第一项史事论证是根本否认忠王有写自传的事 案以前怀疑《忠王自传》真实性的人，都只疑是曾国藩把《忠王自传》的真迹毁灭了，而另伪造一部假的来骗人，还没有人怀疑过忠王写自传的事。第一次提出根本否认忠王写自传的说法的是年子敏先生。这是一个新说法。我们要讨论年子敏先生说法的能否成立，就必须检查他的根据能否成立。年子敏先生第一个根据是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附记里面所记“取伪忠王详供”一条记事，他解释为“拿取《忠王详供》”，以为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前，忠王已有了“详供”，而不是曾国藩所说是从六月二十七日写起的。年子敏先生第二个根据是赵烈文同治三年七月初二日记所说“经中堂录供”的一句话，以为在七月初二日以前，“也还没有什么忠王亲笔所书写之任何口供，而只是‘经中堂录供’”。因此，他作出结论说：“显然‘李秀成供词’也不是真的”。这就是说，忠王根本没有写自传的事。我们先来检查年子敏先生第一个根据能不能作根据。案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记附记共五条，都是待办的事项，嗣后办理的情况还可以考见，兹列表于下：

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记附记事项嗣后办理情况表^①

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记附记待办事项	嗣后办理情况
札数人、查诸殉难者遗骸 陆、祁、涂、孙	曾国藩回到安庆之后，同治三年八月初九日还写信吩咐在南京的曾国荃说：“祁幼章方伯宿藻与余同年，其尸葬金陵城中，闻春浦先生派二仆来寻，望弟善视之。陆、涂诸公之尸，余虽有礼与上、江两县，均望弟留心寻觅也。” ^② 这说明六月二十六日尚未办理，附记此条正是待办事项。
○取伪忠王详供	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日记说：“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他派庞际云、李鸿裔会鞠忠王。曾国藩这一张问辞及庞际云、李鸿裔会鞠忠王的文件，即今天保藏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忠王答辞手卷》。可知廿六日这一条附记，正是一件待办的事项。

续表

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记附记待办事项	嗣后办理情况
○寻伪天王瘞尸处、伪幼主自焚处	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记说：“熊登武挖出洪秀全之尸，扛来一验。”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贼酋分别处治羸筹善后事宜折》说：“伪天王洪秀全逆尸……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从伪宫内掘出，二十八日，扛至营次，臣与臣弟国荃验看。”
遍拜各营官，验各地洞	<p>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廿七日记说：“出外拜各营官，初至振字营见罗逢元，振副营见张定魁。……旋至备字营见张光明，至信字营见李臣典。……又至刚字营见营官何玉贵。旋至印子山慎字营见彭杏南表弟。休息片刻，旋至湘恒右营见朱唐洲，恒左营见葛奇益。”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廿七日记说：“至振字营……又至其分哨垒内看其所挖地道。”</p> <p>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廿九日记说：“至朝阳门外傍城湖外观萧庆衍所挖地洞二处，稍北有萧孚泗所挖地洞一处，萧开印所挖一处，武明良所挖一处。……旋至长胜营嘉字营两处，见太子湖之北有熊登杰地洞一处，李祥和、成东昂地道一处，朱洪章、陈万胜地道一处。”</p> <p>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记说：“至龙膊子观十六日轰破地道之处，所掘两洞，距城极近。”</p> <p>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记说：“至神策门观朱南桂所挖地洞五处，已轰塌者一处，外月城全轰倒矣。又遥望金川门外刘连捷所挖二洞，张诗日、李臣典各挖二洞，未能细阅也。”</p>
周历城内各处	<p>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记说：“由太平门入城，至伪天王府一看，规模俱仿宫殿之制，而焚烧无一存者，旋出大南门回沅弟处共行五十里。”</p> <p>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记说：“进城行二十里至易晴谷公馆一坐，又至伪英王府、侍王府一阅，午初回至沅弟营次。”</p>

表注：①此表参照丁云青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一文附表编制。

②见《曾文正公家书》卷十同治三年八月初九日《致沅弟》。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一天附记里的札、查、取、寻、拜、验、历等事，除了幼主根本没有自焚，不可能寻得自焚处外，事实证明，一律都是待办事项，“取伪忠王详供”一事，并不例外。曾国藩在六月二十六日记的附记里面记上这一条，乃是预备要取忠王的“详供”，是一件待办事项，而不是如同年子敏先生所解释的把在这一天以前已经现成了的“忠王详供”取来。曾国藩在“取伪忠王详供”一条上还加上○记号（这一个圈，用毛笔匆匆画，画的不圆，有点像三角形），在“寻伪天王瘞尸处、伪幼主自焚处”那一条上也加上○记

号，这表示这两项事比之其他各项特别重要，而断不是什么暗号。这些例子，在曾国藩《手书日记》里面是不胜枚举的，例如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记附记有“作李臣典请卹折”、“作声明李秀成先杀片并叙伪印另赘”两条，并加○为记。到十八日记才记早饭后作《李臣典请卹折》，申刻做成，又作《覆奏李秀成未解京之故》一片，夜将片稿作毕的事。可知这两条附记所记都是预备要做的事，而不是记本日已办妥的事，加○为记，是表明这是重要的待办事项，而不是什么暗号。六月二十六日记附记所记的“取伪忠王详供”正是如此。关于这一项考证，丁云青先生曾经费了一番苦功，从曾国藩日记附记的本身寻求出它的规律，给我们归纳出曾国藩日记的附记包括有待办事项和备忘事项两类，而以待办事项为多。待办事项又分为经常性的待办事项（即在一定时期以内经常待办的事情，好像今天的工作日程和作息时间表似的），和临时性的待办事项。临时性的待办事项，有以副词连接词表示未来的时间的，有写出时间的轮廓的，有写出具体月日期的，还有在文字本身看不出时间性而须在办妥之后才看得出来的。在临时性待办事项里面，以最后一项占绝大多数，“取伪忠王详供”便是属于这一类性质的附记。丁云青先生的考证十分贍详，我不用再赘说了。^①在这里，我还要对年子敏先生所说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前已经有了“忠王详供”一事从历史事实上进行考证。案忠王是同治三年六月十九日夜被俘，六月二十日被曾国荃刑治，但并没有鞫讯。曾国荃覆李鸿章信说：

李秀成擒获后，第偏刺以锥，流血如注，随即传置槛车中，后数日，家兄来营提询数次，呈亲笔供词数万言。^②

根据曾国荃这封信，知道他俘获忠王之后，除了当天刑治之外，“随即传置槛车中”，并没有鞫讯。忠王的被鞫讯，是始自曾国藩从安庆到南京之后。考曾国藩是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到南京，他在当天日记记道：

已初登岸，行二十里至沅弟营内。……至戌初，将所擒之伪忠王亲自鞫讯数语。

① 见丁云青《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一文考证。

② 《曾忠襄公书札》卷八《致李中丞》。

我们必须注意，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的戊初（下午七点钟）时候，曾国藩对忠王只“鞠讯数语”，忠王的回答当然也只是大概情况，而不可能有“详供”的，所以《忠王自传原稿》说：

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

我们把上面这几句《忠王自传原稿》说的话与当时情事覆按，正是吻合无间。年子敏先生反以为“对不起头”，那只是由于他个人完全撇开事实，专凭主观臆断而已。又考曾国藩六月二十六日记，这天曾国藩只忙于见客和开会议，并没有鞠讯忠王。据这一天曾国藩谕子纪泽信说：

余于廿五日巳刻抵金陵陆营，文案各船亦于廿六日申刻赶到。^①

从安庆随曾国藩来南京的机要文案人员，便是被曾国藩委派会鞠忠王的庞际云、李鸿裔等人。庞际云在《忠王答辞手卷》跋说：

同治甲子六月，湘乡伯克复金陵，生擒忠酋李秀成。湘乡侯相自安庆移节东下，李廉访（鸿裔）与际云实从，奉委会鞠。

庞际云、李鸿裔是在六月二十六日申刻（午后三点到五点）才到南京的，曾国藩在这一天日记说：

申正……庞省三、李眉生来。夜饭后再与诸人鬯谈。……戌刻接奉谕旨。旋又与眉生等一叙。

案省三，庞际云号；眉生，李鸿裔号。据此知他们是在六月二十六日申刻从安庆赶到。他们到南京之后，当夜听曾国藩的指示，他们被派会鞠忠王是

^① 《曾文正公家训》卷下。

在听曾国藩指示后的事。在二十六日这一天，无论曾国藩本人，或被曾国藩派遣会鞠忠王的庞际云、李鸿裔都没有鞠讯忠王。再考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日记说：

傍夕倦甚，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

案曾国藩所开的问条，便是今天保存在《忠王答辞手卷》里的第一纸，可见庞际云、李鸿裔的会鞠忠王是六月二十七日后事。从上面考证看来，忠王在六月十九夜被俘后，曾国荃并没有鞠讯忠王，到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到南京后，这一天戌初，才对忠王“鞠讯数语”，忠王只把“大概情形”回答他，二十六日没有鞠讯，庞际云、李鸿裔的会鞠忠王，是在六月二十七日后事。由此可见，在六月二十六日以前，根本没有什么“忠王详供”这个东西。请问：曾国藩到何处去拿取呢！根据上面考证，从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记附记各项事件嗣后办理情况和他的日记的附记体例看来，六月二十六日记附上所记“取伪忠王详供”一条附记，乃是记出待办的事项，而不是已办的事项；从历史事实看来，六月二十六日以前，根本又没有什么“忠王详供”，可见年子敏先生所提这一个根据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年子敏先生第二个根据是赵烈文同治三年七月初二日记“经中堂录供”的一句话。案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这一段话说：

晚至中堂处久谈，拟即将李秀成正法，不俟旨，以问余。余答言：“生擒已十餘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与中堂意同。

我们把赵烈文这一段日记里所说“经中堂录供”的话，与他同月二十一日日记所说“幸此人留之半月，经中堂亲询口供，众难伪造”的话对看，知道他所指的“中堂录供”，便是指记录六月二十五日忠王回答曾国藩“亲自鞠讯数语”而说的。在这句话本身意义说的只是经曾国藩录有忠王的答语（反革命分子叫做“口供”），而没有否定忠王另有手写的自传（反革命分子叫做“亲供”）。而况赵烈文在同月初六日记又分明记道：

伪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

案赵烈文这一段话与“经中堂录供”的话距离不过四天。四天前记的是曾国藩录有忠王说的“口供”，虽不候旨杀了也没有问题。四天后记忠王被杀，并记他写有“亲供”的事，前后丝毫没有矛盾。既然年子敏先生认为赵烈文日记可以信赖的而引据了七月初二日“经中堂录供”的话作为自己论证的根据，请问：为什么却遮掩了他四天之后叙述分明的记载呢？可见年子敏先生所提第二个根据也完全是不能成立的。年子敏先生所提论证的根据既不能成立，那么，他所否定忠王没有写自传一事便根本不能成立了。

年子敏先生第二项史事论证是论忠王被刑受伤和他的文化程度不可能写出这一部自传。年子敏先生说：“割臂股皆流血及徧刺以椎，流血如注”，均是说被俘后忠王即因反革命分子的残虐而受了伤害，一个受了伤害的人，在热天，而且又被反革命视为“钦犯”，不仅在囚笼中（曾国藩语）常受审讯，甚至被讯问累日，不难想象，在这样情况下，每日用毛笔写七千字，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何况忠王是雇工出身，从他的文化程度来看，每天一气呵成七千字，全篇组织严密，语无重复，实在也是难以置信的，从这方面看“李供”，也不可能是真的。案忠王被俘的第二天，是被曾国荃“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的，但在被刑的时候，忠王是一动都不动的，到了晚上，赵烈文去看他，还侃侃而谈了很久，可知反革命分子的酷刑，在革命英雄看来是不算一回事的。又考曾国藩奏报清政府说忠王被俘后，“臣二十五日甫至金陵亲讯一次，旋派候选道庞际云、候补知府李鸿裔、候补同知周悦修等鞠讯累日”，这里所谓“鞠讯累日”的意义，就是说讯问了整整一天，现存《忠王答辞手卷》的全部文件可证，可知并无年子敏先生所说的“常受审讯，甚至被讯问累日”的事。至于忠王确是雇工出身，只是跟舅父读过三年书，后来只是在各塾做帮工自学，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一个从雇工出身艰苦自学的革命英雄，就认为他每天写七千字的自传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正因为忠王是革命英雄，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急于完成迫切的政治任务，所以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酷刑，囚笼的蒸热，都无动于衷，甘之如饴，藐视了忍受了人们所不能克服的痛苦，而争取时间拼命挥写，只就速度来说，

造成了“每日用毛笔写七千字”，使年子敏先生认为“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①

年子敏先生第三项史事论证是论忠王写自传显然是一件不合逻辑的事

年子敏先生认为忠王被俘以前是忠贞不屈的，被俘时，在敌人酷刑之下，也表现出威风凛凛地挺立不动的英雄气概，而最后，也是慷慨就义的。这就很难相信，“在曾国藩抵南京后，就使他突然的写出如此充满卑躬乞降语句的供词，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案年子敏先生所以发生这一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在于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上。我们知道，阶级斗争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表现，我们研究历史会常常碰到表面上难于理解的困难问题，而当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年代，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经侵入中国，成为威胁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当时革命的对象，一方面是向地主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另一方面，是要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新任务。因此，反映在革命人物或者是反革命分子的思想意识里面，是多样而复杂的，忠王李秀成的写自传，正是这样的一个须要我们耐心地艰苦地探讨的复杂困难的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以求出合于实际或近于实际的结论，如果用今天的角度去看古人的行事，那就难于理解了。

年子敏先生第四项史事论证是论《忠王自传原稿》中对太平天国敬避与新创的字写法有漏洞 年子敏先生举出原稿中“国”字有不改作“国”的地方，“魂”字没有改作“𡗗”，就指出这是一个“漏洞”，认为《忠王自传》“如果说这是身在太平天国十馀年的一个高级将领所书写，也难使人置信的”。案在太平天国文书里面，对避讳的字和改字常有失检忘记避讳和忘记照改的地方，在领导人物的忠王和英王陈玉成的文书内都可以看到，在作为教育宣传用的书籍以及颂德歌功的碑序里都同样可以看到，试举例如下：

一、国 太平天国刊刻的《天理要论》第六页上半页第八行照规定作“国”，而第九页后半页第六行却失检作“国”。

二、魂 干王洪仁玕著的《英杰归真》第二十二页后半页第八行“实为灵𡗗生命”句，三十一页上半页第七行“而心𡗗遂为魔鬼所拘缠”

^① 此处解释辞句，参用丁云青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一文的辞句。

句，四十三页上半页第四行“害人灵祢”句，都照规定改作“祢”；而在第四十四页上半页第六行“人死其魂之昇降”句，第八行“有魂而受人酹其德”句，却都失检仍写作“魂”。

三、上 太平天国规定除上帝外，一切用“上”字的地方都代以“尚”字，忠王《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布告里，“谆谕尚海松江人民”句，“仰尔尚海松江一带人民”及“在尚海贸易之洋商”句，都照规定把“上”字代以“尚”字，而在《谕忠逢朝将刘肇均》文书里，却“将上海包围定叠”句，“最为上着”句，都失检仍写作“上”。如英王陈玉成致扶王陈得才等函，在“候兄或导王尚游”句，照规定把“上”字代以“尚”字，而在同函“阁下可速一面发兵上游”句，却失检仍写作“上”。又如常熟《报恩牌坊碑序》，其中“仰副天心，尚承圣算”句，照规定以“尚”字代替了“上”字，而在“城上之残虹欲断”句，却失检仍写作“上”。

从上面的例子看来，可知在太平天国领导人物的文书中偶尔失检忘记避讳或忘记照改字书写的事，是一件平常的事，曾经涉猎过太平天国史料的人都知道的。就是在忠王《谕李昭寿书》这一个文件里面，“投明弃暗”的“明”字照太平天国改字制度应写作“潮”，“大兵云集”的“云”字应写作“芸”，封套正面“交马神保”的“神”字应写作“辰”，不是都没有照太平天国的避讳改字制度改写吗？请问年子敏先生为什么却信之而不疑呢？当然，我们并没有因这几个字而怀疑《谕李昭寿书》是伪造的，我们知道这是太平天国文书里面常有的失检的事件。但是，在年子敏先生同是一件可以使他怀疑的事件，为什么在他所要利用的《谕李昭寿书》里面却熟视无睹，而在他所要否定的《忠王自传原稿》里面却成为他否定的证据呢？

年子敏先生第五项史事论证是论《忠王自传原稿》描述军事战役的写法难使人相信它的真实性 年子敏先生说《忠王自传原稿》凡叙述到忠王身任统帅对湘军几次主要战役都略而不详，而对早年身为偏裨将领的时候，或者不是主要与湘军作战的战役，则写的淋漓尽致，认为：“这样一种写法，本身也很难使人相信它的真实性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忠王自传原稿》对湘军那几次主要战役本来都写的详细的，只是

那些地方都被曾国藩撕毁了，所以今天便看不见了。据参与删改《忠王自传原稿》的赵烈文日记说，《忠王自传》共“五六万言”，叙太平天国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而今所见湘乡曾家所藏《忠王自传原稿》只有三万三千三百余字，已经给曾国藩撕毁了二万多字，忠王所写对湘军几次主要战役的详细记载，可能就在被撕毁的部分里面。第二种看法，是忠王写自传怀藏有政治意图，他为了要诱动曾国藩释放他，所以他对那几次打击曾国藩的战役不得不略而不详，他在自传里曾经拜托曾国藩的幕僚“恐有违忌字样亦烦改除”，对曾国藩有违忌的字样要改除，对曾国藩有违忌的事实，也会不写或少写的。

年子敏先生第六项历史论证是说当时的一些大的反革命分子如李鸿章、沈葆楨也都怀疑《忠王自传原稿》的真实性。年子敏先生说李鸿章（清江苏巡抚）复曾国荃信论《忠王自传》有“未敢信为情事真实”之说，李鸿章是“怀疑《李供》的真实性”。沈葆楨（清江西巡抚）把曾国藩刊刻的《忠王自传》交给被俘的干王洪仁玕签驳，“沈葆楨也不相信此项供词的真实性”。案李鸿章在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复曾国荃信说：

忠首供词于历年贼情甚详，但未敢信为情事确实。^①

李鸿章为什么对曾国荃说到《忠王自传》“未敢信为情事确实”呢？我们在他一个月前复曾国荃的两封信里很清楚地看出他的缘由。一封是同治三年八月初三日信说：

蒙谕代借巨款，俾资遣散，义何敢辞。惟……敝处招牌已坏，来源进款，实亦大逊去年……昨商请刘、丁二君能否于八月四万额解外，多借若干，茫无把握，容俟凑出多少，再行奉报，谅明恕君子，断不责人以所难也。^②

另一封是同治三年八月十七日信说：

① 《朋僚函稿》卷五。

② 《朋僚函稿》卷五。

前拨镇营之三万，久未能如数照拨，现因凑解四万，借款尚须弥补，须少缓数月再行筹济尊处。昨在友人处借观《李秀成供词》，云散处关税极多，买动洋鬼与伊打仗等语。今洋人渐撤，而税捐转益短绌，此鸿章经理不善之咎，焉得起李酋与之质证耶？^①

可知李鸿章是因为当时曾国荃伸手问他要钱，他不愿给，而偏偏《忠王自传》中却说他关税极多，正触犯他的避忌，所以他才向曾国荃说《忠王自传》“未敢信为情事确实”的话。他所指的“情事”，乃是指牵涉他个人利害关系的个别事情，而根本没有怀疑到《忠王自传》的真实性。至于沈葆楨把《忠王自传》刻本交给干王洪仁玕看，应该是因为忠王在自传里面，极力批评洪姓误国殃民，沈葆楨要看看洪仁玕有何意见，而洪仁玕所签驳的今天虽未发现，应该也就是这些个别事实的地方，也都根本没有怀疑到《忠王自传》的真实性。

从以上考证，可见年子敏先生这六项史事考察，也完全不可能对他的笔迹鉴定提供证明，来否定《忠王自传原稿》的真实性。

年子敏先生最主要的根据笔迹鉴定既根本不能成立，六项史事考察又不能对他的主要论据提供证明，所以年子敏先生断定《忠王自传原稿》为曾国藩所伪造、否定《忠王自传原稿》的真实性的结论，便全部被推翻。

三 《忠王自传原稿》的内容问题

《忠王自传原稿》确是忠王亲笔写的，经过我们鉴定以及反复的讨论，那是肯定了的。

但是，我们必须郑重指出：今天所见曾国藩后人藏有的《忠王自传原稿》有撕毁、删削、改动的地方，已经不是本来面目。

先说撕毁的情况。《忠王自传原稿》是曾经被曾国藩撕毁的。今所见原稿最后一页末行最后的一句话是：

^① 《朋僚函稿》卷五。

实我不知之也，如知

可见这里文意未完，肯定下页还有文章。案原稿末十要第十条忠王有一句话说：“昨夜深惠厚情，死而深愿，欢乐归阴。”据曾国藩说忠王写自传起自阴历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初六日酉时（下午五点钟至七点钟）忠王即遇害。考曾国藩日记，前后共亲见忠王两次，第一次是阴历六月二十五日晚，即忠王写自传前两日，第二次是阴历七月初五日灯后，即忠王遇害前一天。今案忠王“昨夜深惠厚情”的话，显系指七月初五日夜与曾国藩第二次相见事说的。则忠王写到十要之日，乃七月初六日，已经是他写自传最后的一天了。据曾国藩说忠王每天写七千字，现计十要以下只存二千零二字，由于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考出忠王写到这一句话时是初六日什么时候，所以不可能估计出以下应有多少字，但就文意看，下面肯定还有文章。而这些阙文，与下文所考忠王自己所说的字数联系起来看，可以断定是被曾国藩撕毁的。

我们再就忠王自己所说的字数来稽考。案忠王在自传里面写到天王三次严诏催他从苏州回救天京时事，有一段话提到他已写了的字数说：

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部一本，又好笔一枝，此笔破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

案今所见原稿，在这一段话以前只有二万三千一百馀字，与忠王自己说三万七八千字不合。这一万四五千字肯定是给曾国藩撕去的。

我们在原稿发现了上述两处撕毁的证据。今所见湘乡曾家所藏《忠王自传原稿》共三万三千三百馀字，曾国藩究竟撕毁了多少字呢？我们须要进一步去考原稿原来的字数。关于原稿字数，曾国藩就有不同的说法。据他在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记说：

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馀字，一一校对，本日仅校二万馀字，前八叶已于昨日校过，后十叶尚未校也。

这是曾国藩第一个说法。过了一天，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信又说：

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两日内看该酋亲供如校对房本误书，殊费目力。^①

这是曾国藩第二个说法。他在自传末题记又说：

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

案这年阴历六月小，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共九日，每日约写七千字，则原稿应在五万四千字以上，六万三千字以下，即六万字左右。我们把曾国藩第三个说法与第二个说法参订，可以得出原稿约近六万字的结论。但是曾国藩覆他的幕客钱应溥的信却说：

李酋八日之内，在囚笼中共写三万余字，删其重复谰言，尚近三万字。^②

这是曾国藩第四个说法。曾国藩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呢？以前我们对这个问题还不敢断定，到1953年发现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才使我们得到断案。赵烈文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曾国藩杀害忠王和删改《忠王自传》他都参加密谋。他在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记道：

伪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

同月初七日记又说：

中堂属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

同月初十日记又说：

① 《曾文正公家训》卷下。

②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复钱子密》。

中堂属看《李秀成供》，并分段将付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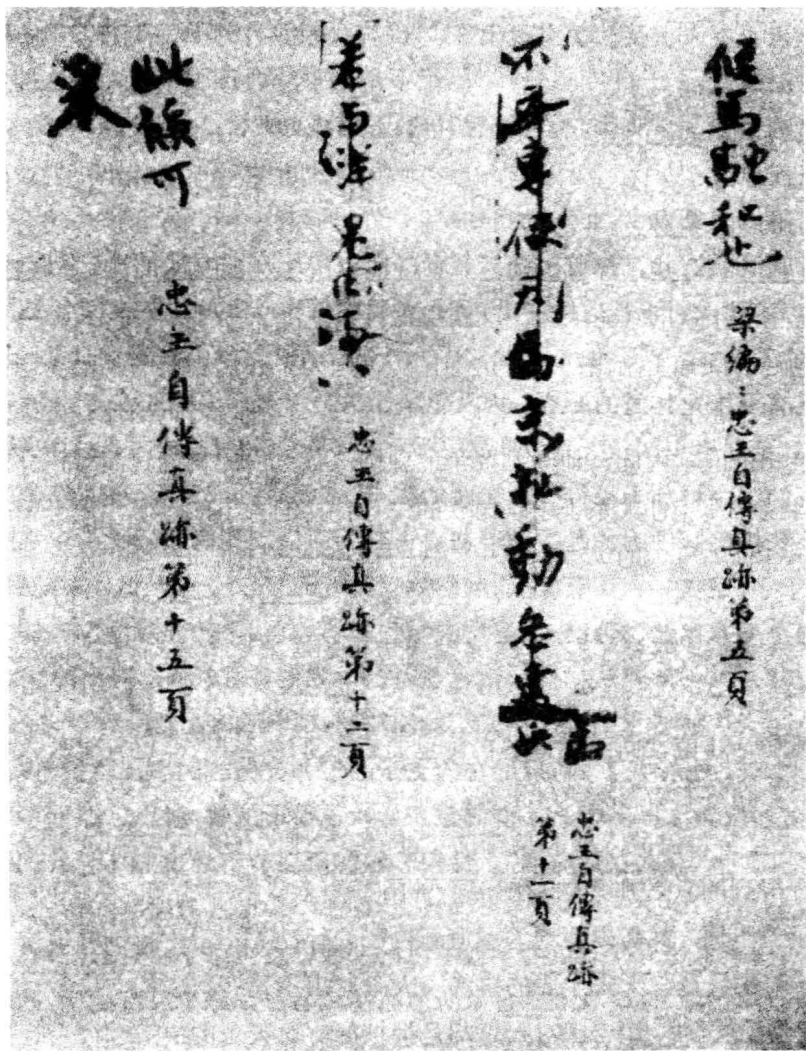
案中堂指曾国藩。据此，知道赵烈文曾参加删改《忠王自传原稿》的事，《忠王自传》的原稿本，和改定咨送清政府军机处的本子，曾国藩付印的本子都经过他的手。他记《忠王自传原稿》字数是“五六万言”。他是一个当事人，他的话是当日记在他的日记上，他所记这一段话并没有掩饰与作伪的必要，所以应该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根据。就我们上面考证，在忠王写到从苏州回救天京以前共三万七八千字，加上从这一段话以后，今所存的一万零三百余字，再加上最后一页后面的缺文，则原稿全文可以计算出来的约有五万字。此外，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忠王自传原稿》记从苏州回救天京之前既撕毁了一万四五千字，最后一页又有撕毁，则从苏州回救天京以后至原稿最末的记事之间，说不定曾国藩也还有撕毁，因此原稿全文应该是五六万字。我们根据撕毁情况估计出来的字数也恰与赵烈文的记载相合。这也就可见曾国藩第二、第三种说法是真实的。曾国藩在七月初六日初看《忠王自传》时，说“约四万馀字”，因为他还没有看完，所以他的估计错了。到第二天，他看完了，所以他在给儿子的信和自传末的题记才得到确实的数字。但是，他知道他偷偷摸摸撕毁《忠王自传》是一件告不得人的事，所以他在回复钱应溥的信就只好说谎话，说“共写三万馀字”。曾国藩各处所以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今天还可以分析得出来的。

现在，我们对《忠王自传原稿》的字数可以得一个结论出来了：《忠王自传原稿》字数约有五万多字至六万字。今所见湘乡曾家所藏原稿只有三万三千三百馀字，已经给曾国藩撕毁了二万多字，占全部字数五分之二有奇。

曾国藩撕毁《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毁灭《忠王自传原稿》最大的一种罪行，是曾国藩对《忠王自传原稿》最大的一种作伪行为。我们要追问曾国藩为什么要把《忠王自传原稿》中一部分撕毁呢？抗战前，陈寅恪先生曾从湘乡曾家得见《忠王自传原稿》，稿末即有缺文。他认为曾国藩不肯把《忠王自传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①陈寅恪先生的意见是

① 据1951年2月9日《大公报》史学周刊第五期方回《介绍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文引陈寅恪语。

不错的，我还要把他的话引申起来：曾国藩不肯把《忠王自传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曾国藩不肯把《忠王自传原稿》送交清朝军机处，也是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曾国藩之所以把《忠王自传原稿》撕毁了一部分，也仍然是必有不可告人之隐。



曾国藩在忠王自传原稿上盗改、增加和眉批字句墨迹

曾国藩对《忠王自传原稿》除撕毁之外，还有删削的地方，例如将自传开首“时逢甲子六月”删去等；有盗改的地方，例如“被两国（个）奸民查获”句，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将“天朝十悞”第十悞改为“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等。在簿眉上又有曾国藩写的批语，例如在述对付曾国藩进攻天京的战略那一段，曾国藩在簿眉上批说：“候马融和也”等。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忠王自传原稿》有撕毁、删削、改动的地方，湘乡曾家所藏的《忠王自传原稿》，已经不是本来的面目了。因此，这部自传既经曾国藩撕毁了二万多字，占全部字数五分之二有奇，首先就是残缺不全。而从我们今天辨认现存十四张原稿照片曾国藩的改字偶然不够小心就误以为是忠王写的原字看来，知道前广西通志馆在湘乡曾家的补钞本，一定会有把曾国藩的改字误作忠王原字的地方。这些地方，会对我们研究问题给以障碍，甚至会导引到错误的结论上去，这也是我们今天利用这部自传的一种缺陷。

我们还必须郑重指出：忠王这部自传，是为了要达到他的政治企图而写的，其中免不了有许多伪饰的地方。这些地方，连他自己也估计到曾国藩是不一定会相信的，因此，他写到要争取曾国藩移对内的目标转而对付外国资本主义者侵略那一件关系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事的时候，他恐怕曾国藩连这一件极关重大的大事也不相信他的话，他就特别加以声明说：

今天朝之事此（已）定，不甚费力，要防鬼反为先，此是真实之语。

忠王这两句话，就暴露出了他的自传里面有“真实之语”，也有对敌人假意伪饰的“非真实之语”这一件事实。

《忠王自传》对敌人假意伪饰的“非真实之语”的部分在什么地方呢？我以前看得到的只是那些向曾国藩、曾国荃假意恭维的地方。到1955年做补充笺证工作时，又考出两项为了遮蔽自己的行动而不得不掩饰的地方。

第一，是假造与天王矛盾的事实 天王对忠王是有猜忌的，忠王对洪姓集团也是有意见的，但忠王对天王却是拥护的，对天王的决策和命令也是服从的。而忠王为了要达到他的政治企图，在自传里面却假造与天王矛盾的事实。例如忠王在自传里记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冬出兵江西、湖北之役的事说：

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领军而去扫北。那时亦无良计，正逢有江西德安县以随州、义宁、武宁、大冶、兴国、蕲水、蕲州、武昌、江夏、金牛、宝安、蒲圻、嘉鱼、通山、通城等有起义四十餘名具禀差使到苏恭呈降表投军，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奏复，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扫北等因。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当即派军选将而行，将苏省军民之务交与陈坤书接任，军民安妥，一一交清。举兵由苏动身到京将来情启奏不欲扫北。我主盛怒，责罚难堪。此时亦无法处，管主从与不从，我在苏肯应江西、湖北肯降之义民，应该前往接应，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师而上江西、湖北。

案忠王此处所说这一役是“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师而上江西、湖北”。考《干王洪仁玕自传》说这一役英王陈玉成从长江北岸进兵蕲州、黄州，忠王从长江南岸进兵江西，两路合取武、汉，以解救安庆，是太平天国在打垮江南大营后的军事决策。威尔生（A. Wilson）《常胜军》一书记公元1860年10月，太平天国决定来年军事的主要目的系占领汉口及解安庆围，为贯彻此项计划起见，四个军同时出动。“忠王尤意气豪迈，深为自信，为达到此目的，不惜跋涉五百英里的路程”。曾国藩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信论太平天国这一役的战略也说：“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我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①曾国藩所说在湖北进军的太平天国统帅是英王陈玉成，在江西进军的太平天国统帅便是忠王。案干王洪仁玕是当时总理太平天国政权的负责者，曾国藩是敌方的主帅，威尔生是当时英国侵略者的分子，他们都说明这一役忠王进军江西、湖北是太平天国军事的决策。不仅如此，就是忠王自己在湖北、江西班师回来攻克杭州之后，他在辛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檄》里面，也分明地说道：

本藩自去冬恭承简命，统师上游江、楚。

① 《曾文正公家训》卷上，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字谕纪泽》。

这一道檄文的原件，现存故宫博物院。忠王向上海、松江人民布告明明说他这一次“统帅上游江、楚”，是“恭承简命”，可知他在自传里那一段“逆主之命”的话是假的。如自传里叙述他在壬戌十二年十月攻打天京城外曾国荃军营不下之后，向长江北岸进兵的事说：

自攻未下，我主严责革爵，调我当殿明责，即飭我进兵北行，不得不由，冒雪而往。

考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记载清军截获忠王与干王洪仁玕的文书，说忠王论这一役进兵长江北岸的战略，叫做“进北攻南”，就是说从长江北岸进攻上游敌人的后方，迫使敌人不得不调南岸的军队去救北岸，调下游的军队去救上游，总的目的是要解救天京的围困，所以叫做“进北攻南”。可知这一役的战略，是忠王定的作战计划，而他在自传里却说是不得不勉强遵从天王的命令。又如他记天王命令要在布告和印文内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一事说：

去年天王改政，要命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间亦然，凡出示以及印文内，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

其实，据故宫博物院现存忠王在壬戌十二年二月《给忠逢朝将刘肇均谕》，他就遵照了天王的命令在文件上写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字样，又可知他在自传上所说“独我与李世贤不服”这一段话是假的。又如他记守浦口时，天王对他疑忌事说：

我在天朝实无法处，力守浦口，后又被疑，云我有投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当封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被天王知道，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

但到他后来述天王封王事时却说：

那时正在浦口镇守，李昭寿与我有旧日深情，渠见天王封陈玉成为王，旁观不忿，行文劝我投清。……那时我母亦在浦口，家室亦然，防我定有变意，后将中关舟只尽封，不准我官兵来往。

一处说天王把他的母妻作为押当品，防止他的叛变；另一处却说当时母妻同他都在浦口，天王认为他定会叛变。记同一件事，两处不同，必有一处是故意假说的。又如他记天京被困紧急，城内无粮，他奏请天王放穷家男女出京逃生，天王不准，他强行密令放出事说：

将此穷苦不能全生情节启奏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依，仍然严责：“不体国体，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备甜露，可食饱长生，不由尔奏！”无计与辨，然后出朝，主有怒色，我亦有不乐之心。闹城男女饥饿，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

但考当时有一个家住在天京的上元人王永年自述送妻子母亲出天京事说：

甲子二月十九日，送妻携子承钰并是秋病殇之女及四妹甥女偕何达夫之妻子等同出汉西门。三月初一日，又送老母出城。能得出觅生路者，乃伪忠王李秀成以城中乏粮奏明伪主，准将无依妇女放出谋食，晓谕通衢。但每名口须备银五两赴伪章王府领照方准。^①

据此知当时放妇女出天京谋生，是经忠王以城中乏粮奏明，得到天王的批准，并且晓谕通衢，布告周知的。又可见忠王所说天王不准，他强行密令放出的话也是假的。他之所以假造这些与天王矛盾的事实，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哄骗敌人，使敌人相信他，而得达到他的政治企图。

① 《紫蘼馆诗钞》上卷《癸未五月初度五首》诗注。

第二，是遮掩天王对他的重任 在杨、韦内讧后，天王猜忌异姓，不愿把大权交给忠王，这是一事实。但他在天京被围最危急的时候，却不得不重任忠王，这也是事实。据清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即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李鸿章致曾国荃信说：

昨于汴关贼馆夺获伪文书数百件，大都金陵贼馆乞苏、浙解济银米，其声甚哀。内称洪逆禅位幼主，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留守城内，各伪王均归调遣。^①

考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存有两封癸开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忠王致护王陈坤书及致潮王黄子隆的信，忠王的署衔就是“真忠军师忠王李”，可证天王确曾封忠王为军师。案军师是太平天国总理全国政权最高的职位，前期军师分为正军师、又正军师、副军师、又副军师四职。那时候正军师是东王杨秀清，又正军师是西王萧朝贵，副军师是南王冯云山，又副军师是北王韦昌辉。丙辰六年，东、西、南、北四王都死了，军师由天王自兼。到己未九年，洪仁玕入天京，封为精忠军师，翼王石达开远征，天王也给他遥加了一个公忠军师的头衔，而实际军师之权只在洪仁玕一人之手。这时候，天王封忠王为“真忠军师”，根据李鸿章在汴关夺获太平天国文书所见天京来文所说“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留守城内，各伪王均归调遣”的话，当时忠王应该是代替了洪仁玕的职权，总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②由此看来，天王在天京陷落前一年，不能说他不重任忠王。但是，忠王在自传里面，对天王封他做军师一事，却讳莫如深，反之，极力铺叙天王对他的不信任，甚至说“我在京并未任闔城之事”，连防守天京的任务他也说没有担负。而今天还保存的幼主洪天贵福的自述却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当时“兵权都是忠王掌管”的一件事实。这就可见忠王在自传里面是特意遮掩天王对他的重任的。

① 《朋僚函稿》卷三《致曾沅帅》。

② 据钞本《天朝钦定敬避字样》附录《点将录》特爵八人都封军师，右辅正军师幼东王，又正军师幼西王，前导副军师幼南王，公忠又副军师翼王石达开，真忠军师忠王李秀成，勇忠军师英王陈玉成，正忠军师侍王李世贤，恭忠军师辅王杨辅清，而忠王独有“御林兵马亲提调奉旨令专征剿”的衔头，这也可与李鸿章所说各王均归忠王调遣的话互证。

上面所考《忠王自传》里面假造与天王矛盾的事实，遮掩天王对他的重任和向曾国藩、曾国荃假意恭维的三个地方，都不是忠王的“真实之语”，而只是他为了要达到他的政治企图而不得不写了这些伪假的话作为遮掩。因此，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工作者，要引用《忠王自传》的时候，对于这三处地方，断断不能认为是真实的事，否则就一定会陷于错误。不仅如此，根据我多年来做这部自传笺证工作的体会，由于史料残阙，许多地方都是发现新史料后才逐渐看得出来的，所以凡有关忠王在自传里面故意污损自己以及强调天王的过错等等地方，说不定将来会发现材料证明是虚假的，我们引用时也必须十分慎重，不能毫无疑问地认为事实，否则也会陷于错误。

那么，《忠王自传》既然是残缺不全，被撕毁后所存原稿上曾国藩的改动又未能得到原稿或全部照片逐一辨认予以全部的还原，而且，在自传里面，忠王又有特意伪饰的地方，这部自传还有什么史料的价值呢？

当然，残缺部分已经是无可补救的大缺陷，那是不用说了。被撕毁后所存的原稿上曾国藩改动未得还原的地方，我们希望将来还可以得回那部原稿来校勘，即使那部原稿得不到了，而遇到一些可能是曾国藩改动的地方，引据时必须十分慎重考虑。至于伪饰地方，就断不能引据。除此以外，《忠王自传》还是第一部记载太平天国革命史的最主要的文献。就我个人体会，主要的地方有下面几处。

一、记载金田起义的历史 其中记载金田起义的领导人物、贫苦农民的信从拜上帝会、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的壁垒分明的斗争、金田起义以至北出湖南定都天京的战役等等，都有很扼要的叙述。据《忠王自传》说，其中关于洪秀全“出身起义之由”的部分，是他根据“记在心”里的“天王《诏书》”（即太平天国编修的历史）写的。

二、记载丙辰六年领导集团内讧前后的历史 其中包括天京建都、第一次打退江南大营、领导集团内讧、内讧后军事政治的变化，以及在浦口打垮江北大营、庐州三河镇歼灭李续宾等等，都有详明的记载。

三、记载六解京围前后的历史 其中包括第二次彻底消灭江南大营、克复苏常、用兵江楚、安庆失守、克复浙江等等，也都有详明的记载。

四、记载太平天国反外国侵略的伟大历史 《忠王自传》详细地叙述在上海一带抗击外国资本主义者侵略的辉煌战绩，他大书特书说：“那时洋鬼

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忠王还记有英国侵略者海军提督何伯（James Hope）、参赞巴夏礼（Harry S. Parkes）向太平天国进行秘密外交阴谋说：“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此语是与朝臣谈及后〔不〕肯从。鬼云：‘尔天王兵而虽众，不及洋兵万人。有我洋兵三二万众，又有火舟，一手而平。’鬼云‘我万馀之众打入北京，后说和，今上（尚）少我国尾欠，尔不与合，尔天朝不久，待为（回）我另行举动。’此这鬼头与天王不肯，然后与及谈。”忠王给我们记载了太平天国不受外国侵略者的利诱，不畏外国侵略者的威胁，而坚决反抗到底的伟大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见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斗争的坚强伟大的传统。

五、宣扬太平天国的业绩 如记东王杨秀清执政时代，“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如记太平天国军队的纪律说：“凡安民家安民，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沓（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他用事实强有力地驳斥了反革命对太平天国所宣传的杀人放火的诬蔑，他宣传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业绩。

六、记出农民革命的严重弱点 太平天国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就不能不具有严重的弱点。弱点不仅在于不能建立一个足以代替封建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在于并不能彻底地粉碎旧制度。由于不能不受到封建思想（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影响，由于基于小生产制度的平均主义思想所起的消极作用，并且由于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在革命队伍中所起的破坏作用，因此，在得到初步的胜利时就发生了领导集团争夺政权的内讧，造成了最严重的分裂而给革命以致命伤。忠王在自传里面，沉痛地记载杨、韦内讧事变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的情况。他又记载在内讧之后，太平天国有一部分军队发生不守革命纪律的事，而这些军队所以纪律败坏，乃是由于受了加入太平天国的广东天地会和蒙、毫起义群众的坏影响。这些记载，都给我们对了解这一个作为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以明确的提示。

七、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 《忠王自传》在“天朝十悞”里总结了十项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虽然忠王受了时代所局限，他不可能理解得

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出现近代的工人阶级，因而太平天国革命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这就是太平天国革命不能不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也没有谈到《天朝田亩制度》，使人不能在他的自传里面看出当时太平天国对土地制度实施的情况。但是，作为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之一的忠王，却以他自己目击身经的体验，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中，在军事上、政治上、特别是在内部团结上所犯的种种错误，作了严肃的沉痛的批判，概括的总结，给后一代革命者留下极可宝贵的经验教训。

以上只举出我个人体会得到的几点。只就这几点看，《忠王自传》史料的价值的重要可知了。所以，《忠王自传》虽然是残缺不全，虽然是即在被撕毁后的原稿上曾国藩的改字也仍未得全部还原，虽然是忠王在自传中又有伪饰的地方，但是，这部自传却不失为今天所见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太平天国革命文献。

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 限制性举例

——《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

一 绪论

笔迹的鉴定，有它的有效性和限制性。用书法的角度去鉴定文件，是凭着具体的东西去对照，同或不同，是从具体的东西做出来的结论，所以它是有效的。但书法有楷书行草的不同，处境如何、心情好坏、健康状况、纸笔精劣、写得较早或较晚、从容或匆促，都不免会有差别，就是同一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所写的字，也不可能像铅印的一模一样。这一切说明了笔迹鉴定的运用，是有相当大的限制性的。

关于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人写的字会有差异的道理，中国古代书法家老早已经指示给我们了。如唐代著名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里说：

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急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

孙过庭指出健康和心情、境遇、气候、纸墨、兴趣五种条件，条件好的叫做“合”，不好的叫做“乖”。如果“五乖同萃，思遏手蒙”，在手蒙的情况下，“蒙无所从”，就会写出“雕疏”的字；如果“五合交臻，神融笔畅”，在笔

畅的情况下，“畅无不适”，就会写出“流媚”的字。因此，在乖合不同的条件下，同一人就会写出“优劣互差”的字。这是一条说明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人写的字会有差异的大道理。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器用章里还特别指出纸、笔、墨、砚四种工具在写字上的重大作用。他说：

夫身者元帅也，心者军师也，手者副将也，指者士卒也，纸者地形也，笔者戈戟也，墨者粮草也，砚者囊橐也。纸不光细，譬之驍将骏马，行于荆棘泥泞之场，驰骤当先，弗能也；笔不颖健，譬之志奋力壮，手持折缺朽钝之兵，斩斫击刺，弗能也。墨不精玄，譬之养将练兵，粮草不敷，将有饥色，何以作气？砚不硃蓄，譬之师旅方兴，命在候粮，馈饷乏绝，何以壮威？四者不可废一，纸笔犹乃居先。俗语云：“能书不择笔”，断无是理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木石金玉之工，刀锯炉钶之属苟不精利，虽有雕镂切磋之技，离娄、公输之能，将安施其巧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利器，就是有离娄、公输的本领，也没有办法施展他的技巧。所以项穆指出“纸不光细”、“笔不颖健”、“墨不精玄”、“砚不硃蓄”，虽名书法家也不能写得好字。纸、笔、墨、砚四种工具都重要，而纸、笔尤为重要。项穆特别强调纸、笔的重要性。

孙过庭指出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写出“优劣互差”的字，这是一条古代著名书法大家亲身体验总结出来的道理。项穆在论写字的工具里特别强调纸、笔的重要性，也是从体验中得来的道理。

由于同是一人所写，尽管有“优劣互差”，但个人的笔法和表现的风格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笔迹鉴定的有效性。由于书写时的条件不同，虽同一人所写，而“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合则流媚，乖则雕疏”，这就是笔迹鉴定的限制性。只有正确地掌握着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同时，为检查笔迹鉴定是否正确起见，还必须从文笔上和内容上作鉴定。文笔和内容的鉴定与笔迹的鉴定两者是有互相辅助的作用的。所以最稳妥的方法，是综合两者的鉴定作出结论，那是比从一方面的鉴定提出的结论

要全面得多，要牢靠得多的。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当他任副掌率后军主将合天义的时候，他写有一封信给那个曾在他部下为他的“爱将”后来投降了敌人的李昭寿。忠王是一个喜欢学书法的人，这一封信书法遒劲流媚。到太平天国失败后，他被俘给敌人囚在木笼里，用一支破坏了不能写字的笔写在账簿上的自传却很潦草雕疏，两者是“优劣互差”的。因此，许多人都认为两者不是同一人所写，《谕李昭寿书》不是忠王的亲笔，而是他的秘书的代笔。但是，经过我们仔细地用笔八法分析起来看，两者基本上却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从忠王《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两者书写时全部不同的条件，指出两者所以会造成同一人所写的字致于“优劣互差”的种种原因，看出了《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的亲笔。我们再经过内容的鉴定，证实了笔迹的鉴定。

忠王李秀成《谕李昭寿书》这一个文件的笔迹鉴定，正是对唐代著名书法家孙过庭所指出的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写出“优劣互差”的书法的道理的最好的说明，也是一个论证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最好的例子。这一个例子，说明了论证了只有正确地掌握着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然后才能够作出正确的结论，而不致于失出或失入。这不仅有关于文献的鉴定，也有关于司法的审理案件。

二 从用笔八法等分析得出谕李昭寿书是忠王亲笔的结论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说：“自幼时八、九、十间，随舅父读书，家贫不能多读，帮工各塾。”他读过三年书，还在书塾帮工，他是一个刻苦钻研的人，在幼年时就学习书法。后来起义，到了江苏、安徽地区，看到古来名家法帖多了，他的学习的兴趣更加高了，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记说：

子慎弟去年被掳四月，知苏州事，记其语。李秀成年四十餘，喜写字，人甚和气。

忠王的胞弟李明成也喜欢学习书法，富礼赐(R. J. Forrest)《太平军的家居》(*The Taiping at home*)记其事说：

我回忠王府吃晚饭时，见王弟正在那里临池习字。^①

富礼赐曾向李明成索取法帖，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李明成《覆富礼赐书》说：

辱问圣钱及字帖等因……字帖中譚（纲案即“华”字）历来四大名家并十数异士各种字帖皆有，不知麾下要用者那种字帖也？^②

据此，知道忠王家中收藏有不少中国古来名家法帖，临池学书正是忠王家庭陶冶性情的一种生活。忠王写得一笔好字，是有他的修养的。

在现存忠王亲笔文件之中，首先肯定确是他亲笔写的是《忠王亲笔答辞》二十八字。后来以《忠王亲笔答辞》作为鉴定标准，又鉴定出《忠王自传原稿》也确是忠王亲笔写的。现在要鉴定的是《忠王谕李昭寿书》这一份文件是忠王亲笔写的呢？还是他的秘书代笔的呢？

今案《忠王谕李昭寿书》写得遒劲流媚，《忠王亲笔答辞》和《忠王自传原稿》却写得潦草雕疏，是有“优劣互差”的（请看图一）。但是，经过我们仔细体味之后，看出了前者的笔法是与后两者的笔法相同的，都同出自一人的手笔。“笔法”两字，好像是抽象的东西，其实它是从具体的用笔书法体会出来的形象，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来分析，忠王熟习书法，他写的字更有条件给我们这样去做。我们研究忠王的字是用八法分析。案古人所传的八法，盛于唐之后，说点画的结构有八种方法，而能适用于万字。其著录有名的如宋陈思《书苑精华》、明张绅《法书通释》、明潘之淙《书法离钩》、清《佩文斋书画谱》、清冯武《书法正传》、清程瑶田《书势》，都化了不少篇幅，谈有关八法的事，都是以楷书为对象的。

① 此处据简又文译文。简又文把富礼赐这一篇记事译为《天京遊记》。收在他撰述的《太平天国杂记》一书内。

② 原件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谕李昭寿书》是楷书，而《自传原稿》既有楷书也有行书，可否一概绳之以八法呢？我们认为如果是集分书的大成以为楷的伊汀洲，集隶书的大成以为楷的邓顽伯，集碑学的大成以为楷的张廉卿，他们虽名为楷书，却不能绳之以八法；但是，如真、草的“回互虽殊”，不妨其“大体相涉”（孙过庭语），那么，我们谨慎地用八法去研究忠王的“相涉”更多的楷书和行书，应该是人无间言的。为使得有更多的字供对照之用，故专以《忠王自传原稿》一种作鉴定的标准去与忠王《谕李昭寿书》对照。兹以八法分析于下。

第一，“丶”侧 侧就是点，为什么把点叫做侧呢？张绅《法书通释》说：“侧下笔使笔锋右顾，审其势而侧之故名，若止言点则不明顾右，无蹲锋向背之势矣。”朱履贞《书学捷要》卷上注释《书法三昧》“点之祖，蹲鸱之势，三过侧法也”句说：“三过者，三折势也，方笔为折，方者棱侧。点名侧者，点无正出也。点有尖、秃、俯、仰、三角、四角，各随字势而用之，故云侧不得平其笔。点之落笔须沈紧，棱侧、蹲鸱、坠石，喻其笔势也。”所以一般作点笔法，都落笔沈紧，从左斜顿向右。今案忠王《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言”字的点，落笔大都是从左起微向右，复斜顿向左直下，与一般作点笔法不同，且其点较一般人作的点为长。这是忠王书法用笔的一个特点（请看图二）。

第二，“一”勒 勒就是横画。为什么把横画叫做勒呢？张绅《法书通释》说：“谓趯笔而行，承其虚画，取其劲涩则功成矣。若止言画，虑不在趯，一出便画，则锋拳而怯薄也。”勒的笔法，初落笔锋向左急勒，回向右横过，至末复驻锋折回，其势首尾俱低，中高拱，如覆舟样，所以说：“勒常患平”，又说：“勒缓纵以藏机”。今案忠王《谕李昭寿书》是以充裕的时间书写的，所以能够掌握着“缓纵以藏机”的书法去书写。《忠王自传原稿》却是以紧迫的时间仓猝写成的，一般横画都是一出便画，未能照书法书写，但“要”字的书法，却还是照书法书写的。而最特出的地方，忠王无论在《谕李昭寿书》中，或在《自传原稿》中，横画都特别的长，与一般人的写法大有不同，真有如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所说：“勒如千里之阵云”^①那样的雄姿。这是忠王书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请看图三）。

① 见张绅《法书通释》引欧阳询语。

諭	訛	詔	詔	詔	詔	詔	詔
誅	誅	誅	誅	誅	誅	誅	誅
詔	詔	詔	詔	詔	詔	詔	詔
誰	誰	誰	誰	誰	誰	誰	誰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試
諭	諭	諭	諭	諭	諭	諭	諭

諭李昭寿书

忠王自传原稿

图二

第三,“丨”努 努就是竖画。为什么把竖画叫做努呢?张绅《法书通释》说:“竖笔微努近左,然后趯笔下行,使不直率,故不得竖画也。”所以《法书三昧》论努的笔法说:“弩弯环而势曲,努过直而力败,努不宜直,其笔直则无力,立笔左偃而下,最须有力。”今案忠王《谕李昭寿书》、《自传原稿》所书“努”的书法,都守着“努不宜直”之戒,取弩弯环而势曲的形势,立笔从左偃而下,写得很有力(请看图四)。

第四,“乚”趯 趯就是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钩。为什么把挑叫做趯呢?张绅《法书通释》说:“趯者挑也,而谓之趯者,其法借势于努,蹲锋得势而出,期于倒收,若跳踢然,忌于平出,故不言挑也。直曰趯,横曰挑。今按《兰亭》事字是挑,殊字是趯。”又说:“趯峻快以如锥,趯宜蹲而势生,趯须蹲锋得势而出,出则暗收。”今案忠王书趯的书法,以用横挑为多,也有用直趯的,《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两者都同(请看图五)。

第五,“ㄣ”策 策就是从左向上的斜画。为什么把斜画叫做策呢?张绅《法书通释》说:“策亦画也,不言画者,其法仰笔趯锋轻抬而进,有鞭策之势,故言策不言画。异于勒者,勒则两头下,中高,策则两头高,中下。”今案忠王书策的书法,都揭锋右上,并且特别的长,在笔法看来,这样长的一笔,与勒的写法同。《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两者都同。这也是忠王书法的一个特点(请看图六)。

第六,“ノ”掠 掠就是撇。掠的书法,须劲捷锋锐,势同利刀,所以唐太宗论掠的书法说:“掠须笔锋左出而利”^①,欧阳询说:“如利剑截断犀象之牙。”^②今案忠王书掠的书法,不取劲捷锋锐,而特别向左延长,有按帚着地之势,《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两者都同。这也是忠王书法的一个特点(请看图七)。

第七,“ㄣ”啄 啄就是左方的短撇。啄的书法,《书法三昧》说:“啄腾凌而速进,啄仓皇而疾掩,啄者如禽之啄物,立笔下罨,须疾为胜。”^③今按忠王写啄的书法,都疾掩而出,《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两者都同。

① 见朱履贞纂《书法捷要》卷上唐太宗笔法。

② 见张绅《法书通释》卷下引欧阳询语。

③ 据张绅《法书通释》引文。

(请看图八)。

第八,“乚”磔 磔就是捺。磔的书法,唐颜鲁公《八法颂》说:“磔抑趯以迟移”^①,柳宗元《八法颂》说:“磔趯趯以开掌”^②,这是不徐不疾平行舒缓的写法。另一种是短劲的书法,唐张怀瓘《石论》所说:“磔笔紧势峻,锋出意收”^③便是。忠王写磔的书法,两者兼有,但即在横波之笔,仍表现出如利刃般的锋锐。《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两者都同。(请看图九)。

上面从八法分析忠王《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的书法,得出了两者用笔完全相同的结论。我们知道,学书八法,在前代是童蒙必学的课程,忠王儿童的时候就学书法,到长大又喜欢书法,岂有不熟习的道理。今案忠王用笔有照八法的,也有不照八法的。他的书法不为古人的常规所束缚,而发展了他个人的一种英气纵横的风格。这正是我们鉴定他的笔迹最重要的根据。因为忠王的书法既不是一般的书法,它是具有特殊的风格的,《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书法的相同,就不是一般的相同,而是个人笔法特殊风格的相同,所以《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亲笔所写是可以肯定的。

在《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书法之中,又有几个偏旁字的书法值得注意,如:

(一)乚 忠王写乚字书法,上两点连下磔笔,学锺书磔笔三过折笔法,起笔微仰,中则平,末则起,自然三折,有波浪之势。《谕李昭寿书》用笔严整,上两点分开,《自传原稿》用笔仓猝,上两点作一笔直下,但两者笔法都相同(请看图十)。

(二)糸 忠王写糸字书法,第一点向左离开,第二、三两点并列在一起,《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都同(请看图十一)。

(三)心 忠王写心字书法,第一点向左离开,第二、三两点一笔相连;又心字若作为某一字的下部,它的第一点一般都取势于上部迅笔向左急下。《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都同(请看图十二)。

这三个字的写法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但却表现出是一个人习惯的笔法。

① 据张绅《法书通释》引文。

② 据张绅《法书通释》引文。

③ 据张绅《法书通释》引文。



谕李昭寿书

忠王自传原稿

图八



谕李昭寿书

忠王自传原稿

图九



谕李昭寿书

忠王自传原稿

图十



谕李昭寿书

忠王自传原稿

图十一



谕李昭寿书

忠王自传原稿

图十二

今案《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写法都同，也就可以证明《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的亲笔书信。

在《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书法之中，还有一些字的书法值得注意，如：

（一）先字 忠王写“先”字，上面一短撇都与一画连，下面一长撇都取势于上面的横画，一笔挥下，《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都同（请看图十三）。

（二）而字 忠王写“而”字，中间两竖都很直，《谕李昭寿书》是楷书，而《自传原稿》是行书，但两者都相同（请看图十四）。

（三）无字 忠王在《谕李昭寿书》和《自传原稿》中写的“无”字都是行书，《谕李昭寿书》以充裕的时间书写，故比较整肃，《自传原稿》却以匆促的时间写，故比较潦草，但两者结构和笔法都同（请看图十五）。

（四）罪字 案“罪”字正楷，网下非字，左边本应作撇不作竖。忠王写这一个字，不作撇而作竖，并且比右竖短得多，在《谕李昭寿书》中写的正楷如此，在《自传原稿》写的行书也如此（请看图十六）。

（五）折字等 忠王在《谕李昭寿书》和《自传原稿》中所写“折”字等二十五个字，在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来，是“优劣互差的”；但是，在用笔以至结构的角度看来，却是相同的（请看图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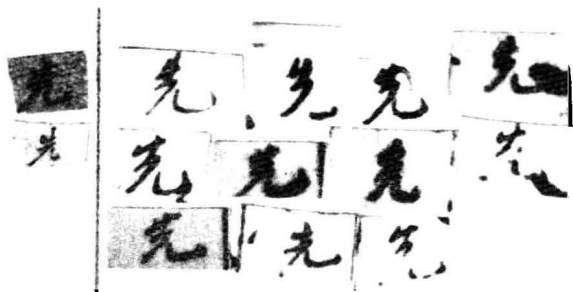
上面这些字的写法，也都没有什么特别，但都表现出同是同一个人习惯用的笔法和结构。今案《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都同，也就可以证明《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的亲笔书信。

在字迹的鉴定中，最后还要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字来说：

（一）欲字 忠王在《谕李昭寿书》和《自传原稿》中写的“欲”字都是行书，两者写法都同（请看图十八）。

（二）兴字 忠王在《谕李昭寿书》和《自传原稿》中写的“兴”字都是写变体字，《谕李昭寿书》作“𣎵”，《自传原稿》作“𣎵”，《自传原稿》比《谕李昭寿书》少写一短撇，是更简省的写法，这一个字变体最主要的写法是“冂”内作“人”，两者写法都同（请看图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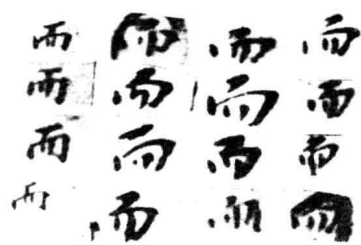
这两个字的写法所以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并不是说这两个字的写法是忠王所特创，而是因为忠王在自传中如此写，在《谕李昭寿书》中也如此写，这说



书

自 传

图十三



书

自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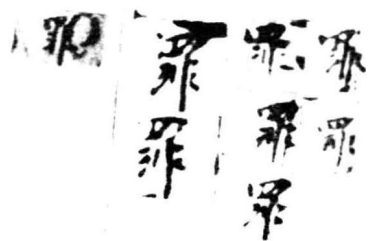
图十四



书

自 传

图十五



书

自 传

图十六



书

自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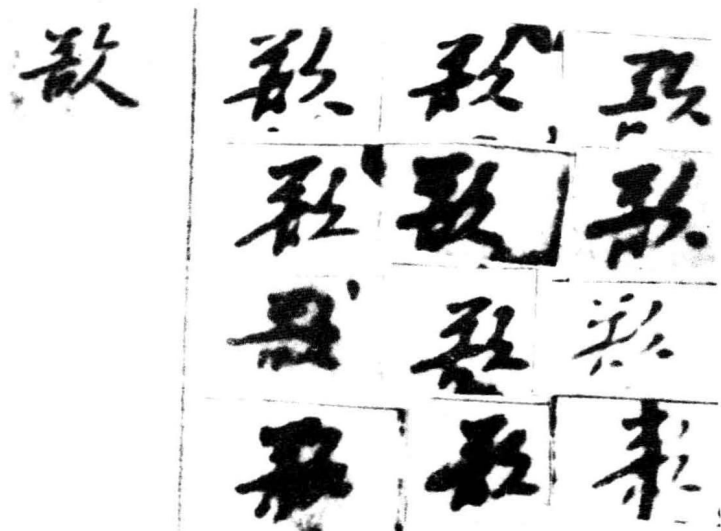
书

自 传

书

自 传

图十七



书

自 传

图十八



书

自 传

图十九

说明：图十三至十九之“书”即《谕李昭寿书》，“自传”即《忠王自传原稿》。

明了忠王对这两个字习惯了这样的写法，否则在用楷书写的《谕李昭寿书》中是不会这样写的。这也是一条证明《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亲笔的证据。

根据上面从八法的分析，偏旁笔法的分析，一些相同的字笔法的分析和行书、变体字的分析，得出了忠王《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亲笔的结论。

现在，我们必须进而研究忠王《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既同是忠王亲笔，为什么《自传原稿》却写得这样潦草雕疏，《谕李昭寿书》却写得那样遒劲流媚呢？这就是孙过庭所论的“合则流媚，乖则雕疏”，“乖合之际，优劣互差”的道理。兹分别稽考于下。

考《忠王自传原稿》是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夏历六月廿七日）后写的，《谕李昭寿书》是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廿七日写的，这是时间的不同。《自传原稿》写的是楷书和行书，《谕李昭寿书》写的是楷书（间有几个行书），这是字体的不同。《自传原稿》是在被俘之后，被囚在木笼里面^①，既身受国破家亡的惨痛，又为部众、为人民和民族的危机等等问题痛苦地反复筹谋，经历着万箭穿心似的惨痛的时候写的。至于在体力方面，被俘前就受了伤^②，被俘后，全身又受锥刺、臂股被刀割、血流如注的酷刑^③，身体衰弱了，腕力一定受了影响。而《谕李昭寿书》却是在两个月前在浦口打垮清朝钦差大臣德兴阿江北大营^④，和二十天前在安徽庐州三河镇歼灭曾国藩湘军最凶狠的李续宾全军^⑤取得了两役决定性的大胜利、粉碎了敌人攻取天京的企图、稳定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大局之后，兴高采烈、志得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记说：“是日作大木笼纳忠酋于内。”过四天，忠王开始在木笼内写自传。

② 曾国藩《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除折》说：“伪忠王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③ 曾国荃《致李中丞书》说：“李秀成擒获后，弟徧刺以锥，流血如注”（见《曾忠襄公书札》卷八）。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记说：“闻生擒伪忠王至，中丞亲讯，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或告余。余以此人内中所重，急趋至中丞处，耳语止之。中丞盛怒……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

④ 考忠王攻破清朝钦差大臣德兴阿江北大营时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八月十八日（夏历八月二十日），据咸丰八年八月三十日德兴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二）。即在忠王写《谕李昭寿书》前两个月事。

⑤ 考忠王在安徽庐州歼灭曾国藩部最凶狠的李续宾全军时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初七日（夏历十月初十日），据胡林翼《查明巡抚衔浙江布政司李续宾三河镇阵亡实迹恩加等优卹疏》（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二），即在忠王写《谕李昭寿书》前二十日。

意满的情况下写的。这是处境、健康、腕力的不同。《自传原稿》忠王是在知道曾国藩要杀害他，为了要完成政治任务，而望敌人“宽限”，“我亦赶写”的迫切情况下^①，以每天约七千字的速度仓猝草成的。^②而《谕李昭寿书》却是在连续获得了决定性的大胜利之后以临池学书的从容工夫去写的。这是心情、速度的不同。《自传原稿》是用一支“破坏了”到“不能”用的笔写在账簿上的^③，而《谕李昭寿书》却是用好笔好纸写的，这是工具的不同。《自传原稿》是在六月酷暑蒸热的木笼里写的，而《谕李昭寿书》却是在十月小阳春的天气写的，这是气候的不同。综看忠王写《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全部条件种种不同的情况，更远过于孙过庭所指出的健康和心情、境遇、气候、纸墨、兴趣五种不同的条件。以孙过庭所说的五种不同的条件，还会产生“优劣互差”的结果，那么，忠王《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应有差异”更是当然的了。

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人会写出优劣差异的字迹，所以运用笔迹鉴定有它的限制性。但笔迹鉴定究竟是凭着具体的东西去对照，虽有优劣的差异，而从笔法去分析还可以辨认是或不是同一人所写，所以笔迹鉴定有它的有效性。只有正确地运用笔迹鉴定的有效性和限制性，然后对所要鉴定的文件不致于失出或失入。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便是一个好的例子。

在这里还要提出一个问题，有人说《谕李昭寿书》最后用行书写“廿七”两字特别大，这两个字与上面的字是否同一人所写？若不同，为什么忠王不自己写而把日子留给他人填上？这位同志还根据这一点疑问提出一个假设，他假定全部以忠王名义颁发的文件都须经过忠王签写日期然后发出，故据签写日期的字迹即可以作为鉴定忠王笔迹的根据。但是经过我们再检查《谕李昭寿书》、《致张洛行书》、《谕康玉吉书》、《谕赖文光书》、

① 忠王在《自传原稿》里写到一半多些的时候，写道：“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

② 曾国藩在他所刻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后记说：“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

③ 忠王在《自传》里说：“此笔破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笔坏不能。”又《忠王自传原稿》写在曾国荃军营的账簿上，现存忠王《自传原稿》照片页缝所印的“吉字中营”四字，就是曾国荃的军营名。

《致艾约瑟杨笃信书》、《谕容椿侄容发男书》等件所写日期出自多人的笔迹之后，这一个假设便不能成立。至于“廿七”这两个字，我们据影印本辨认，大约不像忠王写的，又查信封背面十月下也没有写日子，忠王写信时不写这一个日期，当是留待发信那一天才由发文件的负责者填上日子的。

三 文笔与内容的鉴定证实笔迹鉴定 《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亲笔

从笔迹的鉴定得到《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亲笔的结论。现在，我们再从文笔与内容上去作鉴定。

第一，忠王喜欢用叠字，《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相同 案现存《忠王自传原稿》共三万三千三百馀字，共有六十六句用了二十七个不同的叠字，请看下表。

《忠王自传原稿》用叠字文句表

叠 字	叠 字 文 句	句 数
人 人	教人人可知 到处人人恭敬 那时人人已有退缩之心矣 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号 人人能认我李秀成者 随往文武人人失色 人人各理一事 那时人人遵称 合京人人知到 幸合朝人人与我情厚 是以人人而忠我者 人人俱散 人人悉中堂中丞宽恩赦他 我国人人可悉	十四
事 事	事事严整	一
一 一	一一清白写明 一一交清 即将省内难民一一安抚 一一制造	四
屡屡讲	屡屡讲道理	一
屡 屡	屡屡多言计息	一
件 件	件件可悉 件件有馀 件件载明	三
严严整整	严严整整民心佩服	一
年 年	年年盗贼纷张	一
迷 迷	故而迷迷而来	一
懵 懵	懵懵而随	一
迷迷懵懵	迷迷懵懵而来	一
节 节	节节连营 节节连进二郎河 九师节节连营	三
处 处	处处严密 处处严密防守 此时处处成功 处处地道近城 不能处处防也 处处喊声不绝 处处皆从	七

续表

叠 字	叠 字 文 句	句 数
实 实	实实无知 见事实实不能 实实无心 实实天成 实实无由 实实难行	六
密 密	密密加营	一
弯弯曲曲	弯弯曲曲千里有餘	一
军 军	那时军军俱到	一
湧 湧	湧湧而来	一
闷 闷	我闷闷于囚	一
县 县	县县皆从	一
疎 疎	虽然疎疎有信回报	一
日 日	日日变动 日日连战 日日飞文前来 日日逼紧 日日烦燥	五
多 多	我总是解粮多多回京 其药其码子存贮多多 制造多多	三
叠叠层层	木桥叠叠层层 所过营寨叠叠层层	二
纷 纷	纷纷归队	一
个 个	个个向我流涕 我营将个个可知	二
营 营	营营炮发	一
总 计		六十六

我们从上表看来,“人人”这两叠字就有十四句用了它,其中有许多叠字如“屡屡讲讲”、“密密”、“军军”、“闷闷”、“县县”、“疎疎”、“多多”等都可以不用叠字。叠字表现出一个人口语的习惯,忠王把他口头惯说的词汇写到文字上来,就成为他的文字的一种特点。今案《谕李昭寿书》全文只五百七十三字,就有六句用了六个不同的叠字如下:

- (一) 往往与同朝者争竞
- (二) 尔统下每每滋扰良民
- (三) 本主将事事包荒
- (四) 是人人得而诛之矣
- (五) 惟是我耿耿此心
- (六) 速速归林

其中“人人”这两个叠字,就是忠王最喜欢用的叠字。“事事”这两个叠字,也是《自传原稿》同用。至于“速速”这两个叠字,表示出要李昭寿立刻归林的意思,与《自传原稿》中“实实”那两个叠字表示出千真万确的意思,都同样是加重的语气,也表现出同是一人习惯的口语。从《忠王自传原

稿》看出了忠王喜欢用叠字的习惯，是他的文章上的一个特点，今《谕李昭寿书》同样具有这一个特点，所以《谕李昭寿书》也是忠王亲笔写的书信。案现存以忠王名义发布的原文件，除《致护王陈坤书》、《致潮王黄子隆书》未见原件或照片不论外，其他如《致英国耶稣教士艾约瑟杨笃信书》、《谕赖文光书》、《谕容椿侄容发男书》、《批徐少藩禀》、《与慕王覆英国戈登书》、《给呤喇凭照》六种都无叠字，惟《谕康玉吉书》“中心摇摇”、“切切此谕”两句用有两个叠字，《致张洛行书》“缘兄与弟迢迢相隔”、“中心摇摇”两句用有两个叠字，《谕赵景贤书》“所有各郡州县在在非降即破”句用有一个叠字，《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无不在在仰体上天好生之德”、“惶惶如丧家之犬”两句用有两个叠字。但细读这四份文件句子所用这几个叠字，都是古文修辞中常用的叠字，与忠王在《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中“事事”、“人人”、“迷迷”等叠字把口语写到文字上来的不同。此外，在《谕刘肇均书》中“必要营营相连”、“该营须要筑得坚坚固固，飞鸟不入方好”两句所用“营营”、“坚坚固固”两个叠字，却都是口语，是与忠王的叠字相同的，但是，经过我们仔细检查《谕刘肇均书》这一个文件并不是忠王亲笔写的，因为此文有“伊所言亦是”，第三身代名词用“伊”字，不合忠王的文章习惯，忠王是惯用“其”字，忠王在现存《自传原稿》十四张照片中全无例外。至于此文在文言中夹些白话语汇，可能是忠王添改的，如“以应二殿下隔江那边之声援，所筑之营，必要营营相连”，“并饬二殿下于对江那边……以应六王宗这边之声势”等。文中又有些是统帅对部下的要求，也可能是忠王自己加上的，如“该营须要筑得坚坚固固，飞鸟不入方好”，“有粮即盘，妖来即剿”等。这份文件很可能是幕僚在忠王意图之下，先拟成公文稿，忠王再核阅添改，最后由幕僚誊录的。所以其中所用“营营”、“坚坚固固”两个叠字，很可能就是忠王自己加上的，但这一份文件，却不是忠王亲笔写的文件。

第二，《谕李昭寿书》用的虚字表达文义与《自传原稿》同 我们知道，虚字的作用是表达文句内应有的神情，从这些地方看出一个人的语气。而古文的虚言不是容易学得好的，忠王只读过三年书，虽然他刻苦力学，但是由于家贫要他帮工和种山烧炭为生，他没有得到寒窗十载师友切磋琢磨的学习机会，所以在他的文章里写的虚字有时就难免欠佳，兹对照《谕李昭寿书》

与《自传原稿》所用“之”、“乎”、“者”、“也”等虚字的神气两者相同，欠佳的地方两者也相同。兹列对照表于下：

《忠王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虚字文句对照表

虚 字	《自传原稿》文句	《谕李昭寿书》文句
之	与我天王一般之意见不差 非我军犯之昧言 此非我之虚言 面责我之不忠	本主将之前情尔既不忘
乎	而何不忘我乎 有何人敢包我投乎	岂忘心乎 尔谅知乎
者	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 安民者出一严令 自由从者数万而随 私杀害者赔命，各愿投营者即在营中打入城者鬼把城门	无奈尔行为不轨，往往与同朝者争竞 似此无常反复岂志者所为
也	恐我治其罪，故买此王而拒我也 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锋打破杭郡并非人力之所为也	愿尔降妖亦能实力拒我也 岂志者所为而留名迹于天下后世也
否	而（尔）知朕法否	尔知道否
矣	那时人人已有退缩之心矣 久知死期近矣	辜负我一片同仁同义之心矣 悔已迟矣

我们看上表，所举“之”字的用法，忠王在《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中都同用作前置词，等于语体文“的”字，在古文用字来说，这一个“之”字一般都可以不要，多了反觉得文气松懈。“乎”字的用法，忠王在《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都同用来表达感叹或疑问的情意，在修辞说来都欠佳，但正可以看出同是一人的语气。“者”字的用法，忠王在《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都同作代名词用，等于语体文“的人”的意义，这一个字在古文有时可以省去，例如《谕李昭寿书》中“往往与同朝者争竞”的“者”字文法是通的，但多此一字读起来觉得生硬，不如省去反为精炼，今与《自传原稿》对照，知道忠王文章在这种地方一般都用这一个字。“也”字的用法，忠王在《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都同作语尾词，表

现断定的意义，我们对照所举忠王在这两个文件中所用“也”字的两条例子，虽然所论的事是不同的，但因都表现同样或类似的断定的意义，就不仅是“也”字用法相同，就是在这一个句子中其他与“也”字有关的几个字，如“拒我也”、“所为也”都相同。“否”字的用法，忠王在《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中都同作副词用，所举《自传原稿》“而（尔）知朕法否”？与《谕李昭寿书》“尔知道否”的一条例子，不仅两者“否”字的用法全同，而两者的语气用辞也都相同。“矣”字的用法，忠王在《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中都同作语尾词，表现出一种完了的意义，从所举“之心矣”一句话对照，不但“矣”字用法相同，而且与“矣”字有关的几个字也相同。以上所举各字对照的例子，说明了只有出自一人的文笔，才会有这样的相同。

第三，《谕李昭寿书》用字、用辞有与《自传原稿》相同的地方 用字、用辞属于修辞的工夫，从这些地方，也可以去看出个人的文笔。兹将《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相同的用字、用辞列表于下。

《忠王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用字用辞对照表

字 · 辞	《自传原稿》文句	《谕李昭寿书》文句
谅	谅可久悉矣 满土谅有传声	谅知情义 尔谅知乎
速	各速买粮 不能速去	尽可速速归林
爱 将	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是我部下爱将	自己爱将
诛 之	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	是人人得而诛之矣
思 之	请东王思之	尔自思之

案上表所举“谅”、“速”两个字，和“爱将”、“诛之”、“思之”三个辞，忠王在《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中都同用。忠王用“谅”字是表示一种揣测的意思，经过两种文件的对照，才知道他是习用了这一个字，所以他在《谕李昭寿书》中“尔谅知乎”那一句问李昭寿的话所问的事件，全是李昭寿所知的，但他还是用了这一个“谅”字。忠王在《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中都同用“速”字，他可以用“快”字，或用“迅”字，或用“立刻”等字，但他却都不用，而用“速”字，这也说明了“速”字是忠

王习用的字。“爱将”两字，虽不是忠王所创用，曾见于史传中^①，但忠王说到人与人间的亲密关系时喜欢用“爱”字来表示，如在《自传原稿》中说：“蒙得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爱臣”，如说：“陈炳文与我至爱”。他不作“宠臣”而作“爱臣”，不作“至好”而作“至爱”，都可见忠王喜欢用“爱”字表示这种关系。所以他在《自传原稿》中称谭绍光是他的“爱将”，在《谕李昭寿书》中也称李昭寿为“爱将”，可证同出自忠王本人的手笔。至于《自传原稿》说的“合朝诛之”、“请东王思之”，《谕李昭寿书》说的“人人得而诛之”、“尔自思之”等辞意也都相同。

第四，《谕李昭寿书》用“尔”做第二身代名词与《自传原稿》同案。“尔”字古代用做第二身代名词，《论语》：“惟我与尔有是夫”。但客家方言也同以“尔”字做第二身代名词。《忠王自传原稿》一律用“尔”字作第二身代名词（忠王写的是简体的“尔”字，曾国藩刻本改用繁体的“爾”字）。考太平天国广西起义群众，大多数是客家人。《忠王自传原稿》用简体字，写不文不白的文体，正是遵守太平天国反对“古典之言”的文化政策^②，他断不会特地用古典的“尔”字。而从他不用“汝”字或“你”字看来，他应该是客家人，所以用客家方言的“尔”字来做第二身代名词。今案《谕李昭寿书》也一律以“尔”字做第二身代名词，全文只五百七十三字，就用了二十七七个“尔”字。兹择录几句对照于下。

《忠王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尔字对照表

《忠王自传原稿》文句	《谕李昭寿书》文句
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爾。朕铁统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爾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爾相干。爾是两湖之人，此事由爾便，爾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爾。爾意欲何为？爾身受重任，而（爾）知朕法否？	本主将自与爾共事以来，觉爾大有作为，将才不俗，故惜爾如珍宝，视爾如手足，揆爾之为人，谅知情义，必知始终如一，必知患难同当，竟不意爾乃反骨之人，早知其如此，悔已迟矣。我主天王待爾不薄，本主将亦待爾有情，无奈爾行为不轨，往往与同朝者争竞。爾统下每每滋扰良民，以致军民怀怨。但爾若在天朝，本主将事事包荒，爾知道否？

① 《晋书》列传第十三《山简传》说：“彊家在并州，简爱将也。”《新唐书》列传第七十二《李元素传》说：“东都留守杜亚……更以爱将武金掠服之。”

② 见洪仁玕等《戒浮文巧言谕》述洪秀全的指示。

我们看上表所列《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对照，在一个句子之中连续地用了好几个“爾”字，不但多用“爾”字相同，而语气也相同。这就因为忠王是用对话的口语写到文字上来，活像在指着对方数说一样，所以左一个“爾”字，右一个“爾”字，连续地用了许多“爾”字。这一种语气，表现出了一个人说话的习惯，也表现出了一个人说话时满腔气愤地指责对方的情绪。今案《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都相同，也可以证明《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写的亲笔信。案现存以忠王名义发布的原文件，除《致护王陈坤书》、《致潮王黄子隆书》未见原件或照片不论外，其他如《谕康玉吉书》、《致张洛行书》、《致英国耶稣教士艾约瑟杨笃信书》、《谕赖文光书》、《谕刘肇均书》、《批徐少蘧禀》、《与慕王覆英国戈登书》、《给呤喇凭照》八种都不用“尔”字。惟《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谅尔一带人民”、“恐尔人民惊恐”、“仰尔尚海松江一带人民兵勇知悉”、“尔等试看我师一路而来”四句用了四个简体“尔”字；《谕赵景贤书》“爾我之雌雄易决”、“谅亦尔所闻知”、“爾自度湖郡之视杭省果何如者”、“爾如念及民众”、“亦可无害爾身家”、“总在爾自裁决”、“因爾我同是汉人”七句用了七个“爾”字。但细读这两份文件，第一，用的“尔”字不多；第二，不是把口语写到文字上，而是出自古文；第三，“尔”字为公文常用字，这两份文件都是公文，所以与《谕李昭寿书》不同。至于《谕容椿侄容发男书》共用九个繁体“爾”字，三个简体“尔”字，与《自传原稿》、《谕李昭寿书》都同是把对话的口气写到文字上来，并且也算用得较多，但这一封信，检验它的笔迹、文气都不是忠王亲笔写的，从它的字体端正，笔笔不苟看来，显然是忠王的秘书根据忠王的话写的。当时忠王正在杭州城外指挥军队进攻杭州，因为军事倥偬，所以由秘书代笔，这封信也不是忠王亲笔的书信（封套可能是忠王亲笔）。

第五，《谕李昭寿书》中用有广西潯州、梧州的方言 案忠王是广西梧州府藤县长恭里新旺村人。《谕李昭寿书》中有广西潯州、梧州方言，如：

（一）反骨 “竟不意尔乃反骨之人”，案“反骨”即反复无常，这是广西潯州、梧州一带方言。案《三国演义》也记有诸葛亮说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的话。

(二)包荒 “本主将事事包荒”，案“包荒”本《易经》中用语，作包容解，现在广西浔、梧有些地方有这一句方言，作包庇解。

有人以为“反骨”既同见于《三国演义》，“包荒”既出于《易经》，就不见得一定是用方言，也就不见得一定是忠王所写。这是不对的。因为假使这封信确是一个非广西浔州、梧州籍的文人写的，案之当时文人的作风，是看不起演义小说的，既引用了经典著作的《易经》中的“包荒”，就断不会引用演义小说的“反骨”。而况“包荒”一词，在浔、梧方言说来，是一听就懂的口语，而在古文辞看来，却是一个难懂的词，所以清代学者王引之在他的名著《经义述闻》中列为专条训诂，用了二百三十一字才能把它解释得通^①，可见也不是一般文人所能引用得来的。我们从这一封信的文笔看来，正说明了这一个词语是一个对文言文还是半通不通的人把方言写到信上来的。至于“反骨”这一个方言，在广西浔、梧一带真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的口语，忠王把口头说的话，写到他的夹有白话语汇的信上来更是自然的了。我们知道，在广西浔、梧一带保存有一些古代的辞汇和与小说上相同的辞汇，例如“畀”字是一个古字，见于《书经》、《诗经》，作“赐”字、“与”字解，即等于现代语的“给”字，但我的家乡广西贵县（清代属浔州府）说把东西给人家，不是说“给你”，而是说“畀你”，在贵县的方言中仍保存着古代这一个语汇。又如从前有人研究《醒世姻缘传》中“魔驼”一词的意义，费了很大工夫，先搜求全书中同样的句子，然后用归纳的方法去归纳出作“迟延”的解释，我看了不觉失笑，因为我家乡的老太婆就常常用“魔驼”这一个口语去教训工作迟延的年青人。假如有一个贵县人同忠王的文笔水平那样也去写一封半文不白的信，把他口语说的“畀”字和“魔驼”这一个方言写在信上，你能说他是从《书经》、《诗经》和《醒世姻缘传》引用出来的吗？忠王《谕李昭寿书》中用“包荒”、“反骨”这两个方言正是同样的情况。又有人说忠王《谕容椿侄容发男》信中不是用有广西浔、梧方言的“和锥”、“铺派”吗？为什么不能作为忠王亲笔的证据，而《谕李

① 见卷一。案曾国藩《覆胡宫保》说：“不可互相奖饰，互相包荒”（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曾国藩自称他“最好高邮王氏父子”（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见《曾文正公家训》卷上），又说：“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谕纪泽》，见同书卷下）。他用“包荒”二字，便是从王引之《经义述闻》训诂得来，与忠王用方言不同。

昭寿书》中“反骨”、“包荒”这两个方言就可作为忠王亲笔的证据呢？不错，我们反对用孤证作出的结论，我们不仅不能根据只用了两个方言就可以证明一封文件是忠王的亲笔，就是本文所举任何一条证据，假使是孤证的话，也都不可能作为忠王亲笔的证据。但是，它并不是孤证，除了它之外，还有许多证据，那么，把它与其他许多证据结合起来，它就不是孤证，它就可以有资格作证。我们鉴定《谕李昭寿书》是忠王的亲笔，无论在笔迹的鉴定上，或内容的鉴定上，都是依靠全面的证据，联系全面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孤证。我们在依靠全面证据、联系全面证据的情况之下，《谕李昭寿书》中所用“反骨”、“包荒”这两个方言，就具有作为我们论证这一封文件是忠王亲笔的证据的作用。

第六，《谕李昭寿书》文笔有些地方欠通，正是忠王的文笔，忠王有能文的秘书，这封信不是秘书代笔 《谕李昭寿书》就文法、修辞的角度来看，是有些地方欠通的，兹指出几句来说。

（一）“照得投明弃暗，固俊杰志建非常；识势知时，亦英雄心存是要”，将“是要”生硬与上句“非常”相对，语句欠通，但正与《自传原稿》“与其有争是定”的“是定”同一语气。

（二）“除徒教尔行仁，劝尔从善，谁料尔出乎反乎”，案《孟子·梁惠王》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是说以此待人，而人也将以此报复的意思。今忠王此处，“尔”字是代名词，而“出乎反乎”其意却是责骂李昭寿既投太平天国，又叛而降清，生硬用《孟子》，而与原意全不相同。

（三）“而我与国诛妖之大义岂忘心乎”，“与”应作“为”，作“与”不通；“乎”字用的不恰当。

（四）“何言妖与不睦，杀妖道台而来”，“妖与不睦”似应作“与妖不睦”较合。

可见《谕李昭寿书》的文字有些是欠通的，正是忠王的文笔，我们细读他的自传便可知道。但是，有人会问：“这封欠通的信，安知不是忠王的秘书代笔”？要答复这个问题，请查现存忠王秘书代笔的文件。例如：

（一）“窃思京都地临大江南北，原有金城汤池之固，然必铲平南方妖穴，方可永奠磐石之安。”（《谕康玉吉书》）

(二)“缘兄与弟迢迢相隔，未克聚首一堂共晤兵机，诚令兄有渭北江天之感。”(《致张洛行书》)

(三)“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

(四)“况满、汉之畛域甚明，尔我之雌雄易决，即云食其禄者报其主，恐天心之莫挽，究人力所难支。”(《谕赵景贤书》)

又可见忠王是有能文的秘书在。假如忠王真要人代笔写信给李昭寿，他幕中既有能文的秘书，他何致叫这一个欠通的人代笔；李昭寿是河南固始人，他更不会叫一个写得半文不白夹有广西潯州、梧州方言的人代笔。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一封文件，只有是忠王自己写的亲笔信，而不是秘书的代笔。有人也相信这封信的确是忠王写的，但却提出一个疑问：会不会也可能是忠王口授要点，由机要秘书体会忠王的意图，照录忠王口授的片段的词汇语句，再联属而成为整篇的文章呢？如果如同说者的做法，这封信就只能够保存忠王所口授的片段的词汇语句，而其他部分却是代笔者的文笔和语气了。今案这封信不但白话语汇完全是忠王的，就是文言虚字“之”、“乎”、“者”、“也”、“否”、“矣”等语气也完全是忠王的文笔，这就可见不是忠王的秘书根据忠王口授要点，体会忠王的意图写成的。又有人问：忠王会不会口授全文，由秘书记录呢？如果如同说者的做法，忠王就必须如同蒙馆老师教学生那样，逐字逐句地慢悠悠地念了又念，等候秘书慢慢地逐字逐句地听，逐字逐句地写。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省工夫，反不如忠王自己写还快得多哩。忠王会写字，喜欢写字，而且这封信又须亲笔写，他也不会这样做的。

第七，《谕李昭寿书》不是他人所能代笔，只有忠王本人对李昭寿才写得这封充沛革命热情爱憎分明动人心弦的书信。我们上面说从文法与修辞的角度来看《谕李昭寿书》有些地方是欠通的，但从表现的内容来论，却是一篇写得极真挚动人的书信，只有忠王本人才写得出，而不是代笔所能表达得出来的。案李昭寿初杀清朝道员何桂珍投太平天国，忠王惜他如“珍宝”，待他如“手足”，用尽心力来教育他，后来据滁州反叛，威胁天京北岸门户的江浦。忠王痛恨自己“目不识人”、痛恨叛徒“恩将仇报”。但是，李昭寿既杀清朝道员来投太平天国，又叛太平天国而降清，反革命是不会放过他的。所以忠王在此信中，首先当头棒喝去提醒他，问他：“尔自投顺天朝，

试问所因何事？今又转降胜保，难保不察前因，尔终久总难释其前过，大丈夫岂可且顾眼前，不思后患。”接着就警告他：“情义既绝，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势必先诛。”劝他“速速归林”，否则“两敌莫保”，给叛徒指出清朝将来必要诛杀他的后果。最后对他“无常反复岂志者所为而留名迹于天下后世也”的行为，从“不亦惜哉”四个字里面寄以无限的惋惜，企图以大道理和恳挚的感情去感动他。这一封信，义理昭然，尤其是全文表现出一种极真挚的热情，不论是痛恨，是惋惜，都活跃纸上。除了忠王本人之外，谁能代达得出这一种复杂而真挚的情感？忠王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劝说李昭寿归林，劝得动李昭寿，就对太平天国战局极为有利，这是一件大事。李昭寿是忠王的“爱将”。我们知道，以亲笔信给人会使人感到亲切，代笔信则使人感到疏远，这是人情之常。如果忠王是一个不会写信的人那是没得说了，但是，忠王在自传里说：“我亲书字到，我营将个个皆知”，那么以一个部将个个都熟悉他的亲笔的忠王，而要进行这样一件重大的去劝说一个曾经为自己的“爱将”现在变成为叛徒的人的大事，他若以代笔信给李昭寿，那就一定减却说服力了。所以忠王这一封信就必须自己写，这与调兵调将的文书和檄文布告的作用完全不同。忠王这封信虽然没有劝得动李昭寿归林，但李昭寿却深感忠王对他的爱护。《忠王自传》记其后的事说：“李昭寿与我有旧日深情，渠见天王封陈玉成为王，旁观不忿，行文劝我投清。”忠王被俘后，《忠王答辞手卷》内庞际云记录忠王答辞又说：“李世忠（纲案李昭寿降清后的改名）是李秀成旧部至好，从前通信，去年到江北，李世忠兼劝降。”可知忠王与李昭寿个人的情分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忠王与他“有旧日深情”，他是忠王的“爱将”，所以忠王要劝说他，就必须用亲笔信，才能够以情分去感动他。有人看见《谕李昭寿书》引用有《孟子》“出乎反乎”一句话，就以为非十载寒窗的文士不能写出。不知忠王童年曾随舅父读过三年书，后来“家贫不能多读，帮工各塾”。他读过了三年书，又在书塾帮工，当时的书塾读的是《四书》、《五经》，忠王不要说是生硬搬用《孟子》，就是正确地引用《孟子》也做得到。我们从《自传原稿》中那些句子，例如“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明贤偃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去戚离乡”、“水涨满川”、“雨雪交加”等句子看来，知道忠王不但在书塾读了《四书》，而且还读了唐、宋古文，他能够有构思修辞的时间，就完全可

能写得《谕李昭寿书》的文笔出来。

我们根据上述七项内容鉴定，得出了《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亲笔写的书信的结论，内容鉴定也证实了笔迹鉴定的正确。

在这里，我应该对金毓黻先生在《关于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再商榷》^①一文里面否定《谕李昭寿书》为忠王亲笔书信的论据加以讨论。金先生在内容方面提出两条论据：第一条是“凡是盖印的文书，都是属于一般性的”，就是说都是属于公文，而不是私人的通信；第二条是引曾国藩删改后的《忠王自传原稿》中所说：“我在天朝用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的话，说“他盖印而无密号的文书，都不同于亲笔书信。”金先生经过“细审《谕李昭寿书》，不但盖印，也无密号”，因此，他下断案说：“就不应该作出是忠王手迹的断定”。他否定了《谕李昭寿书》为忠王亲笔的书信。案金先生第一条所说：就一般情况来说，“凡是盖印的文书，都是属于一般性的”，私人通信没有盖关防，这确是一般情况，但这一种一般情况却不能推论到太平天国上去。考现存《忠王谕容椿侄容发男书》^②是一封家书，并非公文，虽所指示的是战事，但与曾国藩给曾国荃指示作战的信性质有什么不同，而忠王的家书却盖上了“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秀成”大长方印，曾国藩的家书并没有盖上清朝两江总督的关防。又考英王陈玉成给他亲信部将扶王陈得才等指示作战的信，与曾国藩给李鸿章、鲍超等指示作战的信，性质并没有两样，但英王的函件就盖上“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忠勇羽林军英王陈玉成”大长方印^③，而曾国藩的函件却没有盖上清朝两江总督的关防。由此可知这是太平天国的一种风气，不管什么文书都要盖上关防。考忠王曾经说过，李昭寿是他的“旧部至好，从前通信”，他明确地说是私人“通信”，而不是“公文”往来。忠王在《谕李昭寿书》上盖上关防，乃是太平天国的一种风气，怎能够说盖了印就是一般性的文书，而不是私人的通信？可见金先生第一条“凡是盖印的文书，都是属于一般性的”说法推论到太平天国的情况上来是不能成立的。案金先生第二条所举《忠王自传原稿》原文并不如此，忠王初作“我在天朝欲调兵者盖”九字，后来忠

① 见《历史研究》1957年第一期。

② 原件现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③ 原件存故宫博物院。

王把这九个字拉去，而另在旁边写作：

我在天朝时调将文盖印者，无我亲画密号，其将不从。

曾国藩把“调”字改为“用”，把“将”字涂抹，改“画”为“书”（金先生文作“笔”，大约是排误），便改成了“我在天朝时用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①金先生没有细辨，把曾国藩涂改的“用文盖印”误认为忠王的原文，所以他才提出忠王“盖印而无密号的文书，都不同于亲笔书信”的说法。其实忠王说的是“调将文盖印者，无我亲画密号，其将不从”，而并不是说所有盖印的文书都要画密号。今案《谕李昭寿书》，乃是忠王劝诫一个投了敌人的叛徒，并非“调兵”、“调将”，无须画密号，那就当然是没有密号了，可见金先生第二条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金先生两条论据既然都不能成立，他的结论也就不能成立了。

四 结论

由于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忠王写《谕李昭寿书》写得遒劲流媚，写《自传原稿》却写得潦草雕疏，两者有着“差异”是肯定的。有一些人没有适当地掌握到古来书法名家所指示“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乖合之际，优劣互差”的鉴定理论的精神，所以浮光掠影地看去或者是粗枝大叶地去对照，看见了有“差异”，就断定不是同一人的笔迹，《谕李昭寿书》不是忠王的亲笔书信。

经过我们从笔迹鉴定，根据八法的分析，看出了忠王书侧、勒、策、掠、磔五种书法都有他个人的特点，他的用笔有照八法的，也有不照八法的，他的书法不为古人的常规所束缚而发展了他个人的一种英气纵横的风

① 这一处曾国藩的涂改，系丁云青先生首先辨认出来的，见所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一文附注（载《文史哲》1957年第三、四两期中）。我覆案原稿真迹照片确实如此；惟丁云青先生说“文盖”二字也被曾国藩拉掉，那却是丁先生把那条粗肥而深浓的间格线误认了，曾国藩没有拉掉这两个字。又丁先生说“亲”字为曾国藩所添，就我据忠王笔迹及曾国藩笔迹对勘起来，这一个“亲”字乃忠王所写，而不是曾国藩添的。

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誨諭客格經客發男知忠係前父在桐康命爾隨王特字及而行保忠義軍
等為其接應先係蕭山而後改紹興以除浙省之羽翼好早日成功也于月初一日誨諭王特字及自紹興發來報云稱紹興
克復得者數千兩等在後亦到紹興已登城內問忠之下是為收帳今紹興已得報即指日可克官兵自到統即取日
與日將城外缺穴一概掃平後元無敵活今者數千自降者數千已將城圍困內外不通成功在即矣爾等已
遠征即可與進王斬和離對敵好等即計克寧敵尔兵下足已告捷元在後將戰兵而未接應一切已而
囑其自勵力助攻敵不備早成大功 國之幸也凡事總與陸王特字及計休其行若各軍平靜回
師之日必與王特字商議如何守地如何安民必得穩固爾等方可回未至父王喜甚務平其與之兵已到頭
天安亦未有人足用未爾等任情馳騁多番報草多否軍需有否報尔查明城中婦女要分別男婦男行
女歸女行不得混雜報者不罰 爾等依法安治方不負爾父之訓教亦為 國之良臣也仍小心謹慎以顧
軍機是為為此特頒誨諭仰 爾等遵諭而行具諭

太平天國軍 萬 年 十 月

初三



格。《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的书法都同。此外，我们从讠、糸、心这三个偏旁的字的书法对照，从“先”字、“而”字、“无”字、“罪”字以及“折”字等二十五字的书法对照，从行书的“欲”字和从变体的“奥”字对照，《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的书法都同。所以我们从笔迹的鉴定得出了《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同是一人的笔迹，《谕李昭寿书》是忠王亲笔的结论。

我们再从文笔与内容去作鉴定，提出了七项证据：第一，忠王喜欢用叠字，《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都同；第二，《谕李昭寿书》用的虚字表达文句的神情与《自传原稿》相同；第三，《谕李昭寿书》用字用辞有与《自传原稿》相同的地方；第四，《谕李昭寿书》用“尔”字做第二身代名词与《自传原稿》同；第五，《谕李昭寿书》中用有广西潯州、梧州的方言；第六，《谕李昭寿书》文笔有些地方欠通，正是忠王的文笔，忠王有能文的秘书，这封信不是秘书代笔；第七，《谕李昭寿书》不是他人所能代笔，只有忠王本人对李昭寿才写得出这封充沛革命热情爱憎分明动人心弦的书信。我们根据这七项证据，得出了《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亲笔写的书信的结论。文笔与内容的鉴定，也证实了笔迹鉴定的正确。

笔迹鉴定是鉴定文献和司法定讞的一种处理方法。如果做笔迹鉴定而没有掌握到甚至无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和限制性，就会造成失出或失入的错误结果，只有正确地掌握着笔迹鉴定的有效性和限制性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便是一件对笔迹鉴定的有效性和限制性这一个理论的好说明、好例证。

后 记

我这篇论文主要是从书法的分析和文笔与内容的考据两方面证实忠王《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两文件都同是出自忠王的手笔。至于我对两者所以会发生差异的解释是属于次要部分。

我解释差异的理论根据是孙过庭的“乖合优劣论”。而应用这一个理论的大前提是先肯定了忠王《谕李昭寿书》为优，而《忠王自传原稿》为劣。

优《谕李昭寿书》而劣《忠王自传原稿》，这是一般的看法。我是接受了这一个看法，然后根据孙过庭的理论来进行解释的。

丁云青先生同意我所鉴定《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都同是忠王亲笔写的文件的结论，而不同意以《谕李昭寿书》为优而《忠王自传原稿》为劣的一般看法。他以为：“《谕李昭寿书》用笔横平竖直，结构整齐规矩，一览无馀，不耐寻味，但易为人们所喜爱；而《忠王自传原稿》则用笔朴拙，结构倾欹，别具风格，趣味隽永，已入名家书法之堂奥，但难马上为人们所赏识，以苏东坡之书当时尚不免‘士大夫多讥’，‘今人未解’，尚须‘远付百年公论自出’（黄庭坚《跋东坡水陆赞》），何况忠王之书，其真伪不分（以《自传》为伪），优次颠倒（以《自传》为次），固不足怪也。”《谕李昭寿书》是忠王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公元1858年）写的，而《忠王自传原稿》是忠王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公元1864年）写的，相差有六年。忠王在六年以前写的字还没有定型，到六年后写的字已经进入了定型的阶段，所以《自传原稿》就比《谕李昭寿书》写的好，有了差异，因此，从发展看问题，提出了“先后差异论”的理论去解释差异。丁云青先生对书法有深邃的研究，他的看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如果肯定《谕李昭寿书》为优，而《自传原稿》为劣，就必须用孙过庭的“乖合优劣论”去解释差异；如果肯定《谕李昭寿书》为劣，而《自传原稿》为优，就必须用“先后差异论”去解释差异。这是两个不同的前提，决定了两个不同的理论解释。

我必须声明，我所坚持的是从书法分析和文笔与内容的考据得出的《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都同是忠王亲笔写的文件这一个结论。至于两者孰优孰次，还有待于书法专家们的研讨。如果确是《谕李昭寿书》为次而《自传原稿》为优的，则我本文所用孙过庭“乖合优劣论”的解释便须全部放弃，而必须另从发展看问题，以“先后差异论”去作深入的研究。

1957年6月11日罗尔纲记

李秀成传

4

5

6

7

题 记

《李秀成传》，原名《忠王李秀成传》，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4 年初版，1956 年第三次印刷。1985 年作者据所著《太平天国史·李秀成传》与 1954 年版《忠王李自成传》重写而成，收入《困学丛书》内。本卷即据以编入全集，并附原作题记，删去后附《李秀成伪降考》。该文见全集所收《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

作者题记

这部《李秀成传》，是今年夏天据我最近写的《太平天国史》中的《李秀成传》和1954年写的《忠王李秀成传》重写而成的。

五十年代写的那本小册子，对李秀成一生所安排的章节，今天看来还是脉络分明的。只是那时对太平天国全史正在钻研中，对李秀成的一些重要历史也还未考出或未清楚，因此，那部小册子就免不了粗疏。这部小传，参照了它章节的框框，而内容则有所不同。但仍是一部简短的小小读物而已。

在李秀成一生中，有一个重大问题。他在被俘后写了一部《自述》。他究竟是真降还是伪降呢？历史家必须作出判断。伪降不等于投降。为气节教育起见，伪降必须批判，那是后人的事。而历史人物必须还他真相，这是实事求是。断不可因为要批判伪降，而否定李秀成的伪降，甚至否定历史上没有伪降的事。我做考据工作不是先有一个“看法”去求证的，而是为追求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或非，真或假，有或无而去考证，把所见资料都摆出来，根据资料作出结论。我对李秀成这个问题的考据也是如此。我认为，在历史事实没有考出以前，不应有观点，观点是在考出历史事实之后才作出的。如果在未考出历史事实以前就说：“我的观点如此”，那这个所谓“观点”，并非“观点”，实际是“主观”，是“成见”。本书特附《李秀成伪降考》^①一篇，敬请列位读者指教！又这篇考据是提出假设去求证的。假设是一种科学方法，先从观察入手，次在观察的基础上，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归纳、导致假设的形成。假设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并不是研究的开

^① 《李秀成伪降考》已作论文刊出，收在《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内，此处删去。——编者

始，而是研究成果的初步概括。社会科学证明假设，可用所知事实来检验，再通过一些新的佐证文献，假设就可以成为定论。只是我今天使用假设方法还在学步，敬请列位读者多加指教！

关于李秀成问题，国家已于1982年为他平反，恢复了名誉。1982年4月2日《光明日报》报道新华社南京4月1日电说：“坐落在苏州城内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经国务院核准，恢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近已动工修缮。忠王府建于1860年，是忠王李秀成率军南下攻克苏州后，没收官僚地主的住宅和花园，动员民工修建的。它曾作为太平天国在东南地区的指挥中枢，是现存的太平天国时期最为完整的王府建筑之一。府内有彩绘及壁画四百八十三方，刻画细腻，色彩绚丽，是太平天国遗留的珍贵文化遗产。1961年，忠王府曾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中全盘否定李秀成，这座建筑也被撤销了重点保护。”这是李秀成一生特大事件，也是历史文献，故特记于此，以告读者。

1985年9月5日 罗尔纲谨志于北京



忠王冠服像



忠王常饰像

上页两像采自 A. F. Lindley (Lin Li 呤喇) 的 *Tai-Ping Tien-Kwoh*。案呤喇曾在忠王部下任职，他的画像是从印象而来的。书中有一段记他会见忠王的印象说：“他看起来约有三十五岁，但由于精神体质各方面的烦劳，使他的外貌显得更憔悴些，更苍老些。他的体态是轻快的、活泼的、强健的，有种特别优美的姿态，虽然他的身材似够不上普通中国人的中等高度；他的举止态度尊严而高贵，他的行动迅速而庄严。他的面貌是引人注意的、富于表情的、好看的，虽然不算美，如照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它略为带些欧洲人的形象，因而使他们不很喜欢。他的鼻子较普通中国人稍直；嘴是小的，几乎近于纤巧，配着他那嘴巴的形状和轮廓分明的嘴唇，表现出绝大的勇气和决心。他的肤色是黑的；但是他的眉与眼却可以直接告诉其观察者，使知他所遇到的乃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他与众不同的，不仅是那非常高而宽广的额，而且是他的眉与眼，它们与普通中国人特有的竖立的样式不同；他的两眼近于成为一条直线；惟一像中国人的部分是眼睑；眉高高地位在眼上，几乎是成水平，稍为扬起的不是其外端，而为其内端。此一特点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没有比他更显著的；我只看到少数的湖南人有一点相近；这使人感到忠王面容不大像中国人的面貌。他一对大眼不断地闪烁着，同时，他的眼睑时时在抽动。从他非常活动的面容和他身体的无休止的过敏性的动作（身体的某一部分随时在动而无休止，不论两腿是否交叠着，他的脚总是在地上轻拍着，或则两手交握着，又松开，或则忽然起立，忽又坐下，这些动作都是突如其来地开始的）来看，没有人会想象到他用兵时竟那样十足地冷静；可是，以后我时常在作战中看见他，那时虽然他显然是在兴奋之中，他的沉着镇定却始终不乱，他的声调（时常是低沉而柔和的，句语和谐而流畅地滔滔涌出，1860年8月中曾在上海近郊因被英人弹片所伤而略受影响）除了万分危急时加快并更加坚决之外永不改变。当我与忠王初次会见时，我发现他的服装应该说是很朴素的。他并未穿起朝冠朝服，只穿一件通常的赤红色的棉上衣，头戴着普通式样的赤红头巾，加上他所特有的一种便装的头饰，计有缀在额前的一颗大的珍贵的宝石，另外八颗珍奇的圆形金质雕牌，每四颗一排分列于宝石两旁。”

目 录

第一章 家庭与时代	137
一 雇农的儿子	137
二 金田起义的前夕	139
第二章 从圣兵到忠王	141
一 参加革命	141
二 天京事变前后	142
三 浦口三河两大战役	143
四 “万古忠义”	145
第三章 克复苏浙与上游用兵	147
一 克复苏常	147
二 建设苏福省	148
三 上游用兵	150
四 克复浙江	153
第四章 进攻外国侵略者	154
一 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干涉	154
二 第一次进攻上海	155
三 第二次进攻上海	156

第五章 艰苦支持	159
一 奉诏回救	159
二 “进北攻南”	160
三 苏浙失陷与天王断然拒绝从天京作战略的撤退	161
第六章 忠贞殉国	164
一 护主被俘	164
二 从容就义	166
第七章 爱护人民，为人民歌颂的英雄	169

第一章

家庭与时代

一 雇农的儿子

广西省梧州府藤县宁风乡五十七都长恭里新旺村，周围是一片高山峻岭。在十九世纪时，附近住的多是贫苦农民。他们大都靠着做雇工、种山、烧炭来维持生活。这儿，就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家乡。

李秀成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出生在一个雇农家庭。父亲李世高，母亲陆氏，生他和弟弟李明成。他们自己没有田地，也租不到半点田地，只得给地主、富农做短工和去垦山种植。虽然长年牛马一般的苦作，却还是饥寒交迫。李秀成便是在这样穷苦的家庭里生长的。

像李秀成这样的一个雇农儿子，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只因为他的舅父是个村塾教师，在八岁那年，把他带去读了两年书。但家中却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读到十岁，家中太苦了，要把他叫回来帮助父母寻食，不让他读下去。后来还是舅父觉得孩子聪明，这样太可惜了，村塾的老师大都是相熟的朋友，就靠自己的面子把他保荐到各间村塾去做帮工，使他得些工钱回来补助父母，自己又得在村塾一边帮工，一边自学。那时候，村塾里面的学童都是地主、富农的儿子。李秀成在那里做帮工，就必须伺候他们。大家都是儿童，人家是人上人，自己却是人下人，生活给他们划了一条阶级的鸿沟，也给他深深地刻下了阶级的仇恨。而他为保持得住这份工作，还要低三下四去取得他们的欢喜。在李秀成一生里面，有一个突出的性格，人们称他为“外柔内刚”^①。什么叫做

^① 这是忠殿左同检熊万荃对华翼纶说的，见华翼纶《锡金团练始末记》。案忠殿左同检是忠王府高级官员。考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李秀成《致^伦天燕^碧韩^绣峰书》，（转下页注）

“外柔内刚”？柔是委婉从顺，刚是坚强果断。“外柔”是外形，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内刚”才是本质，既是百炼钢那般刚强，又是绕指柔似的韧性，这样表里结合起来就成为“外柔内刚”的性格。古诗说：“绕指柔，纯金坚”，正是给这种性格很好的说明。李秀成这种性格，就是在他的童年时，在各村塾做帮工的痛苦生活里年复一年，把他磨炼成的。

在李秀成的时代，书塾读的是《四书》、《五经》。除书塾读的经书外，常有福建人、湖南人肩负书籍到书塾门前来向学童兜售。那些书，有闾墨，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类的诗文书，有各种各样的应用书，而以古典小说最博学童的欢迎。李秀成在村塾里，学得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所以他后来写得一手“明顺”的本章。而《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这两部演义小说对他的影响尤为深重。《东周列国志》他读得很熟，他在《自述》里用的“不忿”、“铁桶”等词，都是《东周列国志》习用的词汇。在《东周列国志》里面，记有勾践沼吴的故事。《东周列国志》也给他“宜刚宜柔，相机而动”^①的教导。他经常引《三国演义》人物来教人论事^②，说明这部书对他的影响的深重。《三国演义》教导他：“势弱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③教导他“兵者，诡道也”^④。教导他“柔能克刚，英雄莫敌”^⑤。《三国演义》上那个最动人的足智多谋、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诸葛亮形象，无疑地对他更具有深重的影响。“兵不厌诈”，“可刚可柔，别有斟酌”的对敌战略战术，正是通过诸葛亮的口着重地来教导了他^⑥。李秀成

（接上页注①）知李秀成派熊万荃前往联络捻军，可见他又是一个久随李秀成的高级侍从人员，所以才派他去做这种机要的任务。熊万荃是从经常观察李秀成的行为而得到对他的性格的认识的。他这种“外柔内刚”的看法是确实的，与我们根据历史事实对李秀成的分析正一致。

① 见《东周列国志》第六十九回。

② 李秀成常引《三国演义》人物教人论事，如他谕告百姓同心去救援天京的文告中，论豪杰自有遇合之时的一段话里，就引孔明为证（据沈梓《避寇日记》清同治元年六月初五日记）。如他谕清朝官员赵景贤投降，以汉寿亭侯关羽归汉为喻（据《赵忠节公遗墨·在苏州复李秀成书》）。又如他杀了奸宄李文炳，论李文炳是“今之孟达”（据沧浪钓徒《劫馀灰录》）。

③ 见《三国演义》第三十回。

④ 见《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

⑤ 见《三国演义》第六十回。

⑥ “兵不厌诈”，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诸葛亮说的话。“可刚可柔，别有斟酌”，见《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诸葛亮说的话。

用兵，专以智取，正是从《三国演义》的教导而来。他从童年形成的“外柔内刚”的性格，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发挥作用，也是跟《三国演义》的影响分不开的。

李秀成在村塾做了好几年帮工，他已经长成少年了。他在村塾每年所得的工资太少，对家庭的帮助有限，他终于回到家来，同父母一道觅食谋生。春天来了，上荒山去种兰，到了秋冬，又上山去砍树、烧炭。他“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更）难”，受尽了“孤寒无食”的折磨。他没有向苦难低头，而是挺起胸膛，向生活搏斗。他度过了多灾多难的黑暗岁月，到了二十六七岁，终于迎来了光明。

二 金田起义的前夕

在李秀成的青年时代，时为鸦片战争后的十年，正是金田起义的前夜期。当时全国各地，到处孕育着革命的种子。英国的鸦片腐蚀了清朝的统治，英国的大炮，也惊醒了中国广大人民。中国社会正在起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不论南方及北方，城市与乡村，全部都动荡起来。起义的农民，已经在南中国的广西，清朝统治力薄弱的地区首先点起革命的火把，烽火烧遍了全广西。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和同乡冯云山，从广东花县进入广西宣传，组织拜上帝会，以桂平县的紫荆山为根据地，秘密发动革命，并向四周发展革命势力。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处劝人参加拜上帝会，说入会的人可以无灾无难，有衣有食。这样的宣传，正符合了当时贫苦农民的要求；因此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广西的桂平、贵县、武宣、平南、象州、藤县、陆川、博白以至广东的信宜这几个州县的许多贫苦农民，都信从了。每村每处都知道有“洪先生”。李秀成全家也都加入了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把当时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土地平分等反封建的朴素的平等思想和基督教的上帝联结起来，塑造了一个“革命的上帝”。拜上帝会认为天下不论何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上帝面前，皇帝和人民是平等的。它用天上的上帝打击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地上的皇帝；它又利用基

督教的上帝，打击了地主阶级用来压制农民的一切封建迷信和权威——从孔子到阎罗王。把农民从旧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把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封建势力看成为“阎罗妖”；把农民自己反抗封建统治的力量集中表现为“皇上帝”。用“皇上帝”对抗“阎罗妖”的宗教斗争形式，号召农民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认为必须杀逐那些清朝贵族、官吏、地主、高利贷者，建立自己的政权，然后才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李秀成也开始受到了这些教育。

那时候，广西在天地会领导下的农民到处起义，地主阶级纷纷组织团练来对抗。团练是地主豪绅的武力，和以贫苦农民做主体的拜上帝会彼此处于对立的地位。团练和团练结成一伙，拜上帝会的人和拜上帝会的人站在一起，壁垒分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新旺村中的情况也是一样。李秀成的同族兄弟多人，都是贫苦农民。他们都参加了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的团练作斗争。在这班人当中，有一个叫李世贤，便是后来太平天国在浙江方面克复宁波、打击外国侵略者的主帅；又有一个叫陈玉成，便是后来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住在李秀成家的邻近，比李秀成小了十多岁。他们一齐参加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在斗争中，李秀成和陈玉成结成了深厚的友爱。后来两人就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两大柱石。

第二章

从圣兵到忠王

一 参加革命

李秀成加入拜上帝会后一年，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这年二月，太平天国在广西武宣县东乡建立，是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年清咸丰元年，1851年）。这年八月，太平军在桂平突破清军围困，经平南、藤县向永安州进军，路经李秀成家乡，沿途召集拜上帝会人马。李秀成全家和全村的贫雇农就放火把破烂的茅舍烧光，投入起义队伍。他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当了一名圣兵。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太平军出湖南，攻武昌，下江南，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清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十四日，不过九个月，就攻克了龙盘虎踞的南京，在此建都，号称天京。东王杨秀清有一首赞扬从广西起义的弟妹《果然忠勇》的诗道：

我们弟妹果然忠，
胜比常山赵子龙。
起义破关千百万，
直到天京最英雄。

李秀成便是其中一个从广西起义直到天京无坚不摧的忠勇战士。那时候，李秀成已被选拔到春官丞相胡以晄衙工作。东王下令，要在各衙里，各举出军帅一员带领新兵。东王已经知道了李秀成，就亲自保举他为右后四军帅，把

守天京太平门外新营。八月，升后四监军，把守仪凤门外的高桥，保卫天京。

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进行北伐及西征。西征军恢复了安庆、九江，挺进到汉阳、汉口。长江中游大片土地都归太平天国的版图。

这年十月，翼王石达开出安庆安民，调李秀成去巡查民务，兼带军队。他为人秉直忠诚，在军中修营筑寨，勤操苦练，对任何艰难险阻的任务，都勇往担当，竭尽心力，争取胜利完成。因此，各级上司都很赏识他。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胡以晄攻克安徽庐州郡后，调他前往，升二十指挥。旋派他镇守和州、太平郡一带，升殿右二十二检点。圣兵出身的李秀成已经提升为一员大將了。

二 天京事变前后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清咸丰六年，1856年）春，李秀成已升地官副丞相，在统帅燕王秦日纲领导下，二月，解镇江围之役，渡江破清朝江北大营之役，四月，大败清朝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军之役，五月，攻破扎在天京城外孝陵卫清朝钦差大臣向荣江南大营之役，他都建立了功勋。

这时候，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着着胜利；在武昌打死了率领湘军的凶狠头目罗泽南；在江西把反革命巨魁曾国藩困在南昌；在天京把江南大营打退到丹阳，迫得向荣自缢而亡。可是，正当胜利获得飞跃发展的时候，太平天国内部却发生了天京事变。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从盛转衰的分水岭。天京事变既起，敌人乘机从各个战场反攻。庐州三河要塞告急。时李秀成驻军江苏句容丁角村，奉命率本部人马去救。军队赶到无为州，三河已败退，随失庐江。清军大小营寨一百多座，自庐州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进逼桐城，图夺安庆。李秀成入守桐城，孤城一座，城外只有营盘三个，将士不到三千，敌人每天出兵万馀来攻，他力战力敌，守住桐城，以保安庆。

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清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冬官丞相陈玉成率军从宁国郡来救，李秀成赶到枞阳与陈玉成商定出奇兵制敌的计策后，仍回桐城。陈玉成从枞阳一鼓而下，先攻破无为州，从仓头、黄雒河、东关一路

扫荡，取巢县、破庐江、上界河，攻大关，包过桐城后，截断清军粮道。李秀成见陈玉成救兵从清军后路包抄过来，立即领军从城内杀出，两面夹攻，大破清军。先是捻党张洛行、龚德树等起义，驻军淮河上游三河镇，李秀成邀约他们来归。既大败清军，于是分三路追赶，取舒城，得六安，即上三河招张洛行。张洛行已先发龚德树，苏天福半路相迎。当即攻破霍邱县，交给张洛行做根据地。太平天国克复了舒城、六安、霍邱之后，安庆才得保固。李秀成以功升地官正丞相，封合天侯。

这年四月，石达开离天京带大军出走，人心离散。朝中议举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李世贤出来处理国事。天王任命李秀成为副掌率，与又正掌率陈玉成同提兵符之令，把他选拔到国家领导岗位，担任统帅的任务。此后太平天国的重担就落在陈玉成、李秀成两人肩上。他俩好似两根柱石一样地支持着太平天国。到陈玉成死后，就由李秀成独立担当了。

自从天京事变后，天王不信外姓，专信同姓，由他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掌握政权。这两人，横暴蠢法，祸国殃民，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李秀成感到自己为兵出身，而今任大责重，就约陈玉成同去安庆会议怎样制止朝中乱政。他在会议后，就上了一封本章，请天王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罢黜洪仁发、洪仁达，重用石达开。天王大怒，革了他的爵位。李秀成再上一本，陈述当前大势，说明奏谏的缘由。奏本经过朝臣手，都认为李秀成的意见正确，一齐上殿奏谏，天王才复了李秀成原职。

三 浦口三河两大战役

太平天国经过天京事变，再经过石达开带大军出走，造成严重的局面之后，曾国藩估计在丁巳七年冬天，清朝江南大营就可能攻破天京。到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清咸丰八年，1858年）六、七月间，太平天国的形势更加穷蹙，曾国藩满以为天京就可以攻下。可是，由于人民支持了太平天国，在天才的军事家李秀成和陈玉成的领导下，取得了两次有决定性的大胜利，竟打破了反革命的如意算盘，扭转了太平天国的危局。

这两大战役，就是浦口之役与三河之役。

浦口之役在戊午八年八月。先是天京事变后，清军再建江南大营。丁巳七年六月陷江苏句容，十一月陷镇江，十二月，清钦差大臣和春率领江南大营之兵再来犯天京。和春建立中军大营在沧波、高桥两门间，宽掘长濠，坚筑高垒，北自观音门而东，越锺山西岭，迤逦而南，跨上方桥，循雨花台南，复西折面达于长江，共长一百三四十里，称为长城，又称为万里濠，连营一百三十馀座，四面围困天京。

戊午八年二月，天京东北门已经被包围，南门也将要被包围。李秀成奏请出京调兵解救，天王要他主持守天京，不准。过了几天，他见事急，到朝门鸣钟击鼓，要求天王重议。天王登殿，他力陈当前形势，天王感悟，准如所请。

第二天，李秀成从南门一日一夜赶到芜湖。这时清军势大，四面都是敌人。他担当重任，还是第一次，但毫不畏惧。他见了带他的部队屯在宣城县黄池、湾沚的堂弟李世贤，筹谋救天京的计策，决定使李世贤力抗南岸一方，牵制江南清军，他向江北进军，企图恢复天京及北岸的交通，使江北物资源源接济，天京得到固守的物质基础，以争取时间调集救兵。三月初，他率精兵五千名过江，刚到含山，清军已攻陷和州。他急忙去救，先破昭关，顺流而下，击溃清军二十多营，克复和州。于是乘胜取全椒、滁州、来安，以分清朝江北大营的兵势。敌人增兵到来，连战不利，四月中，退守全椒。

这时候，天京被围更急，李秀成要先打通京、浦交通，以安京内人心。他带兵由全椒下江苏江浦县大刘村（即大刘庄），打算取道桥林，进军江浦、浦口。清朝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从浦口带马步军万多人到大刘村迎战。四月廿八日（夏历四月廿五日），两军交兵，李秀成因兵少战败，退守汤泉。

李秀成带了几个随从回到全椒。他行文各镇守将，于六月中旬到安庆东重镇枞阳开军事会议。这时陈玉成从湖北麻城、罗田败归，也前来会议。各将领誓同一心，议决陈玉成军队由潜山过舒城，攻取庐州郡后，由界牌而下滁州，李秀成军队从全椒到滁州，两路会合，进攻浦口清朝江北大营，以救天京。

这时，天王设五军主将，封李秀成为后军主将，进爵合天义。八月十七日（夏历八月十九日），李秀成与陈玉成在乌衣会师，与清钦差大臣德兴阿大战，把他打败，乘胜而追。第二天，到小店，击败江南大营救兵，直下浦

口，陈玉成攻清军之前，李秀成攻清军之后，前后夹击，清军大乱，斩清军一万多人，攻破清朝江北大营。京、浦交通既恢复，江北物资便源源运来，解除了敌人对天京最大的威胁，天京人心才安定了。

太平军打垮清朝江北大营之后，接着就发生了三河战役。敌人来犯三河的军队，是曾国藩湘军里面一支最主要、最凶狠、由李续宾统带的陆军。这支反革命军队，最初由罗泽南统带；罗泽南被打死后，就由李续宾接统。李续宾乘着天京事变的机会，攻陷武昌，又攻陷九江。在攻陷九江后，第二个目标就是庐州。于是他进犯安徽，不到一个月，太湖、潜山、桐城、舒城都给他攻下，一直打到离庐州九十里的三河镇。天王急命陈玉成先行带兵去救，又命李秀成带兵随后赶来接应。十月初七日（夏历十月初十日），李秀成与陈玉成会师，在三河镇歼灭李续宾全军，一路扫荡，结果舒城、桐城都收复了；进犯安庆的敌军也闻风退走。据曾国藩自供说，当时湖南湘乡，几乎是“处处招魂”^①。又说：“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②，“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③。由此可见，这一役给曾国藩湘军的打击，是如何的重大。

太平天国由于这两大战役大捷后，就粉碎敌人攻取天京的企图，扭转天京事变后濒于危亡的局面，稳定了太平天国后半期的战局。

四 “万古忠义”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清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江浦守将薛之元叛变，两浦复陷。李秀成驻军黄山，闻变赶回，入镇浦口，保住天京北岸的门户。

当时天朝以陈玉成、李秀成两人功劳最大。天王鉴于东、北王往事，不愿封异姓为王。这年三月，他的族弟洪仁玕来天京，不到一个月，封为干王。他怕陈玉成不服，又封陈玉成为英王，而没有封到李秀成。

李秀成有个部将，叫李昭寿，叛降了清朝。清朝给他的官职正是“钦差帮办安徽军务办理招安事宜江南提督”。他知道天王没有封李秀成，便趁机

① 据《曾文正公书札》卷八《复左季高》。

② 据《曾文正公书札》卷七《致唐镜海》。

③ 据《曾文正公书札·复刘霞仙》。

写信给李秀成，劝李秀成反。正逢天王派侍卫到李秀成这里来勘营，见到这封信，便回京报告。天王和一般人都认为李秀成与李昭寿旧好，封王不到他，家属又都在浦口，定会叛变。尽封中关船只，断绝李秀成官兵来往。可是李秀成毫不动摇。

过了十多天，天王感悟到李秀成是忠贞不贰的，便用黄缎亲写“万古忠义”四字赐给李秀成，封为忠王。

李秀成接到封王诏书和印绶后，悬印一个多月，不肯接受。他上本章说他无才无能，不应受此藩封。他的一些功劳，都出自将士的力，特别捻军慕义来归，更应首先受封。他恳请天王先加封捻军将领韩碧峰、韩绣峰、孙葵心、刘天保等爵位，而后他方敢受封。天王得本章，嘉李秀成谦让推美，立如所请，加封了韩碧峰等爵位。韩碧峰等也连衔上书殷殷敦劝李秀成开用王印，他才肯受封。

“万古忠义”这四个字，对李秀成说来，实是当之而无愧的。他一生献身革命，不但不因个人的得失而有所考虑，他也不因天王的猜疑而稍有所转移，他同样也不因屡遭洪氏诸王的压迫而稍有所动摇。他对待任何逆境的到来，都善于应付，泰然处之，忍辱负重，到死方休，丝毫没有改变他的革命立场。

第三章

克复苏浙与上游用兵

一 克复苏常

就在李秀成受封为忠王的时候，敌人企图再来截断天京与江北的交通，因此又准备进攻浦口。李秀成看见清朝江南大营密密加营，深壕更深，把天京围困得更紧，京内贮粮不多，而力扼天京北岸门户的浦口，眼看又要守不住。他见形势严重，回京面奏天王，请准他离开浦口，调兵来救天京。天王初时也不答应，经李秀成再三陈明利害，天王始允准。他赶回浦口，把防务交清，即前往芜湖。他离开浦口刚三四天，十二月廿一日（夏历正月初八日）浦口江边的营盘都失掉了，跟着九洑洲要塞也失守了，天京与北岸的交通线完全被截断了，天京被围困得水泄不通。

李秀成在芜湖召开军事会议，他指出：敌人这次兵力更多，围城工事更坚固，要想在天京城外跟敌人硬斗，把它打退，那是十分困难的。敌人的军饷出在杭州、苏州、广德、江西、福建等处，如果出奇兵从小路袭破杭州，撼动了苏、浙，敌人必分兵去救；等到敌人兵分力单，然后回军急击，攻破江南大营，来救天京。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初二日（夏历正月十九日）李秀成带七千人，从芜湖出发，经宁国、广德、四安、庙西、武康，取道小路捷径，日夜赶下杭州。二月初九日（夏历二月二十七日），李秀成亲领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锋攻破杭州。清钦差大臣和春得警报，立即命骁将张玉良带江南大营精兵兼程去救，十三日（夏历三月初三日）赶到杭州武林门。李秀成见敌人中计，第二天午时，将新造旗帜遍插城头，以作疑兵，他却赶到安徽建

平，会合各路军队，急攻江南大营。三月二十七日（夏历闰三月十六日），遂把江南大营扫荡一空，天京围解。李秀成这一役用的是中国古代战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略，也是太平天国的一个传统的战略。但他比前人运用得更精妙，所得战果更辉煌，连曾国藩也不得不叹为太平天国“得意之笔”^①。

李秀成打退了包围天京的清军之后，天王又命他乘胜去取常州和苏州。这时候，清朝钦差大臣和春、帮办江南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樑已经带领江南大营的败兵退到丹阳。李秀成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四月初九日（夏历闰三月二十九日），带了大军追到丹阳。和春不敢迎战，仓皇向常州逃走，后来又逃到苏州浒墅关自缢而亡。太平军就在丹阳城外展开歼灭战，把凶狠的张国樑追赶得落河淹死，把威胁天京的清朝江南大营全部打垮，接着就向常州挺进。清两江总督何桂清闻风逃走。十六日（夏历四月初六日）太平军克复常州；二十日（夏历四月初十日）克复无锡。

这时候，清朝溃兵从常州一路败退下来，到处抢劫人民。踞守苏州的清朝江苏巡抚徐有壬要防守苏州，下令放火焚烧城外房屋。清军就在苏州最繁华的阊门、胥门外放起火来，火光直冲青天，百里以外都可以看见。这场大火，一连烧了三天三夜。于是锦绣的苏州，便被清军抢光、烧光。

苏州人民怒吼起来了！他们高喊“同心杀尽张、和贼”的口号。他们渴望太平天国的军队前来解救，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李秀成克复无锡后，就率领大军继续前进，一路旗帜鲜明，步武整肃，浩浩荡荡地向苏州进军。

苏州人民望见太平天国的旗帜了！城外阊门、街房等村的人民，纷纷跑出来欢迎。守城的清军献城投降。李秀成即引军入城，收复了苏州。

有一部分清军向杭州溃退，李秀成派兵跟追。五月初五日（夏历四月二十五日），克复了浙江嘉兴。

二 建设苏福省

当太平军要向常州、苏州进军的时候，苏州地主分子多方欺骗农民。李

^① 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七，清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致沅、季两弟》。

秀成克复苏州后，当即安民。农民受了地主的欺骗，不但不从，还每日每夜掳到城边来。部将请求出兵杀尽，李秀成严令不准。他出示招抚，仍不从，连乱了十多天。李秀成见克城未得安民，就亲自下乡劝谕。他带了少数随从，到了乡下。乡民手执武器，从四面八方奔来，将李秀成围住，刀矛直指着他，随从人人失色。李秀成十分镇静，他命令随从不许动手，很和蔼地把他们因为克复苏州未得安民，心里十分痛苦，所以拼着一条命前来安抚的心事说了一番。他的话洋溢着一片热爱人民的热情，把周围拔刀挺矛的农民都感动了。接着，他就将太平天国革命救民的宗旨详细地说明。农民更加悦服了，尽都放下武器。在三天之中，就将元和各乡先行安抚了；七天之中，又安抚了吴县和长洲，于是从近到远，县县都从。李秀成就在苏南建立一个新省，叫苏福省，以苏州为省会，作为陪都。六月初九日，幼主下诏嘉奖李秀成说：“爷生秀叔扶朕躬，开疆裕国建奇功。叔善感化洋人顺，又善筹谋库帑充。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叔筹交库首顾国，功尚（上）加功忠更忠。”

苏南地区田赋极重，再加苛捐杂税，民不聊生。李秀成将人民苦况奏陈。天王下诏减轻了田赋。李秀成在苏南执行太平天国“着佃征粮”政策，顺应农民的要求。后来又发给“田凭”，农民“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①。保护农民取得了所耕种的土地所有权。于是苏南一带呻吟在封建社会重压下的农民，就得到了初步翻身的机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当时苏南农村，“稻堆蔽场，无路可走”，到处呈现一片“丰年景象”^②。农业生产发展了，也给都市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李秀成又在苏南发展工商业，建设了美好繁荣的都市。他克复苏州后，首先是对阊门、胥门外被清军烧光抢光的人民进行救济，使他们恢复生产。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他尽心替人民打算，凡没有本钱的，可以具呈请领本钱，或申明做哪一种行业，认领哪一种货物，估定货价，售卖后，缴还本钱七成，留三成，使他们永远可以有本钱周转。这七成本钱，太平天国政府也没有追问，而是人民到了生活丰裕的时候，自己乐意归还的。在太平天国政府大力救济扶助之下，商铺陡增，山塘成集，这样就建设了新苏南。

① 据吴江倦圃野老《庚癸纪略》清同治元年三月纪事。

② 据常熟龚又村《自怡日记》清同治元年九月廿二日记。

李秀成又提倡城乡物资交流。船只往来，交易日盛；农民过午，满载而归。同时，他又减轻各卡关税，使商品的流通，更加畅行。所以当日的苏南，百货云屯，人口雨集。到上海去的船只，帆樯林立，往来不绝。工商业的发达，远远超过清朝反动统治时期。而以苏州的城乡、宜兴的大浦镇、无锡的荡口镇，最为繁盛。当时苏福省美好繁荣的生活，说明了李秀成建设苏福省施行的政策的正确。

三 上游用兵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地在长江下游。要保卫天京，必须固守上游武昌、九江、安庆三大据点。自天京事变后，武昌先失，九江又陷，天京最后的一道屏蔽，只有安庆了。

安庆是非常重要的。太平天国如果守得住这里，一方面，在军事上可以阻挡敌人东下进攻天京；另一方面，因为天京的粮食来源是：取江南数郡的粮运出金柱关，取江北数郡的粮运出裕溪口，一齐从长江运入天京。守得住安庆，就可以保卫金柱关和裕溪口的粮运，使太平天国仍擅长江的便利，掘不竭的来源，得到巩固的物质基础。所以安庆实在是天京的生命线。

安庆对太平天国军事上与经济上的重要性，敌人当然是很清楚的。所以敌人在戊午八年攻陷九江之后，就以安庆和庐州作为进攻的目标，两路进犯。经太平军在三河歼灭李续宾后，来犯安庆的敌军也连忙撤走。这样，安庆的军事局面就稳定了一年多。但到了太平天国调动上游的兵力击溃江南大营，进攻苏、常的时候，曾国藩湘军就趁机再来进犯安庆。因此，太平天国收复苏南后，最重要的军事决策，就是保卫安庆，力争上游。

这时候，反革命方面的阵容起了变化。原来清朝皇帝与曾国藩之间是有矛盾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创立湘军，清朝皇帝不愿把大权交给他；到江南大营覆败后，清朝皇帝眼看自己的武力垮台了，才不得不任命他做两江总督。于是这个反革命巨魁就得到筹饷、练兵的大权。不久，又命他兼节制浙江。于是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四省的大权都归他掌握。从此他就更凶狠地向太平天国进攻。

庚申十年冬天，太平天国决定分南北两路军进攻武、汉，解救安庆。北

路军由英王陈玉成统率，从长江北岸经安徽入湖北；南路军由李秀成统率，从长江南岸进江西入湖北。两路会师，合取武昌、汉阳。

陈玉成统率的北路军，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底，经安徽霍山进湖北，击溃皖、鄂交界的敌人，在十一天里面，就攻克安徽霍山、英山，挺进湖北，攻克蕲水、黄州。当时清朝军队的主力在安庆及太湖一带。武昌省城防御空虚，前线回救不及。闻太平军到了黄州，城内就发生混乱，全城逃走一空。陈玉成军队只要向武、汉挺进，就可以唾手而得。恰恰在这个时候，英国海军提督何伯（J. Hope）、参赞巴夏礼（S. Parkes），带了舰队到汉口。英国侵略者要拯救清朝统治者，巴夏礼特上黄州见陈玉成，说太平天国进攻武、汉，对英国商业必有损失，不免发生冲突，劝陈玉成要考虑。陈玉成对英国侵略者的干涉，不得不有所顾虑。他只得暂时停止向武汉进攻，改向西北麻城、德安一带进军。到了三月，又把精兵调回下游去救安庆。因而北路军就失去取武、汉的机会。后来安庆也守不住，终于给敌人攻陷了。

李秀成统率的南路军，在庚申十年十月从安徽太平出发，向江西、湖北进军。在李秀成未离苏州以前，江西的德安、义宁、武宁，湖北的随州、大冶、兴国、蕲水、蕲州、武昌、江夏、金牛、保安、蒲圻、嘉鱼、通山、通城等地的起义人民代表，亲自到苏州来，向他投递请求加入太平天国的请愿书。李秀成接受了这个请求。因此，他这一次进军江西、湖北，除了为要完成太平天国分两路会攻武、汉的军事计划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应起义人民。

李秀成大军从繁昌前进，上石埭。十月二十二日（夏历十月十九日），破羊栈岭，进向黟县，距离祁门曾国藩老营仅六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敌人兵力单薄，全局大震。曾国藩慌忙写了遗嘱。但李秀成却没有侦察到敌情，又因为进攻的目的不在这里，所以没有向祁门进攻，而改从箬岭出徽州，过屯溪，到浙江常山过年，就把曾国藩从绝处放生了。

辛酉十一年正月初，李秀成向江西玉山、广信进军，攻克临江、瑞州、武宁、义宁州、靖安等地。四月底，挺进湖北，连克通城、通山、兴国州、大冶、咸宁、武昌县等地。五月底，李秀成因连续接到侍王李世贤在乐平打败，英王陈玉成、章王林绍璋在安庆集贤关打败，右军主将刘官芳在黟县打

败的消息，当时他自身也处在困难的境地，敌军鲍超部从瑞州追来，他又见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派兵阻他前进，安义、奉新、新昌一带地主武装又抢夺他从瑞州上下解运的军饷，他在湖北把起义群众招齐之后，就向江西退兵。他在江西又把起义群众招齐，总共招得起义群众三十多万，于是分由义宁、武宁集中瑞州。

关于这一次大战役，后来干王洪仁玕在自述里说，他在天京解围后，决定“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后来“英王如议进取蕲、黄，忠王由吉安府绕取兴国州等县。殊忠王惮于水势稍涨，即撤兵下取浙江。英王因忠王既撤，亦急于解救安省，遂失前议大局之计”。洪仁玕把进取湖北、解救安庆计划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归李秀成身上是与事实不符的。案陈玉成停止进攻武昌，改向麻城、德安进军，系受英国侵略者的阻止，时在二月，他回军救安庆，则在三月，那时李秀成还在赣江作战。当李秀成向湖北挺进连克通城、通山等州县的时候，陈玉成已经在安庆外围连打败仗，陈玉成退兵在先，李秀成退兵则在其后四个月，所以陈玉成北路军停止进攻武、汉，完全与李秀成南路军的行动无关。

但是，李秀成也有他应负的责任。他后来被俘，曾国藩的机要秘书赵烈文去看他，曾经提起这次战役问他。赵烈文在他的《能静居士日记》中载有当时的谈话说：“余又问：‘十一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曰：‘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余曰：‘图杭州曷不在赴江西之前，而徒行数千里，无功始改计耶？且尔弟侍王在徽取浙甚便，而烦汝耶？’曰：‘余算诚不密，先欲救皖，后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抑亦天意耳。’”由此可见，当时李秀成如果再向武昌省城挺进，武昌便要动摇，围困安庆的敌军也要撤退。但李秀成却在这一个决定双方胜负的关头，遽然退兵，虽然有他的客观因素，但使他采取这种行动，却主要是因为重视苏、浙的战略思想的缘故。由于他有了重视苏、浙的战略思想，所以使他对于力争长江上游的战略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此，到了进军上游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愿冒险挺进，而采取稳重的一条路子转而东向，攻取浙江，便把攻取武、汉，解救安庆的大战略放弃了。这是李秀成一件大错误。

四 克复浙江

辛酉十一年八月，李秀成退兵回到江西河口，遇到翼王石达开部将童容海、吉庆元等从广西带领部队归来，又得了二十多万人。于是他就率领大军，从江西入浙江。

这时侍王李世贤的军队已先攻入浙江。李秀成大军进入浙江后，又交了一部分军队给李世贤指挥。九月，克复严州后，李秀成自领新兵及童容海全军攻杭州，派李世贤打温州、台州、处州、宁波等处。浙江人民纷起响应。李世贤从金华出发，连克温州、处州、台州，又分军去收复宁波、海门厅、镇海县等处。李秀成大军由富阳破馀杭，到姑塘屯扎，把杭州围住。他又派兵去收复萧山、绍兴、石门、海宁等州县，把浙江省的外府、州、县收复，孤立了杭州。十一月十九日（夏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攻克杭州外城；二十一日（夏历十二月初一日），攻克内城。

那时候，杭州人民久已绝粮。李秀成赶紧从嘉兴运米万石来杭州赈济，又运钱二十万千借给杭州贫民做本钱，从事生产。在短短两个月内，将杭州经济逐渐恢复。太平天国遂奄有苏、浙。

太平天国在向苏南进军时，采取招降政策，于是溃兵败将，地主土豪、恶霸匪帮都钻入了太平天国阵营，苏南成为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地区。而上海近在咫尺，江苏、浙江两省官僚地主都麋集在那里，与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进行颠覆活动，图夺苏州。所以这一地区，潜伏着祸乱，随时都会爆发。这时候，李秀成方克杭州，守苏州的陈坤书又擅自率所部离开苏州。奸宄分子熊万荃、李文炳、徐少蘧等密谋于十二月初八日（夏历十二月十九日）在苏州作乱，旋改期初五夜（夏历十二月十六夜）。李秀成对奸宄的活动早行监视，他接到情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在奸宄们预定作乱的初五夜当天早晨，先头部队就赶到了苏州，奸宄不敢动。他回到苏州，把李文炳调往崑山，熊万荃调往海盐。后来到时机成熟，就把李文炳、徐少蘧杀掉，使一场大乱，得以消除。

第四章

进攻外国侵略者

一 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干涉

在李秀成一生的事迹中，要特别提出来说的，是他进攻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伟绩。

自十八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就利用通商等方法，将他们的势力侵入落后国家。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诸国取得了侵略中国的种种便利，如开辟商埠、协定税则等，因此也就更容易占领中国的市场。

太平天国认为“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①，叫外国人做“洋兄弟”，欢迎外国人来中国通商。当癸好三年（1853年）春，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S. G. Bonham）访问天京时，太平天国就曾经向他正式通知：准许英国人民来华经营商业，惟警告英国不准再卖鸦片，并不承认英国及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但是，外国侵略者要维护既得利益，要盘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五个口岸，做他们扩大侵略中国的基地。文翰答复太平天国的信里声明：英国既取得五口通商的权利，如太平天国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有损及英国商务的，英国唯有以兵戎从事。这就是当时英、法、美各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英、法、美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访问天京之后，知道太平天国坚决保护中国的主权，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太平天国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对

^① 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谕英使文翰》，见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卷一。

清朝政府又处于交战的阶段，还不曾找到他侵略中国的走狗，不得不采取等待一些时候的政策，伪装中立。

到太平天国建都后三年，英、法两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年，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再过两年，英、法又发动新的战争，清政府再签订《北京条约》，批准《天津条约》。于是由打击转到拉拢，最后就帮助清政府，共同向太平天国进攻。

英雄的忠王李秀成，就在这个时候，领导太平军，担负起反抗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光荣任务。

二 第一次进攻上海

庚申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天国克复苏州，李秀成决定进军上海。五月，他照会在上海的英国全权大臣，声明收复松江、上海的必要，并宣布太平天国对外国的平等互惠的通商政策，希望到苏州面商一切。英国公使普鲁斯（Bruce）置之不理。干王洪仁玕到苏州，又照会英、法、美领事，仍不理。

先是，当太平军克复常州那天，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de Bourboulon）叫嚣防守上海，抗拒太平天国向上海进军。到克复苏州那天，以清苏松太道吴煦、四明公所董事候选道杨坊（宁波人，上海巨商，开泰记商号，专贩鸦片）为首的官僚地主买办雇用美国流氓华尔（F. T. Ward）募集外国暴徒，在上海组织洋枪队，驻松江广福林训练，妄图防守上海，夺回附近各城。军需由上海官商供给。

六月，华尔洋枪队进犯青浦，太平军守将告急。李秀成从苏州带领人马去救青浦，大败洋枪队，把华尔打伤，击毙洋枪队三分之一，缴获洋枪两千多支，大炮十多尊，小洋炮百多尊，船只百多艘，顺流克复松江，直指上海。这时候，有居住上海的外国同情人士前来迎接，又有以都司余义政为首的两广兵勇内应，包取上海，开城迎接。李秀成以为上海可以唾手而下，他只带三千军队前往。

七月初九日（夏历七月初二日，阳历8月18日）李秀成照会上海各国公使，宣布大军即抵上海，对外侨加以保护，望于门首悬挂黄旗，以便辨

别。发出照会后，即进军到上海。英、法侵略者的回答是下令军队用大炮和来福枪向太平军轰击，在黄浦江上的英国兵舰也发大炮轰击。这时候，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用普鲁斯的话说：“不是要把自己牵累在对付外国的困难中。”因此，兵临上海城下，面对着外国侵略者的挑衅，仍然需要暂时极力忍耐，不愿轻易失和，始终不还一枪一炮。在徐家汇驻扎了三天，知道城内应已被镇压了，就从上海退兵。

退兵时，李秀成照会各国领事，斥责各国不守中立，再一次宣布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

三 第二次进攻上海

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旬（1861年12月下旬），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乘着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战事失败，安庆陷落的形势，跑到天京来提出平分中国，愿帮助打倒清朝的谈判，幻想用利诱、威胁的手段，在太平天国方面取得比清朝政府还多的利益。遭到太平天国拒绝，双方发生决裂。

太平军既克杭州，天王诏命李秀成向上海进军，他先传檄外国侵略者，“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这时候，外国侵略者已经胁迫清朝政府批准《天津条约》，又订《北京条约》，取得了许多权利；因此，就进一步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共同与太平天国对抗。当时，外国侵略者一方面派英国商船越过太平天国的江面，到安庆去运载曾国藩部下李鸿章的军队来上海，增厚兵力；一方面调集侵略军集中上海，由英国海军提督何伯、陆军提督士迪佛立（C. Staveley）、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A. Protet）共同指挥，与美国侵略者华尔的常胜军及清朝军队联合起来，向太平天国反攻。壬戌十二年（1862年）三月，连陷嘉定、青浦，进犯太仓。当时清军与外国侵略军自松江、泗泾、青浦、嘉定、宝山、上海连营一百多座，城城都有外国侵略军把守。李秀成从苏州亲率精兵赶来迎敌。四月初五日（夏历四月十九日），大战于太仓，力破敌阵，打死外国侵略军几百名，追击落水死的一千多名，打破清军营三十多座，缴获大炮、洋枪不计其数。李秀成派守奉贤南桥镇的部将，也把法国侵略军的海军

提督卜罗德击毙。

李秀成乘胜直追，把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率领的英法侵略军困在嘉定城内。外国侵略者从上海派兵来救，李秀成又把他们打败，击毙一千多名。四月十四日（夏历四月二十八日），士迪佛立焚城突围，逃回上海。

克复了嘉定，李秀成即下青浦，把常胜军副统领美国侵略分子法尔思德（E. Forrest）围住。华尔率部与英国侵略军合兵自松江来救。李秀成又把他们打败。四月二十八日（夏历五月十三日）侵略军放火烧了青浦城，拼命窜出，逃回松江。李秀成督军紧追，生擒法尔思德。外国侵略军胆破心惊，纷纷奔逃，落水而亡。

克复青浦之后，李秀成一路向泗泾、太仓、松江扫荡，把敌人大小营垒一百三十多座全部攻破，松江城外敌营也扫清，大军把华尔常胜军紧紧围困在松江城内。外国侵略军从上海来救，都给李秀成打败，将其火药、洋枪、洋炮全部俘获。

当中外反革命在上海联合抗拒太平天国向松、沪进军的时候，曾国藩在派李鸿章带淮军去救上海前四天，二月二十二日（夏历二月二十四日），就先派曾国荃带领湘军陆师、彭玉麟带领湘军水师自安庆出发，向天京进犯，取东西呼应的形势，进攻太平天国。敌人沿江直下，一路攻陷芜湖、巢县、无为、运漕、和州、东西梁山、太平关，于四月十八日（夏历五月初三日）直抵天京，陆军逼扎雨花台。天京震动，天王一日下三道诏书追围攻松江大军回救。李秀成不得不遵诏退兵。后来英国侵略分子威尔生（A. Wilson）在所著的《常胜军》一书中论这一役说：“如果说我们是为清军而防守上海的话，那末在此危急的时候，清军当然也要帮助我们设法把太平军中最令人可怖的将领和他的大部军队驱离上海哩。”当日中外反革命结合起来共同抗拒太平天国的情况，侵略分子这段自供是说得最明白不过的。

在反侵略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受到了太平天国军队的坚强打击。《李秀成自述》记那时候太平军的声威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李鸿章报告清朝政府说：“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贼。”^①他报告曾国藩说：“上海或可保，青浦、松江恐站不

① 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一《西兵退出嘉定折》。

住。”^①他给曾国荃的信又说：“松江危在旦夕，沪防戒严。”^②左宗棠复曾国藩信也说：“青浦、嘉定二处，发逆麇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③那时外国侵略者给李秀成打得抱头鼠窜，借匿上海，不敢应战，斗志完全丧失。松江唾手可得，上海接着就要克复。不幸大功将成，竟不得不放弃而去。自然，太平天国不曾能完成驱逐外国侵略者的大业，是极可痛惜的。但是，忠王李秀成和他部下的英勇将士们，以雷霆万钧的威力，给予外国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把外国侵略者打得一败再败，以至于屡战屡败，不敢见仗，他们表现出了中国人民无比坚强的反侵略的战斗精神，给百年来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反侵略的战争以最光辉的榜样。

① 见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

② 见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复曾沅甫》。

③ 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六，清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

第五章

艰苦支持

一 奉诏回救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 1862 年），五月初八日，李秀成奉天王命从松江撤退。十一日，在苏州召集部下大将慕王谭绍光、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才、相王陈潘武、听王陈炳文、纳王郅永宽等开军事会议。李秀成与诸将详细研究当前敌我全部情况。他指出：敌人从长江上游而来，有水师的便利，我劳彼逸，水道难争。且敌人初来，其势甚锐，不可与争锋。应该将苏省的米粮、军火多多运回天京，作长期守御的准备。等过两年，敌军久屯坚城，必缺斗志，然后一鼓把它打垮。各将领一致赞同。李秀成把这个策略上奏天王。天王大怒，下诏严责李秀成说：“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尔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仰莫仕睽专催起马，启奏朕知！”

李秀成接到天王这道严诏，不得不放弃会议的主张。六月二十五日，李秀成又在苏州召集补王莫仕睽、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堵王黄文金、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开军事会议，计划调集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等十三王军队去救天京。那时候，天王猜忌李秀成，便分封了许多王来牵制他，使李秀成指挥发生困难。因此，他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强调必须团结一致，始有胜利可望。他把会议经过印成一部《会议辑略》，亲自写了一篇序文，指示各军各将说：“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必须联万心而作一心。”他又为了要消除天王对他的猜忌，就把苏、浙两省政权全部交给各将，连母亲和家眷也从苏州送回天京，交给天王作质，表他的“愚忠”。

李秀成在回救天京前，一面安定人心，出布告安民，指斥清朝天怒人怨，反动统治必亡，革命必胜。最后恳切地说：“今值国中有难，还望协力同心，剿除妖孽，以副众望。”他临行，还在苏州开群众大会，亲作报告。同时，他对后方安定，作了必要的措施。长期以来，苏、松、嘉、湖广大太湖地区，有一种由恶霸、流氓组织的枪船，千百成群，四乡开设赌场，在湖上劫掠，为非作恶，为害人民。太平天国进军这个地区时，有一部分枪船帮助清朝统治者抗拒革命。这些匪帮，熟悉地利，湖汊小港，往来如飞，使太平军感到“妖兵不足虑，所虑者，小船水匪耳”。李秀成审查情势，定下欲擒故纵的策略，用官爵广封枪船头目，笼络着他们。他们就洋洋得意，明顺太平天国，暗通清军，预备做内应。李秀成却装聋作哑，故意放纵他们，使这些匪帮陷入圈套。现在，要回救天京了，就于五月二十八日（夏历六月十三日）一声号令，苏、松、嘉、湖各地军队，同时行动，立即消灭了多年为害人民的枪船匪帮，弭除后方的隐忧。李秀成生平对待敌人，往往采取这种外柔内刚的手段。

时曾国荃进犯天京，逼近雨花台扎营。八月中，李秀成统率军队从苏州出发，分军两路，一由秣陵关，一由板桥、善桥直向雨花台而来。九月初三日（夏历闰八月二十日），下总攻击令，大军包围战线长达五六十里，把敌人完全控制住，使之寸步难移。攻击结果，虽然使曾国藩“心已用烂，胆已惊破”^①。但敌人有水师运输子药粮食，得以持久战。而太平军却需陆运，各军从八月出发，未带寒衣，十月天气已冷，天京又无粮，猛攻了四十多天，十月十五日（夏历十月初五日），各路军不得不撤退。

二 “进北攻南”

李秀成攻清营不下，天王当殿斥责，革了他的王爵。他另采取一个战略，叫做“进北攻南”。这个战略，就是从长江北岸进攻上游敌人的后方，迫使敌人不得不调南岸的军队去救北岸，调下游的军队去救上游，其目的是要解救天京的围困，所以叫做“进北攻南”。

① 见曾国藩致李续宜信原件，此信又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九《致李希庵中丞》。

十月二十七日（夏历十月十七日），李秀成率大军昼夜赶渡，冲过江浦、浦口。十一月初七日（夏历十月二十七日），克安徽含山县，初八日（夏历十月二十八日），克安徽巢县，初十日（夏历十一月初一日），克安徽和州。时常熟情况不稳，三十一日（夏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李秀成不得不赶回苏州。过几天，叛徒骆国忠就在常熟叛变。李秀成留在苏州平乱。到癸开十三年（1863年）二月十八日（夏历二月十三日），始得赶到巢县指挥进军。

李秀成留来王陆顺德、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练业坤等军牵制清军，而自率大军打算从安徽舒城、六安、英山、霍山疾趋湖北麻城宋埠市，分兵一出黄州，一出汉口，合攻武昌省城，然后进取荆州、襄阳，与远征陕西的扶王陈德才军队联成一片。李秀成定计深远，进军至为迅速，敌人十分震慑。那时候，皖北一带，给清朝统治者破坏，人民流离失所，行军十分困难。李秀成在巢县买粮买穀种救济。三月二十九日（夏历三月二十四日），大军赶到六安州，又逢青黄不接，没有粮食可购，不得不回军，从寿州附近东归。

寿州这个地方，久给练匪苗沛霖^① 扰害，人民痛苦万分，正闹着饥荒。李秀成军队没有粮食，吃草充饥，饿死很多。馀众回到天长等处。五月初一日（夏历四月二十七日），雨花台失守，京内惊慌，天王诏命李秀成回京。这时长江发生大水，道路被水冲崩，无路行走。敌人又水陆进攻，和州、江浦都告失守。李秀成抢渡，还未过尽，浦口、下关、九袱洲也都失守，未过江的部队全部战死，已过江的部队，无处驻扎，有米无柴煮食，饿死不少，自散下苏州、浙江。

这一役，丧亡战士数万多人。留守苏、杭的军队，又给洪仁达妄行调度，乱做一场，将士都很灰心。士气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三 苏浙失陷与天王断然拒绝从天京作战略的撤退

敌人从安庆沿江东下，进攻天京，太平天国就应该用固守天京的战略，

① 苗沛霖是安徽凤台的一个秀才，组织团练，对抗革命，清朝给他的官职，保至四川川北道，督办安徽团练。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通款太平天国，据寿州，诱捉英王陈玉成。后来这个匪徒，被英王的两个亲兵杀死，为英王报了仇。

使敌人师老力疲，然后俟机一鼓打垮它。天王不听李秀成良谋，频下严诏将苏、浙大军西调回天京作战。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就乘机在东线向太平天国发动进攻。在江苏方面，先由华尔率领、华尔被击毙后，由英国军官戈登 (G. G. Gordon) 带领的常胜军帮助李鸿章淮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苏州进攻。在浙江方面，以英国海军总兵睦乐德克 (R. Dew) 组织的常安军、定胜军，法国海军参将勒伯勒东 (A. E. Le Brethon de CaLigny)，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 (Prosper Giquel) 组织的常捷军帮助左宗棠湘军向浙江进军。这样，太平天国就陷于两面作战的泥坑之中，终使苏、浙失陷。

癸开十三年春，正当李秀成率大军北征的时候，清朝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军队与戈登常胜军来犯苏福省。三月陷太仓州，四月陷昆山，六月陷吴江，接着就向苏州进犯。李秀成回到天京后，各将告急，日日飞报到来。他屡次奏请去救苏、杭，天王都不准。直到八月，才得出京去救苏州。十月，与戈登常胜军连日大战，胜负未分。李秀成亲带一军出阊门，屯扎马塘桥，取犄角势，暂保苏州。

敌人攻苏州不下，采取从内部攻破坚堡的计策，对太平军中的动摇分子，进行利诱。结果，郇永宽、汪安钧、伍贵文、周文嘉、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八个叛徒刺杀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献苏州投降清朝。

郇永宽等八个叛徒，都是李秀成的部将，自小从戎，由李秀成教练长大，一直提拔到王位。在叛变前，李秀成已经看出他们的企图，在闲谈中，曾对他们作过试探。叛徒们却假意回答说：“忠王宽心，我们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谁会有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叛徒们的回答，李秀成也知道是假的。但他却因为这几个叛徒久有战功，不忍执法诛戮，遂致苏州失陷。李秀成是难辞姑息的罪过的。后来他自己也追悔说：“我见势如斯，不严其法，久知死期近了。”这八个叛徒自己也没有得到好结果，在叛变后第三天，即遭李鸿章杀死。这就是投敌者的可耻下场。

苏州既失，无锡相继沦陷，李秀成退守丹阳。那时浙江方面，外国侵略者先已攻陷宁波，余姚、嵊县的太平军陆续撤退。后来敌人又攻陷绍兴，于是金华、龙游、严州、温州、台州等处的太平军也都陆续撤退，屯扎富阳。癸开十三年八月，富阳又给外国侵略者攻陷，太平军退守余杭，杭州也岌岌可危了。

李秀成看见这种情势，保卫天京失了依靠，断不能再守。敌人惨重地破坏了太平天国统区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政治组织和农业生产，皖北、皖南、苏南、浙江以至天京近畿，尽成荒圩焦土。太平天国在这里好似鱼儿在没有水的池塘，活不下去了。唯一救亡良策，只有立即从天京撤退，保存有生力量，万里长征，向西北进军，与远征陕西的军队会师，在西北重新建立根据地，据西北以图中原。他要回京劝天王立即采取这个战略。他的堂弟李世贤驻兵溧阳，劝他不要回天京，别作他图。他不听。李世贤要起兵前来，逼他去溧阳，阻止他回京。李秀成知道以后，连夜轻骑走回天京。十一月初八日到达，第二天，便上殿向天王奏说：“京城不能保了，曾妖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现在只有赶快撤出天京，取道江西、湖北，去陕西与陈德才军会合。那里洋鬼不能去，妖兵的水师也不能到达。然后妖朝可灭，江山可定。”

天王听了，勃然大怒，严责难当。李秀成不得已跪上再奏说：“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妖得尔雨花台，绝尔南门道路，门口不能行。得尔江东桥，绝尔西门，不能出入。得尔七瓮桥，今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濠。下关屯了重兵，粮道已绝。京内没有战兵，俱是朝官，文的多，老的多，小的多，妇女的多，无法防守。若不依臣奏，灭绝定了！”

天王听了这些话，更加抑制不住怒火，他痛责李秀成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要出外去，要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的，合朝诛之！”

李秀成见天王痛责到了这种地步，就在殿前请求天王说：“求尔将刀杀我，免我日后死在妖手。为主臣子，未闲片刻。今将国事启奏，主责如此，愿死在殿前，尽心酬尔！”天王竟断然拒断，不肯听从。最后拯救太平天国的道路，竟给天王自己亲手堵断了。

李秀成含泪出了朝门。全朝众臣都来劝慰。合城人民都流涕呼留。李秀成只得遵从天王的命令，并自愿顺从全城人民和全朝众臣的意见留在天京死守。他传令李世贤领军去江西就粮，到明年江南秋收后回兵解救天京。

第六章

忠贞殉国

一 护主被俘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清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十七日（夏历正月二十一日），天京城东要塞天保城失陷，天京被合围。四月十九日（夏历四月二十七日），天王逝世。李秀成扶幼天王洪天贵福嗣位以安定人心。

这时候，天京守军只有一万多人，能作战的只有三四千人^①，粮食又断绝。清军围攻越加紧急，从东门到北门沿城挖掘地道攻城。李秀成指挥守城军一连破了几十处。五月二十一日（夏历五月三十日），地保城失陷，敌人以猛烈的炮火作掩护，迫近了太平门城根，开掘地道攻城，太平军无法展开反地道战。

六月初六日（夏历六月十六日）午刻，龙膊子地道爆发，城垣轰陷。李秀成率领饥军奔向缺口，用火药倾盆烧死敌人无算。敌人的先锋队被消灭了，但一队接一队的登城队伍仍似狂潮般汹涌进来。李秀成在太平门和敌人展开鏖战，敌人以五万生力军攻城，众寡相差太远，抵挡不住。他走回朝门，赶来保护幼天王，把自己骑着的以强壮快速闻名的雪白战马让给幼天王骑，自己另骑一匹不得力的马。幼天王因为骑这匹快速战马得以逃出敌人的追赶，而李秀成却因为骑的不是战马，又战斗了一天，马不能行，不幸被俘了。李秀成临难让马，舍命救主，在他部下的英人呤喇（A. F. Lindley）论

^① 据《忠王答辞手卷》。曾国藩《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说：“三日之间，毙贼共十餘万人”，完全是说谎。

为“这正是忠王的勇敢、忠诚、豪爽的性格的特点”^①。

李秀成带幼天王回家，辞别母亲。在李秀成的时代，他受的是忠孝的教育，在忠孝不能双全的时候，就应该移孝作忠。李秀成是个孝子，极孝顺他的母亲，今天要尽忠保护幼天王了，不能兼顾母亲了，他和母亲要生离死别了，全家流涕分离。

李秀成抹了眼泪，跨上马，率领战士保护幼天王上清凉山暂避。到了初更^②时候，假扮清兵，他一马当先，领头冲锋，向守太平门缺口的清军突击，杀开一条血路，跟他冲出天京的有一千多人。李秀成立即分为两队，前队卫护幼天王急走，他率领后队，抗拒追兵。敌人马步追赶，李秀成冲过孝陵卫等处敌人的营寨，又营营炮发，处处喊杀不绝。李秀成血战了一天一夜，马不能行，他掉了队。到天明，身边只剩两三人，只得走上方山顶上破庙内暂避。他把捆在身上的珍珠宝物吊在树上，宽身乘凉。

方山脚下住的贫民，知天京失陷，必有人在山上躲避。他们想发财，便上山来搜寻。李秀成正在山顶乘凉，忽见一群人走上山来，他心惊慌，忘记把珍宝拾起就跑。众人一边追一边喊道：“你身上有钱，交给了我，我不要你命。”到了追近，见是李秀成，一齐跪下，大家流涕。李秀成见人民这样爱护他，便和众人一起转回破庙，想把珍宝取回来酬报众人。不料这群人追李秀成上山后，另外又有人来到破庙，已把珍宝拾去了。

众人为了掩护李秀成安全脱险出，大家劝他薙发。李秀成不愿。众人说：“忠王不肯薙头，沿途盘查严密，不能送你。”众人苦求。李秀成对众人说：“我为大臣，国破主亡，若不能出，有死而已。若果有命能逃出去，现在薙了发，难以对我官军。”仍不肯薙。众人又是苦求不止。李秀成只得薙去一些。众人就把李秀成密藏起来。他们访知拾得李秀成珍宝的人，要和那些人均分。拾宝的人说：“这种珍宝，天朝大头目方有。你们问我分此物，必获这头目。”两方互争，传扬到外面，李秀成就给奸人捉住，解到曾国荃军营。

曾国荃痛恨李秀成死守天京，久攻不下。他摆列刀、锥等刑具，要把李

① 见王维周译吟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五章。

② 《李秀成自述》原稿上“初更”，后改为“四更”，验其字迹不是李秀成笔迹，墨色也有差别，乃曾国藩所改。

秀成狠刺、细割处死。他叫带李秀成来，拿起了锥，疯狗一般扑上去，把李秀成遍身猛刺，血流如注^①。又喝令刽子手把李秀成一片片地细割，满身血肉淋漓。李秀成挺起胸膛，“殊不动”^②。他威风凛凛地大喝曾国荃说：“曾九！各扶其主，你生什么气？且兴灭无常，今天偶然得逞，就发疯了吗！”^③

二 从容就义

李秀成从雇农出身，久经革命锻炼。他一生对天王耿耿忠贞，尽了他的“愚忠”。尤其是反抗李世贤的“兵谏”，到天京失陷时，临难让马，弃家救主；方山落难时，不肯薙发等等行事，更是可歌可泣。李秀成视死如归，早已决心殉国的。他在苏州失陷前，就对叛徒郜永宽等说：“你们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他严厉地表示威武不能屈的革命立场。他在苏州失陷后，泣谏天王不守天京，天王不听，他就请天王当殿杀他，以免日后死在敌手。在方山人民要他薙发的时候，他就严正地表示：若不幸落入敌手，有死而已。可见在他的思想里，是老早就已经有了以死殉革命大节的准备的。到被俘受刑的当天晚上，曾国荃的幕僚去和他详谈，问他：“何不早降？”他说：“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为天王的臣子，受了他的爵位！”又问：“汝今计安出？”他说：“死耳！”也同样坚定地表示他尽忠革命的立场。

但是，李秀成对当前的革命形势，却有他的看法。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前途还很有希望，实力还很雄厚，人民还在拥护太平天国。而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清皇朝与曾国藩之间，却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今幼天王已经脱险，太平天国的几十万大军都在长江两岸，问题只在于要有一个威望素著领导得起他们的人，就可以复兴太平天国。

另一方面，李秀成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深重地受到《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记述勾践沼吴，姜维伪降等历史故事的影响，尤其是蜀国大将姜维

① 据曾国荃给李鸿章信，见《曾文襄公书札》卷八《致李中丞》。

② 据亲眼见的人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记。

③ 据李国瓌《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见《学风》第七卷第五期）并参考秉衡居士《荷香馆琐言》（见《人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在国破后诈降魏国锺会以图复蜀的故事，使他认为自己一身关系太平天国的兴亡，当刀锥交加的时候，就应该慷慨牺牲，表示革命英雄的气节；但如果还有一线可图的机会，就断断不可放弃，不当一死了之，而应该忍辱负重，以应付非常的大变，学姜维那样，那才对得起天王，对得起天朝。

在李秀成被获后五天，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天京，当天傍晚，他和李秀成谈了一次话。其后两天，李秀成开始写《自述》。他通过《自述》，并在写《自述》后八天的夜里，和曾国藩再次会谈的时候，劝曾国藩反清称帝。李秀成把曾国藩看作锺会，要用姜维的假投降计去引诱曾国藩，以图恢复太平天国。曾国藩手握湘军，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他的旗帜，“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①清皇朝极怕曾国藩推翻它。而曾国藩的党羽却要拥戴他做皇帝。当攻陷安庆时，湘军水师大将彭玉麟就以“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来试探曾国藩^②。曾国藩在湘乡建书房，工匠做的上梁文就颂祝道：“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③从前唐朝郭子仪平定安禄山，手握重兵，只因儿子郭暧对其妻升平公主说了一句：“汝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为”的夫妻口角，就把儿子锁起来，与儿子一起入朝待罪^④。而这个自称笃守程朱理学的曾国藩，家中上梁文却居然说要做皇帝，其居心可见。据曾家传下来的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口碑，说他不听李秀成劝告是“不敢”，而不是“不肯”。可知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怀有要做皇帝的野心。这些事实，都是说明了李秀成把曾国藩看做锺会确有所见的，并非幻想。只是曾国藩这个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巨魁由于考虑问题太多，有种种顾虑，所以没有中计。他和幕僚根据过去对李秀成的了解和当前的观察，得出“甚狡”的结论^⑤。他们说的“甚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曾国藩在一年前指示他的部将的信里所谓李秀成的“狡诈百端”^⑥。也

① 据曾国藩给李鸿章信的自述，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致李宫保》。

② 这是在曾国藩身边侍从的亲信巡捕官倪人垵亲见的事，见《清朝野史大观》卷八《彭玉麟有革命思想》。

③ 见曾国藩女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清同治三年纪事。

④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代宗大历二年。

⑤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清同治三年七月初二日记。

⑥ 据曾国藩清同治二年六月复杨岳斌信论李秀成的话，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八《复杨厚庵军门》。

就是与李秀成战斗多年的李鸿章历次论李秀成所说的“深佩其狡猾”^①，“狡狴异常”^②，“诡谲多谋”^③，“最多狡谋”^④。曾国藩又看穿了这条伪降计。因此，他“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⑤

李秀成还在写《自述》。曾国藩派人通知他，今天要杀害他。李秀成知道他的计谋落空了，但是，他已竭尽人谋了！他听到要杀害他的消息，并“无憾容”。到傍晚，他步赴刑场，“谭笑自若”，写了《就义歌》十句，叙述他尽忠的志节，然后在天京从容就义^⑥。时为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1864年8月7日。

李秀成生于雇农家庭，跟饥寒搏斗成长，洪秀全组织拜上帝会，发动金田起义，他全家加入队伍。经过革命大熔炉千锤百炼，从士兵一直提升到最高统帅，太平天国的军师。他一生“铁胆忠心”，英风烈迹，使人可歌可泣。不幸国破救主被掳，学姜维用假投降计，企图恢复太平天国，有亏气节教育，不足为训，青史无情，难免批判，亦可悲己夫！

① 据李鸿章复曾国荃信论李秀成的话，见《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复曾沅帅》。

② 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复曾国荃信论李秀成的话，见《朋僚函稿》卷四《复曾沅帅》。

③ 据李鸿章复曾国荃信论李秀成的话，见《朋僚函稿》卷一《复曾沅浦方伯》。

④ 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分路规取苏州折》论李秀成的话，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三。

⑤ 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清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复陈逆酋正法片》。

⑥ 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原稿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日记。中华书局排印的《能静居士日记》系南京图书馆藏清稿本，已删去“无憾容”和“谈笑自若”七字。原稿本虽写了涂去，但仍清楚地看出原字。

第七章

爱护人民，为人民歌颂的英雄

李秀成一生忠于革命，到处尽心爱护人民。因此，他也受到各地人民的无限爱戴，为人民所歌颂。这些事迹是说不尽的。在这里，只说几件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事。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年），李秀成镇守安徽和州。和州城东南太阳河牛路（即牛渚）一带码头，与长江东岸采石矶相对，是当时长江两岸的一个交通要道。千百年来，这一带船户把持码头，“贪诈存心”，“任情讹索”，为害行人，以致“手中空虚”的人，“临江而叹”。李秀成对此封建把持，感到“深恶而痛绝”，就特地在这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太阳河牛路码头上，树立一座渡船规条碑，颁布了新的码头交通条例，抓紧收费标准一环，严厉地取缔码头船户的封建把持，“以儆刁顽，以安行旅”，特别是最后一条规定：“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体现了太平天国在管理交通上的强烈的阶级性和鲜明的政策性。规条颁布后，革除了码头船户的封建把持，使交通得以畅通无阻，人人讴歌。

江南地区自南宋、元、明以来，田赋极重，即封建统治者自己也叫做“浮粮”、“浮赋”。这些浮收，地主都转嫁于佃农，故苏南佃农极苦。李秀成克复苏南，将苏南人民这种痛苦上奏天王，请减轻田赋。天王准奏。于是封建统治加于苏南佃农身上七百多年的重赋一旦解除，果然宽出无限生机，得到生产繁荣，安居乐业的好生活。苏州人民在阊门外建立一座石碑坊，横题“民不能忘”四字来歌颂太平天国，歌颂李秀成^①。太平天国失败后，清

^① 据沧浪钓徒《劫馀灰录》、潘锺瑞《苏台麋鹿记》、倦圃野老《庚癸纪略》记载。

朝江苏巡抚李鸿章拆毁了这座石牌坊，并向人民追究。当时苏州人沧浪钓徒《劫馀灰录》记其事说：“李少荃宫保问阊门外白石牌坊何以建于伪忠王耶？民以减粮对，皆军、旅、师帅捐建者。而松江一府之粮尚重于福建全省之粮。……牌坊题四字，乃‘民不能忘’。人民的回答，给封建统治者以当头一棒“民不能忘”四字，永远标志着太平天国真真正正是个农民政权，歌颂了这个坚决贯彻执行太平天国爱民政策的革命英雄李秀成。

当年苏南人民为歌颂李秀成而建立的牌坊，今天在常熟公园太平天国纪念亭内，还保存着一座《报恩牌坊碑序》。碑序上有说：

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皆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爰建綽楔，再泐碑文，军民颂德靡涯，黎庶歌功无尽。

这几句话，写出了在太平天国治理下苏南人民安居乐业、美好繁荣的生活，也铭刻下了苏南人民对这位掌握着正确的太平天国政策的革命英雄李秀成的爱戴。

苏南人民对李秀成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在五十年代，苏南还流传着许多歌咏李秀成的民歌。有一首唱道：

春天里来百花开，
忠王一到宜兴来，
我侬的嘴巴都笑开。

夏天里来流水长，
哪有忠王的情义长，
我侬看见忠王象见亲爹娘。

秋天里来稻子黄，
割下稻子打成穀，

送给忠王当军粮。

冬天里来雪茫茫，
我僦一家在炉旁，
说起忠王的恩情日夜都不忘。^①

后来李秀成带兵从苏州去救天京的时候，苏南人民又唱道：

长江里水向东流，
我僦日夜都发愁，
千愁万愁不愁别，
愁你一去不回头！^②

李秀成落难方山的时候，人民见了他，个个流涕，把他密藏起来，要送他出险。后来不幸被捕，方山人民就把逮捕他的清朝提督萧孚泗的亲兵捉来杀死，丢到水里，替他报仇。^③

李秀成一生爱护人民，有口皆碑。而人民称道他的事迹，不仅是镌在碑刻上，传在歌声里，留在记载中，1953年我去浙江绍兴，遇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泥水工人，他就举起大拇指对我说：“李忠王顶好，顶好！”他的英雄形象，还活在人民的心中。

① 这首民歌是在江苏宜兴采访得的，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歌谣》第三辑《哪有忠王恩情长》。

② 这首民歌载1951年7月29日《苏南日报》，据搜集人袁飞说，是1950年他在吴县虎邱和常熟北桥一带亲自听到一些雇农唱的。

③ 据曾国藩清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复陈逆酋正法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增补本李秀成
自述原稿注

题 记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是从《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发展而来的，《笺证》本共出了四版，从 1958 年起著者依据大批史料重新作注，改称《李秀成自述原稿注》，1982 年仍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由《李秀成自述原稿考证》和《原稿注》两部分组成。前者解决自述原稿是真迹，但有被曾国藩撕毁之处。后者为著者参考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但又有所革新，采取训诂与事实并重的体例进行注释，使这部自述原稿成为可读可用的珍贵史料。1982 年后著者继续将新发现的史料增补新注，于 1995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现以此本收入全集。附上《笺证》本各版自序或题记。

目 录

忠王像两幅	179
增补题记	181
前言	183
凡例	195
李秀成自述原稿考证	197
增补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274
一 金田起义（原稿一至七页）	274
二 参加革命（原稿七至十二页）	296
三 六解京围（原稿十二至三十页）	308
四 克复稣、浙（原稿三十至四十七页）	346
五 国势崩败（原稿四十七至六十三页）	384
六 尽忠（原稿六十三至七十四页）	415
附录 忠王答辞手卷	434



CHONG-WANG'S CROWN.

忠王冠服像



CHONG-WANG'S HEAD-DRESS.

忠王常饰像

上页两像采自 A. F. Lindley（呤喇）的 *Tai-Ping Tien-Kwoh*。案呤喇曾在忠王部下任职，其画像是从印象而来的。书中记他对忠王的印象说：“他看起来约有三十五岁，但由于精神体质各方面的烦劳，使他的外貌显得更憔悴些，更苍老些。他的体态是轻快的、活泼的、强健的，有种特别优美的姿态，虽然他的身材似够不上普通中国人的中等高度；他的举止态度尊严而高贵，他的行动迅速而庄严。他的面貌是引人注意的、富于表情的、好看的，虽然不算美，如照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它略为带些欧洲人的形象，因而使他们不很喜欢。他的鼻子较普通中国人稍直；嘴是小的，几乎近于纤巧，配着他那嘴巴的形状和轮廓分明的嘴唇，表现出绝大的勇气和决心。他的肤色是黑的；但是他的眉与眼却可以直接告诉其观察者，使知他所遇到的乃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他与众不同的，不仅是那非常高而宽广的额，而且是他的眉与眼，它们与普通中国人特有的竖立的样式不同；他的两眼近于成为一条直线；惟一像中国人的部分是眼睑；眉高高地位在眼上，几乎是成水平，稍为扬起的不是其外端，而为其内端。此一特点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没有比他更显著的；我只看到少数的湖南人有一点相近；这使人感到忠王面容不大像中国人的面貌。他一对大眼不断地闪烁着，同时，他的眼睑时时在抽动。从他非常活动的面容和他身体的无休止的过敏性的动作（身体的某一部分随时在动而无休止，不论两腿是否交叠着，他的脚总是在地上轻拍着，或则两手交握着，又松开，或则忽然起立，忽又坐下，这些动作都是突如其来地开始的）来看，没有人会想象到他用兵时竟那样十足地冷静；可是，以后我时常在作战中看见他，那时虽然他显然是在兴奋之中，他的沉着镇定却始终不乱，他的声调（时常是低沉而柔和的，句语和谐而流畅地滔滔涌出，1860年8月中曾在上海近郊因被英人弹片所伤而略受影响）除了万分危急时加快并更加坚决之外永不改变。当我与忠王初次会见时，我发现他的服装应该说是很朴素的。他并未穿起朝冠朝服，只穿一件通常的赤红色的棉上衣，头戴着普通式样的赤红头巾，加上他所特有的一种便装的头饰，计有缀在额前的一颗大的珍贵的宝石，另外八颗珍奇的圆形金质雕牌，每四颗一排分列于宝石两旁。”

增补题记

我于1980年8月撰成《李秀成自述原稿注》，1982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旋进行编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再度搜集太平天国史料。在工作当中，凡遇有与《李秀成自述》有关而为以前所未注的都钞于其上。去年7月初动手一一补注入内。

此次补注许多重要史料。如据新发现的《天兄圣旨》证实李秀成所说天王洪秀全为洪镜扬后妻李四妹所生。这是一个以前有争论的问题。如据《天兄圣旨》纠正了李秀成说天王妹嫁萧朝贵为妻，使百多年来太平天国史添了一个乌有人物洪宣娇出来的大错。如补注李秀成克复松江“垂手进城，拱手受地”的安民布告，以见太平天国克复苏、常进军上海时的军威。又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者说什么“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东南繁盛几十年不能恢复。而清朝人曾编《浙志便览》、《皖志便览》的李应珏在所著《浙中发匪纪略》里却说：“李秀成初入浙三日后，即禁止杀掠，抽田租十分之二，按丁助役。苏、杭初克，皆发粟十万赈抚，借给籽种招垦，民颇安之。及大军进剿，官兵退相杀掠，子遗遂少。迄今承平三十年，而如於潜、昌化、临安、武康、吉安、孝丰等雕残之邑尚多，率皆土著不及三分之一，童生不敷学额”等等，都是荦荦大端的。其他重要史料不一一列举。

这个增补本的出版，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郑文林同志、历史编辑室主任范明礼同志的鼎力支持，谨此致谢！

1993年9月4日罗尔纲记于北京

前言

一

中国古代少有长篇自传，革命人物写的更是未见。《李秀成自述》是五四运动新文学出现以前罕见的长篇自传，在当时，就连与他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和外国侵略分子看了，也都不得不承认为“事理井井”^①，“层次井然”^②。它叙述了革命的一生，记载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史，铭刻了太平天国败亡的惨痛教训。

曾国藩在杀害李秀成后，把他的《自述》删改刊刻，叫做《李秀成供》。世传原稿存曾家，而曾国藩不肯交给清廷，曾家后人也不肯公开示人。1944年，广西通志馆从曾家抄录《李秀成自述原稿》和拍照了一些照片回来，叫我做考证，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鉴定它的真伪。当时我从两方面去鉴定，一、从笔迹方面作鉴定，包括语汇、用词、语气等；二、从内容方面作鉴定，结果，我鉴定它是真品。

1956年，年子敏、束世澂两先生以经过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迹的专家审定《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字迹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不是同一人的笔迹为根据，作出《李秀成自述》为曾国藩伪造的论断，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发表《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一文，引起一场大讨论。我又从书学八法对字迹作进一步的研究，写了《笔迹鉴定的有

① 这是参加删改《李秀成自述》的曾国藩心腹幕僚赵烈文看了《李秀成自述》后的评论，见所著《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记。

② 这是英国侵略分子威尔生（A. Wilson）论《李秀成自述》的话，见所著《常胜军》第十六章。

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两文,编入《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一书内,于1958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把这两篇考证提要写入《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考证》内,刊于1957年11月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上,得到书法专家和史学界的同意,再次鉴定了《李秀成自述原稿》确是真品。

1963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公布了。我得到影印本来核对,更加证实我的鉴定。

1979年1月,《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荣孟源先生《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荣先生说稿本字数与李秀成所记字数不符,而“细查稿本,叶叶文句相联,中间并无撕毁的痕迹。这说明这份稿本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了李秀成真迹之后,又找人誊录的钞件”。同年5月,在南京召开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钱远镨先生提出一篇《就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与荣孟源同志商榷》。钱先生说他在这问题上,与荣孟源先生的看法除错简一点相同外,“其余从头至尾都是相反的”。他的结论是:“这个稿本就是李秀成的真迹。不但是他的真迹,而且是完整无缺的。即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或偷换。”两位先生的大著,都用很大功力去进行分析,都为着求真而提出自己的钻研结果,把《李秀成自述》真伪问题探讨得更深入去。现在,本书要付印了,读者都关心这个问题,谨在这里把拙见向两位先生和列位读者请教。

荣孟源先生所考这部“稿本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后重钞的冒牌货”的论断,是须要商榷的。在这部原稿影印本中,可以看出几项曾国藩欺骗清廷的重大事件。第一件是天王洪秀全的逝世事。洪秀全是病死的,但曾国藩为了报功,于清同治三年六月廿三日上奏清廷却说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①到七月初七日,杀了李秀成后,他上奏清廷又捏造宫婢黄氏说洪秀全“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②他又立即改动《李秀成自述》,赶着付印,他把这一段话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

① 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

② 见同卷《贼酋分别处治筹善后事宜折》。

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要借盗改后的《李秀成供》来为他作证。今检《李秀成自述原稿》说：

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

原稿分明记天王洪秀全是因病逝世，不是服毒而死。两相对照，就见曾国藩对《李秀成自述》的盗改，对清廷干的欺骗勾当。第二件是俘获李秀成事。李秀成是被两个奸民陶大来、王小二捉获解送清营的。曾国藩上奏清廷，却说：“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①萧孚泗就因为“督办炮台，首先夺门而入，并搜获李秀成”功，得封一等男爵。^②今检《李秀成自述原稿》记这件事说：

这邦〈帮〉百姓密藏于我，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因此我而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

曾国藩在原稿上，用硃笔把“是以被两国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钞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两相对照，曾国藩对清廷的欺骗，就有目共见。第三件是李秀成保卫幼天王从缺口冲出天京的时间事。李秀成等是在天京失陷的当日初更（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从太平门缺口冲出。这时候，天刚黑，就被冲出，是要受处分的。所以曾国藩便向清廷捏报，说正兵苦战到“见星”才收队，“结为圆阵，站立龙广山”，“分守要隘”，以防太平军的冲突，而伏兵却一直深入进攻王府，到三更（约在二十三时）还不能收队，那时李秀成传令放火烧天王府和各王府，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从太平门缺口冲出。^③清廷看了曾国藩这个捏报，还下谕命令曾国藩把防守缺口不力的将领查参。曾

① 见《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

② 据清同治三年六月廿九日谕内阁，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八十三。

③ 据《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

国藩还是以“我军巷战终日”的鬼话来搪塞清廷。^①如果据实奏报，那就更严重了。今检《李秀成自述原稿》记道：

是日将夜，寻思无计……不得已，初更之候，舍死领头冲锋，自向带幼〈幼〉主在后而来，冲由九帅放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舍命冲出闕来。

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但字是改了，却遮掩不住原来的“初”字。两相对照，曾国藩对清廷的欺骗也是一清二楚的。第四件是盗改“天朝十悞”第十悞事。案《李秀成自述原稿》这条原文作：

十、悞立政无章。悞国悞命者，因十悞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

曾国藩第一次看《李秀成自述》时，用硃笔圈去。到后来清廷命他详细钞录补送时，他要把十要、十悞补钞，就用墨笔全部盗改作：

十、悞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

曾国藩这样一改，不但掩盖了他久攻天京不下的无能，而且，把李鸿章的攻陷江苏、左宗棠的攻陷浙江，都由于太平天国把江、浙的军队调回来保卫天京，而把功劳都揽归自己和其弟曾国荃身上。今两相对照，曾国藩老奸巨猾的用心，真是昭然若揭。我们知道，从来作伪的事，都是为利己而干的，断没有为害己而干的。荣孟源先生论曾国藩作伪的目的也说：“冒充李秀成的真迹，保存起来，以备清政府万一查问时，用此搪塞。”假使当日清政府真的勒令曾国藩交出这部原稿了，我们从上面所举四件事来看，他是可以搪塞清政府呢？还是暴露欺君大罪呢？至于盗改天朝十悞第十悞一条，不但暴露了欺君的大罪，同时，也暴露了损人利己的阴险心肠，揭穿了这

^① 据清同治三年七月廿九日，曾国藩《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

“伪君子”的画皮！我认为这四处盗改，都是证明这部原稿确是李秀成亲笔写的铁证。在抗日战争前，著名历史考据学者陈寅恪先生，得看过《李秀成自述原稿》，他对人说曾国藩不肯把它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其实，何止曾国藩不肯公布，曾家后人也同样不肯公布。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于1936年6月，为北京大学影印《李秀成供》作序，曾以委婉的言词向曾家后人提了意见，希望他们及时发表原供。孟森的话，可说是代表当时社会上对曾家收藏《李秀成自述原稿》不肯公布的舆论，可是曾家后人并不理会。1944年，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桦因在广西工作的关系，经过家庭会议才勉强答应广西通志馆派人前往钞录。后来那部钞本和十多张照片，一再排印和影印出版。到1963年时，社会上已经流传开了，这才迫使曾家后人不得不把原稿影印公布。曾国藩为什么不肯把《李秀成自述原稿》交给清廷呢？曾家后人为什么也不肯公布《李秀成自述原稿》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不可告人之隐”。“不可告人之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面所举曾国藩那些欺骗清廷、损人利己和把现存原稿七十四页以后毁灭的秘密。可知这部原稿，并不是冒牌货，而是真的李秀成亲笔写的《自述原稿》。

我对钱远镕先生所说《李秀成自述原稿》“是完整无缺的，即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也是要商榷的。查现存原稿影印本最后一页是第七十四页，全页写满，最末一行，最后一句说“实我不知也，如知”，纸已写尽，文意未完，所以面对着这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大家都认为必有撕毁。而钱远镕先生却要大家“一信到底，一直信到要承认曾国藩对《李秀成供》只有删改，并无撕毁为止”。钱先生究竟根据什么得出这样坚决的信念呢？钱先生说：

我认为李秀成最后一天写的就只到现存稿本末叶最后的“实我不知也，如知”这几个字为止。据赵烈文七月初六日记说：曾国藩杀李秀成的那天，先叫李鸿裔去告诉李说：“国法难违，不能开脱”。我估计李秀成刚刚就是写到“如知”二字，因听到这话搁笔的。再从稿本全文来看，李秀成所要说的话，都从头至尾说完了。他把“十要”、“十悞”写了之后，又加了一个“防鬼”建议，更显得他已经“彻肠彻肚”，实在无话再说了。所以我认为稿本末尾就是“到此止步”。

钱先生这里提出两个理由：一、李秀成怕死，刚刚写到最末一行，最后满格“如知”两字时，听到曾国藩要杀他，就吓得写不下去了；二、他的话已写完，所以“到此止步”。先讨论李秀成是不是怕死鬼呢？我们看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草稿影印本，记李秀成得到曾国藩要杀他的通知后，是“无感容”，傍晚赴刑场途中，是“谭笑自若”，到临刑时，是“作绝命词十句”，“叙其尽忠之意”（请看本书考证）。李秀成并不是怕死鬼，而是一个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革命英雄。所以，即使真如钱先生的估计李秀成刚写到“如知”两字的时候，得到通知，也断不会吓得搁起笔写不下去的。又讨论李秀成是不是话已说完，“到此止步”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一看“如知”两字，谁都知道连一个句子还没有写完，必有下文，断不能“到此止步”。再就《李秀成自述》整部文笔作风来看，他在许多地方，都是先发一些感慨作为引子，然后引出另一大段的文字来，“如知”以上五行半，正是引子，还未入正文，也断不能“到此止步”的。我们稽考原稿，李秀成就义那天早晨，是从“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句写起的。从此句到七十四页最后一字，共一千一百七十七字。据曾国藩说李秀成每天约写七千字。李秀成写到“如知”两字时，大约还不过上午九时左右。他是傍晚才去刑场，曾国藩派李鸿裔通知他，当在下午，也不会在写到“如知”时得到通知的。再据此估计，第七十四页“如知”两字后，可能还有四千字左右，那些都是被曾国藩毁灭了。所以，今天所见的曾家影印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并不是完整无缺的，其七十四页以后，肯定是被曾国藩撕毁了的。

为帮助列位读者在阅读《李秀成自述》之前，知道有关情况起见，把我于1957年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考证》加以修订，收入本书内，以供读者参考。

二

《李秀成自述》是在待决的囚笼之中，写给敌人的，为着对付敌人，其中必有假话、假事。它又是以每天七千字的高速度，在九天内以迫不及待的极度紧张心情写成的，必有误记、误写的地方。李秀成只读过三年书，他的

文笔，是从读过的《四书》和《古文观止》，以及《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封神演义》、《说唐》等演义小说学来的，所以他写的《自述》是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李秀成是广西梧州府藤县人，他写的白话文，就夹杂有梧州府和浔州府的方言、俗语。要阅读这样的一部《自述》，就非加以注释不可。

我于1931年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时，就在我当时所能得到的扈虱谈虎客编的《近世中国秘史》所收的《李秀成供》上作注。1944年春，我把这些注文加以整理，分注于《李秀成自述原稿》每段之后，于1951年1月出版，叫做《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其后一再补充出了三版。到1957年11月，经过进一步增订，又出版增订本。1958年夏，中华书局要第三次印刷这部增订本，问我有没有增订。那时候，我正要从北京回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请中华书局不要再印，打算把《李秀成自述》从头另作新注。中华书局同意了我的决定。

1958年6月，我回到南京。在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的同时，就依靠大批的史料，进行新注的工作。1963年台湾世界书局影印曾家原稿本出版后，我又把以前所据的广西通志馆钞本改换为影印本。1964年4月，我在南京的工作结束，回了北京，这部注也完成了。十五年来，我不断在稿上把新发现的史料予以补充、修订。到今年1月，搁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把这部注再审核一遍，至今始完竣。回首初作注时，已四十九年。古人说白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从青春注到白首了。

中国注史书，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最著名。我注本书曾参考裴松之的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裴注“纲罗繁富”，引文“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这个评论是不错的。我注本书也尽力网罗，所引史料，也都首尾完整，以供研究太平天国史者的使用。这是我与裴注相同的地方。但裴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不免有主观；我注本书则唯有训诂、考证，不加议论。裴注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我注本书，则凡与太平天国史无关的绝不引录，如注冲天炮只注明其事，记其根据，而不引所据的欧阳兆熊《水窗春吃》的长篇记事，以免芜杂。这是我与

裴注不同的地方。一般注释古书，大都专门注意训诂，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于原文的音切和解释并不详备。注史书一定要注重事实，这是裴松之的卓识。但也必须同样注重训诂，否则读者阅读原文尚有问题，便谈不到理解了。所以，我们既要采用裴注的长处，也要鉴戒他的缺处。因此，我注《李秀成自述》，是训诂与事实的考证并重，在体例的大旨上，也与裴注有不同的。现在，把我注本书的体例说说。先说训诂方面，我注的是下面十二项：

一、太平天国制度。如州县佐将、王宗、登闻鼓等等，都加注释。

二、太平天国的避讳字。如避师字讳，而以司字代；避王字讳，而新造一丕字等等，都加注释。

三、太平天国的特殊称谓。如称天王诏旨为“照”：称天父、天王、东王、翼王等的发怒为“义怒”等等，都加注释。

四、人物。凡太平天国人物可考的都写简传。清朝方面人物，则将其与太平天国有关的注明。至于大头羊、大鲤鱼、山猪箭、糯米四、冲天炮等等绰号，也都考出其本名。

五、地名。凡山川关隘市镇乡村，都一一加注。其“英家会”为殷家汇之误，“四境”为泗泾之误，三里之为墟名，九里之为桥名等等，也都一一考清。

六、事物。如李秀成说他学天文，七日七夜而知，据考系占星术；他叫张国樑招募的广东兵为“广兵”，叫曾国藩的湘军为“南兵”等等，都加注释。

七、专门名辞。《李秀成自述》中有些专门名辞今天已经不易懂了，如记永安州突围之役说：“姑稣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案寿春兵，就是寿春镇的军队，寿春镇是清朝绿营军队里面的一个镇，建立在安徽省寿州，当时调来广西作战，把守永安州姑苏冲。又如记青浦之役，俘获华尔（F. T. Ward）洋枪队的武器说：“得洋庄百余口。”案“洋庄”，是当时对前膛旧式洋炮的称谓。这些地方都加注说明。

八、特殊的简写字。李秀成把“蓝”字简写成“𠂔”。他写三河守将蓝成春作𠂔成春，曾国藩把“𠂔”字认作“洪”，他刊的《李秀成供》刻作“洪成春”，于是真人蓝成春便变成为乌有的“洪成春”了。李秀成写“蓝

顶子”也写作“𠂔顶子”，曾国藩又用硃笔把“𠂔”改为“红”，于是蓝顶子又变为红顶子了。我考明蓝成春的历史，再核对字体，确定是蓝字，也在这两处注明。

九、典故。如“周朝斩将封神”，出自《封神演义》；“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出自《东周列国志》；“许多乱星下降，乱及凡间”，出自《水浒传》；“即是四明山之会一样之情由”，出自《说唐》；“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出自《论语》等等，都一一注明。

十、辞句。如“各心不分〈忿〉”，“少勇刚强”等等，或考其辞源，或考其事实，以注释其意义。

十一、方言。李秀成用了很多他的家乡广西梧州、潯州一带的方言，如“冇”、“是乜”、“定叠”、“少何”、“格”、“知到”、“到步”、“落跪”等等，都一一注明。

十二、乡土称谓。《李秀成自述》用有乡土称谓，如说“张国樑与向帅为契爷”。案“契爷”，是两广西江流域一带对义父的称呼，这种地方也加注。

训诂方面，注的就是这十二项。这些地方，如不加注，就使人难懂，有时还使人发生误解。如“姑稣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这一句话，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就把“寿春”误会为满族人名，写作“守古苏冲者为满将寿春”（见商务印书馆1944年8月初版二六七页）。世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绿营早已成为历史名辞，简又文不知寿春镇是不足为怪的。这就可知古人注古籍，为什么十分重视训诂的缘故。

训诂是帮助读者了解原文的，而事实的考证，则是订正原文的错误和补充原文的缺略的。我在事实的考证方面，注的是下面十项。

一、事实错误。《李秀成自述》所记事实有许多无意致误的地方，有的因本人未参加而致误的，如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各地拜上帝会众是在道光三十年秋间各自团营的。而李秀成却误记为“不约同日起义”。有的是由于把情况看错了而致造成大错大误的，如进攻宁波之役，外国侵略者要调集军队抗拒，驻宁波的英、法、美三国领事派代表前来接洽，要求延期一星期入城，太平军答应了他们。届期入城，英国战舰于几小时后才赶到宁波，以致为时已迟，太平军差一点中了外国侵略者的缓兵计。而李秀成却说：“收克宁波之来情，实是宁波洋鬼之通诱。”有的是因不明敌情致误的，

如大刘村之役和乌衣之役，胜保都没有参加，而李秀成都误记胜保是这两役清朝两路统帅之一。此外，还有由于记忆有误的。所有这些，都一一考明。

二、时间错误。《李秀成自述》时间错误很多，如庐州失陷，在乙荣五年十月初四日，时在天京事变前九个月，而李秀成却误记作丁巳七年四月石达开被迫出走远去，军民的心散乱，以致庐州被攻破。如他和陈玉成于丁巳七年正月十九日大破围困桐城的清军，这时石达开还在天京执政，据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救桐城之役，正是石达开主谋。他却记为石达开被迫出走后事，说“谨〈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如枞阳会议在戊午八年六月，他却记作己未九年六月。江南大营复困天京，是在丁巳七年十二月初一日，他却误记作“此是八年之间矣”。甚至自叙历任官阶，也时间错乱。这些地方，都稽考注明。

三、考其有所为而言，以免把假当真的。《李秀成自述》有许多有所为而言的地方，如奉命出师江西、湖北，却说是“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如天京缺粮，放妇女出京谋生，是经他奏准，并且晓谕通衢，布告周知的，却说天王严责，是他“强行密令”放出。如他于攻入杭州城后，第二天即攻满城，第三天上午就破满城，却说“破入大城四日，上〈尚〉未攻其满城，专等御照下赦”。如部将李昭寿叛变，投降清朝钦差大臣胜保，他手书痛斥李昭寿说：“本主将誓必兴师问罪，情义既绝，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势必先诛也”，而他在《自述》里却说“我亦未责”。诸如此类地方，都一一考明，以免把假当真。

四、李秀成有意隐瞒的地方须考明的。如从天京作战略的撤退，经江西，绕湖北，前往西北与扶王陈德才军队会合，据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划，是当时太平天国救亡的唯一良策。李秀成虽然被俘，他知道京外太平军还是照这条计划进行的，所以他隐瞒起来。又天王封他为真忠军师，调遣各王，他也隐瞒不提。这些地方，都考出注明。

五、李秀成因避免刺激曾国藩而省略的地方。如攻天京城外湘军营之役，大战四十多天，重创敌人，使曾国藩“心已用烂，胆已惊破”，李秀成却用几十个字，以恭维的语气就带过去。这种地方都要考明注出。

六、大事有记而未明，则考明以见其事的。如李秀成记外国侵略者到天

京与天王交涉，提出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朝，平分中国，否则进攻太平天国。天王断然予以拒绝的事，是资本主义侵略者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太平天国反侵略的一件极大的事。李秀成以简短的文字说了这件大事，但他只说“鬼头”，却没有说明是哪一個侵略国家在华的首脑人物，也没有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所以必须详考，以见其事。

七、有其事已具，博考以详其情况的。如镇江之役、三河之役、破江南大营之役等等，都博考以详其情况。

八、《李秀成自述》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补其缺失。如辛酉十一年冬李文炳、熊万荃、徐少藩、钱桂仁等谋在苏州作乱事，《李秀成自述》只字未载，本书考出其事，以补其缺失。

九、事出离奇，须考明是否属实的。如记苏、杭告急，李秀成要前去指挥，天王及朝臣要他助饷银十万，方准他前去。天王限他“四十日回头，艮〈银〉不足交，过期不回者，衣〈依〉国法而行”。这是一件不近情理的事，须考明是否属实。

十、有事出自扬，须订正的。如救镇江之役，统帅是燕王秦日纲，率领冬官丞相陈玉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各将。李秀成在《自述》中，不仅没有提到秦日纲，而且俨然以统帅的身份自居。这是不符事实，须要订正的。

事实的考证方面，注的就是这十项。如果不加注，就会把假的当作真，就会把外国侵略者的阴谋当为友好，就会歪曲事实。大事件固然不待说了，就是一些很细小的地方也同样要订正，否则就会导致普遍的错误。如有同志举出三河镇与庐州距离，据他步行计算是九十华里，而《李秀成自述》误作“三河隔庐郡五六十里”，一般中国近代史著作都据他误作五十华里。^①可知订误的重要。至于要使史事更详明，则又有赖于对原文缺失或简略的地方，加以补缺和增详。

总之，从上述训诂和事实的考证两方面所举的一些例子来看，可知这部《李秀成自述》是必须加注才能读能用的，否则就会误解误用。有些地方，又须增补缺略，方能详明的。我当初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注它的。四十九年

① 见《历史教学》1980年第三期龚维英《关于三河与庐州的实际距离》。

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这也使我认识到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时代、出身、教育，都与我们今天不同，要理解他一生风云际会的经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注《李秀成自述》，是深深惭愧自己的无知的。其中错失地方，敬请读者多加指教，匡其不逮，是所至祷至幸！

至于《李秀成自述原稿》，是一部仓促急就的草稿，著录殊感不易。在复核过程中，深得中华书局责任编辑于世明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1980年8月5日罗尔纲谨记于北京

凡 例

一、《自述》文字，一律用老五号字，顶格排。

二、注文一律低一格，用新五号字排。

三、注文都注于每段之后；凡注处都加数字号码。

四、原稿写在簿眉或正文旁边及簿下端的文句，都是补充正文的叙述，所以一律用圆括号夹注，加在正文内。此种地方，都加注说明，使读者知道原来书写的地位。惟遇不能夹注在正文内的字句，则录在注内，以存原文。

五、凡原稿避讳字均照写，例如“荃邦之幸也”，“荃”字为“全”字的避讳，照写作“荃”。

六、凡太平天国改字均照写，例如“顺流而下”，“顺”为“顺”的改字，照写作“顺”。

七、凡太平天国新造字均照写，例如“制造鑒成”，“鑒”字为太平天国新造，照写作“鑒”。

八、凡原稿上简体字都照写；惟有些难以认识的简体字，例如写“蓝”作“𠂔”则不照写，而在注内记明原稿写法。

九、凡原稿上，对太平天国的避讳字或改字，有时遵守规定写，但有时却不遵守规定写，例如“国”字，太平天国规定改为“国”，但原稿上有时也仍作“国”，本书均照原稿著录。

十、原稿写的字体颇不统一，有时作繁体，有时作简体，本书均照原稿著录。但草书则改作楷书，照原稿录。又原稿同是作简体，有时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兴”字，一般写作“𠂔”，但也有写作“𠂔”，本书都一律作“𠂔”。

十一、凡避讳字、改字、新造字、简体字等，都在初见时加注说明，而不在该字下夹注本字。方言同此例。惟有些会发生混淆的简体字，如简写“骑”作“奇”，“帮”作“邦”等，都在该字之下注出本字。

十二、原稿两字相同之处，下一字一般都写作“く”，例如“又何必往河南，く京乃帝王之家”，本书不照录，下一“南”字，不作“く”，而作“南”。

十三、凡对原稿上辨认不清的字，用□作符号，代表此字。如原稿六十一页后半面第十五行“封王不到我，□定有他变”句，“定”字上尚有一个字，李秀成自己涂去，在旁边另写一草体字，并加一线条插入内，此字尚待辨认，暂用□为记。

十四、凡原稿上有脱漏的字，例如“此语是与朝臣谈及后肯从”句，“肯”字下脱漏了一个“不”字，本书加回这一个字。凡此种由注者校加的字，都用方括号〔 〕为记，以待读者审核。

十五、凡原稿上错字和误写的姓名、地名等等，由注者在原字之下，加上校改的字，都用尖括号〈 〉为记，以待读者审核。

十六、凡原稿上文字不通处，由注者删去的字用六角括号〔 〕为记，加上的字用尖括号〈 〉为记，例如“又要将翼王所杀”，由注者校改为“又要将翼王〔所〕杀〈害〉”，以待读者审阅。

十七、凡原稿上衍文，都用六角括号〔 〕为记，以待读者审核。

十八、凡原稿上倒置文字，例如“那林绍璋革戢调其回京”，应作“那革戢林绍璋调其回京”，经注者改正后，都加注说明。

十九、注文一律以天历纪时，夹注夏历或阳历以资对照。

二十、凡引用清朝资料，读者从书名或篇章名都一望而知为反革命资料，其中所有狂吠太平天国为“贼”、为“匪”的地方，都不改。

二十一、凡引用清朝资料，为读者复核原书时检查方便起见，凡所引用，均照原书名，例如“《曾文正公奏稿》”不改作“《曾国藩奏稿》”；但经我们手编的未刊的曾国藩书牍，则作“《曾国藩书牍》”。

二十二、《自述》原稿不分章段，此书章段是注者试分的，其标题也是注者加的。《忠王答辞手卷》的标题也是注者加的。

二十三、由于印刷条件所限，注文尽量用文化部、文革会公布的的异体字整理表规定的通用字，《自述》原稿则仍全部照录。

李秀成自述原稿考证

一 有关李秀成写自述的一些情况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天京城陷，李秀成从太平门退回朝门，保护幼天王。他看见幼天王没有好马，便把自己骑的战马让给幼天王。他另骑一匹不得力的马，走回家来辞别母亲。他把全家都抛弃了，独带幼天王出走，连冲几处城门都冲不出去，只得退守清凉山。

到了初更，李秀成当先冲锋，带了一千多人保护幼天王从太平门被炸倒的城墙缺口冲出。出城又冲过孝陵卫敌军营卡门后，分为两队，以前队保护幼天王急走，他率领后队以拒追兵。敌军来追，幼天王得脱。李秀成因为骑了不得力的马，赶不上大队，冲散落后，藏在方山民家。六月初九夜（夏历六月十九夜），被奸人查获。六月初十日（夏历六月廿日），解到曾国荃军营。

李秀成被解送到曾国荃军营后，曾国荃摆列刀锥，要用刀割锥刺的酷刑杀害李秀成。曾国荃致李鸿章信自供说：

李秀成擒获后，弟遍刺以锥，流血如注。^①

据常熟秉衡居士《荷香馆琐言》记当时情况道：

① 《曾忠襄公书札》卷八《致李中丞》。

伪忠王李秀成擒获时，曾忠襄憾其四十餘日攻围之力，短衣握锥，独身走出，向李股上直刺。李顾曰：“老九！何为如此？各人做各人事，何须生气？”赵知州惠甫等劝阻，忠襄乃入。^①

案“忠襄”，曾国荃谥。曾国荃行九，所以忠王叫他做老九。赵惠甫即赵烈文，惠甫是赵烈文的号。赵烈文是曾国藩派来做曾国荃军营的机要秘书。他当时听到消息，恐怕曾国荃当天把李秀成杀死了，清廷要献俘时交不得卷，所以赶着出来劝阻曾国荃。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廿日自记这事说：

闻生擒伪忠王至，中丞亲讯，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或告余。余以此人内中所重，急趋至中丞处，耳语止之。中丞盛怒，于座跃起，厉声言：“此土贼耳，安足留，岂欲献俘耶！”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

案“中丞”指曾国荃，“内中”指清廷。在当天晚上，赵烈文去见李秀成。他在日记上记道：

晚同周朗山至伪忠王处，与谈良久。……余云：“何不早降？”曰：“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受其爵位！”……又曰：“今天京陷，某已缚，君视天下遂无事耶？”余曰：“在朝政清明耳，不在战克，亦不在缚汝。闻新天子聪睿，万民颀颀以望郅治，且尔家扰半天下，卒以灭亡，人或不敢复踵覆辙矣。”李又言天上有数星，主夷务不靖，十餘年必见。余征其星名度数，则皆鄙俚俗说而已。余知其无实在过人处，因问：“汝今计安出？”曰：“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言次有乞活之意。余曰：“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遂俯首不语。

① 这一段《荷香馆琐言》的记事载《人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著者真名丁国钧，据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叙目》，见《文史哲》1979年第四期。

这段记载，记出李秀成被俘送清营的当天晚上有两件表示。第一，忠王说：“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受其爵位”，又说：“死耳”，明确地表示他尽忠革命的立场，与他白天被曾国荃用刀割锥刺的酷刑要杀害他的时候所表现的“殊不动”的英雄行动完全是一致的。第二，李秀成提出“天下遂无事耶”、“散遣旧部”、“夷务不靖”等问题试探敌人，说明他后来在《自述》里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以进行他的秘计，在被执送到清营时，就已经在盘算着。他立定了主意，当敌人刀锥交加时，就慷慨牺牲，敌人放下刀锥时，就暗里跟他斗智。有人说李秀成被执时本是坚定不降的，到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受了曾国藩的欺骗，才向曾国藩提出“保民”、“防鬼”两大要求，写了《自述》，投降了曾国藩，可见并不是事实。

过了三天，曾国荃做了一个大木笼，把李秀成关在里面。^①同治三年六月廿五日，曾国藩从安庆赶到。这天下午七点钟，他亲自讯问李秀成。^②他在六月廿三日，在安庆上奏清廷说：“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③那时候他还没有决定即在南京杀害李秀成。到这天亲问李秀成后，才决定在南京杀害。他在六月廿六日给他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杀之。”^④他为了杀害李秀成之后，好向清廷交代，所以在六月廿六日的日记里面，就特地记上“取伪忠王详供”这一条附记。

《李秀成自述》就是在曾国藩要取他的“详供”的第二天开始写的。^⑤他抓住这一个机会，在《自述》里面委婉曲折地进行他的秘计。他在炎暑之月，囚笼之中，为求达到他的目的，争取时间拼命挥写，每天以七千字的惊人速度，去写这一部《自述》。^⑥

①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廿三日记。

② 据《曾文正公手书记》同治三年六月廿五日记。以下所引曾国藩日记均引自此书。

③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同治三年六月廿三日《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

④ 《曾文正公家训》卷下。

⑤ 据曾国藩在他所刊刻的《李秀成供》末写的附记。

⑥ 据同上。案有人根据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三年六月廿六日附记里面所记“取伪忠王详供”一条记事，解释为拿取忠王详供，以为在同治三年六月廿六日前，李秀成已有了“详供”，而不是曾国藩所说是从六月廿七日写起的。又根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二日记所记“经中堂录供”的一句话，以为在七月初二日以前，也还没有李秀成亲笔所书写的任何口供，而只是“经中堂录供”。因此，作出否定《李秀成自述》真实性的结论，也就是论断李秀成根本没有写自述的事。现在，先来考查第一个根据能不能作为根据。案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廿六日所记附记共有五条，都是待办的事项。（转下页注）

在李秀成写《自述》后五天，曾国藩和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商量，不

(接上页注⑥)后来办理的情况还可以考见，兹列表于下：

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廿六日日记附记事项嗣后办理情况表

待办事项	嗣后办理情况
札数人查诸殉难者遗骸陆祥涂孙	同治三年六月廿七日曾国藩手书问辞，还在问：“陆制台（建瀛）、祥将军（厚）知其尸首否？”可见六月廿六日尚未办理，附记此条正是待办事项。
取伪忠王详供	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三年六月廿七日记说：“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交庞际云、李鸿裔鞠问忠王。曾国藩这一张问辞及庞际云、李鸿裔会鞠忠王的文件，即今天保藏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忠王答辞手卷》。可知六月廿六日这一条附记，正是一件待办的事项。
寻伪天王瘞尸处，伪幼主自焚处	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三年六月廿八日记说：“熊登武挖出洪秀全之尸，扛来一验。”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贼酋分别处治殛善后事宜折》说：“伪天王洪秀全逆尸……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从伪宫内挖出；二十八日，扛至营次，臣与臣弟国荃验看。”
遍拜各营官，验各地洞	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三年六月廿七日记说：“出外拜各营官，初至振字营见罗逢元，振副营见张定魁。……旋至备字营见张光明，至信字营见李臣典。……又至刚字营见营官何玉贵。旋至印子山慎字营见彭杏南表弟。休息片刻，旋至湘恒右营见朱唐洲，恒左营见葛奇益。” 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三年六月廿七日记说：“至振字营……又至其分哨垒内看其所挖地道。” 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三年六月廿九日记说：“至朝阳门外傍城湖外观萧庆衍所挖地洞二处，稍北有萧孚泗所挖地洞一处，萧开印所挖一处，武明良所挖一处。……旋至长胜营嘉字营两处，见太子湖之北有熊登杰地洞一处，李祥和、成东昂地道一处，朱洪章、陈万胜地道一处。” 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记说：“至龙膊子观十六日轰破地道之处，所挖两洞，距城极近。” 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记说：“至神策门观朱南桂所挖地洞五处，已轰坍者一处，外月城全轰倒矣。又遥望金川门外刘连捷所挖二洞，张诗日、李臣典各挖二洞，未能细阅也。”
周历城内各处	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记说：“由太平门入城，至伪天府一看，规模俱仿宫殿之制，而焚烧无一存者。旋出大南门回沅弟处，共行五十里。” 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记说：“进城行二十里至易晴谷公馆一坐，又至伪英王府、侍王府一阅。午初回沅弟营次。”

说明：此表参照丁云青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一文（转下页注）

候清廷命令，即将他杀害。他们得出他“甚狡，不宜使入都”的结论。赵

（接上页注）附表编制。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一天附记里的札、查、取、寻、拜、验、历等事，除了幼天王根本没有自焚，不可能寻得自焚处外，事实证明，一律都是待办事项；“取伪忠王详供”一事，并不例外。曾国藩在六月廿六日记的附记里面记上这一条，乃是预备要取李秀成的“详供”，是一件待办的事项，而不是说把在这一天以前已经现成了的“忠王详供”取来。曾国藩在“取伪忠王详供”一条上还加上○记号（这一个圈，用毛笔匆匆画，画得不圆，有点像三角形），在“寻伪天王瘞尸处、伪幼主自焚处”那一条上也加上○记号。这表示这两项事件比较其他各项特别重要，而不是什么暗号（请参看图一）。这些例子，在曾国藩《手书记》里面是不胜枚举的。例如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所记附记有“作李臣典请恤折”、“作声明李秀成先杀片并叙伪印另费”两条，并加○为记。到十八日才记“早饭后作李臣典请恤折，申刻做成。又作复李秀成未解京之故一片，夜将片稿作毕”。可知这两条附记所记都是待办事项，而不是记本日已办妥的事；加○为记，是表示这是重要的待办事项，而不是什么暗号。六月廿六日所记附记那一条“取伪忠王详供”，正是如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历史事实提出在同治三年六月廿六日以前并没有“忠王详供”的证明。案李秀成是在同治三年六月十九日夜被俘的，六月廿日被曾国荃刑治，但并没有鞠讯。曾国荃复李鸿章信说：

李秀成擒获后，弟遍刺以钅，流血如注，随即传置槛车中。后数日，家兄来营提询数次，呈亲笔供词数万言。

李秀成的被鞠讯，是始自曾国藩从安庆到南京之后。考曾国藩是同治三年六月廿五日到南京的，他在当天日记记道：

已初登岸，行二十里至沅弟营内。……至戌初，将所擒之伪忠王亲自鞠讯数语。

我们必须注意，六月廿五日这一天的戌初（十九时）时候，曾国藩对李秀成只“鞠讯数语”，李秀成的回答当然也只是大概情况，而不可能有“详供”的，所以《李秀成自述原稿》说：

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末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蹇，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

我们把《李秀成自述原稿》这几句话与当时情事复案，正是完全符合。又考曾国藩六月廿六日记，这一天上午，曾国藩“见客十馀次”，午后，“见客三次”，又连续与曾国荃和幕客会谈三次。他在六月廿六日这一天，并没有鞠讯李秀成。据这一天曾国藩给他儿子曾纪泽的信说：

余于廿五日已刻抵金陵陆营，文案各船亦于廿六日申刻赶到。（《曾文正公家训》卷下）

从安庆随曾国藩来南京的机要文案人员，便是被曾国藩委派会鞠李秀成的庞际云、李鸿裔等人。庞际云在《忠王答辞手卷》后的跋说：

同治甲子六月，湘乡伯克复金陵，生擒忠酋李秀成。湘乡侯相自安庆移节东下，李廉访鸿裔与际云实从，奉委会鞠。（转下页注）

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二日记说：

晚至中堂处久谈，拟即将李秀成正法，不俟旨，以问余。余答言：“生擒已十餘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

（接上页注）庞际云、李鸿裔是在六月廿六日申刻（十五时至十七时）才到南京的，曾国藩在这一天日记说：

中正……庞省三、李眉生来。夜饭后再与诸人密谈。……戌刻接奉谕旨，旋又与眉生等一叙。

案省三，庞际云号；眉生，李鸿裔号。据此知他们是在六月廿六日十五时至十七时之间才从安庆赶到。他们到南京之后，当夜听曾国藩指示。他们被派会鞠李秀成是在听曾国藩指示后的事。在廿六日这一天，无论曾国藩本人，或被曾国藩派遣会鞠李秀成的庞际云、李鸿裔，都没有鞠讯李秀成。再考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廿七日记说：

傍晚倦甚，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

案曾国藩所开的问条，便是今天保存在《忠王答辞手卷》里的第一纸。庞际云、李鸿裔的会鞠李秀成是六月廿七日后事。由此可见，在六月廿六日以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忠王详供”这个东西。根据上面的考证，从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廿六日所记附记各项事件嗣后办理情况和他的日记附记的体例的证明，六月廿六日日记附记“取伪忠王详供”一条，乃是记出待办事项，而不是已办事项；从历史事实证明，六月廿六日以前又根本没有什么“忠王详供”；可见解释为拿取六月廿六日以前已有的详供这一个根据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再考查第二个根据能不能成立。案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二日记“经中堂录供”这一段话说：

晚至中堂处久谈，拟即将李秀成正法，不俟旨，以问余。余答言：“生擒已十餘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与中堂意同。

我们把赵烈文这一段日记里所说“经中堂录供”的话，与他在同月廿一日所记说：“幸此人留之半月，经中堂亲询口供，众难伪造”的话对勘，知道他所指的“经中堂录供”，便是指六月廿五日李秀成回答曾国藩“亲自鞠讯数语”而说的。在这句话本身的意义，说的只是经曾国藩录有李秀成的答话，而没有否定李秀成另有手写的《自述》。而况赵烈文在同月初六日的日记上又分明记道：

伪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

案赵烈文这一段话与“经中堂录供”的话距离不过四天。四天前记的是曾国藩录有李秀成说的“口供”，虽不候旨，杀了也没有问题。四天后记李秀成被杀，并记及李秀成写有“亲供”的事，前后丝毫没有矛盾。可见第二个根据是断章取义，也完全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根据这两个根据来作出的否定李秀成写有《自述》的论断也就不能成立了。

不宜使入都。”与中堂意同。

案“中堂”称曾国藩。所谓“甚狡”，我们应加以考释。关于这一点，李鸿章曾经再次地论过，他上曾国藩信说：“李秀成狡谋。”^①复曾国荃信说：“忠贼……诡谲多谋。”^②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奏清廷说：“伪忠王李秀成为诸贼之冠，不甚耐战，而最多狡谋。”^③同年十一月廿九日复曾国荃信说：“忠逆谋狡而稳。”^④又复曾国荃信说：“两年以来，与忠逆搏战最多，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⑤曾国藩、赵烈文论李秀成说：“此贼甚狡”，正与李鸿章所论“狡谋”、“诡谲多谋”、“最多狡谋”、“谋狡而稳”、“深佩其狡猾”相同，都是说李秀成是一个富于深谋秘计的人物。这是一方面的意义。另一方面的意义，所谓“甚狡”，是说明曾国藩和他的走狗认为李秀成卑躬屈节地向他们所说种种甘言蜜语都是虚假的，说的写的是这样，心里实际不是这样。当时曾国藩是预料到清廷会要献俘的。他怕李秀成到北京去要利用他与清皇朝的矛盾从中捣他的蛋，所以经过与心腹走狗交换意见之后，大家对李秀成得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的结论，而决定不候清廷命令，即在南京将他杀害。

在李秀成写《自述》后第八天的灯后，曾国藩又与他会谈一次。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记说：

阅李秀成所写供词。灯后亲讯李秀成之供。

第二天，李秀成还在赶写《自述》。这天下午，在天京就义。时为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廿五日，即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草稿本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记载其事道：

伪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

② 同上，《复曾沅浦方伯》。

③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分路规取苏州折》。

④ 《朋僚函稿》卷四《复曾沅帅》。

⑤ 同书卷五《复曾沅帅》。

均甚详，虽不通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贼中不可谓非桀黠矣。中堂甚怜惜之，昨日亲问一次。有乞恩之意；中堂答以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今日遣李眉生告以国法难违，不能开脱。李□□（此两字涂去，在旁有一字亦涂去，都认不清楚）无感容，曰：“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云云。傍晚赴市，谭笑自若（后将“□□无感容”、“谭笑自若”及“□□”两字旁改一字都删去）。作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

这一段记载，记出两件要事，一件是记李秀成临就义前，还对曾国藩的走狗表示感激曾国藩，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的话。李秀成就要被曾国藩杀害了，所谓“厚德”，何所指而云然呢？案李秀成在就义前一夜与曾国藩会见，第二天，他在《自述》里写：“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他得了曾国藩什么“厚情”，竟至于“死而足愿，欢乐归阴”呢？根据他在被解到清军营第一天对赵烈文所说“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的话，“瞑目无憾”是假的，但要保存革命力量却是他的一个目的。又考曾国藩在杀害李秀成后一天，上奏清廷，论到李秀成力劝他“不宜专杀两广之人”这一件事，说是：“其言颇有可采”^①，可证曾国藩在七月初五夜见李秀成时，确曾当面答应了他的“招齐”事项，所以李秀成才在第二天写的《自述》写上“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到知被杀害时，又说感谢“厚德”的话，使曾国藩不致变卦。第二件是记李秀成就义事，在得到曾国藩通知时，是“无感容”，在赴刑场的途中，是“谭笑自若”，到临刑时，是“作绝命词十句”，“叙其尽忠之意”。李秀成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革命英雄气概，虽然在反革命分子的极顶恶毒笔下，仍昭然共见，掩盖不了的！

二 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

李秀成就义后，曾国藩把他写的《自述》经过删改并且撕毁一部分之

^① 据《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贼酋分别处治筹善后事宜折》。

后，另钞一个钞本送清廷军机处，同时刊刻传布，而被删改和撕毁后的《自述》原稿本，却还保留下来。

现在先说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曾国藩叫《李秀成自述》为《李秀成供》。在李秀成就义后第四天——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曾国藩给他的儿子曾纪泽信说：

恩旨本日包封钞回。兹先将初七之折寄回发刻，《李秀成供》明日付回也。^①

案这时候曾国藩在南京，曾纪泽在安庆。七月十一日曾国藩日记又说：

将《李秀成亲供》及两道恩旨寄皖刊刻。

曾国藩刊刻的这部《李秀成供》，十多天后便印成。同治三年七月廿九日曾国藩《补送李秀成供词片》说：

臣因各处索阅逆供者多，已刊刻一本。兹再随折封送军机处备查。^②

曾国藩为什么在杀害李秀成之后，就赶着刊刻《李秀成自述》呢？这是曾国藩既要借李秀成所说的如“国库无存艮”和幼天王“定言〈然〉被杀矣”等话向清廷交代，又要盗改李秀成所记天王病逝为服毒而死以冒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候清廷旨命而擅杀李秀成，为了解释清廷和当时反动统治阶级对他的怀疑，说他杀的不是真李秀成。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廿一日记说：

富将军前日来此，托言查看旗城，其实僧王有信，令其查访忠酋真伪及城内各事。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颇有违言，逢人辄询伪忠王是否的确云云。幸此人留之半月，经中堂亲询口供，众难

① 《曾文正公家训》卷下。

② 据江苏省博物馆藏钞本《求阙斋奏疏》卷六。

伪造，又夷人及各路来人见之者甚多，然犹众议如此。若本日戮之，即剖心视众无以明之矣。

案“僧王”指清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若本日戮之”，指李秀成被俘那一天，曾国荃要用刀锥割杀李秀成的事。可见曾国藩不候清廷命令擅杀李秀成是使人疑心的，所以他为了解释他人的疑心，也促使他把《李秀成自述》赶着刊布。

在这里应该附带说说坊间流传的《李秀成自述》的版本。坊间流传的《李秀成自述》版本很多，大别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曾国藩刻本^①，包括曾国藩的原刻本和照曾国藩刻本翻刻的本子。第二类是当时书贾将曾国藩刻本改头换面的翻改本，例如有一种在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孟冬刊刻的本子便属这一类。这个本子，书面题字，中作“新刻永安州英雄起义”，右为“洪秀全三人结拜，钱江演计取金陵”，左为“曾大人克复江南，生擒李秀成亲供”等字样，其上又标明“同治三年孟冬新镌”；书中内容分为三卷，在卷二结尾加有“若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等章回小说结尾所常用的习语。这一种刻本，我们可以叫它做书贾的翻改本。第三类是文士修改本，我们以前所见的那一种流传最广的《近世中国秘史》本便是这一类。《近世中国秘史》一书是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元1904年）扞虱谈虎客（真名为韩孔厂）在日本编印的。扞虱谈虎客根据曾国藩刻本加以删改。案曾国藩刻本共二万七千八百十八字，而此本只二万六千六百二十五字，计共删减了一千一百九十三字，文字较为简雅，而对于原稿愈加失真。例如传内说太平军克复永安时，水寨军营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困打后移过仙回，案“仙回”岭名，李秀成并不误，《近世中国秘史》本却妄改作“困打后欲移兵回”。如李秀成记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选将举贤，以英王陈玉成与李秀成为首，后来又选得李秀成堂弟李世贤，所以李秀成说：“又得一将朝用”，《近世中国秘史》本却妄改为“又得一蒋朝用”。又如李秀成记浙江太平天国镇守的将领说：“龙游有王宗李尚扬把守”；案《幼主诏旨》：“特诏封李尚扬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裨天义”，“开朝王宗”乃是太平天国后期的

① 曾国藩刻印的《李秀成供》，今不易得。1936年北京大学有影印本。

一种封号，《近世中国秘史》本却妄改为“宗王李尚扬”。可见这一个本子对于原稿愈失真，也愈谬妄；它曾经对撰述太平天国史工作者起了恶劣的影响，如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就把李尚扬作为宗王，列在《王爵表》内，一直到1952年胡珠生《李尚扬自述笺证》^①，还把改窜过的“宗王”认作真，原稿的“王宗”认作假。但是，到今天《李秀成自述原稿》已经刊布，这三类刻本，只有曾国藩刻本在研究曾国藩删改原稿这一课题时还有校勘的作用，其他两种便连这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三 曾国藩送军机处的李秀成自述钞本

曾国藩杀害李秀成之后，第二天——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就赶着把一部《李秀成自述》的钞本送清廷军机处。他上奏清廷说：

李秀成之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谨钞送军机处以备查考。^②

我们稽考曾国藩送清廷军机处的《李秀成自述》钞本的内容究竟是怎样的呢？曾国藩《手书记》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记道：

将李秀成之供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一百三十叶，每叶二百一十六字，装成一本，点句画段，并用红纸签分段落，封送军机处备查。酉刻发折。

据曾国藩所记计算，他送军机处的钞本共二万八千零八十字。案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实数为二万七千八百十八字，此数是将《自述》末曾国藩附记及《自述》内空格除去计算，若将曾国藩附记及空格加上，其字数适与送军机处的钞本相同。故可知曾国藩送军机处的《李秀成自述》钞本是和他的刻本相同的。

① 见《大公报·史学周刊》第六十六期。

②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贼酋分别处治筹善后事宜折》。

清廷看到曾国藩的附记,知道他送军机处的是一个删节本,下谕旨叫他将原本详细钞录送来。曾国藩接到谕旨,于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补钞送清廷。他在《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①里,说他遵旨“将十要十误及其他语补钞进呈,以备考核”。

这一份补钞,今天还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封面题“补钞李秀成亲供”七字。文内曾国藩加标题作“李秀成十要十误等语”。与原稿影印本对勘,系除钞十要十误之外,只钞“防鬼反”一段。曾国藩所谓将“其他语补钞”,不过是欺骗清廷的措词罢了。

这一份补钞,只钞到七十四页后半页第十一行“我与其战过方悉其由”句为止。在此句后,到最末一行末“如知”两字,还有八十三字不录。这八十三字,不但最末“如知”还不成句,而全部八十三字,也不过是一种开场语,要说的话还在下面哩,曾国藩并不钞录。曾国藩钞的“其他语”,是对他没有忌讳才钞的,不钞的就必然是有所忌讳。那些末尾有忌讳的地方,或者是早已撕毁掉,或者是到补呈时才撕毁。孟森论曾国藩删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原因说:“世以秀成以种族之见劝曾,其时汉人已握实力,满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以说。”^②孟森的话,同样可以说明曾国藩不肯把有忌讳的部分钞给清廷的原因。

四 曾国藩后人藏的李秀成自述原稿 确是李秀成亲笔的鉴定

上面考的是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和曾国藩送清廷军机处的《李秀成自述》钞本。一向相传,《李秀成自述原稿》存在曾国藩后人手,但曾家却没有公开示人。一直到1944年春天,才经广西通志馆派人前往湖南湘乡曾家将《李秀成自述原稿》钞录副本及摄影一部分归来。

《李秀成自述原稿》是用吉字中营横条簿写的。吉字中营,是攻陷天京的曾国荃亲带的军营。李秀成被执,落在他营中,故用他营中的簿子写

①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

② 见《影印曾文正公批记李秀成供》孟森序。

《自述》。这本簿子，高一七点〇厘米，宽二七点五厘米，共七十四页，每页三十二行，每行约十四字。文中遇有没有说完的地方，就写在簿眉上或正文的旁边。

考证《李秀成自述原稿》，第一个问题是鉴定真伪的问题。一件经过反动统治者之手的历史文献，首先必须鉴定它的真伪，而这一部掌握于反革命头子曾国藩手里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尤其应该如此。

我对于《李秀成自述原稿》，是从两方面去作鉴定：一、从笔迹方面作鉴定，包括语汇、用词、语气等；二、从内容方面作鉴定。

笔迹鉴定首先要树立鉴定的标准，就是说必须先确定了真的笔迹，把它作为鉴定的标准，然后才有一个标准去鉴定那些受鉴定的文件的真伪。

案现存李秀成文件计有十六种，兹表列于下：

现存李秀成文件表^①

编 号	年月日	文件名称	收藏处所	著 录	附 记
1	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廿七日	副掌率后军主将李秀成钧谕李昭寿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有封套
2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初三日	忠王书致张洛行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有封套
3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初三日	忠王谕康玉吉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4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六月十二日	忠王覆英国教士艾约瑟杨笃信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书翰》影印	
5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忠王谕赖文光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书翰》影印	有封套
6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忠王谕容椿侄容发男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书翰》影印	有封套
7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	忠王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8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	忠王谕赵景贤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9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	忠王谕刘肇均	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国文书》影印	
10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忠王瑞批徐少莲	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排印	

续表

编 号	年月日	文件名称	收藏处所	著 录	附 记
11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廿九日	忠王书致陈坤书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刘半农编《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排印	
12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廿九日	忠王书致黄子隆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刘半农编《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排印	
13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月廿六日	忠王给凭英国洋兄弟呤喇	不详	A. F. Lindley (呤喇) <i>Tai-ping Tien Kwoh</i> 影印	
14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	忠王亲笔答辞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影印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印	
15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	李秀成自述原稿	原存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人家	台湾世界书局影印	
16	〔附〕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 ^②	忠王慕王书覆英国戈登	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太平天国书翰》影印	

表注：① 本表参照丁云青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一文附表编制（刊1957年《文史哲》第三、第四两期）。

② 此件未著年月，按书中有“白齐文（H. A. Burgevine）所带数人，因前受伤，各愿回去医治，已于初四日送南浔，令上洋船”等语，知为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所发。

上表现存的李秀成文件，连与慕王谭绍光《覆戈登（C. G. Gordon）书》一种算在内，共计十六种。其中《自述原稿》一种是待鉴定的文件。我们在这十五种之中应该选择哪一种作为鉴定李秀成笔迹的标准呢？

我们知道，文书有亲笔代笔之分。考太平天国制度，设有“掌书”、“书理”等职，专负造作文告、撰拟禀奏的职任^①，所以用李秀成名义颁布的文件，除特殊情况之外，一般说来，应该是那些专职人员撰写的。今案上面十五种文件，除十一、十二两种未见原件，也未见照片不论外，就我们辨认，现存李秀成文件，实出自多人的手。因此，断不能认为用李秀成名义颁发的文件就都是他自己写的。我们要从其中稽考出有没有李秀成的亲笔，哪

①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同职官总表》。

一种是李秀成的亲笔，必须查明根据，并且经过确凿的考证，才能够确定下来。

在这十五种李秀成文件中，原件上记明是李秀成亲笔写的只有第十四种《忠王亲笔答辞》一种。案《忠王亲笔答辞》收在《忠王答辞手卷》内。这一份《忠王答辞手卷》原是庞际云家藏，传子庞芝阁；庞芝阁没后，归其内侄李鄂楼^①；1937年春，在苏州吴中文献展览会展出，现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此卷末庞际云跋说：

同治甲子六月，湘乡伯克复金陵，生擒忠酋李秀成。湘乡侯相自安庆移节东下，李廉访鸿裔与际云实从，奉委会鞠。其忠酋供一册，已进呈御览。其时对簿复有数纸，亦可备考。第一纸乃湘乡侯相手书，其中小注则际云随讯随录。第二纸乃忠酋口操土音，语不可解，际云令其自书者。第三纸乃际云手录之供。第四、五、六纸则李眉生廉访奉湘乡侯相之命，问辞供辞均已分晰注明矣。辛未八月装演〈演〉成卷，嘉平立春日际云谨识。

案“湘乡伯”称曾国荃，曾国荃封威毅伯。“湘乡侯相”称曾国藩，曾国藩封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此份文件全文共七纸：第一纸是曾国藩手写问辞及庞际云注录李秀成答辞，第二纸是李秀成亲笔答辞，第三纸是庞际云录李秀成答辞，第四、五、六纸是李鸿裔录曾国藩问辞及李秀成答辞，第七纸是庞际云跋语。考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廿七日记道：

傍晚倦甚，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

曾国藩所开的问条，便是这份手卷里面第一纸曾国藩所写的问辞。我们把这一页曾国藩手写问辞和他的《手书日记》字迹对照，也确实是曾国藩的手笔（参看图一）。至于庞际云、李鸿裔两人被曾国藩委派会鞠李秀成事，具见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贼酋分别处治羸筹善后事宜折》，其中说：

① 据李国瓌《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见《学风》第七卷第五期。案李国瓌是庞际云儿子庞芝阁的内侄，李鄂楼是他的从兄。

其

早候後与沈東指之卷中涉及諸君文體圖符一局与這
卷諸兄等十餘人己刻之睡約一時許午在陸軍吃飯
沈東指片一梓寄寄于主海島前在黃島以陳船仙等
未出散天氣甚熱又五竹屋中睡中正堂紀澤兄信一併閱
批稿十餘件与沈東指二后及兄弟等三張紙有三書前
生來在飯後再与沈東指沈東十官而探充信重匯天

信一摺成列挂車品備前又与若多書一紙早晚

附記

札教人志揚殉難少遺難 他非活

。取信志王許信

。哥信王王座戶家信信多口被家

通新名望實地

周歷城內各處

咸亨二年九月方里家鎮信信燕王軍已細

所被信文生船上少越多何以括燕王信燕王已

定奉已細已年而後封信燕王

林能詳形咸亨二年五湖洋戰其久并其年

顧其隆何年得封車王

曾文養与林能詳同到湖南死於岳州其人皇武

有在宋深何以林能詳推心

林鳳祥打平死於連鎮李開方反不封官也林能詳

年死於九江何以後來林鳳祥大稱亦不封官也

信王林能詳文托勤王皇何年進封的

1. 忠王答辭手卷第一紙 2. 曾國藩手寫同治三年六月廿六日記

圖一

李秀成之就擒也……臣二十五日甫至金陵亲讯一次，旋派候选道庞际云、候补知府李鸿裔、候补同知周悦修等鞠讯累日。

这份文件的原藏者、题跋者和要李秀成写亲笔答辞及注录李秀成答辞的人，便是这一个候选道庞际云。而写第四、五、六纸问辞和答辞的人便是候补知府李鸿裔。又考曾国藩《贼酋分别处治羸筹善后事宜折》说：

据李秀成供……李世贤系李秀成堂弟，与之约定八月以前则掳江西之粮以救侍党之饥，八月以后全数回甯，图解长围，则掳宁国之粮以救金陵之饥等语。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

案第五纸李鸿裔所录李秀成答辞有两段话说：

侍逆各党之甯江西，乃李酋所使。八月以前则就江西之粮，八月以后仍复回甯，则徽、宁、句、溧一带秋稻熟矣。其意仍在回顾南京之粮，而不思甯楚、甯粤也。官军多杀两广人，则贼氛愈团结不散，军务永无了期。

我们把上面曾国藩奏报清廷的话来对照，便知道他是据自这份文件里面李鸿裔所录李秀成这两段答辞说的。

根据上面对文件来源、曾国藩笔迹、文件内容等等方面的考证，都证明了这一份《忠王答辞手卷》的真实性，而保存在这份手卷内的李秀成亲笔答辞确是李秀成的亲笔字迹。

但是，我们为这一份作为鉴定李秀成笔迹标准的文件《忠王亲笔答辞》的真实性愈益坚固，使人确信无疑起见，还得再从多方面去作检查。

首先要追问：这一个审问李秀成和监杀李秀成的反革命分子庞际云为什么要保存李秀成这一张亲笔答辞？案《忠王答辞手卷》除第七纸庞际云跋文外，本身“讯”“供”共六纸，在这一份文件里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如果庞际云把第二纸《忠王亲笔答辞》去掉，则“讯”和“供”便对不起头来。就是一般人还不会这样做，以曾经做过刑部秋审处的庞际

云^①，是更不会把本来完整的一套文件搅成残缺不全以示人的。这就是说：庞际云并不是为要保存这一张《忠王亲笔答辞》而保存，而是为了要保存完整的一套文件而不得不附带地把它保存下来的。但是庞际云为什么要把这一份《忠王答辞》装潢成为手卷而保存起来呢？据他自己在跋语里说，是为了“备考”起见。他说得好像是说要保存资料而保存的。其实这只是门面话，他的真正企图实在是要炫耀他的“奉委会鞠”，做过曾国藩的帮凶身份罢了。庞际云为要炫耀他的帮凶身份，所以才保存《忠王答辞手卷》；而为了要保存《忠王答辞手卷》这份文件的完整，所以不得不附带地保存了这一张《忠王亲笔答辞》。

庞际云是曾国藩的帮凶，庞际云会不会帮助曾国藩伪造李秀成的笔迹呢？提问题的人这样想：曾国藩伪造了《李秀成自述》，庞际云又把这一张同出自一个伪造者手笔的所谓亲笔答辞保存起来，预备万一有一天清朝皇帝追究时，拿出来与伪造的《李秀成自述》互为奥援。这完全是一个主观的想法。我们可以从庞际云装潢和题跋这一份手卷的时间和手卷的内容两方面，说明这一个想法没有丝毫的事实作根据。先说手卷的装潢和题跋时间。庞际云在跋文里说：“辛未八月，装潢〈潢〉成卷，嘉平立春日际云谨识。”案他所说“辛未八月”，即清同治十年八月；“嘉平立春日”即清同治十年十二月廿六日立春。据此知道庞际云把这一份文件装潢成卷是在清同治十年八月，加跋语是在同年十二月廿六立春日，上距清同治三年六月李秀成被俘之日已经七年之久，而下离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之死^②不过一个多月。又案曾国藩于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杀害李秀成后，他奏报清廷。清廷得了奏报，在七月十四日就命令曾国藩“将‘李秀成供词’及夺获伪印等物赍送军机处备查”。^③曾国藩并没有遵从清廷的命令，他在初七日已经把删改过的《李秀成自述》送军机处。后来清廷看了他在《李秀成自述》后面的附记，知道是删节本，又下谕叫他全部细钞，不要节录，咨送军机处。曾国藩接到清廷命令，把删节的十要十误和“防鬼反”一段于清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补呈清廷。以后清廷即不再向曾国藩追问。假使这一张《忠王亲笔答辞》与《李秀成自述原稿》都是曾国藩等所伪造，而其目的是为互为奥援

① 据曾国藩《贼酋分别处治筹善后事宜折》。

② 据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卷四，同治十一年记事。

③ 见钞本《求阙斋奏稿》。

的，那么，庞际云便应该在曾国藩把《李秀成自述》钞本送军机处的时候，即清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便装潢成卷，至迟到同月十四日清廷下谕命令曾国藩将《李秀成自述》进呈的时候就必须赶紧装潢成卷，以预备做所谓互为奥援的勾当。但庞际云并不在此时装潢成卷，却在清廷已经不追问，并且经过了七年之久，直到曾国藩将死的时候才加以装潢，并加跋语，这正说明了庞际云之所以要保存这一份文件，完全不是为着要对付清朝皇帝，而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帮凶身份而已。

就手卷内容方面来说，如果这份手卷与《李秀成自述原稿》都是曾国藩等伪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应付清廷追查时可以拿出来交给清廷查看，以互为奥援，那么，在这份手卷里面就断不会反有暴露曾国藩欺骗清廷的地方和曾国藩的丑态的地方。这一点，是大家都共同理解的。现在，请翻看一下这份手卷的内容，就看出了暴露曾国藩极大的欺骗与丑态。如第六纸李鸿裔录曾国藩问：“破城时城中尚有若干人？”同纸，李鸿裔录李秀成答辞说：

城破时，城中不过三万人，除居民之外，**贼兵**（尔纲案“**贼兵**”两字，乃李鸿裔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改换了李秀成的词语，并非李秀成的本来词语）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

考曾国藩以五万大军围攻天京，在清同治三年正月廿一日攻陷天保城后，即把全城合围，断绝接济^①，开掘地道三十多处，分道进攻，都被太平军堵破。合围了半年之久，“伤亡极多”，直到全军“筋力将疲”的时候，攻陷了地保城，离城墙不过十多丈，再在此处掘地道埋地雷进攻，并靠猛烈的炮火日夜不断地向城内轰击，使太平天国守军立脚不住，无法堵破地道，才把天京攻陷。^②可是天京城内太平军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到城陷之后，除了当天晚上大队一千多人跟随忠王保护幼天王从太平门城缺冲出之外，随后从城上四面缒下出走的还有很多。据赵烈文在攻陷天京后七日的日记述他亲见的情况说：太平军“死者寥寥”。当时曾国藩为了要掩罪

①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二月初八日记，及曾国荃营中的李作士、王必昌给少岩信。

② 据曾国藩《克复金陵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

图功起见，他只好夸大敌人的力量，铺张他的战绩，以便向主子陈报他的汗马功劳。因此，他向清廷驰奏《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里面，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

奏为克复金陵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恭折详细情形仰祈圣鉴事……城破后……两广、两湖、江北多年悍贼，十七、十八等日……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餘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餘名，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

据上引《忠王答辞手卷》李鸿裔所记李秀成的话，并参证镇江英国代理领事亚德金(Adkin)在天京失陷后六日到南京调查，向英国外务大臣罗塞尔(Russell)的报告所说：“我可断言，在南京将陷落的时候，城中的太平军不多。……我估计有一万人与清军五万作战”的话^①，可以确切知道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即使全部牺牲，也不过一万多人罢了；而况城陷后保护幼天王冲出的有一千多人，还有从城上四面缒下的。太平军被杀的实在很少，哪里有曾国藩所说：“三日之间”，杀了太平军“共十餘万人”的事！我在拙著《曾国藩奏报攻陷天京事考谬》一篇考证里，证明曾国藩奏报此事的虚谬，就以这一份《忠王答辞手卷》里面李鸿裔所记李秀成这一段话为最主要的证据。那么，假使这一份文件是曾国藩等伪造，拿来与所谓伪造的《李秀成自述原稿》互为奥援，预备对付清廷的追查的，请问：曾国藩会在这一件特地作伪以作证明的文件里面，不打自招地自己暴露出他对清廷最大的欺骗吗？

又如在第六纸上李鸿裔所录的曾国藩问辞中有一条问道：

城中窖藏金银能指出数处否？

这一条问辞已圈去，当是后来庞际云装潢成手卷时，觉得这是一件会被嫌疑的事，所以圈去的。从前著录者都没有把它著录出来；1953年我得见

① 请参看拙著《曾国藩奏报攻陷天京事考谬》。此文收在拙著《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一书内。

原卷，始把它补录。案当时反革命分子纷传天京“金银如海”，清廷正垂涎着；而天京陷落之后，全部被曾国藩军队抢光搜光了，清廷却完全落空。曾国藩不得不向清廷辩解说：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常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以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储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谕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料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①

曾国藩在此奏中，向清廷陈述天京并无圣库，李秀成所得银米都尽数散给部下，说了天京毫无积蓄。又自己提出“窖金”问题，并且说曾经下令：“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他在奏稿里面，委婉曲折地陈说，企望清廷对天京财富一事不再追究，他是竭尽了他生平作奏折的伎俩的。但是，尽管曾国藩怎样地辩解，都不可能取得清廷的相信。曾国藩答复他的朋友郭嵩焘的信也说：“金陵储蓄之奏，措辞诚多未善。”^②就是说他的撒谎说得不好，无法取得清廷的相信。但是在此文件中，曾国藩自己却要向李秀成追问窖金，要李秀成指出城中窖藏金银的地方。假使这一份文件是曾国藩等所伪造以与所谓伪造的《李秀成自述原稿》互为奥援，预备对付清廷的追问的，请问：曾国藩会在这一件特地作伪以作证明的文件里面，自己暴露出这

① 见曾国藩《贼酋分别处治筹善后事宜折》。

②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复郭筠仙中丞》。

一件大嫌疑吗？

经过上面的检查，我们大家对这一份作为鉴定李秀成笔迹标准的文件《忠王亲笔答辞》的真实性，是可以确信无疑的了。因此，要树立李秀成亲笔字迹的标准，只有这一种《忠王亲笔答辞》最为确当。案《忠王亲笔答辞》共二十八字，说：

胡以晄即是豫王；前是护国侯，后是豫王。

秦日昌即是秦日纲，是为燕王。

今将湘乡曾家所藏《李秀成自述原稿》字迹来与这一份《忠王答辞手卷》中《亲笔答辞》对照，正可以辨认是同出自李秀成的手笔（参看图二）。

其次，从语汇、用辞、语气等地方去考察。看出《李秀成自述原稿》有它的特殊语汇，并运用一些广西浔州、梧州一带的方言，例如：

（一）格、格而 “格”作“更加”解，“而”助词。如“度日不能，度月格难”；“格而深信”；“格而不信”。

（二）其各 《李秀成自述原稿》说：“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到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其各易办”；“其各肯从成此事”；“其各记话而从”。案“其”字忠王用作第三身代名词，“其各”连作一个词汇颇费解。体会文意，似应作“他们各人”解。至“其各”读音，我疑与客家方言有关。曾请教过一位客家同志，据说客家方言称第三身单数的读音作“极”，这是一个在“渠”与“其”之间的音；称第三身众数作“极丢”，也有些似“其各”的音；但是否从客家方言写出来的词汇，未能肯定。这一个辞汇，还应该加以研究。

（三）少何 “少何”作“少有”解，如“自成知情之事，俱一全登，少何失漏”。

（四）押制 “押制”作“掣肘”解。如“押制翼王”；“有安、福王押制”。

（五）揣咨 “揣咨”即“揣度”，如“揣咨来情”。

（六）好惜 “好惜”即“可惜”，如“尔忠王本事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

胡以旣即是豫王前是護國侯
後是豫王

秦曰昌即是秦曰綱是為
燕王

1. 忠王亲笔答辞真迹

图二

廿四日。其武都立國。其
 公而。無聞。我之。然後。再。其
 我。等。議。直。惟。一。曾。師。之。兵。何。某
 之。勢。銳。精。之。雄。言。致。家。在。我。不
 行。天。王。又。多。有。捧。照。某。權。詔。云
 詔。追。收。京。城。何。故。保。發。行。不。意
 致。有。交。重。任。而。知。服。法。石。若。不
 得。不。行。是以。計。議。調。抽。女。王。至。下
 而。未。至。通。如。此。無。心。在。楊。縣。抗
 事。概。交。將。任。我。官。理。連。來。會
 中。親。概。交。主。為。信。表。我。恩。忠
 有。長。言。不。了。元。領。到。位。師。所。受
 李。好。軍。一。校。此。等。政。條。一。共。指。三。方

2. 李秀成自述原稿真迹的一页

图二

(七) 契爷 “契爷”即“干爸”，如“张国樑与向帅拜为契爷”。

(八) 定叠 “定叠”是把要做的事情完全办妥了的意思，如“过齐到金山，齐兵定叠”。

《李秀成自述原稿》所用的代名词也颇特别。第二身用“尔”，如“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第三身用“其”，如“其在家时”。案“尔”字古代用做第二身代名词，《论语》：“惟我与尔有是夫”。但客家方言也同以“尔”字作第二身代名词。考太平天国广西起义群众大多数是客家人。《李秀成自述原稿》用有简体字，写通俗的文体，正是遵守太平天国反对“古典之言”的文化政策；他断不会用古典的字。而从他不用“汝”字或“你”字看来，他可能是客家人，所以用客家方言的“尔”字做第二身代名词。浔州、梧州一带称他人作“渠”，“渠”“其”音近；又客家方言称第三身单数作“极”，其音在“渠”“其”之间，故李秀成写作“其”。“其”字等于语体文“他的”，是第三身代名词所有格，李秀成用做主格是不合文法的，但在他全部《自述》看来，却成为特殊的用字。据上录看来，《李秀成自述原稿》是有它的特殊语汇和运用了一些广西浔州、梧州一带的方言的。这些地方，就是懂得浔州、梧州一带方言的人，还需要细细地去体会，而况曾国藩！即使他囫圇吞枣地知道它的大意，也很难于懂得它的语源，更断断不是他所能伪造的了。这也是一项证明《李秀成自述原稿》真实性的根据。

以上是从笔迹方面，包括语汇、用词、语气等的鉴定。现在再从内容方面去作鉴定。

内容方面的鉴定，是文件的阶级性质的鉴定。一部《李秀成自述原稿》，显示出了对鉴定它的真实性至有关系的几项重要内容：第一，《李秀成自述原稿》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强烈的革命感情；第二，《李秀成自述原稿》记载了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业绩；第三，《李秀成自述原稿》对反革命诬蔑太平天国杀人放火的恶毒宣传，用事实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第四，《李秀成自述原稿》总结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关于第二、第三、第四这三项，读过《李秀成自述原稿》的人都知道，惟第一项应加以说明。因为李秀成在《自述》里面，为了要达到他的政治企图，避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起见，不得不写了许多伪饰的话。泛泛看过去，似乎在词语上甚至内容上他的立场都变了。要是仔细检查，他的文字

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如《自述》开端说：“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李秀成就坚定地不写清朝的纪元，遵照太平天国的制度用甲子纪年。又如《自述》中处处以“天朝”与“清朝”、“天朝官兵”或“我兵”与“清军”对称；就是到了最后在曾国藩提出的“招齐章程”里，也仍然是以“我京城”与“贵营”、“我兵”与“尔兵”对称。凡太平天国攻克的地方都大书作“克复”，而被清兵攻陷的地方则作“失”或“失守”。这些地方都是十分显著的敌我分明的坚定的立场的表现。要明白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我们还应该和当时的叛徒的书法去作比较研究。例如在天京失陷之后，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奖王陶金会在江西向敌人谈判投降时，就在给敌人的文书上写了清朝纪元“同治三年七月”，就把称谓清皇朝的“钦命”、“国法”高抬四格，就自称为“伪听王陈炳文”、“伪宁王张学明、奖王陶金会”，就骂太平天国为“广西贼匪猖乱”，就骂太平天国的军营为“贼垒”。^①李秀成在囚笼之中，竭力要避免对敌人的刺激、招致敌人的疑忌的时候，在《自述》的字里行间还掩藏不住他一贯的敌我分明的坚定立场，而叛徒则在向敌人谈判的时候，就完全变了立场。在这样一个鲜明对比之下，最充分地最具体地说明了李秀成的阶级立场。又如叙金田起义说：“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首先明确了阶级对立。又如叙述叛徒郅永宽等在苏州叛变说：“这班反臣不义”；如叙述青浦得保说：“幸此将可嘉”；叙嘉兴不失说：“幸将兵合力”；这些地方，显然包含着强烈的革命感情。至于“起义”这一个光辉的语汇，在《自述》中屡屡写上；就是在“招齐章程”的第一条里，也还同样地写上。我们又读他在郅永宽等叛变之前对他们的训话说：“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

① 见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奖王陶金会致清朝浙江提督鲍超禀，原件存故宫博物院。案《李秀成自述》中有一句“擒匪作乱，举手而平”的话，与叛徒陈炳文等所说“广西贼匪猖乱”完全不同。因为李秀成所说的“擒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面扰害人民的分子。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我天国坏者一李昭寿，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害起”；又说，“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其中所说的“招得张乐行之害”，就是指蒙、亳起义群众里面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说的。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至于李秀成在《自述》中指出这一件事，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因为当时蒙、亳群众起义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李秀成不得不利用这一件事来诱动曾国藩。这就可见李秀成这一句话的含义、用意与叛徒们所说的话丝毫没有相同之处。

投乎”！这一个声明，就是明白地坚定地表明了他的阶级立场。又如在向敌人提出“招齐章程”的时候，他说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又说：“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李秀成一再向敌人显示出人民的力量，迫使敌人不得不放下屠刀，以图暂时保存革命的力量，也仍然是完全站稳立场。而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在这一段话里面，李秀成就把自己称为“罪将”，并且一连写了五处。我认为这一个地方我们必须十分细心去体会。首先要体会李秀成向曾国藩自称“罪将”，是不是向曾国藩低头说，罪在革命革错了呢？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李秀成在写了第一个“罪将”之后，他立刻就对他自称这两个字加以说明道：“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固〈国〉，〔致〕其害民，皆我之罪也。”他自认的罪只是不能保卫太平天国，与国破身俘之后，不能指挥自己的军队；他完全没有向敌人低头认罪。其次，我们还要体会到李秀成在向敌人写这两个字时的委屈沉痛的心情。他在写这一段“招齐章程”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写这两个字。到了写这一段“招齐章程”，在总叙里他写上了第一个“罪将”；“招齐章程”第一条劝曾国藩不杀两广人，第二条谈收他的儿子，第三条谈收他的堂弟李世贤，第四条谈收他的部众，第五条谈幼天王，第六条和第七条谈具体办法，他都没有写；第九条劝曾国藩不要杀太平天国将兵，他才再写了一个“罪将”；到第十条劝曾国藩对中国各省远近州县乡村，都不可以杀为威，他就一连写上了三个“罪将”。这就了然可见李秀成写到他的儿子、兄弟、部众和范围比较小的天京的时候，他的心境还比较平静；到写到太平天国全国兵将的时候，他的心境迫切起来了；到写到全国人民的时候，他的心境更迫切了。这也就了然可见李秀成不是为自己的亲属、部众和一部分地方打算，而是为太平天国全国兵将，为全中国人民打算。李秀成为了要保存革命力量，拯救全国人民，向反革命头子刽子手曾国藩要求放下屠刀，而不得不忍受耻辱，忍受比万箭穿心、千刀剐骨的痛苦还大的痛苦。我们从这一个地方细细地体会起来，李秀成的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①李秀成在自述内，就是到了提出“招齐章程”时，也没有向曾国藩写上一个“降”字。曾国藩刻的《李秀成供》有两个“降”字，都是曾国藩加的。我们还必须指

① 关于忠王写“罪将”这两个字的体会，我是根据丁云青先生给我的提示写的。

出，李秀成是很讲究斗争的方式的。他解放苏、浙的事迹，处处都可以说明。李秀成在革命胜利时还如此，到身系囚笼之中，他就必须更要讲究这些手段了。他曾对曾国藩的幕僚说：“恐有违忌字样，亦烦改除。”所以李秀成在自述中，什么“老中堂”，什么“中丞大人”，什么“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什么“实见中丞大人有德之人，深可佩服，救世之人”，这都是李秀成对敌人斗争的一种手段，而断不可认为他是向敌人低头。我们不妨再检查《李秀成自述原稿》：他尽管向曾国藩故意恭维，但是他仍然坚持原则的。例如原稿第一页，第一次写上帝、天王时，都遵照太平天国定制把上帝抬四格，天王抬二格，而称谓曾国藩的“老中堂”只抬一格，这说明了李秀成对敌人虽作了适当的让步，但他却是坚持原则的。我们必须这样去体会，才能够了解李秀成的委屈曲折的心情，才能够了解《李秀成自述》的坚定的革命立场。

总之，这四项重要内容，条条都显著地表现出李秀成的阶级性，条条都说明了只有像李秀成这样的一个人站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阶级立场的人物，才写得这样的一部《自述》，而断断不是反革命头子曾国藩所能伪造出来的。

接着，我们要指出《李秀成自述原稿》里面有揭露曾国藩冒大功的地方。今所见湘乡曾家所藏《李秀成自述原稿》里面，除了撕毁的部分不可考外，在现存部分还有一条对曾国藩极有妨碍的地方。这条记载，就是李秀成自述被俘的实情。湘乡曾家藏《李秀成自述原稿》记道：

这邦〈帮〉百姓密藏于我。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两家并争，因此我而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末。

我们对照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却把这一段话改为：

那〈这〉帮百姓密藏于我，那帮百姓得我宝物……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

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被两国〈个〉奸民获拿”七个字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情况完全两样的八个字呢？因为清廷要消灭太平天国第一件大事是要捉

李秀成，以“绝其根株”。^①赵烈文在日记里论这一件事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捉不到李秀成，就好像考试交不得卷。^②因此，曾国藩及其走狗捉到了李秀成就可以向清廷报大功；如果捉不到李秀成，就有罪过；如果捉到李秀成，而捉获李秀成的不是他的部下，他也就没有功。所以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六月廿三日上奏的《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里就向清廷虚报说：

伪忠王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萧孚泗亲自搜出。

案萧孚泗是清福建陆路提督^③，曾国荃围攻天京时部下最高的一个将领。曾国藩奏报李秀成被俘是萧孚泗亲自搜出，这就是说李秀成的被捉，是曾国藩自己和他的走狗的功劳。现在，李秀成在《自述》里明白说他是被两个奸民捉送到曾国荃军营的，而不是曾国藩的走狗捉获的。如果照这句原文钞送给清廷，曾国藩不但得不到功，却恰恰揭穿了他的欺骗，他还有欺君之罪。因此，曾国藩对这几个对他极有妨碍的字，就势必非改去不可。我们从这一件事可以了解到曾国藩所以不得不删改和撕毁《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原因；而曾国藩后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所以确为真本，也从这一条内容方面提供了极强有力的证明。

在今天看得见的曾国藩所改《李秀成自述原稿》里面，我们还可以举出一条曾国藩因为对自己利害有关而特意改动的地方。案《李秀成自述原稿》“天朝十悞”第十条原文本来是：

十、悞立政无章。悞国悞命者，因十悞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

曾国藩却把这一条全部勾去，改为：

十、悞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参看图三）

① 据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同治命议政王军机大臣传谕曾国藩等，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五十八。

②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记。

③ 据朱洪章《从戎纪略》。

四臣不意金林紹得去爾相授
 以明林紹得在相授
 五臣用東王之王而亦相授
 是大怪
 六臣聖王之王而亦相授
 聖王之王而亦相授
 此聖王之大
 七臣王不信外通相其身先
 死為報此亦未有不信外通
 八臣王不問政事
 九臣王不問政事
 十臣王不問政事

图三 曾国藩盗改李秀成自述原稿“天朝十侯”第十侯墨迹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改呢？这是因为他以大军围攻天京，经年累月才攻下，当时曾经被清廷屡次下旨督责，所以他就窃改李秀成这一条原稿，作为李秀成的话，说太平天国扯动各处兵马，专保天京，以见他的部队是和太平天国的主力作战的，因此久战才攻下。曾国藩这样一改，不仅可以掩盖他的无能，而且可以表示他的功劳。同时，还可以暗示清廷，左宗棠的攻陷浙江，李鸿章的攻陷江苏，是由于太平天国调动了各处兵马回来专保天京，所以他们才得乘虚攻下，这样也就压低了左宗棠、李鸿章，而抬高了自己和他兄弟曾国荃的功劳。曾国藩老奸巨猾的用心，在这一条的修改上，是怀藏着他的深意的。曾国藩对这一条的盗改，也证明了《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实性。

根据上面的考证，无论从笔迹方面包括语汇、用词、语气等的鉴定，或从内容方面的鉴定，都同样肯定了《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实性，并不是曾国藩伪造的赝品。

五 谕李昭寿书为李秀成亲笔的鉴定给自述原稿的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的佐证

到1953年增订《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三版时，我又鉴定了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为李秀成的亲笔。当时我只说了鉴定的结果，和在卷端列出李秀成《亲笔答辞》、《李秀成自述原稿》、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三种笔迹对照，而没有把鉴定的经过写出来。1956年，年子敏先生把李秀成《谕李昭寿书》和《李秀成自述原稿》、《忠王亲笔答辞》三种照片送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迹的专家去审定，认为不是同一人的笔迹。年子敏先生和束世澂先生根据这一审定，发表《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作出《李秀成自述》为曾国藩伪造的论断，引起了史学界一场讨论。我在这次讨论当中检查自己，知道作鉴定只写结果不写经过，处理得太草率了，我感到应该向读者把鉴定的经过交代明白。为此，从书法的研究上，再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我鉴定《谕李昭寿书》为李秀成亲笔书信，是在根据《忠王亲笔答辞》的字迹来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实性之后，再根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去鉴定出来的。我以《李秀成自述原稿》为根据，从笔迹方面和文笔及内容方面进行鉴定。

先说笔迹方面的鉴定。案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用笔清劲，结构整齐规矩；《李秀成自述原稿》用笔浑朴，结构倾欹跌宕；所以，如果不仔细观摩，就会认为是两个人的笔迹。但是，经过我们仔细体味之后，却看出了两者的笔意是相同的，都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请看图四。“笔意”两字，好像是抽象的东西；其实它是从具体的用笔、书法体会出来的形象，并不是抽象的东西；我们从八法去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昔人所传的八法，盛于有唐之后，说笔画的变形有八，而能适用于万字。曾经著录的专书，如宋陈思《书苑精华》、明张绅《法书通释》、明潘之淙《书法离钩》、清《佩文斋书画谱》、清冯武《书法正传》、清程瑶田《书势》，都用了不少篇幅，谈有关八法（或永字八法）的事。它们都是以楷书为对象而言的。李秀成《谕李昭寿书》是楷书，而《李秀成自述原稿》既有楷书，也有行书，可否一概绳之以八法呢？我们认为（一）如果集分书之成以为楷的伊汀洲，集隶书之成以为楷的邓顽伯，集碑学之成以为楷的张廉卿，他们虽名为楷，但并不能绳之以八法；（二）又如真、草的“回互虽殊”，不妨其“大体相涉”（唐代名书法家孙过庭语）；那么，我们谨慎地用八法去研究李秀成的“相涉”更多的楷书和行书，应该是“人无间言”的。现在，以八法分析于下。

第一，“、”侧。侧就是点。为什么把点叫做侧呢？张绅《法书通释》说：“侧，下笔使笔锋右顾，审其势而侧之，故名。若止言点，则不明顾右，无蹲锋向背之势矣。”朱履贞《书学捷要》卷上注释《书法三昧》“点之祖，蹲鸱之势，三过侧法也”句说：“三过者，三折势也。方笔为折，方者棱侧。点名侧者，点无正出也。点有尖、秃、俯、仰、三角、四角，各随字势而用之，故云侧不得平其笔。点之落笔须沈紧，棱侧、蹲鸱、坠石，喻其笔势也。”所以一般作点笔法，都落笔沈紧，从左斜顿向右。今案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与《李秀成自述原稿》“言”字作的点，落笔大都是从左起微向右，复斜顿向左直下，与一般作点笔法不同，且其点较一般人作的点为长。这是李秀成书法用笔的一个特点。请看图五。

鈞 谕

副掌事復軍王將李 鈞 谕

李王君知悉得從明堂暗閣後保忠
建耳當誠懇知時亦夫群心存是
本王將自與爾共事以來覺爾大
作不將才不傷故情爾知珍愛視
爾如子朕爾之為臣知情天必
如始終如必如意難司爾克不意爾
乃反背之人早知其悔已遲夫誠
本王將日不誤人自己愛爾後放爾
行他勸爾從善推糾爾出子反事
負我一片同仁同義之心勉姑自再

自投順

天朝試問所因何事今王將降降保不
察首因爾終大應難釋其前通久矣宜
可且顧爾首不見後意何見我

王天王侍爾不遂 本王時亦侍爾有哨果
爾行為不軌性性與州者多就商

2. 諭李昭壽書真迹上

圖四



1. 諭李昭壽書

2. 自述原稿

图五

第二，“一”勒。勒就是横画。为什么把横画叫做勒呢？张绅《法书通释》说：“谓趯笔而行，承其虚画，取其劲涩则功成矣。若止言画，虑不在趯，一出便画，则锋拳而怯薄也。”勒的笔法，初落笔锋向左急勒，回向右横过，至末复驻锋折回，其势首尾俱低，中高拱，如覆舟样，所以说“勒常患平”，又说“勒缓纵以藏机”。今案李秀成《谕李昭寿书》是以充裕的时间书写的，所以能够掌握着“缓纵以藏机”的书法去书写。《李秀成自述原稿》却是以紧迫的时间仓猝写成的，一般横书都是一出便画，未能照书法书写，但“要”字的书法，却还是照书法书写的。而最特出的地方，李秀成无论在《谕李昭寿书》中，或在《自述原稿》中，横画都特别的长，与一般人的写法大有不同，真有如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所说：“勒如千里之阵云”^①那样的雄姿。这是李秀成书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请看图六。

第三，“丨”努。努就是竖画。为什么把竖画叫做努呢？张绅《法书通释》说：“竖笔微努近左，然后趯笔下行，使不直率，故不得竖画也。”所以《法书三昧》论努的笔法说：“弩弯环而势曲，努过直而力败，努不宜直；其笔直则无力。立笔左偃而下，最须有力。”今案李秀成《谕李昭寿书》、《自述原稿》所书“努”的书法，都守着“努不宜直”之戒，取弩弯环而势曲的形势，立笔从左偃而下，写得很有力。请看图七。

第四，“丿”趯。趯就是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钩。为什么把挑叫做趯呢？张绅《法书通释》说：“趯者挑也，而谓之趯者，其法借势于努，蹲锋得势而出，期于倒收，若跳踢然。忌于平出，故不言挑也。直曰趯，横曰挑。今按《兰亭》事字是挑，殊字是趯。”又说：“趯峻快以如锥。趯宜蹲而势生。趯须蹲锋得势而出，出则暗收。”今案李秀成书趯的书法，以用横挑为多，间也有用直趯的，《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两者都同。请看图八。

第五，“ㄥ”策。策就是从左向上的斜画。为什么把斜画叫做策呢？张绅《法书通释》说：“策亦画也。不言画者，其法仰笔趯锋轻抬而进，有鞭策之势，故言策不言画。异于勒者，勒则两头下，中高，策则两头高，中下。”今案李秀成书策的书法，都揭锋右上，并且特别的长。在笔法看来，这样长的一笔，与勒的写法同。《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两者都同。

^① 见张绅《法书通释》引欧阳询语。

这也是李秀成书法的一个特点。请看图九。

第六,“丿”掠。掠就是撇。掠的书法,须劲捷锋锐,势同利刃,所以唐太宗论掠的书法说:“掠须笔锋左出而利”^①,欧阳询说:“如利剑截断犀象之牙。”^②今案李秀成书掠的书法,不取劲捷锋锐,而特别向左延长,有按帚着地之势,《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两者都同。这也是李秀成书法的一个特点。请看图十。

第七,“,”啄。啄就是右方的短撇。啄的书法,《书法三昧》说:“啄腾凌而速进。啄仓皇而疾掩。啄者如禽之啄物,立笔下罨,须疾为胜。”^③今按李秀成写啄的书法,都疾掩而出,《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两者都同。请看图十一。

第八,“㇏”磔。磔就是捺。磔的书法,唐颜鲁公《八法颂》说:“磔抑趯以迟移”^④,柳柳州《八法颂》说:“磔趯趯以开掌”^⑤,这是不徐不疾、平行舒缓的写法。另一种是短劲的书法,唐张怀瓘《石论》所说:“磔笔紧势峻,锋出意收”^⑥便是。李秀成写磔的书法,两者兼有,但即在横波之笔,仍表现出如利刃般的锋锐。《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两者都同。请看图十二。

上面从八法分析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的书法,得出了两者用笔完全相同的结论。我们知道,学书八法,在前代是童蒙必学的课程。李秀成在儿童的时候就学书法,到长大又喜欢书法。^⑦今案李秀成用

① 见朱履贞纂《书法捷要》卷上,唐太宗笔法。

② 见张绅《法书通释》卷下,引欧阳询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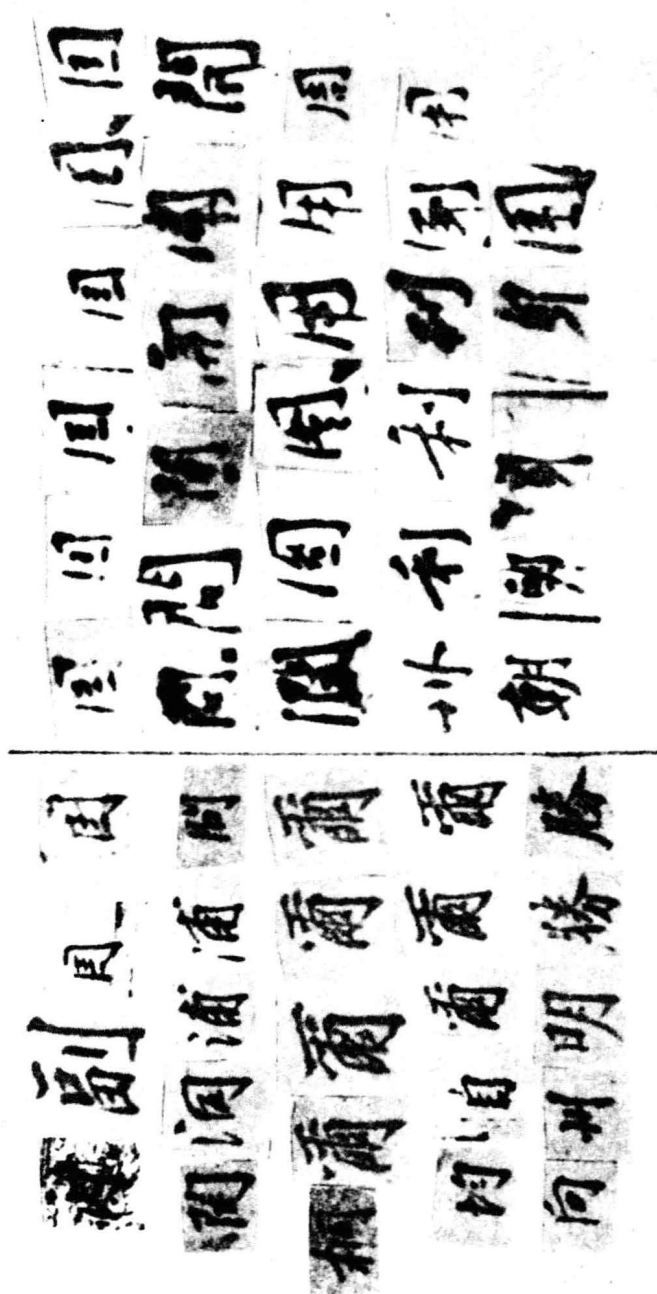
③ 据张绅《法书通释》引文。

④ 据张绅《法书通释》引文。

⑤ 据张绅《法书通释》引文。

⑥ 据张绅《法书通释》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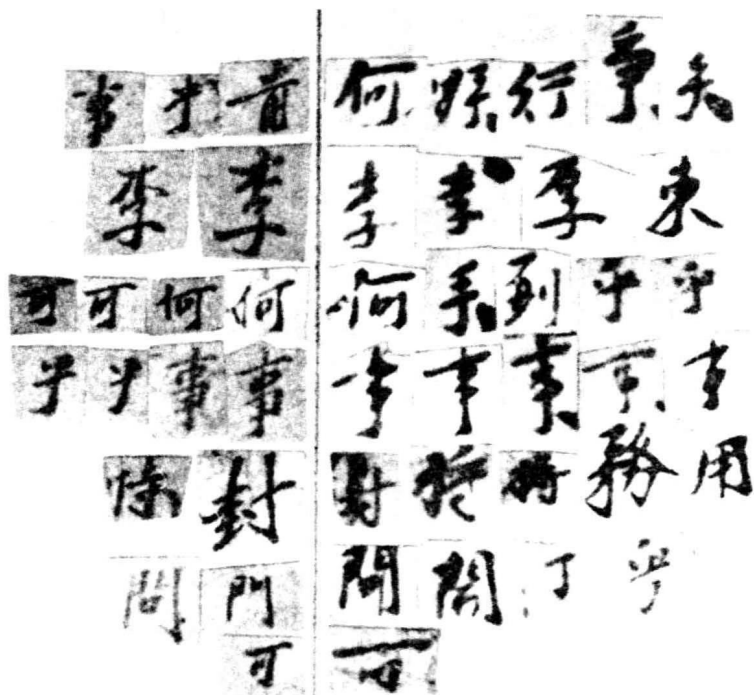
⑦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咸丰十一年(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记说:“子慎弟去年被掳四月,知苏州事,记其语。李秀成年四十馀,喜写字,人甚和气。”李秀成的胞弟李明成也喜欢学习书法。富礼赐(R. J. Forrest)《太平军的家居》(*The Taiping at Home*)记其事说:“我回忠王府吃晚饭时,见王弟正在那里临池习字。”富礼赐曾向李明成索取法帖。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李明成《复富礼赐书》说:“辱问圣钱及字帖等因……字帖中譚(纲案即“华”字)历来四大名家并十数异士各种字帖皆有,不知麾下要用者那种字帖也”(原件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据此,知道李秀成喜欢学习书法,他家中收藏有不少中国古来名家法帖,临池学书正是李秀成家庭陶冶性情的一种生活。



1. 諭李昭寿书

2. 自述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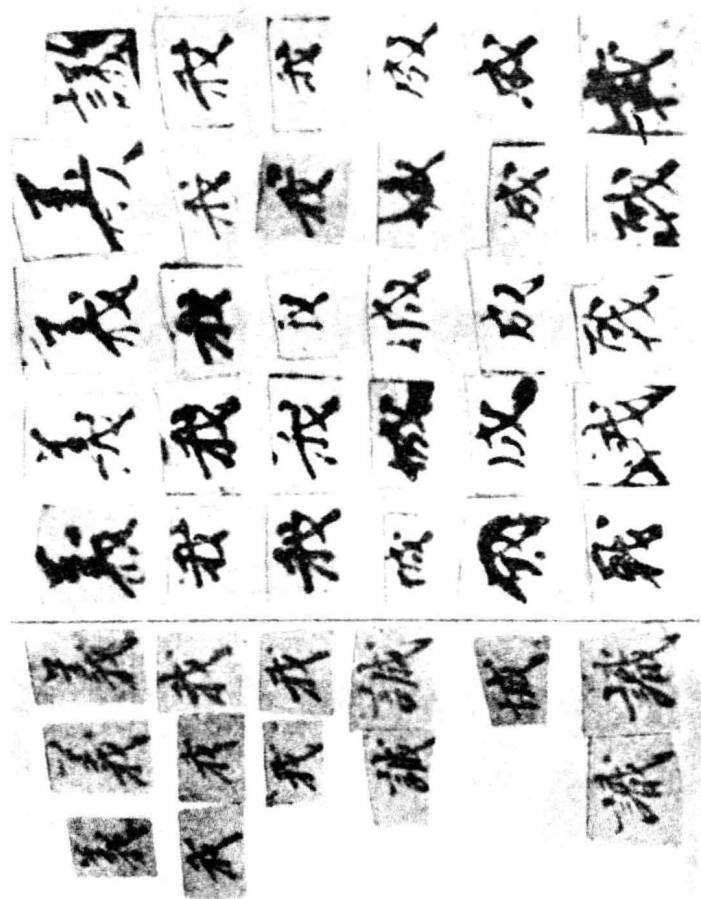
图七



1. 谕李昭寿书

2. 自述原稿

图八



1. 諭李昭寿书

2. 自述原稿

笔有照八法的，也有不照八法的。他的书法不为古人的常规所束缚，而发展了他个人的一种英气纵横的风格，这正是我们鉴定他的笔迹最重要的根据。因为李秀成的书法既不是一般的书法，它是具有特殊的风格的。《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书法的相同，就不是一般的相同，而是个人笔法特殊风格的相同。所以《谕李昭寿书》确是李秀成亲笔所写是可以肯定的。

在《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书法之中，又有几个偏旁字的书法值得注意，如：

（一）辶 李秀成写辶字书法，上两点连下磔笔，学锺书磔笔三过折笔法，起笔微仰，中则平，末则起，自然三折，有波浪之势。《谕李昭寿书》用笔严整，上两点分开，《自述原稿》用笔仓猝，上两点作一笔直下，但两者笔法都相同。请看图十三。

（二）糸 李秀成写糸字书法，第一点向左离开，第二、三两点并列在一起，《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都同。请看图十四。

（三）心 忠王写心字书法，第一点向左离开，第二、三两点一笔相连；又心字若作为某一字的下部，它的第一点一般都取势于上部迅笔向左急下。《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都同。请看图十五。

这三个字的写法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却也表现出是一个人习惯的笔法。今案《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写法都同，也就可以证明《谕李昭寿书》确是李秀成的亲笔书信。

在《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书法之中，还有一些字的书法值得注意，如：

（一）先字 李秀成写“先”字，上面一短撇都与一画连，下面一长撇都取势于上面的横画，一笔挥下，《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都同。请看图十六。

（二）而字 李秀成写“而”字，中间两竖都很直，《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都同。请看图十七。

（三）无字 李秀成在《谕李昭寿书》和《自述原稿》中写的“无”字都是行书。《谕李昭寿书》以充裕的时间书写，故比较整肃，《自述原稿》却以匆促的时间写，故比较潦草，但两者结构和笔法都同。请看图十八。

（四）罪字 案“罪”字正楷，网下非字，左边本应作撇不作竖。李秀成写这一个字，不作撇而作竖，并且比右竖短得多；在《谕李昭寿书》中写的正楷如此，在《自述原稿》写的行书也如此。请看图十九。

（五）折字等 李秀成在《谕李昭寿书》和《自述原稿》中所写“折”字等二十五个字，无论从用笔的角度或从结构的角度看来，都是相同的。请看图二十。

上面这些字的写法，也都没有什么特别，但都表现出同是一个人习惯用的笔法和结构。今案《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都同，也就可以证明《谕李昭寿书》确是李秀成的亲笔书信。

在字迹的鉴定中，最后还要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字来说：

（一）欲字 李秀成在《谕李昭寿书》和《自述原稿》中写的“欲”字都是行书，两者写法都同。请看图二十一。

（二）兴字 李秀成在《谕李昭寿书》和《自述原稿》中写的“兴”字都是写变体字。《谕李昭寿书》作“𣎵”，《自述原稿》作“𣎵”，《自述原稿》比《谕李昭寿书》少写一短撇，是更简省的写法。这一个字变体最主要的写法是“门”内作“人”，两者写法都同。请看图二十二。

这两个字的写法所以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并不是说这两个字的写法是李秀成所特创，而是因为李秀成在《自述》中是如此写，在《谕李昭寿书》中也如此写，这说明了李秀成对这两个字习惯了这样的写法。这也是一条证明《谕李昭寿书》确是李秀成亲笔的证据。

根据上面从八法的分析，偏旁笔法的分析，一些相同的字笔法的分析和行书字、变体字的分析，得出了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确是李秀成亲笔的结论。至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与《李秀成自述原稿》既同是李秀成亲笔，为什么却有差异呢？我们还在根据唐代名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里所说“乖合之际，优劣互差”的理论提出“乖合差异论”，和根据李秀成喜欢学书法，从发展观点提出“先后差异论”两个不同的看法，进行研究，一时还不能得到结论。

上面从笔迹的鉴定得到《谕李昭寿书》确是李秀成亲笔的结论。下面再从文笔与内容上去作鉴定。

第一，李秀成喜欢用叠字，《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相同。案



1. 谕李昭寿书

2. 自述原稿

图十三



1. 谕李昭寿书

2. 自述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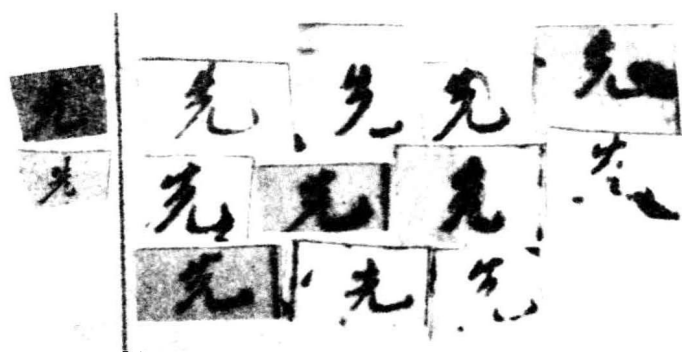
图十四



1. 谕李昭寿书

2. 自述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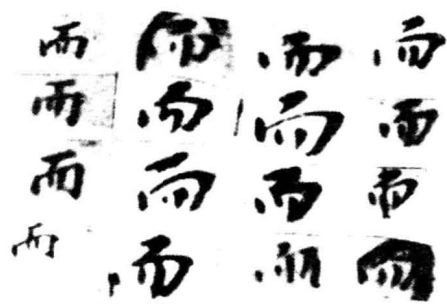
图十五



1. 谕李昭寿书

2. 自述原稿

图十六



图十七

1. 书

2. 自述

图十八



1. 书

2. 自述



图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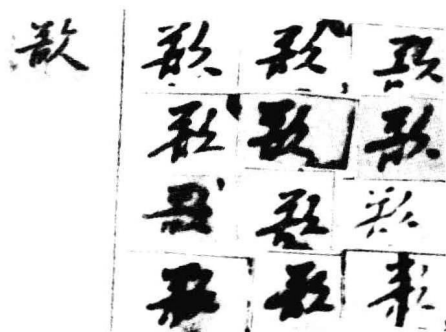
1. 书

2. 自述



1. 书 2. 自述 1. 书 2. 自述 1. 书 2. 自述

图二十



1. 书 2. 自述

图二十一



1. 书



2. 自述

图二十二

现存《李秀成自述原稿》共有六十四句用了二十七个不同的叠字，请看下表：

《李秀成自述原稿》用叠字文句表

叠字	叠字文句	句数
人人	教人人可知 到处人人恭敬 人人那时已有退缩之心矣 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之名号人人能认我李秀成者 随往文武人人失色 人人各理一事 那时人人遵称 合京人人知到 幸合朝人人与我情厚 是以人人而悉我者 人人具散 人人悉中堂中丞宽恩赦 我国人人可悉	14
事事	事事严整	1
一一	一一清白写明 一一交清 即将省内难民一一安抚 一一制造	4
屡屡讲讲	屡屡讲讲道理	1
屡屡	屡屡多言计息	1
件件	件件可悉 件件有馀 件件载明	3
严严整整	严严整整民心佩服	1
年年	年年盗贼分张	1
迷迷	故而迷迷而来	1
懔懔	懔懔而随	1
迷迷懔懔	迷迷懔懔而来	1
节节	节节连营 节节连进二郎河 九帅节节连营	3
处处	此时处处成功 处处地道近城 不能处处防也 处处喊声不绝 处处皆从	5
实实	实实无知 见事实实不能 实实无心 实实天成 实实无由 实实难行	6
密密	密密加营	1
弯弯曲曲	弯弯曲曲千里有馀	1
军军	那时军军俱到	1
湧湧	湧湧而来	1
闷闷	我闷闷于囚	1
县县	县县皆从	1
疏疏	虽言疏疏有信回报	1
日日	日日变动 日日连战 日日飞文前未 日日逼紧 日日烦燥	5
多多	我总是解粮多多回京 其药其码子存贮多多 制造多多	3
叠叠层层	本桩叠叠层层 营寨叠叠层层	2
纷纷	纷纷归队	1
个个	个个向我流涕 我营将个个可知	2
营营	营营砲发	1
总计		64

我们从上表看来，“人人”这两叠字就有十四句用了它。其中有许多叠字如“屡屡讲讲”、“密密”、“军军”、“闷闷”、“县县”、“疏疏”、“多多”等都可以不用叠字。叠字表现出一个人口语的习惯，李秀成把他口头惯说的辞汇写到文字上来，就成为他的文字的一种特点。今案《谕李昭寿书》全文只五百七十三字，就有六句用了六个不同的叠字如下：

- (一) 往往与同朝者争竞
- (二) 尔统下每每滋扰良民
- (三) 本主将事事包荒
- (四) 是人人得而诛之矣
- (五) 惟是我耿耿此心
- (六) 速速归林

其中“人人”这两个叠字，就是李秀成最喜欢用的叠字。“事事”这两个叠字，也是《自述原稿》同用。至于“速速”这两个叠字，表示出要李昭寿立刻归林的意思，与《自述原稿》中“实实”那两个叠字表示出千真万确的意思，都同样是加重的语气，也表现出同是一人习惯的口语。从《李秀成自述原稿》看出李秀成喜欢用叠字的习惯，是他的文章上的一个特点；今《谕李昭寿书》同样具有这一个特点，所以《谕李昭寿书》也是李秀成亲笔写的书信。案现存以李秀成名义发布的原文件，除《致护王陈坤书》、《致潮王黄子隆书》未见原件或照片不论外，其他如《致英国耶稣教士艾约瑟杨笃信书》、《谕赖文光书》、《谕容椿侄容发男书》、《批徐少蘧禀》、《与慕王复英国戈登书》、《给伶俐凭照》六种都无叠字。惟《谕康玉吉书》“中心摇摇”、“切切此谕”两句用有两个叠字，《致张洛行书》“缘兄与弟迢迢相隔”、“中心摇摇”两句用有两个叠字，《谕赵景贤书》“所有各郡州县在在非降即破”句用有一个叠字，《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无不在在仰体上天好生之德”、“惶惶如丧家之犬”两句用有两个叠字。但细读这四份文件句子所用这几个叠字，都是古文修辞中常用的叠字，与李秀成在《自述原稿》和《谕李昭寿书》中“事事”、“人人”、“迷迷”等叠字把口语写到文字上来的不同。此外，在《谕刘肇均书》中“必要营营相连”、“该营须要筑得坚坚固固，飞鸟不入方好”两句所用“营营”、“坚坚固固”两个叠字，却都是口语，是与李秀成的叠文相同的。但

是，经过我们仔细检查《谕刘肇均书》这一个文件并不是李秀成亲笔写的。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第三身代名词用“伊”字，不合李秀成的文章习惯。李秀成是惯用“其”字，而此文有“伊所言亦是”。至于此文在文言中夹些白话语汇，可能是李秀成添改的，如“以应二殿下隔江那边之声援，所筑之营，必要营营相连”，“并饬二殿下于对江那边……以应六王宗这边之声势”等。文中又有些是统帅对部下的要求，也可能是李秀成自己加上的，如“该营须要筑得坚坚固固，飞鸟不入方好”，“有粮即盘，妖来即剿”等。这份文件很可能是幕僚在李秀成授意之下，先拟成公文稿，李秀成再核阅添改，最后由幕僚誊录的。所以其中所用“营营”、“坚坚固固”两个叠字，很可能就是李秀成自己加上的，但这一份文件，却不是李秀成亲笔写的文件。

第二，《谕李昭寿书》用的虚字表达文义与《自述原稿》同。我们知道，虚字的作用是表达文句内应有的神情，从这些地方看得出一个人的语气。古文的虚字不是容易学得好的。李秀成只读过三年书，虽然他刻苦力学，但是由于家贫，要他做帮工和种山烧炭为生，他没有得到寒窗十载、师友切磋琢磨的学习机会，所以在他的文章里写的虚字有时就难免欠佳。兹对照《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所用“之”、“乎”、“者”、“也”等虚字的神气两者相同，欠佳的地方两者也相同。兹列对照表于下：

《李秀成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虚字文句对照表

虚字	《自述原稿》文句	《谕李昭寿书》文句
之	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 非我军犯之昧言 此非我之虚言 而责云我之不忠	本主将之前情尔既不念
乎	而何不忘我乎！ 有何人敢包我投乎？	岂忘心乎？ 尔谅知乎？
者	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 安民者出一严令 自由从者粤省数万而随 私杀害者培命，各愿投营者即在营中 打入城者鬼把城门	无奈尔行为不轨，往往与同朝者争竞 似此无常反覆岂志者所为

续表

虚字	《自述原稿》文句	《谕李昭寿书》文句
也	忌我治其之罪，故而买此王而据我也 一千三百五十名先锋打破杭郡并非人力之能也	愿尔降妖亦能实力拒我也 岂志者所为而留名迹于天下后世也
否	而知朕法否？	尔知道否？
矣	人人那时已有退缩之心矣 久知生死之期近以（矣）	辜负我一片同仁同义之心矣 悔已迟矣

我们看上表，所举“之”字的用法，李秀成在《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中同是用作前置词，等于语体文“的”字。在古文用字来说，这一个“之”字一般都可以不要，多了反觉得文气松懈。“乎”字的用法，李秀成在《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同是用来表达感叹或疑问的情意，在修辞说来都欠佳，但正可以看出同是一人的语气。“者”字的用法，李秀成在《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同是作代名词用，等于语体文“的人”的意义。这一个字在古文有时可以省去，例如《谕李昭寿书》中“往往与同朝者争竞”的“者”字文法是通的，但多此一字读起来觉得生硬，不如省去反为精炼；今与《自述原稿》对照，知道李秀成文章在这种地方一般都用这一个字。“也”字的用法，李秀成在《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同是作语尾词，表达断定的意义。我们对照所举李秀成在这两个文件中所用“也”字的两条例子，虽然所论的事是不同的，但因都表达同样或类似的断定的意义，就不仅是“也”字用法相同，就是在这一个句子中其他与“也”字有关的几个字，如“拒我也”等语气也相同。“否”字的用法，李秀成在《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中同是作副词用，所举《自述原稿》“而（尔）知朕法否”与《谕李昭寿书》“尔知道否”的两条例子，不仅两个“否”字的用法全同，而且两者的语气和用辞也都相同。“矣”字的用法，李秀成在《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中同是作语尾词，表达出一种完了的意义。从所举“之心矣”一句话对照，不但“矣”字用法相同，而且与“矣”字有关的几个字也相同。以上所举各字对照的例子，说明了只有出自一人的文笔，才会有这样的相同。

第三，《谕李昭寿书》用字用辞有与《自述原稿》相同的地方。用字用辞属于修辞的工夫。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各个人的文笔。兹将《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相同的用字用辞列表于下：

《李秀成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用字用辞对照表

字 · 辞	《自述原稿》文句	《谕李昭寿书》文句
谅	谅可久悉矣 满士谅有传声	谅知情义 尔谅知乎
速	各速买粮 不能速去	尽可速速归林
爱将	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是我手上爱将	自己爱将
诛之	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	是人人得而诛之矣
思之	请东王思知〈之〉	尔自思之

按上表所举“谅”、“速”两个字，和“爱将”、“诛之”、“思之”三个辞，李秀成在《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中都用得相同。李秀成用“谅”字是表示一种揣测的意思。经过两种文件的对照，才知道他是习用了这一个字，所以他在《谕李昭寿书》中间李昭寿“尔谅知乎”那一句话所问的事件，全是李昭寿所知的，但他还是用了这一个“谅”字。李秀成在《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中同是用“速”字。他可以用“快”字，或用“迅”字，或用“立刻”等字，但他却都不用，而用“速”字，这也说明了“速”字是李秀成习用的字。“爱将”两字，虽不是李秀成所创用，曾见于史传^①，但李秀成说到人与人间的亲密关系时喜欢用“爱”字来表示，如在《自述原稿》中说：“蒙得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爱臣”，如说：“陈炳文与我至爱”。他不作“宠臣”而作“爱臣”，不作“至好”而作“至爱”，都可见李秀成喜欢用“爱”字表示这种关系。所以他在《自述原稿》中称谭绍光是他的“爱将”，在《谕李昭寿书》中也称李昭寿为“爱将”，可证同出自李秀成本人的手笔。至于《自述原稿》说的“合朝诛之”、“请东王思之”，《谕李昭寿书》的“人人得而诛之”、“尔自思之”等，辞意也都相同。

第四，《谕李昭寿书》用“尔”做第二身代名词与《自述原稿》同。案《李秀成自述原稿》用客家方言的“尔”字做第二身代名词，《谕李昭寿书》也一律以“尔”字做第二身代名词。全文只五百七十三字，就用了二十七“尔”字。兹择录几句对照于下：

① 《晋书》四十三《列传》十三《山简传》说：“疆家在并州，简爱将也。”《新唐书》一百四十七《列传》第七十二《李元素传》记事也有以“爱将武金掠服之”的话。

《李秀成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尔字对照表

《自述原稿》文句	《谕李昭寿书》文句
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 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 尔是两湖之人，皆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 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 尔意欲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	本主将自与尔共事以来，觉尔有大作为，将才不俗，故惜尔如珍宝，视尔如手足。揆尔之为人，谅知情义，必知始终如一，必知患难同当。竟不意尔乃反骨之人。早知其如此，悔已迟矣。我主天王待尔不薄，本主将亦待尔有情，无奈尔行为不轨，往往与同朝者争竞。尔统下每每滋扰良民，以致军民怀怨。但尔若在天朝，本主将事事包荒，尔知道否？

我们看上表所列《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对照，在一个句子之中连续地用了好几个“尔”字，不但多用“尔”字相同，而且语气也相同。这就因为李秀成是用对话的口语写到文字上来，活像在指着对方数说一样，所以左一个“尔”字，右一个“尔”字，连续地用了许多“尔”字。这一种语气，表现出了一个人说话的习惯，也表现出了一个人说话时一腔急迫的指责对方的神情。今案《谕李昭寿书》与《自述原稿》都相同，也可以证明《谕李昭寿书》确是李秀成写的亲笔信。案现存以李秀成名义发布的原文件，除《致护王陈坤书》、《致潮王黄子隆书》未见原件或照片不论外，其他如《谕康玉吉书》、《致张洛行书》、《致英国耶稣教士艾约瑟杨笃信书》、《谕赖文光书》、《谕刘肇均书》、《批徐少蘧禀》、《与慕王复英国戈登书》、《给呤喇凭照》八种都不用“尔”字。惟《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谅尔一带人民”、“恐尔人民惊恐”、“仰尔尚海松江一带人民兵勇知悉”、“尔等试看我师一路而来”四句用了四个简体的“尔”字；《谕赵景贤书》“尔我之雌雄易决”、“谅亦尔所闻知”、“尔自度湖郡之视杭省果何如者”、“尔如念及民众”、“亦可无害尔身家”、“总在尔自裁决”、“因尔我同是汉人”七句用了七个“尔”字。但细读这两份文件，第一，用的“尔”字不多；第二，不是把口语写到文字上，而是出自古文；第三，“尔”字为公文常用字，这两份文件都是公文，所以与《谕李昭寿书》不同。至于《谕容椿侄容发男书》共用九个繁体“尔”字，一个简体“尔”字，与《自述原稿》与《谕李昭寿书》都同是把对话的口气写到文字上来，并且也算用得，但这一封信，检验它的笔迹、文气都不是李秀成亲笔写的，从它的字体端正，笔笔不苟，但

书法却不佳，文笔也不好，看来是李秀成的亲属根据他的话来代他写的家书。当时李秀成正指挥军队围攻杭州，因为军事倥偬，所以要人代笔，这封信也不是他亲笔写的信。

第五，《谕李昭寿书》中用有广西浔州、梧州的方言。李秀成是广西梧州府藤县长恭里新旺村人。《谕李昭寿书》中有广西浔州、梧州方言，如：

（一）反骨 “竟不意尔乃反骨之人”，案“反骨”即反复无常，这是广西浔州、梧州一带方言。案《三国演义》也记有诸葛亮说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的话。

（二）包荒 “本主将事事包荒”，案“包荒”本《易经》中用语，作包容解。现在广西浔、梧有些地方有这一个方言，作包庇解。

有人以为“反骨”既同见于《三国演义》，“包荒”既出于《易经》，就不见得一定是用的方言，也就不见得一定是李秀成所写。这是不对的。因为假使这封信确是一个非广西浔州、梧州籍的文人写的，案之当时文人的作风，是看不起演义小说的，既引用了经典著作的《易经》中的“包荒”，就断不会引用演义小说中的“反骨”。而况“包荒”一辞，在浔、梧方言说来，是一听就懂的口语，而在古文辞看来，却是一个难懂的辞汇，所以清代学者王引之在他的名著《经义述闻》中列为专条训诂，用了二百三十一字才能把它解释得通^①，可知这个辞不是一般文人所能引用得来的。我们从这一封信的文笔看来，正说明了这一个辞语是一个对文言文还是半通不通的人把方言写到信上来的。至于“反骨”这一个方言，在广西浔、梧一带真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的口语，李秀成把口头说的话，写到他的夹有白话语汇的信上来更是自然的了。我们知道，在广西浔、梧一带保存有一些古代的辞汇和与小说上相同的辞汇，例如“畀”字是一个古字，见于《书经》、《诗经》，作“赐”字、“与”字解，即等于现代语的“给”字，但我的家乡广西贵县

① 见卷一。案曾国藩《复胡宫保书》说：“不可互相奖饰，互相包荒”（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曾国藩自称他“最好高邮王氏父子”（咸丰九年四月廿一日《谕纪泽》，见《曾文正公家训》卷上），又说：“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谕纪泽》，同书卷下）。他用“包荒”二字，便是从王引之《经义述闻》训诂得来，与李秀成用方言不同。

(清代属浔州府)说把东西给人家,不是说“给你”,而是说“畀你”,在贵县的方言中仍保存着古代这一个语汇。又如从前有人研究《醒世姻缘传》中“魔驼”一辞的意义,费了很大工夫,先搜集全书中同样的句子,然后用归纳的方法去归纳出作“迟延”的解释。我看了不觉失笑,因为我家乡的老太婆就常常用“魔驼”这一个口语去教训工作迟延的年青人。假如有一个贵县人像李秀成的文笔水平那样也去写一封半文不白的信,把他口语说的“畀”字和“魔驼”这一个方言写在信上,你能说他是从《书经》、《诗经》和《醒世姻缘传》引用出来的吗?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中用“包荒”、“反骨”这两个方言正是同样的情况。又有人说李秀成《谕容椿侄容发男》信中不是用有广西浔、梧方言的“和雉”、“铺派”吗?为什么不能作为李秀成亲笔的证据,而《谕李昭寿书》中“反骨”、“包荒”这两个方言就可作为李秀成亲笔的证据呢?不错,我们反对用孤证作出的结论,我们不仅不能根据只用了两个方言就可以证明一封文件是李秀成的亲笔,就是本文所举任何一条证据,假使是孤证的也都不可能证明是李秀成的亲笔。但是,它并不是孤证;除了它之外,还有许多证据。那么,把它与其他许多证据联系起来,它就不是孤证,它就可以有资格作证。我们鉴定《谕李昭寿书》是李秀成的亲笔,无论在笔迹的鉴定上,或内容的鉴定上,都是依靠全面的证据、联系全面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孤证。我们在依靠全面证据、联系全面证据的情况下,《谕李昭寿书》中所用“反骨”、“包荒”这两个方言,就具有作为我们论证这一封文件是李秀成的亲笔的证据的作用。

第六,《谕李昭寿书》文笔有些地方欠通,正是李秀成的文笔,李秀成有能文的秘书,这封信不是秘书代笔。《谕李昭寿书》就文法、修辞的角度来看,是有些地方欠通的,兹指出几句来说说:

(一)照得投明弃暗,固俊杰志建非常;识势知时,亦英雄心存是要”,将“是要”生硬与上句“非常”相对,语句欠通,但正与《自述原稿》“与其争是定”同一语气。

(二)“除徒教尔行仁,劝尔从善,谁料尔出乎反乎”,案《孟子·梁惠王》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是说以此待人,而人也将以此报复的意思。今李秀成此处,“尔”字是代名词,而“出乎反乎”其意却是责骂李昭寿既投太平天国,又叛而降清,生硬用《孟子》,

而与原意全不相同。

(三)“而我与国诛妖之大义岂忘心乎”，“与”应作“为”，作“与”不通；“乎”字用得不恰当。

(四)“何言妖与不睦，杀妖道台而来”，“妖与不睦”似应作“与妖不睦”较合。

可见《谕李昭寿书》的文字有些是欠通的，正是李秀成的文笔，我们细读他的《自述》便可知道。但是，有人会问：这封欠通的信，安知不是李秀成的秘书代笔？要答复这一个问题，请查现存李秀成秘书代笔的文件。例如：

(一)“窃思京都地临大江南北，原有金城汤池之固，然必铲平南方妖穴，方可永奠磐石之安。”(《谕康玉吉书》)

(二)“缘兄与弟迢迢相隔，未克聚首一堂，共晤兵机，诚令兄有渭北江天之感。”(《致张洛行书》)

(三)“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

(四)“况满、汉之畛域甚明，尔我之雌雄易决。即云食其禄者报其主，恐天心之莫挽，究人力所难支。”(《谕赵景贤书》)

又可见李秀成是有能文的秘书在。假如李秀成真要人代笔写信给李昭寿，他幕中既有能文的秘书，又何致叫这一个欠通的人代笔；李昭寿是河南固始人，他更不会叫一个写得半文不白夹有广西浔州、梧州方言的人代笔。还有人对这封信的文笔和内容也认为确是李秀成亲笔书写的，但他们又以为说不定是李秀成口授，由机要秘书体会李秀成的意图，照录李秀成口授的片段的词汇语句，再联属而成为整篇的文章。案这一个看法，在李秀成的情况和这一封信内所表现的文笔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在李秀成的情况来说，他每天能写七千字的《自述》，他不是一个不会写字需要他人代笔的人。他又是一个负责一方军事重任的领导者；作为一个领导者而要人代笔的目的是节省时间；要节省时间，就只能口说要点，却不可能咬文嚼字地口授，因为这样做反不如自己动手的快了。就这一封信里所表现的文笔来说，不仅有李秀成的口语，而且全文还处处流露出李秀成文笔的风格。口语是可以记录的；文笔的风格却不是他人所能传达的，特别是上文所举“之”、“乎”、“者”、“也”、“否”、“矣”等虚字所表达的神情那一项。除非是李秀成先把他的信写好，然

后同蒙馆老塾师教学生那样，以从容的时间把自己写的信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又念，教人照写；否则任何人不可能根据他口说的话，用文言文表达出他个人文笔的风格和神情来的。但李秀成的时间不许可他这样做，李秀成也不会这样做。由此可见，这一封信不是李秀成口授而由机要秘书写成的。以上考证，都说明了这一封文件只应是李秀成自己写的亲笔信，而不是秘书的代笔。

第七，《谕李昭寿书》不是他人能够代笔的，只有李秀成本人对李昭寿才写得出这封充沛革命热情、爱憎分明、动人心弦的书信。我们上面说：从文法与修辞的角度来看《谕李昭寿书》，有些地方是欠通的；但是从表现的内容来论，却是一篇写得极真挚动人的书信，只有李秀成本人才写得出，而不是代笔所能表达得出来的。案李昭寿初杀清朝道员何桂珍投太平天国，李秀成惜他如“珍宝”，待他如“手足”，用尽心力来教育他。后来他竟据滁州反叛，威胁天京北岸门户的江浦。李秀成痛恨自己“目不识人”，痛恨叛徒“恩将仇报”。但是，李昭寿既杀清朝道员而来投太平天国，又叛太平天国而降清，反革命是不会放过他的。所以李秀成在此信中，首先当头棒喝去提醒他，问他：“尔自投顺天朝，试问所因何事？今又转降胜保，难保不察前因，尔终久总难释其前过。大丈夫岂可且顾眼前，不思后患！”接着就警告他：“情义既绝，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势必先诛。”劝他“速速归林”，否则“两敌莫保”，给叛徒指出清朝将来必要诛杀他的后果。最后对他“无常反覆岂志者所为而留名迹于天下后世也”的行为，从“不亦惜哉”四个字里面寄以无限的惋惜，企图以大道理和恳挚的感情去感动他。这一封信，义理昭然，尤其是全文表现出一种极真挚的热情，不论是痛恨，是惋惜，都跃然纸上。除了李秀成本人之外，谁能代达得出这一种复杂而真挚的情感？李秀成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劝说李昭寿归林。劝得动李昭寿，就对太平天国战局极为有利，这是一件大事。李昭寿是李秀成的“爱将”。我们知道，以亲笔信给人会使人感到亲切，代笔信则使人感到疏远，这是人情之常。如果李秀成是一个不会写信的人，那是没得说了；但是，李秀成在《自述》里说：“我亲书字到，我营将个个皆知。”以部将个个都熟悉他的亲笔的李秀成，要进行这样一件重大的去劝说一个曾经为自己的“爱将”现在变成了叛徒的人的大事，若以代笔信给李昭寿，那就一定减却说服力了。所以李秀成这封信必须自己写，这与调兵遣将的文书和檄文布告的作用完全不

同。至于有人看见《谕李昭寿书》引用有《孟子》“出乎反乎”一句话，就以为非十载寒窗的文士不能写出。不知李秀成童年曾随舅父读过三年书，后来又在书塾帮工；当时书塾里读的是《四书》、《五经》，所以《四书》、《五经》他是“耳熟能详”的。我们从《自述原稿》中那些句子，例如“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明贤偃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去戚离乡”、“水涨满川”、“雨雪交加”等句看来，知道李秀成不但是在书塾读了《四书》，而且还读了唐、宋古文；他能够有构思修辞的时间，就完全可能写得出《谕李昭寿书》这样的文笔来。

我们根据上述七项文笔与内容的鉴定，得出了《谕李昭寿书》确是李秀成亲笔的书信的结论。文笔与内容的鉴定，也证实了笔迹鉴定的正确。

在这里，还应该对两个意见加以考释。第一个意见是说《谕李昭寿书》最后用草书写“廿七”两字特别大，这两个字与上面的字是否同一人所写？若不同，为什么李秀成不自己写而把日子留给他人填上？并且根据这一点疑问提出一个假设：假定全部以李秀成名义颁发的文件须经过李秀成签写日期然后发出，故据签写日期的字迹即可以作为鉴定李秀成笔迹的根据。但是经过我检查《谕李昭寿书》、《致张洛行书》、《谕康玉吉书》、《谕赖文光书》、《致艾约瑟杨笃信书》、《谕容椿侄容发男书》等件所写日期出自多人的笔迹之后，这一个假设便不能成立。至于“廿七”这两个字，我们据影印本辨认，大约不像李秀成写的；又查信封背面十月下也没有写日子。李秀成写信时不写这一个日期，当是留待发信那一天才由发文件的负责者填上日子的。第二个意见是根据一般的看法，凡是盖关防的文书，都是属于公文，而不是私人的通信；又根据曾国藩涂改后的《李秀成自述原稿》那一句“我在天朝时用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的话，误认为李秀成原文，提出李秀成盖印而无密号的文书，都不同于亲笔书信的说法；从而根据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不但盖印，也无密号，作出否定《谕李昭寿书》为李秀成亲笔书信的论断。案就一般情况来说，凡是盖关防的文书，都是属于公文，私人通信没有盖关防的，这确是对的。但这一种一般情况却不能推论到太平天国的惯例上去。考现存李秀成《谕容椿侄容发男书》^①是一封家书，并不是公

① 原件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文，虽然所指示的是战事，但与曾国藩给曾国荃指示作战的信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可是李秀成的家书却盖上了“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秀成”大长方印（参看图二十三），曾国藩的家书并没有盖上清朝两江总督的关防。又考英王陈玉成给他亲信部将扶王陈德才等指示作战的信，与曾国藩给李鸿章、鲍超等指示作战的信，性质并没有两样，但陈玉成的函件就盖上“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忠勇羽林军英王陈玉成”大长方印（参看图二十四）^①，而曾国藩的函件却没有盖上清朝两江总督的关防。或许有人说李秀成这封谕子侄的家书不是亲笔信，因为是指示战事，为慎重起见不得不盖上关防。但是，要提出这一个论断，就须先把太平天国所有盖关防的文书都一一证明它不是亲笔，否则这一个论断就不能成立。由此可知这是太平天国的一种习惯，不管什么文书都要盖上关防。考李秀成曾经说过，李昭寿是他的“旧部至好，从前通信”；他明确地说是私人“通信”，而不是“公文”往来。李秀成在《谕李昭寿书》上盖上关防，乃是太平天国文书上的一种习惯，不能以凡是盖关防的文书都是公文而不是私人通信的一般情况，推论到太平天国这一个特别的情况上来。可见这一个意见的第一个根据是不能成立的。又案第二个根据所举《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原文并不如此，这一句话，李秀成初作“我在天朝欲调兵者盖印”十字，后来李秀成把这十个字删去，而另在旁边写作：

我在天朝时用将文盖印者，无我亲画密号，其将不从。

曾国藩把“将”字涂抹，改“画”为“书”，便改成了“我在天朝用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参看图二十五）。^②李秀成本来说的是“用将文盖印者，无我亲画密号，其将不从”，并不是说所有盖印的文书都要画密号。今案《谕李昭寿书》，乃是李秀成劝诫一个投了敌人的叛徒，

① 原件藏故宫博物院。

② 这一处曾国藩的涂改，系1957年丁云青先生从照片上细心辨认出来，见他所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一文附注。今核对《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确实如此。惟丁云青先生说：“文盖”二字也被曾国藩圈掉，那却是丁先生把那条粗肥而深浓的间格误认了，曾国藩没有圈掉这两个字。丁先生说曾国藩把“调”字改为“用”字，实为“用”字，曾国藩没有改。又丁先生说“亲”字为曾国藩所添；就我据李秀成笔迹及曾国藩笔迹对勘起来，这一个“亲”字是李秀成原来写的字，而不是曾国藩添的。

元門御林忠義衛軍忠王李 誨諭容椿容發容發男書
 等為其接應先係蕭山後改鎮興以所省之用翼好早日成功也十月和一日諸王將於二十九日自能與容椿容發容發男
 克復清者數千兩等在後亦到部已聚城內問悉之下是為收剿令而即已得報即指日可克官場自到統帥以來
 其日將城外缺穴一概掃平後亦無敵否者數千自降者數千已將城內內外不遺成功在即矣兩事已
 遂征那可與達王斬和敵對敵新聲即計先聲彼兵下下已已後者元在後將兵而未接應一切已而
 喝該自為力的改聽不備源早成大功 國之幸也凡事總與陸王將善其外林林總總行若各軍平靜回
 神之日必邀領王將竭誠如何守地如何安民必得穩固甚善方可回來至父喜平路平路最興之兵已制頭
 天安亦有人足用未雨綢繆地雖手否林草否否軍需否否仰尔查明城中好本無要分別男婦男行
 女婦各行不得混雜如者不屬商可指法當治方不負爾父之訓教者為 國之良臣也勿小心謹慎以顧
 軍機是為為此特頒特諭仰爾等遵前而行具諭
 太平天國 萬 年 十 月
 初三

图二十三 李秀成諭容椿侄容發男書

愚兄陳正成書

扶道
王腰折

北 庭
建 康

詰通兵

仕



九

聖詔

이

顧

下

22

22

下

•

人

太平

太平天

同治十二年五月

4

4

10

可貴

5

图二十四 英王陈玉成致扶王陈得才等书

并非“调兵”、“调将”，无须画密号，那就当然是没有密号了。可见这一个根据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一个意见的两个论据既都不能成立，其结论也就不能成立了。

我们根据《李秀成自述原稿》去鉴定出了《谕李昭寿书》是李秀成的亲笔书信，反过来也同样可以用《谕李昭寿书》来证明《李秀成自述原稿》确是李秀成的亲笔自述。《谕李昭寿书》与《李秀成自述原稿》可以发生互相证明的作用。所以由于《谕李昭寿书》的鉴定，我们又得到了一个证明《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实性的强有力的证据。

六 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内容问题

《李秀成自述原稿》确是李秀成亲笔写的。经过我们考证，是可以肯定的了。但今天所见曾国藩后人藏家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却有撕毁、删削、改动的地方。

先说撕毁。现存原稿共七十四页。第七十四页最末一行最后一句话说：

实我不知知也，如知

可见文意未完，肯定还有下文。案原稿十要第十条后，李秀成有一句话说：“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据曾国藩说李秀成写《自述》起自夏历六月廿七日，至七月初六日。考曾国藩日记，见李秀成两次：第一次是夏历六月廿五晚，即李秀成写《自述》前两日，第二次是夏历七月初五日灯后，即李秀成就义前一天。今案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的话，系指七月初五夜与曾国藩第二次相见的事说的。可知李秀成写到这里那一天，乃七月初六日，已经是他写《自述》最后一天了。又案李秀成这段是从“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起，系另一页开头，而所述为昨夜事，可知这是七月初六日早晨开始写的。他于傍晚十八时左右赴刑场。据曾国藩说李秀成每天约写七千字。现从这一句算到末“如知”二字，只存一千一百七十七字。估计以下应还有四千字左右，这肯定是给曾国藩撕毁了的。

我们再就李秀成自己所说的字数来稽考。案李秀成在《自述》里写到天

王三次严诏催他从苏州回救天京事时，记有他已写的字数说：

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部一本，又好笔一枝，此笔破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

案今所见原稿，在这一段话以前只有二万三千一百馀字，与李秀成自己所说的三万七八千字，少了约一万四千字。这又是给曾国藩撕毁了的。

我们在原稿钞本上看出这两处撕毁的地方。今所见湘乡曾家所藏《李秀成自述原稿》共三万三千三百馀字，曾国藩究竟撕毁了多少字呢？我们须考查原稿原来的字数。关于原稿字数，曾国藩在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记说：

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馀字，一一校对。本日仅校二万馀字，前八叶已于昨日校过，后十叶尚未校也。

这是曾国藩的第一个说法。过了一天。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信说：

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馀字。两日内看该酋亲供，如校对房本误书，殊费目力。^①

这是曾国藩的第二个说法。他在《李秀成供》批记说：

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

案这年夏历六月小，自六月廿七日至七月初六日共九日，每日约写七千字，则原稿应在五万四千字以上，六万三千字以下，即五万馀字至六万字。这是曾国藩的第三个说法。曾国藩在复钱应溥的信中又说：

① 《曾文正公家训》卷下。

李酋八日之内，在囚笼中共写三万馀字，删其重复谰言，尚近三万字。^①

这是曾国藩的第四个说法。细审起来，曾国藩七月初六日说的约四万字，是说他“阅”的字数，而不是说李秀成写的字数。到初七日，他看完了《李秀成自述》，说的五万馀字，才是说李秀成“写”的字数。这一个数字，是与他批记的字数相同的。所以，曾国藩实只有“五万馀字”和“三万馀字”两种说法。

又考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记道：

伪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虽不通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贼中不可谓非桀黠矣。

同月初七日记又说：

中堂属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

同月初十日记又说：

中堂属看《李秀成供》，并分段付梓。

据此知赵烈文不但得看过《李秀成自述》，而且，改定送军机处的本子和分段付梓的本子都经他的手，曾国藩删改《李秀成自述》，他就是一个帮凶。他记《李秀成自述原稿》字数是“五六万言”。他是一个重要的当事人，他的话是写在他当时的日记上，他所记《李秀成自述》的字数，并没有掩饰与作伪的必要，所以应该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根据。

赵烈文说的“五六万言”，正与曾国藩说的“五万馀字”相同。又我

^①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复钱子密》。案子密是钱应溥号。

们上面考出李秀成写到从苏州回救天京以前共三万七八千字，加上从这一段话以后，今所存的一万零三百余字，再加上第七十四页后估计被撕去约四千字的缺文，原稿全文应为五万多字。赵烈文说的“五六万言”，和曾国藩说的“五万余字”，与我们的计算所得的五万多字，三者也都相同。至于曾国藩复钱应溥所说的“三万余字”，是他撕毁原稿后对人说的字数，而不是原来的字数，所以这个数字，恰恰和今天所见的经过撕毁后的原稿字数相同。

这是我于1957年根据广西通志馆从湘乡曾家钞回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对其字数所做的结论。到1963年，曾家所藏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已经由台湾世界书局全部影印公布了。现将影印本核对，查李秀成所记已写三万七八千字系写在五十页末。其上只有二万四千六百多字，少约一万四千字。李秀成在三十一页后书口处又记有“到此总共一万八千之敷（谱）”，其上只有一万六千余字，少约二千字。在四十页后书口处也记有“二万八千五”，其上只有二万余字，少约八千字。李秀成三处所记数字，都和现存原稿字数不合，但还未能检查出在何处撕毁。李秀成是一个精密有条理的人，他自记的数字，会有一误、再误、三误吗？据李秀成自记数字计算原稿约五万余字，曾国藩、赵烈文所记也同是五万余字，三者能有这样巧合吗？曾国藩、赵烈文都不是粗心的家伙，会把字数都算错了吗？而且，会所错都相同吗？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固然还须要再仔细加以钻研，但如果没有坚牢不拔的证据，对李秀成三处所记，和曾国藩、赵烈文所记一一都证明其为错误，那就断不可能予以否定的。

至于曾国藩为什么要把《李秀成自述原稿》中一部分撕毁呢？陈寅恪先生曾从湘乡曾家得见《李秀成自述原稿》，他见稿末被撕毁，认为曾国藩不肯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①陈寅恪的看法是对的。我还要补充说：曾国藩不肯把《李秀成自述原稿》送交清军机处，也是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曾国藩之所以要把《李秀成自述原稿》撕毁一部分，那更是必有不可告人之隐。

曾国藩对《李秀成自述原稿》除撕毁之外，还有删削的地方，例如将

① 据1951年2月9日《大公报·史学副刊》第五期，方回《介绍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文引陈寅恪语。

《自述》开首“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落在清营”删去等；有改动的地方，例如将“被两国〈个〉奸民获拿”句，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将天朝十误第十误改为“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等。

我们还必须郑重指出：李秀成这部《自述》，是为了要达到他的政治企图而写的，因此，其中就有伪饰的地方。他在写到要曾国藩转移对内的目的去抵抗外国资本主义者侵略那一件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时说：

今天朝之事此〈已〉定，不甚费力；要防鬼反为先，此是真实之语。

李秀成这两句话，就是暴露出了他的《自述》里面有“真实之语”，也有对敌人假意伪饰的“非真实之语”这一件事实。

《李秀成自述》对敌人假意伪饰的“非真实之语”的部分在什么地方呢？我最初看得到的只是那些向曾国藩、曾国荃假意恭维的地方。到后来做注本书工作时，又陆续有所发现。近撰《李秀成伪降考》，共稽考出有十二项虚假的地方，最主要的是下列两项。

第一，是假造与天王不和的事实。天王对李秀成是有猜忌的，李秀成对洪姓集团也是有意见的，但李秀成却是“铁胆忠心对主”的。而李秀成为了要达到他的政治企图，在《自述》里面却假造与天王不和的事实。例如李秀成在《自述》里记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冬出兵江西、湖北之役的事说：

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由〈游〉，推〈催〉我领军而去扫北。
〔去〕那时亦无良计，正逢有江西德安县以及随州、义宁、武宁、大冶、
兴郭、池〈蕲〉水、池〈蕲〉州、武昌、江夏、金牛、宝〈保〉安、南
祈〈蒲圻〉、加〈嘉〉鱼、通山、通城等处，有起义头四十余名具禀差
使到稣，恭呈降諒〈表〉投军。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奏复，云我招集
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扫北等回。虽回如是，主本不从，我强为而
止。当即派军选将而行，将稣省军民之务交与陈坤书接任，军民安妥，
一一交清。举兵由稣动身到京，将来情启奏，不欲扫北。我主义怒，责
伐〈罚〉难堪。此时亦无法处，管主从与不从，我在稣肯应江西、湖北

肯降之义民，应肯前往接应，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从〈出〉师而上江西、湖北。

案李秀成此处所说这一役是“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师而上江西、湖北”。考干王《洪仁玕自述》说这一役英王陈玉成从长江北岸进兵蕲州、黄州，李秀成从长江南岸进兵江西，两路合取武、汉，以解救安庆，是太平天国在打垮江南大营后的军事决策。威尔生《常胜军》一书记公元1860年10月，太平天国决定来年军事的主要目的系占领汉口及解安庆围；为贯彻此项计划起见，四个军同时出动。“忠王尤意气豪迈，深为自信，为达到此目的，不惜跋涉五百英里的路程”。曾国藩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信论太平天国这一役的战略也说：“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我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①曾国藩所说在湖北进军的太平天国统帅是英王陈玉成，在江西进军的太平天国统帅便是李秀成。案干王洪仁玕是当时太平天国的军师，曾国藩是敌方主帅，威尔生是当时英国侵略分子，他们都说明这一役李秀成进军江西、湖北是太平天国军事的决策。不仅如此，就是李秀成自己在湖北、江西班师回来攻克杭州之后，在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檄》里面，也分明地说道：

本藩自去冬恭承简命，统师上游江、楚。

李秀成向上海、松江人民布告，明明说他这一次“统师上游江、楚”，是“恭承简命”，可知他在《自述》里那一段“逆主之命”的话是假的。如《自述》里叙述他在壬戌十二年十月攻打进犯天京的曾国荃军营不下之后，向长江北岸进兵的事说：

自攻未下，我主严责革爵，调我当展〈殿〉明责，即饬我进兵北行。不得不由，从〈冒〉雪而往。

① 《曾文正公家训》卷上，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字谕纪泽》。

考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二年三月廿五日记载清军截获李秀成与干王洪仁玕的文书，说李秀成论这一役进兵长江北岸的战略，叫做“进北攻南”，就是说从长江北岸进攻上游敌人的后方，迫使敌人不得不调南岸的军队去救北岸，调下游的军队去救上游，总的目的是要解救天京的围困，所以叫做“进北攻南”。可知这一役的战略，是李秀成定的作战计划，而他在《自述》里却说是不得不勉强遵从天王的命令。又如他记天王命令要在布告和印文内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一事说：

去年天王改政，要闾〔朝〕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间亦然，凡出示以及印内，具〈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入，印内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声称。

其实，据李秀成在壬戌十二年二月给《忠逢朝将刘肇均谕》，他就遵照了天王的命令在文件上写天父、天兄、天王的字样，又可知他在《自述》上所说他不遵天王命的话是假的。又如他记守浦口时，天王对他疑忌事说：

我在天朝实无法处。力守甫〈浦〉口，后又被见疑，云我有通投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当，封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被天王悉到，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

但到他后来述天王封王事时却说：

那时正在甫〈浦〉口镇守，李昭寿与我有旧日深情，其见天王封陈玉成为王……其心不分〈忿〉，行文劝我投其。……那时我母亦在甫〈浦〉口，家室亦然，防我定有变意。后将中閤舟只尽封，不准我官兵来往。

一处说天王把他的母妻作为押当品，防止他叛变；另一处却说当时母妻都同他在浦口，天王认为他定会叛变。记同一事件，两处说法不同，必有一处是

故意假说的。又如他记天京被困紧急，城内无粮，他奏请天王放穷家男女出京逃生，天王不准，他强行密令放出事说：

将此穷苦不能全生情節启奏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衣〈依〉，仍言〈然〉严责：“不体国体，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脩咄〈甜〉露，可食饱长生，不由尔奏！”无计与辨，言〈然〉后出朝。主有怒色，我亦〔有〕不乐之心。闾城男女饥饿，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即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

但考当时有一个家住在天京的上元人王永年自述送妻子母亲出天京事说：

甲子二月十九日，送妻携子承钰并是秋病殇之女及四妹甥女偕何达夫之妻子等同出汉西门。

三月初一日，又送老母出城。能得出觅生路者，乃伪忠王李秀成以城中乏粮奏明伪主，准将无依妇女放出谋食，晓谕通衢。但每名口须备银五两赴伪章王府领照方准。^①

据此知当时放妇女出天京谋生，是经李秀成以城中乏粮奏明，得到天王批准，并且晓谕通衢，布告周知的。又可见李秀成所说天王不准，他强行密令放出的话也是假的。李秀成所以假造这些与天王不和的事实，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哄骗敌人，使敌人认为他对天王不是忠贞不贰的，因而得达到他的政治企图。

第二，是遮掩天王对他的重任。在天京事变后，天王猜忌异姓，不愿把大权交给李秀成，这是事实；但当天京被围危急的时候，却不得不重任李秀成，这也是事实。据清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即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李鸿章致曾国荃信说：

昨于汴关贼馆夺获伪文书数百件，大都金陵贼馆乞苏、浙解济银

① 见《紫蘋馆诗钞》上卷《癸未五旬初度五首》诗注。

米，其声甚哀。内称洪逆禅位幼主，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留守城内，各伪王均归调遣。^①

考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存有两封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廿九日李秀成致护王陈坤书及致潮王黄子隆的信，李秀成的署衔就是“真忠军师忠王李”，可证天王确曾封李秀成为军师。案军师是太平天国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职位，前期军师分为正军师、又正军师、副军师、又副军师四职。那时候正军师是东王杨秀清，又正军师是西王萧朝贵，副军师是南王冯云山，又副军师是北王韦昌辉。丙辰六年，东、西、南、北四王都死了，军师由天王自兼。到己未九年，洪仁玕入天京，封为精忠军师。这时候，天王封李秀成为“真忠军师”，根据李鸿章在浒关夺获太平天国文书所见天京来文所说：“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留守城内，各伪王均归调遣”的话，当时李秀成应该是代替了洪仁玕的职权，任太平天国的国务总理^②。由此看来，天王在天京陷落前一年，不能说他不重任李秀成。但是，李秀成在《自述》里面，对天王封他做军师一事却完全遮掩住，只字不提；反之，却极力铺叙天王对他不信任，甚至说：“我在京并未任阖城之事”，连防守天京的任务他也说没有担负。但据《幼天王洪天贵福口述》，却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当时“兵权都是忠王掌管”的一件事。这就可见李秀成在《自述》里面是特意遮掩天王对他的重任的。

诸如此类地方，都不是李秀成的“真实之语”，而只是为了要达到他的政治企图，不得不写了这些伪饰的话作为遮掩。因此，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工作者，要引用李秀成自述的时候，对于这些地方，断断不能认为是真实的事，否则就一定陷于错误。不仅如此，根据我多年来做这部《自述》注的体会，由于史料残阙，许多地方都是到发现新史料后才逐渐看出破绽来的，所以凡是有关李秀成在《自述》里面故意污损自己以及强调天王的过错等等地方，说不定将来会发现材料证明是虚假的，我们引用时也必须十分慎重，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致曾沅帅》。

② 据钞本《天朝钦定敬避字样》附录《点将录》：特爵八人都封军师，右辅正军师幼东王，又正军师幼西王，前导副军师幼南王，公忠又副军师翼王石达开，真忠军师忠王李秀成，勇忠军师英王陈玉成，正忠军师侍王李世贤，恣忠军师辅王杨辅清，而忠王独有“御林兵马亲提调奉旨令专征剿”的衔头，这也可与李鸿章所说各王均归李秀成调遣的话互证。

不能毫无疑问地认为事实，否则也会陷于错误。

《李秀成自述原稿》虽然有被撕毁、删削和改动的地方，并且还有许多伪饰的地方，但是，就截至今天为止已发现的太平天国史料来论，《李秀成自述》还是第一部记载太平天国革命史的最主要的文献。就我个人体会，主要的地方有下面几处。

一、记载金田起义的历史。其中记载金田起义的领导人物，贫农的信从拜上帝会，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壁垒分明的斗争，金田起义后以至北出湖南定都天京的战役等等，都有很扼要的叙述。据李秀成说，其中关于洪秀全“出身起义之由”的部分，是他根据“记在心”里的“天王《诏书》”（即太平天国编修的历史）写的。

二、记载丙辰六年天京事变前后的历史。其中包括天京建都，第一次打退江南大营，天京事变和其后军事政治的变化以及在浦口打垮江北大营，庐州三河镇歼灭李续宾等等，都有详明的记载。

三、记载六解京围前后的历史。其中包括第二次彻底消灭江南大营，克复苏、常，用兵江、楚，安庆失守，克复浙江等等，也都有详明的记载。

四、记载太平天国反外国侵略的伟大历史。《李秀成自述》详细地叙述了在上海一带抗击外国资本主义者侵略的辉煌战绩。他大书特书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李秀成还记有外国侵略者曾向太平天国进行秘密外交阴谋说：“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分〈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此语是与朝臣谈及后〔不〕肯从。鬼云：‘尔天王兵而虽众，不及洋兵万人。有我洋兵三二万众，又有火舟，一手而平。’鬼云：‘我万馀之众打入北京，后说和，今上〈尚〉少我国尾〔欠〕。尔不与合，尔天朝不久，待为〈会〉我另行举动。’此这鬼头与天王不肯，然后与及谈。”李秀成给我们记载了太平天国不受外国侵略者的利诱，不畏外国侵略者的威胁，而坚决反抗到底的伟大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见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斗争的坚强伟大的传统。

五、宣扬太平天国的业绩。如记东王杨秀清执政时代，“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如记太平天国军队的纪律说：“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即斩

左脚，右脚沓（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他用事实强有力地驳斥了反革命宣传太平天国杀人放火的诬蔑，他宣扬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业绩。

六、记出农民革命的严重弱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就不能不具有严重的弱点。弱点不仅在于不能建立一个足以代替封建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在于并不能彻底地粉碎旧制度。由于不能不受到封建思想（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影响，由于基于小生产制度的平均主义思想所起的消极作用，并且由于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在革命队伍中所起的破坏作用，因此，在取得胜利时就发生了天京事变，造成了最严重的分裂而给革命以致命伤。李秀成在《自述》里面，沉痛地记载天京事变；记载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的可痛局面；他还记载“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的情况。他又记载在太平天国后期，有一部分军队发生不守革命纪律的事，而这些军队所以纪律败坏，乃是由于受了加入太平天国的广东天地会和蒙、毫起义群众的坏影响。这些记载，对我们了解这一个作为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都有明确的提示。

七、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李秀成自述》在“天朝十悞”里总结了十项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虽然李秀成受了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理解得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出现近代的工人阶级，因而太平天国革命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这就是太平天国革命不能不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也没有谈到《天朝田亩制度》，使人不能在他的《自述》里面看出当时太平天国对土地制度的措施。但是，作为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之一的李秀成，却以他自己目击身经的体验，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中，在军事上、政治上特别是在内部团结上所犯的种种错误，作了严肃的沉痛的批判，概括的总结，给后一代革命者留下了极可宝贵的经验教训。

以上只举出我个人体会得到的几点。只就这几点看，《李秀成自述》史料价值的重要已显然可知了。所以，《李秀成自述》虽然有被撕毁的地方，又有伪饰的地方，但是，这部《自述》却仍不失为今天所见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太平天国革命文献。

1957年5月撰于北京小三条中国科学院宿舍

1980年7月修改于北京东罗圈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

增补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一 金田起义（原稿一至七页）

时逢甲子，六月国破^①被拿，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承〈丞〉^②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③驾至，讯问末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寔，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欠〈写〉明。^④自我主应立开塞〈基〉之情节，衣〈依〉天王《诏书》^⑤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带随），可记在心之大畧，写呈老中堂玉鉴。我一片

① 案天京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失陷，即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864年7月19日。

② 中丞，称攻陷天京的清朝浙江巡抚曾国荃。案东汉以中丞为御史台率，明、清时命副都御史或金都御史出任巡抚事，所以当时人称巡抚做中丞。

③ 中堂，称反革命巨魁清朝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案清制设殿阁大学士四人，协办大学士二人，赞理机务，表率百僚，以领宰相之职。至称内阁大学士做中堂，系照明朝称呼。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中堂”条说：“明洪武十五年设内阁大学士，上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阁大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俱为翰林院官，故院中设阁老公座于上，而掌院学士反居其旁，诸学士称阁老曰中堂以此。”

④ 曾国藩清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贼酋分别处治蠲筹善后事宜折》说：“李秀成之就擒也，各营之降卒，附城之居民，人人皆识，观者如堵。臣二十五日甫至金陵，亲讯一次。旋派候选道庞际云、候补知府李鸿裔、候补同知周悦修等鞠讯累日，令写亲供多至数万字，叙发逆之始末，述忠酋之战事，甚为详悉”（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据此，知曾国藩到南京讯问李秀成之日为清同治三年六月廿五日，即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又据曾国藩在他刊刻的《李秀成供》后题记，李秀成写《自述》起于同月廿七日至七月初六日，即天历六月十七日至廿五日。在写《自述》最后一天酉时（十七时至十九时），李秀成在天京就义，时为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廿五日，公元1864年8月7日（据曾国藩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记，见《曾文正公手书记》）。

⑤ 《诏书》是太平天国政府修撰的起义建国史，见汪士铎《乙丙日记》、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太平天国这一种政府修撰的革命史不止一种，现存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太平天日》记天王丁酉年（清道光十七年，（转下页注）

虔心写就，并未瞒隐半分。

一将天王出身之首，载书明白。其在家时，兄弟三人，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①，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其父△名不知）^②，长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后母所生^③（此之话是天王载在《诏书》教下，屡屡讲讲道理，教人人可知）。^④长次兄在家种田。洪秀全在家读书，同冯云山二人同窗书友。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之病，死去七日还魂。^⑤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间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⑥，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具〈俱〉不敢拜别神。^⑦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接上页注⑤）公元1837年）死去还魂及入广西宣传事，断至丁未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止，首句以“诏书一”三字为起头。汪士铎在天京所见的《新诏书》其中记事与这一种相类似。至谢炳所见“自戊申起叙至入金陵城等事”那一种，今未见。考证详见拙著《太平天国佚书考》（此文收在拙著《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一书内）。

① 洪仁发、洪仁达在洪秀全起义的时候，入金田跟从，初封国宗，没有参加政事。到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不信任异姓，因封仁发做安王，仁达做福王，掌理政事。朝中不服，洪秀全改封两人为天安、天福。仁发、仁达贪污乱法，肆行无忌。太平天国后期政治的腐败，实为罪魁。仁发后改封信王，天京陷，死乱兵中。仁达后改封勇王，天京陷，被俘死。

② 圆括号内这一句话，李秀成写在旁边。

③ 天王父名镜扬，原配王氏，续娶李氏（据《花县洪氏宗谱》）。李秀成说：“长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后母所生。”考《太平天日》有“君王母李”的话，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也说：“洪贼有伪旨示东贼，谓：‘天父赐兄金盆，不忍自用，因以奉母’。”太平天国政府修的书称李氏为“君王母李”，而不曰“君王后母李”，天王也称李氏曰母，而不曰后母，根据中国的礼法洪秀全应该是李氏所生，与李秀成记载同。近年发现的《天兄圣旨》卷一庚申年六月廿日天兄下凡记道：“天兄转谕君王母李四妹尔要教导媳妇子女，时时教尔仔面。”证实了李秀成的记载。简又文译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据洪仁玕述辞写成的《太平天国起义记》说：“秀全之父名养，生三子二女，为前妻朱氏（Choo）所出，继室李氏（Li）今仍生存，无所出。”那是错的。

④ 圆括号内这两句话，李秀成也写在旁边。

⑤ 天王在清道光十七年丁酉（公元1837年）死去还魂事，详见太平天国政府修撰的《太平天日》、《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及《洪仁玕自述》与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等书中，时年二十五岁。

⑥ 案影印湘乡曾八本堂藏《李秀成供手迹》，已缺这一个“难”字。本书此字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影印《自述原稿》首页著录。

⑦ 案《十款天条》，第一天条崇拜上帝说：“皇上帝为天下万国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人人皆当朝晚敬拜，酬谢天恩。俗语云：‘天生天养天保佑。’又俗语云：‘得食莫瞒天’。故凡不拜上帝者，是犯天条。”第二天条不好拜别神说：“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断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条。”故李秀成记天王劝人拜上帝说：“若世人肯（转下页注）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寻〈浔〉州桂平、武宣、象洲〈州〉、腾〈藤〉县、陆川、博白，具〈俱〉星罗数千里。^①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②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者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③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到^④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

欲查问前各王出身之来由，特将前各王前后分别再清。至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往〈住〉山名叫做平隘山^⑤，在家种山烧炭为业^⑥，并不知

（接上页注⑦）拜上帝者，无灾无难”，又说：“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具〈俱〉不敢拜别神。”

- ① 考天王入广西宣传，首先到贵县赐谷村表兄王盛均家，事详《太平天日》，李秀成未叙及贵县系遗漏。我对这件史事，曾作过调查研究，见《关于太平天日一书中贵县赐谷村的口碑》一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内。
- ② 案拜上帝会为着适应起义需要，采摭基督教里面独一真神和创造天地人万物的上帝这一个说法，根据我国古代大同理想，继承中国农民斗争传统，并且体现当前农民斗争的现实，塑造了一个“革命的上帝”，创立了拜上帝会，给太平天国起义找到了一个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具。它认为天下人不论任何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上帝面前，皇帝和人民是平等的。它用天上的上帝打击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地上的皇帝。拜上帝会又利用基督教的上帝打击了地主阶级用来压制农民的一切封建迷信和权威——从孔子到阎罗王，把农民从旧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把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封建势力看作为“阎罗妖”，把农民自己反抗封建统治的力量集中表现为“皇上帝”，用“皇上帝”对抗“阎罗妖”的宗教的斗争形式，号召农民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这一种思想，正反映出了当时农民的愿望，为农民所接受，故“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
- ③ 天官丞相是太平天国最高一级的职官。案太平天国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分正、副、又正、又副，共二十四员。
- ④ “知到”，广西浔州、梧州一带方言，即国语“知道”的意义。
- ⑤ 平隘山，太平天国刊行的《天情道理书》作平在山，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也作平在山。《桂平县志》作朋隘山，说：“朋隘山在县北宣二里观山东，有路通武宣东乡，为洪秀全起事时卵覆之区”（卷四《纪地山川》上）。此处是金田起义前拜上帝会总机关所在地。广西师范学院史地系《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说：“紫荆山区方圆二三百公里，全是丘陵地带，田少山多，林木茂密。据说过去这一带都是种山烧炭的人多。紫荆山的西南面叫朋隘山（现为木山乡），更是荒山老林，历来是僮族居住的地方。附近地区有许多人到山里烧炭，山上到处都有炭窑。”
- ⑥ 我在1942年冬去金田访问，遇三江墟人曾德周。曾德周说：“杨秀清是平隘山新村旁东王冲人。新村是平隘山一小部分，乃入木山乡（僮山）的路。出新村即东王冲。（转下页注）

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筒（峒）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①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其重用^②，勇敢刚（刚）强，冲锋第一。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③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氏，此人在家是出入衙门办事，是监生出身^④，见机灵变之急

（接上页注⑥）乡人纪念杨秀清，所以叫他的故居为东王冲。”曾德周又说：“平隘山人很苦，住在那里的十有七八以烧炭过活。杨秀清家极苦，不识字，也以烧炭为生。”曾德周的曾祖母是杨秀清姊，所以知道他的事。又考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情道理书》记杨秀清的出身说：“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厄难堪，足见天父将降大任于东王，使之佐辅真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乃天父穷厄我东王者，正天之所以玉成我东王也。”这一段话，正说明了杨秀清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事业，是跟他的阶级出身分不开的。

- ① 《天情道理书》叙萧朝贵的出身说：“西王僻处山隅，自耕而食，自蚕而衣，其境之逆，遇之啬，难以枚举。”可与李秀成所记参证。
- ② 李秀成记萧朝贵事说：“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其重用。”这是大错的。案萧朝贵妻杨宣娇，本姓黄，父黄权政。据说宣娇与杨秀清认为兄妹，故改姓杨。由于洪秀全称奉天命下凡，称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洪秀全称天父第二子，冯云山称天父第三子，杨秀清称天父第四子，韦昌辉称天父第五子，杨宣娇称天父第七子，萧朝贵称帝婿，故秀全称朝贵为妹夫。李秀成是广西藤县新旺村人，他家虽早已加入拜上帝会，但却是到了辛开元年秋，太平军经过新旺村时才参加的，所以他对拜上帝会的情况不清楚。他只据辛开元年颁布的《太平礼制》和洪秀全的诏旨上都称萧朝贵为“贵妹夫”，就认为是“天王妹子嫁其为妻”。他不知道洪秀全与萧朝贵妻杨宣娇的关系，乃神天家庭的关系，而非人世关系。李秀成不明白这种关系，误以人世亲戚关系去理解，这就给太平天国史增添一个乌有人物“洪宣娇”出来了！详细考证见《历史研究》1987年第五期《重考“洪宣娇”从何而来》。
- ③ 《天情道理书》叙冯云山的出身及功绩说：“南王籍隶广东，家道殷实，前随天王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姊妹，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发动金田起义的拜上帝会，便是冯云山独自一人进入桂平紫荆山组织起来的。据汪士铎《乙丙日记》载吴栗生说：“《三字经》、《幼学诗》、官制、礼制多出其手”，冯云山又是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的创制者。
- ④ 李秀成记韦昌辉事说：“此人在家是出入衙门办事，是监生出身。”《天情道理书》叙韦昌辉功绩说：“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但考清道光二十五年立的《宜里安良约碑记》，所列七十家地主集团里面并没有韦昌辉这一家。清道光二十四年立的《重修宜里新墟三界祖庙碑记》所载，捐款最多的有十四两，一两以上的也不少，最少的则为三钱，而韦昌辉父韦元玠、叔韦源洸却只捐四钱，在当时称为“做功德”的大众事的出钱上，这一种极顶吝啬的行为，又正表现出这个新起的刻毒成家、贪钱如命的暴发户的贪婪本性。韦元玠为着要与强宗豪右争竞，就极力栽培儿子韦昌辉读书，希望中科举，当了官，显耀乡里，给他争气。可是，韦昌辉读书多年，已经二十多岁了，连秀才还没有考上。韦元玠见儿子从科举考试上进的路没有希望了，当时富户的子弟考不取功名，捐纳一名监生，就可以列在“绅衿”之林，与官府往来。韦元玠也给韦昌（转下页注）

才足有。翼王石达开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家富读书，文武脩足。^①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与人做工，^②并无是也^③才情，忠勇信义可有，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之事，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是以数县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此也。

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④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夥〕，团练与团练一和〔夥〕，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

（接上页注④）辉捐纳了监生。近年发现的《天兄圣旨》在卷一己酉年三月中旬下凡记事，天兄题诗庆祝韦元玠和韦昌辉道：“年青花景挂满堂，玠人此钱自由当。为子监生读书郎，正人子前二萧凉。”这条记事，十分重要，它指出韦昌辉捐纳监生年份为清道光己酉二十九年，即金田起义前一年。同时又指出当他捐纳监生的时候，拜上帝会就把他拉入会了。

- ① 石达开，广西贵县北山里奇石墟那帮村人，李秀成记为桂平县白沙人，误。案《石达开供》说：“广西贵县人，祖辈由广东和平县移来贵县居住”（见《骆文忠公奏稿》卷六《生擒逆首伪翼王石达开折》附《石达开供》）。《光绪贵县志》说：“石达开，邑之北山里来人。其家世业农。……咸丰元年，县令张汝瀛令龙山武举覃安邦发其祖墓，碎骨扬灰”（卷六）。1933年贵县修志局在那帮村发现石达开曾祖母黄氏墓碑，都可证石达开确是贵县人。石达开的家庭当是一个富有的农家。石达开供说：“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天情道理书》说他是“富厚之家”，《光绪贵县志》说他“家世业农”，《民国贵县志》说他“家中资”。梅竹公同志根据最近发现的《鼎建渡船碑》上题名，指出捐钱有四千文、三千文、二千文、一千五文、一千二文、一千文至三百文以下不等，石达开、石昌隆只各捐一千文，石昌荣、石昌达各捐五百文，碑上题“总理缘”、“主缘”、“化缘”等主持者，石家一人没有，作出石家在当地不是“土豪”和“多年绅富”的结论。我认为《民国贵县志》说他“家中资”是对的。
-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伪燕王秦日纲传》说：“日纲，广西浔州府贵县人”，自注说：“籍贯考自伪家册”。李秀成记作桂平白沙人。1954年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到白沙调查也作出：“肯定秦日纲的籍贯是桂平白沙竹多塘村，他的后裔曾回白沙居住”的结论（见《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应以家册为据。又考汪士铎《乙丙日记》述其甥吴栗生来信，说秦日纲的出身是一个“御车者，不识字”。吴栗生所述可与李秀成此处所记“在家与人做工”的话参证，据此知秦日纲是一个贫雇农出身。
- ③ “是也”，广西浔州、梧州一带方言，等于国语“什么”的意义。“并无是也才情”，就是“并没有什么才情”。
- ④ 团练是地主阶级组织的武装，所以拜上帝会的人与团练“两有分别”，壁垒分明，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道光卅年十月^①，金田^②、花洲^③、六（陆）川、博白、白沙^④不约同日起义。^⑤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⑥而深信了。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⑦胡以晄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⑧那时东

- ① “道光卅年十月”，曾国藩刻本妄改为“六月”。由于曾国藩妄改这一个字，曾使多年来对金田起义日期的考据发生了有害的作用，故特予指出。
- ② 金田，村名，在广西桂平县东北。《光绪浔州府志》记道：“金田，桂平小聚，去浔州城五十馀里，其后为紫荆山，层峦叠嶂，易于出没，中有径通平南、武宣、象州”（卷五十六《纪事》）。
- ③ 花洲，村名，在广西平南县罗寿乡（据《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访问名单所记住址）。花洲是太平天国起义时平南县拜上帝会员团营的地方。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说：“庚戌年二月敬拜天父皇上帝天兄耶稣……于九月十三日花州团营，侄于是月十八日由花黄水之紫微村张五家起行赴花州。”
- ④ 白沙，镇名，在广西桂平县。案《自述原稿》此句作“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不”字草写，有点像“石”字，曾国藩刻本就把它误刻为“石”字，又删去“约”字，并且妄改“十月”为“六月”。就误为“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义”。
- ⑤ 金田起义日期是太平天国初期史上一个异说纷歧的问题。自太平天国史书所载，以至太平天国人物所述与中外史籍所记，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考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说花洲团营是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而白沙人梁立泰是七月到金田入营，至于金田团营则在十月初一日。再考《民国贵县志》贵县石达开是在道光三十年七月十三日率领起义队伍赴白沙，《光绪郁林州志》陆川、博白拜上帝会团营是在道光三十年九月（《陆川县志》作八月）。据此知各地拜上帝会团营的日期并不一致，可知李秀成所说：“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的话是错误的。据张德坚《贼情汇纂》梁立泰家册那一条“广西浔州府桂平县白沙墟人，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营，八月封前营长东两司马”的记载来看，金田起义发令总动员各地会员前往金田，即李秀成所记有拜上帝人传到家中的时间，当在道光三十年七月前，约在这年五、六月间。动员令下后，各地会员先在本县团营，然后陆续到金田集中，十月初一日便在金田团营，《天情道理书》所说：“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便是。到了从山人村迎天王归，遂在十二月初十日庆祝天王生日宣布起义，讨伐清朝，所以干王《洪仁玕自述》说“恭祝万寿起义”便是。考证详见我写的《金田起义考》（载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后收入《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及《金田起义日期再考》（发表于《学术论坛》1980年第三期）。
- ⑥ “格”作“更加”解，“格而深信”，就是“更加深信”。
- ⑦ 李秀成记“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晄家内密藏”。鍾文典《太平天国人物胡以晄传》注九说：“《李秀成自述》：‘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晄家内密藏。’地名欠确切。因为山人村属大同里，花洲属鹏化里，两地中隔大山，相去数十里。”在传内又说：“大同里的山人村，在山人冲中段，到路三里的罗文村，走山间直路也有四十华里。山人冲全长二十华里，群山重叠，密林遮掩，人迹罕至。冲南有双田口，冲北有大厄营，各距山人村十里，乃山人冲外出必经拗口。”洪秀全、冯云山深藏于此，是一个深山险坳的所在。
- ⑧ 金田起义时，洪秀全与冯云山密藏在胡以晄家，为清朝官吏侦知，乃派兵扼守山路，以围困洪秀全。杨秀清在金田闻讯，带队去救，打破清兵，才迎洪秀全回金田（转下页注）

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具〈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平南县所管，与腾〈藤〉县相连。起义之处。与我家两隔七八十里，具〈俱〉是山路难行。（金田至大黎三百餘里，花州〈洲〉山人〔村〕起义处所隔大黎我家中七八十里。）^①此时我在家。知到金田起义之信，有拜上帝人传到家中。后未前去，仍言〈然〉在家。所知未久，金田之东王发人马来花州〈洲〉，接天王到金田会集矣。到金田，有大头杨〈羊〉、大里〈鲤〉鱼^②、罗大纲^③三人在大黄〈湟〉江口^④为贼，即入金田投军。该大头杨〈羊〉到金田见拜上帝之人不甚强壯〈壮〉，非是立事之人，故未投也，后投清朝向提台。^⑤至罗大

（接上页注⑥）宣布起义。李秀成此处所说“并无一人得悉”的话是错的。请参看拙著《金田起义考》。又案胡以晔出身地主阶级（据丁守存《从军日记》），曾中武秀才，在当地有势力，冯云山去动员他加入拜上帝会（据《光绪潯州府志》）。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二月，攻克安徽庐州，论功封护国侯，旋改护天侯，甲寅四年五月，进封豫王。乙荣、丙辰年间随石达开出师江西，不久在江西临江郡病死。

①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写在簿眉上的。

② 大头羊是张钊的绰号，大鲤鱼是田芳的绰号。张钊、田芳都是广东鹤山县人，波山船水手，往来广西潯、柳江上。清道光二十八年，驾波山船横行江上，先扰广东的三水、封川，遂溯流而上广西，从梧州到潯州和柳州，旁及沿江村墟，都被蹂躏（据《股匪总录》卷三）。《天情道理书》记有大头羊事说：“时有大头妖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藉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未几，而大头羊果然叛逆。”李秀成说大头羊“后投清朝向提台”。案向提台，为广西提督向荣。考张钊和田芳是向思恩知府刘继祖投降，而不是向向荣投降，李秀成的记载是错了的。《股匪总录》记张钊、田芳事说：“三十年口月，至金田，洪秀全欲留之。时秀全将往潯州，招集诸匪党会于金田，钊藐之，出就思恩知府刘继祖抚，率炮船随继祖泊武宣勒马滩，遇秀全。秀全故不能至潯州。咸丰二年三月，秀全犯省城，钊督炮船与田芳等由阳朔溯流来会官兵，因贼夹击，不能至，泊斗鸡山下。”后来这两个强盗都被清朝杀死，张钊于清咸丰二年秋被两广总督徐广缙杀死（据清咸丰二年九月初二日徐广缙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八，案《股匪总录》说张钊于清咸丰三年在广西容县自良墟为团练格杀，误）。田芳则于清咸丰三年七月在广西梧州被同知褚必航杀死（据《股匪总录》卷三）。

③ 罗大纲，广东揭阳人，游侠江湖，入天地会。清道光末年，在广西潯、梧江上，专打劫地主富商。金田起义、前来参加，屡建大功。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攻克镇江，以大纲镇守，防备外国侵略者闯入长江。甲寅四年二月，调回天京，经略安徽、江西等地。这年十月，与翼王石达开在江西九江大破曾国藩湘军。乙荣五年夏，与敌水师在天京近畿兔儿矶大战，中炮死。大纲剽悍机警，与众同甘苦，深得众心，用兵剽迅如风，雄杰冠诸将。凡遇军事艰危的时候，辄派他前去应敌，所向克捷，名震敌国。

④ 大黄江口，应作大湟江口，又简称江口，在广西桂平县东北五十华里，当相思江与潯江会合之口，为水陆要冲。从大湟江口向西北行约二十六华里，便是金田村。

⑤ 向提台指清朝广西提督向荣。金田起义，向荣即带兵来抗拒太平天国。太平军既克武昌，清廷任命向荣为钦差大臣，尾随太平军到南京，驻军孝陵卫，称为江南大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被太平军击溃，逃至丹阳自缢死。

纲与大头杨〈羊〉两不相和，后罗大纲投之。（此时上〈尚〉在家，入营之后，罗大纲谈可〈及〉底细，故而写入。）^①天王到金田之后，移营上武宣东乡^②、三里^③，招齐拜上帝之人，招齐武宣之人，又上象洲〈州〉招齐拜上帝人马，招齐仍返金田、新圩。^④（自武宣移营上象州，破庙王^⑤清营之

- ①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写在“大里〈鲤〉鱼、罗大纲三人在大黄〈湟〉江为贼”这一行的旁边的。
- ② 东乡，在广西武宣县城东六十华里，东接桂平县界（据《武宣县志·武宣县略图》）。考太平军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二月初八日（即清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夜间，从大湟江、牛排岭经新墟漏夜入紫荆山，向武宣县东乡进军（据李星沅清咸丰元年二月十七日《会奏官兵焚攻金田匪巢穴贼党败窜折子》，见《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一）。二月初十日，进抵东乡（据李星沅清咸丰元年三月廿八日《奏报亲往武宣督剿折子》，见同上书卷二十二）。二月廿一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称天王（见拙著《金田采访记》第七节考据，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内）。关于太平军在东乡事，署广西巡抚周天爵《致周二南书》说：“二月初一日出省……于十二日甫抵武宣，而教匪偷越紫荆山而来，如虎兕出柙，先锋已到三里墟矣。且〈其〉大营在东乡，即韩襄毅公所谓大藤峡之后户，自昔为韩观、韩雍、陶鲁以及我王文成公用兵几千万众，积年麇兵之所。其大战场即武宣之东面三里墟。……十三日……扎营于云湖村之岭，与三里墟人声相闻。十四〔日〕，我趋其地，见营外村庄与官兵莫〔漠〕不相属，孰知其不去者六七十村皆贼也。遂拔营退回朝钟桥之西。”（此信据清光绪五年八月廿三日《申报》载）周天爵这封信，可以看见当时东乡一带六七十村参加革命的情况。清咸丰元年四月廿七日，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奏说：“臣于四月初三日抵武宣军营，一路访问贼情，其土匪有十馀股，皆乌合之众，其凌十八会匪一股，亦类土匪，惟武宣东乡会匪，谋为不轨，立有伪王伪官名目，留发易服，众至万馀，凶勇鬼蜮，实为广西腹心之患。……武宣东乡地势，四周皆山，西临右江，中间平阳不过五六十里，间有小山重岭，其内大小村墟共有六十馀处。东乡一带，均被贼匪占踞。四面隘口，早经署抚臣周天爵，提臣向荣分拨兵勇扼要堵截。俟兵力稍齐，即可分路进剿”（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乌兰泰这一封奏折，可以看见当时天王登极后，设官分职，留发易服，以及清军在东乡四面隘口，扼要堵截的情况。这些，都可供读李秀成此处叙述的参考。
- ③ 三里，墟名，在广西武宣县城东南三十华里（据《武宣县志·武宣县略图》）。
- ④ 新墟，在广西桂平县东北，距城六十华里，东去大湟江口约十八华里（据《桂平县志》卷十九《纪地·城市》）。关于太平军从象州返驻新墟事，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的机要随员王拯《书愤》道：“六月朔四日，桂州入元旌。是日贼返走，中平还紫荆。……（六月四日，贼由中平、百丈还走入紫荆……）……双髻矗后户，宣墟厂前庭，十日猪崽夺，蜚弧夜先登（向师剿夺猪崽峡，遂得双髻山险）。将军落天上，卷甲势岂停，悖哉都护谁？不鼓从而钲（双髻山既破，我军欲星夜进，某都护执五不可）。花雷走群凶，风门奋空霆（逆全等不三日尽弃花雷、花地诸巢遁，出山踞宣墟。我军至十六日，复破风门坳，断后贼）”（见《龙壁山房集》卷七）。案宣墟即新墟。
- ⑤ 庙王，墟名，在广西武宣县城北约九十五华里，与象州交界（据《武宣县志·地理》二章《疆域》；周天爵等奏报作庙旺，说属象州）。考太平军从东乡北出庙王，系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四月十五日（即清咸丰元年四月十五日）夜间，全军于两夜一日已经全部到达庙王，并未遇到堵截。清军贵州镇总兵秦定三防北路，初则迁延不敢追，嗣经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前来催促，始带兵去追，到追及，稍一接仗，又退走（据清咸丰元年（转下页注）

战,到象州中平^①马安〈鞍〉山^②战。马安〈鞍〉之战,清军死亦不少,天朝死亦不少。自金田移营过武宣,双界〈髻〉顶^③之战,两家死人不少。)^④屯紮数月,当被清朝之兵四困。(那在新圩之困,清将向提台及张敬修^⑤之

(接上页注⑤)五月初二日周天爵、向荣、乌兰泰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庙王北二华里许古城地方有清兵一千二百名扎营盘四座防守。太平军既至庙王,即前往攻破(据清咸丰元年四月廿七日乌兰泰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故太平军从东乡向庙王进军,并没有发生大战。李秀成说:“破庙王清营之战”,“清军死亦不少,天朝死亦不少”,他这时尚未参军,此事得自传闻,是有误听误记之处的。

① 中平,墟名,在广西象州城东七十华里(据《同治象州志》上《纪地》及《象州全图》)。太平军入驻中平墟,在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四月廿一日,即清咸丰元年四月廿一日(据清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乌兰泰奏)。

② 马鞍山,离中平墟东约三华里(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一五六页;案《同治象州志》上《纪地》说马鞍山在象州城东四十华里,与中平墟相距较远,核与当时战场不合,故此处从《汇编》所记)。马鞍山之战,在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四月廿七日(即清咸丰元年四月廿七日),太平军分七路进攻清军贵州镇远镇、古州镇、威宁镇三镇营盘。清军利用大炮死守,太平军冒着敌人炮火,踏着血路前进,几乎把敌营攻下(据清咸丰元年五月十五日周天爵、向荣、乌兰泰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五月初十日,又发生太平军七名战士,进攻威宁营,清军千名全行弃营奔溃的惊人战斗。这一役,连清军统将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在上奏皇帝时,也不得不供说:“伏思千兵不敌七贼,实出情理之外”,而自请治罪(据清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乌兰泰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五)。关于太平军在象州事,当时象州人覃元苏写的《象州乱略记》说:“咸丰元年,洪逆大股由平南而武宣,而象州。四月二十日,入象之安中、安上二里屯踞,其伪太平天国王居新在〈寨〉村。前锋居中平墟、仁义、谢官等村。乡人逃避一空。月底,逆党入大乐〈村市名〉,分司冯公死之。五月初,统领向军门荣追踪始至,兵近万,扎驻界岭〈村名〉一路;扼其前,乌都统兰泰兵一二千驻罗秀,扼其左;皆去贼十里内外,每数日,贼来攻营;官队半道迎击,罔不北,有跪受贼刃者。乌都统一军,旋独蹙山侧,被贼兜胁,入水死者半。又有周中丞天爵兵数千,自州城督队来,欲攻其后。逆党前迎,直犯周师,兵败数十里不能驻。……六月四日,〔贼〕仍退下武宣。”从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记载,可以看见太平军进入和退出象州的日期和一些情况,也可以看见当时清军的腐朽无能。

③ 双界顶,就是双髻山顶,“界”为“髻”之误,在广西桂平县北紫荆山西,罗渌洞北,为桂平、武宣两县交界险要。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六月初四日(即清咸丰元年六月初四日),太平军从象州中平墟回军金田(据清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赛尚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六),前以新墟为门户,后以猪仔峡、双髻山为门户,以拒清军(据清咸丰元年八月初一日赛尚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七)。七月十五日清军分路进攻,并先期密派兵勇由间道翻山爬岭,乘夜至猪仔峡、双髻山等处各隘口,绕出上路合击。太平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兵单不敌,猪仔峡先失,双髻山顶亦被攻陷,然后从小路南退(据清咸丰元年八月初一日赛尚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七)。这一个战役,是在象州回军金田后才发生,李秀成说此役是“自金田移营过武宣”时发生,这是错的。

④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写在簿眉上的。

⑤ 张敬修是清朝署右江道(据清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赛尚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七)。他是广东东莞县人(据清咸丰九年六月初二日两广总督调任四川总督(转下页注)

困我也。)^①后偷由山小路而出隘関，出到思旺、思回^②，逢着清朝向提台官军紮营数十座，经西王、南王打破，然后出関^③，由八筒（垌）水^④而到大旺圩^⑤，分水早上永安州。

此时我上（尚）在家中，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经过，是（自）梧州腾（藤）县五十七都大黎里^⑥而上永安。在家贫寒，父母养我兄弟二人，弟李

（接上页注⑤）黄宗汉、署广东巡抚毕承昭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经钦差大臣李星沅遵旨调来广西对抗太平天国。他带的广东省东莞勇（清朝经制的军队叫做“兵”，临时招募事定遣散的军队叫做“勇”），据李星沅奏报说：“随同打仗，最为得力”（据李星沅《会奏复陈饬发奏单事宜并查复张敬修等分别饬调详查片子》，见《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二），在当时清朝调到广西作战的军队里面，还算能够打仗，所以李秀成此处提及这人。

①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写在簿眉上的。案这几句话，与上面圆括号内“自武宣移营上象州”等句虽并写于簿眉上，但并不相连，系分两段写，前段字迹小而行密，后段字迹较大而行亦较疏，故应各就夹注处插入。

② 思旺，墟名，在广西平南县西北四十华里。思回，应作思迴，村名，在广西平南县西北二十华里（据《光绪平南县志》卷二《輿地略》）。

③ 太平天国这一役是在平南县思旺墟官村大战，是一场大战役。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机要随员丁守存《从军日记》咸丰元年八月廿五日记道：“谨按是役向提军绕截贼之前路，八月二十日贼方入思旺墟，向提军已至距官村五里。将扎营，有平南秀才禀称前面官村岭，距思旺二里许，俯瞰思旺墟，正当贼赴平南之路，其地可以扎营，向提军允之。诇阴云骤合，大雨盆倾，火药皆湿，兵役并无雨具，营盘未立，锅帐器械，因泥淖亦未到齐。稍霁时，贼即由墟中拼死冲出，我兵枪炮不能点放，贼势凶狂，我军全溃，败入平南，后路锅帐、车械、辎重皆为贼有，各将帅仅以身免。贼乃益肆鸱张，各处会匪叠起接应，此乃成败一大转关也，非人谋之不臧，殆劫运之未尽耳。先是向提军约乌都统以秦定三兵为之接应，届期秦军在山峡中，为贼所阻，不果至，事会之艰，令人扼腕。”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也说：“贼由新墟复窜而出，向军拔追，自北而南，绕道数十里，犹及贼前。官村一战，此老愤极，意将一鼓而悉歼之，此即尝在乌营与向为仇讐者言之，未尝不如是也。不谓地既冒险，天复骤雨，大不利军，而其预调南路策应之军，又逾时而不至，而使其屡战屡捷锐气方张之兵，一挫几于全覆，此又事机之一大可惜者也。窃闻向老自言，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于是蒐合残敝，与巴退保平南县城”（见《龙壁山房集》卷二）。据丁守存记向荣追太平军至官村，营盘尚未立，即为太平军所破，全军都溃，李秀成所记“逢着清朝向提台官军扎营数十座”的话是错的。

④ 八筒水，应作八垌水，在广西平南县西北路三里（据《光绪平南县志》卷一《图》、卷四《輿地略》）。

⑤ 大旺墟，在广西平南县北八十华里，临大同江，北接永安州（据《光绪平南县志》卷四《輿地略》）。

⑥ 大黎里，日本菊池秀明于1986年及一年后曾三次访问这个山乡，他在《忠王李秀成故乡访问记》里说：“大黎乡位于藤县西北端，毗邻蒙山县（旧称永安州）、平南县同和乡（大同里）。它离县城约有五个小时左右的汽车山路，驰过崎岖山路，便来到了大黎街。它是一个坐落在一块狭小盆地里的小镇，大黎乡全乡面积二九三平方公里，方圆（转下页注）

明成^①，家堂兄堂弟堂叔多名，未便细写，将大概来由写呈。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自八岁九、十岁，随舅父读书。十岁之上，具〈俱〉自与我父母寻食度日而已。是〈至〉廿六七岁，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自拜上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至天王由思旺到，到大黄〈旺〉圩，分水旱两路行营上永安州，路经大黎经过。大黎处所，四面高山，平地周围数百里，西王带旱路兵由大黎经过，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及罗大纲带。水路兵是东王、南王所带。西王、北王带旱兵在大黎里屯紮五日，将里内之粮谷依〈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山，亦被拿去。西王在我家近村乡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全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具〈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家〈加〉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安^②，即在州城屯紮数月。后载〈赛〉中堂^③及乌、向^④大军四方围困，内外不通。后有姑稣冲^⑤一条小路而过招

（接上页注⑥）巍峨群山耸立，六练山、青山顶等海拔八百米左右。大黎街四周附近约有二七〇〇亩平地的耕地面积，除此之外，散布在山间的坡地最多不会超过二三十亩。……据说，太平天国时期，最多也不会超过四五千人”（见茂名市史学会信宜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史学园地》1991年第一期）。

- ① 李明成，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间，封爵天义（据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爵天义李明成《致英国番译官福书》）。后进封扬王。癸开十三年六月守江苏吴江（据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初六日扬王李明成《谄谕清营官兵》）。天京陷后，突围出走。乙好十五年四月随侍王李世贤与敌大战于福建平和县（据左宗棠《追剿贼大获胜连克平和漳浦云霄各城折》，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二）。旋转战闽、粤间（据左宗棠《越境剿贼叠胜并击退闽边窜贼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四）。这年十月，战败，在江西降敌（据刘坤一清同治四年十月十一日《复刘克庵》，见《刘坤一遗集》第四册《书牍》卷三）。
- ② 太平军克广西永安州，在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又八月初一日，即清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据清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赛尚阿、邹鸣鹤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七）。
- ③ “载中堂”，为“赛尚阿”之误。赛尚阿是清朝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清咸丰元年三月，受任为钦差大臣，六月到广西督师，屡经挫败，二年夏，太平军遂北出湖南，这年秋，进围长沙。清廷革赛尚阿职，拿问，解交刑部治罪（据《清史列传》卷五十二《赛尚阿传》）。
- ④ 乌、向即乌兰泰、向荣。乌兰泰，清朝广州副都统，咸丰元年二月，清廷命驰往广西帮办军务。二年三月，在桂林将军桥被太平军打败，中炮伤死（据《清史列传》卷四十四《乌兰泰传》）。
- ⑤ 姑稣冲，即古稣冲，或叫古苏山口（向荣《致乌兰泰书》，见《乌兰泰函牍》），也有叫古束山口（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在广西永安州东南二十华里，与昭平大山界，是永安州的一个要隘。《光绪永安州志》卷四《兵志》记古苏堡隘说：“咸丰初，洪逆出古苏冲，即此。”

〈昭〉平。而姑稣冲是清朝寿春兵^①在此把守，经罗大纲带领人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関，得火药十餘担，方有军资，不然，上〈尚〉不能得出此関。困在永安，并未有斤刃之火药，实得姑稣冲寿春兵火药十餘担之助，方可出関。^②至永安水斗军营，是天官丞相秦日昌守把^③，清朝之军，是张敬修为

① 寿春兵，是清朝绿营的一个镇的军队，绿营寿春镇建立在安徽省寿州。清咸丰二年八月初六日清两江总督陆建瀛奏：“前已调派安徽寿春官兵一千名前赴广西”（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六）。李秀成所说的寿春兵，就是这一支绿营军队。

② 关于太平军攻破清军东路线事，考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机要随员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说：“二月十六夜，贼突已自东面古束山口全数窜出。方其将窜前数日间，古束口外黔兵及东勇营盘被贼焚扑，请救甚急，大帅疑之。时蒙在大营闻之，力必以劲军相应，大帅乃命前镇军李瑞往探，又饬向军以提标勇三千人与之，蒙即离营，不知何以贼窜而此军已先归也。”案大帅，指赛尚阿。又随福建漳州镇总兵长寿在前敌大营办理文案的萧盛远，在所著《粤匪纪略》里记叙更详，说：“派随同长镇前往昭平、大洞一带防堵。……远同长镇行至大洞，查看地势；当以此处为永安东路，直通桂林省城，仅有已革参将王梦麟带贵州败兵三百名，在彼堵御，殊不足恃，稟请添兵扼守，未荷允行。复由长镇函致邹抚军，恳其转请，声明大洞一带，多系崇山峻岭，在旁观者逆匪必不从此窜逃，不知此股逆匪生长山谷之中，翻山越岭是其惯伎，且头头是道，岂可以三百无用之兵，一员屡败之将，当此要地，未免过于轻视。务请拨给精兵三千，以便守御。邹抚军将原函送阅，仍未邀准。”又记道：“二年二月十二日，逆匪意欲窜走，先以数千人前往大洞一带探路。我军本止数百，不仗而溃。自应赶紧多派官兵，驰往扼要堵守，乃仅令总兵李瑞往看情形，如何堵御，并无良策。十六雨夜，逆匪大股直趋大洞一带而走。”案大洞距永安六十华里，离古苏冲四十五华里（据向荣《致乌兰泰书》）。萧盛远所说的大洞一带，是把大洞到古苏冲一带地方都包括在内。据上引两条记载，可以考出三项事实：一、守古苏冲清军，为贵州兵和广东勇，李秀成说：“姑稣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应以清朝方面与此事有关的重要人物的记载为据，二、罗大纲领军去打破清朝姑苏冲防兵的日子，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廿八日（即清咸丰二年二月十二日）；三、姑苏冲清防兵被攻急时，钦差大臣赛尚阿从王拯的建议，派总兵李瑞带兵去救。关于李瑞带兵去救情况，王拯说当时已离大营，不明情况。萧盛远只说李瑞如何堵御，并无良策。考《光绪永安州志》说：“官军四面俱到，贼困不得窜出。……又东古苏冲则寿春兵守之。最后又有李口率军到，屯古苏村背，筑垒未成，贼悉精锐来犯，阵锐甚，自辰至酉，官军不支，李营破三”（见卷四《兵志》）。案所记古苏冲为寿春兵防守，当是据自《李秀成自述》；至所记李口，即总兵李瑞，率兵到古苏冲的战事，却是当地保存下来的旧闻，可补王拯、萧盛远记叙所未备，而可供李秀成此处记事的参考。又太平军困守永安时，火药用尽事，《天情道理书》也说：“壬子岁，时在永安州，粮草殆尽，红粉亦无。”案红粉，即火药，可与李秀成此处记载参证。

③ 案水斗，清朝官书作水窰（据清咸丰二年二月廿八日赛尚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光绪永安州志》作水秀，在永安州南。水窰军营是当时太平军精锐所在，辛亥闰八月廿八日午刻姚莹《濛江虎船撤防状》云：“贼在永安州城，而以精锐驻营水窰，其外备船三十餘只，以为外窰入江之计。……濛江乃水窰入江之水路，最为紧要”（《中复堂遗稿》卷三）。姚莹致乌兰泰函又说：“水窰及莫村皆贼精锐所在”。乌兰泰上赛尚阿禀也说：“水窰一破，则莫家村、州城可冀有破竹之势”（见《乌兰泰函牍》）。

将困打。后移过仙回〈迴〉^①，被乌帅大军追赶，杀死天朝官兵男女式千余人。众见势甚太逼，大众次日齐心，与乌军死战，复杀死乌军四五千。乌帅被伤，在六塘圩身故。^②

自杀胜之后，东王传令，不行招〈昭〉平、平乐，由小路过牛角瑶〈瑶〉山^③，出马岭^④，上六塘、高田，围困桂林。^⑤一月有馀，攻打未下，退军由象鼻山渡河^⑥，由兴安^⑦到全州。攻破全州^⑧之后，南王在全州阵

- ① 仙回，应作仙迴，山名，《光绪永安州志》卷四，《兵志》“仙迴营”条记说：“仙迴营在州东南七十里，地有仙迴洞，亦曰仙迴山，东北距昭平百二十里。”
- ② 永安突围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三月初三日（即清咸丰二年二月十七日）丑刻（据清咸丰二年三月初十日邹鸣鹤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一）。永安之役，太平军突围，先败后大胜，斩清朝总兵长瑞、长寿、董先甲、邵鹤龄，遂长驱攻桂林。这一役，清军大营翼长姚莹亦有简要报告，他《与严方伯信》说：“大兵追贼，十八日及于仙迴岭，杀毙二千馀贼。……二十日又追至前山，大雾迷漫，为贼所败，二长镇及邵、董二镇均被难。各将死者甚多。乌之兵仅数十名，一将田学韬，可惜之至。向之兵将自四镇外死者八百名，此真不料之事”（见《中复堂遗稿》卷五）。我们将姚莹信与李秀成所记对看，太平军先败后大胜与战死人数，两方的记载是相同的。但据姚莹所记清军伤亡的十分之九是向荣部下，乌兰泰部只死亡几十名，而清军全部的伤亡也不过千人，与李秀成所记“杀死乌军四五千”的话不同。又乌兰泰是追太平军到桂林城外将军桥受炮伤，退军六塘墟，旋回阳朔死（据《清史列传》卷四十四《乌兰泰传》）。他因伤致死，并不是在永安之役，李秀成所记是错了的。
- ③ 牛角瑶山离永安州六十馀华里。姚莹《二十四日溃贼所至状》说：“闻土人言，贼头子尚在牛角瑶〈瑶〉，离永安六十馀里。……牛角瑶〈瑶〉山路难行，似宜探明路径”（见《中复堂遗稿》卷四）。
- ④ 马岭在广西荔浦县。关于太平军出马岭情况，姚莹《陈贼必上省状》说：“本月二十二日，中堂派向提军大兵前防荔浦，二十五日又派乌都统继去，皆为堵截贼匪。兹于二十七日，詎闻贼见兵勇在马岭，不敢前进，另从山路行出马岭之后，已到高田，其势必上省城。除见中堂请饬向、乌二位飞速赴省外，特此驰报”（见《中复堂遗稿》卷四）。
- ⑤ 案太平军本来是从永安的东面突围，指向昭平、平乐方面的。到了把敌人追兵打败之后，就折而西向，从小路过牛角瑶山，出荔浦县马岭北进，经阳朔县的高田墟、临桂县的六塘墟，向桂林进攻。《光绪永安州志》记太平军在突围打胜仗后事说：“逆由南洞绕道牛角瑶〈瑶〉山，过荔浦马岭，出六塘墟，日夜兼程以进，伪官军旗号欲袭省垣。而向帅闻贼出荔浦，知其谋，自率大队星夜取捷路入省城。才一刻，贼到扎将军桥，未及攻城，乌帅兵亦到，遂开仗，督阵甚严，为飞炮伤，退军六塘，殁焉”（卷四《兵志》）。
- ⑥ 太平军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三月十五日（即清咸丰二年二月廿九日）进攻桂林（据清咸丰二年三月十三日邹鸣鹤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一）。于四月十五日（即农历四月初一日）撤桂林围北出（据清咸丰二年四月十三日赛尚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二）。又象鼻山在桂林文昌门外漓江边。李秀成所说“由象鼻山渡河”，即指从漓江的西岸渡过东岸。
- ⑦ 太平军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四月十八日（即清咸丰二年四月初四日）克广西兴安县，打捣衙署和放开监狱后，即北进（据清咸丰二年四月廿八日邹鸣鹤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二）。
- ⑧ 太平军攻克全州的日期是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四月卅日（即清咸丰二年四月十六日），系在城下开挖地道，安放火药，炸开城墙攻入（据清咸丰二年五月初六日（转下页注）

亡^①，计议即下道州^②，打永明^③，破江华县^④，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

（接上页注⑧）赛尚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三）。这是太平天国用地雷攻克城池的第一次。关于这次战役，王可陞《戎幄塵譚》记说：“咸丰二年春……辍耕应募。三月杪，从都司伍昌宣行过全州。贼已于二十七日突出永安，犯桂林。我军进次韩水司，谍知贼攻桂林不下，东破兴安县，将及全州。四月初四日，我军还保州城。次日，贼果至，晓夜环攻，迭经矢石击退，夺获云梯三百架，杀贼数百。贼愤攻益急，居民以守城兵少，日盼援军。时总兵和春、秦定三、游击张国樑等潮勇、捷勇万余屯太平铺，距城八里，战不利。十六日巳刻，地雷发西城，城陷。余从伍都司守东门。须臾贼至，伍督战城上，手杀数贼。贼来愈众，急集败卒百数夺门出，途中贼骑充斥，节节苦战，及登寿佛寺山，则十二人耳。南望太平铺军帐叠叠，知援军犹在，急奔之，和公战城北方归，详询来历，收隶乾镇河标营。”

- ① 关于南王冯云山之死，清朝方面的记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是进攻全州时战死的，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冯云山传》说：“壬子四月，攻扑全州，都司武朝显以劲兵四百，与贼大小十数战，更率百姓登陴，以热桐油稀饭浇之，十日之内，毙贼无算，云山亦死乱军中。”苏凤文《平桂纪略》卷一记太平天国攻克全州事说：“湖南都司武朝显引兵四百至州城，与城中官军固守，贼据城外江西会馆，穴墙置炮，轰击西门，守陴者不能立，贼匿民房穴城下置火药，十六日火发，崩塌城垣二丈馀，贼蚁附登，忿城固守，贼党冯云山毙于炮，屠杀甚惨。”另一种说是进军湖南，在全州境蓑衣渡与带领地主武装的江忠源大战时中炮死，左宗棠、郭嵩焘撰的《新宁江公行状》说：“将顺流犯长沙，掠民船数百，载逆属及所掳金帛子女。公令所部于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连营西岸力扼之。贼觉来斗，以悍贼护船，更番迭进，鏖战两昼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悍贼毙者数千，辘重尽丧。”《清史列传》卷四十三《江忠源传》也记冯云山中在蓑衣渡中炮死，就是据自《行状》。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真实呢？据1942年5月，简又文到全州调查，写了一篇《全州血史》，他说：“据各种史籍所载，则全州战事之发生，系因全城文武官员死守，督率兵勇人民合力抵抗所致。然据吾人采访所得，则地方人士交口传言，金谓当时致祸之由实因城上守军先开炮轰中南王冯云山，于是惹起大祸。”他接着说：“初太平军既抵境，本无攻城意，即如在兴安之和平过境而已。……前队已远过州城，后方押队者有黄轿一乘，簇拥而过。近州城西郊，适为城上参将部下一炮兵所见，知为首要。乃不俟命令，乘一时冲动，径取火燃土炮，对正黄轿施放。轰然一声，果然命中，乘轿者非他，即太平天国副军师后军主将开国第一功臣南王冯云山是也。至是竟被击中要害。全军大愤，遂决回师攻城以复仇雪愤。有谓南王登时身死者，即《平桂纪略》亦有因其党冯云山毙于炮，屠杀甚惨之言。但据官书及清吏奏报均言南王实于破城后全军走至蓑衣渡时中炮阵亡者。《新全各县志》编修者王竹斋先生对此事表示意见，则谓南王确先在城外中炮受重伤，由是惹起攻城浩劫。惟城破后数日大军出发时，昇至蓑衣渡始行去世云。证以吾人后来在蓑衣渡采访所闻，则此说可信也。王先生又言：擅自开炮闯祸之炮兵，于城破时跳垣得免于难，其后积功升至守备，多年后始敢私对人言，叙及往事经过；其人姓名籍贯，城内多有识之者（王君谈话间偶忘其名），是其人其事，凿凿有据，则上述之传说，殆非虚语矣。”他在记到蓑衣渡访问事又说：“余等由渡口东岸弃舟登陆，相将步行至一村庄之陈姓农家，亟与村人攀谈当年战事，另邀村中八十岁老者二人到宅，叩问其所知所闻之战况。据一般传说，蓑衣渡战事大概与上述者相同，且当时确有一王爷在此去世。或则云，南王系在渡口东岸北三里之雷家庄前逝世者。……由本地土人之传说，又可证实南王确在蓑衣渡毙命。参合城内同样确凿之传说——在西郊中炮，则其先在城外受重伤致引起攻城屠城之惨剧，卒乃抬至蓑衣渡身亡——此殆不易之结论矣”（见《金田之游及其他》）。案张德坚《贼情汇纂·冯云山传》注说所记冯云山事系据朱祖培、朱宸、方靖、罗凤池（转下页注）

(接上页注①)等所说。查卷首采访姓名所记这四人的履历,都是在广西参加抗拒太平天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所说应该是有根据的。至《平桂纪略》的著者苏凤文也是当时在广西抗拒太平天国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记载也应该是有根据的。又《贼情汇纂》是汉奸曾国藩行营采编所编辑的情报,供曾国藩的查阅,而江忠源却是曾国藩第一个爪牙,假如南王冯云山确是在蓑衣渡与江忠源大战阵亡,即使《贼情汇纂》执笔的人记错了,曾国藩也一定把它改过来,断不会让这样的大事如此错误下去的。不仅如此,就是曾国藩撰的《江忠烈公神道碑》所记蓑衣渡之役事也只说:“大捷于蓑衣渡,贼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见《曾文正公文集》卷二),并没有只字提到在此役打死南王冯云山之事。请问:如果确有这样的一件大事,曾国藩还不给他最得意的爪牙来大吹大擂吗?而就在同一篇神道碑中,曾国藩就把江忠源抗拒革命的汗马“功劳”,一件又一件地举出来,说什么“破贼目晏仲武于巴陵”,“剪叛民刘立简于通城,缚陈北斗于崇阳”呢!再考江忠源《答刘霞仙书》自述蓑衣渡之役也只自吹说:“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江忠烈公遗集》卷一),也没有说到打死南王冯云山的事。根据以上种种证据,可知左宗棠、郭嵩焘所撰的行状,不过是要放大江忠源在蓑衣渡之役抗拒太平天国的“功劳”,而实在是没有打死南王冯云山的事的。全州在湘、桂边境,太平天国放弃围攻桂林北出,目的就是向湖南进军,断无围攻之理。太平天国之所以围攻全州,据1942年简又文所调查的全州地方传说与《平桂纪略》所记,实因全州反革命守城军炮中南王冯云山之故。这一个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据《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初稿)第一辑,196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到全县调查,所记全州师范学校唐雅文说:“相传当时太平军过全州,从清湘寺门前大路向湖南前进,本无意攻城,后因城上发炮打伤人,才愤而围攻州城”,知道这一个传说直到最近还是保存下来的。

② 太平军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五月初二日(即清咸丰二年四月十八日)从全州出发(据咸丰二年五月初六日赛尚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三)。于五月初九日(即清咸丰二年四月廿五日)克湖南道州(据清咸丰二年五月初十日程裔采、骆秉章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三)。关于太平军攻道州事,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说:“寇入湖南境,将趣永州,阻水退出道州。”《光绪零陵县志》卷十二《事纪寇变》说:“咸丰二年粤逆洪秀全由全州犯零,将薄城,以大水不得渡,乃捉队屯河西。时总兵孙应照、知府徐嘉瑞、知县胡廷槐等督兵堵西城,贼列阵愚溪桥与相敌。……以大水难骤退,遂去道州。”《光绪道州志》卷六《寇变》说:“咸丰二年四月,粤逆……破全州后,欲攻永州,至黄沙河,因春水泛涨不能渡,遂由山路逆窜上州。”刘长佑《札记》所记更详说:“贼由蓑衣渡弃舟登陆,窜至永州东岸。适江水大涨,不能渡,侦知后路追兵且至,乃悉众窜道州。由双牌铺至濂涛湾,计程七十餘里,皆傍山临水,路极险峻。贼至其中,互相骇盼……奈前路并无一兵堵御,使贼从容过去。又离州城数里有斜陂渡,向设浮桥,官军由此退守州城,不即将桥撤去,追兵踵至,贼已将桥撤散,并将上下游船只掳至水南。追兵设法搭桥渡军击贼,而州城已破,贼营亦屹立城外矣”(《刘武慎公遗书》卷二十五)。据上引各书参订,知太平军向湖南进军,本来预定从湘水直下长沙,后因蓑衣渡被打塞,弃舟登陆,进到永州东岸,适江水大涨,不能渡,遂旁趋道州。经过濂涛湾的险峻,进入道州,势乃大振。江忠源《答刘霞仙书》说:“斯时吾楚若稍有防堵,前后夹攻,何难聚而歼旃。乃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先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这一役,太平天国行军处处遇到险阻,可是,由于领导者应付的英明与迅捷,所以能逢凶化吉,把坏事变成好事了。

③ 太平军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六月廿五日(即清咸丰二年六月十三日)克湖南永明(据清咸丰二年七月初五日赛尚阿、程裔采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五)。

④ 太平军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六月廿日(即清咸丰二年六月初八日)克湖南江华(据清咸丰二年七月初五日赛尚阿、程裔采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五)。

明之众，足有式万之數（谱）。^①此时追军，即向、张^②两军。后移师到柳（榔）州^③，入柳（榔）州亦招二三万众，茶凌（茶陵）州亦得数千。^④后移营，西王萧朝贵带李开芳^⑤、林凤祥^⑥等来打长沙。此时我为兵，上（尚）未任事。西王到长沙攻打^⑦，那时天王同东王上（尚）在柳（榔）州。西王在长沙南门外中砲身死，后李开芳具本回柳（榔），天王同东王移营而未长沙，实力攻打，数十日未成功，连开地道数处，放倒长沙大城^⑧，官兵不能勇（踊）进，外面清朝向、张大军围困，在长沙对面沙洲杀胜一仗，杀

- ① 李秀成此处说：“足有式万之數”，就是说足有贰万左右。“數”应作“谱”。今改正。
- ② 向、张，向指向荣，张指张国樑。考太平军出广西时，向荣称病留桂林。带兵跟追的清朝主将乃绥靖镇总兵和春，而不是向荣（据《清史列传》卷四十三《和春传》）。至此时张国樑官职为守备，是一个下级军官，虽在追兵队内，但还不是统将（据同书卷四十四《张国樑传》）。李秀成说：“此时追军，即向、张两军”，以追兵主将为向荣和张国樑是错的。
- ③ 太平军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七月十四日（即清咸丰二年七月初三日）克湖南郴州（据清咸丰二年七月廿四日咸丰谕内閣，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五）。
- ④ 太平军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七月卅一日（即清咸丰二年七月廿日）克湖南茶陵州（据清咸丰二年八月初十日陆建瀛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六）。
- ⑤ 李开芳，广西潯州人，攻城陷阵，最为骁勇善战，是太平天国的著名大将。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与林凤祥统率军队北伐，九月，打到了天津。明年三月退守东光县连镇。时天京派出增援军队到了山东，李开芳率马队六百多人去迎接，未到，增援军队已经溃散，乃入守山东高唐州。乙荣五年正月，连镇军败后，敌人增兵来围，李开芳率领将士突围退守在平县的冯官屯。敌人引运河水淹灌冯官屯，李开芳突围被俘，在北京牺牲。癸开十三年追封请王。
- ⑥ 林凤祥，广西桂平县人。他是紫荆山内平在山拜上帝会的老兄弟，为太平天国的虎将，与李开芳齐名。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统帅军队北伐。林凤祥从扬州出发，经安徽、河南渡过黄河。八月，西入山西，复折而东回河南，从武安入直隶，直逼保定，震撼了清京，清咸丰已经做了逃遁热河的准备。时清军严扼保定，林凤祥乃从深州乘虚而东，进攻天津。甲寅四年正月，粮尽，向南转移，三月入守东光县连镇。守到乙荣五年正月，粮食吃完了，将士饥倒，始被敌人攻陷。林凤祥被俘至北京，壮烈牺牲。癸开十三年追封求王。
- ⑦ 萧朝贵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八日（夏历七月廿八日）率轻兵到长沙。第二天上午，朝贵指挥将士分向长沙各城门进攻。中清军大炮，洞穿乳部，不治身亡。
- ⑧ 这封《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报告西王萧朝贵中炮伤重上东王杨秀清等禀报》，藏英国伦敦档案局。钞件前有“湘潭县拿获奸细身上搜出书信”等字，不是原件所有。又末尾“程”字下有“不闰八月算”五字，这是钞这封文书的人，对太平天国历法的注释，也不是原件所有。这篇文件全文如下。

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谨禀东北王[两]翼王下各千岁殿下：

敬禀者，□等随西王出师，荷天眷顾，所攻必克，一路福星。本月二十四日寅刻，自攸县起程，二十五日子刻至澧（醴）陵，计一百七十里。是城粮穀（穀）颇有，己（巳）得无数军装、红粉。二十六[日]寅刻，自澧（醴）陵起程，二十七[日]申刻到长沙，离城十里停扎。二十八日辰刻进兵，至巳刻破连营七八里，杀死大小（转下页注）

死清朝官兵数千。^①以后破城，仍然未下，天朝官兵有粮，无有油坩（盐）可食，官兵心壮（壮），而力不登，是以攻城未就。^②

天王在长沙南门制造玉璽^③，呼称万岁，妻称娘娘，封东、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呼万岁在后。^④制造璽成，攻城未下，计及移

（接上页注③）妖官数十餘员，妖兵死者二千有餘，尸堆如山，可得军粮、大小炮甚多，红粉四千餘〔斤〕，骡马不计其数。至午刻在省外铺户停扎，计程三里。卅里城外，米穀（穀）甚多，目下查得粮有十万餘，油盐足用。二十九日，□等欲往（往）进攻，回禀西王带牌刀手往各门进攻。不料妖兵炮打着西王胸膛乳上穿身，十分危急，口眼俱呆。□等得此凶信，十分忧愤，幸有天父照顾交天兄，故事未可料。此省十分辽阔，目下圣兵纵能攻破，亦未得托守之人，恳求九千岁览禀遣上将统带多少圣兵，凡各带干粮三斤，来同进攻，城（城）乃万全圣策也。我主天王来不来，听以旨意，□等未敢冒渎。幸此城尚未修整得好，比全州无足为虑。惟思西王有难，□守靠无凭，只得具禀各王千岁。特达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申刻冲即速连夜起程。

- ① 太平军攻长沙，用地雷攻城三次，第一次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月初七日（即清咸丰二年九月廿九日），在南城西边暗放地雷，城身垫陷四丈有餘。第二次在十月初十日（即清咸丰二年十月初二日），在南月城外离城根丈许，地雷轰发，土石迸裂，城墙没有被轰塌（据清咸丰二年十月初六日湖南巡抚张亮基《敬陈围剿情形并击败扑城贼匪折》，见《张大司马奏稿》卷一）。第三次在十月廿六日（即清咸丰二年十月十八日），将南城轰塌，宽至八丈有餘（据清咸丰二年十月廿三日湖南巡抚张亮基《贼踪纷窜省城解围折》，见同上）。
- ② 李秀成所记长沙对面的沙洲叫做水陆洲。水陆洲这一仗，是太平军在长沙的一场胜仗。干王《洪仁玕自述》说：“在河心孤州用诱敌伏兵计胜捷，溺死清兵不计其数。乘胜奔长沙不围”，即指这一仗说。而清朝左宗棠、郭嵩焘撰《新宁江公行状》所记尤详，说：“贼复遣其党石达开渡湘而西，筑数大营，兼掠洋湖晚稻供贼粮。湘水中一洲，俗呼水陆洲，即古橘洲也，长数里，横亘江心如匹练。贼之渡西岸也，留贼屯洲尾为声援。向公拟先剿之。九月十九日亲率劲卒三千餘，由西岸渡江至洲北，整队而进。贼尽匿洲南树林中，时出零骑诱官军。向公督所部放枪击贼。贼走避林中，徐从林旁出，斜抄官军后。官军初为林木所蔽，不及觉，比贼帜微露，则疾趋如旋风，官军惊溃，健将游击萧逢春、都司姬圣脉战歿，士卒死者千餘。向公与河北镇总兵王代琳骑善马得免。城上诸军望见，为之夺气。”所称向公即已革广西提督向荣，时奉清廷旨遣戍新疆，乃从桂林驰赴长沙，听钦差大臣赛尚阿调遣。左宗棠、郭嵩焘所记这一仗情形，可补李秀成的简略。太平军在长沙缺盐事，敌人情报也得到。清咸丰二年十一月初六日钦差大臣徐广缙奏说：“伏查匪徒此次窜逃，实因盐米将尽”（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九）。黄廷瓚《致蔗京书》述太平军撤长沙之围事说：“昨贼因无盐可食，且火药无磺，是以北窜”（见吴煦档案）。
- ③ 考《钦定敬避字样》在璽璽两字下注说：“有金玉之分”。此处作“制造玉璽”，与太平天国制度不合。若系玉质，应用玺字，今用璽字，则应为金质，此处当有错误。
- ④ 考太平天国封东、西、南、北、翼五王在辛开元年十月廿五日，时在永安（据《天命诏旨书封王诏》）。其《封王诏》中并说明有“另诏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之诏。又辛开元年刻的《太平礼制》定“王世子臣下呼称幼主万岁”，其东、西、南、北、翼五王已有九千岁、八千岁、七千岁、六千岁、五千岁的称呼。在辛开元年十月廿九日《天父下凡诏书》中又说：“其时天父回天既三更矣，众朝臣护天王回殿，山呼万岁后，各职回衙。”据此，知天王的呼万岁，与后宫的称娘娘是跟封五王同时的。李秀成的记载是错了的。

营^①，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庭〉湖边而到常德^②，欲取湖〈河〉南为家。到益阳^③，忽抢得民舟数千^④，后而改作顺流而下，过林子口^⑤而出洞庭，到岳〈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岳〉州^⑥，得吴三桂之器械，盘运下舟，直下湖北^⑦，

- ① 太平军撤长沙围移营的日子，是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月廿七日，即夏历十月十九日（据上引清咸丰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徐广缙奏）。黄廷瓚《致蔗泉书》述长沙之围经过说：“贼匪自七月廿八日围湖南省城，穿地道崩城三次……至十月十九夜窜去。官兵次日始得知悉。计贼匪围城八十日，官兵厚集，总不出剿，未尝稍挫其锋”（见吴煦档案）。
- ② 当日太平军既离长沙，欲取常德，清方也得到这种情报。清咸丰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徐广缙奏说：“探得逆贼已至宁乡，据获犯供称有欲往常德者，有欲往宝庆者。臣等查匪徒既至宁乡，非南窜宝庆，即北窜常德，必须赶紧兜围，遏其奔突”（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九）。
- ③ 太平军克益阳的日子，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月卅日，即夏历十月廿二日（据《同治益阳县志》卷十一《武备》）。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记太平军克益阳事说：“贼破宁乡，知县齐德五先走，遂破益阳，守令陈应台亦走。益阳人香花迎伪太平王。”
- ④ 干王《洪仁玕自述》说：“弃长沙不围，直捣益阳……获舟数千。”郭振墉《湘军志平议》录郭崑焘语说：“巴陵绅士吴士迈诣湖北巡抚常文节以防守岳州水路自任。文节信用之，于土星港设栅遏上下商船万数，贼未至营田，士迈已先遁走，悉以所遏商船资贼，贼遂大炽。”所以《天情道理书》说：“若进长沙驻扎日久，则益阳等处江河船户，不免为妖魔哄吓，远遁他方，我百万雄师，何由得舟楫之便而沿流以破武珰〈昌〉乎？”
- ⑤ 林子口，即临资口，又叫临洑口，在湖南湘阴县西北三十华里湘江西，为出洞庭湖的路（据光绪《湘阴县志图》卷五）。考胡林翼《启吕方伯》说：“十二日赍到粮道乔、抚署左手书皆言贼由益阳之北路南溪（离舍间十里）北赴洞庭，已到林子口、芦林潭。查林子口离舍间三十里，芦林潭离舍间五十里，均湘阴县地方，乃入东湖之路……其为入湘阴，入洞庭，窜岳州明矣”（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十五《官黔书牍》）。
- ⑥ 太平军克岳州日子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即清咸丰二年十一月初三日（据常大淳、双福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九）。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记太平军向岳州进军及克岳州事说：“十月廿六日，贼分前队由堤路抵湘阴对河之林子口，劫船登岸。廿九全股俱至。半由磊石过湖，陆路扑岳州，半由水道。初三日，伪装向提军兵，赚开岳州城，不血刃而城破。”考清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徐广缙、张亮基、罗绕典、骆秉章奏说：“向荣于初四日行抵岳州之新口铺地方，已闻岳州失守。并有巴陵县走出之犯，询据供称岳州官员于初二日先已出城，初三日早知县亦即出城，午刻贼分三股涌至，官兵全行溃散，城门大开，无人把守，该匪随即进城。城内火药大炮及饷鞘一切均已资贼”（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九）。据此，知太平军未到岳州前，清朝官兵都已逃走，可见《粤匪犯湖南纪略》所记赚开城门之说是错的。又考当时清朝防守岳州，由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带兵驻岳州督防。太平军克岳州，系由人民接应。林绍年《张制军年谱》清咸丰二年谱说：“巴陵土匪晏仲武以岳州陷贼，纠众劫军饷应之。”巴陵吴敏树《与欧阳筱岑书》说：“敝郡……民风浇恶，贼未起时，阴有连结，壬子冬，贼自长沙下，即有晏姓者聚众应之”（见《梓湖文集》卷六）。巴陵杜贵堦《光绪十四年言事书》也说：“咸丰壬子岳州失守，勾引逆贼之晏仲五，即系大姓”（见《桐华阁文集》）。
- ⑦ 关于太平军克岳州得吴三桂藏的炮械向武昌进军的情况，当时湖南安化人李汝昭《镜山野史》有一段话描写得很好，说：“祭起吴王炮药，从岳州起程，千船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鼓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计数日驻营鹦鹉洲。”

一攻破汉阳^①，得汉口，困武昌，然后开道破城。此时东王掌令，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掌兵，攻打廿餘日而破武昌。^②后而未守，直到阳罗〈逻〉^③，破黄州^④，取池〈蕲〉水、池〈蕲〉州、九江^⑤，破安省^⑥，具〈俱〉是水旱并行。那时胡以晄、李开芳、林凤祥带陆路之兵，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罗大纲、赖汉英^⑦等带领水军。克得安省未守，赶下江南，将江南四面围困。七日，破由仪凤门开道破城而进。^⑧水面舟只〈隻〉万馀，各尽满载粮食等件。

此时天王与东王上〈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⑨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

-
- ① 太平军克汉阳日子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一月廿日，即清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据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二日陆应穀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十一）。
- ② 太平军克武昌日子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即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太平军从平湖、文昌、滨江各门潜挖地道，轰塌城垣，从缺口攻入（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十二徐广缙奏）。
- ③ 阳逻，镇名，在湖北黄冈县西北一百二十华里，隔江与武昌县分界，是黄冈县的一个大市镇（据《光绪黄冈县志》卷二《厢镇》）。
- ④ 太平军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即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进至黄州，清朝官员弃城逃走，百姓欢迎太平军入城（据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廿八日向荣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十二）。
- ⑤ 太平军克九江日子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十六日，即清咸丰三年正月十一日（据清咸丰三年正月廿四日张芾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十五）。
- ⑥ 太平军克安庆日子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廿二日，即清咸丰三年正月十七日（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十九向荣奏）。
- ⑦ 赖汉英，广东嘉应州人，天王赖后弟，通文史，精医理。癸好三年四月带领军队出发长江西征。九月，以久攻江西南昌不下，调回天京革职，命入删书衙删《六经》。十一月，带军队去救扬州，掩护扬州守军和人民撤退，将士都以功授平胡加一等勋位。赖汉英调为东殿尚书。后来杨秀清要杀他，在赴安庆途中投长江死（据张晓秋原稿本《粤匪纪略》）。
- ⑧ 太平军进攻南京之日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初二日，即清咸丰三年正月廿八日，分水陆两路并进（据蒋厚、陆建瀛、福珠洪阿、霍隆武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十八）。攻克之日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即清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据胡恩燮《患难一家言》、汪士铎《乙丙日记》）。
- ⑨ 天王要取河南开封建都事，当时有一个在天京叫做马寿龄的反革命分子，在所著《金陵癸甲新乐府·天父下凡》中也记其事道：“惊传天父下凡间，或言天府中有巾幗，当予东王侍枕席，否则天王笞四百。或言天王思迁河南都，变妖当扑殿之肤，否则天王砍头颅”。据此，天王在建都天京之后，还坚持迁都开封的主张。东王杨秀清不同意，但不敢明抗，就假托天父下凡来挟制天王。案天王这一个主张，不论是在战略思想上或政策方针上都是十分英明正确的。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论河南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见卷四十六《河南方輿纪要序》）。（转下页注）

河南^①，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②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险〉，又有舟只〈隻〉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馀，上〈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是中洲〈州〉之地，足脩稳险〈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知〈之〉！”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固〈故〉而未往。此水手是櫟〈驾〉东王坐舟之人。被该水手诡白，故而改从，后即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开立军伍，整立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

（接上页注⑨）而当时太平天国的革命形势尤其如此。因为清朝的首都在北京，“太平天国之存亡必待清朝灭亡后始可得人承认，清室存亡当视北京之能守与否为断”（见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而太平天国要攻克北京，就必须先取河南，在开封建立临时的首都。这样，就把自己的首都放在敌人首都的大门口，隔着黄河遥遥对峙，先摆开进攻的形势，然后大军渡河，有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源源向前方支援，先立于不败之地，而根据当时双方形势判断，北京又是断然可以攻取的。考太平军攻武昌时，清太常寺少卿雷以诚奏：“风闻伪示有定都金陵之语”（见《清史列传》卷五十三《雷以诚传》）。《同治涿州府志》谭熙龄《紫荆事略》说：“官军与之战，动曰：‘行将取江南矣，岂畏尔官军耶？’”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记曾水源之死也有“在永安时言至金陵为登天堂”的话。根据这些记载，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乃预定计划，今核以李秀成记载，及参订马寿龄所记，殆是传闻之误。

- ① 李秀成所说的这个向东王献议反对取开封为都，而主张建都南京的老年湖南水手，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附会指为航王唐正才。案《贼情汇纂》卷二《唐正才传》记唐正才在建都天京后，才是约四十岁的人（涿浮道人《金陵杂记同》），并不是老年人，他参加革命前，是一个贩木的小商人，并不是水手出身，他在太平军克复岳州时参加革命，就被任为典水匠，职同将军，做了太平天国水师的司令员，癸好三年到南京的时候，升指挥，那时候，连敌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并不是一个驾东王座船不知名的老水手。后来他因功得封航王，壬戌十二年，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他便是李秀成部下十三个将领之一（据许瑶光《谈浙》）。癸开十三年九月在无锡战死（据《李文忠公奏稿》卷五《苏州无锡连获大胜折》）。如果这个向东王献策建都南京的人确是航王唐正才，李秀成就一定记明是他，而断断不会误作“老年湖南水手”了。据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说他亲闻一个从湖南参加太平军后来叛变的湖南零陵人秦上儒说，那个向东王献策的老水手是湖南道州人蒋某。
- ② 开封为北宋故都，汴河横贯中原，西通黄河，南达江、淮，东南漕米，由此而进，所以宋朝人说：“汴河为建国之本”（见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六汴河条）。到宋室南渡，汴河日就湮废，元、明以后，屡经河患，汴河故道，凡不可复问，明太祖以“大梁为天下之中”，曾经打算建都开封，洪武元年，诏以开封为北京，应天为南京。但终因开封无水道未成事实，不久罢北京，以应天为京师。所以顾祖禹论河南，虽然“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但是，“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见卷四十六《河南方輿纪要序》）。这可见这位老水手所说：“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的话，是有他的见地的。固然，开封不宜于作长远的首都，但是，在没有克复北京前，作为临时的首都，根据当时太平天国的形势看来，却是正确的。

分别男行女行^①，百工〔归〕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民家出城门去者准手力拿，不准担挑。妇女亦由〔同〕。男与女不得谈及，子母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沓〔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②法律严，故癸丑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

东王令严，军民畏。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怒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专尊，后北与翼计杀东王。翼与北王密议，单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原清、辅清而已^③，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后北王杀东王之后^④，尽将东王统下亲戚属

-
- ① 太平军初起义时，大都是全家参加，为了预防进军中男女紊乱起见，所以有女营之设，分别男女，虽夫妻不得同居，有犯禁令的叫做犯天条，罪当诛。这时候，克复南京，就把南京人民分别男行女行，男归男馆，女归女馆。到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二月始除此禁。详见我写的《太平天国的妇女》（此文收在拙著《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
- ② 当时人在上元锋饒饒生《金陵述略》上案语说：“按破城后，并不举动。民间至十五日各家搜索人口，防藏兵丁、旗人。所有米粮多者归聚一处，按人口给发登册。民间物件，秋毫不动。内中若有人抢夺，即行梟首。”又案云：“按妇女称为姊妹，二十五人归在一处，紧闭门户，非不许亲人探望，防匪人而进。饮食按人发给，饱餐。”又案云：“无分富贵贫贱，父子兄弟各有差事。量才夺〔录〕用，并不勉强。有工〔功〕则赏，有罪则罚。”
- ③ 考东王杨秀清兄弟见于太平天国颁布的文献上的，有《太平礼制》中的国宗兄杨元清、杨辅清，《天父下凡诏书》中的国宗兄杨润清、杨辅清。李秀成所说“其兄弟三人”，当即指杨元清、杨辅清、杨润清。又李秀成所说的杨原清，当即杨元清。
- ④ 东王被北王韦昌辉杀死的日子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廿七日，其后太平天国定这一天为东昇节来纪念东王。关于天京事变，情事曲折，当时记载以《北华捷报》所载裨治文通讯（Bridgmans, Correspondence. 原载 *North China Herald*. No. 336 Jan 3. 1857. 译文见《逸经》第十七期，简又文译《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讦纪实》）和麦高文（J. Macgowan）报导（原载 *North China Herald*. No. 354 May 9. 1857. 译文见《逸经》第三十三期，简又文译《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讦详记》）及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比较可信。但非加以钩沉索隐，参考互证，不足以明其经过。我在1953年写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讦考》（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可以参看，但近年因有新史料发现，此文尚待修订。

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是以翼王义怒之。^①后翼王在湖北红〈洪〉山，知到京城害杀许多之人，在湖北红〈洪〉山营中^②，带同曾锦兼〈谦〉^③、张瑞〈遂〉谋^④狼辈〈狽〉赶回京都，计及免杀之事，不意北王项〈顿〉起他心，又要将翼王〔所〕杀〈害〉。后翼王得悉此事，吊城由小南门而出，走上安省，计议报仇。此时北王将翼王全家杀了。后移红〈洪〉山之军下救宁国。（困宁国清朝帅将姓周，不知名字，此人后与侍王李世贤^⑤二人战死在芜湖湾趾〈汴〉。）^⑥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太甚，各众内

- ① 原稿“义”字给淡墨水污盖，但曾国藩圈的红圈尚完全可见，而“义”字的形迹也可以细辨出来。考太平天国文献，称天父、天王、东王的发怒为“义怒”，这是一个尊崇的称谓（见下文注）。今李秀成在此处称谓翼王对韦昌辉残杀的愤怒为“义怒”，与在诛韦之后，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正相同。
- ② 洪山在武昌省城东十华里（据《同治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向荣曾论其地势说：“武昌省城……东路洪山地面甚宽，岭后十里即通黄州、九江旱路”（《见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卷一《复奏武昌失守筹备堵剿情形折》）。当时石达开从下游统率军队救武昌，所以扎营在洪山，以与后方黄州、九江取得联系。
- ③ 曾锦谦，广西博白人（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曾锦谦传》），一作广西潯州人（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曾锦谦传》），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授夏官又副丞相，守庐州（据《贼情汇纂》）。丙辰六年六月，随石达开救武昌，时已封卫天侯（据李续宾《上曾涤生侍郎书》，见《李忠武公书牍》卷上）。曾锦谦随石达开回天京后事不详。
- ④ 张遂谋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间任殿左二十九检点，守安徽舒城县（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丙辰六年六月，随石达开救武昌，时已升任春官正丞相（据李续宾《上曾涤生侍郎书》）。丁巳七年，石达开走出天京后，听张遂谋建议放弃江西远征，他是石达开走的分裂路线的鼓动者，石达开封他做元宰，做石达开的军师（据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庚申十年后事迹待考。
- ⑤ 李世贤，李秀成堂弟，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出生，以功封侍王。甲子十四年春，江南地区绝粮，李世贤率领皖、苏、浙三省军队入江西就粮救饥，预定秋收后全军东返解天京围，并取宁国粮以救天京。六月，天京失陷，李世贤遂入福建，九月克漳州府。乙好十五年四月，李世贤从漳州撤退，到近永定的韩江上，清兵追至，部众溃散。李世贤夜半游水渡河，人民掩护了他，密藏山中。六月，从山中日夜伏行，到了驻在广东镇平县的部将汪海洋军中。汪海洋因为犯了不救李世贤和专擅妄杀的罪，他怕李世贤处治他，乘李世贤夜睡把李世贤刺死。
- ⑥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李秀成是在簿眉上的。李秀成说：“困宁国清朝帅将姓周”，这是错的。考攻宁国的清朝主将是浙江提督邓绍良，后来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一月初七日（清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为太平天国左军主将李世贤在湾趾镇击溃他的全军，把他杀死（据《清史列传》卷四十四《邓绍良传》，及《邓忠武公事略》，见《邓忠武公荣哀录》）。《清史列传·邓绍良传》说：“（咸丰）六年……命帮办皖南军务。会贼陷宁国府，绍良倍道往救，先守金河桥，扼贼旁窜，大败贼于东溪桥。贼叠次出城，均击却之。七月，贼窜泾县，绍良偕副将周天受攻剿叠胜。九月调浙江提督。十月大股贼自柿木铺援宁国，绍良败之于杨柳浦，进剿夏家渡。适援贼图窜入城，与周天受援兵相值，歼贼千馀，绍良乘势纵击，贼大溃。是役也，贼众号数万，绍良七战皆捷，（转下页注）

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人心可〈乃〉定。后将北王首级解至宁国，翼王亲看视果是不差。后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说。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安王即是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说。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执，认真天情^①，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押〈压〉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怒〈怨〉，被忌押〈压〉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②

二 参加革命（原稿七至十二页）

今将天王起义，及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地官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

（接上页注⑥）得旨嘉奖。十一月，督诸军……分兵六队环攻。十二月……复宁国府。……

八年……十一月湾沚河东贼势猖獗，我军渡河修筑新营，贼以马队冲突，经总兵戴文英击回黄池。北岸之贼，忽窜上土山，瞰我军营垒空虚处，以马步万余蹑水渡河，复从黄池山后分股断绍良接应，以大股合围湾沚营。戴文英歿于阵，贼愈熾，绍良举火自燔其营，率亲兵血战歿于阵。”又考《清史列传》卷五十《周天受传》记天受在清咸丰六年的战绩及在咸丰十年八月在宁国战死事说：“六年，诏免补参将，以副将补用，南陵贼窜泾县之上下坊，图援宁国，天受驰到。会婺源贼陷休宁，官军战不利，前江西巡抚张芾檄天受助剿，连挫贼锋，击退扑营之贼，旋进师石岭，毁万安街贼垒。贼入城拒守。天受会各军攻之，歼其众，再复休宁。……十年……六月……时贼二万窜扑宁国，势张甚。天受激励饥军，数袭贼垒，叠有斩获，而城围益急……八月……城陷，天受与贼巷战，力竭死之。”据此，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困宁国的清朝主将乃是浙江提督邓绍良，而不是“姓周”。当时邓绍良部下有一个免补参将以副将补用的周天受，在困宁国之役他是有份参加的，李秀成所说“姓周”，当指这人。但他并非主将，他作战地域在皖南一带，也不专在宁国。至后来战死于湾沚的也是邓绍良而不是周天受，周天受是在宁国城内巷战死的。李秀成此处所说困宁国清朝帅将姓周是错了的。又湾沚镇在安徽宣城县西北八十华里，青弋江流经其地，与芜湖县分界，是当时的一个盐埠，盐艘鳞集，商贩辐辏（据《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二《舆地志·乡都》）。李秀成作“芜湖湾沚”误，应作“宣城湾沚”。

① 案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录洪仁发、洪仁达记天王上天预诏事，可证李秀成所记两人一味固执，认真天情的话是不错的。又案曾国藩《复陈逆酋正法片》叙洪仁达被执后情形说：“如醉如痴，口称天父不绝”，也可参证。

② 石达开于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四月走出天京。戊午八年三月放弃江西远征，把太平天国最精锐的军队带去，走上分裂路线，转战于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贵州、云南等省，他的军队成为一支没有基地的孤军，作战上就处处陷在不利的地位，老奸巨猾的曾国藩老早已经指出他“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预料到他的结果（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八，咸丰九年《复胡官保》）。癸开十三年四月，石达开进军到四川大渡河，那时候，正值山洪暴发，清兵扼守对岸，过不得河；后面，又给清朝统治者买通土司，截断了他的退路，石达开自陷绝地，粮尽兵败，被俘到成都死难。

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夏官丞相赖汉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来意，东、西、南、北、翼王合心举义图谋之实积（绩），后此人自行相杀，乱事之原，业经载明。己（又）将李秀成在天朝出身为官，每年奉命战征，一切之情由，明白写清，并未隐瞒。一切细情，恭呈老中堂玉鉴，一视便知，并未差错之理。

自幼（幼）生在广西梧州府腾（藤）县宁风乡五十七都长恭理（里）新旺村人氏。^①父李世高，独生李秀成弟李明成二人。家母陆氏。在家孤寒无食，种地耕山，帮工就食，守分安贫。自幼（幼）时，八、九、十岁之间，随舅父读书。家贫不能多读，帮工各塾，具一周知。来在天朝，蒙师教训，可悉天文。^②（我悉天文者，是在杭州，西湖山后，有一老师，年有九十馀岁，教我七日七夜而知。后此（此）人不知（告）而去，寻踪无由。今已被拿，天数难辞，故而明说。）^③此假（段）不说，说在家时。在道光廿六、七、八年^④，有天王自东省花县上隶广西平南、梧州、桂平、武宣各等县，教人敬拜上帝。此之一节，前偏（编）业已载明。自拜上帝之后，广西贼峯（烽）四起，年年贼盗分（纷）张，一出贼之大头目陈亚贵、^⑤张加（嘉）

①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公元1864年）天京城破，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去见他，李秀成自述年四十二岁（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廿日日记）。案过去广西人计算年岁的习惯，以出生那一年即作为一岁，据此知李秀成出生于清道光三年，即公元1823年。又考菊迟秀明《忠王李秀成故乡访问记》说：“现在新旺村已是一片旷野，无人居住，棚状田地里，立着一块石碑，仅此而已。”

② 李秀成学到的天文系占星术，这是研究测候占验星象的方术，就是论星宿对于人事的影响，及依星宿方位隐现占卜未来的事的方术。赵烈文记李秀成与他谈星象说：“李又言‘天上有数星，主夷务不靖，十馀年必见。’余征其星名度数，则皆鄙俚俗说而已”（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廿日日记）。可见李秀成学到的天文，就是这种占星术。

③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写在簿眉上的。

④ 在此句上，李秀成删了一句，其旁有“知自幼”三字还没有删。

⑤ 陈亚贵，是当时广西农民起义著名的领袖。他是广西武宣东乡人（据黄检真《武宣历年群盗事迹》，见《同治涠州府志》卷二十七）。清道光三十年七月，率领起义军从象州北进，在几天里面，连克修仁、荔浦两县（据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八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广西提督闵正凤奏，同月十一日郑祖琛、闵正凤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案苏凤文《平桂纪略》卷一记陈亚贵于道光二十九年秋克修仁、荔浦误）。旋清军大至，战败，走至桂平罗渌洞，被执牺牲（据清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七日郑祖琛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黄检真《武宣历年群盗事迹》。案苏凤文《平桂纪略》卷一，记陈亚贵于道光三十年正月被执死误，《民国桂平县志》卷三十三《纪事》也沿《平桂纪略》的错误）。

祥^①、大头杨〈羊〉、山猪箭、糯米四^②、刘四各贼首，连年贼恶，劫当铺，抢城池，上下未亨〈停〉，乡人见过人众，自后不惊。后见拜上帝兵马来，是拜上帝之人，具〈俱〉不他逃矣。故又被团练之逼，故而迷迷而来。

一路自粤西而至〈来〉，我本为兵〔而来〕，前之内政，具〈俱〉不经我手。后至南京，破城之后，那时我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晄理事。那时东〔王〕有令，要在各衙之中，要举出军帅一员带领新兵。后经东王调保我为右后四军帅，守把太平门外新营。此时癸丑年之间。是年八月，调为后四监军，在仪凤门外高桥把守。十月之间，即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时官小，不故〈过〉听差而已。我在军中，勤劳孳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各上司故而见爱。逢轻重苦难不辞，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后春官丞相胡以晄带领人马去打破庐州府，破郡之后，来文〔调〕往庐郡守把安民。此四年之间矣。此时调为指挥之任。此时官小，不甚为是。^③

① 张嘉祥，广东高要人，至广西贵县城全昌咸货铺做店员。清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在贵县大岭、平村等处聚众起义。道光二十九年投降清朝（据《光绪贵县志》卷六），改名国樑（据《清史列传》卷四十四《张国樑传》，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后来做到帮办钦差大臣向荣军务，江南提督（据《清史列传·张国樑传》），成为对抗太平天国的一个凶恶分子。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被李秀成追击到丹阳，落水而死，见本书下文叙述。

② 山猪箭、糯米四是两位在道光末年在广西浔州府桂平起义的著名农民领袖，其事迹记载不详，据谭熙龄《桂平历年群盗事迹》说：“桂平紫荆之陈亚五，别名山猪箭（三十年伏诛）。宜里之黄糯米梁四（三十年伏诛）”（见《同治浔州府志》卷二十七）。据此，知山猪箭是陈亚五的绰号，他是广西桂平县紫荆人，道光三十年战死。糯米四是黄梁四的绰号，他是广西桂平县宜里人，也在道光三十年战死。据《同治象州志》山猪箭、糯米四于道光三十年正月从武宣向象州进军（见卷下《纪故》）。《光绪迁江县志》记山猪箭于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率领四千余人进入良塘墟（见卷四《纪事》）。据清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九日命军机大臣传谕郑祖琛述广西农民起义领袖有陈山猪羊（应作陈山猪箭）的名（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同年八月廿九日都察院奏广西农民起义领袖也有黄四的名（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

③ 考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剧贼事略下》记太平天国镇守各地的将领中有：“李寿成，伪殿右二十二检点，曾犯大坝，踞和州一带”（国学图书馆影印本作殿右二十一检点。本书系据北京大学藏本）。涤浮道人《金陵续记》载太平天国六年夏进攻江苏句容、溧水、金坛的将领有“秦日纲（伪顶天燕）、陈玉成（伪冬官又正丞相）、陈仕章（伪夏官副丞相）、余正兴、周胜坤、李寿成（以上三贼伪丞相，不知是何伪六官名目）”。将涤浮道人所记与《李秀成自述》对照，知李寿成即李秀成。到李秀成封忠王后，还有人叫他的旧名李寿成。左宗棠《谕子阿霖书》说：“此贼是伪忠王李寿成”（见《左文襄公家书》卷上）。案《贼情汇纂》成书于清咸丰五年（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所记李秀成守和州系当时事。又案李鸿章清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复曾沅浦方伯》论李秀成说：“此酋前数年在和州一带盘踞”（见《朋僚函稿》卷一）。据此知《贼情汇纂》所记李秀成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乙荣五年间镇守安徽太平府和州一带是不错的。（转下页注）

(到此段之下不说,说翼王、安、福王之由。此段在后分别陆续补说。)^①至翼王与安、福王两闻他往,东、北王又死,秦日昌(秦日昌,即秦日纲也)^②因韦昌辉与东王相杀,秦日昌亦死在其内^③,国中无人,经朝臣查选,查得十八指挥陈玉成、二十指挥李秀成^④、赞天安蒙得恩^⑤、侍天福李

(接上页注③)1955年冬在安徽省当涂县采石镇对面的江心洲太阳河村发现的《太阳河牛路码头渡船规条碑》,此碑原建立在和州东南太阳河牛路一带码头,目的是废除码头船户的封建把持,保证长江东西两岸的经常畅通,特别是最后一条严格地规定:“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表现出极强烈的阶级性和极鲜明的政策性。此碑树立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二月卅日,当时李秀成正在太平府和州一带主持军民事务,此碑当是李秀成所立。我们从此碑看来,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李秀成的阶级立场,与执行太平天国政策的坚决、彻底。

①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写在簿眉上的。

② “秦日昌,即秦日纲也”这一句话,原稿系写在本子的下面。案曾国藩清同治三年六月廿七日日记说:“傍夕倦甚,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其中有一条便是对秦日纲姓名的疑问。李秀成除在答复时已写有字条外,并在此处说明。

③ 天京事变,秦日昌因助韦昌辉妄杀杨秀清统下群众,其后韦昌辉被诛,秦日昌也为天王诛死以正其罪。简又文译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详载其事。可与李秀成所记互证。强汝询《金坛见闻记》上说秦日昌战死于清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即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攻金坛之役,说:“城中不知也,围解后始知之”,又说太平军退后,“搜营得贼往来文书,始知其详”。这显然是清朝官员冒功虚报。而李滨《中兴别记》竟根据来大书其事,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又据《中兴别记》要来订正李秀成记载,都是错的。

④ 李秀成自叙历任官阶前后矛盾,他说太平天国甲寅年初调他去庐州,“此时调为指挥之任”。到丁巳七年四月翼王石达开与安、福王不和远去,被朝臣选举出来担任国务时是“二十指挥”。又说丙辰六年二月救镇江时,“是地官副丞相”,到记这年底因招张乐行功,却说天王加封他“做地官副丞相”。再记被朝中议举担任国务时在簿眉下又记道:“封我是地官丞相,封为合天侯矣。”这显然是有错误的。考张德坚《贼情汇纂》记甲寅四年、乙荣五年间,李秀成守太平府和州一带时的官职是殿右二十二检点。案检点下一级官阶为指挥,则李秀成说他于甲寅年初调庐州时,“调为指挥之任”是对的,而说到丁巳七年四月石达开出走后,被朝臣选举出来担任国务时是“二十指挥”,却是错误的。又考涤浮道人《金陵续记》载丙辰六年夏太平天国进攻江苏句容、溧水、金坛的将领说:“秦日纲(伪顶天燕)、陈玉成(伪冬官又正丞相)、陈仕章(伪夏官丞相)、余正兴、周胜坤、李寿成(以上三贼伪丞相,不知是何伪六官名目)。”案李秀成的地位低于陈玉成,陈玉成这时是冬官又正丞相,将涤浮道人所说与《李秀成自述》对照,知李秀成说他于丙辰六年二月救镇江时“是地官副丞相”,那是对的,而说到这年底因招张乐行功,天王才加封他“做地官副丞相”,却是错的。再考曹蓝田《颍上城守日记》(见《璞山存稿》卷十)清咸丰七年四月初十日(即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三月廿六日)日记记李秀成当时为合天侯。则李秀成于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三月廿六日前,已经由地官副丞相升地官正丞相,进封合天侯了。那时候,石达开还在天京执政。李秀成所记他历任官阶,是前后矛盾,时间错乱的。

⑤ 蒙得恩,广西平南县鹏化里马岭村人。入拜上帝会,参加金田起义。癸好三年十月,授春官又正丞相,总理女营事务。蒙得恩为人,善逢迎,得天王宠爱,石达开出走后,把他升做正掌率,总理国事。蒙得恩执政,政事不一,人各一心,己未九年封赞王,辛酉十一年四月病死。

世贤这班人出来助国。此时翼王在安省远去，幸我招张乐行^①、龚得〈德〉树^②，这班人马，声称百万之众，是以天王降诏来寻，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省。

因翼王与安王、福王三人不睦，出京远去，军民之心散乱，庐州被清朝和帅^③攻破，合城兵将尽亡。^④那时和帅自下镇江，与张国樑困打镇郡，分军来逼桐城县，是清朝军门秦九泰^⑤领军围困。清朝帅将大小营寨百有馀座，自庐〈庐〉郡三河、舒城、六安、庐〈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度度〈道道〉严密，困逼桐城。此时我为丞相，谨〈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人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力救桐城，保固皖省。那时已有张乐行、龚德树在三河尖^⑥造反。那时李招〈昭〉寿^⑦在我营中共事，李招〈昭〉寿与张乐行、龚德树有交，特通文报与张乐

① 张乐行，又作洛行，安徽颍州府亳州雒河集张老家人。太平天国乙荣五年秋，蒙城、亳州起义群众推张乐行做公议盟主，称大汉明命王，在雒河集祭告天地，宣布起义，旗分五色，张乐行自领黄旗，以龚德树领白旗，侯世维领红旗，苏天福领黑旗，韩万领蓝旗。五旗又区分为五边，各旗小的几千人，大的几万人，都听张乐行指挥。丁巳七年正月，张乐行率领起义军加入太平天国，授征北主将，封鼎天福，进封沃王。癸开十三年二月战败，走到蒙城、宿州交界的西洋集被捕，送至清营，二月廿三日（夏历二月十八日）在亳州义门集附近的周家营壮烈牺牲。

② 龚德树，安徽颍州府亳州雒河集官吉寺磨盘松人，与张乐行同起义，为白旗首领。龚德树有智计，他是全军的谋主，军中都称他做“龚先生”。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龚德树率领军队随英王陈玉成进攻湖北，打算从安徽霍山、英山乘虚进捣武昌，以救安庆。在进攻湖北罗田松子关战役中英勇牺牲。

③ 和帅指清江南提督和春。和春是当时围攻庐州的清军主将。

④ 案翼王被安、福王挟制出走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四月，而此次庐州失陷则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月初四日，即清咸丰五年十月初一日（据清咸丰五年十月初七日和春、福济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三十八），那时候还是东王执政时代，李秀成说因翼王被迫出京远去，军民之心散乱，以致庐州失守，他的记载是错了的。考此次庐州失陷，是由于城中地主阶级分子秀才王子固与奸徒周得桂、罗金桂、田士文等纠众乘夜内应（据徐子苓《复庐州记》，见《敦艮吉斋文钞》卷四）。又据和春、福济奏，这一役庐州守将丞相王姓，指挥陈姓都在城中被焚死，守军除在城中战死外，冲出城外的都在将军庙、紫金堤埂一带被截杀，其南路守兵，驰来援应亦被歼，计阵亡五千多人，被俘三百零七人，都被杀，全军尽亡（参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三十八及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卷五十三所录和春、福济奏）。

⑤ 秦九泰，即秦定三，他是清朝福建提督，围攻桐城的主将（据清咸丰七年二月十五日谕内阁，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七十）。

⑥ 三河尖是河南固始县和安徽霍邱县所辖，当皖、豫两省交界处，乃当时水陆要冲（据清咸丰六年七月廿一日，和春、福济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九）。

⑦ 李昭寿，河南固始人，初为盗，受清朝安徽道员何桂珍招抚，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一月，在安徽英山县杀何桂珍投归太平天国，隶李秀成部下。戊午八年九月，（转下页注）

行未投。^①此时张乐行接得文件，当即复文，已肯未投。那时格宜用心镇守桐邑。（说张乐行之事，前说一偏〈遍〉，后说一段，方可分清来历，故而再说也。）^②每日交锋，军砲不息。那时清朝帅士每日万馀与我见仗，我天朝帅士不足三千，他营一百馀座，我止有一孤城，城外止营盘三座，力战力敌，是以保固桐城、安省得稳，实我之敌〈力〉也。后见势不得已，那时翼王出京之后，将打宁国之兵交与成天豫^③陈玉成管带。至陈玉成在家，与其至好，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未在天朝，格宜深友。^④那时在桐城，命使持文前往宁国，求救于陈玉成。当即准请，当即未解宁国之围，移军未救桐邑之困（未解宁国之围，前段亦说明）。^⑤兵由棕扬〈枞阳〉^⑥渡江齐集，我亲自轻奇〈骑〉赶赴棕扬〈枞阳〉，绘成进攻图式，与成天豫细详。至桐城之

（接上页注⑦）在滁州叛变，投降清朝。清廷把他改名世忠，以参将即用，升至江南提督。这一个叛徒，给清朝卖力，在江北抗拒太平天国。但是清朝始终没有放过他，随时派人去密探他的行动，到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安徽巡抚裕禄就借殴打贡生吴廷鉴一件小事把他杀死（据清咸丰八年十月乙巳谕，见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八十四，清光绪七年十一月癸卯谕，见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四十五，张瑞璠《两淮戡乱记》，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十四《抚降》）。

① 关于李昭寿约张乐行、龚德树来投事，清咸丰六年十月廿三日上谕说：“福济前奏探知石逆现窜安、桐一带，奏定三复称贼党内有李兆受等夥匪，意图勾结张乐行以死守桐城，为保护安庆之计等语。石逆素称凶悍，今复加以捻匪李兆受夥党，势更猖獗，必须先克桐城，方能进图安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抄剿捕档）。案李兆受即李昭寿。

②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③ 太平天国官制，有义、安、福、燕、豫、侯六爵，成天豫是当时陈玉成的爵位。

④ 菊池秀明《忠王李秀成故乡访问记》说：“我走访了四王诞生的各个村落。以‘四眼狗’大名，令清军闻风丧胆的英王陈玉成出生在西岸村，这里距大黎街一公里，是它的北边。绍兴守将来王陆顺德的诞生地古制村在镇西南角一公里处。新旺村在古制村后面，两村相距五百米，李秀成就诞生在这儿。”

⑤ 圆括号内这两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⑥ 枞阳，镇名，在安徽桐城县南一百二十华里（据《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卷一《疆域》）。位于枞阳河滨，南临长江，东北为丘陵地带，湖沼环绕，如星罗棋布，形势险要，西距安庆九十华里，为安庆的咽喉。太平天国在这里建为要塞，以保卫安庆，杨载福清咸丰十年五月十二日《攻破殷家汇太平枞阳伪城折》说：“枞阳一镇，实为安庆咽喉，各处粮械由此运入内湖，接济城贼，且舒、桐、庐州及三河、运漕、庐江、无为州等处援贼，亦可由此直趋安庆，逆众倚为重险。”又记枞阳要塞的布置说：“逆匪于上枞阳筑石垒一座，高可数仞，垒上滚木系满，下钉木桩数层，竹签密布。面南加设砖墙一道，迤邐而东，数箭之远，圈以小山，筑伪城一座，较石垒尤加高大。滚木及木桩竹签亦加密，外濠深阔，城垒中间，砖墙相属，墙后房屋临湖，湖东溪畎交错，前临小港。港南为罗塘洲。洲上陆路直达安庆。伪城之东，沿港石堤一道，其直如矢。炮船须由港入，陆路必由堤进。而城上密开炮眼，对准施放，百不失一，万分难近”（见《杨勇恣公奏议》卷一）。这里也是太平天国调遣两皖军队的交通要道。故这一次（转下页注）

敌军，算我之军，定由对面迎敌，清朝官军逆面脩防。我与成天豫计出奇兵，我亲回桐邑，谨脩制敌之师，候成天豫奇兵制胜，由棕（枞）阳一鼓顺下，攻破无为州，下汤（仓）头镇^①（此是无为州汤头，与镇江汤头分别）^②，运漕^③会迓天侯陈仕章^④之军，力破汤（仓）头清营，攻破之后，抄黄落（雒）河^⑤，破东关^⑥，得巢县，分军镇守。（自无为至汤（仓）头到巢县，清将不知姓名，此经成天予（豫）之手，那时我〔在〕桐城。）^⑦

（接上页注⑥）英王从宁国救桐城，就从这里渡江齐集，后来戊午八年秋解天京围之役，有名的枞阳会议也在这里召开。而枞阳要塞对安庆保卫的关系尤为重大。庚申十年春，敌人在进犯安庆时就定计先取枞阳。曾国荃《与李小泉书》说：“枞阳为寇贼充斥之所，此路不塞，则东门难以合围。……乘援贼未来之时，先取枞阳。枞阳克，则怀、桐之贼皆成孤注，而官兵得以一意图剿矣”（见《曾忠襄公书札》卷一）。《与赖古愚书》又说：“皖城之贼负隅不出，其意在坚守待援。我军之陆师现围西北，一面开挖长濠。惟东门通枞阳一路，为寇贼充斥之所，必须先剿此路，而后才可合长围耳”（见同上）。胡林翼《致严渭春阎丹初书》也论道：“涤帅（案指曾国藩，国藩号涤生）兵已进逼安庆，然安庆之要在枞阳，不得枞阳，即顿兵城下一二年，贼可徜徉自如，暇则来战，不暇则游行他处，我不能谁何也”（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抚鄂书牋》）。《致李希庵方伯书》又说：“枞阳不得，则顿兵十年，亦必不能断城贼接济，闻枞阳之垒，阻水难攻，又闻须出其不意乃可幸获”（见同上书卷七十二）。到枞阳被杨载福水师和叛徒韦志俊陆军袭陷后，敌人始得合围安庆，并得水陆师互相支援以制安庆的死命，曾国荃《与杨载福书》说：“顷闻贵部戈船将枞阳贼垒一律荡平，不禁距跃三百，该处为怀、桐门户，夺此要隘，则城贼即成孤注，我军可以合围矣。……敝营拟于节后即移扎东门外，以开长濠。枞阳既克，将来贵部戈船即可进万塘湖、菱湖、使我陆军有所依倚”（见《曾忠襄公书札》卷一《与杨厚庵》）。其关系重大如此，故枞阳在庚申十年五月被攻陷，到辛酉十一年七月安庆即失守。

- ① 汤头镇应作仓头镇，李秀成误写“仓”作“汤”。仓头镇在安徽无为州东北二十华里（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三《疆里志图·无为州乡镇图》）。
- ② 圆括号内这一句话，李秀成是在“下汤头镇”句旁边的。
- ③ 此处所说的运漕，系镇名，在运漕河上，距无为州东北四十华里（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三《疆里志图·无为州乡镇图》及同书卷七《山川志下》，案运漕河《庐州府志》作运河，此处据《无为州志》）。运漕镇是太平天国聚粮的要地，曾国藩《克复铜陵县无为州等处折》说：“无为、含山之交，有运漕镇者，外濒大江，内通巢湖，自咸丰三年后，贼粮皆聚于此，上而接济安庆、庐州，下而接济金陵老巢，实为南北之锁钥”（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四）。
- ④ 陈仕章，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间任殿左二十九指挥，守安徽巢县（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丙辰六年春救镇江时，已任夏官副丞相。丁巳七年正月月中旬，领军救安徽桐城，其时已封迓天侯（据《李秀成自述》）。这月下旬，江苏溧水被围急，仕章奉命领军星驰来救，与敌大战，兵败被执牺牲（据《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九《虎坤元传》）。
- ⑤ 黄落（雒）河在安徽无为州北四十华里，西接巢湖，南接州河，东注运漕河，归裕溪入长江（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七《山川志》下）。
- ⑥ 东关，在安徽巢县东三十华里（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三《疆里志图·巢县乡镇图》）。
- ⑦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写在簿眉上的。

即移军，成天豫带领人马上打庐（庐）江，仍然攻破庐（庐）邑，派军把[守]庐（庐）江，即引军上界河^①，攻大関^②，包过桐城之后，断清军之粮道。桐城地势，一面高山，一面平坦。清军粮断，成天豫由外包来，我领军由内攻出，两面合攻，清军大败。^③分三路追赶，破舒城，得六安，此两处之民，投诚者数万之众。^④当过六安，上三河尖，招引张乐行，那知张乐行先发龚德树、稣（苏）老天^⑤半路想（相）迎。当即计破霍邱

① 界河，在安徽桐城县东北与庐江县交界处（据《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首《桐城县全图》）。

② 大关在安徽桐城县北四十华里（据《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一《輿地志》）。

③ 李秀成与陈玉成在桐城打败清将秦定三围军时为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正月十九日，即清咸丰七年二月初一日（据清咸丰七年二月十五日福济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七十）。这时翼王还在天京执政，到这一年四月，始被安王和福王挟制离开天京。据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桐城之役，便是翼王主谋。清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福济奏说：“石达开……为贼中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而案李秀成所记，既说：“此时我为丞相，谨（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人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力敌桐城。”又说：“那时翼王出京之后，将打宁国之兵交与成天豫陈玉成管带。”就他的文意看来，是此役在翼王远去之后。今考清方记载，知李秀成此处所记时间是错了的。至于石达开把救宁国的军队交给陈玉成，应该是丙辰六年十月得韦昌辉首级后回京时，而不是丁巳七年四月逃走进京时，“翼王出京之后”，应作“翼王回京之后”，“打宁国之兵”，应作“救宁国之兵”方合事实。又考桐城人孙云锦《流离杂记》卷一记这一役战事说：“咸丰六年九月，秦军门定三统兵入桐城，离十余里而驻扎，久之，客有请其开仗者，军门许可而兵勇不应也。十月杪，郑镇军魁士自庐、巢率大队来桐，贼夜遁，城外无一营。官兵进扎，离城仅一二里，贼势穷蹙叠至。时金陵贼首洪逆、杨逆自相屠戮，调遣不灵，望治者皆以为桐城可不日下也。乃以两帅不睦，日延一日，竟不作攻城计，惟任兵勇四乡抄掠。是时北路饥民与兵勇杂处桐、庐接壤间，百姓避官兵急于避贼，大吏将官相视而莫之惜也。七年春，奇荒之后，米价腾贵，斗米千馀，营中缺粮，贼乘机破之。秦、郑拔营回，致令舒、庐复陷，所谓功败于垂成，病加于小愈，事机之失，无如此也。”孙云锦的记载，可以补充李秀成此处所记。

④ 李秀成克复安徽舒城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正月廿六日，即清咸丰七年二月初八日，克复六安州在二月初二日，即清咸丰七年二月十五日（据胡潜甫《凤鹤实录》）。李秀成克复舒城、六安，接着攻克霍邱后，据清咸丰七年三月十八日英桂、胜保奏说：“六安、霍邱均为粤逆盘踞，固始、商城迤东百余里外，遍贴粤逆伪示，饥民从而附和”（见《剿平捻匪方略》卷二十六），河南固始、商城东部的人民也归附太平天国。

⑤ 苏老天，河南永城人，居住在安徽亳州境（据袁甲三清咸丰四年十月十六日《派员驻亳会办另股土匪折》，见《项城袁氏家集》《端敏公集·奏议》卷五）。他的名字叫做苏天福，涡河流域习惯，对人称呼，凡单举其人名中一字，上面加一老字，作为一种特别尊敬的称呼，不是有深仁厚泽，使人心悦诚服的，不能在乡里获得此种称号，捻党领袖张乐行深得人民拥戴，乡里至今呼为张老乐（据王地球《张乐行传略》，见《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二期）。苏天福因为他得到人民的心悦诚服，所以人们叫他（转下页注）

县^①，攻破此城，交张乐（行）为家。^②那时成天豫引兵破正阳关^③，攻寿州未下^④，

（接上页注⑥）做苏老天。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二月，太平军进军到河南永城、夏邑，苏天福率众响应太平军，攻克永城。旋战败，走亳州境，与张乐行会合（据清咸丰四年九月廿一日张之万奏，见《剿平捻匪方略》卷七）。乙荣五年秋捻党在雒河集宣布起义，旗分五色，苏天福为黑旗领袖（据张瑞璠《两淮戡乱记·张洛行叛逆本末》，《剿平捻匪方略》卷六十六，清咸丰九年八月廿五日胜保奏）。加入太平天国后，己未九年封立天侯（据清咸丰九年八月廿五日胜保奏，见《剿平捻匪方略》卷六十六）。其后进封爵位待考。癸开十三年二月，战败，张乐行被执后，他也被执到清营，壮烈牺牲（据清同治二年二月卅日，僧格林沁、国瑞奏，见《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八十）。

- ① 李秀成克安徽霍邱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二月初十日，即清咸丰七年二月廿三日。其克复经过，据清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三日福济、郑魁士奏说：“据署霍邱县知县王启秀禀称……二月初七日捻逆大股攻扑县城。……初十日……向南由河口集一带窜去。……十五日回扑县城，在东门民房内暗挖地道。二十三日辰刻，地雷轰陷城垣数十余丈，勇练半溃，悍贼乘势冲入……县城遂为贼踞”（见《剿平捻匪方略》卷二十九）。又曹蓝田《颍上城守日记》说：“〔咸丰七年〕二月初二日，捻首龚德树等分路掠粮，遣人向霍邱王令假道。初六日，捻匪千余人由霍邱南门入，从城根至北门，取富民粮以出，因驻城外不去。阴毁城门铁皮，城上练勇欲开枪击之。王令叱曰：‘此皆张乐行之众也，乐行狗且不可伤，况人乎！候乐行至，众自戢。’初八日，捻匪攻霍邱城，王令遣张乐士出城谕之。乐士者，乐行从弟，王令与乐行有旧，故养乐士于城中，冀以深结其心。初十日，金道宪自关驰救，王令立城上遥指语人曰：‘乐行怒其属侵我，今来解围矣。’是日捻匪先败，金宪后亦小败，金宪退回关，捻匪亦去霍邱。……十五日，复围霍邱，八日而城破”（见《璞山存稿》卷十）。李秀成所说“计破霍邱县”，大约就是指假道事说的。
- ② 李秀成攻克霍山后四日，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二月十四日清咸丰七年二月廿七日率领龚德树军进围颍上县，至三月廿六日（夏历四月初十日）不克，撤退，见曹蓝田《颍上城守日记》。曹蓝田在清咸丰七年四月初十日记事上说：“会长发围颍上者龚德树也。长发贼首二：一驻河畔，不知其姓名；一驻保颍寺，伪春官丞相合天侯李寿臣也。”案春官丞相为地官丞相之误，李寿臣为李寿成，即李秀成之误。《李秀成自述》未记围颍上县，故补记于此。
- ③ 陈玉成这一役攻克正阳关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二月初三日，即清咸丰七年二月十六日（据清咸丰七年三月初五日福济、郑魁士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七十一）。案正阳关在安徽寿州西南六十华里（据《光绪寿州志》卷四《营建志·关津》）。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说：“正阳关夹淮据险，为古来之津要。”胡林翼也说：“寿州为正阳关之要，正阳关为全淮之要。争天下之大利者，惟以江、淮、河、汉水道大纲为第一义”（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五《抚鄂书牍》，清咸丰九年八月初二日《致庄蕙生方伯书》）。这是当时淮河流域最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和军事据点。
- ④ 陈玉成于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二月初三日攻克正阳关后，于初五日（夏历二月十八日）进攻寿州（据清咸丰七年三月初五日福济、郑魁士奏）。围攻仅七日，不克，于十二日（夏历二月廿五日）三更即撤退。《光绪寿州志》卷十《武备志·兵事》记道：“〔咸丰〕七年正月，粤逆陈玉成窜扰六安、霍邱。二月十八日由正阳犯寿盘踞南门外。先二日，署庐凤道金光箭，参将成桂由霍邱追贼，窥贼有犯寿意，乃间道来援，入城，贼踵至。亟援兵登陴，偕城内民练分守四门。光箭前牧寿时，甚得民心，众乐为效死，股实出资粮供军食，贼未敢逼。二十二日，正拟出队，适东门药局火起。是夕东门董事刘炳南盘获奸细六名，北门亦盘获一名，供称与城内奸民李本勾结为内应，始悟火起之由。李本伏诛，越日出队，擒斩贼众数十名。二十五日三鼓，贼忽遁。”《寿州志》这一段记事，可补充李秀成此处记载。

扯兵直上黄、松两处，与曾帅交锋^①，同清将李续宾^②对战，在松子牌（童司牌）失利之后^③，与清军两迎，胜负未分。（斯时成天豫是冬官丞相，封我是地官丞相，封为合天侯矣。恐前后参差，故而明载，一觉〈览〉可知。）^④

那时朝中无人掌管，外无用〈勇〉将。斯时我与成天豫各有兵众，朝中议举我与陈玉成带兵外战。后见我堂弟李世贤少勇刚强^⑤，又而选用，又得一将，朝用世贤次之。蒙得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爱臣，永不出京门，后封为正掌率大臣，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连我与陈玉成亦其调用。^⑥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故未散也。若清朝早日肯救赦广西之人，而散久矣。后有人奏闻到，天王知到此事，各有散意，后即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今天王封出许多之王，由此段而起，是酌各再振雄

① 李秀成此处说陈玉成“攻寿州未下，扯兵直上黄、松两处，与曾帅交锋”。曾帅指曾国藩。案曾国藩于清咸丰七年二月从江西丁忧回籍，至咸丰八年六月始起复出江西督师（据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五）。当时在湖北方面的湘军主帅是湖北巡抚胡林翼，而不是曾国藩，李续宾即受胡林翼节制，李秀成此处是记错了的。

② 李续宾是湘军里面一个极凶恶的分子，湘军大将罗泽南被太平军在武昌打死后，就由李续宾接统湘军。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三河战役，被陈玉成与李秀成会师打败，无路可逃，自缢而亡，详见本书下文叙述。

③ 黄、松，即湖北的黄梅县，安徽的宿松县。松子牌为童司牌的音讹，在湖北广济县境。童司牌战役发生于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七月十一日（清咸丰七年六月廿九日），先是，陈玉成在广济内湖童司牌一带，据险筑垒，谋伺黄梅敌军的瑕隙，以解九江的围困。率军从南岸渡江来攻。在一天里面，太平军在童司牌的营垒十九垒都被攻陷。胡林翼清咸丰七年七月初八日《水陆各军剿除下游童司牌贼垒获胜仗疏》说：“臣等查薪、广逆焰正张，而自黄州以上守御既严，贼辄敢于下游童司牌地方，背水临湖，筑垒抗拒，诡计百出，欲断我粮路，实为心腹之患。今经都兴阿老成持重，商议会剿，李续宾料敌决胜，将逆巢悉数毁除，分军驻守，实属调度合宜，不特黄梅各军气势益固，即武穴、龙坪运粮要道，亦臻安堵，战守皆有可恃”（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二十《奏疏》）。童司牌营垒失，据险截敌后以救九江的计划便被打破，所以这一战役对当时双方战事具有重要性。

④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写在簿眉上的。

⑤ 案李世贤当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时，年方二十四岁，所以李秀成说他“少勇刚强”。

⑥ 蒙得恩封正掌率时间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上半年，约在这年四、五月间翼王私自出京后，他的儿子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说：“翼王石出师远征，其朝廷大权均归先父掌握，即于丁巳七年由督率赞天豫而升正掌率赞天燕。”考清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二日（即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五月廿六日）何桂清根据情报，向清廷报告天京重要人物，已有“文总衡正掌率赞天燕蒙得恩”（此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可与蒙时雍家书互证。

心之意而保)。^①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此时成天豫屯在太湖、潜山,我屯在六安、霍山,然后轻奇(骑)约成天豫赴安省会议,云朝中这乱如何亭(停)止之由。正当会议,斯时天王加封我与陈玉成二人。陈玉成封又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实任也。那时我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我自为兵出身,任大戡重,见国乱纷云(纭),主又蒙(蒙)尘,尽臣心力而奏练(谏),愿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衣(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代(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于安、福王。因此奏练(谏),当被我主降照^②革除我爵。后再复一本,将天下之大势情形,并陈奏练(谏)之末历。奏本由朝臣手过,见我本张(章)言明顺,朝臣亲上展(殿)奏练(谏),仍复我戡。

那时和帅^③困我镇江,内外不通音信,内又无粮^④,外又无救。翼王远

①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② “降照”就是“降诏”。考太平天国制度,天王的手批叫做“御照”。《钦定敬避字样》说:“御照,本章尾御批圣诏,为真圣主太阳所照见者也。”因此,降诏就叫做降照。

③ 和帅,指和春,清咸丰六年八月,向荣死,清廷任命和春为钦差大臣,从安徽庐州驰赴江苏丹阳督办江南军务(据《清史列传》卷四十三《和春传》)。

④ 关于镇江绝粮,坚守等候援军接应撤退事,清军方面得到许多情报。余万清《致吴煦书》说:“讯据该难民供称,现在城内牌面每人日给米二两八钱,麦一两二钱,一个礼拜更难发了。谢锦章带来的贼常有饿死的,叫他们到别馆把种的菜都拔来吃了,并找寻芦根充饥,已经杀了两个马吃了。昨日在高资的贼米不敷吃,都到城里来补的。并闻南京有文书来说,李世贤初间下来救援。谢锦章在高资,吴如孝早到高资,晚回镇江守城,不时来往等语。查该逆粮尽计穷,铤而走险,早在意料之中,惟防守于先,不啻设阱以待。西南现已堵塞严密,东北所部地方复经通飭各营员弁加派队伍驻守墙濠,分段严防,勿稍松劲”(见吴煦档案)。余万清又《致吴煦书》说:“据逃出难民钱正恕等及熊铨母子四人金供……现在各馆抄过几次米粮,从上两个礼拜就无米发了。伪大将帅、伪兴天燕有伪令,叫吃水也要吃两个礼拜,等南京兄弟下来。……昨日吴如孝有伪令,叫各馆多打起包裹,各人发给麦子四两,炒作干粮,候过二十六至二十七两个礼拜,高头没有兄弟下来,就从高资拼命冲出”(见同上)。大营委员李庆琛禀也说:“十六日镇营见城内逃出难民供称城内以及高资粮米早尽,即豆、麦等物亦已吃尽”(见同上)。又禀说:“据镇城逃出难民供称,城内困饿不堪。今日杀驴数头,能战者每人每肉六两”(见同上)。关于撤退前军事布置,李庆琛禀说:“瓜州贼首谢锦章带四千悍贼已渡江至高资,在金山至高资一路设卡五十馀处。每处或十人或五人不等。并带来数百斤大炮十馀个,在高资修筑炮台。镇江悍逆亦全调赴高资,俟外援一至,即里外会合等语”(见同上)。案清军情报中所说的李世贤为李秀成之误。余万清是清朝云南鹤丽镇总兵,围攻镇江的一个主要的将领(据清咸丰七年十一月廿一日谕内阁,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八十五)。镇江瓜洲已经绝粮了,为着等候援兵作安全的撤退,就是“吃水也要吃两个礼拜,等南京兄弟下来”,这可见太平军战斗性的高度坚强,可笑清军将领自吹“设阱以待”,而结果竟被太平军打破围困,里外会合,全军安全撤退。

逃，那时朝中无人出色，独我与陈玉成二人有兵多众，故人而举荐，调我下救镇江。当时由皖省赶上六安，全军调下^①，救出镇郡之兵，失去镇江之城矣。^②

那时清朝和、张两帅^③引军攻打句容。那句容县天朝守将是袭戢夏官丞相周胜富守把。（句容守将周胜富是周胜坤^④之胞兄。周胜坤在汤头被张国樑攻破营寨身死后，周胜富兄袭戢，委镇句容，是此末由也。）^⑤战攻数月，被和、张两帅打破句容城池^⑥之后，和、张两帅未困天京^⑦，此是第二回困天京。此假〈段〉放下，先说明向帅^⑧头困天京之由。

① 这支救兵，清朝情报也知道是从安徽六安州调来的，清咸丰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命军机大臣传谕德兴阿、翁同书、鞠殿华、和春、张国樑、许乃钊、何桂清说：“瓜、镇两处贼巢同日克复……惟六安匪众来援者号称数万”（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八十五）。关于李秀成这一役上六安州调兵的日期，据清安徽巡抚福济等报告，于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九月卅一日（清咸丰七年九月廿一日）军队东开到庐州附近二十里铺（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四，清咸丰七年十月初五日福济、郑魁士奏）。又此次救兵，除李秀成部队外，还有张乐行的军队，清咸丰七年十月初五日福济、郑魁士奏说：“楚北窜回逆首李秀成纠邀潜、太、桐、舒各处踞贼，号称数万，合并捻匪一股。”清咸丰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和春也奏说：“贼供洪逆因镇城粮断，勾结捻匪，并调和、巢一带贼党来援，实有数万之众”（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八十五）。

② 镇江撤退，为清朝钦差大臣和春占领日期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十一月廿日，即清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据清咸丰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和春奏）。镇江人孙某《蕲湖笔记》咸丰七年九月初十后记事说：“闻得贼匪连日脱粮，城内逃出者数百人。张提军令各乡民挖濠沟，由东马头至西路一带，宽数丈，深数丈，虽坟墓不顾，骷髅棺柩，沿路抛弃。十月，南京贼救援镇江，扎营数十里。张提军大破数营，退。”又记说：“十一月十二日子时，贼开西门遁。城外贼营火起，我军方知贼退。”北岸瓜洲亦同日撤退（据清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德兴阿、翁同书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八十五）。

③ 张帅，指清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张国樑。

④ 周胜坤，广西人，是一个典当商人，把家财献作军资，参加金田起义，初任左一军副典圣库。甲寅四年，以战功授夏官又正丞相，守庐州（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周胜坤传》）。丙辰六年三月，守镇江汤头，战败牺牲。

⑤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⑥ 句容失守的日子，是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六月初八日，即清咸丰七年闰五月廿五日（据清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和春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七十七）。

⑦ 考清朝江南大营第二次围困天京，是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即清咸丰七年十一月廿四日（据清咸丰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和春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八十六）。某时在句容失守后五个月又二十四日，而在镇江撤退后十二日。当时清军在攻陷句容之后，即进围镇江，到镇江撤退之后，始立刻来围天京，所以李秀成下文又说：“清将收得句容，顺下再困镇江。张国樑困得镇江之后，同和帅复困天京。”而此处叙事时间是错乱的。

⑧ 向帅，指清江南大营钦差大臣湖北提督向荣。

三 六解京围(原稿十二至三十页)

头困天京,向帅全张国樑带有满兵数千,汉兵二万三之众。自孝陵卫紮至朱洪武坟这边,东南紮至七公(瓮)桥为止。^①那时向帅困我天京,那时镇江亦困。困镇江清帅姓吉^②,是满洲人氏,营紮九华山^③、当涂(丹徒)^④、金山^⑤一带。仪征(徵)清朝帅臣不知姓名(复查镇守土桥、^⑥三岔(汉)河^⑦是清朝德姓为帅)。^⑧天朝镇江守将吴如孝^⑨提理仪征(徵)、镇江一带兵权,概归吴如孝掌管。那时我上(尚)是地官副丞相,合同冬

-
- ① 案向荣江南大营以苏州、常州为后方,扼截天京东出的陆路。向荣上奏清廷说:“查东路孝陵、淳化镇一带,地势宽敞,进攻较易,兼可扼贼窜扰苏、常之陆路。当即统兵绕从秣陵关一带,驰往东路,度地扎营,相机进剿”(《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卷二《救援金陵迟误请旨治罪折》),故扎营在天京城东孝陵卫和七瓮桥一带。又案上元王永年《紫蘧馆诗钞·出金陵》注说:“张公国樑(号殿臣),扎营于通济门外七瓮桥。”据此,知七瓮桥在天京通济门外。
- ② 案这人是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系围攻镇江清军的主帅。吉尔杭阿姓奇他拉氏,满洲镶黄旗人(据《清史列传》卷四十三《吉尔杭阿传》)。
- ③ 九华山,即岷山,在江苏丹徒县西南五华里(据《乾隆镇江府志》卷二《山川》上《丹徒诸山》)。
- ④ “当涂”,为丹徒的误写。李秀成此处所说的丹徒,是指丹徒镇,在江苏丹徒县东十五华里(据《乾隆镇江府志》卷一《建置沿革沙镇》)。
- ⑤ 金山,在江苏镇江府城西七华里长江中。《乾隆镇江府志》说:“金山在郡城西七里大江中,自长山西北起为五州山,至下漣浦突入江,起为此山”(卷二《山川》上《丹徒诸山》)。
- ⑥ 土桥,在江苏仪征县城东二十五华里何家港镇。《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十六《都里》仪征县何家港镇条引《方輿纪要》说“何家港镇在县城东二十五里,港为北岸要口,由京、江渡此登岸,则东走瓜洲,西入仪征,北达扬子桥,皆为径易,故防守尤切。港有土桥”。土桥是镇江对岸要口,所以清军在这里驻营防守。
- ⑦ 三岔河,应作三汉河,在江苏江都县城西南十五华里,江都、仪征、瓜洲至此水分三支,所在叫做三汉河(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八《山川》)。
- ⑧ 圆括号内这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 ⑨ 吴如孝,广东嘉应州人,初为广东十三行商人司会计,后入广西经商,金田起义,参加革命,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与罗大纲同守镇江。甲寅四年二月,罗大纲调回天京,镇江、瓜洲军务遂由如孝专任。如孝守镇江,屡挫敌人围攻。丁巳七年冬,粮尽,奉命全军撤退。戊午八年七月,再克庐州,以如孝镇守。庚申十年四月,奉命去凤阳援助征北主将张乐行。明年夏,命救安庆,屯军桐城,安庆陷,引还。旋封顾王。癸开十三年二月,命与爱王黄崇发出师江北,克浦口。三月进军皖南,与襄王刘官芳、辅王杨辅清等会师在祁门作战。其后事迹待考。

官丞相陈玉成、春官丞〔相〕涂镇兴^①、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后为迓天侯，即陈仕章也）^②、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等下救镇江。^③此是初困之救军，进镇江汤头，与张国樑连战十馀日，胜负未分。后九华山清朝吉帅发兵未与张国樑会战。我亦选集锐军，两家迎敌，大战于汤头，两无法处，我欲救不能，吉、张破我不下，两边按寨对紮，两不交战说话。想通救镇郡未下，当与各丞相等计议，派丞相陈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镇江。水面皆是清军砲舟拦把，虽言〈然〉严密，陈玉成舍死直冲，到镇江，当与吴如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出，我带军由外打入。后查汤头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内，清军由此河边紮营。此地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两进为难。后我天朝之军移靠汤水山边下汤头，靠河边，两家难进处所。清军营寨概移入汤水山边，堵我进兵之路。那时镇江不应绝命，吴如孝、陈玉成已由内打出。我在外高山吊望，见镇郡人马出未，旗播〈旛〉明现，知是我军，是夜亲挑精锐之兵三千，我亲带由两不能〔进〕处所，清军移堵我汤水进兵之路矣，此处无兵把守，此地叫做汤头岔河，是由此经过，将此清军旧营修紮。天明原紮汤水山边之丞相陈仕章、涂镇兴、周胜坤等出军与吉、张两帅制战。吉、张不知我出奇兵袭由汤头岔河而过。午未时，吉、张方知我袭其后路之信。汤头岔河隔汤水山边廿里之大概^④，那时镇

① 涂镇兴，广西人，初在西王萧朝贵部下，萧朝贵战死，改隶东王杨秀清部下。甲寅四年七月，奉东王命与侯裕宽等出巡安徽、湖北一带。十月守湖北田家镇。田家镇陷，退九江、湖口堵击敌人，卒破敌军（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涂振兴传》）。丙辰六年春，任春官丞相，救镇江，五月，打败清江南大营，追击至句容，其后事迹待考。

② “后为迓天侯，即陈仕章也”这一句话，原稿系自注在“夏官副丞相陈仕章”旁边。

③ 案首次救镇江之役，太平军统帅是燕王秦日纲。简又文译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订详记》叙一个跟随燕王作战的爱尔兰人肯能（Canny）的话说：“瓜洲与镇江两城，困于饥荒，几不能守，幸得顶天侯救兵由天京赶到，否则吉尔杭阿抚台之军必唾手得胜也。顶天侯由天京苦战而来，援救镇江防军，即与其镇江军联合，大获胜仗，肃清江北大部地方清军。”案顶天侯是秦日纲在封燕王前的封爵。清咸丰六年四月十九日德兴阿、邓绍良等奏也说：“据生擒贼供，逆首秦日纲现派五六千人由北山后路攻打六合”（《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二）。可见这一役太平天国统帅是燕王秦日纲。据李秀成记这一役救镇江各大将是：冬官丞相陈玉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这五人地位相等，应有一更高级的人员，做他们领导，故以燕王秦日纲为统帅。李秀成在自叙中俨然作为统帅的身份，那是不符事实的。

④ 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记汤头、汤水山边、汤头岔河的地理形势很不容易看清楚，因而对这一战役的经过也不易得到深入的了解。考陈庆年《镇江剿平粤匪记》上说：“是时总兵张国樑合我军截上游援贼，连战十馀日，相持于汤头。汤头故有小河，（转下页注）

江吴如孝、陈玉成之兵亦到，两下接通^①，那时欢天喜地，内外之兵，和

(接上页注④)大江歧流通山下，一曰汤水山边(汤水自汤泉东南曲曲流经句容西北境，折而西，经湖熟镇、龙潭镇北，又西南流七十餘里，至秣陵镇，东入秦淮河，今上元东与句容交界有汤水镇，直龙潭南，中隔群山，距东阳东南十五里)，一曰汤头岔河，相距十餘里。我军先屯岔河，凭险自固，贼移营汤水相抗，我军亦移垒往逼。庚子，伪丞相涂镇兴选悍党突至，李秀成乘夜袭汤头旧垒，断其后。贼党东驰，陈玉成已先乘小舟至镇江约城贼夹攻。时下蜀滨江五垒已撤其四，余万清遣田宗扬驰截，乞[邓]绍良以兵分援。绍良谓扼江滨，贼必内犯，不应。宗扬所部才四百人，扼守三昼夜，无一援至，高资贼已至桥头，腹背受敌，且战且退。我军与贼搏战于汤水，相角至午，始知后路被袭，甫引军还斗，城贼已大至，锋锐甚，于是上下游之贼合为一，辛丑迟明，悉众猛进，陷我十有六垒”(《横山乡人类稿》卷三)。案陈庆年是站在反动统治的立场来记叙这一个战役的，但他是丹徒县人，熟悉本地的地理，所以他对汤头、汤水山边、汤头岔河当时作战的地理形势有扼要的叙述，对我们了解李秀成这一段记载很有帮助。

- ① 救兵与镇江守军接通的日子，据李秀成此处说，是两下接通之后，第二天开仗，打破清军营十六座，当即扯兵下镇江，这一夜调齐镇江舟只，由金山连夜渡过瓜洲。第二天早晨，攻破土桥。案这一役，太平军从镇江渡过瓜洲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二月廿六日，即清咸丰六年二月廿七日，二月廿七日(夏历二月廿八日)攻破土桥。清咸丰六年三月初五日翁同书奏说：“二月二十七日，金陵、镇江悍贼万余，合股渡江，次日，约同瓜洲之贼直扑土围，由土桥一带越围纵火，兵丁纷纷溃走，各营尽毁，托明阿退走三汊河”(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四十八)。同日文煜奏说：“瓜州贼匪于二月二十八日突出数千名，窜至土桥，将土桥乌塔沟各营盘冲蹶”(见同上)。江北大营钦差大臣托明阿也奏说：“二月二十八日瓜州镇江贼匪分扑东西两岸沿墙，官兵……所守土桥小芦庄等处，逆贼拼死越墙而进……步兵溃散大半，至晚收队暂扎三汊河”(见同上)。据此知李秀成所记连夜渡兵过瓜洲次早开仗，攻破土桥是对的。但据李秀成所记推定救兵与镇江守军接通的日子为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二月廿五日(清咸丰六年二月廿六日)却错了。考清咸丰六年二月廿四日向荣、吉尔杭阿奏陈太平军援兵与镇江接通的日子说：“[二月]十二日夜，自焚其垒，窜至江滨，与镇逆并而为一”(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四十七)。清咸丰六年三月初二日托明阿、陈金绶、雷以诚奏说：“昨接吉尔杭阿来咨，高资以内，严巷一带之贼，被攻势蹙，于十二日焚垒夜遁，与镇江逆贼合股东下”(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四十七)。又考当时有一个在提督余万清军营总办文案的卞乃譚，在《从军纪事》里记其事说：“[咸丰]五年十二月廿三日黎明，接向帅飞檄，‘以上游大股贼匪屯踞石埠桥一带，意在窜并镇江，调余帅督带一军，由龙潭东阳迎头拦剿’。即于已刻拔营起行，文员惟譚随往。……二月初旬，探报镇城贼粮垂尽，有敢死贼党数百人，各裹干粮，窜至高资柴圩，时刘观察存厚带兵堵高资，而下蜀江边五营已撤其四，诚恐上下贼匪合并，一面飞檄刘观察分兵扼红旗桥，一面请邓军门拨兵扼下蜀江边，均不从。初九日贼乘夜由江边偷窜，余帅派田都司带兵堵截，屡请邓军门派兵接应，邓军门谓：‘如堵住江边，则贼必内犯，与其内犯，不如下窜。’卒不发兵。十二夜，高资之贼窜至桥头，下蜀之贼拼死下窜，时田都司兵勇仅四百名，且扼守三昼夜，无一援兵，腹背受敌，只得且战且退。于是上下游贼匪遂合并矣。”据上所考，知援军与镇江守军接通的日子是清咸丰六年二月十二夜，即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二月十一夜，其时在渡过瓜洲前十五日，而不是前一天。李秀成所记这一点也是与事实不符的。又卞乃譚系清军中亲参加这一战役的人，他所记太平天国援军前来的日期，以及与镇江守军会合的经过，都可对李秀成记载作参考。

作一气，大锐声张，与吉、张两帅答话。次日开兵，吉、张兵败，失去清营十六座。是日当即扯兵而下镇江，屯在金山、金鸡岭^①、九华山脚，与吉帅大营相对。吉帅防我攻其大营，度度〈道道〉严密防守。是夜调齐镇江舟只〈隻〉，调齐由金山连夜渡过瓜洲。^②次早黎明，亲领人马全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吴如孝力攻土桥，破入土桥清军马营。那时清军大败，红桥^③以及卜著〈朴树〉湾^④、三岔〈汊〉河清营尽破，大小清营一百二十馀座，清营那时闻风而逃。当即顺破扬州。后将扬州一带粮草运入镇江。^⑤此不知土桥清朝将姓名，已今〈经〉日久矣。自在汤头岔河以

- ① 金鸡岭，在江苏丹徒县西五华里，又叫京畿岭（据《乾隆镇江府志》卷二《山川》上《丹徒诸山》）。
- ② 瓜洲，在江苏江都县南四十五华里，即今瓜洲镇地。江中积沙成洲，形如瓜，所以叫做瓜洲（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八《山川》）。
- ③ 红桥，在江苏仪征县东南（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十七《津梁》）。
- ④ 卜著湾，应作朴树湾，是一个镇名，在江苏仪征县城东三十华里，滨临运河（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十六《都里》）。
- ⑤ 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清咸丰五年十一月纪事记围攻镇江事说：“江苏吉巡抚既克上海，移兵驻镇江，前提督余万青副之……余营城东京岷山，吉巡抚营小九华山，复于黄鹤山及京畿岭筑城置炮以逼贼。是月为地道轰去城垣十丈馀，城中贼死拒，官兵不得入。”同书清咸丰六年三月记太平军攻克扬州事说：“二月杪，镇江逆渡江纠合瓜洲逆突然内犯，金陵逆又拨大股助之。三月初一日，复陷扬州，知府世焜、参将祥林力战捐躯，托大臣兵溃，退保北路……十三日收复扬州。”佚名《广陵史稿》记太平军克扬州事说：“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托将军以下，参、游、都司、千百户齐集雷以诚大营飞觥上寿，猝得吉抚军示警羽书，犹尽欢而不为之备。二鼓后，贼渡江，冲福营，抢松营，劫安营，势如破竹。二十八日土桥、朴树湾寇率其旅若林。二十九日，西营马步兵以欠饷四十五日不战自溃，东营团勇亦鸟兽散。……戊刻后，前奸细张逢春羽翼百余人破龙头水关，大股蹂躏”（卷一《世焜传》）。又说：“二十八日丑刻，江南贼渡江，冲土城，遂破安营、福营、松营，营兵四窜，贼屯土桥、朴树湾一带。……二十九日，将军调兵，兵以欠饷四十五日，枵腹难支，一齐溃散。惟德兴阿、毛三元两营未动，午后贼来愈夥，东围雷勇，亦不战而走，土城崩塌，四十三营鼓噪一空。……酉刻后，托将军窜走德营，急调毛三元带骁兵一千名飞来防护三汊河，毛营遂失。戌刻，参将潜逃，知府世焜〔被执〕”（卷四）。倪在田《扬州御寇录》记太平军克扬州事也说：“六年正月，瓜洲贼屡出掠……二月贼自仓头……入瓜洲。……伪地官丞相李秀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及镇江守贼吴如孝等悉锐自瓜洲出，先攻仪征诸屯溃之，至于乌达沟，托明阿不知所为。入毛三元壁，贼踵之。……漕河以西诸屯毕溃，炮械旗帜遗脱万计。托明阿夜以数十骑走，毛三元为后拒。……仪征守吏先弃其城遁。晦日贼攻河以东垒，金绶、以诚已内震，又尽填八濠口、马桥为直道，称利战，乃益便战，叛勇为导，金绶大溃走沙头，以诚渡霍家桥河，走杭家集、仙女庙，所部勇卒列位肩枪走殆尽。三月朔，贼逼扬州，知府世焜、参将祥林不及备。贼至，门者下键走，环城千堞荡无一卒，叛勇缚枪为梯入，拔关以纳后者，贼执世焜于署。……十三日，贼罄其众听讲于旧城。……乃弃城走。”关于张逢春队伍接应入扬州事，清咸丰六年三月（转下页注）

及汤水山边守将同下镇江，过在扬州矣。独留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带领人马守把吉、张旧营，是堵后路之意。破土桥之后，得扬州之后，取粮回镇郡，事完，欲领兵回京。那汤头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守把吉、张两帅旧营六个。自我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过破土桥之后，此处周胜坤所守之营，仍是吉、张两帅破去，周胜坤兵败，吉、张两帅将此营坚紮，加工修理，绝我归京之路。斯时无计可施，全军概在扬州仪征〔徵〕，欲由六合县上甫〔浦〕口回京，后经张国樑知到，带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尽心拼命，合为一气，仍由金山渡江而回。过到〔齐〕金山，齐兵定叠^①，那时张国樑在六合未回，当即领兵攻打高资。^②是日攻破清营七个，余四个大营未及攻下。吉帅由九华山领兵来救此营，当被天朝官兵逼吉帅逃入高资山中。那时吉帅是夜逃出，入其高资营，被天朝官兵四困，内外不通。吉帅自己用短洋砲当心门自行打死，清兵见主帅自死，各军自乱〔营〕，此营当即失利与天朝帅手。后悉知清朝吉帅身死，知其营中无有主帅，当即移营，赶下九华山。次日早晨，全军具〔俱〕集九华山脚，吉帅之营七八十座，军中无主，吉军自乱，不战自逃。^③吉营失过之后，张国

（接上页注⑤）初八日文煜奏说：“扬城被陷，闻系东岸张逢春旧勇勾结应贼，以致失事”（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四十八）。上引四种记载可与李秀成所记参看。据上引记载，知太平军克扬州之日为天历丙辰六年二月廿九日，即清咸丰六年三月初一日，弃扬州之日为天历三月十一日，即夏历三月十三日。从《广陵史稿》记载看来，可见这一役太平军势如破竹的胜利，可给李秀成此处所记“清营尽破”、“清营那时闻风而逃”的话作注脚。李秀成说：“仪征〔徵〕清朝帅臣不知姓名”，案这人是江北钦差大臣江宁将军托明阿。李秀成又说：“守土桥三岔〔汉〕河是清朝德姓为帅。”案这人是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德兴阿。这一役清军溃败，清廷革托明阿职，即以德兴阿为钦差大臣。又考真州刘贵曾口述于咸丰六年三月初一日在仪征被编入太平军，十三日午后太平军弃城去（见刘寿曾编录《徐生纪略》）。

- ① 定叠，就是把事务办妥的意思。这是广西浔州、梧州一带的方言。
- ② 高资，镇名，在江苏丹徒县西四十华里（据《乾隆镇江府志》卷一《建置沿革沙镇》）。
- ③ 杜文澜《江南北大营纪事本末》说：“时吉巡抚驻师镇江，以高资为贼运粮要道，谋夺之。夏四月，飭江宁府知府刘存厚结三营于高资烟墩山，金陵逆大惧，以数万人会句容、镇江之贼分扑高资，存厚被围。吉巡抚率亲兵小队往援，冲围直入，贼遂全力四面环攻，吉巡抚中炮阵亡，存厚翼其尸出，亦战死。”考清咸丰六年五月初七日向荣奏吉尔杭阿援高资，系在夏历四月廿八日，即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四月廿四日，第二天卯刻，受伤阵亡，这一夜营盘即为太平军攻克（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五十三）。关于此役，身预其役的卞乃灏《从军纪事》有比较详明的记载，说：“四月，江北各营溃散，贼复窜扬州。廿四日，贼众窜扑高资。吉中丞督兵截剿，屡战不利。廿八日，探报吉中丞在高资虎镇军营内被围。是夜譚随余帅带兵往九华山赴援。五鼓，余帅督（转下页注）

樑由六合赶至，此时救之不及，张国樑兵屯当涂（丹徒）镇，然后将我得胜师前往当涂（丹徒），与张国樑见仗。两家迎敌，自辰至午，胜负未分。至申时候，有镇江守将吴如孝带领人马千馀前来助战，将张国樑马军先破，步军并进，张军大败。次早行营回京。^①汤头旧清营见九华山营失守，自己他逃，后我天朝之军，直上到京。

东王令下，要我将孝陵卫向帅营寨攻破，方准入城。将我在镇江得胜之师，逼在燕子矶（矶）^②一带，明天屯紮，逼得无计，将兵怒骂。然后亲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入京，同东王计议，不欲攻打向营。我等回报，向营久紮营坚，不能速战进攻。东王义怒^③，不奉令者斩。不敢再求，即而行战。次日开攻，移营由燕子矶（矶）猺（尧）化门紮寨四营。猺（尧）化门清将是向帅发来镇守。我自此屯紮。次日张国樑已由当涂（丹徒）返回孝陵卫，是早引军与我迎战，自辰至己（巳），两军并交，张军败阵，天朝之军，顺力追赶。是日张军仍回孝陵卫。我等移营，重困猺（尧）化门清营。次日张国樑复领马步前末，两家立阵想（相）迎，各出门旗答话。步战汉兵，马战满兵，两交并战，自辰至午，得翼王带曾锦兼（谦）、张瑞（遂）谋等引

（接上页注③）兵援高资，虎镇军等亦溃围出合兵回九华山，吉中丞与绷都统阔、刘观察存厚已先后阵亡矣。高资六营皆失守。廿九日余帅在九华山与虎镇军、庆副将文、查巢司文经会商防剿事宜，飞传各将领，至者寥寥。是夜，九华各营夜溃者十之四五。五月初一日，贼众围扑九华山，各营兵勇不战自溃。”案吉中丞指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余帅指提督余万清，虎镇军指总兵虎嵩林。又考吉尔杭阿之死，实系自杀死，赵烈文《落花春雨集日记》清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日记说：“贼由十步桥攻高资防兵甚急，巡抚吉尔杭阿率兵往援，中道扎营某山，贼断路口围之。廿九日，吉军突围出，遂入高资营。从兵为贼所断，营兵少，贼又大至。抚口拔靴内小洋枪自向发火死之。初一日，九华山大营数千人闻信皆溃，自焚营帐，死者千馀人。”赵守纯《雪鸿山馆纪年》说：“吉公知不可为，即以所佩洋枪自行开放死。”沧浪钓徒《劫馀灰录》也说：“九华山之败，吉抚军自以洋枪击死。”赵烈文、赵守纯、沧浪钓徒等记载，都可与李秀成记载参证。

① 李秀成等军队在镇江丹徒镇打破张国樑军队后，开拔回天京的日子，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初七日，即清咸丰六年五月十一日（据清咸丰六年五月廿一日向荣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五十四）。

② 燕子矶在江苏江宁府上元县北观音门外直湊山东（据《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六《山水》）。向荣奏报也说太平天国从镇江开回天京的军队分两路入观音门（见清咸丰六年五月廿一日向荣奏），可与李秀成此处记载参看。

③ 义怒，是太平天国文书述上帝、天王、东王发怒的称谓，如《天情道理书》记审讯叛徒周锡能事说：“天父大发义怒。”《天父下凡诏书》记东王对天王说：“闲时见二兄在殿前，女官面觐天颜，未免理事不周，致触二兄义怒。”案二兄，称天王。《天情道理书》又记东王闻东殿兵部尚书侯谦芳禀奏参护李凤先恃强事说：“东王闻奏，遂发义怒。”

军到步^①助战。清军满兵马军先败，次即向、张〔所〕领汉军亦败也。是日向、张所救猺〔尧〕化门未能，自军败阵，后被四面追临，当即攻破孝陵卫满、汉营寨廿余个，独乘〔剩〕向帅左右数营，张国樑自紮七公〔瓮〕桥，此亦乘〔剩〕左右乘〔剩〕己营也。是夜向、张自退，我天朝之兵并未追赶。^②（此是五年间^③东王未死）。^④

后东王传令，将向、张营寨器械什物，运齐入城，将官兵紮息数日，大赏众军，然后飭令我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等领兵追由句容而去，顺手已得句邑^⑤，并下丹阳。斯时向、张已到丹阳六七日矣，已〔已〕将丹阳四面坚屯营寨之后，那时我与四丞相领兵方到丹阳，离〔离〕西门廿五里下寨。次日计议攻城，那知张、向之军次早先至，两家并力迎敌。是日张、向军败入城，并不出战，坚守城营，我力攻未下，清军精锐养足。此时天朝之

① 到步，是到达目的地的意思，也可作到来解。这是广西潯州、梧州一带的方言。

② 考太平军打破清江南大营那一天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十三日，即清咸丰六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役清方报告有咸丰六年六月初一日清钦差大臣湖北提督向荣、西安将军福兴、前长芦盐运使彭玉雯等会奏说：“逆匪自攻陷溧水后，经臣向荣派张国樑带兵驰往溧水会同明安泰剿办，其时镇江窜回大股之贼于太平、神策各门分股屯踞。五月十五日，先由龙脖子出贼数千窥伺前敌各营，并在大小水关一带筑垒。当派副将王浚等分路进攻，将贼击败。复有上游贼众二万从芜湖、金柱关一带陆续窜回金陵，屯踞北乡，与大水关之贼联络，并于黄马群路口添筑二垒。当飭张国樑抽带兵勇赶回大营。一面札飭总兵虎嵩林、游击张玉良等各调兵勇均赴大营策应。……十七日逆匪四五千人直扑仙鹤门营盘，王凌、李定太、李若珠等整队迎剿。该逆复突出数千分股包抄，我军众寡悬殊，旋战旋退。该匪即乘势攻扑，将仙鹤门营盘围困。臣复抽派兵勇交游击李鸿勋带往援剿，该逆始行退去。臣福兴以贼势过众，亲往青马群地方连夜赶修营盘，堵其内窜。诂该逆分十数股来扑，张国樑督率兵勇奋击，毙贼数百名。忽紫金山贼股犯山脚营盘，南门及通济门又出贼数千直扑七桥瓮〔七瓮桥〕捷勇营盘。该勇存营不及三百，其势甚危。臣向荣亲统官兵策应，并力截杀，我兵无不以一当百，毙贼甚多。战至午时，张国樑一军火药铅弹俱尽。该逆抵死不退。……适另股四五千人翻山围扑马队营盘，纵火焚烧，以致各营相继失陷。逆众数万即围扑大营。……该逆复分股至小水关、高桥门一带。查高桥门为大营后路，万一被贼占踞，则我兵腹背受敌。营盘既失，只得将全军退至淳化镇整队扼守”（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五十六）。案向荣等此奏所称“镇江窜回大股之贼”，即指燕王秦日纲领导李秀成等诸军说；所称“复有上游贼众二万从芜湖、金柱关一带陆续窜回金陵”，即指翼王石达开军说；所称“南门及通济门又出贼数千直扑七桥瓮〔七瓮桥〕捷勇营盘”，即指天京内太平军说。我们将向荣等此奏与李秀成所记参订，是可以看见此役作战的经过的。

③ “五年间”是“六年间”之误。

④ 圆括号内这两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⑤ 太平军克复江苏句容，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廿一日，即清咸丰六年五月廿五日（据《续纂句容县志》卷十九下）。

兵战久未下，官兵少有战心。后经张国樑分军迎敌，在丹阳南门外大会一战，两不高下。此向帅困在丹阳，又失去孝陵卫大营，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阳，是以向帅自缢而死。^①张国樑与向帅拜为契爷^②，他见向帅自缢，故而奋身再与见仗，然后被张国樑攻破丹阳南门外天朝营盘七个，杀死六、七百人。南门守营之将，是十三检点周得贤，中砲身死，于〈馮〉军败散。此员战将勇敢有馀，众军见此员战将战死，攻打丹阳，又不得下，各有畏意，人人那时已有退缩之心矣。

然后无计可施，全军扯攻打金坛^③，亦然未克，连廿馀日，亦是与张国良〈樑〉战征。每日见仗，具〈俱〉未分高下，两阵皆坚，攻城又未成效。那是李昭寿亦在其场。〔所〕攻〈城〉未下，然后移营回紮丁角村，离〈离〉句容廿五里所屯。杀东王即此时之间。^④此是天意，若向帅未败，仍

① 向荣死于清咸丰六年七月初九日，即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三日。据清咸丰六年七月十八日福兴、彭玉雯奏，说向荣因败退丹阳，忧愤焦急，旧疾举发，复力疾督阵，感受暑热，病益加剧，延至七月初九日病死（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五十九）。与李秀成所记自缢而死异。惟考与向荣系旧熟识任江南大营翼长的张集馨自著《椒云年谱》记咸丰六年十月十四日召见时，咸丰帝问他向荣死事一节对话说：“上曰：‘向荣何以就过去了？’”对曰：‘向荣以一介武夫，受皇上重恩，负国家重任，与逆匪相持四载，反为贼劫营挫败，自然对不住皇上，向荣又是病躯，闻其愤激而死。死之日，军士哀慕。似此将材，殊觉可惜。’上曰：‘哎。’”案张集馨于江南大营被攻陷前几天回扬州家中，向荣死时虽不在营，但他是向荣的旧熟识，又是江南大营的高级人员，他断不会以传闻的话回答皇帝的询问。他不说“病死”，而说“闻愤激而死”。这种所谓“愤激而死”，与李续宾在三河被困自缢而死，和春败退浒野关自杀而亡正相同，可证李秀成所记向荣“自缢”而死的确实。

② 契爷是粤、桂人对义父的称呼。

③ 太平军撤丹阳围，往攻金坛，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七日夜，即清咸丰六年七月十三日夜（据清咸丰六年七月廿四日福兴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五十九）。时谋袭敌不备，乘夜疾驰，第二天早晨，即兵临金坛城下（据强汝询《金坛见闻记》上）。

④ 关于攻金坛事，强汝询《金坛见闻记》上说：“咸丰六年七月贼帅洪秀全遣其党秦日纲、陈玉成等寇金坛。……贼时屡胜，气锐甚，谋窥苏、常，知丹阳有大军不易攻，欲由金坛以达常州，遂大举来犯。……时月之十四日也。……八月初五日，贼围城二十馀日矣，张总兵于七月末即率兵来援……是日，遂亲率兵出，贼迎战于东门外三里之南戴庄，列阵齐发，锋甚锐。张总兵率亲军直前冲贼，诸军齐进，奋勇鏖战，贼不能支，遂败走。……夜三鼓，贼潜遁，城中不之觉。”案清咸丰六年八月初五日，即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廿八日，东王被杀于天历七月廿七日，太平军撤退金坛围攻是在东王被杀后一天，所以李秀成说：“杀东王即此时之间。”又据《金坛见闻记》上述太平军进攻金坛的目的说：“金坛邑小民贫，非贼所急，而攻围不遗馀力者，志在得金坛以窥苏、常也。其始遣秦日纲来犯，贼之骁悍者皆属，约十日必陷金坛，即移兵寇常州。既十日不拔，秦日纲又死，贼乃请命于其渠。其渠遣李姓者增兵来攻，更申期十日，逾期（转下页注）

紮孝陵卫，遇内乱之时，那时乘乱，京城久不能保矣。逢向帅败过而乱，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朝中内乱，祸起肖详（萧墙），因此而起，内政不修，人心各别，亦因此举之原。

在六年之间乱起，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故有今之败。我久经力练（谏）数十封章，不从我练（谏）。虽本无才，因自幼（幼）为民之时，不知天王欲图天下，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自由从者，粤省数万而随，非我一人而为此乎（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①，数万之多，那有不才理者乎？非独一山夫之辈。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愿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并育（离）宗，育（离）亲别友，去戚育（离）乡？此之机变作，实实无知，此亦世人之劫数，亦是英雄应受折磨之当（罪），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自周至今，数千年之大换，世间之作变，非是我为。世民随洪姓而来，作一路而至，即是沙云而已，慷慨而随。今除神象，是天王之意，亦是神圣久受烟香之劫数。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象，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我亦不知理数，揣忖（咨）未情，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已数尽国崩，观之可是也。^②

（接上页注④）又不克。贼以东门地道将成，请更申五日，及地道成，而火药缺，张总兵又急击败之，贼遂遁。”案所说秦日纲战死事，系清朝官员冒功虚报，上文注已考明。至所说“遣李姓者增兵来攻”，也不是事实。又镇江人孙某《蕲湖笔记》咸丰六年七月十一日后记事说：“贼匪攻金坛。守城者李公，军令森严，防御之计严密。其时旱甚，河道皆涸，贼开地道至城，城崩数十丈。放炮退贼。……廿一日，城内烟[缺]（尔纲案“烟”，即鸦片烟），贼攻城益急，幸张国樑率军亲往，送烟入城，兵气稍振。”八月十七日后记事说：“闻得金坛贼匪大退。西路贼匪大队又下白兔，张军门连夜到白兔扎营堵住。”尔纲案白兔在句容县东。

①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见《论语·公治长第五》记孔子的话。这可见李秀成曾读《四书》。

② 李秀成这一段话，是受了《封神演义》的影响，《封神演义》第十五回说：“话说崑崙山玉虚宫掌阐教道法元始天尊因门下十二弟子犯了红尘之厄，杀罚临身，故此闭宫止讲；又因昊天上帝命仙首十二称臣；故此三教并谈，乃阐教、截教、人道三等，共编成三百六十五位成神，又分八部，上四部雷、火、瘟、斗，下四部群星列宿，三山五岳，步雨兴云，善恶之神。此时成汤合灭，周室当兴；又逢神仙犯戒，元始封神，姜子牙享将相之福，恰逢其数，非是偶然。所以‘五百年有王者起，其间必有名世者’，正此之故。”李秀成所说“五百年之大数”，“周朝斩将封神”，都是根据《封神演义》说的。又《封神演义》说姜子牙伐纣王斩将封神，而太平天国却打倒神佛，“封万千之将”，所以李秀成又说：“而今除许多神象，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

我自幼〈幼〉不知分毫之事，迷迷惘惘而未，造成今日患害，父母分离〈离〉，妻儿失散，为人非肯作不良不孝不义之徒乎〈也〉。今国破被擒，实直一心，将国未历，一一用心，从头至尾，起止反复，得失悞国情由，实见中丞〈丞〉大人有德之人，深可佩服，救世之人。久悉中堂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当承讯问，我实的未及详明，自行甘愿，逐细清白写呈老中堂玉鉴。至自我天王起义至今，两面交锋，各在一朝，虽耳闻未及目见的实。今我主死国亡，我亦被擒到步，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写齐明白，存我粗心^①，性直心直，故而明白写呈。非求我乐，实出我直心，非悉我有今日难，非悉生我能扶洪为君，实不知今日繁〈烦〉难也。此段业经说过，再说朝规坏乱，丧民失散家邦情由。

此时杀东王之后，又杀北王。杀北王之后，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那时三河^②有军把守，守将是蓝成春^③，具文到京告急，三河有庐〈庐〉郡清军围困。当调我领本部人马去救三河。军行到无为州，三河败退，随失庐

① 这个“心”字，李秀成写在旁边，又把它圈去，但就文意看，圈去此字是不通的，故仍录回此字。

② 三河，镇名，在安徽庐州府合肥县南八十华里，一作九十华里（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三《疆里志》）。太平天国在这里建立一个要塞，清咸丰六年八月廿四日和春、福济奏说：“查三河距庐城仅九十里，系南北往来通衢，实郡城第一门户。该逆死力拒守，于四面堆砌石垒，高至数丈，进攻非易”（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六十一）。胡林翼也上奏清廷说：“贼于三河镇设立伪城一座，砖垒九座，凭河设险，负固有年。该处为水陆冲途，实扼庐州之总要，其屯聚米粮军火，即以接济庐州、金陵贼营也”（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二《查明巡抚銜浙江布政司李续宾阵亡实迹恳恩加等优恤疏》）。考三河筑城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九月，主持筑城者为丞相蓝成春。合肥三河人吴大光著《见闻粤匪纪略》清咸丰五年纪事说：“九月，贼筑城三河镇。伪丞相蓝将三河北岸居民店铺尽行逐去，建立城池，长约一里，横约半里，一月而成，与伪检点黄共守之。”节录此稿者马昌华注说：“蓝成春，三河当地人叫他蓝矮子。”后来著名的三河战役便在这里，详见下文。

③ 蓝成春，李秀成原稿“蓝”写作“𠂔”，下文记三河之役时，在簿眉上又记蓝成春守三河事，“蓝”也写作“𠂔”。曾国藩刻本把“𠂔”字刻作“洪”，于是“蓝成春”便变成“洪成春”。考涂浮道人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秋撰的《金陵续记》说：“蓝成春，伪春官又副丞相，前踞三河，后逃回安庆。”我在1956年，做《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时，已据这一条资料订正曾国藩刻本的错误。今得见影印湘乡曾八本堂藏本《李秀成亲供手迹》原稿并不作“洪”而作“𠂔”：这一个“𠂔”字，就是李秀成写“蓝”字的简体。这就证实了我的考证。蓝成春，广西人，参加金田起义。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守三河时，任春官又副丞相。辛酉十一年秋封祜王，奉命与扶王陈得才等远征西北。甲子十四年春，从汉中回救天京，不得达。天京陷，转战到安徽霍山，被叛徒甘怀德执送清营。成春慷慨激昂地说：“我就是祜王蓝成春，与天王、东王同起义。今天亡天朝，兵败被执，唯一死！”遂就义。

〈庐〉江县矣。^①那时张国樑之军败而复振,进兵攻打句容矣。句容守将周胜富败退,清将收得句容,顺^②下再困镇江。张国樑困得镇江之后(前是头困镇江,此是二困镇江,注明在此)^③同和帅复困天京,此是八年之间矣。^④

那时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杨辅清已在福建^⑤,韦志俊避逼林泉^⑥,林绍章(璋)^⑦因在湘潭(潭)失军,革职闲居,林启容被困于九江^⑧,

-
- ① 考三河失守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初十日,即清咸丰六年八月十八日(据清咸丰六年八月廿四日和春、福济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六十一)。庐江失守在同月十二日,即清咸丰六年八月廿日(据清咸丰六年八月廿七日和春、福济奏,见同上)。案东王被杀在这一年七月廿七日,三河失守乃在东王被杀后十四日事,读李秀成文意易使人误会为翼王远征后事,故特考明于此。又案李秀成《自述》说:“移营回紮丁角村,离〈离〉句容廿五里所屯,杀东王即此时之间。”是李秀成奉命援三河,乃从句容率所部出发,文中亦未叙到,并考明于此。
- ② 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六咸丰七年五月纪事说:“和大臣既克溧水,谋取句容,而城贼勾结外援,声势尚壮。闰五月二十一日,张提督国樑会总兵傅振邦围攻,贼以大队抗拒。张提督率亲兵冲入,立刺执旗黄衣悍酋数名,贼乃奔溃。和大臣挥军冲进内濠,杀贼无数。二十四日,衔枚急进,越濠竖立云梯,张提督首先登城,遂于二十五夜克复县城。”
- ③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 ④ 案清朝江南大营复困天京,时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李秀成此处说“此是八年之间矣”,是记错了的。
- ⑤ 杨辅清是东王杨秀清的堂弟。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出师江西。这年七月,杨秀清被杀,不敢归天京。丁巳七年,石达开出走,辅清在江西与达开合军,进入福建。戊午八年七月复折回江西。庚申十年封辅王。天京陷后,杨辅清从湖州变装出走。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日本侵台湾,清政府在东南各省纷纷募兵设防,杨辅清以为有机可乘,秘密到福建谋恢复,给叛徒马融和识破,在晋江县被捕牺牲。
- ⑥ 韦志俊是北王韦昌辉胞弟。镇守武昌。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一月武昌失守,韦志俊退入江西。这时,韦昌辉已被诛。案李秀成下文说:“天王欲治韦志俊之罪”,此处说:“韦志俊避逼林泉”,即指此时事。己未九年九月,在安徽池州叛变,替敌人出死力夺取枞阳要塞,致安庆不能久守。这一个无耻的叛徒,曾回到他的家乡金田村,出钱要修蚂蝗桥、蔡江义渡。材料已经运来了,乡人拒不受。韦志俊排行十二,至今“反骨韦十二”的臭名,还给金田村人所唾骂。
- ⑦ 林绍璋,广西人。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三月带兵进攻湖南,在湘潭全军败没,革职。戊午八年,任为地官又副丞相,与蒙得恩、李春发同理国政。庚申十年封章王。壬戌十二年春,正当太平天国与外国侵略者交涉最紧急的关头,天王特任林绍璋代洪仁玕办理外交事务。甲子十四年六月,天京失守,林绍璋与李秀成等护幼天王乘夜突围出走,敌骑追到湖熟镇,林绍璋力战牺牲。
- ⑧ 林启容,广西人,甲寅四年镇守九江。敌人来犯,他在九江,兵单粮少,不屈不挠,打了几百次仗,屡次打败敌人。守到戊午八年四月,城陷,林启容率领将兵在烈风雷雨之中,浴血巷战,把敌人的王牌军队李续宾湘军打得伤亡惨重,使它“兵气顿弱”,不到半年,就在三河战役里遇到被歼灭的后果。最后全军一万七千人在完成了他们(转下页注)

黄文金在湖口有清军制困^①，张潮爵^②、陈得才^③孤守皖省无兵，陈玉成那时虽旺而官亦小，斯时〔其〕在小孤山^④、花洋〔华阳〕镇^⑤一带。那时国内分〔纷〕张乱政，独有蒙得恩、李春发^⑥二人不能为事，有安、福王压制不能，此八年之间。

和帅、张帅困天京，得幸粮丰足，件件有馀，虽京兵少，有食有馀而各肯战，因而坚稳也。张国良〔樑〕之兵是广兵^⑦虽精，未有曾帅之兵力足，勤劳亲事。广兵好勇而心不齐，虽有满兵数千，未有曾帅南兵^⑧之壮〔壮〕，是以八、九年之困不碍。和、张二帅军饷，出在福建、广东、稣、杭、江

（接上页注⑧）的光荣任务之后，都英勇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壮士们的热血洒满长江，流水都成赤红色。后来日本人白浪庵滔天歌咏林启容守九江事说：“睢阳而后有斯人”（见汉公《太平天国战史》白浪庵滔天词）。林启容和他所领导的将士们，确实是表现了太平天国革命战士的英勇、坚忍的优良传统。癸开十三年追封勤王。

- ① 黄文金，广西博白人。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出生，参加金田起义。天京既建，经略长江上游，湖口为赣、鄂关键，长江腰膂，以文金骁将，命去镇守。文金守湖口四年，大小数十战，屡次打败清兵。敌人极怕他，称他做黄老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以功封堵王。甲子十四年六月，天京陷，幼主奔广德州，黄文金迎接到湖州。七月，奉幼主谋入江西与侍王李世贤同去湖北会合扶王陈得才大军，道经宁国，病死。
- ② 张朝爵，广西人。癸好三年冬，以顶天侯秦日纲守安庆，张朝爵为副，主持民政。辛酉十一年秋安庆陷，张朝爵坐小船走脱，后封力王。天京城破，据说出走得脱。
- ③ 陈得才，广西藤县新旺村人，英王陈玉成堂叔。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封扶王，奉命率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祐王蓝成春远征西北，广招兵马。天京被围急，率军星驰回救。这时候，皖北、江南的生产都被清朝反动统治破坏，赤地千里。甲子十四年春夏之交，大军到达湖北麻城，前途无粮，被迫不能前进。得才侦知里下河地区尚称饶富，决定到秋收时大军东下，先取扬州，为就食聚粮，救援天京之计，不图计尚未及行，而天京已于六月失陷。天京陷后，清军四面来攻。九月，得才领军转战到安徽霍山，叛徒马融和等纷纷叛变，大军崩溃。得才服毒殉国。
- ④ 小孤山在安徽宿松县东南一百二十华里，屹立中流，长江澎湃环于四面，山周围约一华里，高逾千寻。太平天国在此设立要塞，在山的南岸澎浪矶砌有石城，北岸蛾眉洲亦筑有营垒，据险扼守（据《宿松县志》卷二《地理志·山川》）。
- ⑤ 花洋镇，即华阳镇，太平天国讳“华”为“花”，李秀成又误“阳”作“洋”，在安徽望江县东南十五华里（据《乾隆望江县志》卷二《地理·乡镇》）。
- ⑥ 李春发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任护京正主将，升京畿总管。庚申十年十一月，封殿前忠诚贰天将，与干王洪仁玕、幼赞王蒙时雍、章王林绍璋共理朝政。辛酉十一年冬，进封殿前礼部又正春僚顶天扶朝纲顺王。李春发是太平天国后期掌理国务的一个重要人物，以勤劳著称，天京陷后，不明下落。
- ⑦ 广兵，广东兵勇，张国樑是广东高要人，他招募广东人组织军队。
- ⑧ 南兵，指湖南兵勇，曾国藩湖南湘乡人，他招募湖南湘乡一带人组织军队，称为湘勇，又叫湘军。

西之助。那时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樑〔梁〕〔山〕^①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浦〔浦〕之通，虽被德帅攻破两浦〔浦〕，上〔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馀粮。固而稳也。^②稳过之后，和、张、德三帅围困虽是严紧，斯时朝臣荐用于我，主一心用我，我一心实对，主用臣坚，臣力死报。那时家弟李世贤，带我原日旧部士将屯在黄池^③、湾池〔沚〕之莊〔壮〕势。此时朝政事悉归我一人提理，那时主信我专，令法得严，故稳固也。出令各不敢有违，具〔俱〕各愿从，听我调度。

那时京城东北已困，独有南门将已实困，那革戢林绍璋^④调其回京，后保为地官又副丞相之戢，调任京务。那时观势不同，外无调度之将，不得已，先与朝臣计议，我欲出〔京〕以为外调救解等议。众朝〔臣〕苦留，那时从头至尾，一一算筹，各方心愿，肯我出京。复而奏主，主又不从。然后又从头至尾，一一奏明。主上不肯，斯时无计，当即退朝。又过数日，复而明〔鸣〕钟擎〔击〕鼓，朝堂传奏，见事实实不能，故而强奏，擎〔击〕钟鼓之后，主即坐展〔殿〕^⑤，尽而力奏。斯时朝不当绝，却未满登，人心有醒，主而复明，故而准奏。是次日出朝，将京中之事，概行清白交与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掌管，奏免不准长次兄理事，斯时肯信奏事而佳也。交

① 东西梁山在安徽当涂及和县，二山隔江相对。东梁山，即当涂的博望，西梁山即和县的梁山，江流为山所束，水面极狭，是长江上用兵的一个要地。

② 和春江南大营围天京时，天京粮食丰足事，清咸丰八年五月初四日和春奏说：“金陵城外西南两面，我军筑墙掘濠次第工竣，与东北连为一气。查金陵首逆，困守老巢，负隅恃固，今大兵合围，陆路接济已断，惟江面宽阔，消息仍通。臣又檄飭吴全美挑派得力师船八只，归赖镇海管带，分泊江路，可期严密。近又探闻贼粮仍旧照发，或云仅可支至七月，尚难深信，所获伪文，仅少油盐杂物，尚无缺粮之语”（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五）。后来曾国藩在《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论这时候事也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数郡之粮运出金柱关，取江北数郡之粮运出裕溪口，并输金陵。和春等虽合围城外，而贼匪仍擅长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和春与曾国藩这两封奏章说的话，可与李秀成的记载参证。

③ 黄池，镇名，在安徽宣城县北一百一十华里（据《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二《輿地志·乡都》）。

④ “那革戢林绍璋调其回京”句，原稿本作“那林绍璋革戢调其回京”。案李秀成上文说：“林绍章〔璋〕因在湘潭〔潭〕失军，革戢闲居”，知“革戢”二字应在“林绍璋”之上，故移置于上。

⑤ 太平天国制度，各机关设有登闻鼓，凡有冤枉的人，都可前来击鼓鸣冤，主管长官听闻了鼓声，就立刻出来受理。李秀成因见事急，天王不准他外出调教兵，就到天朝宫殿鸣钟击鼓强奏。李秀成击过钟鼓之后，天王立刻坐殿。这也就是登闻鼓制度。

清朝中政事，辞主出朝，由南门一日一夜赶到芜湖与家弟李世贤斟酌，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斯时清军势壮〈壮〉，四面皆军，人心又乱，又无逃处。那时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那时韦志俊与陈玉成同进固治〈始〉、双〈商〉城等处，天王欲见〈治〉韦志俊之罪，又经我在天王驾前力保，后封其为定天福之戢，即全陈玉成合队矣。今韦志俊生命投入清朝而得回家之乐，性命实我保全。其回家乐也，我之难，无门而死，亦不叹也，那时陈玉成欲上得〈德〉安招足人马而救天京，那知天不容去，在罗田、麻〈麻〉城一败而回，在太湖潜山屯紮，正是九〈八〉年五、六月之间也。^①陈玉成去远，李世贤力挡南岸一方，我独无计，在无〈芜〉湖将我部下调精兵五千馀众，一由无〈芜〉湖渡江，一由东梁山渡过西梁〔山〕，两处渡江，概到含山齐集。那时部将独有陈坤书^②、萧招生、吴定彩^③、陈炳文^④、而已。在含山

① 李秀成此处说陈玉成“在罗田、麻城一败而回，在太湖、潜山屯紮，正是九年五、六月之间也”。考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咸丰八年三月廿六日《奏陈皖逆窜陷麻城官军前往攻剿情形疏》说：“查楚军围攻九江，屡次击败贼援，计穷路绝，首逆陈玉成遂由安庆率悍贼数万，意在上窬武、汉，下援九江。……三月初九日，贼即由李家集窜罗田之吴家店。又由吴家店分作四股，以两股扑罗田之松子关、铜锣关，以两股扑麻城之五斗岗、长林关。团众御之失利。初十日，另股八千余人，由间道翻山越岭，疾走丫角山、圭峰山、马牙山，一日夜行一百餘里，窬周家冲、月形塘。十一日……窜入麻城”（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八）。案清咸丰八年三月十一日，即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三月十六日。至陈玉成军队从湖北麻城撤退，则在同年五月初六日，即清咸丰八年五月初四日（据胡林翼咸丰八年五月十一日《官军连复黄安麻城越境追剿并移兵防剿太湖等处疏》，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据此，知李秀成所说“九年五、六月”是“八年五、六月”之误。

② 陈坤书，广西桂平人，李秀成部下骁将，骄悍不法，霸住常州，使钱买作护王，不复受李秀成节制。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苏州被围急，李秀成一再向他求救，他都不肯来救（据癸开十三年九月廿九日李秀成《致陈坤书求救书》）。陈坤书不仅是拥兵不救，而且还有叛变的企图，据李鸿章给曾国藩信说陈坤书“早欲投诚”，后来因为他杀了苏州叛将，才“婴城固守”（据清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李鸿章《复曾相》，见《朋僚函稿》卷四）。甲子十四年三月廿九日常州陷，被俘，自称欲保守常州，以为天京犄角，奈事不成，只有尽忠，被敌人杀死（据《李文忠公奏稿》卷六《克复常州折》）。

③ 吴定彩，李秀成部将，以功擢平西主将，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奉命与前军主将吴如孝合军去凤阳救应征北主将张乐行。旋守六合、天长。辛酉十一年春，安庆被围急，奉命率精锐千余人入城助守，屡挫清兵。城陷，力竭英勇牺牲，所部将士都战死。

④ 陈炳文，安徽巢县人（据《忠裨天将李尚扬自述》），封听王，守杭州。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二月杭州陷，走江西。这年七月在江西金溪叛降清。

齐集之后,那时和州失守^①,清军屯紮廿餘营,不得已,破招〈昭〉関^②,顺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河〉村舖^③清营,然后破和州廿餘营也^④,后有两甫〈浦〉德帅救兵已〈赶〉到,我先将和营早破,救之不及。上石营两座未破,被德帅马步之军救去,杀死我步军数百人,此是陈坤书在此。那时我引军先

- ① 案李秀成说在含山齐集之后,那时和州失守。考和州失守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三月初八日,即清咸丰八年三月初三日(据清咸丰八年三月十四日福济、郑魁士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一)。
- ② 昭关在安徽含山县北二十华里小岬山西,《光绪直隶和州志》论其形势说:“两山对峙,为庐、濠往来之冲,其口可守”(卷四《輿地志·关津》)。
- ③ 何〈河〉村舖,在安徽和州北二十华里(据《光绪和州志》卷四《輿地志·关津》)。查同书《州属总图》,李秀成所说破昭关,顺流而下和州那一条河,就是指流经州西北经千秋坝,而至河村舖流向针鱼嘴出长江的河(卷三《輿地志·图说》)。又考同书《武备志·兵事》清咸丰六年记事说:“六年夏四月,粤逆由桐城闸袭破和州官军前营。秋,镇军音德布驻兵河村舖”(卷十)。清咸丰七年记事说:“闰五月壬午,音德布、聂桂荣复含山县,城垣先蹙,筑营河村舖,驻军守之。”又说:“冬十月,逆匪由巢县犯昭关,千总韩殿安阵亡,戊午东窜和州,壬戌河村舖陷”(卷十)。据此,知河村舖是和州城北二十华里的要塞,清军在此筑营驻守,而是此役李秀成从昭关进攻和州必经的路线。
- ④ 关于这一役战事,清咸丰八年四月十一日福济、德安奏说:“该逆由裕溪、西梁山至姥下河屯聚,窥伺和城。又由南陵、芜湖纠党万余前来勾结捻匪数万,由六、舒绕至无为,沿江北犯,乘昭关营未扎定,分股由含山内窜,进围和城各营。西舖贼匪又绕扑河村舖。我军前后不能互救,河村舖兵勇撤并和城,而该逆乘夜由北门大西门潜入城中,总兵塔思哈带队赴援,三月二十六日行抵仙踪,探闻和城各营于是夜因粮绝溃散”(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三)。从这一篇文件可看出李秀成这一役用兵的经过。至攻入和州的情况,清咸丰八年四月初五日德兴阿、翁同书、鞠殿华奏说:“据成明等禀称,三月二十六日行抵乌江,探得和州贼匪数千人,先在城西焚掠,二十五日由北门窜入城内,城外各勇营全部溃散”(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一)。据此,知李秀成克复安徽和州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三月卅日,即清咸丰八年三月廿五日,据此核对福济等奏,知所谓“是夜”,即指夏历三月廿五夜,故三月廿六日塔思哈行抵仙踪就得和州被攻下的消息,两处报告是相同的。又《光绪直隶和州志·武备志·兵事》清咸丰八年三月记载对此役也有扼要的记载说:“三月丁丑朔,副将锡昌、参将惠成剿贼和州,戊寅副将鲍云襄由乌衣镇率师来会,己卯复和州。……未几,粤逆由裕溪、西梁山屯姥下河。丁酉,袭昭关,守将聂桂荣退至仙踪。副将鲍云襄力守和州,粮绝,戊戌和州陷,守备张春发、训导沈庆策阵亡”(卷十)。案清咸丰八年三月初一日丁丑,即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三月初六日,这一天清军来攻和州,第三天,夏历三月初三日己卯,即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三月初八日,和州失陷。李秀成从含山指挥军队反攻,夏历三月廿一日丁酉,即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三月廿六日,李秀成克复昭关,第二天,夏历三月廿二日戊戌,即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三月廿七日,就克复和州。我们根据这一段方志的记载,可以考查出和州这一役战事经过的日期。惟记太平天国克复和州为清咸丰八年三月廿二日戊戌,与德兴阿等奏报作清咸丰八年三月廿五日早三天。又考清咸丰八年四月初六日德兴阿、翁同书、鞠殿华奏说:“臣等拨兵赴援滁县,不意又有芜湖大股贼匪渡江,会合巢县、无为州之贼,由含山一带窜入和州,分扑全椒”(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二)。其所述李秀成行军路线也可与《李秀成自述》参订。

取全椒、滁州、未安^①，分甫（浦）口德帅之势，斯城虽破，德帅之势已分，奈无兵可用，取到未安为止。后胜功（宫）保马军来敌，连战数场，我军失利，退守未安，仍回滁郡。^②后将滁州交与李昭寿镇守。李昭寿在我部下，我无不重情深待。我部下旧将见我重待李昭寿深重，我手下各又不服。至李昭寿之兵甚为多事，兵又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扰于民，县县佐将^③被其打责。自见事过，又不好见我之面，故而有变心而降大清也。自李昭寿在我部下扰乱民间，与守将闹事，我并未责其半言，后其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瞞我天王而偷送付。（我天国坏者，一是

① 李秀成这一役克复安徽全椒，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四月初二日，即清咸丰八年三月廿八日（据清咸丰八年四月初八日德兴阿、翁同书、鞠殿华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二）。同日克复安徽滁州，四月初四日，即清咸丰八年四月初一日克复安徽来安（据清咸丰八年四月十八日福济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三）。

② 李秀成说：“胜功（宫）保马军来敌，连战数场，我军失利，退守未安，仍回滁州。”案胜宫保是清镶黄旗蒙古都统胜保，时在六安作战，没有参加来安之役，李秀成所记误。考此役清主将是帮办江北军务侍郎翁同书，督副都统富明阿、穆克登额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四月十一日来攻（清咸丰八年四月初八日），第二天，李秀成放弃来安（据咸丰八年四月十八日德兴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三）。

③ “县县佐将”，是太平天国带兵镇守县的将官。考余一鳌《见闻录》说：“其一县镇守者曰佐将。”又录天王诏说：“此诏多刻些，凡是带兵守土众佐将俱一体颁及也。钦此。”据此，知太平天国带兵镇守县的将官叫做佐将。

④ 李昭寿既叛，李秀成手书斥责他说：“本主将自与尔共事以来，觉尔大有作为，将才不俗，故惜尔如珍宝，视尔如手足。揆尔之为人，谅知情义，必知始终如一，必知患难同当，竟不意尔乃反骨之人，早知其如此，悔已迟矣。诚本主将目不识人，自己爱将，除徒教尔行仁，劝尔从善，谁料尔出乎反乎，辜负我一片同仁同义之心矣，姑勿再论。尔自投顺天朝，试问所因何事？今又转降胜保，难保不察前因，尔终久摠难释其前过。大丈夫岂可且顾眼前，不思后患。何况我主天王待尔不薄，本主将亦待尔有情，无奈尔行为不轨，往往与同朝者争竞，尔统下每每滋扰良民，以致军民怀怨，但尔若在天朝，本主将事事包荒，尔知道否？今已降妖，是人人得而诛之矣。本主将之前情尔既不念，而我与国诛妖之大义岂忘心乎！尔既归降胜保，为目前之计，陷我滁州、未安，此诚恩将仇报也。惟是我耿耿此心，终怀不服，愿尔降妖亦能实力拒我也。尔之官兵，前皆赖我陶镛，性情本领均已洞悉，尔之欲反天朝，本主将誓必具师问罪，情义既绝，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势必先诛也。尔自思之，尔若拒以滁城可恃，胜保有势，试问天京东门之向妖头，桐邑抗拒之秦妖首，今年抗绕（扰）江浦、浦口之德妖头，侵犯三河之李妖头，其肆猖狂，其毒狼贪，尚被大兵云集，一旦消亡，尔谅知乎！劝尔既已妖途，何须往返，尽可速速归林，若敢诡计仍恃，更恐两敌莫保。何言妖与不睦，杀妖道台而来，何虑天朝难容，返又降妖而去，似此无常反覆，岂志者所为而留名迹于天下后世也，不亦惜哉！”李秀成在这封信说：“情义既绝，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势必先诛”，可见他对付叛徒是怎样的敌我分明！但他在《自述》中却说李昭寿叛变，“我亦未责”的话，这显然是他有所为而说的。至李昭寿叛变降清的原因，张瑞樾《两淮戡乱记》说：“兆寿之降贼也，秀成实主之，故兆寿事之谨。及秀成引众趋三河，（转下页注）

李昭[寿]起,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①,三是广东招来这邦〈幫〉兵害起^②,惹我天朝之心变,刘、古、赖三将^③杨辅清害起^④,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后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⑤之害。陈坤书是我部将,我有十万众与他,此人胆志可有,故而交重兵于他。后谗臣见我兵势甚大,密奏天[王]加封其重爵,分我之权,故而自尊,不由我用,制其不能,而[害]百姓者,是此等之人也。南北两岸其害过之处所,我无不差官前去复安,给粮给种,招民给本~~义~~而救民命。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也。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⑥害民

(接上页注④)将袭李忠武军,遂举全、来悉隶之,兆寿据有三城,益浚城濠,缮兵甲为自守计,玉成甚恶之。兆寿初为乱,惧不免,先使妻子易姓名乘舟载其母潜周家口,口人以其贫而多金,疑之。久之泄,或繁以献胜保公。胜得之喜曰:‘濠、全在吾掌中矣。’乃善视之,使为书招兆寿降,且命江苏知县姜锡恩因陈学书以利害说之。学书者,霍邱老吏,而兆寿之掌书也,实主伪军政。兆寿既失玉成欢,常见危,又入锡恩言,遂反正。八年九月下令籍发,以数百骑谒胜帅清流关。胜大喜,礼言霁色,拊之甚至,闻于朝,锡花翎二品冠,赐名世忠,号其军为豫胜营,悉以其母董、妻周、子显才归之。”案李昭寿《上胜保禀》说:“兹蒙大人施恩再造,专差委员姜锡恩来营颁发札示,始知父及妻子蒙宪恩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知张瑞璜所记有据,惟李昭寿自述说父未说母,张瑞璜当是得自误传的。

- ① 刀口余生《被掳纪略》说:“长发起事,规条甚好。攻城掠地,凡安民后,深加体恤,所以江南半壁,全为所有。自与捻匪会合,生灵涂炭,不堪言状,故又有此一败。”案这人被编入英王陈玉成军中,做文书工作,身经庐州失陷之役,故发为此论。他的话可做李秀成此处的注脚。
- ② 广东兵是指太平天国乙荣五年翼王石达开在江西招的广东天地会,即后来被清方文书叫做“花旗”的队伍。当时广东天地会军队,是由游民无产者组成,他们具有破坏性,他们堕落的影响随时表现出来。他们加入太平天国后,就对一部分太平军起了感染的作用,破坏了太平天国严明的军纪。
- ③ 刘、古、赖三将,是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刘官芳以功授右军主将,庚申十年冬间至辛酉十一年春,与侍王李世贤、定南主将黄文金把曾国藩困在安徽祁门。后封襄王。甲子十四年守浙江长兴,五月城陷战死。一说得退到湖州。湖州陷,下落不明。古隆贤后封秦王,癸开十三年九月,驻守石埭、太平、旌德一带,叛变降清。赖文鸿后封匡王,甲子十四年七月,湖州失守,退至安徽宁国县余村战死。
- ④ 关于杨辅清军队扰害人民事,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给他部下俘虏的李圭在《思痛记》说:“伪辅王下令云,此次金陵解围,须多掳百姓驱之南下,其文弱不堪打仗者准以银赎归。此特辅逆一股私意,他股不若是也。”
- ⑤ 洪春元,广东花县人,天王侄(据花县《洪氏宗谱》)。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春守安徽巢县。巢县失守后,据陈庆甲《金陵纪事诗》说,又奉命以重兵守雨花台。雨花台失守,天王治他的罪,把他诛死。
- ⑥ 上海英领事馆翻译官密迪乐(T. T. Meadows)在所著的《中国人及其革命》云:“另有显著事实,现确已证明为真者,即是:在所占的城市中,凡强奸与和好者皆处死刑无赦。由各难民之谈话,当问及此一点时,均异口同声嘲笑凡有指责太平军容许(转下页注)

者，实这等人害也。)^①

此段说完，又说独自一人无计解救京围，此是九（八）年之话。交滁郡与李昭寿，我自回全椒，无兵可用，主与我母被困在京，那时在全邑日夜流涕（涕），虽招有张乐行之众，此等之人，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也。那时止有部将陈坤书、吴定彩、萧招生、谭绍光^②、陆顺

（接上页注⑥）强奸之观念。反之，人人均同声赞美他们之克己节欲，如不表示敬佩，则啧啧称奇”（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一三一四页译文）。维多利亚主教（Bev. George. Smith）公开发表意见云：“太平军在一千五百英里的长途进军中，经过了人烟稠密的富饶地区。在亚洲战争中所常见的奸杀掳掠，太平军是用死刑来严加禁止的。他们较之清教徒更为严格地来对自己的同胞所珍爱的各种官能享受进行内部战争。他们严守基督教的十诫，并且加以更严格的解释，丢邪眼，唱邪歌，以及一般激起淫佚放纵的事物，都被禁止和铲除。饮酒、吸烟、赌博、说谎、咒骂，尤其吸食鸦片，都是以一种丝毫不苟的道德决心予以禁止的。”（王维周译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四章）《北华捷报》载 C. E. B 通讯，报导丙辰六年夏太平军克江苏句容事云：“此处被太平军占领后……发出安民告示，严禁军士劫掠人民财产，或骚扰人民妻女，违者处死。……凡在天朝治下各处地方的居民，皆异口同声一致宣称，此新的局面大概比之从前在清官清军多年治下远远优胜得多了……那些清军奸淫他们的妻女及劫掠他们的财物”（载三二〇号，1856、9、13，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一三一六页译文）。英国莫尔斯《太平日子》一书云：“太平军是有纪律、最勇敢，远胜清兵”（H. B. Morse: *In the Days of Taiping*. p. 149, 见简又文上书一三一六至一三二七页译文）。艾约瑟（J. Edkins）在其所著 *Religious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 一书有云：“当他们叙述天王部众，必称赞他们纪律极好，不事劫掠，及无其他暴行……凡此皆清军所有之习惯的行为也”（载 J. Scarth: *Twelve Years in China*, Chap. 24p, 284, 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一三六九至一三七〇页译文）。杨笃信（Griffith John）致伦敦布道会秘书戴德曼（Tidman）书记访问苏州的见闻说：“一般人都说老长毛的军纪非常好，他们对人很和气”（见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一三八页）。宁波之役，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F. Harvey）向罗塞尔伯爵报告太平军的纪律说：“极有节制。”太平天国的死敌英国海军提督何伯（J. Hope）向英国海军部报告对太平军的纪律，也不得不称为“良好”。另一死敌英国驻华公使参赞巴夏礼（Harry S. Parkes）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克复宁波时，与克复浙江其他城市时，并未发生那些被作为宣传的“暴行”（均见王维周译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四章引文）。凡以上所引，都可以证明李秀成所说：“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的话的完全真确。

① 自“我天国坏者”，至“实这等人害也”二百二十九字，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② 谭绍光，广西桂平县金田乡板霞村人，清道光十五年（公元 1835 年）出生。十六岁参加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以功封慕王，镇守苏州。屡挫戈登“常胜军”与李鸿章淮军的进攻，苏州卒雄峙不下。敌人知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勾结了叛徒郇永宽、汪安钧等。癸开十三年十月廿二日为叛徒刺死，苏州陷落。绍光是李秀成部下大将，做李秀成的左右手。敌人描写他在打败戈登夜袭的作战情况说：“慕王在前面的栅堡上，跣足而立，未著鞋袜，奋勇作战，宛如普通士兵”（见常文煜译威尔生《常胜军》第十一章）。就由于他的活动一如士兵，这就给士兵感觉到官兵一体，从而发挥了无限的积极性。绍光勇猛像一头雄狮，宁可拼掉最后一滴血，也决不屈服。（转下页注）

德^①，各将愿力拼舍死，愿救京都。当调精锐，不足五千，欲先扫开两甫（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内人心。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即由全椒重（动）马，下大刘村^②，安营紮寨，由桥陵（林）^③进兵两甫（浦）。那知德帅由甫（浦）调集马步万馀到大刘村迎战，外有胜帅马军三四千，头一见仗，我军取胜，次日开兵，我军失利，新旧之营概行失守，失去官兵千馀，败军概到汤淙（泉）^④一带，我自己数奇（骑）而转全椒。那时真苦之不尽，流涕（涕）不尽了^⑤，仍在全椒，实无良策。后通文各镇守将，凡是天朝将官概

（接上页注②）就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称赞他“为人勇敢而聪明，在困难之中从未示弱”（见同上）。当绍光被叛徒们刺死时，他截获戈登给叛徒那几封信从衣袋里落出，都沾染血迹。在这些信件上所洒的点点热血，说明了这位英雄人物的无比忠贞、勇敢而磊落的行为。在绍光英烈牺牲后，《中国之友报》（Friend of China）副主笔到苏州访问，曾到慕王府废墟去凭吊，归来在《苏州旅行记》上论绍光道：“他在这么多叛徒（他的兄弟各王）之间，始终对于自己的事业抱着耿耿忠心，他懂得满洲的尊荣是怎么一回事，他死在太平军叛徒之手，正说明了他是个值得赞美的人物”（见王维周译吟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四章）。只有像绍光这样的一个威武不能屈，始终忠心耿耿的英雄人物，才赢得人们的衷心赞叹。

- ① 陆顺德，广西藤县大黎乡古制村人，隶李秀成部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秋，领军经略浙东，克复萧山、诸暨、绍兴等地，以功封来王，镇守绍兴。外国侵略者来犯，屡次给侵略者以重大的伤亡。天京陷后，转战闽、广间。乙好十五年七月，克复广东长乐县。敌军四面来攻，为叛徒林政扬执送清营，八月廿七日（清同治四年八月廿一日），在广州慷慨就义。
- ② 大刘村，即大刘庄，在江苏江浦县。《光绪江浦县志》卷十四《武备》下清咸丰八年四月记事说：“是月皖逆纠合捻匪自大刘庄窥浦口大营，北军击却之”，就是指这一役说的。
- ③ 桥陵，为桥林的音讹，镇名，在江苏江浦县西南四十华里，道通安徽和州。
- ④ 汤泉，镇名，在江苏江浦县西北四十华里（据《光绪江浦县志》卷一《疆域》）。
- ⑤ 大刘村之役，时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四月廿七、廿八两日，即清咸丰八年四月廿四、廿五两日。清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德兴阿、翁同书、鞠殿华奏说：“皖匪自芜湖、无为、含山与和州通连一气，屡据生擒贼供逆情，欲驰救金陵，必打通江浦，始畅其南北应接之路。近日密探和州、全、滁之贼，纠合捻众在大刘庄、崔庙集一带屯踞。……臣德兴阿先令海全潜师哨探。……四月二十四日，经海全等分路紧攻，匪徒惊溃，乘胜追杀，毙贼一千馀名，生擒二百馀名，立将贼垒三座踏平。臣德兴阿以西路群贼结垒，必乘其根基未固，立予剿除，因约臣鞠殿华合师并进。二十五日，督同诸军由石碛桥进发，甫至青山寺口，即见贼垒重重，沿山起伏，约十馀里。当令营总富庆阿等各带马队由山外小路分驰南北，伏于陈村石桥之间，豫断其败窜和州之路。贼众惊见我师，不及列队纷纷扑而来。臣德兴阿、臣鞠殿华指挥诸军，奋锐进攻。……贼众践踏狂奔，势如瓦解。……所有大刘庄、崔庙集一带贼营十三座悉数平毁……毙贼六七千名，生擒贼九百二十名，夺获器械米粮无数。臣等自率师以来，躬亲数百战，斩获之多，未有过于此者”（《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五）。案《李秀成自述》说头一天战胜，而清方奏报却说打胜太平军。《李秀成自述》说第二天大败，新旧营盘都失，战死官兵千馀，而清方奏报却说杀毙太平军六七千人。两相对照，清方奏报是有隐讳和夸大的，但是，这一役，太平军却是打了一场大败仗。又案这一役清方大将是德兴阿和鞠殿华，胜保也没有参加。《李秀成自述》说：“外有胜帅马军三四千”，那是错的。

行传齐，择日约齐，到安省棕〈枞〉阳会议。各处将臣具〈俱〉而衣〈依〉约而来，此时正是九〈八〉年六月中期〈旬〉。^①那时陈玉成由罗田、蕲〈麻〉城败转，不约而到棕〈枞〉阳会议矣，各誓一心，订约会战。陈玉成之兵，由潜山过舒城，破庐〈庐〉郡，出店〔埠〕舖^②，攻梁园^③、定远。此时攻定远是陈玉成令吴如孝带领龚德树之兵围攻。陈玉成由界牌^④而下滁州。斯时我已由棕〈枞〉阳回全椒整队，当即领人马到滁州、乌衣〈衣〉^⑤会与〈遇〉陈玉成矣。那时德帅在甫〈浦〉口发动人马由小店^⑥而来乌衣，胜功〈官〉保之马军亦由水口^⑦而来，马步〈军〉押战，大战于乌衣〈衣〉。那边德、胜两军，这边陈、李两将^⑧，两家交兵，自辰至午未，胜、德二人之军败阵，我军乘胜而追，那德军失去三四千众。次日到小店，与〈遇〉张国樑由江南统带精锐前来，解救小店。^⑨于〈张〉军又败，顺势追下甫〈浦〉口，陈玉成攻德帅

- ① 李秀成说枞阳会议在“九年六月中期”，“九年”为“八年”之误。案再克庐州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七月十五日，即清咸丰八年七月十五日（据清咸丰八年七月廿三日翁同书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进攻定远在这年八月初一日，即夏历八月初三日（据清咸丰八年八月十三日翁同书奏，见同上书卷二百一）。攻破江北大营之役在这年八月十八日，即夏历八月廿日（据清咸丰八年八月卅日德兴阿奏，同月廿八日和春奏，见同上书卷二百二）。李秀成在戊午八年六月中旬在枞阳开军事会议，是在江北大会战之前召开的。枞阳会议是一个著名的军事会议，是李秀成一次谋定后战的著名军事会议。曾国藩刻本把“六月中期”误刻为“九月中期”。我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曾指出这一次军事会议应该在江北大会战前，“当在天历六、七月间，最迟亦当在七月上旬”（见二〇四页），不应在九月，当有错误。今得见原稿影印本，李秀成原稿实作“六月中期”，却是曾国藩刻本误刻的。
- ② 店舖，《庐州府志》作店埠，镇名，在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东四十华里（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三《疆里志》）。清代在此设立一个驿站，叫做店埠舖（据同上）。所以李秀成把它写作店舖。
- ③ 梁园，镇名，在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东七十里（据《光绪续修庐州志》卷三《疆里志》）。
- ④ 界牌，集名，在安徽全椒县西北九十里，与定远县为界（据《全椒县志》卷一《舆地志·疆域》）。
- ⑤ 乌衣，镇名，在安徽滁州东南三十华里清流河西岸，通江苏江浦县。
- ⑥ 小店，在江苏江浦县西北二十华里，即古永宁镇（据《光绪江浦县志》卷一《疆域》）。
- ⑦ 水口，镇名，在安徽来安县南三十华里（据《道光来安县志》卷二《营建》附《市集》）。
- ⑧ 考胜保当清咸丰八年八月时，任督办安徽军务钦差大臣，正在指挥定远战事，并驰赴凤南一带策应（据咸丰八年八月初二日胜保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一）。他并没有参加乌衣大战之役。此役清方大将仍是德兴阿、鞠殿华。《李秀成自述》说：“那边德、胜两军，这边陈、李两将”，记胜保参加乌衣大战是错的。
- ⑨ 考此役清江南大营派救江北大营兵五千名，系由总兵冯子材带往，大败后仅馀残军二三百名。李秀成此处称张国樑自统去救，误（据咸丰八年八月卅日德兴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二）。

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甫(浦)口一万余人。此时得通天京隔江之信,此是一救于天王。^①后陈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长,到扬州。此等处俱无清兵把守,随到随克,独扬州有兵,不战自逃。扬州知府被拿,当而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与不降,肯降即可,不肯者,皆由自愿也。说不从,称云:“受清朝之恩,不敢再造。”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②而去,舁盘川艮(银)三百五十两而行。斯时兵少,不定(守)扬州。^③

① 李秀成与陈玉成攻破清江北大营那一天是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八月十八日,即清咸丰八年八月廿日。这一役清方报告有江南大营主帅和春、江北大营主帅德兴阿两奏。清咸丰八年八月廿八日和春奏说:“八月二十日瞭见江北浦口一带火光四起,据报是日早间官兵攻剿贼营正在得手,詎逆众数万从后抄袭,将东路浦口各营全行焚毁。又准德兴阿函称,南北各军会剿后路逆匪,欲解小店之围,不料该逆大股数万已逾陟冈由东面抄入浦口城,遂至失利。德兴阿扶病亲督兵勇冲出重围,现由七里店前赴六合之谢家店,收齐溃军,再图守御”(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二)。同月卅日德兴阿奏说:“浦营四面俱是贼巢,狂寇约近数万。浦南九洲之贼,因逆援大至,合夥出扑。臣久困垓心,因向和春借拨兵勇五千名过江防剿。八月二十日,臣派兵勇先解小店之围,先闻冯子材等已将贼压下,俄报马步兵勇俱散,纷纷过山,贼穷追紧蹙,冲破陟冈军营,直抄浦口。臣因偕鞠殿华拼死迎剿,贼已陷浦口城。直扑臣垒。臣等挥军四面迎截,枪炮连环,贼毙甚多,无如贼匪太众,力战不退。另股并抄江浦西路,九洲之贼,又浮水来扑。臣与鞠殿华诸将杀出重围,暂驻通江集,招聚溃兵,飞囑和春速为奏请就近拨兵,以顾江北大局”(见同上)。这一役,打通天京南北两岸的交通,使太平天国危而复安,关系重大。清咸丰八年九月廿六日胜保奏陈其事说:“臣此次攻剿北犯逆匪,擒获生贼,多有金陵逃出者。据供浦口各营撤退后,沿江两岸皆贼。虽经江南官兵堵剿严密,而贼之粮米火药接济已多。并金陵逆首伪令江北各贼及新胁之众放入城中约有万馀,令其守城。又将城内长发之贼若干,驱至江北,归各逆首统辖,令向各路扑窜。据称浦营未溃之先,金陵贼众缺粮,饥毙者填塞道路,众心业已溃散。若无此变,总在九、十月间,必能克复金陵,全数殄尽等语。江北大局一旦决裂至此,诚为可惜”(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六)。所说打垮江北大营前,天京缺粮,饥毙填塞道路的话,虽系虚传,但形势确实是严重。曾国藩在清咸丰八年九月廿八日致《澄侯季洪两弟书》也论道:“金陵大营去冬即有克复之望,今年六、七月间,贼势尤极穷蹙。八月间,逆匪忽破浦口,德钦差营盘失陷,又破江浦、天长、仪征三县,扬州被围,并有失守之说。南京之贼,接济已通,气势复旺,天下事诚有非意料所及”(见《曾文正公家书》卷六)。所以李秀成说:“此时得通天京隔江之信,此是一救于天王。”

② 仙女庙,镇名,在江苏扬州府江都县东北三十华里,地濒运盐河北岸,西临人字河,是江都县的一个大商镇(据《嘉庆扬州府志》卷十六《都里》)。

③ 李秀成克扬州是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九月初一日,即清咸丰八年九月初三日,清咸丰八年九月壬午咸丰谕说:“天长之贼,直奔扬州,初三日攻破郡城。据杨能格奏报情形,纵火之贼,数止七八十人,而各路兵勇望风溃散”(见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三)。清方这一段文书,可做李秀成此处所述“扬州有兵,不战自逃”的话的注脚。李秀成放弃扬州是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九月十三日,即清咸丰八年九月十五日(据清咸丰八年九月廿二日德兴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五)。至陈玉成攻克六合是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九月十六日,即清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以地雷轰陷(据清咸丰八年九月廿七日德兴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六)。

陈玉成攻破六合之后^①，忽言〈然〉安省告急，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②、桐城、舒城一带，被老中堂统下帅臣李续宾攻破，一日五文前来告急，那陈玉成无心在下，当即扯兵上救。斯时陈玉成启奏天王调我同往，陈玉成先行扯兵上去，我随后而来，直由巢县而进。那时三河复守之将是吴定规所守（三河失过，然后天朝又复取回，前蓝成春之失三河，清军未守，复命吴定规为将）^③，被李续宾逼困甚严。经成天豫陈玉成（那时已封前军主将），领军由巢县到白石山^④、金牛^⑤而进，包三河之后，断李续宾之后路，塞舒城（之）不通三河李营之救。斯时〔李〕续宾见前军主将陈玉成之军屯紮金牛，次早〔李〕续宾领精锐四更仆（扑）到主将营边，依〔李〕续宾要黎明开仗，李家手将要五更开仗，〔李〕续宾云：“陈玉成兵壯（壮），恐战未成，各将岂不悞我之事？”是以五更未开战也，若衣（依）其手将五更开仗，陈玉成之兵而败定也。黎明之时，被李将攻陈将之寨，当被李将攻破，追陈将之兵过于金牛去矣。天当明，蒙（濛）雾甚大，皆闻人声，不知向处。那知陈玉成上（尚）在李续宾之后，李将追赶陈将之上前，陈将在〔李〕将之后杀去。李将那时知到陈将由后杀来，复军回敌，己军自乱，死去千馀清兵。查白石山隔金牛廿五里，那时陈玉成奏调我往，天王封我为后军主将，随后而来。是早在白石山十馀里屯紮，我听闻金牛砲声不绝，知是开兵，我亲引本部人马向三河边近而来，斯时正逢陈、李两军迎战，膏（离）李将营前七八里交锋。我军即至，陈玉成见我兵生力一莊（壮），破李续宾阵门，阵脚一动，大败而逃，困李将于营中。那时清军外无未救，

① 陈玉成于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九月十六日，即清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攻克江苏六合县（据清咸丰八年九月廿七日德兴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六）。

② 石牌，镇名，在安徽怀宁县西北九十华里（据《道光怀宁县志·县境全图》），居皖水之南，上与潜山、太湖接壤，是从湖北入安庆要冲，太平天国在此建立据点以防守。到己未九年秋，清军再进犯安徽时，复为所夺。清咸丰九年九月初七日湖北巡抚胡林翼《楚军征皖大胜攻拔石牌伪城疏》说：“查皖属石牌镇地方，与宿、望、潜、太等县毗连接壤，为入安庆要隘。自上年官军回援宿、太，该逆复在该处修造坚城一座，糜集逆众，意图久拒，阻我入皖之路，与太湖城内之贼互相应援，兼通贼粮火药等项，是以屡攻太湖未能得手。现筹进兵图皖之计，必先夺取石牌要隘，方为胜算”（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六《奏疏》）。石牌要塞，在当时防备敌人从湖北进犯安庆的关系如此。

③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④ 白石山，在安徽庐江县西二十华里（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六《山川志》上）。

⑤ 金牛，镇名，距离三河镇三十华里（据胡林翼《查明巡抚浙浙江布政司李续宾三河镇阵亡实迹恩恩加等优恤疏》，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二《奏疏》）。

三河隔庐(庐)郡五六十里^①, 庐(庐)郡又是陈玉成派吴如孝守把“庐(庐)城”, 舒城李军又被陈军隔断, 欲救不能。后李将见救不及, 营又紧困, 自缢而死。^②后将李将全军收集, 多落在陈将营中, 我营少有, 那知湖

① 据咸丰六年八月廿四日和春、福济奏三河失守事(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六十一), 说三河距庐州九十华里。今人龚维英《关于三河与庐州的实际距离》(见《历史教学》1980年第三期)说他步行计算也是九十华里。李秀成说三河距庐州五六十华里是错的。

② 案三河之役, 是太平天国战史上一大战役。清湖北巡抚胡林翼在《查明巡抚衙浙江布政司李续宾三河镇阵亡事迹恳恩加等优恤疏》奏陈其事说:“查李续宾提兵入院, 一月之内, 连克四城, 声威甚振。克舒城之后, 急欲进剿庐州。贼于三河镇设立伪城一座, 砖垒九座, 凭河设险, 负固历年。……必先得三河乃能进兵庐州, 然合计兵勇一分于九江、湖口、彭泽, 再分于蕪州、黄州, 又分于桐城、舒城, 所带不过五千人, 九月二十八日抵扎三河, 审视形势, 以攻城必先破垒……于十月初二日黎明出队进攻贼垒……一鼓缘登, 九垒俱下。……旋据探报并搜获伪书, 知首逆陈玉成率大股自江浦、六合、庐江来援, 首逆李世贤、捻逆张乐行自庐郡率大股来援, 号称十数万, 连夜窜至三河三十里之金牛镇、白石山一带, 连管数十里, 包抄大军后路。……初九日援贼逼近, 势颇猖獗。……初十日五鼓前往金牛镇击剿……我军行十五里, 黎明至樊家渡王家祠堂地方, 突遇大股来扑。……忽大雾迷漫, 咫尺莫辨。该逆由左路抄出数大股直前冲突, 时我军之在左路者后仁营先溃, 义中、义左、义右等营相继而走, 致中右两路各营均为贼抄袭, 反戈冲杀, 而前后皆贼, 参将彭友胜, 游击胡廷槐、饶万福等力战阵亡, 其余员弁勇丁伤亡过半, 队伍星散, 归路已为贼阻截矣。……伪城之贼复分股冲出, 合之援贼, 绵亘二三十里, 环绕来扑。游击邹玉堂、杜廷光、守备赵国幹等力战阵亡, 各弁勇伤亡愈众。李续宾一面奋战, 一面传令军中严守墙垒, 是时贼已逼近, 而后仁营、义右营败复扬去, 护右、凯左及亲兵马队等营被贼阻截不能回营, 义中、义左均无守志。此七营墙垒已被贼攻破。惟运同丁锐义冲入李续宾营盘, 期与统将共命。其余各营惟副右尚是全队在营, 其湘后中右毅中利中左仁等营仅留四成队守垒, 余皆随从李续宾苦战。战至二更, 杀贼已近二千, 李续焘、彭祥瑞率勇越垒冲出, 于是贼踞其垒, 挖断河堤, 以绝我军去路。李续宾勇气百倍, 怒马当先, 往来奋击, 毙贼又数百, 我勇伤亡亦多。战至三更, 李续宾身面均受矛伤, 力竭阵亡。……随从员弁退守营墙……至十三日夜静, 铅药水米俱尽, 援兵隔绝不前, 势遂万不能支矣。……是夜四更……冲出得脱免者仅十之二三。”胡林翼这一封奏报, 可与李秀成所记参看。据此, 知三河之役, 陈玉成与李秀成大败李续宾及李续宾战败后自缢而死是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初七日, 即清咸丰八年十月初十日; 歼灭李续宾全军是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初十日, 即清咸丰八年十月十三日。惟胡林翼说的李世贤乃是李秀成之误, 此役李世贤并未参加。又李续宾实系自缢而死, 胡林翼奏报说是“力竭阵亡”乃是对他的懦怯行为的掩饰。考清咸丰九年三月十五日胡林翼《复李香雪太守书》说:“迪庵血性刚烈, 故一败即以身殉。殉之良是也, 丈夫不可辱, 与其图后局之难撑, 不如顾当前之大义。此迪庵之所以甘心无悔也”(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三《抚鄂书牍》)。案迪庵, 李续宾字。胡林翼此函, 为李续宾确是李秀成所说“自缢而死”之证。又考曾国藩在《李忠武公神道碑铭》虽同样掩饰说李续宾“怒马陷阵死之”(见《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但在《母弟温甫哀词》里也不得不供认其弟曾国华与李续宾都是自杀而死说:“营垒以十三夜被陷, 而吾弟与李君以初十之夕并命同殉”(见同上书卷三)。这是清朝的官样文章, 当时对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钦差大臣向荣、和春的自杀都如此掩饰。这一役太平天国对清朝的王牌军队(转下页注)

南之人，同军行到半路，不防提备，被湖南之人杀死陈将之军数十人，后陈将传令杀尽，落我营具〈俱〉一而在。自此之后，各已陆续自逃。我与李将战平三河之后，当与陈玉成两路分行：陈玉成靠舒城而出大関，我由三河至庐〈庐〉江，到界河。斯时桐城被李将攻克，派将由〈在〉此守把。我与陈玉成在桐邑羽亨翼〈吕亨驿〉^①会议分兵，陈将与曾帅李将人马战过，低〈底〉细甚知，我未与战，其地又生，派我由孔城^②而进桐城斗铺，陈玉成由山边而进桐邑。西门清将出军与陈玉成见阵，我亦到场。清将分马步两边迎战（桐城清将不悉姓名）。^③清军见三河失去李续宾之好将，各有忌〈惧〉意，少有战心，故而败也。当日败仗，我军越由西门扒城而入。我由斗铺而攻，当已夜矣，清军营寨是夜退逃，杀死不少。^④斯时收复桐城，当即息兵三日。那时安省已困，内外不通。自三河一战，桐城一战，安省之围自解。^⑤此是一解天京，得甫〈浦〉口而通之道之二困京也（连向帅算来二解

（接上页注②）曾国藩湘军予以歼灭，计歼敌六千人（据曾国藩《复刘霞仙》，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七）。当时湖南湘乡几于“处处招魂”（据曾国藩《复左季高》，见同上书卷八）。曾国藩《致唐镜海书》说：“敝邑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见同上书卷七）。可见三河这一役，给敌人打击的重大了。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后，天京还能够屹立八年之久，这一役与上面浦口之役的胜利，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

① 吕亨驿，在安徽桐城县北十五华里的吕亭（据《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卷一《公署》）。

② 孔城，镇名，在安徽桐城县东三十华里（据《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卷一《疆域》）。

③ 守桐城清将是李续宾部将总兵赵克彰，请参看下注。又这一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④ 关于收复安徽桐城事，胡林翼在《查明巡抚衔浙江布政司李续宾三河镇阵亡实迹恳恩加等优恤疏》记三河被歼灭后事说：“贼遂分两股，一由杭铺绕舒城，一由梅心驿窜桐城。先是李续宾以桐城为安庆、舒城后路，派总兵赵克彰统带六营及巴图隆阿、保庆马队等营，又檄调九江防兵参将赵友材、副将沈俊德、副将萧庆衍并归赵克彰节制，驻守桐城，为后路声援。十九日，贼出数大股来扑，漫山遍野，约七八万人。赵克彰令原在桐城各营及谢永祜之信前营，均以四成队守濠，六成队迎敌，自午至酉，鏖战四时。……朱希广先败，退至长濠，该营墙垒被贼焚毁，各营守濠之勇，逐渐溃乱。赵克彰即收队回营，而贼已从后路冲入长濠，包裹营盘。各营见势不敌，遂于是夜先后冲出重围。……其时城中无营护守，惟三河之溃卒聚于城内，见贼逼近，遂与各营同溃。此十月十九日赵克彰桐城溃失之实在情形也。”据此，知陈玉成和李秀成这一役克复桐城，是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十六日，即清咸丰八年十月十九日。其所述战役经过，也可作李秀成此处记载的参考。

⑤ 案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四月九江失守，这一年九月，清朝荆州将军都兴阿率军来犯安庆。到了三河大捷，桐城克复，清军以安庆围师前后受敌，乃向宿松撤退，于是安庆之围自战自解（据《清史列传》卷五十五《都兴阿传》）。

也)。^①三河、桐城之战,则皖围之〈立〉解。

那时陈玉成军由石碑而进宿松,其军乘胜,不知自忌,在宿松被曾帅部下将官马步打败,自退而回。陈将派其部下之将李四福领一军由青草隔〈壩〉^②进黄坭岗〈黄泥港〉^③,进石碑之上,去助宿松成功,到黄坭岗〈黄泥港〉被清军马军冲失一队,未及助宿松之力,不知宿松之败,两悞不成。^④陈玉成总欲得宿松,有安省之稳,心结实而图之。斯时我由潜山而进太湖,两处清兵自退,收得此二城,是陈玉成派将把守。陈玉成自宿松之败,仍回太湖与我会议,其欲节节连进二郎河^⑤,屡议我不〔欲〕愿,其〈渠〉^⑥屡屡多言计息,不得不由而从,当即分路进兵上二郎河。会鲍军同左〈多〉将军之兵,一由二郎河而来,一由宿松而来,马步并进。陈玉成之军先败,其营概被鲍军所得,其被鲍军逼其上山,杀死数千天朝将士,独乘〈剩〉我紮大营六座未破,被困至夜,左〈多〉、鲍收军,我冲阵而出,是夜仍退回太湖,陈玉成亦至。^⑦那时陈玉成军屯太湖,其〈渠〉自回安省。

① 这一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② 青草壩,在安徽怀宁县西北百十里,凭沙河,与桐城、潜山二县分界,官路所经。

③ 黄泥港,在安徽太湖县东南,与怀宁、潜山二县交界(据《同治太湖县志》卷三《輿地志》)。

④ 案陈玉成进攻宿松,系分两路进兵,自统大军由石碑前进,另遣部将李四福自桐城青草壩进至太湖县黄泥港,以夹攻宿松,清荆州将军都兴阿马军迎击,先败李四福。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廿三日,即清咸丰八年十月廿六日,都兴阿又在王家畈等处打破陈玉成大军(据清咸丰八年十一月初八日都兴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九)。《清史列传》卷五十五《都兴阿传》说:“李续宾战歿,潜山、太湖、舒城复陷,都兴阿退保宿松。陈玉成由石碑上窜,遣党犯黄泥港,谋夹攻宿松,均为都兴阿所败”,便是指这一役说的。

⑤ 二郎河,在安徽宿松县城西北三十华里(见《宿松县志》卷二《地理志·山川》)。

⑥ “其”,应写作“渠”。我家乡广西贵县说:“渠做的”。其义为“他做的”,说“渠”,不说“他”。李秀成不会写“渠”字,故写成同音的“其”字。曾国藩看《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多次,才看得出为“渠”字。考《三国志》卷六十三《吴书》十八《赵达传》说:“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即此义。

⑦ 二郎河之战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夜,即清咸丰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夜。时太平军进营于花凉亭、二十五里墩、荆桥一带。清将鲍超军扎二郎河,多隆阿军扎宿松。这一夜多隆阿统军赶到二郎河会合鲍超分道来犯,清帅都兴阿自率马队设伏而进。太平军战败,陈玉成打算取宿松以固安庆外围的计划不能达到(据清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官文、都兴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十)。这一役,论者说是陈玉成用兵失败的开始。刀口餘生《被掳纪略》说:“王小亭、缪植甫、阎海山、程鹏云等闲谈云:英王自带兵以来,一帆风顺,大张旗鼓,所到之处,不破则降,最失机者二狼〈郎〉河之战。……多帅、鲍帅、杜〈都〉帅三军,扎二狼〈郎〉河,共五十五营。英王(转下页注)

我引军回巢县黄山屯紮，息养过年。左〈多〉、鲍二军，亦而息马养军。

那时江浦〈浦〉是薛之元镇守，九年正月，投降清朝，将甫〈浦〉城献降。^①此时李昭寿在滁州乌衣、小店连营，接连江浦〈浦〉，甫〈浦〉口亦是李昭寿兵屯。此时又是为三困天京矣。那时我上〈尚〉在黄山，救之不及。然后得悉江浦〈浦〉之变，赶下甫〈浦〉口，城内一片空城，城外有李昭寿之兵，不得已，令将入屯甫〈浦〉口，暂通天京之路。所幸者那时有六合、天长，和州、巢县、无为之势。后经南岸张帅加兵来两甫〈浦〉，又被困紧，那时虽通京城些须之道，其实不由，然后不得已，追调前军主将陈玉成赶军下救，后而由庐〈庐〉郡梁园而至。那时六合亦有清朝之军数万围困六合。^②困六合清将姓朱，是广西人，张帅部

（接上页注⑦）骄气过甚，直期将营踏平。抑知三军皆节制之师，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先出令，着孙魁新先锋，的是能打，战未一时，败下来了。又命张罗刑之侄张小阎王迎敌，一战亦败了。……英王怒发冲冠，自带中队中出队，进兵颇有道理。战有三个时辰，队全站不住了。鲍超见英王坐在高处，命准头枪二百杆对英王直打，包中皆烧，未有打着。其不死者，有天幸焉。”案刀口餘生是在陈玉成军中，所记陈玉成军中谈论说“英王骄气过甚”的话，可与李秀成此处所述陈玉成“其军乘胜，不知自忌”的记载参考。

① 案江浦太平天国改为天浦省，乃天京门户。薛之元，安徽霍邱县人（据《光绪江浦埤乘》卷十四《武备》下），是捻党的一个首领。他归附太平天国后，天王以他有胆识，战守有方，特委以镇守江浦重任（据天王《命薛之元镇守天浦省诏》）。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正月廿一日（清咸丰九年正月廿六日），薛之元在天浦省叛变，第二天，与李昭寿同陷浦口，清廷给他四品顶戴，命更名成良（据清咸丰九年二月初五日和春奏，见《剿平捻匪方略》卷五十七）。十年五月，薛之元因索饷劫清吏，为清福建陆路提督李若珠督军围剿于高邮王家港，解散其众，薛之元溺水潜逃，这年八月给李昭寿诱擒杀于滁州，李昭寿遂以杀薛之元功擢江南提督（据清咸丰十年五月廿五日李若珠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三，同年八月十六日袁甲三奏，见《剿平捻匪方略》卷八十三）。

② 当时薛之元在天浦叛变后，天京北岸门户被截，六合被围，形势险恶。胡林翼清咸丰九年四月十四日《致牙厘文案粮台诸君书》说：“据副右营逃去之败勇孙姓供，四眼狗于鹤营降后，破胜帅之营，即夜驰往江浦，不能遏志。贼约六七万人，官军亦有数十营垒，严守不战，前凭江流，后阻沮泽，贼亦不能越也。狗偷渡金陵，以金陵求援日急，每人日米四两，每礼拜钱八文。数日后，狗仍渡江，欲即往六合。如六合不败，则金陵可破，计零星接济必不能多”（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四《抚鄂书牍》）。案“四眼狗”，是敌人狂吠陈玉成的称谓。考刀口餘生《被掳纪略》记陈玉成状貌说：“人身体不高，面黄白色，声音出林，两眼下各长一紫痣，故号四眼狗。”案刀口餘生姓名不详，曾被编在陈玉成军，得见陈玉成。鹤营，指清朝署理安徽巡抚李孟群的军营，李孟群字鹤人，所以胡林翼叫他的军营为“鹤营”。李孟群军队投降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二月。胡林翼在同月廿四日《复贵州粮道韩南溪书》又说：“江浦守贼薛成良献城，江南官军渡江守之，进克浦口，并围六合。该处与金陵唇喉，贼所必争。陈逆率众往援，势颇狼狽”（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四《抚鄂书牍》）。胡林翼这两封信的论述，可与李秀成此处记载参考。

下^①，发未六合。后前军主将先攻六合，头一战未成，然后将兵扯下扬州，声张困打阳（扬）郡。那时朱军屯在六合东门一带四十馀营，攻扬州，过东门之后，是以分朱军兵势之计，复兵回袭。朱军战士调救扬州，被我复兵隔断，内无战兵，外救不能速至。后江南张帅分兵来救，在陵子口交锋，一战张军而败。是夜朱军尽退，六合之围而解，朱军失士甚多。^②后又同陈玉成引兵回甫（浦）口，将清朝周将^③困甫（浦）口五六十营攻破。自六合班师上甫（浦），与清帅张国樑及其部将张玉良^④、周姓等战。五、六日大战，张国樑兵败。周将见主帅兵败，将士心寒，无有守战之心，中有大江之忌（惧），将兵自畏，未有力敌之心，故而甫（浦）口清营不能守也，失去清营五六十个，退到河边，不能再退，其上有江甫（浦）未退。^⑤那时独〔通〕

① 考困六合的清将为福建陆路提督李若珠，广西宾州人，清道光丁酉武举，投效军标，后随署广西提督刘长清追太平军至南京，隶江南大营（据《民国宾阳县志》第七编《列传》）。李秀成说：“困六合清将姓朱”，是误把他的名记作姓了。

② 案六合解围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九月廿三日，即清咸丰九年十月初七日。这一役，陈玉成先扬言进攻扬州，调动了清朝围军的兵力，然后回军六合，于九月十四日（夏历九月廿八日），先在红山窑东大破江南大营援军，横截清军大营后路，四面合围昼夜环攻。清军不得出。廿三日（夏历十月初七日），探得太平军口号，始得出重围，溃走扬州。六合解围（据清咸丰九年十月初十日和春奏，同月廿日和春奏，均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二十六）。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八记其事说：“李提督攻六合，被援逆窜踞红山窑，横截大营后路，和大臣派总兵冯子材等援剿，营于红山窑之东，因大炮震裂，兵勇惊溃，致东营复为贼踞。六合大营被困，粮尽援绝，统带忠勇詹启纶列营南门外，密探得逆垒口号，呼啸而出，李提督率众从之，遂突重围，驻扬州西路。”此役清军伤亡惨重，清政府革李若珠职，钦差大臣和春亦下部议处，因为和春是主帅，而李若珠则为围攻六合的主将。关于陈玉成这一次救六合用的战略，胡林翼在清咸丰十年正月十七日《致金国琛书》说：“查去年贼围李若珠，本已数战不能破入，贼忽发一枝兵马绕入扬州城边，扬州告急，李若珠分兵前往，而贼又急攻李若珠之垒，遂致被困。又查近年在鄂，总是分枝作小包大包之势，专以狡计与官军为难”（见《胡文忠公手翰》卷三）。胡林翼所论这一役的战略与李秀成所记全同。

③ “清朝周将”，是困浦口的清朝湖北提督周天培。

④ 张玉良，为向荣旧部，屡与李秀成对抗。这时任甘肃巴里坤总兵，隶张国樑部下。清咸丰十年春，以收复杭州功，擢广西提督。咸丰十一年十月，带兵来救杭州，被太平军打死（据《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九《张玉良传》，及《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九十三浙江布政使林福祥奏）。

⑤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太平军攻破浦口清朝围军之役，战事起于十月初七日（清咸丰九年十月廿二日），迄十二日（夏历十月廿七日），大破敌军，斩清朝湖北提督周天培。清军往江浦溃退（据清咸丰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和春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二十七）。故李秀成说大战五、六日。又考杜文澜《江北扬州大营纪事本末》对这一役有简要的记叙说：“时和大臣派提督周天培扼浦口，连营垒为江浦声势。自六合兵溃，贼窥围浦口。张提督闻警，派兵驰往协堵，屡战失利，周天培阵亡，营垒皆陷，大军退保江浦。”

京之半边之路，此是四困京城之小解围也。

自攻破甫〈浦〉口、六合之后，曾帅大军又由黄〔梅〕、宿松而来，上路又未告急，前军主将扯兵上救，独我不能前去，要保甫〈浦〉口，后破两甫〈浦〉清营未尽，后又反生。我守甫〈浦〉口日久，又无军饷支兵，外又无救，南岸和、张两帅之兵又雄，无兵与其见仗，营中所用火药砲子具〈俱〉无，朝无佐政之将，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军务政务不问，我在天朝实无法处。力守甫〈浦〉口，后又被见疑，云我有通投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当，封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被天王悉到，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此时虽而受逼，我乃粤西之人，路隔千涯，而无门投处，我粤人未能散者实无门可入，故而逼从。若曾中承〈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今我天王立国，其欲剗〈创〉立山河，非我知也。大清欲息峯〈烽〉烟，再望平定天下，收服人心之为首。我主实因德政未修，故而败亡。久知中堂恩惠，收齐作乱之人，免乱世间百姓，早日可安宁，清军将相早日解甲息军，满天同歌而颂赞中堂、中承〈丞〉大人恩德巍峨，荃^①邦之幸也。语语直陈，实出我直心之意，蠢直如斯，非敢多言话辨〈辨〉，我是何人也，本朝英才片〈遍〉地，非我军犯之昧言，久知中承〈丞〉大人、中堂恩量，故而言及。我今临终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宁，闲言粗諗〈表〉，恳容见量〈谅〉。

今将我在甫〈浦〉口被逼之后，逐细陆续陈清。那时江甫〈浦〉上〈尚〉是张帅之军屯困。我见时势甚不同，轻奇〈骑〉回京奏主。主又不从，当金展〈殿〉与主办〈辨〉白，问主：“留我镇甫〈浦〉口，尔外救应望何人？”将主国臣筹算，与主周详算：“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韦志俊业投清朝；^②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有其名未能为用；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在池郡英家会〈殷家汇〉^③、东流，

① 太平天国避天王洪秀全的全字讳，故李秀成写作荃。

② 韦志俊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九月十一日（清咸丰九年九月廿五日）在池州府叛变，部将古隆贤、赖文鸿、刘官芳、黄文金不从，夺回池州（据胡林翼清咸丰九年十二月廿日《奏陈逆首投诚献城旋为贼党袭踞先后剿抚办理情形疏》，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八）。

③ “英家会”为殷家汇的音误，镇名，在安徽贵池县西南六十华里（见《光绪贵池县志》卷六《舆地志·村镇》），北濒长江，西通建德、东流两县。太平天国在这里（转下页注）

亦有曾帅之军制战；左军主将李世贤已在南宁〈陵〉湾趾〈沚〉一带；京城四门具〈俱〉被和、张两军重困深濠，朝内积谷无多，主又不准我出，[谁]为外来救？我主意何为？”与主力辨〈辨〉。当被严责一番，又无明断下诏，不问军情，一味靠天而已，别无多诏教臣。不得已，后而再行强奏，定要出京，主见我无可而留，准我出京。当即将甫〈浦〉口军务概与黄子隆^①、陈赞明^②接镇，当即行军，自甫〈浦〉口动身到无〈芜〉湖。三、四日之间，甫〈浦〉口城外靠大江边营盘，概行被张帅之军攻破，九伏州〈九洲〉亦已失守。^③此时京城又困，此是五困京城矣。

（接上页注③）建立一个据点，作为长江南岸军事交通的要道。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杨载福奏说：“池州府属殷家汇地方，为南岸之贼往来要径。贼匪筑垒踞守，垒后新开小河，搭有浮桥，可通池州府城”（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二）。

① 黄子隆，广西藤县人，后封潮王，守无锡。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秋，苏州被攻危急，李秀成求救，子隆按兵观望，企图叛变，到见苏州八叛徒降敌被杀，才知道投降是死路一条。但苏州既失，无锡亦瓦解，子隆被俘，后悔莫及，给敌人杀死。

② 陈赞明，湖北人，典当业出身，参加革命，任典圣库（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冬与黄子隆同替李秀成镇守浦口。壬戌十二年二月，与护王陈坤书等统兵过江北，谋赴庐州救援陈玉成，时任掌率（据英王陈玉成《致护王陈坤书求救书》引陈坤书本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其后事迹待考。

③ 九洲洲，在江苏江浦县浦口镇金汤门南十馀华里，准对下关，地势高耸，江面狭窄，太平天国在此设立要塞，保障天京（据《光绪江浦县志》卷一《疆域》，卷十四《武备》下）。清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彭玉麟上曾国藩述九洲洲要塞的建置说：“九洲洲在至河口下里许，周围不过三里大，环围皆江。据土人云，其初原不险，盖贼得恃其中防夷大炮数百尊以险也。自张家祥收复后，修以巨石，环以石壕，如螺丝络者七八道，内可走船，湾湾曲曲，水流湍急，我军一时难以硬攻，是以险而又险处也”（见《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二册）。《彭刚直公诗稿》卷一《夜破金陵对江九洲洲》诗注又说：“贼踞十二年，筑伪城，敌楼横巨炮数千，与石头城对峙，外江后河，复环伪城，浚濠二十馀道，只有通江一路，以严出入。”清咸丰十年正月十九日和春奏述其事说：“查金陵北岸九洲洲为南北往来水陆要道。自咸丰四年，洪逆分遣死党扎营洲上，内蔽金陵，外通大江，出入自由。必须攻克此洲，断其江北要害，全局方有把握。正月初八日，张国樑部勒各军，克期大举。……初九日，官兵水陆并进，直薄浦口。……当将逆垒八座，逆卡十馀座，一律攻克。……张国樑派冯子材等因垒为营，仍飭水陆官兵会攻九洲老巢。我军更番休息，昼夜轮流轰击……即于初十日卯刻攻克九洲洲老巢”（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二十九）。帮办江南军务许乃钊《致吴煦书》也说：“张副帅于去腊廿五日渡江布置。正月初九日，会合水陆由江干直捣九洲洲咽喉，破贼卡垒数十座，仅馀洲上老巢一座。今晨又攻。顷从隔江遥望，我军已破垒而入。从此扼吭捣腹，大有转机，专此布闻”（见吴煦档案）。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咸丰十年纪事说：“正月初九日，张总统水陆进薄浦口沿堤贼垒……共平贼垒八座，卡十馀，斩首千馀。初十日，遂合兵攻九洲洲老巢，汹涌潮进，越重濠，纵火焚其穴，烟炎蔽天，贼死者数千计。二月，克复上下关（李圭原注：上关即龙江关，在上河，下关在仪凤门外滨江），尽焚贼垒。金陵上关滨江有寿德洲，下关滨江有七里洲，久为贼踞。既破九洲洲老巢，和大臣张总统（转下页注）

被和、张两帅密密加营，深濠格深，阍朝无计，京城困如铁桶一盘（般）。^①此时天朝气数未尽，不应绝命，人心再振，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而肯从我意，任我指陈（挥）^②。自困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四筹解救，善心

（接上页注③）定议招降，令贼党去逆就顺，寿德、七里洲守贼秦礼国、谢茂庭相率投诚，愿约期攻二关为内应。初三日，总统会诸路军进剿，总兵熊天喜由七里洲宝塔桥平毁贼垒，收复下关。秦礼国亦从寿德洲轰炮内击，总兵刘季三率军直进，斩贼无算，上关亦复痛扫沿河贼垒，贼连夜退守江东门。”据和春奏报，知九洲失陷在清咸丰十年正月初十日，即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二月廿三日。而浦口城外靠长江边营盘，则在前一天失陷，据浦口城外江边营盘失陷日期推定，又知李秀成出天京调救兵日期，是在十二月十五分左右。

① 关于和春、张国樑江南大营修筑围墙和挖筑壕沟困天京事，李秀成《谕上海百姓檄》说：“京都附近地方，长城则一百里之遥”，干王《洪仁玕自述》说：“被张嘉祥四面筑长城围裹京都”，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书》说：“戊午八年有该诛妖敌愆不畏死，胆敢纠聚各路妖兵勇匪，前来天京城外筑造土营，挑挖长濠，围困三年之久，南北水旱两路，一线不通。”清咸丰八年五月初四日清钦差大臣和春奏说：“此时金陵围攻自城北之上元门至西路之三汊河、乐心寺江干上，共长一百三四十里，大小营盘约一百三十馀座，兵勇约四万有奇”（《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五）。当时人对此事也有记载，如王永年在《癸未五月初度五首》其三注说：“己未，张忠武公国樑迭获胜仗，逼近金陵，沿城挖沟，曰万里濠，贼又受困”（见《紫蕖馆诗钞》上卷）。吴颐吉《冥鸿草江南两制军行》咏张国樑事，在“长濠万里奇功伟”句注说：“金陵城广，贼兵四出难防，公于东南面筑长濠拒守，横亘数百里，俗呼万里濠”（见《仙蜨诗存》卷一）。顾我愚《孝陵卫杂咏》诗序说：“咸丰六年丙辰，向荣败绩，殁于丹阳，张忠武公乃拜总统之命。明年丁巳，克复溧水、句容、镇江。是年冬，进攻金陵，北自观音门掘濠而东，越锺山西岭，迤迤而南，跨上方桥，以困城之东北。贼方出屯秣陵关，虎镇军击之，中飞炮死。戴文英将其众，急攻之，贼乃走。乃更筑长濠，自上方桥而南，循雨花台之阳，复西折而达于江，连营数十里，如环带焉。于是南岸之围始合。……此咸丰八年戊午也”（见《愧斋遗稿》卷一）。案顾我愚是当时身预其役的反革命分子，故所记很具体。据以上所引，可见当时敌人用长濠围困天京的情况。

② 李秀成奇袭杭州以救天京，是太平天国战史中一大战役，就是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天国“得意之笔”（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七，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二日《致沅、季两弟》）。考《粤匪起手根由》说：“江南被张大人围困，各位王在无（芜）湖会同议论进兵折（浙）江。”又考许瑶光《谈浙》述李秀成《会议辑略》说：“予尝于营中获其会议伪书，自述……十年会议于芜湖，陷广德、泗安，以破杭州，分我兵势，旋回聚于界牌，纠集上江诸贼，暨侍逆、辅逆、刘逆、古逆，即英逆亦由北渡南，扑我大营，致张帅阵亡于丹阳，和帅自缢于浒墅”（见卷三《再谈七年浙江筹防事略》）。据此知这一役，李秀成在军事行动之前，先在芜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战略。《粤匪起手根由》所说“各位王”，就是指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据干王《洪仁玕自述》说此役由他主谋。案这一役所用的战略，乃是中国古代战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略，也是太平天国的一个传统的战略。乙荣五年石达开攻江西以救武昌和九江，己未九年陈玉成攻扬州以救六合，辛酉十一年攻武、汉以救安庆，癸开十三年李秀成“进北攻南”以救天京等等，都是运用这一个战略。所以，这一役李秀成在芜湖召开军事会议，群策群力，谋定后战，辉煌地运用这一个战略，卒获致大胜利，我们固然不能说是李秀成的计策，更不能说是洪仁玕的主谋。《洪仁玕自述》的话，并非事实。

用意,和就外臣,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之名号,实在我舍散艮〈银〉
 水,不计敌军将臣,与我对语,亦有厚待,民间苦难,我亦肯给资,故而外
 内大小,人人能认我李秀成者,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长,长
 者,重用者,我天王是一重幼西王萧有和^①,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王
 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②,第四重〔用〕其驸马锺姓、黄姓^③,
 第五重用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后,正将^④英王之事交与

① 考太平天国晚期定制,凡一切本章上奏天王,先盖会同公议,后即封箱递至资奏官,资奏官阅后,再加图记,即用自印封箱,传献幼东王,盖金印转献。故一切本章得上奏与否都经资奏官阅后决定,至幼东王加金印转献只是一个形式,其权都操于资奏官之手,其资奏官则以幼西王萧有和兼任(据廿六日幼主诏旨,廿七日幼主诏旨,案此两诏无年月,伦敦博物院藏钞件),故李秀成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这时候,萧有和据贺翼柯(A. E. Hake)《戈登在中国》引教士何默斯(J. L. Holmes)于1860年夏访问天京的报告说十二岁或十四岁。天京陷后,从太平门出走,为清军追及,在湖熟镇牺牲。

② 洪仁玕,是天王的族弟,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春始到天京,初授福爵,不到一月,进封义爵,加主将,再进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全国政事。洪仁玕曾在香港教授西洋牧师,在上海洋馆学习天文历数,得到长期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机会。他到天京时,撰《资政新篇》一书,进献给天王,企图把中国建立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他是太平天国里面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在近代中国开始初步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的人物,但是,洪仁玕没有参加到太平天国革命前期的斗争,他对当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面貌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因此,就使得他在《资政新篇》中没有能够提出反封建的革命的纲领,也没有能够提出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对策,直到经过了严重的教训,才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太平天国的死敌,在他被俘后写的《自述》中给后人写下了“清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的血的教训。同时,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一种防止“弱本强末”之弊的中央集权的政纲,广封王爵,以分李秀成等的权力,破坏了团结,造成了洪氏集团与李秀成等对立的严重情况,洪仁玕也是要负责的。癸好十三年十一月,天京被围急,洪仁玕奉命出京催兵解围。甲子十四年六月,幼天王出走到湖州,洪仁玕保护幼天王入江西,兵败被俘,这年十月在南昌就义。

③ 天王驸马锺姓、黄姓,锺姓为殿前又正总开矿天二驸马金王锺万信(据《十救诗》前天王诏旨、《忠王答辞手卷》及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贼酋名号谱》,左宗棠奏作锺英),太平天国乙好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即清同治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在广东丰顺县北白水寨被俘死难(据清同治五年正月十四日左宗棠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百十四)。黄姓为殿前副总开矿天四驸马凯王黄栋樑,殿前又副总开矿天西驸马捷王黄文胜,年纪都小,天京陷落时在城内,下落不明(据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月廿七日天王诏,同年五月初九日天王诏,同年六月廿八日幼主诏,《忠王答辞手卷》及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贼酋名号谱》)。

④ “正将”,就是“方才将”的意义。这是广西浔州、梧州一带的方言。例如“正界渠做”,就是国语“方才给他做”。曾国藩刻本不懂“正”字在此处是浔、梧方言,就把这一句话改为“英王死后,主将英王之事,交与我为”,是妄改的。

我为。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自尽一心。那时天京困紧，实实无计。十年正月初二日，由无〈芜〉湖带领人马到南陵，过青戈〈弋〉江^①马头^②，由宁国高桥^③而过水东。^④那时宁国^⑤清军防脩我攻打宁城，其〈渠〉严脩我到，谁知我由水东顺过宁国，两日两夜赶到广德州。当即攻破广德，留陈坤书、陈炳文在被〈彼〉守把^⑥，我亲带部将谭绍光、陈〈陆〉顺德、吴定彩等由广德动身到四安。^⑦四安有张国樑之军在此守把，是日到此，当即闭兵，两家见阵，拼力来迎。此时张〔军〕败阵，攻破其营，收四安，下红心^⑧，会家弟李世贤之队并力计攻湖州。那时湖郡不欲〈须〉人多，将此城交李世贤自攻，我扯本部人马由庙西到武康，日夜下杭郡。^⑨那止有六七千之众，将杭州困其五门，三日三夜，攻由青〈清〉波门而进。攻破杭州，非是人力，实实天成，一千三百五十名先锋打破杭郡，并非人力之能也。杭民应难，劫数难逃。我非一心去打杭郡，见和、张两帅困我主及我母亲

① 青弋江，在安徽宣城、南陵二县间，为宣城、南陵二县界水。

② 马头，镇名，在安徽泾县东北三十华里赏溪东南滨，近南陵、宣城二县境，商舟聚集。

③ 高桥，即高桥坊，在安徽宣城县东二十五华里（据《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二《舆地志·乡都》）。

④ 水东，在安徽宣城县东六十华里（据《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二《舆地志·乡都》）。

⑤ 此处宁国，是指安徽宁国府城，即宣城县，不是指宁国县。当时宣城县为宁国府治。

⑥ 李秀成攻克安徽广德州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正月十六日，即清咸丰十年二月初三日。吴煦探报记太平军克广德州情况说：“广德州于本月初三日乡民演出祠山大会。是日该贼等皆从白毛岭偏僻小路扮作香客，陆续而进。该匪集千余人，乘机骚扰。现在该匪踞城不出”（见吴煦档案）。

⑦ 四安镇，在浙江长兴县西南七十华里（据《光绪长兴县志》卷一下《镇市》）。

⑧ 红心，当是虹星桥镇，在浙江长兴县西南二十五华里（据《光绪长兴县志》卷一下《镇市》）。查《湖州府境全图》及《长兴县境全图》（均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一），虹星桥镇在湖州府之西，而四安镇又在虹星桥镇之西，为李秀成从四安进攻湖州必经的路，李秀成所说：“收四安，下红心”，当即此虹星桥镇。“红心”与“虹星”音近，李秀成当是因音近致误。

⑨ 缪德荣《庚申浙变记》述李秀成袭杭州事说：“〔咸丰十年二月〕辛亥，贼陷孝丰，壬子夜，从间道袭武康。癸丑，经狗葬，夜焚良渚，杭城尚未之知也。……越翼日甲寅辰刻，贼至武林门。前队假冒官军，称来自宁防，将混入城。统领宝胜军、候选道陈炳元登城观望，知为贼队，令速闭城，乃不得入”（见《缪武烈公遗集》卷六）。案缪德荣当时随其父署两浙盐运使缪梓在杭州，为亲见其事的人，据缪德荣记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正月廿九日（清咸丰十年二月十六日辛亥）克孝丰，卅日夜（夏历二月十七壬子夜）从间道袭武康，卅一日（夏历二月十八日癸丑），经狗葬，夜焚良渚，二月初一日（夏历正月十九日甲寅）早晨，就到杭州武林门，其行军的迅速可见，盖日夜兼程前进，故能迅速如此。李秀成说：“日夜下杭郡”，这一段资料，可作注脚。

[在]京,知和、张两帅军饷具〈俱〉出在稣、杭^①、江西、福建、广东,此是出奇兵而制胜,扯动和、张两帅江南之兵,我好复兵而回,救解天京之谋,非有立心去打杭郡。打入城内,连战数日,满营未破,然后和、张两帅果派江南救兵来救杭郡,令张玉良统带到杭郡武林门,两家会话,知是江南和、张之兵分势,中我之计。次日午时,将杭[郡]新制造旗帜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计。不意张玉良果中我谋,退出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得。^②此时天朝未当灭绝,谋而即中。“于今”气数业已满登,谋而不中。

① 许瑶光《谈浙》卷一《谈咸丰三年设防宁国之始》说:“黄宗汉(寿臣)抚浙,闻芜湖已为贼踞,恐贼从徽、宁入浙,乃请设防于宁国。……宁国弁勇丁均由浙定,饷解军火均由浙济。浙中向无劲旅,乃乞师于向帅。其时向营兵饷,除苏、常供给外,每月由浙协济六万、拨解未赏稍缓。向亦以浙为饷源,因而健将劲兵络绎调赴宁国。”因为浙江为江南大营的饷源,故李秀成攻杭州,江南大营必定分兵去救,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谓“攻其所必救”的道理。

② 李秀成这一役攻入杭州是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二月初九日(清咸丰十年二月廿七日)。清肃州镇总兵张玉良统江南大营兵来援,二月十三日(夏历三月初二日)抵大关,十四日(夏历三月初三日)李秀成全军退出杭州(据清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和春奏,同月十三日和春、何桂清、徐有壬奏,均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三)。此役,时人许瑶光《谈浙》一书记载颇详,可与李秀成所记参看。许瑶光记道:“张殿帅克复九洲,金陵贼窘,忠逆、侍逆率吴廷彩、陈炳文、谭孝先、陈坤书、李尚扬诸逆由六合渡江,集群匪会议,度岁于芜湖,图解官军之围,疾趋宁国县。正月初旬,泾、太、旌、宁四县连失,周天受拥兵二万三千困守宁国府城,不能御贼。二月初三,陷广德。……初六日,陷泗安镇。粮台遂退湖州。李定太之兵败于梅溪,亦退湖州。初八日,安吉、长兴被陷,贼乃分股犯湖以牵我势。十二日,攻湖州之青铜门,其大股由武康走羊珠狗荡以逼杭省。十七,至西湖山中。十九日,抵武林门。是日为大士诞辰,杭州香客纷纷入天竺,又有难民过境,不知为贼至也。管带楚勇知府陈炳元(炎生)登武林门而望知真贼,乃闭城登陴。省中除满营外,杭抚四营兵二千餘名,宁绍台道仲孙懋兴勇一百二十名,运司缪福胜勇四百名,协防局团勇三百名耳。城外衢兵千名,新招江西勇千名,臬司段光清亲兵勇四百名,皆先出守餘杭,为贼所格。二十日,段率亲兵由餘杭返,且战且行,满营相应乃入城。廿三日,贼绕至玉皇山,缪、段两起出队,不战而归。廿五日,贼于湖上扎营十餘座。段臬司率亲兵及江西勇三路出队,败而归。……时罗抚飞章告急,各路乞援。张玉良援杭州……由湖援杭。三月初一日,张坐小船携六百人,初二日,至武林门,而贼已于廿七日卯刻轰陷清波门矣。贼之开挖地道也,日夜击锣鼓。……地雷发而城塌。贼上城喊杀,福胜勇怀中出红巾裹头为内应,戕缪运司,遂开门纳贼。……满洲将军瑞昌谨愿人也,外城陷,将军欲自裁,都统来存、佐领杰纯苦战自保,满营得全。初三日,张玉良架梯登艮山门,闪张字大旗,杀贼十八名,贼以为张殿臣帅至也……退攻大营以解金陵之围,乃决意弃城,出清波、涌金门走。张玉良入城,报收复”(见卷一《谈咸丰十年春二月杭州失守克复情形》)。李应珪《浙中发匪纪略》也记其事说:“庚申,贼因去年官军克复九洲,乃遣伪忠王李秀成、伪侍王李世贤率万人由南陵越宁国、广德入浙,为围魏救赵之计。三月初八日,贼由广德趋东亭,陷安吉。十二日,又由泗安陷长兴。时李定泰军万二千人。在杭有议令其出(转下页注)

以前至今，亦是此人任事，而今计不中而失京城，一是我主无福，清朝有福，曾帅大人坚心耐苦，将士齐心，曾家亦有厚福而辅清朝，得此城而威扬天下，实中堂之谋、九帅^①之才谋算，将相用命，而成全功也。此段放下，再将杭郡退出，未解京城之围，张、和兵败之情節，一一详呈。说清之后，再又说今失天京之情。此事十餘年之积聚，一段难以说清，陆续载计清明。

自退出杭郡，由余杭过临安，行天目山，出孝丰（丰），到广德。^②那时我行前，张玉良之兵行后。其入杭城兵，取杭城民物，不肯追我。查

（接上页注②）独松关、分扼泗安、东庭两路，并屯百丈关，以固边围者，而军已由湖州援吉安，败于梅溪，退守湖州矣。贼十九日直扑湖城，绅士赵景贤率练军固守，于是分党千餘向太湖、夹浦窥省城。十七夜从山径陷武康。十八日走勾庄，夜焚良渚。十九日黎明，数十骑已入武林门，官军始觉，迹之不得。……贼分围武林、钱塘、涌金、清波四门。……二十七日，贼于清泰门外西竺庵用地雷轰塌城垣数丈，一拥而入，于是省城遂陷，计守城仅逾八日。……是夜贼仍退出。二十八日，始尽入城。……三月初二日，张玉良由湖州至，贼喜金陵大营中其计，急弃城回攻。越一昼夜，张玉良乃逾艮山门入。贼由涌金、清波门走平窑，出独松关，由临安、孝丰径回金陵。初八官军复临安，十四复孝丰，十五复长兴，而贼已于三月内乘虚攻溃大营，进陷江苏。”关于这一役李秀成兵少事，清朝方面也有报告。廿二日巳刻，浙江省城城守局绅士戚来信，廿三日酉刻到苏：“十九日忽有贼匪窜至武林门外，直扑入城，幸人数不多，已竭力挡住，立时闭城。城外火起，自大关以至近城，皆为灰烬。连日涌金、钱塘、清波皆被其烧。细探贼来不过千餘人。然我军无劲旅，仅能布置守御，不敢出战，幸贼亦并未来攻，仅于夜间肆其诡变，以疑我心。但我之守御等事亦甚草率，兵勇多不齐集，若非贼数不多，竟不可问”（见吴煦档案）。可见李秀成说“一千三百五十名先锋打破杭郡”，确是实事。

① “九帅”，指曾国荃，曾国荃排行九。

② 天目山，在浙江湖州府孝丰县“西南六十五里金石乡，高三万六千尺，广八百里，与杭州府临安、於潜二县接界”（《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輿地略·山》下）。同书引《方輿纪要》论其形势说：“连亘于杭、宣、湖、徽四州之界。”又引《掌故集》说：“东峰从临安入，疏豁可行，西峰从孝丰入，深僻不易。”这是一条从临安出孝丰的捷径，李秀成从杭州回军攻击江南大营时就是走这一条捷径，而清兵走的却是弯弯曲曲的大路，所以清兵回救不及。薛福成《庚申杭垣之陷》说：“咸丰年间，贼扰江西、安徽等省，浙江之军以常玉山、昱岭关、四安镇三路为重防，其餘则视贼所趋而调拨之。己未十月，江南借浙闻乡试，皖南之人赴浙者率由广德、四安径从安吉、孝丰山中抵杭，盖小路也。自是人始知山中有途径，而贼亦侦探得之。庚申春，大军围金陵甚急，伪忠王李秀成欲救金陵，乃以悍贼数百，沿途裹胁，由安吉、孝丰、余杭越山而至杭郡。巡抚罗壮节公（遵殿），以事出仓卒，未暇调兵，不知所措，数日而城陷。……值金陵分大军继至，贼仍由此路遁走，大会群贼，攻陷东坝，乘大军之虚，攻陷老营，而东南遂糜烂矣”（见《庸盦笔记》卷一）。海盐朱丙寿《杂诗八首》有句道：“山耸乌回（武康山名）磴道长，一朝暗度似陈仓（贼陷安吉，潜由武康山路直逼武林）。村虚上陌人烟少，水咽前溪夜月凉（上陌、前溪，武康地名）。走险居然如挺鹿，临歧未必类亡羊（贼之前队，必有内地奸细引路，故险峻处皆能行）。平明探骑临安至，底事传烽羽檄忙”（见《榆荫山房吟草》卷二）。钱塘张预《二月十九日寇警》在“疏防怨八都”句下注说：“贼由宣城越吴兴，间道趋杭州，实吴越钱氏设防故道，号为八都兵者也。（转下页注）

广德到天京三百馀里，杭州至〔金陵〕八九百里，湾湾曲曲，千里有馀，是以张玉良回救金陵不及，此解京解〔围〕，乃有天合，不然，亦不得成此美事也。至杨辅清早日有文约其会战，解救京城，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通文亦至，侍王亦到，具〔俱〕在建平大会^①，此是天机，即是四明山之会一样之情由。^②朝不该绝，是以而合天机。会议之后，当即分兵，杨辅清带领人马攻高敦〔淳〕^③东坝^④，派李世贤攻溧阳〔溧〕^⑤。刘官芳亦至。此时处处成功，辅清遂克溧水^⑥木〔秣〕陵关^⑦，侍王李世贤

（接上页注②）今绝无备，贼遂得乘虚掩至”（见《崇兰堂诗初存》甲集下）。缪德荣《庚申浙变记》也说：“辛亥，贼陷孝丰，壬子夜，从间道袭武康。癸丑，经狗葬，夜焚良渚……甲辰辰刻，贼至武林门。”案李秀成记袭杭州说：“我扯本部人马由庙西到武康。日夜下杭郡。”记退出杭州说：“退出杭郡，由余杭过临安，行天目山，出孝丰，到广德。”今参考当时人记载，知李秀成这一役进兵和退兵，走的都是小路捷径，故能乘敌人不备袭陷杭州，并且能够迅速回军攻陷江南大营，收到了作战所预期的目的。

- ① 建平属安徽省，为当时江苏、浙江两省紧要门户，清咸丰六年五月十六日，浙江巡抚何桂清曾奏论其重要性说：“查建平紧逼广德，为红林桥后路，乃苏、浙紧要门户”（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五十四）。所以当时李秀成在建平开大会，集合各路军队，从建平入攻苏南，从江南大营的后方进击。佚名《东南纪略》论此事道：“建平四达之衝，为由皖南入苏要道，和春、桂清及督办皖南军务张芾互相推诿，不遣重兵防守，天受拥兵在宁国，建平是其后路，亦视如秦、越。建平既陷，深入腹地，莫可遏防矣。”太平天国这一役克复建平，是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三月初二日，即清咸丰十年三月廿一日（据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二日何桂清、徐有壬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五）。
- ② “四明山之会一样之情由”，是李秀成用《说唐》说的隋朝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大会四明山捉拿隋炀帝共举大事的故事。
- ③ “淳”，原稿误写作“敦”。曾国藩于第二次看《忠王自述》时，用墨笔圈掉改作“淳”。这是曾国藩因避清穆宗载淳名而改的避讳字。
- ④ 东坝，即广通坝，在江苏高淳县东五十华里。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清军以东坝为交通要冲，在此设营驻扎（据《高淳县志》卷二《建置》、卷四《疆域》）。太平天国这一役克复东坝，是在太平天国十年三月初三日，即清咸丰十年三月廿二日（据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二日何桂清、徐有壬奏）。时在攻克建平后第二日。据此知李秀成在攻克建平之后，立刻开军事会议，当天就开完，开完会议后，立刻就分兵，可见这一役军事行动的迅速。
- ⑤ 侍王李世贤这一役克复江苏溧阳，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三月初三日，即清咸丰十年三月廿二日（据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六日和春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五，周璐《溧灾记略》，见《光绪溧阳县续志》卷十六，陆黼恩《庚申纪实》，见《读秋水斋文》卷三都同，案同月初二日何桂清、徐有壬奏说在咸丰十年三月廿三日，当是错的）。
- ⑥ 辅王杨辅清克复江苏溧水县，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三月初九日，即清咸丰十年三月廿八日（据《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三《咸丰三年以来兵事月日表》）。
- ⑦ 秣陵关，在江苏江宁县东南五十华里（据《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厢》）。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咸丰八年记事说：“八年戊午二月，李总兵若珠及戴文英等攻克秣陵关。是关为金陵南面外蔽，贼筑垒若城，守之甚固。”曾国藩论其形势说：“秣陵一关，环水巍峙，金陵之雄镇”（《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六《官军水陆并进叠克要隘驻军雨花台折》）。

克得句容。^① 我由赤沙山^② 而末，一路我并未攻打城池，直到雄黄镇。^③ 那时张、和两帅分将屯紮大营十余个，斯时侍王亦到，大齐会战，与张帅之军两家立阵，两并交锋，自申至酉，张军大败，攻破雄黄镇清营，清兵畏忌〈惧〉，不敢交锋。次日进兵，由土山^④ 而末，辅王由木〈秣〉陵関至南门。那英王陈玉成自潜、太早亦扯兵下两甫〈浦〉。那时我与杨、刘、李等俱在南岸，英王是不约而末^⑤，知我兵到南岸，其〈渠〉由西梁〔山〕渡江，顺由江宁镇^⑥ 而末头関、板桥、善桥。^⑦ 那时军军俱而到步，我由猺〈尧〉化门而进紫荆〈金〉山尾^⑧，陈坤书、刘官芳由高桥门而末，侍王李世贤进北门红〈洪〉山^⑨而至，辅王杨辅清由木〈秣〉陵関到南门羽〈雨〉花台，英王陈玉成由板〔桥〕、善桥而进。和、张两帅之兵〔前〕不能救后，后不能

- ① 侍王李世贤这一役克复江苏句容，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三月十四日，即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三日（据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何桂清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六，《续纂句容县志》卷十九《咸丰三年以来兵事月日表》，《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三《咸丰三年以来兵事月日表》都同）。
- ② 赤沙山即赤山，在江苏句容城西南（据《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一《江宁府境全图》）。
- ③ 雄黄镇即淳化镇，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卷一在记向荣军队“达金陵，驻淳化镇”句下注说：“俗称雄黄镇。”李秀成军队到达雄黄镇，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三月十八日，即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七日（据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何桂清奏）。案淳化镇是上元县的乡镇（据《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厢上元乡镇》）。在天京的东面，为江南大营的后路。李秀成军队既到淳化镇，就包抄了敌人的后方，故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两江总督何桂清奏说：“初七日，贼踪已至淳化镇，大营后路吃重。”
- ④ 土山，在南京上方门南（据《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一《上元江宁两县境图》）。即现在的江宁县东山镇（据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文学研究所编《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换马》注）。
- ⑤ 李秀成此处说这一役打垮江南大营解天京围大会战，“英王是不约而末”，应该加以说明。考清咸丰十年正月十九日钦差大臣和春奏说：“顷探洪逆因被困情急，号召上游逆党即日下窻解围等语。……请旨飭下湖北、安徽皖南各路统兵大员乘此机会竭力攻剿”（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二十九）。案李秀成记在芜湖调兵事说：“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路肯从我意，任我指挥。”陈玉成地位高于李秀成，当然不是他所能通文调遣，他所说“英王是不约而末”的话当是事实。但是，我们根据和春的情报，却知道陈玉成是奉诏率军回救天京的。
- ⑥ 江宁镇，在南京西南六十华里，当长江东岸，为交通要冲（据《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江宁乡镇》）。
- ⑦ 头关（《江宁府志》作大胜头关）、板桥、善桥（《江宁府志》作西善桥），都在南京西南（据《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一《上元江宁两县境图》）。
- ⑧ 紫荆山，为紫金山之误，即鍾山。
- ⑨ 红山，应作洪山，考江宁人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卷三记此役侍王李世贤进兵事说：“进北门洪山”，在洪山下又注说：“洪山，幕府山支派。”

救前，雄黄镇战败一仗，张玉良带江南精兵去救杭郡未回，被我军隔断于外。和、张两帅之粮出在稣、杭、福建、广东、江西等处，具〈俱〉被隔断，营中无粮，那时天朝之兵又众，是以一鼓而解京围，此六解也。^①那时

- ① 李秀成攻破江南大营六解京围之日是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三月廿七日，即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六日，而破围大战，则在前一日。李秀成《致征北主将张洛行书》说：“兄客岁奉旨南征，在芜屯扎……幸赖天威主福，自攻克善弋、广德、四安、武康、杭州各省郡，复行顺讨临安、孝丰而仍回广德，与各大队进取建平、溧阳、东坝、高淳、句容、溧水等县，后即分途进剿。乃于三月二十七日将京外长城妖穴扫荡一空，而九洲洲妖艇亦于其时相率潜遁，南北两岸通行，京围立解。”即记此役事。至于清方记载，有钦差大臣和春奏及和春幕客萧盛远《粤匪纪略》所记为最重要。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廿六日和春奏：“自贼匪窜陷句容后，遂于本月初七日由淳化镇至马鞍山各乡放火，城内首逆知外援已到，即在七瓮桥营前添筑三垒，攻我濠墙，经张国樑督兵击败。初九至十一日援逆由南路沙子岗直至秣陵关，连营数十座，而高桥门及小水关大营后路亦添贼垒，城逆复于上方、安德等门分路出扑，张国樑督饬将士迎击，斩首千级。十二日，贼又分数十路来攻。探闻贼首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统率各路悍贼十数万，必欲力破长墙而后已。张国樑与王浚分督诸将至清波门、陈家桥一带出击，自朝至暮，毙贼不下二三千。该逆见东南无懈可击，于十四日由上河、毛公渡等处搭造浮桥数道，攻我外墙，城逆从内应之。是日风雨交作，将士彻夜不能收队。十五日风雨愈大，张国樑派队驰赴西路救援，诿路行至上河、毛公渡一带，见总兵黄靖等营盘被围数重，援军不能冲入，黄靖、马登富、吴天爵营中火起，据冲出兵勇金称该三员均已力竭阵亡。张国樑遂断上方桥，欲固守东北半壁。臣与张国樑、许乃钊相商，亦惟有从小水关以东设法守御，立即传知各营一律严守。无如三更以后，小水关附近南北各营亦皆火发。臣与张国樑、许乃钊、王浚即带本营兵将分投赴援，火光中接仗逾时，而小水关之营亦即起火。臣复与张国樑、王浚在马港口截杀，后军只得退守镇江以图再举。伏念洪逆崛起金陵已经八载……自正月初九日扼断九洲洲后，即于西南添筑外墙以御援逆，不料浙西溃决，良将劲兵先后调援者不下一万三千人，而淳、坝、宜、荆防兵又调去一万有奇。旋因淳、坝、溧阳失守，苏、常大震，援浙之师，又不得不调赴常郡，先其所急。迨溧水、句容先后失陷，秣陵被围，大营亦即四面受敌矣。虽添募新勇以守长墙，而训练未成，心志不固，致有此失”（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六）。萧盛远《粤匪纪略》说：“杭州省城经张军门会同瑞将军克复之后，败贼窜回，历泗安、广德一带，分扑宁国、建平。先经金陵大营札饬副将梁克勋带兵勇三千扼守高淳，副将冯日坤带兵三千有奇防守东坝，兼顾建平，乃未到东坝，而建平已被贼破，梁克勋闻警溃退，其东坝旋即失守，贼势蔓延，于是溧水被围，句容戒严，金坛、宜兴同时告急，常州警信频至。……闰三月初三日，溧水贼匪分股直扑句容……县城旋即失守。句容既失，大营后路已断。和、张二帅同王翼长筹商派记名总兵张威邦带兵勇三千余名，扎营淳化镇以扼贼之来路。……初七日午后，句容贼匪突至，张威邦一闻警报，即带兵勇退回大营，淳化镇遂为贼踞，相隔金陵仅二十里矣。……初八、初九两日，该逆在于相离大营数里之马鞍山顶，遍插旗帜。十一、十二等日天气晴朗，贼众下山，渐次逼近大营，不过二三里之遥……十二日夜间大雨，十三、十四两日昼夜不止，十五日立夏，辰刻风雨交加，兼带冰雹，城内逆匪被围紧急，见外援已到，遂大股突出，连抛火罐，落于副将雷安邦营内，火药轰发，人声鼎沸，登时大乱。梁克勋、张威邦营盘均在附近，并不开放枪炮，即带兵勇溃退。营外溧水、句容等处逃来难民甚多，一见营内兵勇溃出，（转下页注）

虽解京围，攻破和、张两帅营寨，未杀多人，具〈俱〉行连夜全军退去，直下镇江、丹阳屯紮。和、张军死者三五千，散者多也。散下稣、常、和、张之兵陆路抢民间物件，众百姓怒之。此时我朝军威大振，何知有今日之难。

（接上页注①）扶老携幼，哭声振天。援贼乘势扑至，内外夹攻，顷刻之间，得胜门至江边一带官军营垒五十餘座，全行失陷。陕西绥远镇总兵黄靖、副将马登富、雷安邦等均殁于阵。……官兵死者数万人，张副帅闻信驰往，将上方桥拆断，东路各营始得瓦全。……张副帅由上方桥收队回营，满拟会商必有良策，据称桥已拆断，可以杜贼来路，大帅营盘可期无虞，即匆匆而去，旋闻附近各垒多有带队出营者，仅存小水关数营，孝陵卫一二营而已。二更时，外间警信频至，皆云左近营盘大半空虚，大营危在俄顷。……未几，营外数处火起，金称兵勇焚营退走，旋闻枪炮不绝，人声喧哗，探得逆匪已大股出巢，攻扑孝陵卫街口营盘，经参将罗大春督兵轰击，顷而钟山遍地皆火，势已危极。总理营务处副将銜参将广霖请大帅速起，而大帅犹然酣睡，复经其甥副将常亮、巡捕游击王传训、都司侯定贵、徐坤等将其唤醒，告以危急情形，尚复不起，请之再三，始穿衣上马出营。维时远与许中丞得知，随偕候补知府朱守履恒踉跄奔出，漏夜就道，雨湿路滑，一路颠扑，狼狈不堪。……而张副将营内存银十餘万，军火局内所存枪炮火药铅子等项不计其数，尽以资贼。”又顾我愚《孝陵卫杂咏》记此役道：“冰雹摧残九仞功，长城崩自凤台东，鼓笛丧气烟尘起，人马争奔壁垒空。计阻黑旗难纵鸽，命怜赤子不如虫。曳兵夜走京江道，回首营烧遍野红。”诗注说：“咸丰十年庚申正月，克九洲洲，南北之围乃合，城外之爪牙仅存雨花台一垒，而贼势始穷。于是外援大至，东破高淳，入句容，更丧我师于淳化镇，而北扰栖霞，耀兵青龙诸山，远望旌旗如林，峰峦尽蔽，昼夜不辍，南则自小丹阳而下，直犯安德、凤台两郭。闰三月十五黎明，贼众数万攻雨花台之外濠，相持至日昃，会冰雹大至，贼乃破围而入，西南之军尽陷。时张忠武军萧水关，亲往御之于上方桥，东北诸营赖以不败。是夜遁走镇江。……初令各营旗分五色为号，危急则举黑旗，长濠既破，黑旗摇荡于愁云苦雨中，魂为之销”（见《愧斋遗稿》卷一）。这三种记载，都可以与李秀成所记参订。案李秀成这一役打垮江南大营的战略，是先截断敌人的后方，主力从敌后进击，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东王杨秀清打退江南大营时不从敌后进军的战略不同。萧盛远《粤匪纪略》记述其事道：“建平已被贼破……东坝旋即失守，贼势蔓延，于是溧水被围，句容戒严，金坛、宜兴同时告急。……惟句容相距金陵甚近，又系大营后路……若句容有失，大营后路已断，丹阳无重兵扼守，万一被其突至，苏、常休矣。……闰三月初三日……句容……失守。句容既失，大营后路已断……远向大帅云，从前向帅金陵兵溃，系由寡不敌众，彼时饷银尚充，故从句容退守丹阳，得以保全苏、常，今则军心涣散，情形不同。且后路节节皆贼，兵勇大半溃退，大营已成孤注。”所以东王打破江南大营之役，敌人得以退守丹阳，抗拒太平天国向苏、常进军，而这一役，敌人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后路节节被截，在天京溃败之后，就无法再同上次那样在丹阳抗拒太平天国向苏、常进军。这就因为这两次战役所用的战略不同的结果。又胡林翼清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致李方伯多都护书》论江南大营覆败的原因说：“江南大营之弊，其虚冒荡佚，乃其致败之由。其调度布置，实不能尽善，患在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以七万人顿于城下，贼从后路旁路纷扰，闻江南大帅迟疑吝吝而不肯速分兵，又不肯多分兵。继因所分之兵败挫不力，后路旁路已陷，饷道已阻，始不得已而再分兵。则应战之兵气已挫，而围城之兵力又单，乃得乘间抵衅以陷其营垒。此金陵军营之覆辙也”（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二《抚鄂书牍》）。胡林翼的话，也可供研究这一役的参考。

六解京围之后，并非主计，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这班臣子，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忽〈屈〉悞英雄。死去无数之好汉，悞死世民，实出吾主之过，不问贤良而用，信臣不专。我屡启本力练〈谏〉，与主力辨〈辨〉世理，万不从容，故而今日之难。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涌涌〉而末，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人无天理，非是人伦，奇〈骑〉在虎辈〈背〉，不得下奇〈骑〉，父母失散，非我之愿。主立山河，得永远之业。我为其将，随军许久，未乐半时，愁繁〈烦〉我有。在天朝害民害众者多，非我一人之爱主，权柄不归，何能治事？中堂、中承〈丞〉在外耳目深长，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谅可久悉矣，不待再言。自六解京围之后，我主格外不由人奏，具〈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斯时军威格〈更〉胜，将士格〈更〉多，缠身难谢，日缠日重，格〈更〉难离〈离〉身。自此六解京围，亦未降诏厉〈励〉奖战臣，并未诏外战臣见驾，朝臣亦是未然〈见〉。我主不问政事，具〈俱〉是叫臣认实天情，自言〈然〉升〈昇〉平之句〈局〉。今国破丧邦，被中承〈丞〉大人之获，押在罪囚，上〈尚〉未刑治。我闷闷于囚，我主势已如斯，不得不写呈中堂、中承〈丞〉之玉鉴，可悉我主欲立朝之末历，坏国根源素〈诉〉清，万不隐避，件件载清。

四 克复稣、浙（原稿三十至四十七页）

自六解京[围]之后，息兵三日。天王严诏下颁，命我领本部人马去取常、稣，限我一月肃清回奏。人生斯世，既为其用，不得不从，当排队伍，择日行军，由丹阳进发，三日队到丹阳。张国樑兵屯[丹]邑，次日开兵，在丹[阳]大南门迎战。两日交锋，头一日胜富〈负〉未分，次日一战，自辰至未，张军大败，死者万人。张帅死在丹邑南门河下，差官寻其尸首，用棺收埋在丹阳宝塔根下。两国交兵，各扶其主，生其是英雄^①为敌，死不与其为仇，固〈故〉代收埋之意也。^②此是恤英雄之心，非我与仇也。得丹阳

① “是英雄”三字，原稿写在“生与其为敌”句旁。与字圈去。

② 李秀成克江苏丹阳，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初十日，即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卅日，清钦差大臣和春奏此役经过及张国樑之死说：“臣驰抵丹阳，探闻逆匪将以全力来犯，当即函致张国樑带兵前来。时张国樑在镇江收集溃兵二万数千名，以一万餘名交总兵冯子材留防镇城，自带一万三千人于闰三月二十三、四两日先后分起到防。张国樑于（转下页注）

之后，顺下常州。那时张帅之水旱具〈俱〉败，丹阳直至常州城，有苏州发来之众，并偶〈遇〉张玉良由杭郡回来之军概屯常郡，大小营寨四十餘营。是日军到，次是〈日〉阅兵，两家会战，张军又败，其营尽破。金陵和、张大营已失，外兵未有闻战之心，具〈俱〉未会战而逃，连攻数日，常郡自降。^①入城之时，郡内之人，并未杀害，各畏威自投水死者亦有。克复随即安民，息兵两日，赶下无锡。^②常郡张玉良军屯无锡，何制台自行偷盘家眷下舟他逃，不知去向。^③大军下到无锡，张玉良已又安好营寨，四门稳紮。后又有镇守宜兴清将姓刘，是广西东乡人氏，是何戡分，我不知^④，后其〈渠〉由宜兴而至无锡，助张玉良之战。其军坐舟由太湖而来，正到无锡之候，张军与我军迎战，两阵交锋，连战一日一夜，我见不得已，张军败而复振，亦算清朝之好将。后我领我亲军、护将由会淖山〈惠泉山〉^⑤而下，力

（接上页注②）二十五日出城踏看地势。值久雨路滑，压伤甚重。……只以贼信愈紧，二十九日，带伤督队，于东南添筑营垒，而令王浚、熊天喜于营前五里外黄土桥地方分左右两翼整队以待。黎明大雾，该逆冒我旗帜数道并进，突至王浚军前，搏战约一时许，毙贼无数，王浚中枪坠马殒命，贼乘之，其众大乱。熊天喜见右军已溃，即行驰救，复被包抄，遂持短兵杀贼甚厉，亦以力竭阵亡。张国樑见前军皆败，贼已蜂拥前来，立即督队击退数里，斩贼不可胜计。而逆援愈聚愈多，自寅至午，相持五时之久，诂料另股逆匪见城西土山可以俯瞰全城，环攻我营，退而复进者十馀次，遂于午初，为其所破。即又下山进犯西门长桥，副将蔡其荣御于桥上，贼不能进，旋因中枪落马，贼遂过桥，直抵城闾。城上居民抛掷碎石呼噪杀贼，而土山之贼以炮俯击城上，守牌兵不能支，贼即梯城而上，城中大乱。臣等见城不守，惟有退保常州尚可屏蔽苏垣，遂与许乃钊出城东门。张国樑见西城上已竖贼旗，知不可为，亦即上马，拟过东门长桥与臣等会议，而溃兵瓮阻，马不能行，贼已追及，即策骑蹢水而过，无如河深入众，遂殁于水”（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八）。

- ① 李秀成克江苏常州，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十六日，即清咸丰十年四月初六日（据钞本常州人程兆和《常州失守纪略》，滨湖拙隐《常州被陷始末》）。
- ② 原稿在“下无锡”句这一页旁的页缝“吉字中营”下，李秀成写有“到此总共一万八千之数（谱）”十字。
- ③ 何制台是清两江总督何桂清。他从常州逃跑事，详见清江苏巡抚徐有壬奏，说：“督臣于闰三月三十日闻丹阳失守，见和春一到，即魂亡胆落，立思逃避。当时常州绅士闻督臣有退避意，公同进谒，涕泣慰留。督臣情急，遂于次日将亲军小队摆成队伍，黎明时突开东门，与和春、查文经冲突而出。是日常郡绅民耆老顶香跪留者不下数千人，督臣竟令小队开枪轰击而逃。闻当时士民被击而死者十有一人，其被鸟枪及刀矛伤损更有百馀名之多”（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八）。其后清政府将何桂清处死。
- ④ 案此人是刘季三，广西武宣县东乡人，这时任清朝直隶通永镇总兵。太平天国庚申十年秋，太平天国军队在浙江富阳把他打死（据《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九《张玉良传》附《刘季三传》）。
- ⑤ 惠泉山，即惠山，在江苏无锡县城西（据《光绪无锡金匱县志》卷二《山水》）。

攻西门，于〈张〉军水旱大败，收克无锡城池^①，当即息士安民^②，暂息二日。那时和春自江南大营失利，败军之后，和、张两帅各走一方。张帅计屯丹邑，以保稣、常之稳。和春独一人而下稣州，舟往浒墅关〈浒墅关〉^③，后其听见副帅张国樑战死丹邑，和春在许庶关〈浒墅关〉自缢而亡。^④此段言尽，再将由无锡动马下稣州〔说清〕。克锡次日，行营而下稣郡。初到阖门，将分困各门，看阖门街方等村百〔姓〕多有来迎，街上舖店民房门首具

- ① 李秀成克江苏无锡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廿日，即清咸丰十年四月初十日。佚名《平贼纪略》卷上《锡金城陷记》说：“伪忠王李秀成陷常州，初八日直扑吾邑，高桥官军枪炮水陆齐施，贼不得逞，而退陡门等乡。……初九日，陡门贼取民房门隔什物扎浮桥三座，由瓦屑坝渡河登龙潭岸，抄高桥后路，为郑济美败之。初十黎明，贼众趋洛社大桥，由花藏越惠山，走荣港河、埭口等处，直犯西南两门。张玉良等在北路方胜，见惠山贼旗遍插，即退入北门。……贼破西门，南水关亦陷。……张玉良欲出北门，贼骑已至，遂出东门。午刻城陷。”
- ② 关于李秀成克复无锡后安民事，华翼纶《锡金团练始末记》说：“咸丰庚申，金陵大营兵溃。……四月初十，县城不守。先是金陵败兵逃下，掳掠财物，无所不为，乡间土匪又四出抢劫，居民之载輜重遁者无一幸免，以致乡民进退维谷。而城内贼酋伪忠王李秀成出示安民，反而严禁长发肆扰，杀土匪数人，悬首城门。居民逃出者皆欲回家。而四乡黠者遂创为进贡之说，以牛羊食米献贼，冀得免杀掠。伪忠王驻锡五日，军政悉派乾天安李贼；民事派监军黄顺元、厉双福，俱本邑人。”
- ③ 浒墅关，在江苏长洲县西北二十五华里浒墅镇，明、清两代在此设立户部分司钞关，所以叫做浒墅关（据《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九《乡都图圩村镇》一）。
- ④ 和春之死，据清咸丰十年四月廿一日清江苏巡抚徐有壬奏系伤发身死，他说：“本月初二日贼匪攻犯常州府城，和春亲自带兵出城迎敌，胸受枪伤，不省人事，跟随人等背扶冲围而出，至无锡城外养伤，呕血不止，热毒内陷，饭食不进，延至初六日未刻呕血数口而逝”（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八）。这是清官方关于和春之死的正式报告，与李秀成所记自缢而亡不同。后来《清史列传·和春传》就据徐有壬奏报记和春之死是“中枪伤卒”。考戴望谟《麟堂遗集·江苏巡抚徐公行状》说：“总督何桂清先弃城走至浒墅关外……和春公关外自缢死。”镇江人孙某《蘋湖日记》四月初八日记事后（四月十六日记事前）说：“闻和已奔至无锡，由锡至苏、苏城弗纳，回驻浒墅关，自缢于观音阁矣。”上海王萃元《星周纪事》说：“十三日咏春兄来述，备悉金陵大营业经冲散……和军门行抵浒关，自缢身死。”名《东南纪略》说：“和、许因江督退苏州，亦随至，知不得入城，乃旁皇浒墅关上下，和春旋于十二日自缢。”又考和春幕僚萧盛远《粤匪纪略》说：“和帅随至浒墅关，悔恨交集，初五日午间，以烧酒吞服洋烟，初六日未刻身故，经徐中丞以因伤殒命，飞章驰奏，奉旨照例赐恤。”就是在清朝奏报里面也有提到和春自杀而死的，清咸丰十年四月廿二日两淮盐运使乔松年《陈苏州危急及水师待饷情形折》说：“探得和春于初七日在苏州城外浒墅关自缢”（见《乔勤恪公奏议》）。两江总督何桂清、浙江巡抚王有龄《军情决裂亟宜抚夷剿贼折》说：“和春在浒墅关自击解体情形，无可收拾，先期自戕”（见吴煦档案，未署月日）。据以上所考，可见和春之死，不是因伤致死，乃自杀而死，可证李秀成记载的确实，徐有壬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替和春掩饰罢了。官书的多虚伪，即此可见一斑，故考明于此。

〈俱〉贴字样云：“同心杀尽张、和两帅官兵”^①，民杀此官兵者，因将丹阳之下，到苏州水陆民财，概被其兵抢掠，故恨而杀也。^②此段清白说完，又言收得苏州情節。自将苏州各门紧困，城内之兵因前锡、常告急，其兵调尽来〈去〉堵，城内无兵，后守城之兵，具〈俱〉是金陵之兵退下，常、无之兵退下所守，张玉良一人在内。〔其〕徐清将自失金陵及丹、常、无邑等处，兵心寒忌〈惧〉畏威，外又有民家之逼，其见势不同。有李文炳、何信义、周五等献城未降，此等是广东之人。张玉良见兵势如此，带其川兵本部人马由盘门而出，上杭州，自行败退数百里到杭，不开城门，其有怒意，兵屯武林门外，与〈愈〉扰于民。那时省城守将两有怒意。自李文炳、何信义等献苏州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其部众五六万人。^③此也不怪，因金陵大败，

- ① 当日苏州百姓贴的标语，原文应该是“同心杀尽张、和贼”，或“同心杀尽张、和强盗”。李秀成当是因为对曾国藩有避忌，所以才改作“同心杀尽张、和两帅官兵”罢了。
- ② 清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军务张国樑、两江总督何桂清的匪军，从常州一路退下来到处抢掠人民。到了苏州，借守城必须尽焚城外民房为名，取得了江苏巡抚徐有壬的命令，就在苏州最繁华的阊门、胥门外放起火来，趁火抢劫（据赵烈文《庚申避乱日记》四月初七日记）。“凡放火之处，掠掠一空”（据潘锺瑞《庚申噩梦记》四月初八日记）。这是一场大火，“红光烛天，百里外皆可望见”（据陶煦《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到了夜间，“彻夜火光”，“烛天如昼”（据吴大澂《吴清卿太史日记》及《庚申噩梦记》），“燎原凡三昼夜”（据潘锺瑞《苏台麋鹿记》）。于是锦绣繁华的苏州，便给清朝匪军抢光烧光。
- ③ 李秀成克苏州，时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廿三日，即清咸丰十年四月十三日。清杭州将军瑞昌、浙江巡抚王有龄奏太平军入苏州情形说：“据江苏候補县谢申烈禀称，苏州兵民互斗，军心离散，四月十三日贼众拥入阊门，溃勇从之，随即四面火起，城门洞开。该员突围而出，各官均无下落”（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可见太平军的克复苏州由于内应，清朝记载也与李秀成同。李文炳原名李绍熙，广东嘉应州人，小刀会刘丽川在上海起义，李文炳参加，后来叛变降清。庚申十年李文炳在苏州带勇，江苏巡抚徐有壬委他守城，时太平军前锋已到城下，李文炳营勇魏芸青等归附太平军，李文炳与何信义乃大开阊门迎李秀成入，李文炳受职为江南文将帅，主理崑山县事，后来又与魏芸青图谋作清军内应，为太平军镇守崑山朝将朱某诛死（据王韬《瓮牖余谈》及沈梓《避寇日记》所录李秀成布告《诛李文炳魏芸青谕》）。王步青《见闻录苏州纪事》记其事说：“守阊门候补道李绍熙本广东人，上海逆匪小景子党，降于前苏抚吉。后积军功，以道员补用。徐抚授以标兵二百，使率常熟兵二百守门。李开门纳贼。十三日昧爽，贼大股入城。”吴县蓼村遁客《虎窟纪略》清同治元年四月纪事说：“贼杀其伪官李文炳。文炳字少卿，广东人，行为不轨。咸丰癸丑，周烈〈立〉春之乱，人咸谓少卿与闻焉。粤匪入苏，少卿首先降贼，授伪职文将帅，统领广贼。时其眷属由粤之苏，为官军缉获，不杀，令其母以书致子，使归身赎罪。少卿具言不得已从贼，许为内应。同治元年四月，官军克复嘉定，少卿率广匪三百出东门接应，为贼将朱某擒戮。”何信义，即何培英，又名何培章，广东人，捐纳五品蓝翎候选县丞。在苏州开城迎接李秀成，太平天国任用他，仍交军队给他带。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命守浙江乌镇，时任莱天福兼浙江省文将帅。癸开十三年七月调守桐乡。甲子十四年正月，献桐乡投降清朝（据《何培英稟帖》、沈梓《避寇日记》、张景渠《烬餘诗草》）。

失去许多城池，主帅又死，官兵无主，故而投也。此是天意，六困天京，上〈尚〉而有救，七困败亡，此是大清之福，亦是中堂、中承〈丞〉大帅谋才福泽〈泽〉，无此〈所〉不能。自我收得稣城，兵得五六万众，未杀一人，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具〈俱〉未伤害，各欲回家，盘川无，我给其资，派舟其往，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溥〈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各散回家，亦有多回北京，满士谅有传声，必可悉也。复城之后，当即招民，稣民蛮恶，不服抚恤，每日每夜，抢掳〈掳〉到我城边。我将欲出兵杀尽，我万不从^①，出示招抚，民具〈俱〉不归，连乱十馀日^②，后见势不得已，克城未得安民，后我亲身带数十舟只直入民间乡内，四处子民手执器械，将我一人困在于内，随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来抚稣民，矛枪一一〈指〉^③我杀命，我并不回手，将理说由，民心顺服，各方息手，将器械收。三日将元和之民先抚，自举安起，七日将元和、吴县、长洲安清平服，以近及远，县县皆从，不战自抚，是以稣、常之民即〈即〉归顺。

① 吴大澂《吴清卿太史日记》咸丰十年四月廿六日记说：“顾肯堂表母舅信来，知廿一、廿二两日角直、车坊、谢塘、唯亭一带乡民聚众杀贼，直逼葑门城下，因无官兵接应，不敢轻进，长毛退入城内，并未施放枪炮，伊即亲往上海请兵；并知大宪已委元和令冯树勋来周庄办民团，督带费玉枪船等因。”吴县杨引传《甫里寇难纪略》也说：“初上游寇警日闻，苏、常震动，城市村庄，俱议团练。……时为咸丰十年四月初旬，里人果自相为团。……十三日，苏城陷，而里中宴然，摩拳擦掌，顾盼自豪。西汇王心馥，尤好事，率众远至斜塘，会各村剿葑门外贼之巢穴，而甫里强悍之名以著，薛中丞遂有札来甫里，多奖许之辞，里人以为荣。元和冯邑尊亦自来抚绥。”案甫里，即角直镇。据上引资料，可见当时农民被地主阶级欺骗的情况及李秀成对被农民的爱护。

② 案当时李秀成招抚苏州人民的告示现在还保存有一张，是五月初七日发的，即在克复苏州后十四日发的。全文如下：“真天命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为谕四乡百姓举官造册事：照得轸恤不深，则招安不力，而痼疾既切，则绥辑弥殷。本藩前抵苏郡，查尔百姓当大兵云集之时，多有流亡失所之惨，每一念及，痛不可支！业已委令逢天安左同检在此镇抚，已经谕谕在案，尔等已共见共闻矣。但不举官则民事无人办理，不造册则户口无从查核，何以为安抚之地乎？为此再行谕谕，仰尔百姓一体知悉，凡乡邻熟识之人举为乡官，办理民务，其五家举一伍长，二十五家举一两司马，一百家举一卒长，五百家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举一师帅，万二千五百家举一军帅，盖所举之人，必度其干事才能称职者充当其任，尔等一面开造民册，一面将所举之人，令其概行来城，听候铺派。兹将册式粘后，限五日内照样造齐呈送阊门外总局查核，以便给发门牌，则尔民得安堵之常，本藩亦慰抚绥之念。从此四方鸠聚，采菽无行野之伤；比户燕安，绵葛无在河之叹。倘敢违延，定行发兵问罪剿洗，以为违抗者戒。尔百姓其各凛遵，毋负本藩谆谆叮嘱之意可也。特此谕谕”（见《吴清卿太史日记》）。

③ 原稿这里既不是“二”字，也与原稿写叠时作“𠂇”的写法不同。此字可能是李秀成写的简体字，从文意看应该是“指”字，故用尖括弧在原字之下，注一“指”字。

那时张玉良兵退杭郡，我顺追而得嘉兴。^①自得嘉兴之后，当亭〈停〉兵安民，具〈俱〉未征战。后张玉良在杭郡将兵养盛，队伍整好，进兵来攻嘉兴。加〈嘉〉兴守将是求天义陈坤书、朗天义陈炳文守把。张玉良带大小军营四十余个，将嘉南两门困紧，攻倒嘉郡城池，幸将兵合力，不然，嘉郡早失矣。此时嘉兴告急到稣省，谁知青甫〈浦〉县被洋鬼领薛抚台^②之艮〈银〉来攻青甫〈浦〉。该县守将周文嘉^③堵守，幸此将可嘉，不然，青甫〈浦〉失矣。该周文加〈嘉〉告急甚紧，不得已，六月中旬，由省带领人马，先救青甫〈浦〉。是日由省开舟，次日到步，当即开兵。洋鬼出兵迎战，两阵交锋，自辰至午，鬼军大败，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式千余条，得其大炮十余条，得洋庄^④百余个，得其舟只〈隻〉数百余条，当解青甫〈浦〉之困^⑤，顺流破得松江^⑥，直引兵去攻尚〈上〉

① 李秀成克嘉兴时为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初五日，即清咸丰十年四月廿五日（据瑞昌、王有龄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二）。

② 薛抚台指清朝江苏巡抚薛焕。

③ 周文嘉，江西人（据王彝寿《越难志》），木匠出身（据绍兴人宛委山民《寄龛甲志》），太平天国骁将，在绍兴屡败英、法侵略军，把法军副将达第福（Tardif de Moidrey）和英军副将定龄（Tinling）都打死，封到宁王，后来却变成叛徒。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月在苏州叛变，降敌后，就被清朝江苏巡抚李鸿章杀死。

④ “洋庄”是一种前膛旧式洋炮，因为在太平天国战役中，用的旧式前膛大炮有土制的和外国制造的两种。外国制造的和土制的在形状上和质料上都有不同，所以把外国制造的叫做“洋庄”，或作“洋装”。这一种旧式前膛铁炮，当时英、法、美资本主义国家大批的输入中国，接济清朝对抗太平天国。曾国藩《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说：“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彭玉麟《挑选大炮运赴衡州片》说：“历年制办洋庄大炮，今除分归长江水师提镇各标外，尚有存余”（见《彭刚直公奏稿》卷三）。这种洋铁炮，现陈列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⑤ 太平军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廿一日，即清咸丰十年五月十二日克江苏青浦。六月廿六日（夏历六月十九日），江苏巡抚薛焕派华尔率洋枪队来攻。七月初一日，李秀成从苏州率救兵到，大败华尔洋枪队，华尔退走，遂解青浦之困（据《光绪青浦县志》卷十《兵防》）。案李秀成说：“六月中旬，由省带领人马先救青甫〈浦〉，是日由省开舟，次日到步，当即开兵。”今考《光绪青浦县志》，知李秀成说是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七月初一日到青浦打败华尔洋枪队，则在苏州动身之日为六月卅日。李秀成说“六月中旬”“由省开舟”，“省”就是苏福省，这是记错了的。“六月中旬”，应改为“六月底”方合。

⑥ 李秀成既克苏州，派宿卫军大佐将陆顺德率军攻江苏松江府，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廿二，即清咸丰十年五月十三日攻克（据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廿七日忠王《给宿卫军大佐将陆顺德等谕》；及清咸丰十年六月初四日江苏巡抚薛焕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四）。六月初五日（夏历五月廿七日），太平军退出松江府（据清咸丰十年六月十五日薛焕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五）。到了李秀成解了青浦（转下页注）

海。^①斯时有尚〈上〉[海]夷人来引,外又有汉兵内通,故而往也。^②军

(接上页注⑥)围,就于七月初三日(夏历六月廿六日),顺流再克松江府(据清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薛焕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七)。王步青《见闻录·松江记事》记太平天国克松江府事说:“五月初三日,贼势渐近。……十三日辰刻,贼游骑至西门。须臾,贼大至。城内五营兵弁,阒然无人。……松城遂陷,伪忠王使贼伪署府、县职。出示通衢以安民,有‘垂手进城,拱手受地’之语。”

① 太平天国避上字讳,《钦定敬避字样》规定上字“唯尊崇天父可用,餘以尚字代”。故李秀成写“上海”作“尚海”。

② 关于李秀成说:“斯时有尚海夷人来引,外又有汉兵内通”事,考当时清朝苏松太道吴煦在上海城内抗拒太平军,他在《给怀儿信》说:“忠贼亲来上海……本由余义政包伊到沪,开城迎接。又有无聊夷人许以不帮中外,故该逆有恃而来。不知余本狂妄乱说,现且伏诛。无聊夷鬼,但图得价销售炮台,信口应许,而各城上夷兵防守极严,该夷岂是夷人对手”(见吴煦档案)。吴煦所说的“无聊夷人”、“无聊夷鬼”、“该夷”,都是指对太平天国同情的外国人。所说“岂是夷人对手”的“夷人”,乃是指帮助清朝守上海城的英、法侵略军说的。张汇文等译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也说:“8月中旬,太平军受到上海方面外国同情人士的邀请,进展到城市附近”(见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第四节。马士自注是根据麦克利兰《上海的故事》第四九页,1860年9月4日卜鲁斯(Bruce)《致罗塞尔勋爵函》,见1859~1860年《中国事务有关通信汇编》)。吴煦说的余义政是清军内应的首领。清咸丰十年六月廿九江苏巡抚薛焕《上海情形危迫折》说:“查连日飭据探报苏州、崑山窜出贼匪水陆约万余,臣访有广西人余义政曾在金陵大营充当勇目,自称系蓝翎守备,加都司衔,与贼勾通,由苏省来沪,意欲结连广匪滋事。当即密飭上海县知县刘郁膏将该犯拿获,讯明正法。金谓内应已破,贼可不致骤窜沪城。今松江忽又被陷……连日所获奸细,俱供有即窜上海之语”(见吴煦档案)。考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廿七日,李秀成《给宿卫军大佐陆顺德等谕》说:“刻据呈天燕朱弟等禀报,尚海有两粤兵勇三千餘人情愿投诚前来,因该处巡抚薛妖有疑心该兵勇之心,凡有两粤各勇,不准身带兵器伙器,是以尽欲投降报效,恳请大师前往等情。为此特颁谕谕,仰弟等确切探明。”案这是一件实事,考钱保塘《薛公行状》记江苏巡抚薛焕对抗李秀成进军上海事说:“李秀成……攻上海,城中兵才二千人。大营广勇数千人溃至。公虑其通贼,立营要隘,诛其劫掠者百餘人,余悉收其械方令过,而广勇游弋城外,不肯出。居民汹惧,商贾不前,餉立绌。议者请募之守城,否则将为贼用。公不听。……旋调得都司余义政为贼谍,暗散贼号于民间,以计禽之。……贼以无内应,不敢近”(《续碑传集》卷十三)。据此,知在上海要作内应的清军有三千多人,是从江南大营败退到上海的两广兵勇。他们因为江苏巡抚薛焕对他们起疑心,不准身带兵器,所以都要投降太平天国,愿作内应。而余义政便是他们的首领。但是,余义政在李秀成军队没有进抵上海之前就已经被杀了,这班要起义的兵勇没有首领了。据廿六辰正,薛焕《致吴煦书》说:“余义正前日临刑时,连称:‘天意,碰在他手里’,别无他言”(见吴煦档案)。将这一文件,与薛焕《上海情形危迫折》参考,知廿六为清咸丰十年六月廿六日,前日为六月廿四日,即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七月初一日,时在李秀成军队进抵上海之前九日。这一天,余义政已被杀,内应已破,而李秀成却还没有知道,仍以为城中尚有内应。李秀成在下文说,他进抵上海这一天,上海内应谨备恭迎,忽然大风大雨,立脚不住,不能进兵,“清军通我未成,此事未举,这班人马,概被抚台杀之”,今考清方文件,知李秀成记载是错了的。

到周家会〈徐家汇〉^①，隔尚〈上〉海十八里屯紮。谁〈距〉离〈离〉尚〈上〉海九里^②处所，紮有清朝营寨四个。那时我部将蔡元隆^③、郇永宽^④提队，是日明天光耀，天上四面无云，出兵到九里地方，与清将会战。他见军到，他已别逃，弃营不守。正当用力进兵尚〈上〉海，内又谨脩恭迎接我，忽言〈然〉明天暗雨，风雷振动，大风大雨，兵马不能企身，立却〈脚〉不住，后未进兵。后洋鬼及清兵恭迎，未见我到，薛抚台是夜悉知有通情，复即加艮〈银〉和于洋鬼，请得一二千鬼子而守此城。清军通我未成，此事未举，这班人马概被抚台杀之。其事不成。在周家会〈徐家汇〉红毛礼拜堂暂屯数日。后嘉兴告急到来，不得已，移军由松江、甫〈浦〉邑而回。^⑤由関王

① 案《同治上海县志》县境无周家会，而县西镇市则有徐家汇（卷一《镇市》），又记徐家汇有天主堂（卷三十一《杂记》），当时李秀成正从这方面进兵攻上海，故周家会是徐家汇之误。考当时人上海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上，清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记事道：“是役也，伪忠王率贼……直抵上海，设伪馆徐家汇天主堂，指挥贼党，环攻七昼夜。”王萃元的记载可以为证。亲见其事的马良也说：“予读书徐家汇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提兵略杭、嘉、湖、苏、松、常地曾驻军徐家汇，一宿即去，人尚和霭，教堂及地方人民亦无惊扰。忠王龙袍红巾。告示用印长尺馀。予等年少，争出往观，清早祈祷，惊为奇事。乡人有曰：‘我等信上帝，念耶稣经。王爷何故也信上帝，念耶稣经？’忠王闻之，一笑”（刘成禺《相老人九十八闻见口授录》，《补录》一，见《逸经》第三十一期）。马良的话也可为证，并可见李秀成驻军徐家汇时的情况，惟所说李秀成“一宿即去”和扎红巾，却是他多年之后记忆的错误。

② 九里，即九里桥，在上海法华镇、徐家汇附近（据李鸿章《松郡解围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一）。

③ 蔡元隆，湖南岳州人，后来封会王。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二月，在浙江海宁州叛变。

④ 郇永宽，后来封纳王。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月，献苏州降敌，即被敌人杀死，事详下文。

⑤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七月初七日（清咸丰十年六月卅日，公元1860年8月16日），李秀成军队进到泗泾镇（据清咸丰十年七月十八日薛焕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七）。英国公使卜鲁斯在这一天发出通告，悍然宣布：“上海县城及外国租界由英、法联军占领，联军特此警告一切人等，倘有武装群众攻击或走近联军所驻地点，即视为侵犯联军之行为，联军当依法对待”（见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章）。英、法侵略者竟凶蛮地抗拒太平天国进军上海。初九日（夏历七月初二日，阳历八月十八日）李秀成致书上海各国公使，声明：“本军已抵七堡，即将达上海城下。所有贵国商民，烦贵公使转令其于门首悬挂黄旗，守候屋内，不必惊恐。余已令兵士等认明黄旗符号，不准侵扰。其他要事，俟到上海再行磋商，先此驰告”（据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章回译）。李秀成发出照会后，即进军到上海（据清咸丰十年七月十八日薛焕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七）。英、法侵略者的回答，是下令军队用大炮和来福枪向太平天国的军队轰击，在黄浦江上的英国兵舰也发大炮轰击。李秀成受了弹片所伤（据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章及第三章，简又文译晏玛太《太平军纪事》，《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一《历代兵事·咸同兵事》，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四《上海守城记》）。这一役，李秀成进军上海的目的，他（转下页注）

庙^①到嘉善、平湖。此两处有清军守把，一战而破两城，^②攻破之后，顺至嘉兴，解嘉兴之困。是日到未，尚〈上〉城观阵，观清军动静如何。次日开兵，连战五日，分一军上石门，断张玉良浙江来之路道。稣、杭水地，有军此屯，万不能行，四方皆水，无有别路他行，是以张军见兵困断其后，其队大小将兵具〈俱〉献营来降，独张玉良见阵交锋，其余尽降。故张玉良不敢再战，亦自逃回杭州。^③

解围定叠，我亦班师回省息兵。此时七、八月之间，以省近之民，亦有安好，亦有未安好，〔此〕外尚有难民，当即发粮舛饷以救其寒，各门外百

（接上页注⑤）在自述中说得很明白，他说：“斯时有尚海夷人来引，外又有汉兵内通。故而往也。”所以他只带三千兵前往（据卜鲁斯报告，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860年8月18日记事注），预备兵不血刃和平进入上海。在当时革命形势决定下，太平天国是要先打倒清朝统治者，然后驱逐外国侵略者，它的对外政策，是争取外国侵略者不助清朝，维持中立。因此，现在兵临上海城下，面临着外国侵略者的挑衅，仍然需要暂时极力隐忍，不愿决裂，所以始终不开一枪一炮（据吴煦《给怀儿信》说：“贼仅初二近城，此后均只离城数里窥伺，亦从未开一枪炮”）。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章引1860年11月14日《独立新教报》上转载《北华捷报》记者报道说：“大炮轰击开始了，太平军像石人一样固定不动，达数小时之久，并未回击一枪。”又引英国官方报导说：“只隔着一道小濠沟，可是，令人感到奇怪，敌人竟未放一枪。”李秀成军队在徐家汇驻屯了三天，到知道内应已被镇压了，十二日（夏历七月初五日，阳历8月21日），就从上海撤退（据清咸丰十年七月廿六日薛焕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八）。李秀成在退兵时，致书上海英、美、葡等国领事（无法国），责他们不守中立，痛斥法人失信，说大军初到苏州时，有法国人来约进军上海，今法人竟转帮清兵守上海，如此不公不义，无以复加。我军势如山岳之坚，若决心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望勿悛心迷交清兵，仍保持友好为美（案李秀成这封照会，系中外会防局从英文报纸回译，现存吴煦档案）。

- ① 关王庙，在江苏吴县二十八都（在东山）二图（据《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九《乡都图圩·村镇》一）。据此，知李秀成是从上海退兵先回苏州的，所以《自述》说“不得已移军由松江、浦邑而回”。他回到苏州后，然后取道吴县关王庙去救嘉兴。
- ② 李秀成克浙江嘉善，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七月十九日，即清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据《光绪嘉善县志》卷十三《武备志·兵防》）。克浙江平湖，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七月廿二日，即清咸丰十年七月十五日（据《平湖县志》卷五《武备》）。
- ③ 嘉兴解围之役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七月卅日，即清咸丰十年七月廿三日。此役战事的经过，清方亦有报告。清咸丰十年八月十八日瑞昌、王有龄奏说：“兹据张玉良咨称七月二十三日，贼众倾巢出扑大营，我军连战五昼夜，疲乏已极，力不能支，全行溃退，将士伤亡甚多，张玉良身受重伤，退扎石门，军器俱已遗失等语”（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五十）。王有龄又奏说：“再嘉兴大营之溃，实缘逆党十餘万麇集嘉兴，与我军血战五昼夜，不得休息，复分出东北两门抄袭后路，将我西南一带营盘包裹在内，致副将张德禄、参将罗照贤、游击戴序武等均未突出重围，至今尚无下落，张玉良亦受重伤（见同上）。

姓无本为业，亦计给其资，弁去铜水十馀万串，难民每日施粥饭救人。^①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是以苏省百姓之念我也。^②

- ① 潘锺瑞《苏台麋鹿记》述李秀成克复苏州派左同检熊万荃办理救济苏州人民事说：“熊姓先自立馆于城外，预煮粥以待出城者，且云：‘出城住定每口给米五升，俾度四五日，于四五日内，各谋生业，开出铺面，无资本者，具呈请领本钱，或呈明何业，认领何等货物，仍估定货价，于售卖后缴还七成，留三成，俾其永远藉以运转’等语。”据此处记载，太平天国借给苏州人民本钱的办法是：在卖完货物之后，还七成本钱，留三成作永远运转。但这七成本钱，据李秀成后文说，太平天国政府并不追问，而是丰足的时候，人民自己乐意归还的。
- ② 太平天国既克复苏州，在苏南建立一个新省，叫苏福省。李秀成将苏南人民的痛苦奏闻天王，天王得奏，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廿四日降诏说：“朕诏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知之：爷哥朕幼坐天京，救民涂炭拯民生；民有饥溺朕饥溺，痼痼在抱秉至情。……朕览秀胞本奏，历述苏省所属郡县新附四民，前经胡妖抽捐抽税，竭尽尔等脂膏，厚敛重征，同天打斗。兹经天朝统率大众，奉行天讨，救民水灾（火）之中，同申万郭（国）归爷天义。……朕又念前时天兵征剿，尔等四民畏惧天威，抛弃家产；今虽欣然就抚，各安农业，际此新天新地之期，未有馀一馀三之积。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其各体谅朕心，益坚信认，安居乐业，同顶爷哥朕幼纲常，同享真福于万万年也。”于是减轻赋税，解救人民的痛苦。这是太平天国在苏南设施里面的一件大事。王步青《见闻录·苏州记事》说：“选各乡土匪头目授以伪职，曰乡官，使管理一方民事。各乡官共建大石碑于阊门外，凿大字四，涂以金，曰‘民不能忘’。背后凿姓氏不下千余人，皆苏民。”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江苏巡抚李鸿章拆毁了苏州人民歌颂太平天国的石碑坊，并向人民追究。当时苏州人沧浪钓徒《劫馀灰录》记其事说：“李少荃宫保问阊门外白石牌坊何以建于伪忠王耶？民以减粮对，皆军、旅、师帅捐建者。而松江一府之粮尚重于福建全省之粮，屡奏屡格。……牌坊题四字，乃‘民不能忘’。”案江南地区自南宋、元、明以来，田赋极重，即封建统治者自己也叫做“浮粮”、“浮赋”。而这些浮收，地主都转嫁于佃农，故苏南佃农极苦。元和王炳燮在《上李抚军请停止收租局状》里说：“苏府各县田地自种者十不及一，佃种者十不止九。向来漕粮额重，浮收皆取办于佃户，租额不得不大。小民终年耕种，除交还租米外，所馀无多，率皆不敷籽本，是以在乡农民，历来穷苦特甚”（见《毋自欺室文集》卷六）。现在，太平天国减轻了田赋，并由政府定出租额，监督地主收租。这样，就减轻了佃农的负担，而使他们得到了生机。由于苏南农民得了生机，生产便得到发展。加以太平天国又施行通商惠工的政策，于是当时苏南便繁盛起来。据记载，宜兴的大浦镇，滨临太湖，“商贾云集，交易日数十万金”（据《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五《武事·粤寇》）。无锡“各镇口热闹如城市”（据张乃修《如梦录》）。尤其是荡口镇“闹如赛会，杨树港一带，舟填不能再容”（据龚又村《自怡日记》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记）。商人“往来贸易，货财充斥，增设市廛”（据沈梓《避寇日记》清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记）。吴江同里镇“市上热闹，生意繁盛，较平时数倍”（据知非《吴江庚辛纪事》）。常熟“徐六泾港生意极盛，河海各船稠密”（据柯悟迟《漏网偶鱼集》）。而苏州更是“百货云屯”的商业中心（据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上当事书》）。每天苏州城乡交流的盛况是：“船来日多，售亦日盛，乡民过午，满载而归，奚止利市三倍”（据潘锺瑞《苏台麋鹿记》）。外国商人到苏州来购买（转下页注）

统下部伍，贤愚不一，我不敢包含，谅世间能有耳目，不待多言，我身视〈事〉天朝，自随至今，受其恩重，而何别乎。我天朝开国之时，人心个个肯愿。洪姓一人，由广东花县而上广西一千馀里，非我众人，人能悉他乎？其一人欲图立国，何肯先教于人乎！此是天机，昇平日久，应出此人，集传许多乱星下降，乱及凡间。^①我今被护〈获〉，何悉今日之由。能早知有此难，而〈宜〉可早避。在家为民，何知前世之事，知者谁从。到此为官，军机在手，习久而知；知者避而不及，故惹今日之殃。我亦无怨，皆是自为，非人累我。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收复部军，而爵高厚。馀兵不乱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清帝之恩，二占中堂、中承〈丞〉之德，万世威名，自古及今，观前觉〈览〉后，容人而定天下，皆大义智广，而成显于今日也。亦是争国之成。我生而本无才畧，秉直心院〈愿〉^②，见义而从，别无他也。我惟一心为我天王，固〈故〉而今日父母妻儿失散，不忠早亦他随。虽有他之意，无有招引之门，故而丧至此也。见中堂、中承〈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諫〈表〉真情。我肯与中堂、中承〈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中堂、中承〈丞〉大人欲除我患，

（接上页注②）生丝停泊在角直镇的船只，也“帆樯云集”（据孟宪承译吟唎《太平天国外纪》第三章）。因为对外贸易增加，所以“自江、浙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据王韬《上当事书》）。苏南一带繁荣的情况，据亲见的苏州人王韬说：“盛于未乱时倍蓰”（据王韬《上当事书》），就是说远远超过清反动统治的时期。商业的繁荣，自然标志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提高。当时苏南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了，所以苏州人民特在阊门外建立一座石碑坊，横题“民不能忘”四字来歌颂太平天国（据沧浪钓徒《劫馀灰录》、潘锺瑞《苏台麋鹿记》、倦圃野老《庚癸纪略》、王步青《苏州纪事》）。常熟人民也建立了一座报恩牌坊来歌颂太平天国功德。这一座报恩牌坊序今天还保存在常熟公园太平天国纪念亭内。碑序上有说：“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皆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爰建谯楼，再泐碑文，军民颂德靡涯，黎庶歌功无尽。”这几句话，写出了在太平天国治下苏南人民安居乐业美好繁荣的生活，也铭刻下了李秀成掌握着正确的太平天国政策来治理苏南的成绩。

① 案李秀成那时社会上流行的《水浒传》是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这部《水浒传》的楔子记洪太尉在江西信州龙虎山上清宫伏魔之殿放走了锁镇着的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降在人间，直使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儿洼内聚蛟龙。到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又记掘得石碣，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面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着众义士的姓名。此处李秀成所说天王洪秀全“集传许多乱星下降，乱及凡间”的说法，便是从《水浒传》来的。

② “秉直心院”句的“院”字，据下文述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正月留京死守事说：“我心自院”，知此处“院”字，实为“愿”字。

代〈待〉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是〕好事。我丧国亡，收齐此众，免乱世民，平我之心，而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将免劳，免费国之财货。此是被获承恩厚待，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恳请揣之，细详便知的实。我说我非我不忠，国亡而言真语，尽諫〈表〉周详。容与不容，皆由中堂、中承〈丞〉之玉鉴，非我强要而能乎〈也〉，不故〈过〉见待人之深厚，自愿直详。此段放下，再说稣州及今结尾情由。

〔自〕解嘉郡围之后，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由〈游〉，推〈催〉我领军而去扫北。〔去〕那时亦无良计，正逢有江西德安县以及随州、义宁、武宁、大冶、吴郭、池〈蕲〉水、池〈蕲〉州、武昌、江夏、金牛^①、宝〈保〉安^②、甫祈〈蒲圻〉、加〈嘉〉鱼、通山、通城等处，有起义头四十餘名具禀差使到稣，恭呈降諫〈表〉投军。（此等名姓，日久未及记订，恳免追。）^③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奏复，云我招集此等

① 金牛，镇名，在湖北武昌县西南一百二十华里（据《光绪武昌县志》卷三《镇市》）。

② 宝安，应作保安，镇名，在湖北武昌县东南六十华里，半属武昌县，半属大冶县（据《光绪武昌县志》卷三《镇市》）。

③ 此处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案江西、湖北起义群众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八月，派人到苏州稟请李秀成前往接应事，待考。而在此以前，湖北蕲州、广济人民约李秀成夹攻事，则见清咸丰十年十月廿八日，湖北巡抚胡林翼《蕲广匪徒通贼经州县先期拿获疏》说：“前数年蕲、广为贼久踞，莠民陷溺贼中，实繁有徒。刻下吴地之逆焰日见鸱张，楚境之民情尤虞蠢动。……本年五月十八日，据蕲州知州彭应鲤禀报，访闻蕲、广交界之灵东等乡，有匪徒何致祥等与该州民人孙兴荣等潜通皖逆，从贼营逃回，谋为不轨，立将孙兴荣拿获。供系广济贼匪何致祥为首通贼，约期于五月二十八日在蕲州河岸举事等情禀报前来。臣等以蕲、广地方为征皖大营后路，最关紧要，该逆何致祥敢于勾结皖省逆匪，聚众滋事，实为腹心之患。当即……四面兜捕，该逆逃窜无路，先后将首逆何致祥及同谋之吴得儿、徐兆林、经学来、王狗儿、周金魁、徐瑞枝、周松涛、王文耀、田金幅、王培绩、张四喜、张八五、龚和尚等一并拿获。并据现署蕲州事候补知州李瑜于交界处所拿获张正启、王白子、朱福、许喜元、胡立三五名，署蕲水县蒋照亦获郁老七一名。并于何致祥家内起获贼首伪忠王李秀成所给黄绫文书一角，列有伪衔，盖有伪印。又在周金魁家内起出伪军师〈帅〉木印一顆，刊有‘太平天国前军广济县右一营军师〈帅〉’字样。讯因何致祥在安庆贼营最久，受贼指使，潜从贼营逃回，起意与现获之孙兴荣等谋逆已定，并同徐瑞枝、吴得儿等扮作客商，复回安庆贼营谋逆夹攻情形。由安庆逆日伪职亮天福唐正才转送浦口，面见伪忠王李秀成，说明原委，领获伪文伪印回籍招兵办粮，以为夹攻之计。约期于五月二十八日在蕲州河岸聚众起事，先抢蕲州，踞城设守，随后分途掳人，由蕲州、广济、黄梅直攻大营后路，胜则合贼上窜，败则绕路仍归贼营各情不讳。质之各犯，供词相符，立即分别凌迟斩决，枭首示众”（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四十二《奏疏》）。按何致祥、徐瑞枝等到浦口谒见李秀成，领谕领印，回籍招兵办粮起义的时候，当系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二月中旬李秀成离浦口赴芜湖前。这一次何致祥等在湖北蕲州、广济密图起义虽然在期前（转下页注）

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扫北等回。虽回如是，主本不从，我强为而止。当即派军选将而行，将稣省军民之务交与陈坤书接任，军民安妥，一一交清。举兵由稣起身到京，将耒情启奏，不欲扫北。我主义怒，责伐〈罚〉难堪。此时亦无法处，管主从与不从，我在稣肯应江西、湖北肯降之义民，应肯前往接应，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从〈出〉师而上江西、湖北。^①

在京时，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声言：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艮〈银〉，概行要买多米粮，切勿存留艮〈银〉两，买粮为首切等叙云云。今收得稣、常，下无再困，上困而耒，利害难当。前困是六困，乃和、张之帅〈师〉。七困定是曾帅，利害而耒。此军有中堂之善算院〈愿〉为，统下将官之用命，南军能受苦坚心，此军常胜，未见败过，若耒困者必严，若皖省可保，尚未为忧；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买粮。我奏主亦然如是。主责我曰：“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我尚有何言也！无言退步自叹言曰：“教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奔首竖江东门、羽〈雨〉花台营寨为首^②，各要买粮，我这出京，四百餘日，方见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那时洪姓出令：“某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艮〈银〉买方得票行，无艮不能弄票也；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固〈故〉积今日之患，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③此事不提。

（接上页注③）就被破获了，但是，庚申十年秋，湖北、江西密图更大的起义接着就起来，他们派了代表到苏州来禀请李秀成前往接应。我们将李秀成记载，与清朝方面的奏报参看，可以看出当时湖北、江西人民起义的情况。

① 案李秀成这一役出师江西、湖北，乃是当时太平天国攻克苏、常后，下一步的军事大行动，是经过天王决定，奉天王之命而行的。李秀成此处所说“逆主之命，信友之情”的话，不是事实，而是有所为而说的，另详考证中。

② 江东门、雨花台是太平天国的两个要塞。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二年八月廿三日记载江东门要塞说：“墙堞甚坚，在江东桥之东岸，联江东门及桥为垒，气势雄阔。登江东门一望，至城下尚三里，正对水西门。”太平天国在雨花台上建筑有一座石城，曾国藩《金陵军攻克石城石垒折》记雨花台石城的形势说：“该处地高势险，俯瞰东卡西卡南卡九石垒，历历在目。”又说：“雨花台及金陵南门外各石垒，据险雄峙，屏蔽城垣”（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太平天国凭藉这两个要塞，就可以抵抗敌人从天京的西面和南面的进攻，也就可以维持天京西门和南门对外的交通线，因此李秀成当时在出师江西、湖北前，就嘱咐蒙得恩等以坚守江东门、雨花台这两个要塞为首要。

③ 天京失陷，由于缺粮，故城中不能留大兵保卫，百万雄师不能来救，干王《洪仁玕自述》说：“京粮益缺，而京困益无所恃。……于去岁十一月奉旨催兵解围，身历丹阳、常州、湖州，殊各路天兵憚于无粮，多不应命。”可见天京因缺粮失陷，确是（转下页注）

当即行军，扯由太平、芜湖、繁昌而进。上石台（埭），到移（黟）县，偶（遇）鲍军会战。头一日我军取胜。次日鲍军取胜，杀我官军数百余人。^①

（接上页注③）事实。考清同治元年秋，曾国荃《与张紫莲书》述天京事说：“城内米粮本属缺乏，只以鲍军迟久未来，莫能断其东北之路，以致贼复掠新稻入城，久延岁月”（见《曾忠襄公书札》卷四）。清同治二年春，曾国荃《禀曾中堂李中丞》说：“据管带崑字营道衔补用知府黄运昌稟称，迭据发探面禀，上年九、十月间，金陵城内米粮告罄，百物踊贵，贼颇惊怖。旋有湖北兴国州、蕲、黄等处猾贼窺发出城，在于对江仪征、四沿沟地方，设立各色行铺，转输粮米等项，以致城内无物不有，该逆仍恃以无恐。又据卑营帮办从九彭达昭等采办军火至大通镇，目击沿江米船百馀号，皆系满载由轮船拖带，扬帆直下，络绎不绝，无人盘诘，莫知所往。又据副将曾传荣由仪征来营，面称目击轮船拖带米船至四沿沟停泊，即有该处奸商贩运，由金陵下关接济城贼等情。卑府伏查……金陵为洪逆老巢，各伪王府伪官属家小以及守城各匪往来游贼通计不下数十万口，纵有蓄积，而兵临城下，已及一载，自然不甚充足。且附近各属产米不多，目下上、江两县，遍地荒芜，尤属无粮可掳，所恃者江面接济耳。今长江上下，有水陆官军扼要驻守，若能严密稽查，奸商自然敛迹，不敢居然济贼。除洋船不敢在武、汉买米外，该逆仅九洲洲一线来路。只能陆运，且须掳之数百里外，必难接济。如此则不特援贼再来，无所得食，即城贼亦当坐困，不出数月，定有内讧之势，将来会剿，易于得手矣”（见同上书卷七）。案曾国荃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即清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进犯天京，到这年秋天，天京就缺粮。后来虽在仪征四沿沟偷购，但只靠九洲洲一线水运，长江上下，都是敌人水师，处处严截，断不能多，而陆运须在几百里外，也难接济。故到癸开十三年春天，曾国荃就已经看出不特援军再来，无所得食，而城内守军亦当坐困。又考辛酉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干王洪仁玕致上海英领事馆翻译员富礼赐信说：“售卖米粮一事。查明现下粮仓皆不用再买。至于各府各衙或私卖若干，问五天将莫世睽弟，自可明白。”案这时候安庆被围，已经到了极度危急，再过十九天便陷落。安庆失陷，敌人下一步军事行动，就必定是来犯天京。如果粮仓充裕，有几年的积储，做有与敌人作持久战的准备，何致后来敌人来攻，不到三个月，就已经缺粮？洪仁玕主政，就这一件大事来论，可以说就是对当前极重极大的形势，还是没有打算的。天京缺粮，洪仁玕是要负责任的。

- ① 考李秀成军队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月廿二日（清咸丰十年十月十九日），经羊栈岭，距曾国藩祁门老营仅六十华里。曾国藩兵力单薄，全局大震。在李秀成军队进入羊栈岭的第二天（夏历十月廿日），曾国藩写信给他的兄弟说：“十九日未刻，石埭之贼，破羊栈岭而入，新岭、桐林岭同时被破，张军前后受敌，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他眼看死亡就要到来，他已经写了遗嘱（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七，咸丰十年十月廿日《致沅季弟》）。过了两天，李秀成军队退出羊栈岭后，曾国藩又写信给他的兄弟说：“此间于十九日忽被大股贼匪窜入羊栈岭，去祁门老营仅六十里，人心大震，幸鲍、张两军于二十日、二十一日大战获胜，克复黟县，追贼出岭，转危为安。此次之险，倍于八月二十日徽州失守时也”（同上书，十月廿四日《致澄侯四弟》）。据此可见敌人的空虚，恐慌到了怎样的地步。但是，李秀成却没有侦探到敌情，又因为这一役行军的目的，在于进攻湖北，而不是进攻在皖南的曾国藩，所以他没有向祁门挺进，去歼灭曾国藩，却改道从箬岭出徽州，经屯溪，入浙江，就把曾国藩从绝处放生了。又案李秀成军队于十月廿二日经羊栈岭进入黟县，明日，仍从羊栈岭退出，改道徽州（据清咸丰十年十月廿六日曾国藩《进攻休宁立复黟县折》，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黟县官军胜仗折》，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二）。

(此由洋岔岭(羊栈岭)^①过,是欲由移(黟)县出休宁县,因与鲍军战败,其兵屯移(黟)县,中堂大军重屯祈(祁)门,此处具(俱)是山高路小,一塞不能别行,我非是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因湖北等县起义之人约我前去,不失其信而图此事(处)也。)^②当即改道,不由移(黟)县(县),由岳(箬)岭^③到徽州,过屯溪^④,上婺源^⑤,到常山县过年。^⑥十一年正月初一,由常山动马,上玉山、广信^⑦、河口^⑧而行。到建昌屯紮,攻打廿馀日未下^⑨,外[有]清军来救,是冲天砲李锡扬(金旂)带兵,当与其战,其兵与[我]兵并不交锋,二家和战,其兵少,我兵多,故而

① 洋岔岭,应作羊栈岭,在安徽黟县北,通休宁(据《嘉庆黟县志》卷一《山川总图》、卷二《地理疆域》)。

②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③ 箬岭,亦作蒟岭,在安徽歙县北八十华里,为徽州的要冲(据《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輿地志》、卷三《輿地志》下《山川》)。

④ 屯溪,在安徽休宁县东南三十五华里,率水与吉阳水会合处,是新安江的上游。水北岸有镇,休、歙各县茶市在此。东浮新安江入浙。

⑤ 李秀成军队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一月廿一日,即清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九日进军至安徽婺源县(据曾国藩《黟县官军胜仗折》)。

⑥ 李秀成军队到安徽婺源县后,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一月卅日,即清咸丰十年十一月廿八日进围江西玉山县,至十二月初六日(夏历十二月初五日)解围(据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曾国藩《致沅季弟书》,《曾文正公手书记》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六日记)。《李秀成自述》未记及此事,注明于此。

⑦ 李秀成军队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初从浙江常山县开拔后,进入江西,于正月初六日(清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围玉山县,初九日(夏历正月初八日)围广丰县,十一日(夏历正月十一日)围广信府(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正月廿四日《谕纪泽》,见《曾文正公家训》卷上)。《李秀成自述》只说上玉山、广信,未提广丰,据此可补李秀成的遗漏。

⑧ 河口,镇名,在江西广信府铅山县西三十华里,当信河、铅河二水交会之冲,汭口、九阳石之上,商贾往来,货物贮聚,为江西省大市镇(据《同治广信府志》卷一《地理·乡都》)。

⑨ 李秀成军队围江西建昌府城,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廿四日,即清咸丰十一年正月廿三日,撤围在二月十二日(夏历二月十三日),围攻共二十日(据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廿六日毓科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六十四)。关于李秀成这一役围攻建昌府,震动了江西省城,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七日《近日江楚军情片》说:“再江、楚军情,伪忠王李秀成由广信府内窜,围攻建昌府城,抚州吃紧,江西省城亦为震动。……兹据刘于浚禀称,建昌之贼,开挖地道,城中兵不满千,危在呼吸,援师败挫,贼纵跟至抚州等情。臣查抚、建去省甚近,关系甚大,已飞调鲍超一军,由九江一带,驰赴江西省城,先顾根本,次援抚、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同月廿日《致李续宜书》也说:“伪忠王李秀成一股,由广信内窜建昌,转攻廿馀日,又分支扑犯抚州,省垣亦为震动”(见《影印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一集卷一)。

和战之故也。后将建昌之军撤退，由抚州湾^①上宜黄。到章〈樟〉树^②、新金〈淦〉一带屯紮，计欲过江。斯时水涨满川，对河团练自丰城那河边屯到吉安之上。那时亦不能退，亦不得进，又无舟只，大江中有清军砲舟，连在新金〈淦〉屯紮数日。不意河水已自退干到低〈底〉，与我兵过河^③，此时〈是〉天意所就，非我之能。过到吉安^④，而上瑞州。此州本

① 原稿本作“军由抚州、湾上宜黄”，后自将“军”字圈去，据李秀成自加标点，在“由抚州”下用点号，读断，故“湾”字在此处作动词用，而不是“浒湾”。

② 樟树，镇名，在江西清江县东北三十华里，袁、赣二水合流，绕镇而北，水陆交冲，商贾云集，为江西省大市镇（据《同治清江县志》卷二《市镇》）。

③ 关于李秀成军队这一役从赣江东岸过河事，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廿六日毓科奏说：“乐安、崇仁逆匪分为两股：一由乐安之龚坊窜入永丰地界，吉安戒严；一由宜黄之刘家渡窜入丰城地界，吉安戒严。……诂丰城之贼，侦知省垣无隙可乘，于二月二十六日窜至樟树镇。乐安之贼于二十五日窜入新淦，县城失守。该县知县李辅……于三月初二日将新淦县城收复。该贼掠得民船，用木牌竹牌，于初十日在吉水之梅滩地方纷纷渡河。西岸官军，迎击失利。吉安府知府曾咏等商令李金旂亲往督阵，遇贼于龙王庙，全军溃散，退保安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六十四）。据此，知李秀成军队到新淦县城，是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廿四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五日），另一枝军队于二月廿五日（即夏历二月廿六日）至樟树镇。在樟树、新淦一带屯扎了五六天，即向吉水县进发。于三月初九日（即夏历三月初十日），在吉水县渡河。又考《同治新淦县志》卷五《武备志·武事》说：“〔咸丰〕十一年辛酉春二月，贼渠李秀成越江、皖过抚州，由樟树镇窜至新淦，破城。……贼直上吉水，踩三曲滩，过赣江。”《同治新喻县志》卷六《武备志·武事》说：“〔咸丰〕十一年辛酉三月，陈〈忠〉贼李秀成出南京，由玉山至抚、建，闯入樟镇，欲逾河。临属四县团丁依岸盖篷，日夜守御，联络二百餘里，贼不得间。趋至三脚〈曲〉滩，捉获民船，夜半偷渡西岸，乡团惊溃。”《同治吉水县志》卷二十四《武事》说：“〔咸丰〕十一年三月，贼窜吉水，越数日遁。贼自临江上寇吉安，省垣遣总兵李能通赴援，驻师于府城外螺子山。李固发贼中骁将，自袁州投官军，积功至总兵，至是复通贼。贼遂结筏由横石渡河而西。”案李秀成说：“对河团练自丰城那河边屯到吉安之上。那时亦不能退，亦不能进，又无舟只，大江中有清军砲舟，连在新金〈淦〉屯紮数日。”《同治新喻县志》也说李秀成军队到樟树镇，因西岸团勇沿岸守御，联络二百里，不得渡。《同治新喻县志》的话，可与《李秀成自述》参证。关于渡河地点，清江西巡抚毓科奏报说是吉水梅滩地方，《同治新淦县志》、《同治新喻县志》都说是吉水三曲滩，《同治吉水县志》说是吉水横石。关于如何渡河事，李秀成说是因适逢河干得渡，毓科奏报，与《同治新喻县志》、《同治吉水县志》都说是用船筏过渡，惟《同治新淦县志》说：“踩三曲滩，过赣江”，与李秀成所记合。至于《同治吉水县志》说是由于叛徒李能通接应得渡，考毓科奏报，此役李能通并不在吉安府防守，而在吉安府防守的则为副将李金旂。李金旂也没有接应太平军，而是给太平军过河后打得全军溃散，《同治吉水县志》这一个记载显然是错误的。

④ 李秀成克江西吉安府，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三月初十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在此驻军两日，于十二日（即夏历三月十三日）全军开拔，前往瑞州（据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廿六日毓科奏）。

不欲扎〈紮〉,此处百姓坚留,是〔以〕将瑞州所属各县屯紮安民。^①仪〈义〉宁、武宁一带,湖北各县,具〈俱〉已兵屯^②,一面安民,一面将湖北兴国、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鱼、蒲圻〈蒲圻〉一带具禀来降之人招齐,大概三十万之数〈谱〉。^③后鲍军由宿松扯兵上到黄州府^④,湖

- ① 李秀成克江西瑞州府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六日(据清咸丰十一年七月廿九日毓科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一)。李秀成既克瑞州,因人民坚留,就留军屯扎安民,照太平天国制度,设立乡官,建立地方政权,并以瑞州为后方。《同治高安县志》卷九《兵防志·兵事》说:“〔咸丰〕十一年三月,逆首伪忠王李秀成复窜江西,瑞州又陷……仍设伪监军,扰勒如前。”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官文、胡林翼、李续宜奏说:“伪忠王李秀成自占踞瑞州后,分窜上高、奉新、靖安、安义、建昌、武宁、德安、瑞昌,以及湖北之通城、崇阳、通山、蒲圻、咸宁、兴国、大冶、武昌等州县,而以瑞州为老巢”(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二)。
- ② 关于李秀成这一役在江西、湖北分兵屯守各城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他《给杰天义赖文光谕》说:“兄自十一日覆谕寄送圻州,转送弟处,曾将兄进兵通山、通城、嘉鱼、蒲圻、咸宁发员镇守,及瑞州、靖安、奉新、武宁、义宁各处,亦飭各将领守各州邑,并兄扎兴郭,谭主将驻大冶,陆主将入蒲圻,一切情形诉明于弟,谅必接到矣。”这一封信所说,可补充李秀成此处记载。
- ③ 曾国藩《复李辅堂书》说:“李秀成今年在江、楚掳人近二十万,不过半年,拜官封爵,即不思归,枭杰者出其中,后患弥长,思之忧悸”(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七)。《光绪抚州府志》记进军湖北时及从湖北回师时入数说:“七月,伪忠王李秀成自湖北兴国州回窜瑞州,由崇、宜入境。……贼自正月过境,不过数万人。至此乃数十万人,道路络绎二百餘里”(卷三十四《武备志·武事》)。这一役李秀成招收了江西、湖北起义群众,对军队的扩编,收效的巨大可见。
- ④ “后鲍军由宿松扯兵上到黄州府”,曾国藩刻本改作“后鲍军由池州扯兵到瑞州”。案“鲍军”为曾国藩部下湖南绥靖镇总兵鲍超军队,鲍超字春霆,又叫“霆军”。考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拟移驻东流建德抽出霆军片》奏报李秀成入赣,陈玉成入鄂,赣、鄂同时告警,“别无劲旅,可作他处援兵,万不得已,臣当移驻东流、建德,防堵下游池州、芜湖各股,而抽出鲍超一军作为游击之师,或驰援江西腹地,或驰援皖北各路,视其尤急者而应援之,或可少遏凶锋”(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同年六月十八日《复陈华祝三牘奏折》奏报五月初安庆集贤关战役后,命“鲍超一军,回援江西,由九江入武宁、瑞州,鲍超于五月十五日自集贤关拔营,行抵宿松,被绅民苦留,围攻宿城,五日未能得手。……上游九江、南康各属亦纷纷禀报瑞、昌之贼,分窜德安、建昌境内,迫望援师。臣现檄催鲍超迅速南渡,由九江直捣建昌,先保江西省城”(见同书卷十四)。同年八月初二日《鲍超军丰城大捷折》又奏报说:“伪忠王李秀成窜扰江西瑞州、奉新等郡县,蔓延甚广,逼近省垣,经臣派记名提督绥靖镇总兵鲍超督军赴援,于六月十八日奏明在案。鲍超于七月初三日行抵九江,拔营前进。……十九日由瑞州拔赴丰城”(见同上)。据此知鲍军是曾国藩从池州抽调出来的,在赴援江西瑞州前,曾在宿松作战,即从宿松开拔过江,经九江,到瑞州。李秀成根据鲍军从宿松开来的情报,因此记从宿松来。至于“黄州府”,则为“瑞州府”之误,这事经曾国藩自己的手,所以他刻《李秀成自述》,就把这一句话改为“后鲍军由池州扯兵到瑞州府”,应以曾国藩刻本所改为合事实。又李秀成在“后鲍军由宿松扯兵上到黄州府”句下说:“湖北胡巡抚兵亦来,育〈离〉金牛、宝〈保〉安二三十里。那时正逢六月之中,(转下页注)

北胡巡抚^①兵亦未，育〈离〉金牛、宝〈保〉安二三十里。那时正逢六月之中，所招之兵，具〈俱〉未经战，是以未敢与鲍军开兵。那时家弟李世贤亦由徽州而到景得〈德〉、乐平一带，与左京堂^②而〈对〉敌。侍王李世贤在景得〈德〉战胜^③，到乐平一败，失去官军万馀。^④黄文金、胡弼〈弼〉文、李远继^⑤由东流、建得〈德〉、饶州一带，与中堂部将临敌所制，未与李世贤之相应，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这支人马，在后再由洋岔岭〈羊栈岭〉而未，祈〈祁〉门有中堂在此屯紮，后刘官芳之兵，亦被中堂之兵打破，胡弼〈弼〉文中砲身死，其军不能荃力，此军亦被中堂之兵制战，不能为事。

（接上页注④）所招之兵，具〈俱〉未经战，是以未敢与鲍军开兵。”案曾国藩《鲍超军丰城大捷折》，此役鲍超军队并没有到湖北，又考胡林翼清咸丰十一年六月廿五日《官军克复通崇咸蒲等县南岸一律肃清疏》此役在湖北抗击李秀成进军的只是胡林翼部队，并无鲍超军（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四十七《奏疏》），知李秀成此处所说“未敢与鲍军开兵”的话也是错的。

- ① 湖北胡巡抚，是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胡林翼是仅次于曾国藩的凶恶的反革命大头子。他利用武、汉，作为反攻的重镇。他极力支持曾国藩的湘军水陆师，向太平天国进攻。他还为曾国藩一再向清廷谋取得督、抚的大权，使得更便利地去从事反革命勾当。他在攻陷安庆之后，于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底吐血死。
- ② 左京堂，指左宗棠。这时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随曾国藩襄办军务（据《清史列传》卷五十一《左宗棠传》），所以李秀成叫他做左京堂。
- ③ 侍王李世贤在江西景德镇得胜，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廿九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卅日事。这一役，李世贤打败曾国藩派来救景德镇的皖南镇总兵陈大富的军队，陈大富投入李村河死。李世贤攻克景德镇。左宗棠退乐平（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廿四日《景德镇失陷陈大富阵亡请恤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
- ④ 侍王李世贤在江西乐平县战败事，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官军破贼乐平鄱景浮梁一律肃清折》说，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三月初五日（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六日），三月初九日（夏历三月初十日）在乐平附近，和三月十三日（夏历三月十四日）在乐平城发生的大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忠王答辞手卷》论左宗棠军说：“左自乐平以后，无能战矣，兵皆老病故也。兵忌老。”据此评论，乐平之役，还算得上左宗棠军一场大血战。太平天国军队，在一个战役中，损失到万馀人，也是极少见的事。
- ⑤ 李远继，广东花县人，以功封佑王（一作祐王）。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二月，与孝王胡鼎文、堵王黄文金合军由青阳同入江西。旋退军归浙江，镇守安吉县，与湖州相犄角。甲子十四年六月，天京失陷，幼天王奔湖州。七月，远继从安吉至广德州与黄文金会师，奉幼天王入江西。在广昌、石城之交战败，幼天王被俘，远继率千人突围走福建，收集余众，与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转战闽、粤间。乙好十五年八月，与敌人在广东镇平县大战，兵败，十月，在江西降敌（据刘坤一清同治四年十月十一日《复刘克庵》，见《刘坤一遗书》第四册《书牍》卷三）。旋复回汪海洋军中，充当内奸，出卖机密情报，瓦解军心（据《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二期盛巽昌《太平军僭王谭体元部大败真相》引刘典《从戎识实》和与左宗棠书信）。

家弟李世贤乐平一败，退由河口而下常山。^①中堂在祈〈祁〉门，被天朝之兵围屯。此非中堂不可，别人祈〈祁〉门不能屯稳也。此亦是清朝之福，中堂之福，不然，四方皆兵，其不美事，今事已过，良可佩服也。^②此段说过，再将自湖北凑下合章，中堂惠觉〈览〉。我自在金牛、宝〈保〉安招得新兵，不与鲍、胡军战，一因兵新，二因接李世贤来报云乐平之败，赶我复回。那时曾九帅又困安省，英王陈玉成解救不能，又调黄文金回来助救皖省，刘官芳被中堂部将战败而回，是以当即将湖北等县全军尽行同日收兵赶下^③，以

- ① 侍王李世贤进入浙江常山县日期，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三月廿三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廿四日。其时在乐平大战后十一日，可见李世贤用兵转移的迅速。第二天，分军进入江山县（据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廿五日瑞昌、王有龄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六十四）。李秀成说：“李世贤乐平一败，退回河口而下常山。”考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二日瑞昌、王有龄奏说：“婺源贼匪窜踞常山、江山二县”（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六十五）。同年八月初六日毓科奏说：“侍逆李侍（世）贤股匪，本年三月间，自景德镇败窜安徽婺源，旋陷浙江常山”（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二）。案瑞昌是清朝杭州将军，王有龄是浙江巡抚，毓科是江西巡抚，他们都说李世贤在江西乐平战败后，经安徽婺源入浙江常山县，与李秀成所说从江西河口入常山不同，李秀成当是记错的。
- ② 关于这一次进攻祁门曾国藩的战役，侍王李世贤在东南进攻，定南主将黄文金在西面进攻，右军主将刘官芳在北面进攻，断绝了曾国藩的粮道文报，包围了祁门。其中刘官芳一军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一月进到羊栈岭，辛酉十一年正月进到大赤岭，二月进到榉根岭，都逼近祁门。曾国藩已经写了好几次遗嘱，说：“万难支持”（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七，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廿四日《致澄侯四弟信》），又说，“军事日危，旦夕不测”（见同上，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四日《致澄、沅季弟信》）。但太平天国当时用兵，进攻祁门的指挥既不统一，步骤也不一致，后来黄文金复调去救安庆，李世贤又入了浙江，只剩刘官芳这一路军队与敌人作战，就失去了在祁门捉曾国藩的机会。
- ③ 李秀成说此役在湖北撤退，是“将湖北等县全军尽行同日收兵赶下”，但据胡林翼清咸丰十一年六月廿五日《官军克复通崇咸蒲等县南岸一律肃清疏》说，却是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廿九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二日）至六月初二、三日（即夏历六月初六、七日）各县陆续撤退的（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四十七《奏疏》）。这一役是太平天国战争中关系重大的战役。李秀成此处叙述太简略，我们应该做比较详细的注。据常文煜译威尔生（A. Wilson）《常胜军》记公元1860年10月，太平天国决定来年军事的主要目的系占领汉口及解安庆围，为贯彻此项计划起见，四个军同时出动。“忠王尤意气豪迈，深为自信，为达到此目的，不惜跋涉五百英里的路程。1861年1月，忠王离常山，军行无阻，经过玉山、广信，直到建昌，那里被清军占据，虽经击败来援的清军，但不能攻占该地。忠王乃进到赣江东岸。渡过赣江时，忠王军队将民团驱走，向前进军，在4月间，兵屯靖安、武宁，就其军队来说，已尽其能力，虽因进袭建昌而遭失败，也算是不容易的了。由于建昌的失败，使忠王的后退非常危险，而另一支太平军向汉口进发又遭挫折。英王陈玉成取道捷径而行军，早在三月间占领霍山及英山，后乃进攻阿木尔鞑鞑人营垒，大获胜利，尽俘他们的马匹而回，黄州离汉口仅五十英里，在1861年3月18日被英王部队突击而占领。彼统率兵士约八万人，在十一天里面行二百英里，使在宿松的清军受惊吓而退走。侍王统率的军队四月间在乐平（转下页）

接护李世贤之军，一由义宁州而回，一由武宁而回，一由遂（德）安而回，

（接上页注③）被击败，死伤一万人，堵王也受挫败，因在渡过扬子江后，抵达东西梁山时，被曾国藩的部队所截击，全部被歼灭，其他一路军队也被曾国藩击败，当忠王得悉各路不好消息的时候，自身也处在困难的境地，因鲍超统率大军蹙其后，湖广总督又派军阻其前进，民团抢夺他的辎重，忠王不得不循原路撤退，免贻后悔。在经过许多次危险之后，驰行八百英里以上的路程，在1861年9月抵达广信。英王见忠王不能前进，也率兵退回。于是攻打汉口而解安庆围困的伟大计划竟不能实现”（第五章，扬子江流域太平军的逆势）。干王《洪仁玕自述》也说太平天国庚申年三月廿七日打败清江南大营解天京围之后，“四月初一日；登朝庆贺，且议进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取闽、浙，独忠王从吾所议云：‘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四（西）距川、陕，西（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乃蒙旨准，即依议发兵，觉为得手。及取苏、杭等郡县后，英王如议进取蕲、黄，忠王由吉安府绕取兴郭州等县。殊忠王惮于水势稍涨，即撤兵下取浙江。英王因忠王既撤，亦急于解救安省，遂失前议大局之计。后虽得杭州等郡，而失一安省，为京北屏，大有可虞之势。殊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故予行文晓之曰：‘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况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洲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闻也’。后忠王复以‘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凛遵’云云”。我们从上引《干王自述》与威尔生记载看起来，可见此役关系全局的重大。本来，太平天国这一役决定的战略是很正确的。据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三日彭玉麟向曾国藩报告当二月初八日（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初七日），陈玉成统率的北路军攻克湖北黄州时，武昌城的情况说：“当夫初八贼破黄州时，武昌城人民一空，不堪笔叙。各粮台军火总局，闻警散尽。阎丹初呼唤不灵，愤极自尽。……满城已无人……仅馀秀相司道数人在省垣以内而已，土匪白日城内劫掠当铺钱店（据言即标兵倡之）。”（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三日彭玉麟《上曾国藩禀》，见影印《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二册）案阎丹初即清朝总办前敌后路粮台兼理营务阎敬铭，丹初是他的字。秀相，是清朝湖广总督官文，据此可见当时武昌已经陷到十分混乱的地步。其后五十多天，李秀成军队又挺进到江西腹部，军锋所向，震动了赣、鄂两省。曾国藩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信说：“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在二三月可决耳”（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字谕纪泽》，见《曾文正公家训》卷上）。曾国藩所说“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话，不过是要在儿子面前作硬汉，其实，只要太平天国军队向武昌或九江直捣，则安庆之围就要不攻而自解。曾国藩《复胡林翼信》，述左宗棠的意见说：“左季翁以此贼飘忽异常，若抚、建不破，恐其由樟树等处渡赣水之西，由瑞、临以达九江，则全鄂震动，安庆之围自解”（转下页注）

具〈俱〉到瑞州齐集。那时安仪〈义〉、奉新、新昌一带百姓作怪，抢我由瑞州上下解运军饷，后将〈由〉此经过，而问其罪，杀其为首二十余人。此事办清，荃军片〈徧〉地而下，瑞州等县亦是撤退尽。^①先有冲天砲李赐

(接上页注)(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复胡宫保》)。案左季翁，即左宗棠，左宗棠字季高。曾国藩在《复李辅堂书》中又自供道：“伪忠王一股，若从建昌直捣樟树、瑞、临，则江西固将糜烂，两湖亦为震动，安庆之围，且不攻而自解”(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我们上引彭玉麟的报告，与曾国藩的自供看来，可以看见太平天国这个大战略是怎样的正确与有效。它使敌人从主动变成被动，它使敌人从气焰嚣张变为应付失措，并且陷于混乱的地步。如果当时长江南岸的李秀成大军与长江北岸的陈玉成大军取得联络，同时向武昌、汉口挺进，即使是两路军队不能同时会师，而由陈玉成军队在取得黄州后单独向武、汉前进，或者是李秀成军队在取得大冶、武昌(今鄂城)、兴国、咸宁、蒲圻、崇阳、通城等县后，即向武昌省城进军，都同样可以克复武、汉，安庆之围，不战自解，而收到了这一大战役所预期的目的。乃陈玉成受了英国参赞巴夏礼的阻挠，迁就了外国侵略者，把唾手可得的武、汉停止进攻，犯了大错误于前，而李秀成为救安庆而进军赣、鄂，现在已兵屯鄂南，并且在武昌县已与杰天义赖文光军隔江相望，李秀成大军只要一向武昌省城挺进，安庆围师就要不战自解，竟功亏一篑，从湖北撤退，又犯大错误于后，遂使这个大战略全部破产，安庆跟着失陷。在太平天国后期战事论，这一役是决定双方全局胜败的关头，作为太平天国军事两个主要统帅的陈玉成与李秀成都犯了大错误。而就李秀成一生历史来论，应该说是他最大的一个错误。固然，李秀成的撤退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的，如侍王李世贤在乐平的战败，右军主将刘官芳等在黟县战败，使他后方受到威胁；如长江无水师，南北联络困难，情况不明；如军饷被江西安义、奉新、新昌一带团练抢劫等等，但是，全局胜负决于安庆的能否守得住，而攻武昌乃是为要达到救安庆的目的，岂有安庆已到了十分危急，而李秀成军队跋涉四省，路经几千里，将临武昌省城下，竟行退兵之理！这时候，正是破釜沉舟，有进无退的时候。李秀成不但犯了退缩的错误，在他的思想意识里，实有重视苏、浙的战略思想存在。后来李秀成被执，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去看他，曾经提出这件事问他。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记有当时的谈话说：“余又问：‘十一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曰：‘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余曰：‘图杭州曷不在赴江西之前，而徒行数千里，无功始改计耶？且尔弟侍王在徽取浙甚便，而烦汝耶？’曰：‘余算诚不密，先欲救皖，后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敌退，抑亦天意耳。’”所谓“天意”乃遁词，实是私心误了大事。所以我们应该指出：在这一役关系到双方全局胜败的大战役当中，李秀成不但犯了退缩的错误，而在战略思想上还犯了轻视保卫长江上游、重视苏、浙的错误，而且违犯了不顾全局，只顾发展个人势力的大错误。至于洪仁玕把进攻武、汉，解救安庆计划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他身上，说陈玉成停止进攻武、汉，回军解救安庆，是由于他先退兵，却不是事实。因为当陈玉成从湖北回军救安庆的时候，李秀成正沿赣江西岸北进；当李秀成向湖北挺进连克通城、通山等州县的时候，陈玉成已经在安庆外围接连失利。所以陈玉成北路军停止进攻武、汉，与李秀成南路军的行动无关。陈玉成停止进攻武、汉，是因为受到英国侵略者巴夏礼的阻挠。这点必须应该辩明。

① 李秀成军队从瑞州撤退日期，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九日(据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官文、胡林翼、李续宜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二)。

扬〈金旂〉带有清兵十餘营屯紮阴岗岭^①，与我部将谭绍光、蔡元隆、郇永宽等迎战。两军对阵，李锡扬〈金旂〉兵败，其将概已被擒，全军失散，拿其到步。见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当问其末情肯降否。他云被擒之将，不得愿而回我也。后见其语未有从心，仍言〈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数日，发盘川艮〈银〉六十餘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后闻被杀。^②此人不是肯降天朝，实是被擒不奈。因惜好汉，故而放回。其手下部将六七员亦已回去。此人杀之好惜，不是降我也。自湖北回来瑞州〔撤等县〕，向临江而东，过张〈樟〉树，大队过齐，宗弟李恺运^③、李恺顺^④二人由章〈樟〉树那边河边而下。那时知家弟李世贤尚在乐平，不知其退下常山，是以由那张〈樟〉树那边河而下，河中有木簰而行，欲相〈想〉下到江西会队。后家弟由那边河下，忽偶〈遇〉中堂派令鲍昭〈超〉一军亦到，在丰〔城〕对面紮廿餘座，中隔一山，我并未悉有中堂

① 阴岗岭，在江西瑞州府高安县城西南八十华里（据《同治高安县志》卷四《山川》），是瑞州府和临江府的咽喉，据守得住阴岗岭，就可以保持瑞州和临江的交通（据同上书卷九《兵事》刘昕《阴冈岭平贼记》）。

② 李金旂，清朝副将（据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廿六日江西巡抚毓科奏），绰号冲天炮，勇悍绝伦（据欧阳兆熊《水窗春吃》卷上）。左宗棠戊午派李金旂带勇至蒋益澧军中，他在“李守备金旂”句下注说：“即冲天炮也。有血性，善冲锋，熟悉楚、粤边界情形，故遣其来。此子要善驾驭，以之冲锋恐太轻，以之打接应则无不胜矣”（见《左文襄公书牍》卷四《答蒋芗泉》）。所以李秀成说他“是勇将有名之人”。李金旂本是天地会员，在湖南起义，称統領元帅，后来叛变投降清朝（据王鑫清咸丰五年三月初六日《永明剿贼大捷夺获富川县印信并各件请咨送广西省核收禀》，见《王壮武公遗集》卷三《禀牍》三）。阴岗岭战败被俘，李秀成释放他，走归江西省城自首。时狱未定，左宗棠《致曾国藩信》说：“江西于李金旂事，似颇难处。弟意欲其解送敌军了之，以除一患。此辈不用则杀，别无处置也”（原件南京图书馆藏）。后来江西巡抚毓科把李金旂解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就借失律把他处斩（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李金旂张光照正法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据欧阳兆熊说李金旂被斩未死，后逃为和尚（见《水窗春吃》卷上）。又案李秀成擒李金旂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三月卅一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据曾国藩《李金旂张光照正法片》）。这是李秀成未入湖北克瑞州府前四天的事。此处乃补叙前事。

③ 李恺运，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二月守江苏无锡，封天朝九门御林王宗殿后北破犄军主将乾天义（据佚名《平贼纪略》）。现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李恺运镇守无锡时，发的《金匱县尚忙钱粮执照》。

④ 李恺顺，后封广王，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坚守江阴，联络通州农民起义（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八月初三日《克复江阴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四）。甲子十四年春守丹阳，城陷后，领军去江西。其后不知所终。据清方奏报，说李恺顺被杀于丹阳之役，这是清军营的冒功虚报，是不可信的（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七十二，同治三年四月十七日冯子材、魁玉奏）。

派有此军而来。家弟在高山一望，见鲍军多，当而未进，陆续退军，荃军退尽，行〈幸〉而不及。鲍军后追来，我军过尽，到有一小河，前此河是我军搭桥，后不知百姓撤开，到此无桥可过，后又追兵，我兵游水而过，将已过齐，鲍军亦到，此时伤官兵数十名，仍回章〈樟〉树。^①次日连起大风，舟不能动，连吹四五日大风，鲍军不得过来，我已行去三四日远以〈矣〉。过了抚州浒湾，方知李世贤下常山。当息兵三日，而下河口。即见童容海由广西而回^②，得其什数万，顺下浙江。^③

当即分队，李世贤攻打金华、汤溪等处。^④严州各城攻破之后，又议

- ① 李秀成部李恺运、李恺顺在丰城西岸遇鲍超追军事，时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七月廿四日（据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二日《鲍超丰城大捷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四）。此役曾国藩奏报称为大捷，说李秀成在樟树传令，以豫王等精锐二万余，一面围攻丰城，一面直冲水师，李秀成自率大队过河猛攻鲍超军，双方鏖战一时之久，大败而逃，被杀七八千名。今案《李秀成自述》，当时并不知道鲍超军到，李恺运等一经发现，立刻退兵，鲍军追到，只伤了过不得小河的官兵数十名。可笑曾国藩居然把这一小事，铺张为大捷，用了六百里驰奏，官书之多虚，这又可见一例。更笑笑的，曾国藩几年之后，给他部将的信里，还把这一役称为唯一的痛打的大仗，他《致彭杏南信》说：“两三年来，除鲍春霆在丰城一战外，我军从未与忠党痛打一仗”（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一）。以杀伤落后的几十名敌军，为痛打的大胜仗，曾国藩湘军陆师的战斗力可以想见。湘军之强在于水师，太平天国军事的失败，也在水而不在陆。
- ② 案童容海这一支队伍，是石达开部下。石达开离京远征回到广西后，部下群众觉悟到石达开所走的分裂路线的错误，纷纷起义，谋归天京，其中有一支是童容海、吉庆元等率领的，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归天京，辛酉十一年七月到江西铅山一带歇伏，八月遇李秀成大军从湖北回师，隶李秀成部下（据吉庆元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本章）。
- ③ 李秀成大军入浙江分为两路：一路由玉山进常山，一路由广丰进江山。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廿三日庆端奏说：“伪忠王李秀成一股，复与铅山逆匪，一由玉山窜陷常山，一由广丰阑入江山境内”（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七）。从江西进军浙江日期，当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八月初十日前后，八月十五日（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廿一日）即进克浙江常山县城（据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廿四日闽浙总督庆端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朝军机处录副档案。又当时在江西广信抗拒太平军的左宗棠则说是咸丰十一年八月廿三日入浙江，见《左文襄公家书》卷上，九月初三《广信大营谕霖儿》。案庆端此奏系据自在浙西抗拒太平军的前衢州镇李定太等先后驰禀，故应以庆端此奏日期为据）。太平军既进抵常山、江山，乃分两路进向衢州府。八月廿四日（夏历九月初一日），即进抵衢州府城，四山旗帜均满。廿九、卅两日离衢（据佚名《辛酉八月再赴衢州纪事》四首诗注，见南京图书馆藏钞本《杂著》）。大军向严州府进发，与李世贤军在严州府会师（据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瑞昌、王有龄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六；又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庆端奏，见同书卷二百八十一）。
- ④ 李秀成上文说从江西河口“顺下浙江”，此处接着说：“当即分队，李世贤攻打金华、汤溪等处。”案李世贤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克浙江龙游县，十六日（夏历四月十八日）克汤溪县，十七日（夏历四月（转下页注）

分兵^①；我领新招将士及童容海全军而下浙江，派李世贤打温、台、处州、宁波等处，我派军去破绍兴各县。军到处所，具〈俱〉是自降献城，独甫〈浦〉江县有张玉良提战，数日交锋，张军即败。侍王收克甫〈浦〉江^②，即到宁波矣。斯时正逢九月而到浙江，军由富阳而破余杭^③，到卦〈盐〉岭舖，至姑唐〈塘〉屯紮，宵〈离〉城三四里之情形，安寨分军派将，按门攻打。^④先将浙江外之府县分军据净，严州有涕〈梯〉王练业坤守把^⑤，龙游

（接上页注④）十九日）克金华府城（据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瑞昌、王有龄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六十六），廿一日（夏历四月廿三日）克兰溪（据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卅日瑞昌、王有龄奏，见同上）。其时都在这年八月李秀成军队入浙江前。李秀成此处说他入浙江后分队进攻，才由李世贤攻打金华、汤溪等处是错的。

- ① 李世贤军队克浙江严州府城，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据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闽浙总督庆端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九。案同书卷二百七十六录同年十月十八日瑞昌、王有龄奏叙严州府城于十七日失陷，未记月份，而其上叙事则记“八月十六日”。考同日瑞昌、王有龄另一封奏折报告浦江县城于八月廿三日失守，李世贤于攻克浦江等县后，率军赴严州，增加围攻严州的兵力，则太平军的攻克严州府必在攻克浦江之后。《剿平粤匪方略》录十月十八日瑞昌、王有龄报告严州失守奏报，中间删节，使月份不明而已。又考《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九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帮办浙江省团练王履谦奏报严州府城系于九月十六日失陷，与庆端奏报虽相差一日，但也可证此书所录瑞昌、王有龄奏是有脱漏。恐读者滋疑，故考明于此）。
- ② 李世贤克浙江浦江县，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廿三日（据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瑞昌、王有龄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六）。
- ③ 李秀成军队克浙江余杭县，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据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瑞昌、王有龄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六。案《方略》录此奏折先叙严州府城于十七日失陷，接着叙述“余杭县城亦于十七日失守”，上面注⑤既据庆端奏报知严州府是于九月十七日失陷，则余杭县为同日失守，其日期即为九月十七日）。
- ④ 李秀成军队攻杭州，开始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廿三日（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九十三清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浙江布政使林福祥奏、华学烈《杭城再陷纪实》及钱塘王洁《双红豆馆遗稿·辛酉围城》诗注）。廿五日（夏历十月初二日），将九龙头、闸口及馒头山一带营盘全行扫平（据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陈世章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九）。廿八夜（夏历十月初五夜），在候潮、望江门外，连夜抢筑营垒五六座，天明已成，将杭州十门合围，饷道断绝（据华学烈《杭城再陷纪实》）。案辛酉十一年十月初三日，李秀成《谕侄容椿男容发》说：“官兵自到杭郡以来，日战日胜，城外妖穴，一概扫平，杀死无数，活拿者数千，自降者数千，已将该城围困，内外不通，成功在即矣。”这一段话，可作此处补充。
- ⑤ 练业坤，广西人，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生，李世贤部将。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既克严州，以练业坤镇守（练业坤镇守严州事，除见《李秀成自述》外，《光绪浦江县志稿》卷五《兵防民团剿贼纪略》也有记载）。后调往浙东作战，严州由忠勋朝将花旗谭富镇守（据左宗棠清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三日《攻剿严州克复郡城折》，见《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壬戌十二年春，以功封梯王。癸开十三年夏，调归守卫天京。这年七月初十日，在天京城外印子山阵亡。他的墓碑在阴沟发现，现陈列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有王宗^①李尚扬把守^②□^③衢郡清兵未下,金化〈华〉有李世贤亲军部将周连得,兰溪、汤溪是广东之兵守把(此等害民之贼)。④李世贤领军由金化〈华〉去取温州。收得温州^⑤,而到处郡^⑥,即克臺〈台〉州^⑦,皆李世贤之

- ① “王宗”全衔是“开朝王宗”,这是太平天国官制里面的加衔。俞功懋《探穴记略》说:“以咸丰三年前者加开朝王宗”(见《碧城杂著》卷一)。
- ② 李尚扬,湖南安仁县人,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出生。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七月,在长沙投入西王萧朝贵军。屡立功劳,庚申十年十一月封裨天义。辛酉十一年春随侍王李世贤入浙江,既克龙游,镇守其地(李尚扬镇守龙游事,除见《李秀成自述》外,《民国龙游县志》卷一《通纪》说:“[咸丰]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县城陷。……匪一宿即退。……六月二十六日匪将裨天义(名待考)复据县城。七月晦……出示安民,各乡村均设卡子,胁民进贡完粮。”旋调守汤溪(据《李尚扬自述》)。壬戌十二年夏,李世贤奉诏回救天京,时敌人从衢州进犯,留李尚扬主持防御任务。屡败敌人,终因援绝,城中柴米子弹火药都尽,计穷力竭,无法突围,于癸开十三年正月被俘死难。
- ③ 此处原稿尚有一字,因认识不清,不敢轻率著录,故用□代。
- ④ 李秀成说“兰溪、汤溪是广东之兵守把”,在此句旁边注有“此等害民之贼”六字。案“广东之兵”,是指被称为花旗的广东天地会部队。考兰溪是天将谭星镇守,严州是忠幼朝将谭富镇守,都是花旗部队(据左宗棠《逼攻龙游汤溪县城贼垒情形折》及《攻剿严州克复郡城折》)。当时花旗所守浙江地方,还有武义、永康、浦江、东阳、义乌等县(据《李尚扬自述》)。但汤溪却是忠裨天将李尚扬镇守,并不是花旗把守,李秀成说是广东之兵把守是错的。又案花旗这一支游民组成的队伍,经翼王石达开招收后,“犷悍不可制”,“乃阳示以羁縻,令其自树一帜于江、皖间”,藉以牵制清兵(据夏燮《粤氛纪事》)。他们不遵命令,不守纪律。刘长佑向江西巡抚耆龄报告,说太平军叫他们为“花贼子”(见《刘武慎公全集》卷二十三《禀耆中丞击贼获胜筹防各情》)。左宗棠向清廷奏报说:“花旗贼,此股系广东无赖匪徒,前年由广东、湖南、江西入浙、皖者也。人数最多,无甚伎俩,为金陵贼党所不齿,时尾贼后游行掠食”(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四《水陆各军攻剿大胜见筹办理情形折》)。黄侗《义乌兵事纪略》说:“浙江巡抚左宗棠攻衢州龙游急,伪侍王李世贤檄义乌据贼陈荣赴援。陈为粤产,貳于李,不受征发,且聚诸粤贼于邑境,号曰花旗,图反噬。”所以忠王指出他们是:“害民之贼。”这也就可见后来浙江、皖南等地所传的太平军烧杀掠掠事,实在是这些花旗部队干的。
- ⑤ 太平军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即清同治元年正月廿九日)攻温州府城未下,其后二、三、四月间复来攻,都未攻下(据《永嘉县志》卷八《武备志·兵事》)。但于正月廿六日(即清同治元年二月初七日),攻克温州府乐清县(据《光绪乐清县志》卷十四《寇警》)。
- ⑥ 太平天国克复浙江处州府城,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据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廿九日庆端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九)。
- ⑦ 李世贤军队,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廿三日克浙江天台县,十月十九日(夏历十月廿七日)克浙江仙居县,十月廿一日(夏历十一月初一日)克浙江台州府城,十月廿七日(夏历十一月初六日)克浙江黄岩县,十月廿八日(夏历十一月初七日)克浙江太平县,十月廿九日(夏历十一月初八日)克浙江宁海县(均据《光绪台州府志大事略》)。于是台州府五县一府城都攻克。

取。打宁波亦李世贤之将，是戴王黄呈忠^①、首王范汝曾〈增〉前往^②。收克宁波之未情，实是宁波洋鬼之通诱。军离〈离〉宁城十里屯紮。宁郡鬼之头目到营求宽屯五日，候其将宁城内洋行什物运出城齐，言〈然〉后我军方进。求限五日，戴王不准。〔限〕其三日，将其洋行运净。其亦已愿。在外屯军，所食之粮米，皆洋鬼以及四民公〈供〉应。第四日，移军入城。^③当即安民。洋鬼带戴王去取海门厅〈定海厅〉、镇海县，皆洋鬼而助舟只。取

- ① 黄呈忠，广西人，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出生，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任殿左军主将，封宝天义，随侍王李世贤进攻浙江，克复宁波，进封戴王，与首王范汝增同守宁波。壬戌十二年三月，英、法侵略军与清兵联合来犯宁波，给敌人以重大伤亡后，从宁波撤退，继续在浙东抗击外国侵略者。癸开十三年春，在安徽进攻曾国藩，配合李秀成北征作战。天京陷后，黄呈忠随李世贤入闽。乙好十五年正月，克复福建漳浦。四月，漳浦失陷，不知所终。
- ② 范汝增，广西人，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出生，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任讨逆主将，封进天义，随侍王李世贤进攻浙江，克复宁波，进封首王。范汝增在辛酉十一年入浙江后，至癸开十三年春，都与黄呈忠军共同作战。天京陷后，范汝增率军保卫幼天王，甲子十四年八月，在安徽歙县建口战败受伤。军散后，偷过江北，与遵王赖文光等共同领导蒙城、亳州队伍作战。至丁荣十七年冬，东路军在山东寿光县覆败，范汝增英勇牺牲。
- ③ 太平军克宁波时为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廿九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公元1861年12月9日（据清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陈世章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九十一）。关于太平军克宁波事，李秀成说：“收克宁波之未情，实是宁波洋鬼之通诱。”清朝方面的记载如许瑶光《谈浙》也说：“贼之入宁也，虽由土匪勾引，实自洋人让之来。”又云：“初贼之既陷余姚也，不敢遽逼宁城，洋人迎犒以洋枪，贼亦酬以战马，且促之进，贼乃进。初七日，知县臧均之从城上见洋人三自贼营出。初八日清晨，洋人入城登陴劝兵勇早散。此皆英国夏领事之谋也。”案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公元1861年）三月，太平军进军浙江的时候，英国海军总兵咭乐德克（Roderick Dew）就奉提督何伯命一再警告太平军勿攻宁波，否则武力制止。四月底，咭乐德克先到宁波，五月初，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A. Protet）、陆军提督查绵（Jarmin）也来宁波，咭乐德克与卜罗德同到余姚视察防务。当时英国公使卜鲁斯通知何伯，说保护口岸即所以保护英国利益，清政府已同意由英军代守宁波。咭乐德克即与清宁绍台道张景渠商议宁波防务，张景渠愿雇英舰代为防守，由咭乐德克草拟计划。七月，英国外相罗塞尔赞同咭乐德克防守宁波计划。到太平军进攻的时候，何伯听到消息，立刻从日本赶到上海，派舰去宁波。外国侵略者企图用武力来干涉太平天国的收复宁波。但是，当外国侵略者布置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太平军已经以压倒的势力，分为两路，黄呈忠出余姚，范汝增军出奉化，用钳形攻势向宁波挺进，驻宁波的英、法、美三国代表就用狡猾的伎俩先派代表于十月十九日（阳历11月29日）到余姚见黄呈忠，窥探军情。呈忠答复他们，愿与外国和好，并宣布大军进入宁波时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接着又派代表于十月廿二日（阳历12月2日）到奉化见范汝增，假说要把城内洋行什物搬清，请延期七天再攻宁波，其实是阴谋在七天之内飞调战舰到来抗拒。汝增不知是计，在侵略者再三请求下，答应了这一个请求。汝增在当天即复英国领事夏福礼、美国领事勃立克、英国海军舰长赫格士汉姆、法国海军舰长奥布雷照会说：“大军将入宁波，暂克此城，以为（转下页注）

得两处,分军镇守,仍回宁郡。^①此事说之不尽,在后陆续补清。收绍兴一军,是末王陆顺德领军前去收复,萧山亦是其[所]收。^②收绍兴之情節,非是战成,实绍兴清将献城自降。此城高而濠阔,四面此〔皆〕水,来者进兵者,是单边之路,此城不是自降,不能收复也。^③收复绍兴,萧山亦自

(接上页注③)四民安居乐业之所,今接各桂国来函,所请一切,均一一照准,本主将已命我军兵士遵从上帝之榜样,严禁侵扰之行为。可请放心勿虑。查遵守信义为行为之要道,我军决不食言,幡然改变进攻宁波之约定期限也。至于各桂国人民之生命财产,本主将已发命令,不准兵士略有侵扰。商业亦可照常,且较前更为便利。劫掠暴行一律严禁。君子一言为定,诚实不欺,决无幡悔”(据王维周译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四章的回译)。廿九日(夏历十一月初八日,阳历12月9日),到了约定攻城的期限,大军进入宁波城,清军散走,遂克宁波。在几小时之后,外国侵略者派遣抗拒太平军进入宁波的英国皇家兵舰侦察号及其他一些船只才赶到,已无法抗拒。吟喇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里揭露出侵略者的阴谋说:“太平天国攻宁波时,那里并没有英国军队,虽然英国用了狡猾的伎俩使太平军首领延期七天,以便调集大军阻挠他们进城,可是担负此项任务的皇家兵舰侦察号及其他一些船只,在太平军攻克宁波数小时后始抵宁波,以致为时太迟了”(见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六章)。据此可知,李秀成所说“宁波洋鬼之通诱”,许瑶光所谓“迎犒”,实在是外国侵略者的缓兵之计。李秀成这一点记载是大错特错的。又案外国侵略者请求延期七天攻宁波,范汝增于十月廿二日答应了这个请求,即日回复照会,至廿九日始攻宁波,正是约定期限。李秀成说“宁郡之头目到营求宽屯五日”,“戴王不准,〔限〕其三日,将其洋行运净”,“第四日,移军入城”的话,也是错的。当时幸亏英国兵舰和船只到迟了几小时,否则外国侵略者的缓兵之计就会达到目的。这不仅是范汝增犯了这种错误,就是李秀成也犯过相类似的错误。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进攻武昌,驻军兴国州时,他把向驻在北岸黄州的杰文赖文光询问军情的要函托汉口英国领事金执尔(Gingell)带去,就给这一个侵略分子中途扣留起来,后来送到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去。这说明了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者和一些将领,他们虽然一般对外国侵略者具有警惕性,但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却有时警惕性不够,而导致了错误。

- ① 案海门厅,在江苏南通县东,不在浙江。当时浙江宁波府有定海厅。李秀成此处海门厅是定海厅的错误。太平天国并没有攻克定海厅(据《光绪定海厅志》卷二十八《大事志》),李秀成此处说攻取定海厅是错的。又案太平天国攻取镇海县是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廿七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其时在攻克宁波前两天。太平天国的进攻镇海县,是十月廿五日(夏历十一月初四日)从慈溪出发,由何文庆率领的浙江诸暨起义部队前往攻取(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九十一,清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陈世章奏,并参考《民国镇海县志》卷十五《大事记》,《光绪定海厅志》卷二十八《大事志》)。李秀成此处说是在攻克宁波之后,由“洋鬼带戴王去取”,并由“洋鬼而助舟只”,都是错的。
- ② 陆顺德克浙江萧山,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廿四日(据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护理浙江提督陈世章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九)。
- ③ 陆顺德克绍兴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廿二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廿九日(据清同治元年正月初五日闽浙总督庆端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八十六)。关于此役作战情况,李秀成在辛酉十一年十月初三日《谕侄容椿男容发》说:“尔父在桐庐〔庐〕命尔随陆主将队后而行,缘恐该队兵单,令尔等为其接应,先保萧山而后攻绍兴,(转下页注)

献降。(此时当即)末王陆顺德出示安民,浙省自孤。武康、得(德)清亦是天朝兵把[守],孝丰、广德、四安、安吉,县县如是。高敦(淳)、东坝我亦有军屯,溧扬(阳)、常州、苏州、嘉兴、石门亦是[我]兵屯。湖州虽有赵景贤把守^①无兵未救。杭城至海宁州及海盐(盐)县虽是清军把守,我军一到,海宁州守将张威邦献城而降^②,海盐(盐)县官亦(自)献城自降。^③杭省孤立,外府县概行收复。^④又未有救兵,四门被我紧困,(此

(接上页注③)以除浙省之羽翼,好早日成功也。十月初一日,接该主将于二十九绍兴发来捷报,云称绍兴已克,投降者数千,尔等在后亦到绍郡,已扎城内,阅悉之下,甚为欣慰。”会稽鲁叔容《虎口日记》说:“咸丰十一年辛酉,九月二十九日甲寅辰时,赭贼袭绍兴府,城陷。……是日黎明,遣仆出城买舟,拟赴乡寓慰老母心,不意贼夺西门入,守城兵勇捍卫团练大臣王副都履谦及诸当道尽出五云门,弃城东遁,任贼款段而入。”据此知太平军从西门进入绍兴,清朝官兵兵勇弃城东逃。克绍兴后,投降者数千。所以李秀成说绍兴不是战取,而是自降。至于李秀成在家书中说明取萧山、绍兴的目的,在于“除浙省之羽翼,好早日成功”,也可作此处记载的参考。

- ① 赵景贤是清浙江归安举人,在本籍办理地主武装,抗拒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清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太平天国克复湖州,把他生擒,捉到苏州处死(据《清史列传》卷四十九《赵景贤传》及宋韵初《湖防私记》)。
- ② 案太平军克海宁州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廿二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乃太平军克杭州后三日的事。李秀成此处叙事,先后次序是错了的。海宁陈锡麒《粤逆陷宁始末记》述太平军入海宁州城情形说:“[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平明,蔡贼元隆入城,驻于育婴堂……蒋姓闻变出,惶惶无所之,遇张副将横头下马来劫之行,见其叩蔡贼甚恭,互交还笔札,蒋始恍然于献城之故矣。”张副将即张威邦,同书《铸像诛奸记》称:“统领虎威军副将张威邦献城降”便是。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卷上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日记也说:“初二日,我宁城失守。先是城中乏粮,火具又尽,小田之兵营守东门外,已潜投贼。至是贼攻城,张虎臣开门迎贼,遂失守。”
- ③ 太平军克浙江海盐县,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廿六日,即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七日。《光绪海盐县志》卷十二《武备考·历代兵事》说:“[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奸民章遇琴引贼陷海盐。三月初一日贼退。初七日复至。旋结巢于坞城。”又李承燾《咸丰同治海盐兵事始末纪略》说:“[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辰刻,直扑县城,城遂陷。……至三月初一日退去。……初七日……贼又至。……是时贼方筑垒坞城,屯兵踞守。……此后贼遣北乡土棍李阿美为伪官,设卡于西门外,勒收钱粮。……同治元年春,伪帅熊逆,伪副帅方逆始率党踞守盐城”(见《光绪海盐县志》卷末《杂记》)。据此,知太平军克海盐县,是在克海宁州前九个月的事。李秀成此处叙在克海宁州后,时间是错的。
- ④ 许瑶光《谈浙》说:“自十年四月嘉兴不守,湖州被扑,根已伤矣。至十一年三月,海平、乍浦被陷,而浙、沪之路断。四月处郡被扰,金华告陷,而浙东之腹心受惠,八月严州失,而上江之势蹙;九月绍兴失,宁波继失,而东渡之路绝;是无节不断,无根不掘,无叶不剪矣。斯时杭州西只存一被困之湖城,东只存一弹丸之海宁,各路诸将纷纷退保杭州。……以数万众群聚于区区一顷之西湖,即使贼不攻,城不陷,而饷绝兵哗,内患亦作矣。”案许瑶光所述李秀成取杭州战略,是太平天国用兵经常使用的重要战略。左宗棠向清廷奏陈说:“逆贼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频年东南贼纵,验之历历不爽”(见《左文襄公奏稿》卷一《复奏驻军开化马金街正可兼顾衢城折》),便是指这一个战略说的。

是二破杭州)。^①外救独有张玉良一军,由候潮门水道而未。那时我军已重屯凤山门,膏〈离〉候潮门二三里之远,见张玉良兵到,出军拦紮,绝断杭城,内外不通,内外押〈夹〉战未下,城内无粮,民亦无食,军民之心甚乱。^②那杭郡巡抚王有龄甚得军民之心,甚为坚守。我困城之时,射谕入城,分军民满、汉分别言语,顺言而化,肯降者即可,不肯降者不足为要。浙江瑞将军带领满众,我亦愿放。我为〈围〉城七日之前,具本恳我天王准赦满军回国,文由浙江未往二十馀日,御批未及下未,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四日,上〈尚〉未攻其满城,专等御照下赦。一面与瑞将军和议,云愿放其全军回家,其〈渠〉總未信。我奏准天王,御照降下,准赦满人,其〈渠〉亦不信,开枪打死我兵千百余人,然后攻其内城^③,各男女投水死者

① “此是二破杭州”六字,原稿写在簿眉上。

② 李秀成既围杭州,清朝广西提督张玉良率军从富阳来救,无法打通粮路。许瑶光《谈浙》卷二记其事说:“逆贼陈炳文于罗木营扎营五座。十月初五日,张玉良自富阳来,壮愍(案浙江巡抚王有龄谥)夜觞之。泣曰:‘粮路不得通,食且尽,奈何!’张应以死战。处州镇文瑞、副将况文榜俱由浦江冲围至,夺路入城。况即出城,与张军合攻贼,踏其五座营。兵疲甚,未及守,贼仍夜抢筑而成。至是杭城十门合围,饷断信绝矣。贼乃于凤山、清波门挖地道,城内开壕筑墙以断之。贼复自海潮寺至凤凰山筑木城,实以土,开枪炮眼,日夜施放,城中困甚。张玉良于罗木营外叠次出战,并令钱江炮船夹击,不能开。”杭州既合围,从上海接济的米粮军火等物均无法运入,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薛焕奏道:“据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禀称奉委航海赴杭,前诣总兵况文榜等军营,悬立重赏,激励攻剿,冀将米粮军火等物运入城中,无奈贼围重叠,未通一线之路。”(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八十三)同日瑞昌、王有龄奏说:“现在十门围紧,贼众愈集愈多,叠次督同饥军,并密约江干各营会合夹击,计大小昼夜数十战,竟不能开通一线饷道。城内粮食净尽,兵弁忍饥固守,势将无力举戈”(见同上)。李秀成所说“绝断杭城,内外不通,内外押〈夹〉战未下”,即指此。

③ 李秀成二破杭州,攻克杭州城是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廿一日(夏历十二月初一日)攻克满城(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九十三,清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浙江布政使林福祥奏、《文献丛编》第二十四辑清同治三年七月十七日唐音布佐领下监生继耀《为兄阵亡请恤呈》、许瑶光《谈浙》都同)。考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薛焕奏述总兵罗大春报告杭州失守事说:“据罗大春咨称……[十一月]二十七日,各军在望江门外鏖战通宵,瞥见贼匪已由凤山、清波两门搭架云梯上城。城中火光烛天,城上黄旗满布,即于二十八日卯刻失守。”钱塘陈学绳《两浙庚辛纪略》说:“[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廿七日,上城守卒约夜赴艮山门,俟明冲出,二鼓后纷纷下城,禁之不可,而黑暗中贼未及觉也。廿八日黎明,见无动静,方欲登城而下,城外贼亦以我军溃出告,遂自凤山、候潮、清波三门入城,城复陷。”清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浙江布政使林福祥奏报杭州失守及满城被攻破事说:“[十一月]二十八日辰刻,候潮门城下之营先行火起,兵勇一时尽散,于是贼匪纷纷爬城而上。……二十九日,贼匪攻扑满营……十二月初一日巳刻,满营又被攻破。将军瑞昌、乍浦副都统杰纯皆力竭战死。”据此,知清军溃散,李秀成军队于十一月(转下页注)

有之，被获者有之。后瑞将军及都统之死^①，当即差员在河下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渠〉本不信我奏，准放其〈渠〉回国，不欲加害，我亦射谕入城，城内军民可悉。我云：“尔奉尔主之命镇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未取，各扶其主，尔我不得不由，言和成事，免伤男女大小姓〈性〉命之意。愿给舟只〈隻〉；尔有金艮〈银〉，并而带去，如无，愿给助资；送到镇江而止。”其实不从，从者放满人定也。满州〈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未，非而自成。满待汉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君，两不得已，存我之心而为此事也。被获满州〈洲〉兵将，当即传令诸军，各获有满人落在营中者，不准杀害，私杀害者培〈赔〉命；各愿投营者即在营中，不愿者准其回国，给资其往。后有满官大胆者，即到府与我谈及，给费回家；为兵胆小者，各自夜逃；自去亦有；落在营中者，与营官日久，两家想〈相〉好，营官自行给费放者亦多。此之为非我虚言，杭省军民可悉，谅满州〈洲〉人

（接上页注③）十九日黎明攻克杭州城，于廿一日上午攻克满城。至于李秀成说：“我为〈围〉城七日之前，具本恳我天王准赦满军回国，文由浙江来往二十餘日，御批未及下来，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四日，上〈尚〉未攻其满城，专等御照下赦。一面与瑞将军和议，云愿放其全军回家，其总未信。我奏准天王，御照降下，准赦满人，其亦不信，开枪打死我兵千百餘人，然后攻其内城。”案李秀成于辛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开始进攻杭州，廿九日，即将杭州十门合围。十一月十九日始攻克杭州，廿一日即攻破满城。据李秀成说在围城七日前，即九月廿二日具本奏请天王赦杭州驻防满人，文由浙江来往二十多天，是十月廿日前即收到天王准赦满人御照了，这时候，离克杭州还有一个月，哪里会有已破杭州“御批未及下来”的事？又据亲在杭州城中与李秀成抗拒的清朝浙江布政使林福祥奏报，李秀成于十一月十九日攻克杭州城，第二天即进攻满城，第三天上午就攻破满城，李秀成也没有“破入大城四日，上〈尚〉未攻其满城，专等御照下赦”的事。又考杭州人清朝六品官员林西藩《隐忧续记》述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事说：“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一月，伪忠王复陷杭州。二十八日辰刻，城中破。”被掳在寅天豫许某馆中当更夫。他续述道：“十二月初一日，伪忠王传令攻满州营，诸贼咸齐集听令。馆中仅有妇女三人，童子四人，嘱余与余杭人守视。至申刻，漫天尽黑，喧传满营已破，旗人俱自焚死。……初二日，满营火熄，贼众俱往检物。”据此知忠王于攻入杭州城第三天即下令攻满城，当天即攻克，并无“破入大城四日，上〈尚〉未攻其满城，专等御照下赦”的事。李秀成这一段话是有所为而发的，他当是为着对付曾国藩屠杀天京军民而说的。

- ① 李秀成攻入杭州满城，杭州将军瑞昌，乍浦副都统杰纯都被打死。李秀成这里所说打死的都统，就是指乍浦副都统杰纯（据清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林福祥奏，案陈学绳《两浙庚辛纪略》说杭州副都统关福也自杀死，据林福祥说关福从钱塘门逃出，陈学绳的记载是错的）。案清朝八旗驻防，在浙江省设杭州将军一人，副都统一人，协领九人，辖佐领三十二，杭州将军兼辖之乍浦副都统一人，协领五人，辖佐领十六（据《光绪大清会典》卷八十四《八旗都统》）。杭州将军是杭州和乍浦驻防八旗最高长官。杭州副都统和乍浦副都统是杭州将军下一级的长官。

众，必有之〈知〉情。在省候补候任清官无数，业亦给费其回，稣州前日亦是如是。至困杭州之时，每日与王有龄兵战。那时其内无粮，民亦无食，兵将饿倒，不能为战，王有龄亦是无法，外战张玉良一人抗（况）文榜而已，屡战不能见效，内〈夹〉攻不果，实实无由。^①王有龄与其师爷计及：“托信与忠王，叫忠王其免害杭城军民。”师爷回言：“大人此信何写？两国交兵，何以称呼？称其〈渠〉不好，其〈渠〉重害尔民；称得其〈渠〉好，皇上罪尔投他。”其师爷之语，王有龄无言可对，捶心而叹：“不必写文，杭城不能保守定也。坐在大堂，等忠王入城，视忠王何等之人，见其人而死。”其师爷回言曰：“此人入来，万不与尔死。”后而无法，我官兵四面越城，一踊而进。我亲自上城，抢得一奇〈骑〉，单人直冲到王有龄衙内，寻取此人，入屋四寻不见，寻到其后花园，见其〈渠〉吊死，当令亲兵放下，其〈渠〉已死矣。后抬其〈渠〉到大堂，排〈摆〉与众视是否，叫其〈渠〉部下之人来认不差，后而用棺木载之，将其〈渠〉依〈衣〉帽朝服一应归还，放其木内，令其〈渠〉部将亲自看守于他。次日，当即调其〈渠〉部下之（之）员到堂，当众明喧〈宣〉：“各肯从军者即从，不从者皆由自便。”其〈渠〉亲兵具〈俱〉是福建人众，馀军两湖者多，具〈俱〉而尽赦。亦有肯从，亦有不从，从者在营入部，不从者各任回乡。各有金艮〈银〉什物，不准兵拦〈拦〉，仍言〈然〉其〈渠〉带。后将王有龄之尸首，在其〈渠〉亲兵之内，点足五百人，送其棺木，由省动身，给舟十五条，费艮〈银〉叁仟两，路凭一纸，送其〈渠〉回乡。各扶其主，各有一忠，念其〈渠〉忠志之故，惜看英才义士，故用此心。生各扶其主，两家为敌，死不与其〈渠〉为仇，此出我之心院〈愿〉，息〈悉〉不认〈忍〉加刑，故而为此也。其中上〈尚〉有米贤招〈米兴朝〉、林福祥两人，外有林〈麟〉趾一人，亦是杭省布政司之賤，到省上〈尚〉未接任，原任仍是林福祥。此等亦言〈然〉被获，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我文官闲及〈叙〉。夜静，我与

① 案清朝杭州城外援军，由广西提督张玉良统率。张玉良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九日中炮阵亡。援军由总兵况文榜接统，内外夹攻，毫无效果，“渐至内外隔断，不独粮米军火不能运入城内，即文报音信递送亦难”（据清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林福祥奏。案张玉良之死，据许瑶光《谈浙》卷二说：“十九日，张送客出营门，方转，我守城兵枪伤其右肋，弁勇以船护至闻家堰而亡”，与林福祥所说“攻剿贼垒”“中炮阵亡”的奏报不同）。

米、林谈及世情。后并将林福祥家小儿子一并寻回，交还林福祥，将米贤招（米兴朝）之马疋亦寻见付交。后米贤招（米兴朝）将其之马送与我部将汪安钧。林（麟）趾乃是满人，心中自畏，次夜私逃，并不追赶。^①然后过了十馀日，林、米二人欲去，不愿在营，即而脩舟隻各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艮（银）三百两。后其（渠）两人不敢要，各领百两，临行各具一信与我辞行，云：“今世不能为友补报，末世不忘。”并云：“尔忠王本事出色，未偶（遇）明君，好惜！好惜！”等语之文，辞行而去。^②

此时十二（一）年十一、二月之候，雨雪交加，不能行动；稣、杭河

① 林福祥是清朝浙江布政使，米兴朝是清朝汀州镇总兵，麟趾是清朝杭嘉湖道、署浙江布政使。据清朝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说麟趾于杭州城破时，巷战至武林门中枪死（见《左文襄公奏稿》卷五《查明杭湖殉难文武大员请恤折》）。今案李秀成此处所记知麟趾被俘后，第二夜私逃而去，没有追赶，并没有巷战到武林门中枪身死，左宗棠的奏报却是虚谬了。林福祥、米兴朝二人为李秀成礼待，送出境后，赴上海，为清朝江苏巡抚薛焕奏请查办，清同治元年七月，清政府命左宗棠杀于衢州军营（据清同治元年七月廿九日谕，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十六）。

② 关于李秀成礼待林福祥、米兴朝事，清朝江苏巡抚薛焕访查所得情形，于同治元年三月廿七日向清廷奏报说：“臣自闻浙江省城失守，即经专弁赴浙查探城中文武各官下落，均因不得入城，未有确信。本年正月后，杭城被难士民陆续逃出到沪，皆云逆匪入城，兵勇溃散，伪忠王李逆改抚署为招贤馆，大小文武官员皆准投入，或授以伪职，相待甚优，或给与护照，听其自便。藩司林福祥已降贼为伪官。织造恒起、署杭嘉湖道刘齐昂、已革总兵米兴朝均在招贤馆中，又闻贼至海宁州，防军纷纷从贼，副将张威邦亦在贼中等情。旋于正月二十八日林福祥携带家属同恒起、刘齐昂均到上海。据林福祥云杭城未破之前，奉有王有龄印札及帛书奏稿令其设法出城，招集溃勇，力图恢复。及城破后，率众巷战，与恒起相遇，遂同入驻防城，随同将军力战。满城又破，血战冲出，暂驻杭州城外，由桐乡县屠田市镇、嘉善县西塘镇取道至上海，与恒起、刘齐昂一路同来等语。臣思杭州至屠田市镇，由该镇至西塘，沿途均有贼卡，林福祥等何能行走无阻？情殊可疑，不得不密为访察。当经飭据道员吴煦查得该司等乘坐船只到沪，传讯船户陈阿二，据供系在西塘被贼封捉，装载恒起与林福祥等一同来沪，亲见林福祥两次至伪将军徐姓贼营赴席，林福祥在西塘趑趄而行，闻徐逆送给银二百两等语，旋有参将郭太平等解送临阵投出之被掳杭州驻防旗兵三名，臣亲加讯诘，据供杭城失守，官军或降或逃，并无带兵大员与贼巷战，亦无一人投入旗营等语。又有浙江候补主簿裘云章自贼中逃出，据称破城之前数日，王有龄给与林福祥印札，令其临急出城收集溃兵，乃城破后，林福祥被贼拦阻，即时降贼，李秀成相待甚好，令与伪主将邓光明同居藩署。又将织造恒起父子，署杭嘉湖道刘齐昂招至一处，并给总兵米兴朝银数十两，即行放出。邓逆并令恒起办理关税。李逆回苏后，正月中旬，寄信至杭，并有护照令林福祥送王有龄等灵柩出城。林福祥恳邓逆准将恒起、刘齐昂带出，于十五日自杭起程，邓逆设宴饯行，并致送盘费，令其子带贼兵二百人护送，至嘉善县西塘雇船到沪等语”（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九十八）。薛焕的奏报可与李秀成此处记载参看。李秀成之所以如此对待敌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争取敌人，以减革命的阻力。

小水浅，下雪冰冻，不能行舟。^①此时在稣〈杭〉省，往〈住〉十日有馀，而方启行。斯时将杭省各清将应从不从，安排定叠，即将省内难民一一安抚。在城饿死者舁薄板棺木万有馀个，费去棺木及财式万馀千；难民无食，即到嘉興载米万担，载式十万千来杭，将此米粮舁救穷人；各贫户无本资生，借其本而救其生，不要其利，六个月将本缴还，粮米发救其生，不要其还。^②四只〈个〉月之内，将杭省一并妥周，此时十一年末矣。十二月回稣，^③卅过年。

那时收得杭省，安省被九帅之兵克复，合城饿死，而失皖城。此是英王之军在省，被九帅之兵深濠高垒困之，省城内外不通，英王未救不得。后靠湖边九帅退裹〈让〉己〈几〉营，此是九帅留其退省生路之思。不意英王陈玉成不退，将石碑及省近之民粮运入省。九帅见其未退，仍将军兵复紮此湖边，此又困实省城。英王见势不得已，内守将叶芸来^④、张朝爵心有忌〈惧〉意，英王心惊，解救未果，后将我部将三人调一人入省助守。此将是我名下，我上湖北，留其保固六合、天长。此二县是我兵守把，故在稣州派

① 这一年冬天大雪，吴县杨引传《野烟录》咸丰十一年辛酉记事说：“是冬大雪，平地数尺，其干如粉。……俞松亭襄办乡官局中事，解粮至苏，归舟中途阻于雪……逾旬始还。”所以李秀成此处说“雨雪交加”，“不能行舟”。

② 李应珏《浙中发匪纪略》说：“李秀成初入浙三日后，即禁止杀掠，抽田租十分之二，货厘十分之一，按丁助役。苏、杭初克，皆发粟十万赈抚，借给籽种招垦，民颇安之。及大军进剿，官兵退相杀掠，子遗遂少。迄今承平三十年，而如於潜、昌化、临安、武康、吉安、孝丰等雕残之邑尚多，率皆土著不及三分之一，童生不敷学额。”案李应珏广东高州府化州人。据光绪十八年（1892年）《化州志》卷八载，系附贡出身，曾编辑《浙志便览》、《皖志便览》等书。这部钞本，为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

③ 考李秀成前队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赶回到苏州（据吴云《两樞轩尺牋》卷十二《致周腾虎书》）。这一天，苏州官员前往吴江县平望镇迎接李秀成（据吴云《两樞轩尺牋》卷十二《致永昌徐少莲书》）。据此知李秀成当是在十二月初间在杭州起程。案李秀成于十一月十九日克杭州，于十二月初间从杭州回苏州，所以他说在杭州“往〈住〉十日有馀，而方启行”。但他又说：“将杭省一并妥周，此时十一年末矣，十二月回稣，卅过年”，却会使人望文生义，误会为是十二月底才回苏州，故考明于此。

④ 叶芸来，广西人，为人极精明强干，多谋善战（据李续宾《克复太湖县城疏》，见《李忠武公奏疏》）。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以功封受天安。庚申十年春，镇守安庆。四月，敌军水陆大举来犯，掘长濠围困安庆，敌人久围不下，乃故撤城围一隅让叶芸来出走。芸来坚持不退，守到辛酉十一年七月，城陷，芸来率领饥军巷战，全军将士二万人都壮烈牺牲。考余一鳌《见闻录》说：“守安庆者耆天义叶矮子。”据此知叶芸来后进封耆天义，为人短小精悍。

来吴定彩、黄金爱^①、朱兴隆^②三将，保天、六之脩。后安省告急，英王奏调其往。后省城〔被〕曾九帅官兵困，后选吴定彩带部军千余人入省助叶、张守省〔之助〕。后英王同刘昌林^③计保集贤关^④，是英王再欲班重〔动〕大军未救。那时章王林绍章〔璋〕、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愿〔顾〕王吴如孝具〔俱〕在同〔桐〕城，有信至集贤关云奉诏〔来〕前未助救安省。斯时我正在呉国州，得悉英王如此如此而为，悉其省不能保也。^⑤英王留下刘昌林、李四福守集贤关之营，英王连夜由集贤关动身而到桐城，将我部将黄金爱令其把尾而到桐城，谁知被钓舖、青草隔〔壩〕、黄坭岗〔黄泥港〕

- ① 黄金爱，李秀成部将，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封佑天安（据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李秀成《给佑天安黄金爱谕》）。后封纪王。癸开十三年八月，随李秀成从苏州救无锡（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九月初七日《无锡大捷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四）。据1980年，福建上杭县南阳公社发现的太平天国墙头组诗，黄金爱于甲子十四年冬，在福建上杭县南阳乡为汪海洋诬害死。案这组墙头诗共十一首。其中有一首道：“杀后有人叹曰：‘卖国求荣大不该，背主无义黄金爱（害人在南□□□□）。昔日不闻杨松事，谁知天父眼恢恢。’”又曰：“上天排定不可强，金爱害死李忠王。意□□清乱天国，谁知被诛在南阳。”据鉴定这组墙头诗确是太平天国战士题的。而考其时间则为太平天国乙好十五年新年，驻扎在南阳乡是康王汪海洋，杀害纪王黄金爱的就是此人。据这首诗，所宣布的罪状是：“卖国求荣”、“背主无义”、“害死李忠王”。但据《李秀成自述》，曾国藩奏报，亲见人如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等记载，以及我们于1951年在南京方山的调查，都无此事。案这个无视法纪的汪海洋，后来正是以诬陷的手段来杀害主帅李世贤的。他也同样是以诬陷的毒手来杀害纪王黄金爱的。
- ② 朱兴隆，广东清远人，加入天地会，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在广东起义，进入江西，归附太平天国，后来封利王。甲子十四年春随侍王李世贤入江西，转战闽、广间。乙好十五年五月，在广东嘉应州叛变（据朱用孚《摩盾馀谈》及左宗棠清同治四年六月廿六日《越境剿贼叠胜并击退闽边窜贼折》，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四）。
- ③ 刘昌林，广西人，参加金田起义，为英王陈玉成部下第一骁将，太平天国庚申十年，论功封靖东主将。辛酉十一年四月，奉命守集贤关第一垒，其他三垒都陷，昌林独坚守不下。敌人打算用水淹，始率将士突围出。不幸到马踏石，溪河汛涨，昌林泅水而过，敌水师追到，被俘，壮烈牺牲。
- ④ 集贤关，在安徽怀宁县城北十五华里集贤岭上（据《怀宁县志》卷一《道光志县境全图》及卷二《山川》）。
- ⑤ 陈玉成留刘昌林等死守集贤关外四垒，目的是扼守进援安庆的要隘。但是，孤垒无援，必无守法。陈玉成以最精锐的军队，放置在死地，实犯兵法的大忌，所以李秀成得悉这一个布置，便预料必败。案胡林翼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十四日《致鲍军门成总镇》说：“得寿山来函，知春霆弟已定于十六日同武臣弟进兵，可胜欣慰！结垒须从石湖尾及于集贤关，作大包裹之形，又须安排六七营作游击雕剿之兵。狗逆弃四垒而自窜于桐城，凡孤垒无援必无守法。此狗逆之以术愚贼，非兵法也”（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八十三《抚鄂书牍》）。同月十七日《复鲍春霆军门》又说：“关外四垒孤悬，围而不攻，十日八日贼必渴死。其米麦薪柴尚足支十餘日，水则难支三五日也”（见同上）。胡林翼的话可与李秀成所论参看。

等处清军知悉，被左〈多〉将军埋服〈伏〉拦杀其军。英王全军过尽，黄金爱押尾，被左〈多〉将军伏兵拦杀，死者千余人，将黄金爱困下田筒水中，死者皆我部下之人，黄金爱至晚，带数百人由水中冲出。左〈多〉将军兵见其死势甚猛，各宜〈皆〉襄〈让〉路，该虽〈乃〉到桐城。后英王又亲自回京求主奔救。那知集贤关被曾中堂发鲍昭〈超〉一军前来，将集贤关刘昌林、李四福之营困打，连打未下。后鲍军将营寨紮好，又作长濠，每日出兵攻打，营中又无火药砲子，粮米亦无，官兵日夜防战，兵困苦多，后被鲍军攻破，刘昌林、李四福具〈俱〉是阵死，全军具〈俱〉没。^①后而无法，英王与辅王、堵王黄文金等再复来救安省。斯时九帅又将皖围困之濠格〈更〉而深垒，屡战不成，此时省城边草〈菱〉湖，又

① 关于安庆集贤关赤冈岭四垒覆没这一役，是太平天国战役上少有的重大损失，因为守垒的军队，都是太平天国久经征战的最精锐的军队，敌人至比之岳州、九江两次战役。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官军围攻赤冈岭贼垒悍贼歼除折》有详细的记载，说：“逆首陈玉成自三月十八日率党回援安庆，候选道曾国荃会同水师凭濠固守，贼不敢逼。旋经臣曾国藩飞调总兵鲍超，臣胡林翼飞调副将成大吉，会合副都统多隆阿之军，进逼集贤关外。陈逆畏惧，于四月初十日，由马踏石潜窜，留四垒于关外之赤冈岭，以梗我师。……其关内十三垒经曾国荃作长濠围之，该总兵等遂得专意攻此四垒之贼。詎料垒中皆系多年悍贼，官军窥探，阒若无人，一近垒边，则枪炮如雨，我军奋怒，拔签填濠，四面猛扑，多被枪炮伤亡，迄不能前。时水师提督杨载福飭水师助攻，亦有伤亡。湖北候补知府周开锡与该总兵等筹商，遂环濠修筑炮台数十座，传令各营兵勇昼夜轮流出队，用枪炮环攻，暂不使一名漏网”（《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案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月初八日。李四福等三垒守到四月廿八日（夏历五月初一日）被陷。刘昌林死守第一垒不下，于四月廿九日（夏历五月初二日），率领将士突出重围，阻水不得渡，全军覆没。曾国藩又记道：“据杨载福咨，鲍超、成大吉咨呈刘玲琳、李仕福、贾仁富、朱孔堂等均系广西老贼，与官兵历年接仗，每次首先冲锋，九年踞守太湖，数月不下，十年二月，逆首刘玲琳自安徽渡江，充作先锋，破我金陵围师营垒数十座，连陷苏、常等郡邑，皆系该逆等为首肆恶等因。臣等查粤逆滋扰以来，虽屡经挫败，然临阵率新掳之众以当前敌，我军所斩长发老贼至多不过数百名。此次陈逆见我大军云集，乘夜潜遁，而留此四垒于集贤关外，原欲牵制我师，且垒中系其平日第一枝悍党战守可恃者，希冀凭坚久抗，以便纠合余党，复来解安庆之围，不料四月十五日陈逆自被多隆阿败于挂车河，四垒之贼虽甚驍悍，而孤守二十餘日，援绝势穷，无计可脱。鲍超、成大吉等昼夜环攻……歼除长发老贼至四千名之多，实为从来所未有。”曾国藩在四垒都被攻陷，刘昌林被俘牺牲后，他疯狂地狞笑说：“今而后喜可知也！”（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七，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七日《致沅弟书》）胡林翼也叫嚣说：“功抵塔忠武岳州，李忠武九江矣！”（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八十三《抚鄂书牍》，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七日《致曾制军》）从敌人的疯狂叫嚣，就可以知道太平天国在这一役所受损失的惨重。据曾国藩奏李四福是投降后被杀的，李秀成说阵亡是错的。

被九帅挖塘堤放砲〔船〕而入拦隔，偷信难通。那时英王陈玉成、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在外，九帅兵隔于内，城内无粮，后被九帅攻破，叶芸来逼死于内，张朝爵坐舟逃生，吴定彩入城助守，全军具〔俱〕没〔末〕，死于大江之中，此城尽没，未漏余人，苦而可叹。^① 那时英王在外，见省

- ① 安庆失守，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廿六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三，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廿五日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安徽巡抚李续宜、福建提督杨载福、福州副都统多隆阿奏说：“安庆围师自七月十三日攻破北门外贼垒后，城贼自是日蹙。狗逆陈玉成纠合伪辅王杨逆及洪逆、朱逆等共四五万人，于十六、七、八、九等日，陆续入关，在关口毛岭、十里铺一带扎营四十馀座，散布山冈，城贼亦列队西门，遥遥相应。二十日，该逆出全队扑我后濠，分十馀路而来，其扑西北一隅者势尤汹涌。我军不动声色，俟其逼近，始以炮枪轰击，毙贼无数。二十一日，仍猛扑如前。次日，我军修筑炮垒一座，占住要地。而毛岭、十里铺及关口之贼倾巢齐出，其扑中路者约万余人，直至新垒之下。我军以枪炮三面夹击，伤毙之贼，尸满田陇。狗、辅两逆酋复亲自督阵，贼退即挥刀砍之，猛扑十馀次。我军新营已成，贼始却退。未几，而后队之贼，仍大呼齐进。曾国荃督率各营并力稳击，自夜达旦。其犯西北两路者亦猛扑数次，经彭毓橘等击退。是役也，相持半日一夜之久，贼之精锐实伤毙三千馀名，援贼凶锋大挫。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每夜轮扑后濠。各营均严为戒备，水师亦由盐河口开炮横击，毙贼不少。该逆既屡挫于西北，又欲从中路冲突，因于菱湖北岸陆续筑垒十馀座。二十九夜，贼以大队扑垒，而暗用小划送米入城。蔡国祥率炮船阻截，概行抢夺。其扑水边营垒者，亦经朱洪章等击退。三十日，曾国荃于菱湖南两岸扎营四座，派人驻守，与水师互相联络，贼划愈难出入。城中米粮尽绝，贼益慌乱。逆首张朝爵等将由水路逃遁。适我军所挖地道业已开竣装药，五更火发，轰塌北城墙垣。曾国荃分派队伍登城，与水师两路夹击。西门二垒之贼，经后左、副后、振字、义字各营杀尽。东门之贼，经新后、吉左、湘恒、智字、长胜各营杀尽。北门正街一路之贼，经中军严字、制字、和字、护军及马队各营杀尽。其从百花亭逾城逃出之贼，经水师营官万化林、蔡国祥派队杀尽。众贼首均死于乱军之中。八月初一日卯刻，克复安徽省城。其菱湖援贼数垒，亦经长胜、吉左、智字各营攻扑焚烧，杀贼千馀。陈、杨各逆，见我军攻克城垣，俱为胆落，退遁集贤关外。”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记也有详细的记载。他记道：“下午咏如同梁溪大令来。二君自皖至此，言皖事甚详。前月中旬，援贼至石牌，进扎集贤关。二十日、二十一日，扑东门外长濠。二十二日巳刻，大股扑西北长濠，人持束草，蜂拥而至，掷草填濠，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衢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壕墙旧列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调增抬鸟枪八百杆，殷雷之声如连珠不绝，贼死无算，而进不已；积尸如山，路断，贼分股曳去一层，复冒死冲突；直攻至二十三日寅刻，连扑一十二次。攻方急，一勇掷火包，线长未燃，被拾起回掷。时我濠内遍地火药，包发轰燃一二处，守者皆溃，奔退十馀丈，贼过濠者已七八人。统领曾观察国荃见事急，亲下斫贼数人倒地，溃卒见统领自战，皆复返，枪炮复续，贼见不可攻……前队之众已尽乃退，凡苦战一日一夜，贼死者万数千人，我军死者百余人，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是时城外贼之陆营先已尽夺得，沿江炮台，亦为水师陆续攻取，内贼已在掌握，惟专力御外而已。七月杪，北门地道成，晦夜四鼓……薄城西北门，缘城而升，城破，会地道亦发，我师蜂拥而入，守贼皆饿倒，不能抵御。……杀贼凡一万馀人，男子髻齿以上皆死。……贼绝粮已久，通城惟伪目张朝爵私藏（转下页注）

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黄、宿之兵尽退，上野鸡河^①，欲上德安、襄阳一带招兵。不意将兵不肯前去。那时兵不由将，连夜各扯队由六安而下庐（庐）州。英王见势不得已，亦是随回，转到庐（庐）城，尔言我语，各又一心。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戡权^②，心繁（烦）意乱，愿

（接上页注①）米五石余于屋顶，余处俱无颗粒。……城将破，援贼见火起，尚来扑围二次，不得进，越日始退。计是役前后阵诛贼不计外……共死三万余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是之酷者矣。”清军攻陷安庆，进行疯狂的屠杀。王维周译吟《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说：“清军入城后，滥肆屠杀，男女老少和平居民尽被戕害。他们的被剁碎的尸体，飘浮在扬子江中，顺流而下。我曾亲眼目睹被这批残暴的恶鬼乱砍成数块的尸体，成百上千地挤满江中，当时两艘在江上航行的江轮总督号和迦太基号为之阻塞，难以前进”（见第十二章）。简又文译富礼赐《天京游记》也说：“前在安庆，清军大杀三日，全城男女老幼无一存留，长江为无首之尸所填塞。”所以李秀成说：“此城尽没，未漏余人，苦而可叹。”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守在上游，在武昌、九江失陷之后，以安庆为唯一屏蔽。七月廿六日安庆既失守，廿八日（夏历八月初三日）安徽桐城撤退（据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廿九日官文、曾国藩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三），卅日（夏历八月初五日）安徽池州撤退（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十日《水师克池州府城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四），八月初一日（夏历八月初七日）安徽舒城撤退（据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夏臻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四），初二日（夏历八月初八日）安徽宿松、湖北黄梅、蕪州撤退（据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官文、胡林翼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四；八月廿九日官文、曾国藩奏蕪州撤退在夏历八月初九日），初五日（夏历八月十一日），湖北广济撤退（据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官文、胡林翼奏），初六日（夏历八月十二日）安徽铜陵撤退（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克复铜陵县无为州等处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四），十八日（夏历八月廿四日），湖北黄冈撤退（据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卅日官文、李续宜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五），九月十三日（夏历九月廿日），安徽无为州撤退，十六日（夏历九月廿三日），安徽运漕镇撤退，廿二日（夏历九月廿九日），安徽东关撤退（均据曾国藩《克复铜陵县无为州等处折》，廿四日（夏历十月初一日），湖北随州撤退（据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廿一日官文、李续宜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七十七），安庆上下游各据点，都陷于土崩瓦解的地步。明年四月，敌人就长驱进犯到天京，再过两年，天京失陷，所以安庆的失守，实决定了天京不可能再长期坚持下去的形势。

- ① 野鸡河，在安徽英山、太湖。胡林翼《札各营及各委员》说：“金守、余参将之转运，除已由天堂陆续发运各件仍飭赶紧运送外，应札改循英山、太湖野鸡河、龙溪、罗溪河送至大营”（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八十六《抚鄂批札》）。
- ② 关于英王陈玉成被革黜事，陈玉成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致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等书》说：“去岁耘天燕之案，曾经兄直奏回朝，致触圣怒，复命敬王、畏王恭捧圣诏三道，圣旗一道，责兄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又失挂车河之约，致章王退桐城、庐江、无为、三河等处，皆罪在兄。现已荷蒙圣恩，出以赏罚革黜。思处境之时，亦是万幸。”耘天燕之案不详，据陈玉成同日《给马融和、倪隆淮等谕》说：“今兄因偶尔见朝中办事不公平，兄在庐郡具本启奏，现下不以本章为然，小事酿成大端”，知是一件朝内处理得不公平的事。由于陈玉成直奏回朝，触了天王的怒，就把战败的罪过一并算起了，予以革黜。陈玉成这两封函件所表现的情绪，可与李秀成此处所说：“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戡权，心繁（烦）意乱”的话参看。

老于庐〈庐〉城，故未他去，坐守庐〈庐〉城，愚忠于国。后曾〈多〉帅奔兵而未困，被逼不甚〈堪〉，又无粮草，久守不能，将兵之心已有乱意，故未稳坚，而失庐〈庐〉郡^①，失将失兵，无计可施，而逃寿春，被苗佩林〈苗沛霖〉^②反心获捉，送解清营，是以而亡^③，此之为也。自英

① 陈玉成失庐州郡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即清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据清同治元年四月廿六日袁甲三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二；同月廿九日官文、曾国藩、多隆阿奏，见同上书卷三百三）。

② 苗沛霖，安徽凤台县人，以秀才办团为练长，称霸一方，初受清朝官职，保至四川北道，督办安徽团练。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通款太平天国，封为秦王，据安徽寿州。壬戌十二年春，清朝兵部左侍郎胜保督师皖、豫，苗沛霖又暗通胜保，要诱捉英王陈玉成。他上禀陈玉成，请求陈玉成到寿州去，他帮四旗人，一旗三十万人，攻打汴京。且说：“孤城独守，兵家所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陈玉成一向认为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都为我，就可以渡河直捣燕京。苗沛霖的话，正打中他的心愿。庐州被围急，于是从庐州撤退，走入寿州，遂中苗沛霖毒计。苗沛霖捉了陈玉成，解送清营。希望清朝赏他的大功，不料清朝只免治他的罪而没有赏他的功，后来又要他解散团练。苗沛霖不从，围蒙城。癸开十三年十月，清朝亲王僧格林沁带兵来救蒙城。陈玉成亲兵二人，乘苗沛霖势败，把他杀死，替陈玉成报仇（据张瑞堉《两淮戡乱记苗逆叛迹本末》，《剿平捻匪方略》卷三百六，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僧格林沁、国瑞、富明阿奏，薛福成《庸盦文续编》卷下《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案张瑞堉记太平天国封苗沛霖为“扫北王”，此处据王定安《贼酋名号谱》，《文献丛编》第二十二辑袁甲三奏同作奏王）。

③ 清同治元年四月廿八日兵部左侍郎胜保奏陈英王陈玉成被执事说：“粤逆陈玉成逃出庐城，势将他窜，臣即密飭苗沛霖扼要截剿，毋令占踞寿城……若能擒获首逆，非但建立奇功，更可自明心迹。四月十七日辰刻，陈逆率其死党三四千人窜至寿州城外东津渡地方。苗沛霖密派伊侄苗景开前往下蔡一带相机料理。苗景开即先至寿城密令投诚粤匪余安定开门迎接，使之不疑。陈逆入城，见余安定伏谒道左，遂带亲随悍贼二三千人袒怀入城。苗景开等候其进城，即将钩桥撤去，余众阻隔城外。陈逆心生疑惧，顿欲出城。苗景开即会同署寿春镇游击朱佩芬会齐兵练突起拘执，立即捆缚。并将伪导王陈仕荣、伪从王陈得隆、伪王宗统天义陈聚成、伪主将向仕才、伪王宗虔天义陈安成、伪裨天义梁显新及其亲随伪官二十余人同时就擒。……臣接禀后，驰回郡城，派委副都统常海、总兵傅崇武等带领马步三千名驰赴江口集，将该逆押解到营”（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三）。刀口余生《被缚纪略》记英王陈玉成被执事说：“闻英王到寿州，苗天庆将所带之人安在城外驻扎。出庐州十餘万人，至寿州仅二千餘人。请英王进城，英王所居宫殿，华丽已极。苗沛霖未敢与面，至晚候饭换第三酌面时，苗天庆戴着蓝顶花翎出来行礼，跪禀英王云：‘叔父看清朝洪福过大，祈英王同享大清洪福。’英王即将酌子扯了，指云：‘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颗草，风吹二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势已至此，看你如何发落！’所带仆射及六部各丞相皆欲动手，英王云：‘可以不必。’第三日，苗将英王送与胜保。胜保坐中军帐，旗帜枪炮排列森严，凡带兵营皆要站班，耀武扬威。升坐，叫英王陈玉成上来。英王上去，左右叫跪，大骂云（指着胜保）：‘尔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塌尔二十五营，全军覆没，尔带十餘匹马抱头而窜。我叫尔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转下页注）’

王死后,其部将悉归我掌,见势不能,过南不得,后调陈得才来至稣省,当面订分,令其上去招足人马,廿四个月回来解救京城议定事。今许久尚未回来,虽言〈然〉疏疏有信回报,来往甚难通信,故而今日之悞事也。^①

五 国势崩败(原稿四十七至六十三页)

此段说过,再将十一年克浙江之后,十三〈二〉年回转稣州,那时我尚〈上〉江西、湖北招兵之时,将稣州、浙江嘉兴军务民务交陈坤书,我方而去。后十二年回到稣省,民已失散,房屋被拆不甚〈堪〉,良民流凄〈涕〉未稟。那时陈坤书自愧对我不能,我由杭州回到嘉兴,其在稣州业带自队逃上常州,将常州自霸,使尔而买作护王。此人是我部将,因其乱稣州百姓,忌〈惧〉我治其之罪,故而买此王而据〈拒〉我也。^②自收浙省以来,以及英王之队归我

(接上页注③)物件!’骂罢铺垫而坐。”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清代野记》卷下《胜保事类记》里,述他的父亲张承涛当时在胜保幕府得亲见其事并往见英王的事道:“伪英王陈玉成自安庆为曾忠襄所败,全军皆没,穷无所归,走凤阳投苗。苗匿而不见,使其侄天庆缚献于胜。时胜驻军于河、陕之交,得陈大喜,克日亲讯,盛设军卫。陈立而不跪,大笑曰:‘尔乃我手中败将,尚颀然高坐以讯我乎!’因历举与胜交绥事。胜大惭,命囚之。铺张入奏,冀行献俘大典以矜其功。批答反斥其妄,并命就地正法,大失所望,遂切齿于曾氏矣。陈之囚也,有精舍三椽,陈设皆备,环以木棚,兵守之。先君子与冯鲁川、裕朗西皆往见。貌极秀美,长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点,此四眼狗之称所由来也。吐属极风雅,熟读历代兵史,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裕举贼中悍将以绳之,则曰:‘皆非将才,惟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无一语及私。迨伏诛,所上供词,皆裕手笔,非真也。”胜保把英王解送北京,行至中途,清廷命就地处决,遂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廿三日(即清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就义于河南延津县的西教场(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七,清同治元年五月廿四日河南巡抚郑元善奏)。英王陈玉成年十四,在广西随天王起义,转战大江南北,少年英雄,蔚为太平天国后期柱石,不幸死于奸匪之手,时年二十六岁(据《英王陈玉成口述》)。

- ① 案清同治元年八月廿三日多隆阿奏说:“南阳之贼,探知我军志在援秦,无暇回剿,遂徘徊于镇平、南召之间,迨援师全队入关后,始駸駸西犯。臣于八月初八日,进扎商南,连接浙川厅马筴乾五次飞禀,发、捻率党数万,直扑城下,并扰及荆子关一带,势甚危急,请兵援救。臣查此股粤匪伪扶王陈得才等纠合豫捻约有悍贼三万有奇。春间由楚入陕,原拟大肆扰害,旋因狗酋陈玉成饬调回庐,是以率党出关,道经随、枣,侦知我兵已克庐郡,狗逆伏诛,遂苍黄失措,无穴可归,狼奔豕突,窜扑南阳”(见《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五十五)。李秀成说:“调陈得才来至稣省,当面订分”,正是这时候的事。
- ② 李秀成此处记陈坤书带部队从苏州逃上常州,是在他“由杭州回到嘉兴”时。考与奸宄作联系工作的清朝官员吴云《致周韬甫主政腾虎书》述辛酉十一年冬那一次(转下页注)

之用，黄文金、刘官芳后入（由）我辖，天王见我兵多将众，忌我私心，内有佞臣之弄，封陈坤书为王，分制我势，我部下之将，见此各心不分（忿）^①，

（接上页注②）阴谋作乱事说：“当忠逆窜围杭州之时，李、熊均奉伪令往杭，至十一月初四、六两日，先后托故回苏，即与徐氏兄弟密约举事，徐董于初九动身，十三至沪，力陈忠逆在杭，陈逆赴江北（即陈坤书，曾至东西梁山，复折回窜扑镇江，现闻在丹阳，此悍贼也），苏城党类，大半李、熊心腹，正可乘隙进攻，必能得手。惟欲先筹军饷十数万，以备临时举事为各项经费。大府持重，决意复绝。徐董留沪旬餘日，再四恳求。有援伐魏救赵之策，向大府丛愚，因发军火银二万两，徐董即匆匆购备，于廿七日回去，出吴淞口，由常熟进口（此钱姓所踞之地），风逆直于十二月初五日始到。当即齐集民团添募枪船，遂日冠带点名（可谓大谬，作事之粗疏如此），毫无顾忌，人数过众，既需时日，而又不能慎密，事机大露，以致无锡、崑山、苏州一带各贼卡贼馆伪官逃匿一空（时已得杭州被陷信，谬谓忠逆必不能即返）。原约十二月十九日举事，旋得李、熊信，云忠逆即欲回苏，改为十六夜间。传单甫发（传单为调各路民团），而忠逆前队已于十六清晨赶到矣。事遂中阻，忠逆到苏，即发伪谕到各卡，凡永昌徐氏船只过往，一概拿解（陈墓乡董昨有密禀到来，故知其详），远近民团无不惊骇，谓大祸即在顷刻矣。乃越日，忽又有伪谕，谓徐某之剃头赴沪，系为采买军火解往杭州（其时杭州未陷），以备攻打之用，早经禀明办理，各卡馆未悉根由，见徐某剃头误会有异志，以致群相疑惧，现已查明，无庸再究，徐氏船只仍照常放行。此绝大破绽，居然瞒过。此必熊、李从中播弄。然忠逆岂竟形同木偶，为熊、李玩弄股掌之上耶？此中实在底细未能尽悉。惟熊、李、钱联为一气，合四人所部实三四万人，忠王见其人众，亦未敢轻以下手，此说亦似近情”（《两樞轩尺牍》卷十二）。案李为李文炳，熊为熊万荃，徐为苏州永昌恶霸地主徐少藩，钱为钱桂仁。据吴云所记，陈坤书在李秀成从杭州回苏州前一个多月已经离开苏州了。案吴云分明说奸宄徐少藩等是因为李秀成攻杭州，陈坤书离开苏州，苏州军队大半是李文炳、熊万荃爪牙，又有守常熟的钱桂仁与同谋，合李、熊、钱、徐四人所部实有三四万人，所以才敢“乘隙”谋作乱，而由徐少藩亲到上海与清军联络筹饷筹械。如果如同李秀成所说，陈坤书是在他“由杭州回到嘉兴”的时候才带队伍逃上常州的，那么，徐少藩何得有力陈忠王在杭，陈坤书赴江北，“正可乘隙进攻”的话。李秀成此处所记陈坤书带部队擅离苏州的时间是有误的。又考龚又村《镜雅轩自怡日记》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廿日记事说：“钱伪帅赴苏，祝陈主将寿，又贺其升七天将衔。”知陈坤书当辛酉十一年八月仍在苏州。他当是这年九、十月间，李秀成从湖北回军围杭州时带部队擅离苏州的。又关于李文炳、熊万荃、徐少藩等谋乘隙在苏州作乱事，是一件大事。李秀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在奸宄们预定作乱的当天清晨，先头部队就赶到了苏州，使奸宄不敢发动。李秀成回到苏州，把李文炳调往崑山，熊万荃调往海盐。后来到时机成熟，就把李文炳、徐少藩杀了，李秀成对这批奸宄的策略也是很英明的，故因注陈坤书带队擅离苏州的时间，特详考其事于此，以补《李秀成自述》所未备。

① “各心不分（忿）”，后面记天王封王事又说：“天王再而复思，又见各旧功臣久扶其国，心不分（忿）意。”案“不忿”，就是不服气。《东周列国志》第八十回：“子胥见吴王忘仇待敌，心中不忿，不肯入坐，拂衣而出。”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第二十三回目“郗哥不忿闹茶肆”，都是作不服气和怨恨解。唐朝人李端《闺情》道：“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鹊喜声。”知这一个辞由来已久。而至今广西潯州、梧州一带的方言中表示不服气时也用“不忿”这一个辞。

积恨于心。^①那时主见我部辖百餘万众，而何不忘我乎！稣省之民，又被陈坤书扰坏，后我回省，贴出为民之米，用去甚多，各铺户穷家不能度日者具〈俱〉给本米，田家未种，速令开耕。舜本其用，苦种之家，无米舜粮。当三月之后，我在省时，斯民概安，仍言〈然〉照旧，舜米式万餘担，舜（钱）十万餘千。舜此米之后，百姓安居乐业，后丰足之时，各民愿仍将此本归还，我并不追问，其自肯还我也。后又将郡县百姓民粮，各卡闾之税轻收，以酬〈酬〉民苦。后见京中之事，日日变故，日日变动不同，屡具本奏主，格〈更〉不从奏，日〈越〉奏日〈越〉怒，又适佞臣弄章。我见屡奏不从，我心亦有不说之意，君臣各有私怒之心，日〈越〉是明奏，天王日〈越〉格〈更〉不信，具〈俱〉将天话逼来，降我之戢，暗中密革我权。我手下部将见此，其心不服，未有战心，各筹一路。乱政乱规者，主见我兵权重大，總计分革我权，童容海乃（归）我部将，一片之心为我，后被谗惑，而辈〈背〉（而）我逃，此是王次兄之弄奏，欲归其辖，暗放遥〈谣〉言，童容海他心者，因此之由也。^②

① 李秀成说天王忌他权大，乃封陈坤书为王来分制他的权势，这确是当时天王集权的一种政策，但结果却使内部散漫不可收拾。李鸿章论天王欲制御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诸人，“乃增封多王，以间其党，而内乱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的话（见《朋僚函稿》卷一清同治元年七月初九日《复彭雪琴侍郎》），可与李秀成此处参看。

② 童容海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即清同治元年六月廿日，袭陷广德州叛降于清将鲍超（据同治元年七月初二日曾国藩《童容海投诚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六）。案《吉庆元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本章》，陈述他们与童容海在广西起义脱离石达开归天京，童容海在半途暴虐凶残，杀害同僚，夺取领导权的事。沈梓《避寇日记》清同治元年三月日记有童容海在杭州因争权内讧、放火烧杭州出走的事说：“杭城之破也，伪主将童姓之功为多，而伪忠王李……保举为朗天义陈功，与童先后升为王，童为宝〈保〉王，陈为听王，李乃以仁和地属之，令陈与童同守城，而已自回苏。伪僚天安邓姓者，亦在忠王统下，与守杭城，专司启闭。壬（戊）年正月，伪听王出兵打松江，邓守管钥如故。童之兵甚骄，恐不得横行出入。童既以功大赏薄而怨伪忠王之抑也，又以权分势夺而受伪僚天安之节制也，于是大怒，诡云奉令将打江西，而悉其兵以行，遂大纵火烧城中民屋殆尽，自廿六日至初四日止，火光烛天者八日，屠田市以南皆可望见，至城外乔思里等处亦被延烧，童既引兵出城，未尝往打江西，仍在餘杭韩陵埠等处屯兵，大纵劫掠云。”丁葆和《归里杂诗》也有“顷刻内讧童主将，缚人拔队出杭城”之句。又考曾国藩《童容海投诚片》记其事说：“伪保王童容海骁勇善战，本系石达开死党，上年由汀州入浙，转隶李秀成队下。此次来援宁郡，屯众数万于孙家埠，与官军未开一仗。旋遣人具稟乞降，称与群贼有隙，愿取郡城，缚叛逆以献。”据此，这一个叛徒营私为己、暴虐凶残的本质昭然可见。他的叛变，不会是由于听了谣言，惧祸而然的。李秀成此处所说的话，是有所为而发的。

我十二年在省往〈住〉有四月之久，然后有巡抚李鸿章（巡抚）^①到尚〈上〉海接薛巡抚之任，招集洋鬼，与我交兵。李巡抚有尚〈上〉海正闹，税重_水多，故招鬼兵与我交战。其发兵未破我嘉定、青甫〈浦〉，逼我太仓，昆〈崑〉山等县，告急前来，此正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间，见势甚太〈大〉，逼不得已，调选精锐万余人亲领前去。此鬼兵攻城，其力甚足，嘉定、青甫〈浦〉到省一百餘里，其攻城，尔外无救，五六时辰，其定成功也。其砲太利害，百发百中，打坏我之城池，打平城池，洋枪砲连响，一踊直入，是以□^②我救不及。接到惊〈警〉报，当即启兵，救之不及，失去二城。^③该鬼兵即到太仓，即而攻打，外有汉军而未，助其〈渠〉之战。打入城者，鬼把城门。凡见清官兵，不准尔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渠〉带尽，清官兵不敢与言。若尔清朝官兵多言者，不计尔官职大小，乱打不饶。^④至我天王不肯用鬼兵者，因此之由也。有一千之鬼，要押制我万之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也。那时鬼兵已至太仓开仗，我亦到未，外有清兵万余众，鬼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四境〈泗泾〉^⑤、青甫〈浦〉、加〈嘉〉定、保〈宝〉山、尚〈上〉海连未大小营寨一百餘座，城城具〈俱〉有鬼兵守把。我到太仓，当与其〈渠〉见仗，两边立阵迎战，自□^⑥至午，胜负未分，两家受伤千餘

① 李鸿章于清同治元年三月在上海接江苏巡抚薛焕任。

② 原稿在“是以”下，有一字认不清，故用□代。

③ 嘉定失守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三月廿日，即清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青浦失守在同月卅一日，即清同治元年四月十四日（据李鸿章清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查明克复青浦情形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一）。

④ 李鸿章《上曾相》述洋兵事说：“与官军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见《朋僚函稿》卷一）。清同治二年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述洋兵在浙江的横行说：“绍兴府城因贼窜收复，杀贼无多，乃洋勇入城，复搜括在城米物，据为己有，勒派绅民变价，否则运而之他。官绅往与力争，几遭反噬。萧山贼遗财物亦悉被席卷而去。其官军之先入城者，复被洋鬼遍身搜索，兵勇皆积怒而未敢言。洋人在内地强横之状，实有不可以情理论者”（见《左文襄公书牍》卷六）。嘉定黄宗起《知止齋诗录》卷一《鬼子来五章纪壬戌四月》事也说：“鬼奴不知何等级，乱捶官吏如舆台。”这些资料，说明了当时外国侵略者的横行霸道，也说明了清朝统治者的奴隶相。

⑤ “四境”为泗泾的音讹。案李秀成此处所说的泗泾为镇名，在江苏娄县，为从松江赴上海的要道。王步青《见闻录·泗泾纪事》说：“泗泾镇在松江府城东七十里，乃娄县所管辖，为赴上海之要道，一巨镇也。”署松江府知府吴云《上吴煦书》说：“泗泾、七堡系由松江北门至沪要路”（见吴煦档案）。《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一《历代兵事》也说：“泗泾者，入上海之要道也。”

⑥ 原稿“自至午”这一句，在“自”字下应有一字，大约是“辰”字，曾国藩即从原稿上用硃笔加一辰字。但从辰时至午时中间尚有巳时，李秀成这一漏字，也可能是巳字，故用□代。

士卒。次早又立阵于东门，开兵大战，[自]辰至巳，力破鬼阵，当斩数百，追其下水死者千馀，当破清营三十馀座，得其大砲洋枪不计其数。^①次早行军，即追其尾，困其〈渠〉嘉定城中之鬼，未得出来。尚〈上〉海来救之鬼，是广东调来之鬼，立即未救嘉定这城鬼子，由南翔^②而来，当与迎战，两阵并交，连战三日，具〈俱〉是和战，两家伤二三千人。那时见不得，飞调听王陈炳文带万馀众到，当即再与交锋，一战鬼兵大败，又斩千馀。其救嘉定未得，其追逃，被我追杀其大半，克复定城^③，派官把守，即下青甫〈浦〉。又将青甫〈浦〉鬼兵困稳，外又有松江洋鬼及尚〈上〉[海]再调来救其甫〈浦〉县，用火舟而未解救，此之天意从事，我早檣〈架〉大砲等他，此正火舟来之候，不意我亦开砲打他，初一砲正中其舟，其火舟烧起，其救未〈末〉由^④，其甫〈浦〉城鬼兵自行退去^⑤，自惊下水而亡数百馀鬼子。下路^⑥地方，动步皆水，实难行，有惊〈警〉急之事，错步性命难全，是以鬼兵惊退下水而亡，因此之来由也。收得青甫〈浦〉之后，顺攻四境〈泗泾〉之营十馀个。自四境〈泗泾〉至下到松江以及太仓而末，大小营寨一百三十馀营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营亦已攻开，独松江一孤城，城内是鬼子所守。^⑦次日又有尚〈上〉海来救之鬼用舟莊〈装〉洋药洋砲千馀条而

① 李秀成太仓州之捷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即清同治元年四月十九日，李秀成抄袭清朝知府李庆琛后路，覆其全军五千人于城东板桥（据清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李鸿章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四）。

② 南翔，镇名，在江苏嘉定县南二十四华里，为县南要冲。

③ 李秀成克复嘉定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即清同治元年四月廿八日（据李鸿章清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西兵退出嘉定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一）。

④ 青浦是常胜军华尔分守。李秀成既来围，华尔从松江来救。据李鸿章上奏清政府说：“华尔于初一日带火轮船两只往解青浦之围，初二日用大炮轰进贼卡，不料开至第四炮，忽然炸裂，贼二万馀蜂拥而来，只得暂行收队。”（见李鸿章《西兵退出嘉定折》）案李鸿章所说的初一日是清同治元年五月初一日，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所记华尔轮船炸裂致败事与李秀成所记同。惟李秀成说是太平军打中，李鸿章却说是华尔自己放炮炸裂。

⑤ 太平军克复青浦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廿九日，即清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先一夜华尔率常胜军精锐由炮路冲入青浦，焚烧米粮船只，救城内守军没命地逃出。太平军截击，把守城的常胜军副领队法尔师德（E. Forrester）擒获（据李鸿章清同治元年五月廿七日《松郡解围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一）。

⑥ “下路”指苏、松、杭、嘉、湖一带，系对长江上游而言。干王《洪仁玕自述》说：“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是其证。

⑦ 松江是华尔常胜军所守，李秀成进围松江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即清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据李鸿章《西兵退出嘉定折》）。

末，经我官兵出队与其迎战，鬼败我胜，将其火药洋砲〔洋〕枪为我所有。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渠〕即败^①，将松江困紧。正当成功之时^②，曾帅之军已由上〔而〕下，破我无〔芜〕湖、巢县、无为、运漕、东西梁山、太平関一带，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声〔势〕，而〔直〕至金陵，逼近京都。^③

那时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捧诏到松江追我。诏甚严，何人敢违，不得已，将松江兵退回^④，未攻此郡，因严诏之逼。然后转苏州，与众将从长计议，万难周全，知曾帅之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彼〕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我总是解粮多多回京，将省府财物米粮火药砲火具〔俱〕解回京，待廿四只〔个〕月之后，再与其〔交〕战，解京围，其兵久而必随〔惰〕，而无闘战之心，然后再与其战等议真情。知曾帅之兵，初末之势，锐精之雄，这鼓气莊〔壮〕，我不肯末争。正当议楚，应欲举行，天王又差官捧照来推〔催〕，诏云：“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仰莫

-
- ① 李鸿章上奏清廷说：“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所慑，从此不肯出击贼”（见李鸿章《西兵退出嘉定折》）。左宗棠复曾国藩信也说：“青浦、嘉定二处，发逆麇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六，同治元年六月廿二日《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案“发逆”、“长毛”都是清统治者称谓太平天国的名词。据左宗棠自供说，外国侵略者畏惧太平天国正同他们一样，这就可知当时太平天国的武力是如何地在威慑着清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
- ② 李鸿章《上曾相》说：“上海或可保，青浦、松江恐站不住”（见《朋僚函稿》卷一）。李鸿章《复曾沅浦》又说：“松江危在旦夕，沪防戒严”（见同上）。
- ③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清同治元年三月廿日）失安徽巢县，三月初九日（清同治元年三月廿二日）失安徽和州，三月十一日（清同治元年三月廿四日）失西梁山（据曾国藩清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克复巢县和三城并铜城闸等隘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五），四月初七日（清同治元年四月廿一日）失金柱关、东梁山，四月初八日（清同治元年四月廿二日）失安徽芜湖（据曾国藩清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克复太平芜湖两城折》，见同上书卷十六），四月十八日（清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敌军遂进犯天京，逼扎雨花台（据曾国藩清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官军水陆并进叠克要隘驻军雨花台折》，见同上）。案李秀成说的在东西梁山附近的太平关，就是安徽当涂县的金柱关，考曾国藩《克复太平芜湖两城折》说：“自逆匪窜踞金陵，以芜湖为屏障，以东西梁山为锁钥，尤以金柱关之伪城为关键。”又说：“伏查太平府属莫要于芜湖一城，尤莫重于金柱关一隘。自攻夺此关，未逾三日，上下各城要隘，悉为我有。从此全局一振，上而宁国，下而金陵，均有可乘之机。”据此知李秀成所说的太平关即金柱关，并知它在保卫天京所具的重要性。又案安徽无为州、运漕镇的失守，系前一年的九月间事，已注于安庆失守节内，并非此时事。李秀成因记敌人进犯天京，所以一并叙述于此。
- ④ 李秀成从松江撤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即清同治元年五月廿三日（据李鸿章《松郡解围折》）。

仕蔡〈睽〉^①专推〈催〉起马，启奏朕知。”诏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计议调抽兵马起队前末。^②主逼如此，无心在扬〈阳〉，稣、杭之事，概交各将任，我少管理，连母亲以及家眷概交与主为信，表我愚忠。

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部一本，又好笔一枝，此笔破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笔坏不能，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承〈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业今前部已呈，而今由此凑上合章，恐有言语在昨日所呈之部，语句两不合章，烦各师爷劳心，将前部鉴对，凑合成全，好呈中堂玉鉴，中承〈丞〉大人惠觉〈览〉，恐有违忌字样，亦烦改除。成自幼〈幼〉本未读书，认字不周，不知忌避。现今所呈之前后，不故〈过〉在国

① 莫仕蔡〈睽〉，广西平南县鹏化里高楼村人，初任殿前侍卫。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任忠诚伍天将，后封补王，任天朝刑部事。天京陷后，不知所终。

② 李秀成从松江回苏州后，于五月十一日、六月廿五日召开两次军事大会，集议全局，并刊有《会议辑略》一书。曾国藩清同治元年九月廿日记说：“接沉弟十六、七信，尚属平安，中有伪文数件，知贼之来援金陵，曾于五、六月大会二次，集议全局，并有刊刻《会议辑录》一书，伪忠王亲为之序，乃知贼中处心积虑以求逞于我，而我或轻心深入，率意浪战，其尚未到溃败决裂，实天幸也”（见《曾文正公手书记》）。许瑶光《谈浙》所记更详，他说：“同治元年四月，曾沅圃率水陆诸军……水师泊护城河，陆师逼扎雨花台，洪逆窘迫，求救于李秀成。时秀成踞苏州……于五月十一日纠集伪听逆、纳逆、慕逆、孝逆、航逆、相逆暨蔡、汪、吉各伪主将、刘伪天将会议。旋于六月廿五日又纠补逆、襄逆、奉逆、堵逆、首逆、来逆会议，拟合侍逆、护逆共十三伪王，号称六十万，于闰八月廿日至十月初五拼死环攻我湘军大营，以图解金陵城围。……秀成是举，纠合诸逆……予尝于昔中获其会议伪书……伪书中云：‘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必须联万心而作一心’云云。”案《李秀成自述》知会议原定的战略本是打算不战而老敌师，天王不听，严诏催逼，不得已，始作战计。就当时敌我形势而论，李秀成指出：敌人从长江上游直下，控制了长江，我无水师，我劳彼逸，水道难争，故定计将苏福省米粮军火尽量解回天京，用坚城来牵缀敌军，待过两年后，敌军久顿坚城，师老力疲，必无斗志，然后才可以一战把它打垮。这本是太平天国惯用的制胜敌人的战略。胡林翼就曾经警告过曾国荃说：“林翼之愚，谓从此东征之师，处处为坚城堡垒所阻，一年二年求一战而不可得也。贼情于近三四年凡遇名将强兵皆以此法制我。彼作活局，作守局，而能使我军作钝局，改为攻局围局也。积日累月，情见势绌，彼乃起而乘之，往事可鉴，伏望深思！”（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七《抚鄂书牍·复曾沅圃观察》）他指示部将多隆阿也说：“发逆自粤西起事以来，每以坚城堡垒牵缀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狡焉思逞。故贼日见其多，兵日见其少。贼处乎有馀，而我转处于不足。善乎李左车戒韩信之言曰：‘顿兵城下，情见势绌’，实为古今不易之论”（见同上《致多都护》）。因为敌人被牵缀在坚城下便变成了被动，而太平天国就可以操主动权，向敌人无兵及兵弱之处进攻，并且可以等待敌人被牵缀在坚城之下的名将强兵到了师老力疲的时候，一举而把它消灭。《孙子》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见《虚实篇》），又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见《形篇》）。太平天国这一个战略，正和《孙子》这两条兵法相合。胡林翼极怕这一个战略。李秀成此处对付曾国荃进犯天京的战略，就是发挥这一个思想，实为当时最优良的对策，可惜天王不听，遂使良谋硕算，化为灰尘。

日久而知，成生之在世，见过而知，不知不及。今呈前后之大概，记得而自陈，自成知情之事，具〈俱〉一全登，少何^①失漏，不知者不便及也。此之言语，是我秉直之心，应言之事，不问自详。今自愿所呈此书，实见中堂之恩情义厚，中承〈丞〉恩容，佩服良谋，我深足愿。所作之书供，定由列位师爷手过，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今凑前部入写。

自奉严诏，不能再辞之后，计议抽调各处官兵，择日起马。主逼甚严，我亦无心在世，不故〈过〉见我母六十餘旬〈岁〉，育我之〈至〉大，是以曲而就之。见势如此，亦知不能久图，主不修德政，尽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对天。后将稣、杭军务概交各将管理，然后连我母亲以及家眷一并回京，交主为质，寸表我之愚忠。所交合家与主为质，因其降诏，命其亲使捧诏前来，面责云我之不忠，云我有自图之意，朝臣劝我，不得不从。一朝之大，亦有好友，亦有不情，人心是肉，劝化多言，而心自遂。心虽不欲佐理，国中之将，兵是我多，牵牵缠缠，不能离〈离〉身，朝内人人之抑〈仰〉望，不得不由。不理三日政事，不开三日府门，閤朝文武男妇求求，因何而止免乎！主并不问我事，我为者，实因信义而为。然后八月中旬，由省动身^②，过溧

① “少何”是广西浔、梧一带的方言，作“少有”解。

② 李秀成于回天京解围时颁发给围攻天京清军的谄谕一张，夹在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十一月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总页码五六三四页与五六三五页之间（祁龙威同志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东亚部发现，刊于《扬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三期）。全文如下：

忠王李为

谄谕尔众，明听予言事。照得人民者，中华之人民也，非满洲之人民也。满洲占据中原二百余年，满虽不薄于汉，汉亦不刻于满。今适满数已尽，故无道之大清，致刀兵之四起，天下崩解，人民离散，正由治入乱，由乱入治之时，是以上天特生真主，临凡治世，业建金陵，非人力，实天意也。中华士子通情达理者，宜早易轍改弦，因何顿忘旧德，荆发为胡，尚不复中原旧制耶！且不自量力，屡犯京都。岂知向荣一犯而泯没终身；德兴阿再犯而身首异处；和春、张国樑三犯而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今又欲逼迫我京畿，窥伺我土地，荼毒我人民，思螳臂以当车，欲杯水而救火。于是我国救困之臣，好义之士，以及强兵猛将，皆欲秣马秣食，与尔等共决雌雄，虽成事悉听天裁，非人力所能逆料。然即昔日之时机，度今时之成败，试思尔国，其能常有天下否？我愿知机应变者早早投诚，倘得惠然肯来，本藩定然录用。一有功绩，即奏我主，恩赐荣褒。大胆而来，定可欣心而处，决无加害之理也。且自与尔国临阵，招来清军者无数，凡尔将官，临阵被擒，本藩领凭给费，释归者亦不少。其愿在营者，迄今已皆重用。如此厚待尔等，已非一日，谅已见闻。本藩不肯伤害尔等之心，亦可彰明较著矣。及早回头，幸勿裹足，为此特谕，布告咸知。

阳,到东坝齐兵,直下溧水,向木(秣)陵関而来雨花台,一由板桥、善桥而东,围攻九帅营寨。困攻(三)四十日,连攻未下。九帅茆茆严营,濠深垒(坚),木桩叠叠层层,亦是甲兵之利,营规分明,是以连攻数十日未能成效者,因此之由也。然后亦因八月而东,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①

- ① 案李秀成回救天京,攻打曾国荃军营,战斗开始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清同治元年闰八月廿日),迄十月十五日(夏历十月初五日)方停止。这一役战斗激烈,敌军主将曾国荃与郭崑焘书说:“弟自去夏秋在安庆经过恶风巨浪,以为贼不足以制我,敢于悬军深入。不意事与愿违,多、鲍大军皆不能并集于二百里内,初则以为可以自强,不望他人来援而亦可自立。迨后天灾流染,军中疾病死丧,摧折我精锐几有三成,存者不过七成,又将有四五成久病不痊者,其幸而能执干戈以御贼者仅二三成病愈之勇,倏来强寇,实数满二十万,孤立无援,实所难堪,竟遂为贼所制,寸步难动。占地五六十里,前后左右皆贼环伺,智尽能索,肆应不暇,濒于危者屡矣。幸天气晴朗,将士齐心,勉强支持已二十餘日,惟廿九、初一、初三皆最险,初五一战而西路乃有转机,初六、七、八、九东路亦极危险,至十二日又几殆哉!幸克转危为安,贼中死者伤者实逾六七千人,至此而守局乃大定也。……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二万杆,所以此次殒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见《八贤手札》)。曾国藩给李续宜信也说:“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九《致李希庵中丞》)。参加这役的王可陞《戎轍尘谭》同治元年记事道:“九月,余率池州三营谒九帅于雨花台。……初九日,武明亮、萧开印营地雷并发,塌墙十餘丈,贼来如潮。九帅跃出墙外,督诸军拒战,贼死伤山积,仍进不已,相持至日中,墙缺复完,乃悉锐越濠奋击,杀贼又数千人,贼始退。余营于武、萧之前,九帅虑余兵单,令并召芜湖二营。……至雨花台立营,与三营唇齿相依,声势顿壮。又与诸军增筑外墙,内浚长濠,破贼地道七。贼愤甚,番休迭进,累土箱作檐楯,上设开花洋炮,伤我兵颇多。我兵更代眠食,日夜拒战,枪炮之外,杂掷火球、火箭,烧贼亦无算。相持至十月初旬……忠逆向九洲遁去。……是役也,诸军战守四十六日,杀贼五万,官军亦伤亡五千,将士皮肉都尽。”可知这一役太平天国确曾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竟不能把敌人攻下,据李秀成说是由于“因八月而东,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案这一役的太平军都是从浙江、江苏各地调来的,既未带冬衣,路远运送便发生了困难。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却是没有粮食。至于缺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陆路运输困难,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曾国藩《致沅弟书》说:“季弟所守江滨一段,系粮运至要之地……季能稳慎有条……又能联络水师使之乐为我用。……再过十日,贼若无如弟何,自必溃而之他,贼数闻以十万计,每日须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守事既稳以后,余惟多办银米、子药接济,弟可放心,断不缺乏,宁国守城之事,已有把握。此后,只求金柱关一带水师不挫,则处处皆稳矣”(见《曾文正公家书》卷八)。第二个原因是从安庆以下长江两岸都给曾国藩的军队大抢、大烧、大杀,生产被破坏了,太平天国粮食来源困难。因此,大军到天京,打了三十多天的仗,便发生了无粮的大问题,所以虽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而无衣无食,不能与敌人作持久战,遂致不能成功。李秀成的话虽然简单,却说明了真正的原因。

自攻未下，我主严责革爵，调我当展〈殿〉明责，即饬我进兵北行，不得不由，从〈冒〉雪而往。^①自过北之后，大江两隔不通，杭、稣之将兵，任其自行调用，部将不得不从，首〈手〉下各将，任王次兄洪仁达乱为。我在江北，幸〔收〕得两甫〔浦〕收克，为我通江北之道，顺由和州而行。斯时〔此是〕先年先发部将而去，我是后来，由含山、和州、巢县而未。^②此处百姓被刳为难，当令手下属员汪宏建^③带艮〔银〕两买粮买谷种而救于民。兵由巢县进发，至石岗〔涧〕舖^④偶〔遇〕中堂弁隶人马，安紮营垒十余个，当即排阵迎战。此〔彼〕不出军，专守为稳，以逸代〔待〕劳，攻数日未下。天连降大雨不息，官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合管〔馆〕

① 李秀成这一役进兵长江北岸，叫做“进北攻南”。这个战略，就是从长江北岸进攻上游敌人的后方，迫使敌人不得不调南岸的军队去救北岸，调下游的军队去救上游，总的目的是要解救天京的被困，所以叫做“进北攻南”（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二年三月廿五日记述截获李秀成与洪仁玕文书所得的消息）。曾国藩据李秀成文书论这一役的目的说：“据搜获忠酋伪文，将由舒城、六安而上英、霍、麻城、宋埠，一出黄州、一出汉口，扰犯湖北，意欲掣我南岸之兵以援北，掣我下游之兵以援上，无非图解金陵之围”（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清同治二年三月廿七日《近日军情片》）。又说：“其行踪为至疾，其蓄谋为至狡”（见同上书同卷同年四月十二日《石涧埠六安州庐江等处战守情形折》）。但终因皖北为敌人破坏净尽，大军无粮，吃草充饥，饿殍载道，卒致无法完成战略目的，受了惨重的丧亡而归。又考这一役冒雪过江北事，曾国藩清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汇报近日各路军情折》记道：“十月十七、八等日，忠逆之子及伪章王、对王数股并趋九洲洲，一面围李世忠各营，一面昼夜赶渡，先后冲过江浦、浦口者五六万人。……伪对王一枝，直冲过李世忠各垒，从和州之青甸庙斜趋而西，于二十七日陷含山县，二十八日窜踞巢县，十一月初一扑陷和州”（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七）。案清同治元年十月十七、八日，为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月廿七、廿八日，太平天军渡江过浦口。十一月初七日（夏历十月廿七日）克安徽含山县，初八日（夏历十月廿八日）克安徽巢县，初十日（夏历十一月初一日）克安徽和州。

② 考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一月卅一日（清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二日），从天京回到苏州（据李鸿章清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收复常熟昭文攻克福山许浦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徐佩璠《稟前署浙江布政使司麟趾蕉园夫人》说：“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忠逆由金陵回苏，疑忌六家兄，拘留不放”（徐佩璠《双鲤编》）。旋即叛徒骆国忠在常熟叛变，留苏州定乱。至癸开十三年二月十八日（清同治二年二月十三日）始到安徽巢县指挥进军。所以李秀成此处说：“先年先发部将而去，我是后来，由含山、和州、巢县而未。”

③ 汪宏建，初任李秀成秘书，既克苏州，任佐将，管理吴县事（据王韬《瓮牖馀谈》卷八《贼中悍酋记》及潘锺瑞《苏台麇鹿记》）。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夏，封勋天义，任苏福省文将帅总理民务（据汪宏建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钧谕抚天预徐少莲》印文，原件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

④ 石岗舖，为石涧舖之误，曾国藩奏报作石涧埠。石涧舖在安徽无为州城北三十华里（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三《无为州乡镇图》）。

病倒，见势为难，攻又不下，战又不成，思无法处，清军又不出战，总以严守为强^①，后处〔路〕救兵又至，我军病者又多，无兵可用。后扯兵由〔庐〕江而上舒城，至六安州。在〔庐〕江与〔清〕军见阵，两下交锋，清军败阵，追到城边，斯城严闭。次日行兵，赶到六安，正逢菁黄不接，那时想去会陈德才之军，此地无粮，不能速去，不得不由，迎〔回〕军返佩〔饷〕，由寿春边近而回。^②此地正无粮，被苗佩林〔苗沛霖〕之兵久害，民家苦于万分，官兵又未得食，饿死多多，食草冲〔充〕饥，如何为力。转到天长等处，正逢九帅破我雨花台。^③巢县是洪春元镇守，被中堂派鲍昭〔超〕军一路攻破^④，败致〔至〕和州，军民四乱，雨花台又失，

- ① 同治二年曾国藩《致彭杏南》述李秀成对他的军队的批评说：“昨夜接庐江吴长庆禀，并钞寄伪忠王文书，仆细阅之，知其中有故作大言恐吓，亦有实系贼中主意。兹批出原文送寄弟览。贼称曾某之兵，守则有余，战则不足。此实忠酋确有所见之言，盖两三年来，除鲍春霆在丰城一战外，我军从未与忠党痛打一仗，即雨花台、石涧埠两次亦皆能坚守，故忠酋欺我全不能战，叮嘱群贼如遇曾某之兵，一到即与交锋，该酋自信战有把握也”（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一）。案曾国藩所说石涧埠坚守事，便是指这一役说的。
- ②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清同治二年三月初二日）攻石涧铺湘军营，层层合围，将其粮道汲道俱隔断，至廿一日（清同治二年三月十六日），敌水陆援军大至，明日撤围去。廿四日（清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攻庐江，明日撤围去。廿六日（清同治二年三月廿一日）攻舒城，廿九日（清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攻六安州，至四月初六日（清同治二年四月初二日）撤围归（据曾国藩《石涧埠六安州庐江等处战守情形折》）。
- ③ 雨花台失守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即清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据曾国藩清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金陵军攻克石城石垒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案太平天国保卫天京，在雨花台建筑要塞。涂浮道人《金陵杂记》记道：“南门之雨花台贼营最大，山上各庙宇僧房悉圈在内。又在山顶起有望楼一座，挺立山巅，高与报恩寺塔并峙。”这一座要塞，雄峙在天京南门，正对着曾国荃的军营，所以时人称为天京的门户（见陈庆甲《金陵纪事诗》）。曾国藩《金陵军攻克石城石垒折》论其重要性说：“查雨花台及金陵南门外各石垒，据险雄峙，屏蔽城垣。昔年和春、张国樑等屡攻未下，兹赖圣主威福，诸将同心，克此坚垒，不特可分苏、扬之贼势，亦于逼剿金陵深有裨益。”据曾国荃的机要幕僚赵烈文记雨花台失守，实系被袭取，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二年五月十四日记说：“录本处近事，雨花台前月十（廿）七夜，后营官李臣典率亲兵四千人，乘贼不备而入，杀贼无多，我兵死亦止二人，遂获十馀年未得之要隘，洵奇功也。”以这样一个保卫天京的要塞，竟给敌人乘不备而袭取。守塞的将领固罪不容诛，而总理朝纲的干王洪仁玕实难辞其咎。这一件事，反映了太平天国晚期崩败的政局。敌人既占雨花台，就直逼到聚宝门濠边（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二年五月廿五日日记），所以李秀成说：“雨花台又失，京内惊慌，那时天王差官捧诏召〔召〕我回京。”
- ④ 巢县失守，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四月廿六日，即清同治二年四月廿二日（据彭玉麟《会奏再克巢县等三城折》，见《彭刚直公奏稿》卷一）。

京内惊慌。那时天王差官捧诏〈召〉我回京，当即引军回转。斯时正逢大江水涨，路道被水冲崩，无处行走。那时和州又败，江浦失守，官兵纷乱。然后将舟只先渡将官战兵马疋过江^①，将已过尽，上〈尚〉有老小以及不肯上舟马疋落在江边。此〔时〕九洲洲又被水没，官兵无棲身〔之所〕，有米无柴煮食，饿死甚多，正逢九帅发水军前来攻打下関，又被九帅攻去。^②失此之营，九洲洲即而退守^③，馀有未过未之兵，存亡未悉。

① 和州失守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四月廿九日，即清同治二年四月廿五日，江浦失守在五月十三日，即清同治二年五月初十日（据彭玉麟《会奏再克巢县等三城折》及《会奏攻克江浦浦口及九洲洲折》，均见《彭刚直公奏稿》卷一）。关于太平天国自巢、含、和三城相继失陷，江浦、浦口复失，当时李秀成北征军狼狈渡江，大势崩溃情形，清兵部右侍郎彭玉麟《会奏攻克江浦浦口及九洲洲折》所记颇详，他说：“贼中以雨花台连破石垒，恐官军大举攻城，又以崑、新既克，恐沪军大举围苏，李秀成与诸伪王纷纷改图，议由江北返援，近救金陵，远救苏州。于是天长、六合、来安等处次第解围，群丑南渡，而贼之分踞桥林、小店者亦于五月初五日冒雨掠舟，纷纷抢渡，江面人声，喧阗不绝。萧庆衍度江浦、浦口各贼股将无固志矣，乃遣骑队袭之，行未中途，闻浦口之贼，先已弃城遁走。江浦之贼献书诣营乞降，鲍超、刘连捷察知其诈，于初九日引军疾进，萧庆衍出乌江与各水营会师约战，适李朝斌统太湖水师将赴沪上，亦于是时道出金陵。初十日，李朝斌派部将郭桂芳、李助发、江福山等师船由大江冲下，先驻浦口，以扼忠酋馀党之未渡江者。臣玉麟自率定湘、澄海、清江三营，臣岳斌自率亲兵左后护卫等营，并调正中副后副右亲兵前四营同入内河，诃师次江浦，而贼又闻风宵遁。遂会合陆师将江浦、浦口一并收复，仍沿途追剿，抄过逃贼之前。贼正窜并九洲洲，洲上伪城之贼不纳。我舟师截江围击，贼不得渡，争向芦苇中骇窜。不知丛苇密处，水深丈许或数丈，昔道光年间备夷之濠，张国樑御贼之濠，沟港纵横，人马纷逐，一蹶即溺，死者駢积，以数万计。至十一日，馀贼饥啼江边，既为新开河所隔，不得仍回北岸，又为大江所阻，不得径渡南岸。各水师分队登陆，终日轮攻，攫刃就戮者半，堕江自沈者半。……此五月初十日克复江浦、浦口两城之情形也。”彭玉麟这一个奏报，可与李秀成此处记载参看。

② 太平天国在下关、草鞋峡、燕子矶等处建立坚垒，与九洲洲要塞互为倚护。敌人水师在攻九洲洲前，先攻下关等处。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五月十六日（清同治二年五月十三日）攻陷下关、草鞋峡，明日，攻陷燕子矶（据彭玉麟《会奏攻克江浦浦口及九洲洲折》）。又曾国藩将李秀成原稿此句“九帅”都改为“曾帅”，到付刻时又改为“杨帅、彭帅”。案九帅，指曾国荃，曾帅，曾国藩指他自己，杨帅，是清朝福建水师提督杨岳斌，彭帅，是清朝兵部右侍郎彭玉麟。杨、彭为湘军水师统将，曾国荃为湘军陆军统将，他们都是曾国藩部下，受曾国藩指挥，而曾国荃与杨、彭地位相等，则不可能调遣水师。李秀成说曾国荃派水师来攻下关是错的。

③ 太平天国保卫天京，以九洲洲为水路锁钥，湘军水师将领李朝斌《致黄翼升书》说：“金陵形势，盖以雨花台为陆路藩篱，以九洲洲为水路锁钥”（原件南京图书馆藏）。九洲洲的重要，在于保卫长江南北两岸的交通。九洲洲一失，太平天国水运即断，接济路绝。曾国荃为《刘连捷请恤折》说：“方金陵之谋合围也，臣以不断贼粮，此城终不能下，而九洲洲、下关各隘，乃贼接济之路……贼既失九洲洲，水运已断”（见《曾忠襄公奏议》卷二十八）。九洲洲对保卫天京关系的重大如此。九洲洲失守，（转下页注）

自此回来，九帅克我雨花台，营垒紮坚，不能再复，兵又无粮，紮脚不往（住），自散下稣州、浙江。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

稣、杭之悞事，洋鬼作怪，领李抚台之赏，攻我各路城池。攻克稣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其将尚（上）海正税招用其力。该鬼见艮（银）亡命，言（然）后鬼兵及李抚台见我未在省城，是以而顺势攻之。若我不来京者，不过北者，其万不能攻我城池也，因此来京过北之

（接上页注③）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五月十八日，即清同治二年五月十五日。敌人的夺取九洲洲，水师受到了极重大的伤亡，自供为自有水师以来第一恶战。彭玉麟《会奏攻克江浦浦口及九洲洲折》说道：“先是臣岳斌询诸土人，知江滨丛莽中有堤埂一道，可达九洲洲贼濠之外。至是商令陆军刘连捷、杨镇南数队，由堤埂缺处凫水而进。派彭楚汉、傅敏才、颜海仙三营从洲尾攻上，派张锦芳、成发翔、任星元三营由洲头攻下，派喻俊明、唐敏义、严定国等及李朝斌所部之李助发、周正林、江福山等营各驾舢板绕洲奋击，另饬丁泗滨、罗宏裕、杨点鳌等由南岸分领水师直趋中关，十五日昧爽，两岸并举，人人皆殊死战，贼之在中关者，自恃附城为垒，卒不稍动。其坚踞九洲洲者，下有贼划，上有伪城，千炮环轰，片刻不息。又于东西南三路，分伏洋枪悍队，伺间出击，损我精锐，几不可以数计。……战至日晡，贼少怠矣，乃于初更时……乘月色昏暗中移船潜近贼垒，会西南风大作，众军以火箭攒射，立焚水中拖罟数只，风引火猛，燃及洲上卡房……麾军直上……大呼升岸，丁泗滨亦自中关鼓桨而来，跃过重濠，肉薄齐登，前锋既殪，后者更进，逾者被戕，践尸复登，竟以二更后越墙扑入，聚歼群丑，无一脱者，遂夺九洲洲伪城一座，并获大炮数百尊，牛马旗械无数。此又十五日力克九洲洲之情形也。臣等查九洲洲为大江关键，与金陵相犄角，实逆首所必争之地。幸赖天威震叠，夺此要隘，北岸尽为我有，江面一律肃清，从此围攻金陵较有把握。诸将士酷暑鏖兵，血战至五昼夜之久，伤亡至二千余人之多。”彭玉麟《彭刚直公诗稿》卷二《夜破金陵对江九洲洲》注说：“我军陆师不能措手。同治二年六月初十日，以水师轮攻两昼夜，死亡枕籍。时十二日夜半，天大雾，派巴里坤总兵成发翔，浙江定海镇总兵喻俊明、广东阳江镇总兵任星沅、江南狼山镇总兵王吉战船轮流伴攻其城，而拣精锐四十人，短兵火登，密令成镇率之登岸，于黑雾中蛇行逼垒门纵火蹂而入，大队继进破之。数万贼无一逃脱者。先有战舰六只护垒门，于十二日间焚之。”曾国荃《与官中堂书》也说：“厚庵雪琴两帅亲督弋船及李镇朝斌太湖水师，自初十早起至十三日，将草鞋峡、下关一带石垒一律攻克，死贼无算，夺大炮数百尊，烧贼拖罟长龙舢板以及粮草辐重各船数百只。国荃当派刘南云一军守下关石垒，水师仍猛攻九洲洲石垒，于十五夜三更后克复。所有守垒及忠部尚未过江之贼屯聚洲上者约三万余人，皆聚歼于此。先日国荃带三营过江，是夜见九洲洲已克，遂派营守之。查九洲洲为长江关键，金陵贼恃为接济之咽喉，故以全力死守。今承厚、雪两帅率水师数十营，苦攻六昼夜，阵亡营官三员，哨官若干员，伤亡弁勇至二千余人之多，竟以力取，建此奇勋。金称自有水师以来，此次为第一恶战，夺此要隘，不仅城贼之接济可断，而长江数千里一律肃清，水师洵莫大之功矣！”（见《曾忠襄公书札》卷七）案厚庵，杨岳斌字，雪琴，彭玉麟字。考湘军水师战船，长龙每船二十四人，舢板每船十四人，此役伤亡至二千多人，其伤亡的重大可以想见。

由，此之大势，启奏主闻。主^①不从我奏，一味蛮为，云称：“有天所定，不必尔算，遵朕旨过北，接陈得〔才〕之军，收平北岸，启奏朕闻。”启奏不入，实佞臣之所由，惑主而行，忌我之势，密中暗折我兵，然后失去苏州各县。浙省金华、龙游（游）等处，具（俱）被中堂派左京堂全军制战李世贤之军。宁波郡前是鬼子诱引而得宁城，然〔后〕清将用艮（银）惹动洋鬼心，而攻我宁城。洋鬼砲火利害，百发百中，攻倒城墙，我官军不能立脚，是以退守^②，余姚、乘（嵇）县陆续亦退。^③然后鬼子攻破宁郡，得

- ① “主”字以下，《影印李秀成亲供手迹》接着是第五十四页首句“大势情由启主”。计这一页从首句“大势情由启主”起，至末句“我今之祸，因母及”止，并连写在簿眉上的字计算在内，共四百八十四字。据曾宪洛《李秀成自述的两处错简》的勘核，这一页首句“大势情由启主”，与第五十三页最后一句“启奏主闻，主”不相接，最后一句“我今之祸，因母及”，与第五十五页首句“不从我奏”也不相接。若将此页抽出，则五十三页最后一句“启奏主闻，主”，与第五十五页首句“不从我奏”相接。再将这一页改放在第五十八页前，则这一页最后一句“我今之祸，因母及”，便与第五十八页首句“閤城男女之留”句相接。因此，第五十四页，应为五十七页。尔纲案，这一个勘核是对的。故本书著录原稿，据此勘核将五十四页改移于五十七页，特此声明。至于以第七十二页为独立的最后的一页，鄙见却未能赞同。因第七十二页首句“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不但与第七十一页最后一句“此事实老中堂深恩量大，出我一片思及愚诚”文意相接，而且，以下六行全文，都是与七十一页同是说“收齐章程”的事。这是第一个理由。又第七十二页分为两部分，前半页第一行至第六行止，是与第七十一页连接同说“收齐章程”事，第七行空一行不写，前半页第八行起，至后半页第十四行止是说“计开天朝之失悞有十”事，所以第七行要空一行，以表示前后叙述的事件是两项不同的事件。如果说这一页是独立的、是全部自述写成之后单独另写的一页，则全页既分为两个内容，便应该两个内容都完整，今案第二个内容“天朝十悞”共二十三行，是完整的，而第一个内容说“收齐章程”，“定要先行靖一方爵报”，仅六行，有尾无头，是不能独立的，而必须有上文的，它不是单独另写的一页至为明显。这是第二个理由。因此，鄙见认为现在这部原稿本的第七十二页接在七十一页之后，并没有错简。因与本书著录有关，故附论于此（曾宪洛《李秀成自述的两处错简》一文，我是于1963、1964年间在报刊上看见，现已记不起报刊名称，谨记于此）。
- ② 宁波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三月廿九日（清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被英、法战舰攻陷（据李鸿章清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洋将克复宁波片》，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一）。这一役，太平军对英、法侵略者的武力干涉，给以非常英勇坚定的打击，把法国舰队司令耿呢（Lieut Kenney）、英国舰长克莱琪（Gaigre）、赫哈姆（Huxham）都打伤了，把英国军官大卫斯（Davis）、甘安（Craigie）等都打死了，后来耿呢也因重伤而死。太平军虽然撤退宁波，但英、法侵略者却受了重大的损失，就是英国侵略分子的报告，也不得不供认：“这次袭击造成极大的死亡”，而承认太平军“作战非常坚定勇敢”（据英国怡和洋行档案，1862年5月15日格林（F. S. Green）《致香港怡和洋行信》，见严中平译《怡和洋行书简》），叫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无比坚强的力量。
- ③ 余姚撤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六月廿一日，即清同治元年七月初七日（据沈又亨《随军目睹武功记略》、《光绪鄞县志》卷十六《大事纪》下）。嵇县撤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即清同治元年十月初五日（据《同治嵇县志》卷三《建置志·兵防》）。

赏艮〈银〉之后，又领赏艮〈银〉未打绍興。所攻此两处，鬼子得艮〈银〉四十余万。宁波税重艮〈银〉多，是清瞞〈满〉饷艮〈银〉^①，而请洋鬼，作为己功，打绍興亦是如是，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自此之起，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处陆续退守^②，兵屯富阳。左京堂^③全军发下，逼到富阳，与我军连敌数月，亦攻未下，然后仍请鬼兵由水路而未，用砲攻崩富阳成〈城〉池，连战数十仗，鬼败，然后再调鬼兵多未，复再与战，左京堂亦队伍甲〈交〉争，是以富阳之失^④，绍興之失^⑤，萧山之失^⑥，兵退到餘杭，屯营落寨，[左]京堂之兵亦到，两并交争，日日连战，我力据餘杭，以坚杭州之稳〈防〉。那时鬼兵攻了富阳，得艮〈银〉之后，仍回宁郡。那时左京堂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一紮餘杭，一紮九龙山，到凤山门、雷峯塔、西湖为止，连至餘杭八十餘里。此地山多水多，紮一营，而十营之坚稳也，自连八十餘里，其[营]百餘座。我天朝之军，自西湖至餘杭止，有营十餘座，具〈俱〉是以水为坚，两军并紮，困战而已，两不更调兵。浙江

① “是清瞞饷艮〈银〉”句的“瞞”字，在此处费解。曾国藩在原稿上用硃笔改为“满”字。

② 案台州郡五县一郡城撤退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廿七日（清同治元年正月初八日）天台撤退，壬戌十二年三月廿日（清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仙居撤退，三月廿六日（清同治元年四月初九日）台州郡撤退，三月廿七日（清同治元年四月初十日）黄岩撤退，三月廿八日（清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太平撤退，四月初一日（清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宁海撤退（均据《光绪台州府志·大事略》五）。温州郡撤退事，壬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清同治元年四月十九日）乐清先撤退（据《光绪乐清县志》卷十四《寇警》，四月廿二日（清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攻温州郡城军队亦撤退（据《永嘉县志》卷八《武备志·兵事》）。严州郡于壬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清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撤退（据左宗棠清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三日《攻剿严州克复郡城折》，见《左文襄公奏稿》卷三），龙游于癸开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清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撤退，金华于癸开十三年正月廿日（清同治二年正月十三日）撤退（均据左宗棠清同治二年正月十五日《连克汤溪龙游兰溪三县并金华府城生擒首逆折》，见同上书卷四）。

③ 案左宗棠此时，已升浙江巡抚，李秀成此处仍作“左京堂”，系照左宗棠最初的官衔称。

④ 富阳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二月十一日（清同治二年二月初六日）被敌来攻，到八月初八日（清同治二年八月初八日）失守。案富阳系被左宗棠的湘军和法国侵略者德克碑（Ensign paul d' Aiguebelle）的常捷军（中法混合军）攻陷。李秀成所说的鬼子，即指德克碑的常捷军（据左宗棠清同治二年二月廿五日《水陆各军攻剿大胜见筹办理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同年八月十六日《克复富阳县城折》，见同书卷六）。

⑤ 绍兴撤退，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即清同治二年正月廿六日（据左宗棠清同治二年二月廿五日《查明绍兴萧山克复详细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四）。

⑥ 萧山撤退，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即清同治二年二月初二日（据左宗棠《查明绍兴萧山克复详细情形折》）。

斯城，是听王陈炳文为帅，馀杭是汪海洋^①为将。浙江之稳数月者，则水利之坚。然后洋鬼子攻打乍浦、平湖、加（嘉）善，三处失守^②，苏州、太仓、崑山、吴江等处具（俱）被李抚台请鬼子打破。^③那时九帅破雨花台，京城惊乱，主不准我下苏、杭，奏三求四，亦是不从。自此之后，印子山营又失，其格不准我行^④，苏、杭各将告急，日日飞文前来，不得已，又以启奏。我主及朝臣要我助饷艮（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艮（银）刃交十万。我主限我下苏、杭四十日回头，艮（银）不足交，过期不回者，衣（依）国法而行。^⑤〔我〕见下路势急，亦愿从由，总得出京门，再行别计。^⑥

- ① 汪海洋，安徽全椒人，初隶翼王石达开部，后随石达开远征。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从广西回天京，辛酉十一年七月，归到江西河口，随李秀成入浙江，既克杭州，留守馀杭，封康王。甲子十四年二月，从馀杭撤退入江西，转战闽、广间。乙好十五年十月，克广东嘉应州，敌人檄各路军来围攻，汪海洋击败敌人，不幸中弹伤重。汪海洋死后，在南中国的太平军始败散。
- ② 平湖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失守，乍浦在同月初十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失守（均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廿一日《连复平湖乍浦海盐各城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五）。嘉善在同月廿六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廿八日）失守（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收复嘉善县城折》，见同上）。
- ③ 太仓州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三月廿日（清同治二年三月十五日）失守（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三月十六日《克复太仓州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崑山在同年四月十八日（清同治二年四月十四日）失守（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克复崑山折》，见同上）。吴江在同年六月十六日（清同治二年六月十四日）失守（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克复吴江震泽县城折》，见同上书卷四）。
- ④ 印子山在南京城东七瓮桥附近，太平天国在这里建立一个要塞，保卫东路七瓮桥一带（据曾国荃《复郭筠仙》，见《曾忠襄公书札》卷六；《与李少泉中丞》，见同书卷七）。敌人昼夜用大炮攻击经月，屹立不动。至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七月初八日（清同治二年七月初七日）失守，佩王冯真林战死。第三天，李秀成亲率辅王杨辅清、梯王练业坤出天京反攻，与敌人争夺印子山，不克，梯王练业坤战死（据曾国荃《复官中丞》、《复左季高制军》，见《曾忠襄公书札》卷七）。因为印子山失守，敌人就可以进犯七瓮桥、孝陵卫，扼断天京东路交通，从而包围天京，所以印子山失陷后，天王更不准李秀成离京。
- ⑤ 关于李秀成所记天王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他去救苏、杭，考清同治二年十月十一日，李鸿章上曾国藩书说：“据伪尚书李生香供称，忠逆报效七万金，始得出金陵以援苏、锡”（见《朋僚函稿》卷四）。案天王及朝臣要李秀成助饷银十万两，李秀成当时把全家首饰以及银两只交得七万两，所以天王有“艮（银）不足交，过期不回者，衣（依）国法而行”的命令。
- ⑥ 关于李秀成回救苏州事，当时在苏州的白齐文部下军官马惇（J. D. Morton），在他的《志愿陈述书》里说道：“忠王在九月二十日带领四万人来苏州”（见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八月廿日《进攻苏城克宝带桥石垒折》说：“据探报伪忠王李秀成已于十一日由金陵回苏，所带贼党甚众，意欲立解（转下页注）”

自去未久，高桥门又被九帅攻破。^①那时省城洋鬼逼近。自高桥门之败，辅王杨辅清逃回东坝，侍王李世贤亦转溧扬（阳）。那时我在苏州与洋鬼开仗。连战数日，胜负未分，两不能进。水道甚多，洋鬼利在火舟之害，我水军不能与其见阵，旱道能争，苏州水道太多，旱道甚少，是而败失地者，皆洋鬼之害也。自此两攻不下，然后亲引军由阊门至马塘桥，欲由外制，暂保省城，将军屯紮马塘桥^②，意欲回京奏练（谏）请主他行，不守京都。〔独〕自议思之后，上（尚）未举行。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是我手上爱将，留守苏州，内有纳王郅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天将张大洲、汪花班。这班返（反）臣不义。郅永宽等这班亦是我手下之将，自小从戎，教练长大至今，做到王位，与谭绍光两人是我左右之手，何悉其有此由。郅永宽等这班之人，久悉其（渠）有投大清之意，虽悉其（渠）〔所〕为，我亦不罪。闲时与其（渠）谈及，云郅永宽、汪花班、周文嘉、汪安钧、张大洲、汪有为、范起舜云：“现今我主上蒙（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皆由尔便，尔我不必想（相）害。”谈及云云：“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我一家难舍，母子六十余旬（岁），大齐流涕（涕），而各及他行。”各回言曰：“忠王宽心，我等万

（接上页注⑥）苏城之围”（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四）。案公元1863年9月20日，相当于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八月初八日，清同治二年八月初八日。李鸿章从探报所得李秀成从天京回到苏州的日期较马惇所记迟三日。马惇系亲见，应以马惇记载为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九月初九日《上曾相》又报告李秀成回苏州后情况说：“忠逆回苏后，贼气颇增，屡欲抄入常熟、崑、太后路。……苏城逃人云，自李酋回后，号令极严，人心镇定”（见《朋僚函稿》卷四）。

- ① 高桥门在南京城东，是太平天国防守天京要塞之一，于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九月廿二日（清同治二年九月廿二日）失守（据曾国藩清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金陵军叠克八隘并复秣陵关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九）。
- ② 马塘桥，李鸿章奏报作茅塘桥（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五《苏州无锡连获大胜折》）。钱勛《吴中平寇记》作麻塘桥（见卷五）。其地在伯渎的北岸，西距无锡县城三十馀华里，东距苏州六十馀华里，至今老农还叫做马塘桥（据董迟《李秀成自述中的马塘桥考》，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三辑）。英人呤喇在上海俘获飞而复来号轮船后，曾到此地向李秀成报告。王维周译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三章记道：“潮王告诉我，总司令现驻在无锡和苏州中途的马塘桥，此地居太湖岸边，为战略上要地。”黎世清译贺翼柯《戈登在中国》第四章记李秀成的驻军说：“在无锡和苏州之间的马塘桥驻有一万八千人，由此，忠王的军队可以袭击运河岸上清军的侧翼。”由于马塘桥是一个战略的要地，由于太平天国守城，守险不守陴，所以李秀成“亲引军由阊门到马塘桥，欲由外制暂保省城，将军屯扎马塘桥”。

不能负义^①，自幼〈幼〉蒙带至今，而谁有此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我为其〈渠〉长，其〈渠〉为我下，不敢明言。我观其行动，悉其〈渠〉有他心，故而明说。我见势如斯，不严其法，久知生死之期近以〈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留其全生。该等在我部下，久有战功，我成名者，皆其〈渠〉各等之力，实是心腹之闲谈及也。不意该等与慕王谭绍光二人少年结怨〈怨〉至今，后其〈渠〉各果是变心，将慕王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②，是以至今为头子不敢投者，因\

① “我等万不能负义”句，“万”字原稿在“我”字之下，案应在“等”字之下，故为改置，并注明于此。

② 苏州叛徒为纳王郅永宽、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八人（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三日《駢诛八降酋片》，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五。案李鸿章奏郅永宽作郅云官，汪安钧作汪安均，周文嘉作周文佳，又汪怀武当即汪花班）。李秀成漏述比王伍贵文。八叛徒刺杀慕王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月廿二日，即清同治二年十月廿四日。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月廿六日《克复苏州折》说：“二十四日午刻，慕逆传令各伪王上城堵御，正在对众指挥，郅云官商令伪天将汪有为，出其不意，立拔腰刀刺杀之”（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五）。案公元1863年12月12日，即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月卅日，慕王被刺后八天，戈登写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信，述两个从苏州城走出的法国人报告说：“那天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诸太平王齐集慕王府聚会，午餐毕，他们举行祈祷，然后一齐往慕王接待厅。诸王均穿行礼的袍冠，依次坐在厅内的高台上。慕王坐首席，先作长篇的讲话，他讲到太平军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嘉奖广东、广西军的英勇，责备其他军队的不可靠（显然慕王已知道正在进行的投降谈判，意欲试探秘密）。其次另有一王起立讲话。于是激烈的争论发生了，终至康王跳起来，脱去长袍，抽出一柄短剑，直向慕王肩上砍去。慕王大叫一声，倒在桌上。其馀诸王拿住他，把他拉下坐位，由一天将割下头级。然后诸王才骑马各自回营。”后来，他们将慕王首级送到清军营。第二天，戈登到慕王府，看见慕王尸在府中（据黎世清译贺翼柯《戈登在中国》一书录戈登原信）。又考当时苏州元和陶煦《贞丰里庚甲见闻录》、李鸿章幕僚钱勛《吴中平寇记》也都说慕王的被杀，是叛徒们“即坐刺杀”。据此，知慕王被叛徒刺死是在慕王府会议厅，李鸿章奏报因为要显他的战功，所以改为在苏州城上指挥时罢了。郅永宽等八个叛徒降敌后第三天，便给李鸿章杀死了。叛徒如此下场，真是活该！关于李鸿章杀降事，还要考明的有两事：第一，过去记载都把杀降的主谋加在李鸿章部将程学启身上，如王闳运《湘军志》说是程学启杀的，事前李鸿章根本不知道。王定安《湘军记》、朱孔彰《咸丰以来功臣别传》说是程学启主谋，李鸿章也以为不杀“恐不可制”，所以“不得已”才同意杀的。到了李鸿章幕僚周馥笔下，李鸿章竟成为好心肠的菩萨，说是程学启请杀，李以为“杀降大罪也”，经程以“我行矣”力争，李才不得已允杀，事过三十年，李还“尚以为歉”（《负喧闲话》）。其实这正是李鸿章定下的阴谋，清同治二年十月廿四夜，即八叛徒刺慕王献苏州城之夜，李鸿章《与弟鹤章书》说：“降者太大，不甘人下。俟将此城收复肃清，落得两双血手。兵家无后，益信曹武惠为千古伟人矣。”据此，知叛徒投降之夜，李鸿章就已定下了杀降的阴谋。到杀降之后四天，于十月卅夜《与弟鹤章书》又说：“伪纳、比、康、宁四王及五天将投诚，杀慕逆以献省城，厥功甚伟。惟拥众二十万……卧榻之前，（转下页注）

此之举。^①

失去稣省，那时正在马塘桥，闻失省之后，我即上常州，到丹阳屯紮。后无锡（在后）又失。^②那时兵乱民慌，寻思无计，暂紮丹阳。那时我家

（接上页注②）岂容他人鼾睡，致有尾大不掉之虞。因于廿六日诱该降酋九人来谒，温语慰藉，各赏红顶大帽一具。旋密令龚生阳骈诛之。方忠立即派满队入城，轰杀其党。……用此倒仓法，搬乱搬开，绝无后患，可为大幸”（此两函均见简又文《金田之游及其他》一书内《曾左李彭手札》注释）。案李秀成所记为八叛徒，李鸿章奏报也作八叛徒，但在与弟书中却作九人，其一人姓名不详。又案方忠为程学启字。李鸿章自己也没有把杀降的责任推到程学启身上去。相反的，他对于杀降是很得意的。试看他对曾国荃说：“苏垣幸克，因人成事，贪天之功，只自愧悚。乃承朝廷眷遇之隆，师友奖藉之殷，丑女簪花，对镜增恶。惟擒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见《朋僚函稿》卷四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复曾沅帅》）。据此可知李鸿章当时对于他自己杀降的事是如何的得意忘形，完全暴露出反革命的狰狞面目。这正是反动统治者的狠毒的做法，可笑后来却偏偏有人极力替他洗刷。第二，李鸿章杀了降将之后，常胜军统领戈登忽然恨透了李鸿章，要求清廷将李鸿章革职查办。以前曾有不少人认为戈登是为了“讲信义”起见。这是大错的。考戈登与李鸿章进犯苏州前，曾订有一项协定，李鸿章奏报清廷说：“臣接见戈登，面商进取机宜。……如克苏城，常胜军与程学启所部分入驻守，五日后仍将常胜军撤回崑山”（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四清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驾驶西兵片》）。这就是说把苏州攻占后，戈登的军队与李鸿章的军队同时入城，大家抢劫，在五天之内，把赃分妥后，常胜军才撤回崑山。后来苏州陷落，李鸿章先把洋枪队调开，不守分赃协定。李鸿章奏报清廷说攻占苏州后，他“派程学启督队入城……不谓戈登因臣先调常胜军回驻崑山，未与入城之功，忽生异议”（见李鸿章《骈诛八降酋片》）。案所谓“不与入城之功”，实在就是李鸿章不照协定，不许戈登军队入苏州分赃，所以这一个杀过中国人民，抢过圆明园的戈登，就因为不能进城去大抢，才跟李鸿章火并，所谓“信义”者，不过是幌子而已。后来戈登还是与李鸿章讨价还价，得到相当的抵偿后才了结。1864年10月《香港日报》揭露戈登的秘密道：“三月二十一日卜罗斯致鲁塞尔伯爵书中附税务司赫德与卜罗斯一函，赫德报告二月初，苏抚与戈登会话时，彼曾为之翻译，抚台竭力为己辩护，与戈登疏通，戈登与卜罗斯书，不及此事，代理领事麦亨与卜罗斯书，报告苏抚与戈登和解情形，亦不及此事，白朗将军不知此事。外间严守秘密如此，究何故欤？赫德为诚实之人，得官绅之信用，抚台所以欲赫德行之者，不但使戈登知五万两之允许可靠，且欲此事秘而不泄也”（据孟宪承译吟喇《太平天国外纪》第二十四章引文）。案卜罗斯又译卜鲁斯，为英国公使，鲁塞尔为英国外相，赫德（Hart）为总税务司，白朗（Brown）英国驻华陆军提督，苏抚即江苏巡抚李鸿章。《香港日报》所揭露的戈登这一个秘密，是真确的。李鸿章的文件证实了这一个报导。他在清同治二年十月卅夜《与弟鹤章书》说：“戈登忽挟伪纳王义子邵联鏞者（庐郡人）欲为纳逆报仇，将由崑山带轮船炸炮攻打我军。旋派潘季玉、李谒堂谏止之。而戈登悻悻不已，必怙恩惠伯提督，英领事等多方刁难。已允给犒赏七万元，犹未满足。已飞函总理衙门撤退该酋，另派中国大员接管常胜军，未知能做到否？”这些文件，也绘出了戈登这一个侵略分子的丑脸。

① 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复曾相》说：“苏、锡之复，歼数逆首，自是粤酋死拒困斗，绝无降意。常州护酋，早欲投诚，兹乃招聚广东悍党，婴城固守”（见《朋僚函稿》卷四）。

② 无锡失守，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月卅日，即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二日（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克复无锡金匱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五）。

弟李世贤兵屯漂扬〈阳〉，劝我前去，别作他谋，不准我回京。我不肯从。其〈渠〉欲出兵前来，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后见势不得已，见我母亲在京，难育〈离〉难舍，骨肉之亲，故而轻奇〈骑〉连夜赶回京。到京次日，上展〈殿〉启奏。（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①将^②大势情由启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那时天王义怒，严责难当，不得已，跪上复行再奏：“若不衣〈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了。九帅兵得尔雨花台，绝尔南门之道，门口不能尔行。得尔江东桥，绝尔西门，不能为用出入。得尔七公〈瓮〉桥，今在东门外安寨，深作常〈长〉濠。下関严屯重兵，粮道绝门。京中人心不固，老小者多，战兵无有，具〈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衣〈依〉臣所奏，没〈灭〉绝定也！”奏完，天王又再严责，云：“我^③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鉄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于〉水，何具〈惧〉曾妖^④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严责如此。那时我在展〈殿〉前，求天王：“尔将一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为主臣子，未闲半刻，今〔将〕国之事启奏，主责如斯，愿死在

① 圆括号内这一句话，是李秀成写在簿眉上的。考李秀成失苏州后回到天京的日期，据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廿七日曾国藩《近日军情片》说：“伪忠王李秀成自苏州逸出，统众数万，分布丹阳、龙潭、石埠桥等处。初十日，忠逆率数百骑由太平门入城。……叠据降贼供称，忠逆既至金陵，劝洪逆弃城同逃，洪逆不从”（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九。案曾国藩致《李少荃中丞》、《复冯萃亭军门》、《复乔鹤侨方伯》等函均作十一日，见钞本《曾国藩书牍》卷四。此处暂以奏报为据）。案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十日相当于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据此知李秀成失苏州、无锡后，回到天京的日子系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到京次日，上殿启奏”系十一月初九日事。所以李秀成说：“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

② “将”字以下，从“大势情由启主”句起，至“我今之祸，因母及”句止，系将现存原稿影印本的错简第五十四页改移著录于此。

③ 案这个“我”字，李秀成写后知道错了，他另写为“朕”字，但他在原稿上忘记把“我”字涂去。

④ “何具〈惧〉曾妖者乎”句的“妖”字，李秀成在原稿上，为避免对曾国藩的刺激，用○代此字。曾国藩却用硃笔在旁边写了一个“妖”字。案太平天国叫反革命为妖，以人妖对立。今曾国藩竟自认为妖矣，妙哉！

展〈殿〉前，尽心酹〈酬〉尔！”如此奏启奏，主万不从。^①含泪而出朝门。閤朝众臣前未善劝。次日，天王（其）知自过，赐下龙袍，以安我心。此番死实，因我母之念，实非为主之为。自此之后，住京一月之馀。十四年新正，欲出京去，那时，主怕我出京，城内人心不稳，朝臣苦留。閤朝弟妹闻我出京，合城男女流涕〈涕〉呼留。我心自院〈愿〉，故未启行。我今之祸，因母及閤城男女之留，不然久而〈已〉他去矣。稣省独有丹阳、常州、金坛、溧阳、宜兴而已。今年常州亦被李抚台请洋鬼子未打此城，杀死合城官兵。^②自常〔州〕破后，丹阳亦退。^③浙江嘉兴前后失守^④，独有湖州、四安、广德未退。浙江、丹阳、金坛、宜兴、溧阳各军无处可逃，我又被困京内，

① 案李秀成放弃天京别走的计划，是经江西绕湖北前往西北与扶王陈德才大军会合。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曾相》说：“据苏城降酋纳逆、无锡擒酋潮逆金称忠逆欲由宁国县、常、玉山窜江西，绕湖北，而接连伪扶王陈德才”（见《朋僚函稿》卷四）。考这一个战略是归附太平天国的白齐文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秋天向李秀成建议的。《白齐文自述》说：“我建议假若不能把外国军队撤离苏州，又不能把产丝区的桑树尽行砍伐，最好放弃苏州和南京，集中太平军力量攻打北方”（见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白齐文此策原是为对付外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而发的。其实，就当时太平天国整个形势来看，也非行此策不可。曾国藩清同治二年二月廿七日《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说：“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又说：“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同年四月廿二日《恭谢天恩沥陈下情折》说：“以大局论之，沿江三千里，名城要隘皆为我有，浙东列郡，苏、松各属，次第克复，凡山川筋脉之地，米粮百产之源，该逆一无可恃”（见同上）。1863年1月3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六四九号载：“南京附近三百里之地区，全被蹂躏为荒野地。不能生产，渺无居民，复变回远古未开辟的荒地，有如澳洲或纽西兰之野地一般。……使其米粮所出产之地尽成荒虚焦土，而并无其他得获粮食之地以为代，因此他们时时陷于大饥荒”（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十一篇《食货考》七四五页译文）。这时候，太平天国境内生产全部被破坏了，名城要隘都丧失了。太平天国要保护自己，进攻敌人，除了作战略的撤退，前往西北，与扶王陈德才大军会师，另图发展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所以呤喇论这一战略说：“忠王认清英国坚持向太平军作战而太平军无力进行抵抗之后，就马上决定采取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军事行动，这就是放弃所有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退往内地，因为英军无法到内地去和他们作战，清军也无法在内地阻遏他们的军事行动，制止他们增添兵力，阻碍他们未来的发展”（见王维周译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五章）。这确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救亡良策，可惜天王顽固，断然拒绝，遂至灭亡。

② 常州失守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三月廿九日，即清同治三年四月初六日（据李鸿章清同治三年四月初七日《克复常州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六）。

③ 丹阳撤退，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三月卅一日，即清同治三年四月初八日（据清同治三年四月十四日富明阿奏，同日冯子材、魁玉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七十一）。

④ 嘉兴失守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即清同治三年二月十八日（据李鸿章清同治三年二月廿八日《克复嘉兴详细情形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六）。

各将各王无法何〈可〉施，是以上江西而去。^①江西领兵之将，家弟李世贤唱〈倡〉首而图。此等之兵，具〈俱〉是我浙江部下之众，势逼而行。计开上江西各将名目：李世贤、刘朝钧^②、汪海洋、陈炳文、陆顺德、朱吴隆、李恺顺、谭应芝^③、陈承奇、李容发^④领兵前去，已在江西。此事不说，再将〈陈〉京中坏政败亡之陈〈故〉。

自此之下，国业将亡，天王万不由人说。我自在天王殿下，与主面辨

- ① 宜兴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正月廿日（清同治三年正月廿四日）失守（据李鸿章清同治三年二月初一日《克复宜兴荆溪县城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六）。溧阳在同月廿七日（清同治三年二月初二日）失守（据李鸿章清同治三年二月廿日《收复溧阳并江常锡次第解围折》，见同上）。金坛在同年三月十四日（清同治三年三月廿一日）失守（据李鸿章清同治三年三月廿九日《溧阳官军截剿金坛窜逆获胜折》，见同上）。关于当时江、浙两省军队开往江西就粮事，曾国藩清同治三年四月廿日《复郭崑焘书》说：“窜江之贼，第一起为伪陪王等，系溧阳败出者，溧阳本侍逆巢穴，故陪王亦侍党也。第二起为陈炳文、汪海洋等，杭州败出为多，而武康、德清、石门等股亦附陈、汪以行，辎重最多，旗帜最鲜。第三起为伪侍王，由湖州逸出者。……第四起为江阴杨舍之败贼，常州城外之垒贼，与夫金坛、句容克后之贼。……丹阳于初八日克复，逸出之贼甚多，是为第五起。而湖州之贼将为第六起。皆当由徽入江，人数实已不少。所幸不甚凶悍，号令不一，心志不齐，沿途抢粮，多饥少饱，纷纷逃散，不敢言战，此机势之最可喜者。而散处各军，江西各军，绝少良将劲旅，无一人能制此散漫之贼，左部差胜，亦多新集之卒，此又时局之最可虑者”（见《八贤手札》）。当时江苏南部和浙江省全部生产被反革命破坏，没有粮食，清朝江西巡抚沈葆楨，奏报入赣太平军有“与其饿死江南，不如战死江西”的口号（见《沈文肃公书札》卷一《部署饶防片》）。曾国藩也论这时候太平天国军队“只有江西是一条生路”（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八《复孙小山方伯》）。所以当时江、浙两省撤退的军队都到江西去就粮食。
- ② 刘朝钧，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有一封《谕忠逢朝将刘肇均》的文书，写作肇均，清文书作刘肇钧，当是同一人。他是广西人，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封逢天义，总理苏福省民务。后守昆山，历败清兵。封凛王。乙好十五年夏守福建漳浦，城陷牺牲。
- ③ 谭应芝，广西桂平县人，慕王谭绍光的叔父，封乐王。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秋与堵王黄文金同守湖州（据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二章）。李秀成说他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夏已领军在江西，但清朝关于他的奏报却不同，左宗棠奏报，说他在甲子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清同治三年四月十六日）守浙江湖州城外长生桥军营，战死（见《左文襄公奏稿》卷九，清同治三年五月初四日《进犯湖州郡攻克要隘叠胜一挫折》）；李鸿章奏报，却说他在今年四月廿八、廿九日（清同治三年五月初七、八日）还在湖州吴淞督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六，清同治三年五月十七日《分剿湖州进逼长兴折》）。
- ④ 李容发，李秀成第二子，封天朝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二殿下（据幼主诏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藏）。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随南破杞军主将陆顺德进攻绍兴，时年方十五岁，已经以英勇闻名（据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九章）。以后历随李秀成在苏、浙、皖三省作战。甲子十四年二月，在江阴华市击溃英国侵略者戈登常胜军最精锐的劲旅第四团和新编第六团，把戈登打得一败涂地，狼狈而逃（据威尔生《常胜军》第十二章）。这年春夏间，带军经浙江入江西就粮食。其后事迹不详。案左宗棠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提讯李士贵口供贼情请暂缓处决片》说：“前据提督銜总兵（转下页注）

〈辨〉一切国情之后，天王深为疑忌，京中政事，具〈俱〉交其兄洪仁达处理，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掌。我在京并未任闾城之事。主任我专，政不能坏。我在京实因我母之念。见国中之势如斯，外城池概失，日变多端，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欲启奏国中情節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由〈事〉。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我久日在外带兵，我部将多有在外，在京者，谨〈仅〉有出师外去其各家眷在京，各在家每有十人，或七八人，见我在京，各而聚至，合作一队，计有千馀。十三年十一月，我由外入京，亦有随身之将十馀员。那时专作守城之事，某处要紧，即命我行。京城穷家男妇俱向我求，我亦无法，主又不问此事。奏闻主云：“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恳求降旨^①，应何筹谋，以安众心。”我主降照云：“合城具〈俱〉食咁〈甜〉[露]，可以养生。”咁〈甜〉露何能养世间之人乎！地生之物，任

（接上页注④）刘明灯搜获忠逆李秀成之子李士贵，经臣饬提来省鞠讯，供姓周，湖北江夏人，咸丰二年，湖北省城初次失陷，被李秀成掳去为子，改名李士贵。咸丰十一年，加封伪二殿下。……本年三月，由丹阳窜至广德，复来湖州与黄文金合股。六月间，幼逆洪福瑱自金陵缺口冲出……该逆曾随黄文金见过洪幼逆一次。……该逆由湖州、广德、宁国窜至歙南建口被擒”（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

考李秀成《给侄容椿子容发谕》，封套分明写：“交与^{王相}二殿下^{容椿}等开拆”，幼主诏旨也分明写：“朕旨准特诏封李容发为天朝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二殿下”，可证忠二殿下下的名是李容发，而不是李士贵。且“贵”字犯幼主洪天贵及西王萧朝贵讳，太平天国定制，“贵”字是一个须避讳的字，《钦定敬避字样》规定：“贵，改用桂字，或意近似者代。”李秀成也不可能给自己的养子取名为李士贵。又李容发封忠二殿下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卅一日，而不是在辛酉十一年，即清咸丰十一年时的时候。《李秀成自述》说在甲子十四年春夏间入江西将领，列有李容发，并且说明“领兵前去，已在江西”。他并没有去浙江湖州与堵王黄文金会合。

根据上面的考证，可断左宗棠奏报所说于清同治三年八月十六日（即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在安徽歙县建口所俘的那个叫做李士贵的忠二殿下（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清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提讯忠逆义子李士贵确供并起获堵逆黄文金尸首梟示片》），以及他所讯的“供词”，都是不可信的。

- ① “恳求降旨”句，原稿本作“恳求旨降”，案应作“恳求降旨”，故为改置，并注明于此。关于当时天京围困缺粮事，陈庆甲《金陵纪事诗》第三十首道：“簇簇旌旗拥上游，转粮一线仗苏州，千钱斗米犹争羨，几辈糟糠痛割喉”，注说：“城围粮少，馆中食豆渣糠粃者十有三四”（见《补愚诗存》）。案陈庆甲自记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至天京，到癸开十三年八月离开，据此知癸开十三年八月前，天京已缺粮了。后来李秀成被俘，赵烈文去见他，记与他的问答道：“余又问：‘城中使今日不陷，尚能守乎？’曰：‘粮尽矣，徒恃中关所入无几，不能守也。’余曰：‘官军搜城见米粮尚多，曷云无食？’曰：‘城中王府尚有之，顾不以充饷，故见绌。此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

而食之，此物天王叫做咁〈甜〉露也。^①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得。”天王云曰：“取来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众又无法，不取其食。我天王在其宫中阔地自寻。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閤朝衣〈依〉行毋违，降照饬众遵行，各而脩食。天王亦早知有今日无粮之难，京城不固，久悉在心，〔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后。入南京之时，称号皇都，自己不肯矢志，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具〈俱〉是有天。先二三年之间，早经出令，各多被〈备〉甜露，每家要呈缴十担，收入苍〈仓〉中。亦有遵旨送缴者，亦有不从〔者〕。天王久日宫中具〈俱〉食此物。我主如此，我真无法。城中穷家男女数万余人，缠我救其命，度日罔生，我今无法。十三年七、八月之间，那时我有艮〈银〉米，可以暂将城内穷家民户以及各穷苦官兵之家，开册给付艮〈银〉米，以救其生，开造册者有七万馀，穷苦人家各弄洋银廿元，要米二担，具〈俱〉到保堰〈宝堰〉领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宝堰〉领米，无力之家，自各领艮〈银〉作些小买〔卖〕。^②救至去年十二月，又不能了。我亦苦穷，无艮〈银〉无米，稣、杭又失，京城困紧，

① 甜露，是基督教的神话，说是上帝从天降下来的食物。太平天国颁行的《三字经》说：“皇上帝，大权能，以色列，尽保全，行至野，食无粮。皇上帝，谕莫慌，降甜露，人一升，甜如蜜，饱其民。”考这一个神话见于《旧遗诏圣书》（即《旧约》）《出麦西国传》（即《出埃及记》）第十六章，说：“适暮时鹌鹑上来覆营，朝时露下周营矣。露清，即在野而细如鳞，细如霜在地。且以色列族看之，不知系何物，则互相曰：‘此却何物耶？’且摩西谓之曰：‘此乃皇上帝所给尔食之饼矣。皇上帝所谕之事，即乃各人随嘴所食，必收之，每人一升，照在帐户口之数，各人必敛之也。’……夫以色列家称其名曰蔓，即如甜露，系白如芡苡仁。其味如扁饼，调以蜜也。且摩西云：‘皇上帝所谕之事乃如此，必满一升，致历代恒存甜露，则可见我率汝出麦西地之时，所养尔在野之饼也。’”案李秀成说天王“早知有今日无粮之难”，只“因自好高，不揣前后”，“靠实于天”，所以现在到了缺粮的时候，就企图利用基督教甜露的神话，来稳定人心。

②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二年七月廿四日记说：“见城贼伪示二张，一禁谣言惑乱军心……一言在城之人，贫富不均，令贫民至其府内领钱十千为度，领米以二石为度，以作小本生意及贩卖小米店，限一年归还云云，皆是忠逆出名。”陈庆甲《金陵纪事诗》第三十一首也说：“收拾人心笑李猫，假仁煦煦亦无聊，试看通济门前路，买米归来满担挑。”注说：“伪忠王李秀成于湖熟、懈溪诸镇搭盖草房，设立米市，转运入城，以资商贾，并给资本。”同治二年六月十九日陈鼎《上曾国藩书》说：“吴江新复，苏、浙之吭已断。获伪札数十道，嘉、湖之贼筹运米粮，由句容之宝堰陆运入金陵，尚有数百里。若能断秣陵关接济之路，则更易得手”（见《清朝官员书牍》）。又考清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李鸿章致曾国荃信述天京粮运情况说：“自江路不通，米价长至十二两一石，牌尾日发四合，仅有三岔河、宝堰一路可运粮进小东门，暂于该处扎营设栈夫转运，若官军再进，恐即断绝”（见《朋僚函稿》卷三《致曾沅帅》）。案宝堰镇名，在镇江西南，西界句容，东界丹阳，南界金坛，交通四达，是当时天京被困后唯一（转下页注）

力不能持，奏主不肯退城，实而无法，不得不由而为此也。我有艮〈银〉米，那时而救军民，自丹〔阳〕而至三岔河^①、龙都、胡〈湖〉熟、洒溪^②等处之民，被陈坤书、洪春元害死之后，我即奔艮〈银〉米命员前未抚之，以救民家。斯时王次兄以及洪姓见我滋〈慈〉爱军民，忌〈惧〉我自图害国之心，声言明到我耳，那时忠而变奸，负我辛勤之一世苦楚，不念我等勤劳，反说我奸。我本铁胆忠心对主，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奸！是以辞心^③而藏京内，又逼气而培〈陪〉其亡。^④不是此意，我将兵数十万在外，任我风流〈所为〉，而何受此难者乎！早亦悉其气将满，奈我粤人无处他逃，故而死

（接上页注②）一的粮道。清同治二年七月初三日李鸿章复曾国荃信说：“据吴江擒贼供称嘉兴廖逆六月初四日装米船一百三十一只，每船米十二石，十四解到丹阳之宝堰镇起旱转送。该处离金陵尚九十里，若能将此一条粮路截断，则金陵数十万之贼毫无指望，立见溃没。”（见《朋僚函稿》卷四《复曾沅帅》）

- ① 三岔河在句容城南，湖熟镇之东（据《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一《江宁府境全图》）。
- ② 龙都、湖熟都是江苏江宁府上元县东南的乡镇（据《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上元乡镇》）。查《上江两县志》无洒溪，而与龙都、湖熟相邻的则有解溪，又考陈庆甲《金陵纪事诗》注说：“忠王李秀成于湖熟、懈溪诸镇搭盖草房，设立米市，转运入城，以资商贾，并给资本”，案懈溪即解溪。据此知李秀成所说的洒溪，应该是解溪。
- ③ “辞心”，就是“灰心”。我儿时听我家乡广西贵县的老婆婆有一句话说：“心辞肚淡”。这句话，即等于国语“心灰意冷”。可知李秀成此处“辞心”，就是“灰心”。
- ④ 考李秀成回天京后，主持守城事，人心益固，敌人所企图的内应成为画饼。曾国荃清同治二年十二月《复李季荃》说：“城逆自忠酋至后，死党益多，守志益切，力攻之外，无可希冀”（见《曾忠襄公书札》卷八）。李秀成在回天京后第三天，就带兵出城与敌人作战，并傍城增筑营垒，加强防御布置。曾国藩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复乔鹤齐方伯》说：“忠逆十一入城，十三后屡与官军搏战。据探该酋欲挟洪逆同窜江西，而洪逆顾恋老巢，死守弗去”（见钞本《曾国藩书牍》卷四）。同月《复冯萃亭军门》说：“忠酋入金陵城之后，傍城增垒，尚未猛扑围师”（见同上）。十一月廿一夜（夏历十一月廿三夜），又亲自前往镇江、常州交界冲途的奔牛镇，围攻叛徒营垒，以救常州。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二月廿日《奔牛解围折》说：“前准曾国荃十一月二十五日来函，闻李秀成前夜出城向句容去。据擒贼供称，围奔牛时，李秀成亦在其内”（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五）。曾国藩清同治三年正月《复赵玉班观察》说：“苏军围攻常州，忠酋援援，几破围师营垒，幸以力战得完”（见钞本《曾国藩书牍》卷五）。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夏历正月廿一日），天京将被合围，李秀成又亲率军出城猛攻敌人龙脖子军营，以阻敌人的合围。曾国藩清同治三年正月《致黄南坡》说：“弟于灯节后，陆续分布各营扼扎神策门一路。城逆见我军围逼渐紧，二十一日，忠逆指挥马步贼数千人，猛扑龙脖子营垒，为背城借一之计”（见《曾忠襄公书札》卷八）。二月，天京被合围，李秀成写了一封血书向浙江湖州侍王李世贤、堵王黄文金等求救。曾国藩清同治三年三月《复严渭川中丞》说：“伪忠王以血书乞援于湖州侍、堵诸酋，其书为舍弟军中搜获。该酋许以三月内赴援金陵。弟催春霆速进句容，与金陵围师互为声援，不知能否赶在贼前”（见钞本《曾国藩书牍》卷五）。旋以江南地区无粮，援军不能前来，李秀成又命令侍王李世贤率领江、浙退守军队前往江西就粮，约定待八月秋收后，即回天京。（转下页注）

对主忠。我等一班为人，为主厚待者，具〈俱〉是一心，无奈佞臣之害，入京者不能出京也。我到京閤城欢乐，知我出京，具〈俱〉各流凄〈涕〉。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强欺城中百姓，不敢欺逼官兵。我不在城者，其〈渠〉满城逢屋查过，有米艮〈银〉物合其用，任其取用，不敢与争，日日按户查寻，男女不得安然^①。

去年天王改政，要閤〔朝〕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家亦然，凡出示以及印内，具〈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入，印内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声称^②，李世贤现今亦未肯称此也。（言后）天王见李世贤不写此等字样，即而革戡，现今李世贤之戡上〈尚〉未复回。天王

（接上页注④）内外夹攻敌人。曾国藩《复左宫保》说：“据伪忠王供……江西伪侍王一股，渠与订有公约，三、四、五、六等月皆在江西掳粮以饱侍王之党，一至八月，即回皖南掳宁国各属之粮，内外力战，运济金陵”（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据上考出，李秀成在天王拒绝他“让城别走”的大计之后，他是服从天王的决定，并且立刻作出种种坚守天京的布置与行动的。可见他在这里所说“我在京并未任閤城之事”，又说：“我本铁胆忠心对主，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好！是以辞心而藏京内，又逼气而培〈陪〉其亡”的话都是假的。就是据他在下文自述在忠王府中召集补王莫仕嘏、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王长兄长子洪和元、次子利元、干王长子洪葵元开粮务会议，这也就是担任防守閤城之事的证据。所以曾国藩论到当时坚守天京，都以李秀成与天王并举，如清同治三年三月《复乔鹤仲中丞》说：“城内新种麦禾，青黄弥望。洪逆、忠逆坚忍异常，前此两次掘开地道，及上月初七云梯猛攻，均未得手”（见钞本《曾国藩书牍》卷五）。又如四月《复厉伯符方伯》说：“舍弟因合围已久，焦灼万分，又在城之东北抢扎四十餘垒，另开地道十餘处，百道环攻，而洪、李二逆坚韧异常，援绝而粮未尽，其精力尚沛然未遂枯竭，此段未知何日始了”（见同上）。当天王在日，李秀成是执行天王坚守天京决定的主持者，到天王逝世后，幼天王洪天贵福年少，更都是他主持，《幼天王口述》记他登基后事说：“兵权都是忠王掌管。”事实俱在，随处都可以证明李秀成这些话是虚假的。

① 关于洪姓误国害民事，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李鸿章致曾国荃信说：“昨于浒关贼馆夺获伪文书数百件，大都金陵贼馆乞苏、浙解济银米，其声甚哀。内称洪逆禅位幼主，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留守城内，各伪王均归调遣”（《朋僚函稿》卷三《致曾沅帅》）。左宗棠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攻剿龙游汤溪兰溪逆贼连胜克复寿昌县城及各要隘折》说：“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可见“洪氏之党”确为军民所公愤，天王才“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以顺人心，也可见李秀成在这里所记的洪姓误国害民事，并不是他个人好恶的私言，而是真实的事实。

② 李秀成此处所说天王去年改政，命令凡出示及印内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入，所谓去年，就李秀成写《自述》时推算，应该是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但据现存辛酉十一年天王诏旨五道，都已在太平天国之上，加上“天父、天兄、天王”字样。辛酉十一年干王洪仁玕、幼赞王蒙时雍、天将李春发颁发的《戒浮文巧言谕》，谕上的印内及年月上也都已加上“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原件都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又辛酉十一年黄畹《上逢天义稟》也在太平天国之上加上“天父、天兄、天王”字样（转下页注）

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将此来情，云天上有此之事，瞒及世人。天王之事，具〈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渠〉臣，不敢与〔其〕驳，任其〈渠〉称也。称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御林兵者，皆算其〈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我〈称〉为我队我兵者，其〈渠〉责之云：“尔有奸心之意，天军、天官、天兵、天国，那有尔兵”！不称天兵、天国、天官者，恐人霸占其国，此之实言也。何人敢称自兵者，五马分尸。又改各王之号，此是天王失算。前封东、西、南、北王、翼王止，除此以外，自行降照言，杀东、北王之后，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因其弟洪仁玕九年之间而来，见其弟至，格外欢天，一时好乐，重爱其弟，到京未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①，降照天下，要人悉归其〈渠〉制。封过后，未见一谋。天王再而复思，又见各旧功臣久扶其国，心〔中〕

（接上页注②）（原件藏故宫博物院）。据此知天命令凡出示及印内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入并不是始于癸开十三年，而是始于辛酉十一年。又李秀成说：“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声称，李世贤现今亦未肯称此也。”这句话也有问题，应该分别说明。考现存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英王陈玉成《致扶王陈德才等》、同日《致沃王张洛行》、同日《谕马融和等》三封文书，都没有在国号之上加写“天父天兄天王”六字，可知他说“那时人人遵称”，并非事实。又考李秀成于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致杰天义赖文光谆谕》、十月初三日《给侄容椿子容发谆谕》、十一月《给清朝总理湖州团防事务赵景贤谆谕》、十一月廿八日《谕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及外国侵略者檄》，确实都没有遵称。但到壬戌十二年《给忠逢朝将刘肇均谆谕》，却于国号之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了，在癸开十三年十月廿六日发给呤喇的路凭所盖印上，我们也看见他在印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了。至于侍王李世贤在辛酉十一年颁发的《劝四民诚心向化纳贡投诚谕》、《劝四民投诚归顺谆谕》、《劝浙江太平子民各知效顺谆谕》三件都没有在国号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其后，在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内，译有李世贤于甲子十四年九月卅日在漳州颁布的《安民布告》、十月初一日《致英法美各国公使照会》也都未见加有“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而所译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廿二日幼赞王蒙时雍等《复英国舰长宾汉照会》，则于衔前和函后国号上都有“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虽然呤喇所译李世贤这两封文件，不是据自原件，而是采自《每日新闻》所录的，但一般说来，若原件上有此六字，《每日新闻》没有把它删去的必要。所以李秀成说：“李世贤现今亦未肯称”，大约是可信的。

- ① 考太平天国后期王爵，天京事变后，首封王长兄洪仁发为安王，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据清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二日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六月，因朝中不服，撤去两人王爵（据清咸丰七年六月廿一日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改封天安、天福（见《忠王答辞手卷》）。李秀成因见洪仁发、洪仁达封王不久即被撤去，所以说后期封王始自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封洪仁玕为干王。又考干王《洪仁玕自述》说：“三月十三日到天京，蒙我主恩封福爵，二十九日封翼爵，加主将，四月初一日改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据此知洪仁玕于己未九年三月十三日到天京，到四月初一日，为时仅十九日即封王。李秀成说他到京未半月封王，实为未半月。

不分〈忿〉[意]。天王见势不同，自翼王他向，保国者〔首〕陈玉成与我〔而〕为首，那时英王名现〈显〉，我名未成，日日勤劳，邦〈幫〉为运算，凡事不肖〈离〉。天王见封其弟，初来封长，又有^①才情，封有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已知愧过，难对功臣。后而先封陈玉成为英王。^②封陈玉成之后，见我日有战功，勤劳其事，对我不能。那时正在甫〈浦〉口镇守，李昭寿与我有旧日深情，其〈渠〉见天王封陈玉成为王，其〈渠〉在清朝，在傍看见，其〈渠〉心不分〈忿〉，行文劝我投其〈清〉，来文到案，此时正逢天王侍卫六七人来甫〈浦〉口踏看军营，谁知李昭寿之文未到，先有遥〈谣〉言，传到京中，天王差侍卫一探军营，二探我有何动静，那知李昭寿胆大，特命其亲使送文前来。此使旧日在我身边为护旗，然后李昭寿投入大清，其〈渠〉即随去，今使其〈渠〉带文前来，被把卡捉来，解送到案前〔到〕。其使云曰：“尔不必捉我，我专到李老大人处”等云，然后把卡士卒送至衙前。拿得敌人而至，合营人众视之，见在其身尚〈上〉拾得文〔书〕一件。拿来之情，此事问马玉堂^③亦知此由。那侍卫同在其场。后侍卫回京，合京人人知到，恐我有变，云我同李昭寿旧好，封王不到我，□^④定有他变。那时我母亦在甫〈浦〉口，家室亦然，防我定有变意。后将中阁舟只尽封，不准我官兵来往。那时有人奏到天王耳日〈中〉，一二十日，未见动静，天王降照封我为万古忠义，亲自用黄缎子，〔自亲〕书大字四个，称“万古忠

① “有”，是广州方言的字，读如母，作没有解。“又有才情”，便是“又没有才情”。

② 考陈玉成封王日期，据清咸丰九年五月十五日（即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五月初六日）钦差大臣胜保奏说：“近据生擒发贼供称……洪逆以陈玉成所至，能出死力，伪封英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洪仁玕封王在己未九年四月初一日。据胜保此奏，他在五月初已经说陈玉成封英王是近闻的事，则陈玉成封王不是在洪仁玕封王两月后可知。又考天王封洪仁玕为干王诏说：“朕意玕胞、达胞、玉胞知之”，达胞称石达开，玉胞称陈玉成。李秀成说天王封洪仁玕为干王后两月，见洪仁玕一事无谋，功臣心中不忿，难对功臣，以陈玉成最高，始封陈玉成为英王，那是错的。

③ 马玉堂，安徽人，清朝举人，钻入太平天国内部，封钥天福，与恩天安黄同守安徽无为州（据余一鳌《见闻录》）。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在无为州作清军内应，致无为州失陷（据曾国藩《克复铜陵县无为州等处折》）。其后替曾国藩作勾串叛徒的工作，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四日记说：“本日午刻马玉堂（沅帅遣往说降者）自小河来，据禀所办三酋之降，现为护逆调散。”所以李秀成此处说：“此事问马玉堂亦知此由。”

④ 李秀成原稿“定有他变”句的“定”字之上，尚有一个字，李秀成自己涂去，在旁边另写一草体字，并加一线插入内，此字不认识，故用□代此字。

义”四字，并赐绸缎前来，封我为忠王。^①我为忠王者，实李昭寿来文之诱，而乐我心封之，恐防我有他心。自此之后，日封日多，封这有功之人，又思那个前劳之不服，故而尽乱封之，不问何人，有人保者具〈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艮〈银〉丩者，欲为作乐者，用丩到部，而又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樑。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言〈然〉后封王具〈俱〉为列王者，因此之来由也。^②然后列王封多，又无可改，王加头上三点，以为丩字之封^③，人心格〈更〉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人心由此两举而散无涯也。（我言直陈之语，非不忠而败主節，今国亡，

① 关于李秀成封王事，除在《自述》所说外，他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致伦天燕韩碧峰禀天燕韩绣峰书》也有叙述，他在信中说：“缘兄于月之初八日夜，据巍天豫熊万荃由桂营返浦，承贤台挂兄殷殷，属兄开用王印，想兄何才何力，敢受此藩封，不过赖贤台之威名以助耳。前已将悬印月餘，未敢视事之情形启奏圣上，请真圣主加封贤台而后愚兄方敢受任。所有圣恩特禀〔封〕绣峰弟为九门御林征北副总统禀天福爵，碧峰弟已经保封福爵，愚心方慰，早将兄已勉强受任之情布达惠闻，谅登照入。并又接到贤兄等连衔手书，当即寄京传献圣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钞件）。案李秀成这封信，是清朝官员夺获后钞送清廷军机处的。在信后清朝官员有一行注语说：“外致孙葵心、刘天祥等逆书词句与此相同。”据此，知李秀成封王的日期是己未九年八月或七月，而李秀成的谦让推美，与捻党将领韩碧峰、韩绣峰、孙葵心、刘天祥等对他殷殷地敦劝开用王印等情况，都可以看见。这些地方，都可以补《自述》所未备。

② 《昭王黄文英自述》说：“那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南、西、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又说：“天朝的事，越做越坏。”

③ 案“丩”字是太平天国新造字。《钦定敬避字样》说：“凡单称君字、王字，是天父、天兄、天王、幼主，餘外称列王。凡王姓可添用此丩字避之。”据此知丩字是因避王字讳而造的字，今却用来作王爵的封号，所以人心不服。关于此字读法和意义，1961年8月，我接到一位读者刘乐孙来信，说他读了《太平天国史稿》述天王封王太多，既如箭出难收，而又病其滥，于是在王字上加三点作为丩字之封，人心益不服，多有他图这一事后，经过反复探研，“疑丩字当为小王二字连写，我国古代钟鼎石鼓文字中多有如是将二字连为一字的写法，如将小子二字写作𠂔，五十写作𠂔等等均是。余以为丩一字当读作小王，列王以下无可再封（指王爵），封作丩（小王），于意义及等级上均殊吻合，二字连写，古有成法，非太平天国首创也”。尔纲案宗周钟“保余小子”（保余小子）句，小子二字连写成“𠂔”（见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三）。季鼎鼎“小臣菱先”，小臣二字连写作“𠂔”（见同上书卷四）。太平天国的丩字，当是取我国古代两字连写的成法，把小王两字连写作丩字，刘乐孙的解释是对的。

具衰得失不陈，不知来由。)^①天王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前日明清之候，保将封官，择有才而用。陈玉成、李秀成我二人是主之所爱，而改加我等之名。陈玉成在家书名是陈丕成，天王见其忠勇，改做玉成。^②我在家书名号为以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时，〔其〕改我号为李秀成。^③天王用人，从前择士。业蒙〈蒙〉尘失国，应丧家邦之由，业今写明，老中堂一鉴便知。

天国得失具亡祸害之事，因此自乱于己，内外慌张，为将为臣，无法挽救〈救〉。国内无粮，九帅之兵严困，内外不通，无粮养众，京内繁繁，每日穷家男妇叠在门前求为救命。国库无存良〈银〉米，国事未经我为，后见许多流凄〈涕〉苦叫，我实无由〈法〉，不得已，将自己家存之米谷发救于城内穷人，将自〔己〕谷米发救穷家之食，自辖部官兵又不资云〈匀〉，再不得已，将家内母亲以及妇女手〈首〉饰金良〈银〉概变给为军资，家内无存金良〈银〉者，因此之来由也。自发此谷米，救过此穷人，亦不资〈济〉于事，后将此穷苦不能全生情茹启奏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衣〈依〉，仍言〈然〉严责：“不体国体，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脩

① 圆括号内这几句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② 王韬手钞本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陈丕成传》说：“陈丕成，伪将军，广西人，年最幼，不满廿岁，最亡命，能得众贼心，统下贼常千人。”此陈丕成即陈玉成，是玉成初名丕成，可做李秀成此处注脚。

③ 案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廿七日李秀成《给李昭寿谕》上及封套上所盖印同作“太平天国副掌率后军主将合天义李秀成”，据此知李秀成改名李秀成，并不是始自己未九年秋封王之时。考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胡林翼奏报（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十八清咸丰七年五月卅日《奏陈九江长围困贼叠次大胜及水师深入失利旋复获胜疏》）在丁巳七年五月以前，所记李秀成名都作李寿城，曹蓝田《颍上城守日记》作李寿臣，臣，当是成的音讹。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剧贼事略》下说：“李寿成伪殿右二十二检点，尝犯东坝，踞太平府和州一带。”咸丰七年九月廿二日硃批的德兴阿等奏说：“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今所见清朝文书记李秀成名为李秀成，始自咸丰七年十月初五日福济、郑魁士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八十二，王先谦《咸丰朝东华续录》同）。据此李秀成改名为李秀成，当在丁巳七年五月后，同年十月前。案天王名秀全，秀全两字在太平天国制度上，都是须避讳的字，《钦定敬避字样》规定，秀字，“凡用以绣、绣字代”；全字，“凡用以钤、銓等字代”。以燕王秦日昌的地位，尚须避北王韦昌辉之讳，改“昌”为“纲”，太平天国避讳制度之严可见。而李秀成本名为李寿成，天王却把他改为李秀成，不避自己的名讳，与东王杨秀清不避天王讳同。这一件事，可以看见天王对李秀成的器重。

咁〈甜〉露，可食饱长生，不由尔奏！”无计与辨〈辨〉，言〈然〉后出朝。主有怒色，我亦〔有〕不乐之心。閤城男女饥饿，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即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我在城内，得悉九帅在外设有救难民局，所悉此之由，正合我意，可久〈救〉民生，密令放行。去年至今，各门分出足有十三四万之数〈谱〉。^①不意巡各城门要隘，是洪姓用广〔东〕之人，将男妇出城之人，将各所带金艮〈银〉取净，而害此穷人。闻悉我心甚怒，亲往视之，果有此等，当而杀数人，害穷人贼子，然〔后〕各出城门，而可暂安。自此之后，国出孽樟〈障〉，多有奇奇怪怪。主信闲言，不修正〈政〉事。城内贼盗峯〈蜂〉张，逢夜城内，砲声不绝，抢劫杀人，全家杀尽，抢去家内财，国败出此不祥。^②去年十一月之间，九帅放倒南门城墙，此时城内官兵多，尚可足食，而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帅之兵不能踊进者，此之来由也。^③

-
- ① 李秀成疏散天京妇孺出城事，清方也有记载，曾国藩在清同治三年二月廿七日上奏清廷说：“近日军情，金陵首逆并未出城猛扑，仅于水西、旱西两门放出老幼妇女万余人，为节省米粮之计。”同年三月十二日又奏说：“再近日军情，金陵城贼常放妇女幼孩出城，以为节食之计。”曾国荃《致官中堂》说：“今年城中逃出难民妇女不下五六万人”（见《曾忠襄公书札》卷八）。《上海新报》甲子四月十九日新闻说：“闻得金陵省城已被我军围攻甚紧……现将老弱及妇女小孩均放出城。”五月十三日新闻又述南京来信说：“水陆围攻，贼粮断绝，城中放出老弱及女人有数万之多。”又考当时有一个家住在天京里面的上元人王永年自述送妻子母亲出天京事也说：“甲子二月十九日送妻携子承钰并是秋病殇之女及四妹甥女偕何达夫之妻子等同出汉西门。三月初一日又送老母出城。能得出觅生路者，乃伪忠王李秀成以城中乏粮奏明伪主，准将无依妇女放出谋食，晓谕通衢”（见《紫蘋馆诗钞》上卷《癸未五月初度五首》诗注）。
- ② 曾国荃清同治三年春《复赵玉班》说：“金陵自合围太平、神策门后，贼吮已断。附城各营，每夜闻城内哗扰声，达旦不休。据逃出难民供称，城逆夺粮，自相残杀”（见《曾忠襄公书札》卷八）。
- ③ 这一次天京南门城墙被轰陷，是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五）夜五更事，守城军队把抢夺缺口敌人迎头痛击，使敌人不得窜入。关于此役战事，曾国荃《复王峰臣》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说：“敝军五月间所开地道，至十一月功在垂成。诿该逆于城之内外墙脚对开地道，已将穿透，势不能待横道齐整，因急于初五日装药四万，夜间封塞道口，并派队四面环攻，于五更时轰之。其时浮桥搭成。城塌之处，其宽虽十馀丈，而两头壁立，无斜磴可上，实缘城身厚有八丈，火药仅轰塌城外三四丈而已，其内面仍然巍峙，故贼得以堵御。抢口之贼，被砖石土块击伤者甚众。而兄营将士驰过浮桥，争先抢口，城上大炮洋枪子如雨注，受伤阵亡者亦有三百余人。人谋之不能遽成，殆有天意，可胜喟然”（见《曾忠襄公书札》卷八）。

六 尽忠（原稿六十三至七十四页）

自此之后，京〔之〕事日变〔一〕不同。城外九帅之兵，日日逼紧，城内格外惊慌，守营守城，无人可用。凡是城外有文通者，何人扑〔拾〕到，不报到天王处，私开敌人之文者，抄斩全家。自九帅兵近城边时，天王即早降严诏，闾城不敢违逆。〔若〕不遵天王旨命，私开敌人之文，通奸引诱，有人报信者，官封王位，之〔知〕情不报，与奸全罪，命王次兄拿获桩砂、剔〔剥〕皮法治^①，〔而〕何人不畏死乎！后鬆王陈得〔德〕风^②通于东〔门〕外萧军门处^③，慰王朱逃〔兆〕英^④二人通来九帅这边。斯时之事，朱兆英、陈德风并未与我言明，后其事洩漏，被王长兄洪仁发锁拿鬆王陈得〔德〕风。该〔陈德风〕与我想〔相〕好，其〔渠〕有母七十餘旬〔岁〕，前求求我，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艮〔银〕一千八百餘，然后保陈德风之命。陈德风通清朝这边，言〔然〕后事作不成，其命尚不能保。此有心献门投降者，此之来由也。

此事此〔已〕过未久，有我妻舅宋永祺来在九帅营下，云同九帅部下司^⑤

① 关于桩砂、剥皮这两种刑法，《上海新报》甲子六月十六日新闻说：“一桩白法，用大石做长白，将人放于白内，以大石柱从足际捶起，渐渐往上，约百餘捶，方至头顶。又将身体折为一团，打为烂泥方罢。……一剥皮法，其法先在地上掘一土坑，用柴火烧热，将人衣服全行脱去，推于坑内。其人乱跳乱踪，浑身皮肉浮起成泡，然后用铁钩出火坑，遂将人皮剥下。”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二月日记也记有太平天国用桩砂刑法处治叛徒事说：“贼目许连芳，广东人，于前月杪与仁字营张诗日处始有投诚之议。初五、六日俱出城至营。初七遣所辖曹某，安庆人，来为向导。……城中悬巨纆四迎之。甫上七人，而我军不知何人放一小枪，为他贼所觉，遽吹角放炮，我军登者复下，狼狈凫水而归。明日曹某脱出，闻许已监押，后闻于十六日用石臼碓舂死。”

② 陈德风，广西潯州人（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十九日记）。初任北殿承宣，后封鬆王。与朱兆英同谋叛，未遂。到天京陷落，给敌人捉去（据曾国藩清同治三年七月廿日《复陈逆酋正法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仍被杀死，所以李秀成下文说：“事作不成，其命尚不能保”便是。

③ 萧军门，指曾国荃部下将领福建陆路提督萧孚泗。

④ 朱兆英，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二月封殿前吏部正天官部官领袖职同副掌率（据庚申十年十二月廿九日幼主诏旨），后封慰王。与陈德风谋叛，事发后，是否被捕诛死，《李秀成自述》未提。

⑤ “司”字为“师”字的代用字，太平天国制度，规定“师”字为避讳的字，用司字代替，见《钦定敬避字样》。

爷谈及，劝我未降等〔语〕。其〈渠〉有兄弟，我不知其〈渠〉何姓名，在中堂辖下戴蓝顶子^①，可保于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见过，未悉其人，未见过〔其〕面，是以未敢定言。此人闻在泰州，未知真段〈假〉。至宋永祺由九帅之营回转京内，〔未〕往十日有馀，同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与我谈及，云有此事，未见有九帅之文，其〈渠〉云不故〈过〉与九帅司〈师〉爷谈及，未有实情等语，此人好还〈玩〉饮酒，是夜〔与〕我谈及多言，次日与朋友饮酒太多，与人多语，即与陈德风谈及^②，云与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陈德风半信半疑，行文前未问我，能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会议粮务，补王莫仕葵〈葵〉、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王长兄长子洪和元^③、次子利元、^④干王长子洪葵元在我府内会议，正逢鬆王陈德风递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而有防内有私者乎！莫仕葵〈葵〉（莫仕葵）顺手将此文扯阅一看，见此情由，各人在此，并踊未视，内言：“问忠王真有此心否？”此时莫仕葵〈葵〉在此，问我曰：“尔调宋永祺到场，我问未情，我为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尔即调尔妻舅宋永祺到场与我讯问，不然，我亦〈便〉要先行启奏，尔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后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葵〉彳亍动人马在我府等候。此日夜宋永祺正到我府，与我家弟叙及此事，莫仕葵〈葵〉将其〈渠〉拿获，后又将郭老四并获，此时惹出大事，合城惊乱。我平日幸得军民之心，不然，悞我全家久矣。朝臣其有忌〈惧〉意，不敢强为究我之罪也。后将宋永祺押入囚内，欲正其法。我与其亲戚之情，不能舍绝，然后将艮〈银〉用与莫仕葵〈葵〉，而后宽刑，不治其罪，奏旨轻办。^⑤此事连及我身，幸合朝人人与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

① 李秀成此处写的蓝字，只写草字头，与上文写蓝成春的蓝字同。曾国藩在原稿上用硃笔改为“红”字，到刊刻时又改为“水晶顶子”。案“顶子”又称“顶戴”，是清代官员分别等级的帽饰，装在帽顶中间，圆形，所以称为顶子。一、二品高级官员，用红宝石，称红顶子；三、四品中上级官员用蓝宝石，称蓝顶子；五品中下级官员用水晶，称水晶顶子（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一《王礼》十七）。此处说的戴蓝顶子的，就是清朝三、四品中上级的官员。

② “即与陈德风谈及”句，原稿本作“即与陈德风及谈”，案应作“谈及”，故为改置，并注明于此。

③ 洪和元，封殿前京内又副总监顶天扶朝纲巨王，天京陷后，走至湖熟镇被杀。

④ 洪利元，封殿前京外正总监顶天扶朝纲崇王，天京陷后，走至湖熟镇被杀。

⑤ “奏旨轻办”句，原稿本作“奏轻旨办”，案应以“奏旨轻办”较通，故为改置，并注明于此。

不到今日之亡。

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脩，恐我变心。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①那时天王又死，九帅军逼甚严，实而无法，后天王长子洪有福^②登基，以安合朝人心。天王之病，因食咁〈甜〉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亦是其无福处，害死庶民。自幼〈幼〉主登基之后，军又无粮，兵又自乱。九帅〔沿〕城闹垅甚多，自东门而至北门，一路闹垅甚多，不能处处防敌也。^③

① 关于天王逝世事，《幼天王洪天贵福口述》说：“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干王《洪仁玕自述》也说：“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以前曾国藩刻《李秀成供》说：“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此事曾引起我们的疑问。今得见影印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李秀成原稿实是说：“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又说：“天王之病，因食咁〈甜〉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知天王确实是病死，并知是因吃甜露起病。曾国藩为着要向清廷报功却把全部事实盗改了。又天王逝世日期，李秀成记为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廿一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口述》则作四月十九日，干王《洪仁玕自述》也同作四月十九日，两者不同。考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五月初六日记说：“闻探报稟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廿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廿日。”案当时赵烈文在围攻天京的曾国荃军中任机要幕僚，他所得的探报，系距天王死后八九天即得到。曾国藩清同治三年六月廿八日记述在攻陷天京后，讯问宫女黄氏说：“洪秀全于四月二十日死，实时宪书之二十七日也”（见《曾文正公手书记》）。案这天历四月廿日，相当于夏历四月廿八日，不是四月廿七日，曾国藩的对照是错的，但与赵烈文所得的情报却都同是天历四月廿日。这当是天王实病死于四月十九日深夜，外间到四月廿日才知道，因此说是四月廿日逝世。天王逝世时，幼天王必在身边，而这一宫女黄氏却不一定在旁，她也可能是到第二天才知道的。李秀成此处记作四月廿一日是错了的。

② 案《幼天王洪天贵福口述》说：“自少名洪天贵，数年前老天王叫我加个福字，就名洪天贵福。登极后，玉玺于名字下横刻真主二字，致外人错叫洪福瑱。”李秀成此处叫他为洪有福，当是因为四字的姓名不习惯，故概括名字的意义为洪有福。

③ 关于清军从东门至北门一路开地道进攻天京事，曾国荃《致骆制军》说：“敝军三月初薄城筑垒，开挖地道十馀处，颇为水石所阻者。现仍朝夕趣工，计四月杪五月初可抵城根”（见《曾忠襄公书札》卷八）。《致刘中丞》又说：“于朝阳、神策等门及龙脖子一带，增筑二十馀垒，开掘地道十馀处，距城五、六、七十丈不等”（见同上）。当时天京守军，对敌人的地道进攻，曾经展开了坚强有效的防备，不断地斗穿了近城的地道。曾国荃《复蔡少彭》说：“弟军地道，为城逆斗穿者先后已十七穴，余已无一可望者”（见同上）。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五月廿七日记道：“先是城北城东各营攻毁长毛月围，加工开挖地道。贼守法甚谨，遥望官军所扎先锋垒之处，知其下必有地道，即遥度其处，先从城内挖一直道透出城外，然后分头横挖暗濠，官军或三穴两穴并进，约其所占地面之宽狭为横濠长短，如其数以俟之，十不失八九。金川门一带，刘连捷等所开三穴，今月廿二、三日皆斗穿。神策门以北，张诗日等所开两穴，（转下页注）

神策门连被放倒两回,实难防脩。^①主又幼(幼)小,提政无决断之才人。外曾帅之兵,日夕逼近城边,合城文武,无计可施。^②

至六月初六日早,见势真不得已,知曾帅立破我城在即,抽点先锋,连夜出城,欲攻九帅寨^③,攻打未成,知城不能保固了。此官兵日夜未得饭食,天明各已寻去了,被曾帅在紫金山高处吊望,见城内之人,纷纷散队。

(接上页注^③)二十日斗穿。正当神策门朱南桂所开六穴,被贼斗穿五穴,廿六早所轰者,系五穴中之一穴加修用之,余尚一穴可望。其龙脖子以南及朝阳门一带,惟朱洪章等所挖尚可指望。其余李祥和、熊登武、陈万胜等各营所挖之穴,均于十九、二十、廿一等日抵城根时,被贼横道斗穿。萧孚泗、萧庆衍等五穴,去城尚远。据此情形,地道未能奏功,尚不如内应足恃。”曾国藩在《金陵湘军陆军昭忠祠》记里总述地道进攻的失败说:“其穿地道以图大城者,凡南门一穴,朝阳至钟阜门三十六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则纵横聚葬于其中。贼或穿隧以迎我,熏以毒烟,灌以沸汤,则赴者幸脱,而恣者就歼”(见《曾文正公文集》卷一)。据曾国荃等自供,他们对用地道进攻已经感到失望,天京守军防备地道战术的精熟可知。

① 神策门连被用地道攻塌两次,第一次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即清同治三年五月廿六日。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五月廿六日记说:“昨夜因神策门月城有地道已达,中丞赴城北督攻。黎明火发,遥见城北烟雾四塞,枪炮声连绵不绝,未知得手与否。……已刻炮声渐寂,亭午报至,闻神策门月城轰去外皮,其内面矗立不倒,仍不可攀援而登。而昨夜将有此举,本营及外营齐队,灯火人声,贼久知之,已严兵以待,烟火甫尽,万枪齐列,官军将近数十步,受伤已数十人,不得进而返。”第二次在同年六月初四日,即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四日。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四日记说:“下午,闻自城北归者言,神策门地道今早已发,月城轰为平地,而内城未动,我军奋登,贼用火药数十桶排掷,伤亡至三百余人,竟不能进,贼复拒守。”王可陞《戎幄尘谭》同治三年记事记:“六月朔日,余从四十骑谒九帅于金陵。时附城贼垒皆为我有,贼粮久断。龙脖子列台二十余座,昼夜环轰,城堞皆圯,又于炮密处潜穴地道,入火药三百石。李成典、朱洪章、伍维寿、武明良、谭国泰、刘连捷、沈鸿宝、张诗日、罗雨春九人誓先登。九帅留助克城,余以溧水为逸贼所必经,恐防御有疏,或贻后患,遂于望日辞归。十六日午刻金陵竟复。次日,贼果至,伏兵要截,杀数百人,残众走姑熟。”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记说:“黎明传言贼缒城出,钉草堆旁炮眼,伤官军守者,追之不得。辰刻贼放火焚草,草燃,在中军望者皆懊叹。俄顷有亲兵至,言贼四鼓出钉炮眼未成,焚炮营内火药数桶,会中丞自至前敌,逐去之。已刻望城北烟焰已救熄。”

② 天京危急时,曾有从关过浦口的计划,曾国藩清同治三年六月《复彭雪琴侍郎》说:“城逆欲由中关出窜浦口,已檄王可陞赴浦口防守。其中关三垒,据戈登言,须用轮船炸炮击之。台旆到金陵后,当可与少荃、沅弟商酌办理”(见钞本《曾国藩书牍》卷五)。后来因敌人长江防备严密,太平天国没有水师,无法突围过江,所以未能实行。

③ 中国从前一天的计时法,以十二支计算,每天从子时(二十一时至一时为子时)起,至亥时(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为亥时)止,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即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系天京失陷的日子,这一天午刻(十一时至十三时为午时)敌人攻城地道火发,轰陷太平门。李秀成先在这一天丑时(一时至三时为丑时)初刻四更时候,知敌人破城在即,立刻抽点先锋连夜出城攻打敌寨。这时正是这一天的第二个时刻,所以他说“六月初六日早”,就是根据当时的计时法的。

是午时之候，九帅用火药攻倒京城，由紫金山龙颈而破^①，全军入城，我军不能为敌。此是大清皇上鸿福，中堂运算良才，九帅精功智才韬〈韬〉略，将相勤劳，此亦天朝数满，天王乱世民之数满仍〈盈〉，大清再复昇平。那时九帅官兵四门扒城亦入。中関以外，各处军营见京已失，降亦有之，逃亦

- ① 案紫金山龙颈，即富贵山（一名龙广山，即古龙尾坡），俗名龙脖子，在鍾山第三峰南麓，高度八十米，明初筑太平门，城跨其上。这里是历代战争之所，六朝之末，隋军平陈，即从此处攻入金陵。太平天国在鍾山第三高峰上筑天保城，又在龙脖子设第二要塞叫做地保城，来保卫天京。天保城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正月十七日（清同治三年正月廿一日）先失陷，至五月廿一日（清同治三年五月卅日）地保城又失陷。以前敌人所掘地道三十多处都给太平天国堵破，到了地保城失守，离城墙不过十多丈，敌人遂再在此处掘地埋地雷攻城，城始陷。曾国藩清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日记说：“至孝陵卫，登宝城一看，旋登鍾山之腰阅贼匪所筑之天保城，下至王远和湘后左营一坐，下至龙脖子观十六日轰破地道之处，所掘两洞，距城极近，不过十馀丈耳。沅弟于龙脖子山上随山高下，架炮数层，安炮百馀尊，连攻十馀日，昼夜不断，城上之贼，不能立足，故城外掘地道者虽极近而贼无如何也。此次地道破城，一在炮火极多，猛攻极久，使城贼立脚不住，二在附城极近，掘洞极速，仅五日而成，功出贼所不意”（见《曾文正公手书记》）。至于天京失陷经过，曾国藩清同治三年六月廿三日《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说：“据曾国荃十九日咨称此次攻城，剿洗老巢之难，与悍贼拼死鏖战之苦，实为久历戎行者所未见。自得天保城后，城中防守益密，地保城扼住隘路，百计环攻，无隙可乘，直到五月三十日，始经……率队攻克，占取龙脖子山阴，居高临下，势在掌握。自六月初一日起，令各营轮攻，伤亡极多……我军地道三十馀穴，都已无成，官军五万余人，筋力将疲，若不趁此攻克，事久变生，深为可惧。李臣典愿率吴宗国等从贼炮最多之处重开地道，萧孚泗、董润昌、熊登武、王远和愿距城十数丈修筑炮台数十座，通派各营队伍，刈割湿芦蒿草，堆捆山积，上覆沙土，左路地势甚高，利于声攻，右路地势极低，利于潜攻，如是者半月，未尝一刻稍休，肉薄相逼，损伤精锐，不可胜数，总兵陈万胜、王绍羲、郭鹏程等素称骁将，数日之内，次第阵亡，尤堪恻。十五夜四更，地道装药之时，曾国荃与李臣典正在洞口筹商一切，忠猷李秀成突出死党数百人，由太平门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垒，别从朝阳门东角出数百人装官军号衣，持火蛋延烧各炮垒及附近湿芦蒿草，官军久劳之后，夜深几为所乘。赖伍维寿、李臣典、黄廷爵、张诗日堵住左路，毙贼无算，彭毓橘、熊上珍、陶立忠等堵杀右路，擒斩亦多，幸克保全洞口。十六早向明，曾国荃将四路队伍调齐，顶饬各军稳站壕濠，严防冲突，惟将太平门龙脖子一带，自黎明攻至午刻。李臣典报地道封筑口门，妥放引线……遂传令即刻发火，霹雳一声，揭开城垣二十馀丈……直冲倒口而入”（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这是一场非常凶恶的战斗。太平军以无比的英勇给疯狂的敌人以迎头打击，把敌人攻城先锋部队朱洪章带领的三千人打死了一半。曾国荃在“表忠之碑”里记道：“登城前队奋勇死者四百馀名，同瘞于此，呜呼，惨矣！”这个幸逃狗命的朱洪章在碑上题的诗更写得凄惨说：“不易当年克此城，今朝却是倍伤神。精兵四百遭全没，壮士三千只半生！”案太平天国当时因缺粮留在天京的军队不过一万多人，能战的不过三四千人（据《忠王答辞手卷》），敌人攻城部队共有五万余人。我们从曾国荃、朱洪章的自供中，可见当时天京失陷的时候，太平军是怎样的英勇、怎样的坚强给敌人以打击！

有之，死亦有之。^①我末在天朝，天王用我，不故〈过〉三四年之间。我用命散财，肯救贫人，是以人人而悉我者，此之由也。破城之时，个个向我流涕〈涕〉。我由太平门败转，直到朝门，幼〈幼〉主已先走到朝门，及天王两个小子^②并到，向前问计。斯时我亦无法处，独带幼〈幼〉主一人，其余不能提理。幼〈幼〉主又无马坐，将我战奇〈马〉交与其坐，我奇〈骑〉不力之奇〈马〉^③，直到我家，辞我母亲我胞弟与侄，合室流涕〈涕〉辞别，带主而上青凉〔山〕^④避势。斯时亦有数千余人，文武将官具〈俱〉而护往。我为天王之用臣，虽言〈然〉我〔主〕不修得〈德〉政，立国不以军民为念，既我于主封为忠王之爵，非是重用我一人，主封为王，朝之大臣，长过我者，〔过〕次过我者，亦复不少。不故〈过〉我肯舍死从人，深情有义者，肯报占过情者不亡〈忘〉。既为其臣，虽天王气满懔〈蒙〉尘，俟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为，是日将夜，寻思无计，欲冲北门而出，九帅之军重屯，又无法处，随行之文武将兵，自乱如麻，合众流涕〈涕〉而无法处。不得已，初更^⑤之候，舍死领

① 天京失陷时，中关各处军营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清同治三年六月廿日会防处翻译新闻纸说：“孔夫子轮船来信，云该船十五日到南京，距贼营七八里许。次早，据官兵告称，南城均已攻破，官兵现围内城。该船主知官军大胜，即驾本船前进，轰炮两时之久，将贼营打破。官兵船只同时齐集帮打，贼众溃逃，遂踞贼营。轮船内计伤兵官一员，水手二名。获贼多名，营内衣服什物无算。看光景南京其易得手矣”（见吴煦档案）。据此，知当时中关各处军营对进犯的外国侵略者的战舰及曾国藩湘军水师展开英勇的迎击，直到营垒被打破之后，方始撤退。

② 李秀成所说的天王两个小子，是第三子光王，第四子明王（据戊午八年颁行的《太平礼制》）。光王名洪天光，明王名洪天明（据幼天王《洪天贵福亲笔自述》）。天京陷后，他们的下落不明。

③ 关于李秀成临难让马一事，在他部下的英人呤喇指出：“这正是忠王的勇敢、忠诚、豪爽的性格的特点”（见王维周译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五章）。

④ 清凉山在南京城清凉门内。

⑤ 原稿上“初更”后改作“四更”。细验其字迹不是李秀成手笔，墨色也较深浓。案《幼天王洪天贵福口述》说冲出天京时在初更。又考曾国荃机要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记，说他于“戌末时”，即将近二十一时的时候（此据影印《能静居士日记草稿本》，《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能静居士日记》排印本作“戌末时”，“未”字是误排），就听到龙膊子至孝陵卫一带炮声，便知有太平军冲出。案当时赵烈文与曾国荃同在城南军营。到四更时候，北城军营就派人来报告，有太平军马队二百多人，步队约一千人，从太平门放倒缺口冲出，出城后，从孝陵卫投句容路去。据此可知李秀成冲出天京时必为初更，而四更则实为曾国藩所盗改。曾国藩为什么要把“初更”盗改为“四更”呢？因为他在《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里向清廷虚报，正兵苦战到“见星”才收队，“结为圆阵，站立龙广山”，“分守要隘”，以防太平军（转下页注）

头冲锋，自向带幼〈幼〉主在后而末，冲由九帅放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舍命冲出闕来。我此者，实为一点愚忠而救危主。冲出城之后，过九帅营寨，叠叠层层，濠深垒固。幼〈幼〉主出到城外，被九帅营中，营营砲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幼〉主两下分离〈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①

（接上页注⑤）冲突，而伏兵却一直深入进攻王府，到三更还不能收队，其时李秀成传令放火烧王府和各王府，到四更就从太平门缺口冲出。所以他不得不把李秀成原稿“初更”，盗改为“四更”，以符合他的虚报。再考曾国藩在《李秀成供》里，又把“四更”改为“三更”。曾国藩在这一个字的盗改上，是费尽了心机的。

- ① 关于李秀成带幼天王冲出天京事，《幼天王洪天贵福口述》说：“六月初六日五更，我梦见官兵把城墙轰塌，拥进城内。到了午后，我同四个幼娘娘在楼上望见官兵入城来了，我就望下跑。幼娘娘扯住不放。我说下去一看就来，便一直跑往忠王府去了。忠王带我走了几门，都冲不出来。到初更时候，乃假装官兵，从缺口出来。才出来千多人，就被官兵知觉，尾后都被截断了。到广德州只剩数百人。”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记李秀成被俘事注说：“圭按：官军追至湖熟镇时，贼前队三百余人已挟洪福瑱至句容南乡之郭庄庙镇，日暮途穷，遂暂匿于此。有乡人亲见之者云，福瑱年约十五六，极瘦弱，有与其年貌服色相同者凡十一人，环坐饮食，悍贼数人，持刀紧随，不离寸步。十八日黎明复南通。午后，官兵马队追踪已逾夹山地方，以热毙马二，军士亦有中暑者，乃撤队回，贼遂获由溧水东境逸去。”曾国藩《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说：“是夜四更，有贼一股，假装官军号衣号补，手持军器洋枪，约千余人，向太平门地道缺口冲突，经崑字湘后左右各营截击，多用火桶火弹焚烧人马，死者已多，约尚有六七百人，骑马冲出，向孝陵卫、定林镇一路而逃。伍维寿、杨钾南、陶立忠等急率马队跟追。曾国荃一闻骑贼装扮官军逃出之信，即加派张定魁、李泰山、黄万鹏、黄廷爵等马队七百骑追之，并飞咨溧水、东坝、句容各守将会合追剿。直至十九日酉刻，伍维寿、黄万鹏等回营，面禀追至淳化镇、生擒伪烈王李万材带领前进，追至湖熟镇，见逃贼在前，当经马队围住，全数斩刈，未留一人。又追至溧阳，据百姓言前路并无贼踪经过。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餘孽。”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日记说：“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至戌末时，余见龙脖子至孝陵卫一带放炮，知有窜贼。……至四鼓时，城北来报，有马贼二百余，步贼千余，假冒官军衣装，并携带妇女从缺口冲出，守汛者崑字及湘后左右营精锐大半在城内未返，余者疲顿，不能阻之，仅杀数十人。出城后由孝陵卫福字李泰山、节字萧孚泗等营卡门出，亦莫能遏，其众投句容路而去云云。报者不敢惊中丞卧。……中丞与彭毓橘正闭门酣卧，急叩门请之起……飞札马队营官伍维寿追剿。”同月十九日日记又云：“傍晚，追贼马队营官伍维寿至，言在纯〈淳〉化镇擒得伪列王李万材，供称幼主与忠酋出城，分作二队，幼主与王长兄等为前队，已去远。忠酋与璋王、顺王、幼西王、幼南王、信王等为后队云云。当令带路追至湖熟大桥边，将伪忠王等一起酋目，全行杀死，缚李万材归。”案中丞，称曾国荃，时曾国荃任浙江巡抚。戊末，为将近二十一时。据曾国藩奏报及赵烈文日记，与《幼天王口述》参看，知系假扮清军号衣、号补，从太平门缺口冲出，出了一千多人，才被清军发觉，尾后就被截断。又据赵烈文日记与曾国藩奏报核对，知李秀成带幼天王冲出，实在初更，曾国藩奏报为要弥缝疏防的过失，特地捏奏战至（转下页注）

现今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幼)童,自幼(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言(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①

自出城与幼主分别,我奇(马)不能行走,此奇(马)在城交战一日,此又不是战奇(马),力又不足,又未得食,人马未得饱食,走到天明,人人具(俱)散,马不能行。那时无法,自己无马,又不能行,是以逃上荒山暂避,又未得食,肚中又饿,万不能行。我战马幼(幼)主奇(骑)去。现

(接上页注①)三更不能收队,至四更被从缺口逃出。又说在缺口截击,多用火桶火弹焚烧人马,死者已多,而案赵烈文日记只是杀了几十人。至于马队营官伍维寿带马队去追,则是四更得报后,才由曾国荃飞札派追,并不是如同曾国藩所说登时跟追,曾国荃加派马队去追的事也是捏造。再据赵烈文日记,述列王李万材说李秀成带幼天王出城后,分为两队,幼天王为前队,已去远,李秀成为后队。这一点可补《李秀成自述》的缺略。李秀成从缺口冲出城,及冲过孝陵卫敌人军营卡门时,则“舍死领头冲锋”。到过了敌人营卡后,则打发幼天王为前队急走,自己则留为后队以拒追敌。李秀成之忠,于此又可见。

① 幼天王冲出天京到安徽广德州后,堵王黄文金迎接他入浙江湖州。时干王洪仁玕也在湖州。因湖州粮乏军单,不能建都立业,定计入江西建昌、抚州等处会合侍王李世贤去湖北再会扶王陈德才大军,踞荆、襄,以图长安。七月,从湖州出发,转战进入江西,八月底,在江西石城县阳家牌军覆,走入荒谷中,被敌跟踪追获。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十月初六日(清同治三年十月廿日),在江西南昌殉国。李秀成在《自述》中说幼天王,“十六岁幼(幼)童,自幼(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言(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上杀死,亦未悉其是幼(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案据列王李万材说,当日冲出城过孝陵卫之后,分为二队,幼天王为前队,已去远,李秀成与章王林绍璋等为后队,则李秀成已知道幼天王去远,敌人没有追及,这是第一点。第二,他让给幼天王骑的战马,是一匹“以强壮快速闻名的白马”(据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五章),有把握可以越过敌人的追赶,他在《自述》中也不自觉地暴露出这一个看法说:“我战马,幼(幼)主奇(骑)去,现今生死未知,我若仍奇(骑)战马,我亦他逃矣。”据此而论,李秀成是知道幼天王是走脱了的,但他竟强调“定言(然)被杀矣”。《上海新报》甲子(清同治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在一篇时事短评里论此事说:“前据忠逆李秀成口供,称干王洪仁玕、伪恤王洪仁政俱死乱军中。今阅上谕,始知忠逆狡狴异常,身在囹圄,犹朦混大宪,为幼逆等漏网地步。詎知罪贯满盈,万无逃脱之理,今将各逆首悉数歼之,想天下人心无不称快者也”(引自陈光贻纂注《上海新报所刊有关太平天国史料类汇》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未刊稿)。李秀成之所以强调幼天王“定言(然)被杀矣”,他的目的,就是阻止敌人追寻,使得达到自己的军队中。曾国藩果然信了李秀成的话,他在《贼酋分别处治筹善后事宜折》说:“洪福瑱以十六岁童驂,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他在《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又说:“以为洪福瑱必死于乱军无疑矣”(见同书卷二十一)。后来曾国藩一直到接到幼天王进入广德州的探报,他还上奏清廷说:“其洪福瑱果否尚存,臣现派蓄发降卒四处访查,不欲仅以难民之言为凭。……或洪福瑱实已身死,而黄文金伪称尚存,亦古来败贼常有”(见《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据此知《自述》这一段话,曾经收到了他所预期的效果。

今生死未知，我若仍奇〈骑〉战马，我亦他逃矣。逃在荒山顶破庙内避，后被荒山脚之民，悉京城失破，必有人在此山而避，贫民各欲弑财之故，我命该绝，故未能逃。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那不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我欲宽身呈〈乘〉凉。不意民家寻到，见其人众到来，我二三人而〈疑〉心惊乱而逃，忘记执拾此物。此百姓追我，问：“尔身有义，交过与我，我不欲〈要〉尔性命。”我那时忙逃，亦不得〈能〉走，亦不能行，百姓追近身边见我，悉我是忠王，各大齐落跪^①，具〈俱〉各流涕〈涕〉，追我下山脚。斯时百姓又众，那时百姓将我改依〈衣〉，随步而行，仍回荒山顶上，〔我〕见百姓如此，有救我之心，自愿回破庙处所，将此珍珠宝物以酬〈酬〉其情。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在后又有民家而来。将此庙〔中〕我之宝物拾去。我同此民回来，不见此物，此也不提。众百姓劝我涕〈剃〉头，我心不愿。其〈渠〉云“不肯涕〈剃〉头，不能送尔。”百姓又是苦求。我回其〈渠〉曰：“我为大臣，我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获解送大清帅臣，我亦不能复语〈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难对我官军。”不肯涕〈剃〉也。民逼涕〈剃〉多言，后衣〈依〉其言，涕〈剃〉去些须者，因此之来由也。然后这邦〈帮〉百姓密藏于我。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邦〈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那帮〉百姓云：“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方有，如〈除〉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云言该百姓带我，心有私忌，两家并争，因此我而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未。^②

① “落跪”，就是“跪下”。这是广西涪州、梧州一带的方言。

② 考李秀成落难的荒山顶破庙，是南京东南方山顶海会寺。捉李秀成送清营的两个奸民，是方山南麓涧东村陶大来和丁村王小二。关于这一件事，1954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曾进行调查。据王长发（丁村人，年四十一岁，他的父亲王保全过继王小二为后）说：“捉忠王的王小二，就是我们二爷爷，他叫书发。听我父亲讲，他是不成户的东西，在丁村做田，一天上山扎柴，遇见忠王，就去涧东告诉陶大来，随着大家上山把忠王捉送清朝。”王保林（丁村人，七十岁，王小二侄儿）说：“二伯伯天明上山砍柴，在宝积庵会到忠王，下山报告涧东陶大来。陶是八村村董，二伯伯跟随大家骗了忠王下山送到清营。”陶明才（涧东村人，七十九岁）说：“陶大来是我的祖父辈。……他在捉忠王以前，在涧东种田兼开磨坊。忠王在方山石龙池被丁村王小二上山砍柴发现。王小二是个老粗，心里无数，就来报告大来。大来是八村的村董，胆量大，太平天国来了，他挂太平天国的旗子，我们的房子让太平天国打馆子，官兵来了，（转下页注）

承禁囚笼^①，蒙九帅恩给饭茶足食，老中堂玉驾由皖而来，当承讯问，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未及，中承〈丞〉大人情厚难酌〈酬〉，是以我心自愿将国中一切供呈。罪将是本不才，自幼〈幼〉在家为穷民，而图日食，并不知天王图国之为，末者数万之众愿随，独非我一人愚悞。我出名作事，三四年之间，方知我李秀成微名也。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为，其国军亡，我为洪姓之将，外众将兵具〈俱〉是我辖。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而酌〈酬〉高厚。我为此者，实见老中堂人〈仁〉爱，我虽不才，早至数年，而在部下，亦尽力图酌〈酬〉，虽不才智，死力可为。忠扶天朝末国不代〈待〉复言。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酌〈赎〉旧日有罪愚民。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固〈国〉，〔致〕其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今而扶洪姓为将，今已被拿，本应早日诛刑，承蒙迟究，敢带〈感戴〉靡涯。今国败尽，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举，实大清皇上格外之福，万民同占中堂雨露之恩。若我能此本事收复，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国法；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恐中堂不信我有此为，仍锁在禁，容我办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两岸好办。心虔有馀，无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纳，具〈俱〉办齐全，决不负

（接上页注②）他就换挂官兵旗，所以我们这带房子未遭灾。他捉忠王送曾九，曾九大人与他平坐吃茶，赏他功牌札子”（均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忠王李秀成方山被执调查记录》）。案石龙池在方山顶破庙海会寺旁，宝积庵则在山顶南侧，低于海会寺一华里，据李秀成所说“逃在荒山顶破庙内”，应以在海会寺被发现为是。李秀成说“被两国奸民获拿，解送前来”，“两国”应该是“两个”之误。两个奸民，就是指陶大来和王小二。陶大来是一个种田兼开磨坊的富农，他做八村的村董，这种村董，当是清朝的团练组织。他在太平天国军队来了，挂起太平天国旗；清兵来了，就换挂清军旗。李秀成就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手里，所以才被解送到清营去。曾国藩把李秀成原稿“是以被两国奸民获拿，解送前来”，用硃笔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解送前来”，到钞送清廷及刻划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曾国藩之所以一改再改，目的是要显他做奴才的功劳。又李秀成被捕解送清营，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十日，即清同治三年六月廿日（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廿日记）。

① 李秀成被解到清营后三日，被关在木笼里。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廿，三日记说：“是日作大木笼，纳忠酋于内。”所以李秀成说“禁囚笼”。

意。祈劳高才揣度，合否可为。^①计开欲办收齐之章程门〈开〉列于后，仍祈玉鉴。

一、要准恩赦两广之人勿杀，给票其回，或散作生意。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因两广人起随起义，至肯赦者，天下闻知，无有不服。其欲愿投入军者，不必用他。各省县之兵亦要赦去。如行此举，大幸民安，免劳大清财货，免劳将相之心。

二、欲恩行此举，要中堂舜一二〔人〕同我差使前去。若我京城贵营拿有我之人，准我保数个代我带民〈文〉前往，先收我儿子为先。

三、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漂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②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其母不到，我文前去，迟些日期，亦可成事。

四、欲将听王陈炳文收复〈服〉。陈炳文与我至爱^③，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渠〉定肯从。其〈渠〉各肯从成此事，欲因我

① “合否可为”句，原稿本作“否合可为”，案应作“合否可为”，故为改置，并注明于此。

② 清同治四年正月丙寅江苏巡抚李鸿章奏：“遵查前收复溧阳，获逆李侍〈世〉贤之母何氏、姊李氏先后身死，妻金氏，系被掳之妇，遣回原籍”（见王先谦《同治朝东华续录》卷四十二）。又考清同治四年三月廿九日左宗棠《舟师缉获通贼洋匪解沪讯办折》，说福建海澄缉获侍王李世贤派往上海接家眷的合众人花耳说，李世贤家属为戈登留养上海，奉李世贤命前往寻覓。又据询问李鸿章部将郭松林面称，戈登留养李世贤家眷，“意在溧阳寻覓窖金，非与李逆交好”。因此，左宗棠把花耳解交上海跟追（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二）。

③ 考吴云《上吴煦禀》说：“镇海卫千总黄凤喈从乌镇来，携有浙江伪文将帅何姓禀帖一件。何姓与该千总向来熟识，本年正月间，遣人资书致该千总，面称嘉兴陈炳文与忠逆有隙，渠与陈姓至好，可以说合反正”（见《两樵轩尺牋》卷十二）。案浙江省文将帅何姓，就是混入太平天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何信义（又名何培英）。何信义这封禀帖，现存吴煦档案内。其署年月为清同治元年（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何信义因为看见了陈炳文与李秀成有隙，所以他就要钻这一个空子去煽动陈炳文叛变。他既向清朝提出了这一件事，就要做得到，然后才能取信。所以这不是一件随便报告的消息，而是一件实事。据此，知李秀成与陈炳文早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就已经有嫌隙了。到癸开十三年（即清同治二年）十二月，陈炳文果然向清朝江苏巡抚李鸿章乞降（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复曾沅帅》，见《朋僚函稿》卷四）。清同治三年正月廿七日清帝谕左宗棠说：“伪听逆陈炳文早有与洪逆及李秀成互相猜疑之说，此时在李鸿章处呈递帛书乞降，即著左宗棠与李鸿章妥商办理”（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八录上谕）。据此，知清廷也早已得到陈炳文与天王及李秀成发生矛盾的情报，则李秀成此处所说“陈炳文与我至爱”的话，是有所为而言的。

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若不收复〈服〉此人，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其〈渠〉等在外路阔，尔兵到此，其〈渠〉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欲代收此等人者，亦差使往。

五、查幼〈幼〉主果能到外，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此人必不能有了。^①

六、老中堂肯行此举，非〈必〉马玉堂及赵金龙二人为用，其去必成。

七、要求中堂舜一谕与我，押带我文并往，有文去不用印信。今用印者，到我营中，其众将格〈更〉而不信，他定疑中堂自造诱他。我亲书字到，我营将个个可知，格宜〈更加〉稳便。我在天朝时用将文盖印者，无我亲画密号，其将不从。收复〈服〉我弟及我子我侄我将之后，又收黄文金，总赦回乡，其事定成。我业落这边，是部辖定概从之。我部从顺，处处皆

① 李秀成此处说：“查幼〈幼〉主果能到外，再有别样善谋，又有计效〈较〉，此人必不能有了。”固然，幼天王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童子，但是，当时幼天王乃是太平天国的君王，他是一面号召群众的旗帜，只要他到得湖州，那里有名将堵王黄文金，有首辅干王洪仁玕，如何会没有良谋善策？这显然是哄骗曾国藩的话。考干王《洪仁玕自述》说：“我幼天王与大臣忠王等万有餘人出京，一路平安到广德州。群臣大会，喜悲交集。因湖州军〈粮〉乏军单，恐难建都立业，故议到建昌、抚州等处会合侍王、康王，往湖北再会翼王、扶王等大队。”沈葆楨清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席军生擒曾逆折》说：“窃念洪福瑱黄口小儿，无足介意。惟洪秀全窃号十有餘岁，流毒十有餘省，遗孽犹在，则神奸巨慝，倚其名号，足以挥召群凶。臣诘洪仁玕以由浙入江，意将何往？据供定义从抚、建合康、侍等逆出湖北，会石达开、陈玉成馀党，踞荆、襄以窥长安。不料汪海洋、李世贤业经官军剿遁，是以寻踪西行等语。臣查李世贤已入南雄，复回龙定，击退后又由粤境东趋；汪海洋回犯宁都，迫逼入武平，又折窥汀界；湖北之贼亦舍英、霍而入广济，无非思得幼逆，妄冀死灰复燃。……当幼逆遁至广昌，去康逆已间不容发，幸席宝田昼夜穷剿，迫至石城；鲍超援宁都，克瑞金，使康逆无可容足，而幼逆辗转荒谷十有餘日，不为饿殍，卒就生擒。此皆列圣在天之灵，与皇太后、皇上威福所致，东南大局从此底定矣”（《沈文肃公政书》卷三）。案干王洪仁玕、堵王黄文金在湖州会议，决定到江西建昌、抚州等处会合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军，往湖北再会扶王陈德才大军，踞荆、襄，以图长安的计策，就是李秀成向天王提出的放弃天京，经江西，绕湖北，与扶王陈德才大军会师，另图发展的战略。从前天王拒绝了这一个良策，现在天京失陷了，再来执行，为时还不迟。不幸大军离湖州出发，还没有进入江西，在半路上，名将黄文金病死，军队失了杰出的统帅，指挥乏人，李世贤、汪海洋军队，又过了粤、闽，未得会合，而敌人穷追，遂致军覆，大计未能达到罢了，却不是没有良谋善策的。这可见李秀成这一条论说，实是哄骗曾国藩的，其目的是阻止清军不去追击幼天王，使幼天王得有时间达到与侍王、康王、扶王等会师的计划。

从。天朝独我部众，将我部收齐，余各记话而从。

八、要求中堂今将南京城内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享〈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渠〉他行，留其〈渠〉传出于外，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渠〉心免结，囹事速成。

九、要收复〈服〉天朝各将免乱天下者，务用善心抚恤〈恤〉。有中堂如此仁爱收复〈服〉，又有罪将邦〈幫〉筹为引，不计其〈渠〉何将，不计有罪，以义用收复〈服〉天朝将兵后，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在安省居南北便易〈利〉。

十、要劳老中堂如行者求行，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陵〈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人〕具〈俱〉赦，仍旧为民，此是首要。今具〈俱〉用仁爱为刀，而平定天下，不可以杀为威，杀之不尽，仁义而服世间。罪将本无才智，被获罪孤〈辜〉，何〔知〕此事，实老中堂深恩量大，出我一片思及愚诚。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酌〈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计开天朝之失悞有十：

一、悞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悞。

二、悞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①、陈仕保^②、许十八^③去救，到临青〈清〉州之败。

三、悞因曾立昌等由临青〈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

① 曾立昌，广西浔州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三月代林凤祥守扬州，以功授夏官又副丞相。甲寅四年正月，奉命领军赴直隶增援林凤祥。曾立昌在丰工下游的包家楼渡河，从丰县挺进山东，连下金乡、钜野、郛城、阳穀、莘县、冠县，沿途农民、水手、盐枭、溃勇踊跃加入。三月，克临清州，敌人先烧城中存粮，大军乏食，退出临清州，新附的不听指挥，为敌所乘，全军溃败，曾立昌退到黄河漫口，指挥败军渡河，亲自断后拒敌。敌骑大至，立昌力竭，乃跃马入黄河，水急，被淹牺牲。

② 陈仕保，以功授丞相，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奉命与曾立昌、许宗扬北援林凤祥。三月克临清州，因粮绝，新附者哗乱，军溃。四月，归到河南凤台县展沟集，遭地主团练夜袭，仓卒拒敌，战死。

③ 许十八，名宗扬，行十八，广西人，初授御林侍卫，以功授冬官又副丞相，命与曾立昌、陈仕保率军赴直隶增援林凤祥。到山东临清州军溃，曾立昌、陈仕保都死难，许宗扬逃归天京，关在东牢。旋释放，田家镇之役，与张子朋同督战船随燕王秦日纲拒敌。天京事变时，随韦昌辉入东王府杀杨秀清。其后事迹不详。

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①（杨家店清将，现今日久，不能记得姓名。）^②

四、悞不应发林绍璋去相谭〈湘潭〉，此时林绍璋在相谭〈湘潭〉全军败尽。^③

五、悞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悞。

六、悞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疑〉忌，翼起猜〈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悞至大。

六、悞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国而悞。^④

七、悞主不问政事。

八、悞封王太多，此之大悞。

九、悞国不用贤才。

① 燕王秦日纲舒城杨家店之败，考《清史稿》卷四百二十八，列传二百十五《秦定三传》记此事说：“四年……庐州之为贼踞，旁县并陷，定三连战破贼，复六安，屯三角井。会江宁贼分党入安徽，图北犯，以援畿南窜匪，道经舒城；贼首罗大纲、石达开、胡以晄、秦日昌等合众数万，四路来扑。定三所部仅二千，坚守十餘日，阵斩罗大纲，贼始挫，引去。”李秀成说记不得守杨家店清将姓名，这人就是清朝福建提督秦定三。惟《清史稿》记此役阵斩罗大纲却是清朝将帅的虚报，罗大纲根本没有参加，石达开、胡以晄也都沒有参加。又考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伪燕王秦日纲传》，对此事有扼要的记载说：“甲寅四月调回江宁，封燕王，杨贼再令北犯，日纲往扰凤阳、庐州一带，不愿北行，禀奏杨贼云，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夏燮《粤氛纪事》卷八也记此事说：“咸丰四年……夏六月，官兵攻庐州急，贼遣人求援于金陵。是时北窜之贼败于临清，高唐、连锁之被困者又遣奸谍间道求救金陵。杨逆谋调舒城之贼由英、霍二县进攻六安以通北路。六安经正月土匪之役，绅士力图反正，遂率团勇击贼克之。贼谋再窜不果，乃纠合皖匪扎营于舒城之西北两路，欲俟救出庐州之众统率北行。经秦提军定三扼要堵剿，又擒获其伪水师总制黄先贵斩之，遂绝其北路之援。”

② 圆括号内的话，是李秀成加在簿眉上的。

③ 林绍璋湘潭全军覆败，是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三月事，考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林绍璋领军于三月十九日（夏历三月廿七日）进入湘潭，至廿六日（夏历四月初五日），八日之内，水陆十战十败，全军覆没。据《光绪湖南通志》说：“林绍璋以数骑奔回靖港，即日遁岳州”（见卷八十九）。林绍璋不是大将才，而东王却派他去担任进军湘潭经略湖南的大任，卒致军覆，所以李秀成说误不应派林绍璋去湘潭，是有责备东王之意。这是太平天国军事上大失败的一役，并且是具有关键性的一役。自经此役，太平天国无力再图湖南，而曾国藩编练的湘军，遂乘机东下，攻陷武、汉，进犯九江，其关系太平天国战局的重大如此，故李秀成列为天朝十误之一。

④ 第六误重出，所以天朝十误实在是十一误。

十、悞立政无章。悞国悞命者，因十悞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①

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服〉此等之人众齐来，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中堂及中承〈丞〉大人成利就，早日完功收复〈服〉，众匪奔何防。为今虑者，洋鬼定变动之为，中堂恩厚，我亦陈之。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渠〉愿助之。天王〔云〕不肯〈云〉：“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此语是与朝臣谈及后〔不〕肯从。鬼云：“尔天王兵而虽众，不及洋兵万人，有我洋兵三二万众，又有火舟，一手而平。”鬼云：“我万馀之众打入北京，后说和，今上〈尚〉少我国尾〔欠〕^②尔不与合，尔天朝不久，待为〈会〉我另行举动。”此这鬼头与天王不肯，然后与及谈。^③今天朝之事

① 关于曾国藩盗改李秀成天朝十误第十误事，现检阅影印原稿本，看出了曾国藩最初读《李秀成自述》原稿时，用硃笔窜改点句，将收齐章程十条，删为九条，天朝十误也删为九误，将第十误全文用硃笔圈去。后来又用墨笔在第十条的“十”字右上旁用△打了一个记号，表示要回此字，即在其下旁用墨笔写“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十二字。根据原稿审核，知曾国藩曾读过两次，第一次是用硃笔圈改的，第二次是用墨笔圈改的。又根据后来清廷命曾国藩将《李秀成自述》详细钞录咨送军机处，及曾国藩所交之十要十误看起来，知这十二个字是曾国藩奉命详细钞录时所改的。曾国藩之所以这样盗改，我在考证中已经指出：曾国藩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并且显示自己的功劳起见，所以特用心机盗改了李秀成这一条原文。郭沫若《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序》说：“原文十悞，是只有‘立政无章’四字。‘悞国悞命’以下是十悞的总结语。”这是很对的。至于他说：“‘命’是民的别字，‘性命无涯’。应该是‘悞民无涯’。悞字草写过简，极类性字。”今核对影印原稿本，十误内共有“悞”字十八个，笔法结构都相同，而与此处这一个“性”字不相同，又“命”字是“民”字的别写没有旁证。案“性命无涯”的意义，应连上文联，作害死了数不尽的性命。李秀成在叙述六解京围时说：“这班臣子，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忽悞英雄，死去无数之好汉，悞死世民，实出吾主之过”，即是此意。

② 案外国侵略者说的“今上〈尚〉少我国尾〔欠〕”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清朝统治者还有一部分赔款没有交清给他们。

③ 案李秀成所记外国侵略者到天京与天王交涉，提出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朝，平分中国，否则进攻太平天国，天王断然予以拒绝的事，是资本主义侵略者企图把中国殖民地化的阴谋，太平天国反侵略的一件极大的事件，文字虽简短，而全部内容却已经很扼要地记了出来。不过，李秀成只说“鬼头”，却没有说明是哪一个侵略国家在华的首脑人物，也没有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但有三点却是明确的：（一）提出交涉者的身份和国籍，李秀成说明是“鬼头”，即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首脑人物，而不是那些国家的非政府人员；也就可见所提的是代表该国政府的交涉谈判，而不是个人的建议。至提出交涉者的国籍，据李秀成记他们的话说：“我万馀之众打入北京，后说和，今上〈尚〉少我国尾〔欠〕”的话，说的是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清咸丰十年九月，公元（转下页注）

此〈已〉定，不甚费力，要防鬼反为先。此是真实之语。今〈趁〉其〈渠〉

(接上页注③)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打入北京事。所谓“今上〈尚〉少我国尾[欠]”，就是说清朝给英、法的赔款还没有交清。案曾国藩在忠王原稿上也用硃笔在“尾”字下加一“欠”字，可知我们对这一句话的释义并没有错。说话者又分明自称“我万馀之众”、“我国”。据此可以断定他们不是英国在华的首脑人物，就是法国在华的首脑人物。(二) 交涉的结果，从李秀成述侵略者所说：“尔不与合，尔天朝不久，待为〈会〉我另行举动”的话，知其结果是双方决裂。(三) 提出交涉的时间，案英、法联军打入北京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辛酉十一年二月廿二日(公元1861年4月2日)，太平天国还与英国订立本年内不进入上海、吴淞一百华里以内的协定，当时天王还特地颁布了一道《中西永遵和约章诏旨》，在辛酉十一年春夏间，太平天国还不曾与侵略者决裂。考太平天国拒绝英国四项横蛮要求，是在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廿二日(公元1862年1月1日)，六日之后，即传檄向上海进军。据此知侵略者向太平天国提出这一个阴谋交涉的时间，系在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廿二日之前，约在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旬左右，即公元1861年12月下旬左右，也就是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下旬左右。

现在我们根据李秀成记载这三点明确的提示去进行考据，看看在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底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侵略者决裂以前，有哪一个侵略国家派有代表到天京来进行交涉，其结果如何，事实便可以明朗化了。考辛酉十一年十二月廿三日黄畹《上逢天义刘肇钧书》说：

英、法公使巴学礼、水军提督巴克从轮船前诣天京，请大臣转奏天王无加兵于沪。而天王睿衷未可，诸大臣谓无论前日百里之约不能从命，即今日加沪之兵亦必速至，取天下岂能顾通商大局，况中外肯和，则通商之局亦无所窒碍。巴公使不悦而去，因此欲战之意以决。

案黄畹说的巴学礼，又译作巴夏礼，英国参赞。他说的英国海军提督巴克，又译作何伯。这两人都是当时英国政府侵略中国的在华凶恶首脑分子。黄畹即王韬的假名。他在向逢天义刘肇钧上书前，曾在上海教士开的墨海书馆工作了十三年。他在辛酉十一年春天，并且做过何伯、巴夏礼的随员，到过天京和汉口向太平天国及清朝两方面进行交涉。他跟英国侵略者有密切的关系(详见我著的《黄畹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内)。据王韬所述，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到天京向太平天国谈判不进攻上海的交涉，经太平天国拒绝，双方决裂。又考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四章也说：

太平军攻克宁波数日之后，何伯提督前往南京，企图使太平天国当局应允延长不进攻上海的期限一年，因为前次协定至1861年终即告期满。可是太平天国不再同意这种协定。

案王韬、吟喇所记虽然只是他们所知道的英国侵略者公开宣布的交涉，而不是秘密交涉的内容。但是，根据他们的记载，却使我们知道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廿九日(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公元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克宁波几天之后，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前往天京进行交涉，结果双方决裂这一事实。这就给我们考出了李秀成此处所记向太平天国提出平分中国的阴谋交涉的侵略者，就是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礼，其时间是在太平军攻克宁波后数天，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旬左右，公元1861年12月下旬左右，也就是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下旬左右。我们还(转下页注)

未动，老中堂早定计去广东先行密中多买其大砲回，先有其砲，其药其码

（接上页注）可以从清朝方面文件对这一事件进行考证。关于何伯、巴夏礼这一次赴天京进行交涉，决裂归上海，清朝在当时就得到情报了的。吴云《上吴煦禀》说：

龚孝拱卯刻来晤，云见巴酋询及所事曾否出奏（水师提督亦已回来，甜棠所云亦合，云与金陵逆首齟齬也）。答以“连日因巴公不在此，尚未晤见官绅”。随即进城见敏斋、玉泉，知此事大略。复出城与巴酋面谈：“此乃中国大事，必须会议，今已定见，即日可奏。”巴酋云：“有轮船进京，何不趁船前去？”孝拱云：“恐格于成例，未知能否”答之。其意颇为要紧，盖此番到金陵，与逆首颇有齟齬也。（见吴煦档案）

案吴云是由清朝上海方面官员派与外国侵略者联系的人。龚孝拱即龚橙，孝拱是他的号，是一个汉奸，给英国侵略者做工作。甜棠，是上海宁波帮买办商人，清朝候補道员杨坊字，是清朝上海方面与外国侵略者联系的重要的人物（据吴云《禀吴煦》，见吴煦档案）。吴云这封信是向当时清朝在上海主持与外国侵略者联系事务的代理江苏布政使司苏松太道吴煦报告的。信中所说的“巴酋”、“巴公”，都是指英国参赞巴夏礼，所说“水师提督”，是指英国海军提督何伯。信中所述杨坊说的何伯“与金陵逆首齟齬”，龚橙说的巴夏礼“此番到金陵与逆首颇有齟齬”，就是这一次何伯、巴夏礼到天京进行阴谋交涉，与太平天国决裂事。信中所述龚橙说的“巴酋询及所事曾否出奏”，就是指当时由上海官绅出面向清朝皇帝奏请与外国侵略者共同守卫上海事。从这封信中，也反映出英国侵略者与太平天国决裂之后，要求急与清朝进行军事合作的迫切期待的情况。

这一件事，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记说：

夜张执之、王右星来。上海薛抚遣弁到湘募勇，由夷人载至上海，头帮去数百人，过江宁为贼所觉，移文与夷目言：“初约两不相犯，奈何助彼裁勇？俟杭州克获，即来说理。”夷目得信，颇惶扰，遂至京师请巴夏里归，赴江宁与贼说，不能妥。现在杭州既陷，逆焰专指上海，夷人在彼修理炮台为守计。

他在清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记又说道：

傍晚到九江，诣宝顺洋行晤徐君渭南……徐君言……贼到宁波后，夷酋巴夏里进江宁城，问其来犯通商口岸之故，两俱出恶言，将来必有一战。

周腾虎在上海写给曾国藩的报告也说：

夷人闻浙省沦陷，头人至金陵与贼目会话，大恫而归，巴夏里已赴香港调兵。（见南京图书馆藏《清代名书札录》第十五册）

曾国藩在这封报告上记明是清同治元年正月初九日收到。这些情报，虽然语焉不详，但都报导或记述了英国侵略者与太平天国决裂前后若干动态，也反映出了清朝方面是怎样在密切地注视着这一事件的发展。

英、法侵略者迫不及待竟亲自向清政府提出军事合作共同抗拒太平天国的要求了。清朝皇帝同意了这一个要求，曾国藩也赞同皇帝的主张。清同治元年三月廿四日，曾国藩在《筹议借洋兵剿贼折》里复奏说：

（转下页注）

子全〔存〕贮多多，防在要隘。砲位要大，要买〔其〕洋鬼砲樑〔架〕，有其砲，无其砲樑〔架〕不能。买砲为脩〔防〕隘口者，總三四千斤即可，太大不必买他，他〔有〕十五、三十斤重码，而何将砲而制计保水面之坚，虽我有我国之广砲之好，实无他砲之强。取到其砲，取到车砲樑〔架〕，寻好匠人，照其样式，一一制造。那时将我中国广砲制造多多，以一教十匠人，以十教百匠人，我国人人可悉，制用此物者人多，那时我亦利害制之。

（接上页注）奉三月初二日寄谕：近复据英、法两国驻京公使声称贼匪与洋人构衅，此时在沪洋人情愿帮助官军剿贼，并派师船驶往长江协同防剿等语。……谕旨以洋人与逆匪仇隙已成，情愿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处搜获伪文，亦知金陵洪逆词意不逊，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我中国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殆亦天亡粤逆之会也。（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五）

于是外国侵略者与清朝统治者就在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情况下成立了军事合作来共同对付太平天国了。

据上引清朝方面文件综合看起来，就可以看清楚了这一事实的过程：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廿九日，即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公元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克宁波之后，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到天京来向天王洪秀全进行直接交涉。结果，双方决裂。何伯、巴夏礼回到上海，一面赶调救兵，一面通过汉奸耸促上海官绅赶紧向清朝皇帝奏请准借洋兵防守上海，急待与清朝结成军事合作。到清同治元年二月间，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二月，公元1862年3月，英、法公使就亲自出面面向清政府提出军事合作的要求。经过清朝皇帝的同意与曾国藩的赞同皇帝的主张，于是外国侵略者与清朝就结成军事合作共同对付太平天国。这也就是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春天进攻上海展开反侵略大战时，中外反革命势力结成军事合作的过程。其时间，其人物所代表的身份，其结果，无不与李秀成记载所提示的三项要点相同。这样，我们从清朝方面文件也考出了李秀成此处所记到天京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向天王提出平分中国阴谋的鬼头；就是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其时间是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旬左右，即公元1861年12月下旬左右。

我们必须指出：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向太平天国提出的这—个平分中国的阴谋交涉，是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勾当。因此，当阴谋交涉决裂之后，何伯就命令停泊天京的英国狐狸号（Renard）舰长宾汉（Herry M. Binham）向太平天国提出四项无理要求，结果，当然也给太平天国拒绝。于是英国侵略者就以要求被拒绝而公开宣告交涉决裂，来掩饰自己的丑态。所以外间就知不到英国侵略者这—个阴谋交涉，所知道的只是他们公开宣布的到天京去进行不进攻上海的交涉，结果，被拒绝的消息；或者是只知道他们与天王进行直接交涉，发生“齟齬”、“两俱出恶言”、“大佛而归”的决裂情况罢了。但是，侵略者要想遮盖，是枉费心机的。李秀成为着使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侵略者提高警惕，特地在《自述》里记载了这一事件。今天经过与其他资料进行参考互证，使我们完全看清楚了这一事件。侵略者见不得人的丑态终归暴露出来了。

大西〔瓜〕砲^①樑〈架〉，我在太仓抢得砲样，业经制〔造〕，与其一样无差，今南京城内上〈尚〉有此样。又要买其三四百斤之大铜砲廿馀条，亦是有旱路用之砲樑〈架〉，选集我灵变通〈聪〉明用砲之人，在阔地方密中教练，仍用砲子对一面高山，平处立起把子，教练砲手，练久而成百发百〔中〕之好手，出重工食，给与其资。欲与洋鬼争衡，务先买大砲早脩为先，与其〈渠〉有争是定。我天朝已末，我乃大清民根，亦愿军民之好，免以惊动我大国人民，见中堂情深义厚，说直明言，并未半言虚语。现今广东人众近在海〔边〕，知洋鬼之来情，知其鬼利情弊之人，查寻数人为用，去办此物，非广东之人不能。现今仍言〈然〉买动洋鬼通敌数人，全作生意，可到广往来，好买其砲。买此砲上海、宁波未有，东省是鬼之旧根，此处要用者亦彼处之来，到广东乡巷〈香港〉所买便也。欲同〈求〉步战之利，到乡巷〈香港〉要密买其鬼之抬抢〈枪〉，此砲每条食砲〔子〕十刃半斤之上下，鬼与〔我〕步战，其〈渠〉定用手抢〈枪〉，甚〈其〉打远过我买洋抢〈枪〉，故其〈渠〉来少用抬抢〈枪〉，我买为之用，实有利便甚也。愚言如此，我与其〈渠〉战过，方悉其由。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难，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知〈之〉也。如知〈下缺〉。

① “大西砲樑”，文义费解。曾国藩送军机处的“十要十悞及其他语”，此句作“大西瓜炮樑”，在“西”字下加了一个“瓜”字。考曾国藩《致曾卓如制军》说：“忠、侍两逆，众约二十馀万，攻扑官军营盘，纯用洋枪、洋炮、西瓜礮”（见钞本《曾国藩书牍》卷二）。曾国荃《复骆制军说》：“其西瓜炮之利害，犹无可比拟，新副营之垒厚丈馀，内砖石而外土块，亦为轰坍数处”（见《曾忠襄公书札》卷六）。左宗棠《答福州税务司美里登》也说：“天炮、炸子西瓜炮等器，用之攻城攻垒洵为极妙”（见《左文襄公书牍》卷七）。据此，知西瓜炮是当时西洋一种炸炮的名称，李秀成此处漏了一个“瓜”字，故加上此字。

附录

忠王答辞手卷

《忠王答辞手卷》一卷，1937年春吴中文献展览会陈列。此卷旧为庞际云家藏，传子芝阁，芝阁没后，归他的内侄李国杰（鄂楼）^①，现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藏。全卷分八纸，第一纸是曾国藩写的问辞及庞际云注录忠王答语，第二纸是忠王手书答语，第三纸是庞际云手录忠王答语，第四、五、六、七纸是李鸿裔手录问辞及忠王答语，第八纸是庞际云跋语。^②考《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廿七日记说：“傍夕倦甚，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便是这份手卷里面第一纸曾国藩所书的问辞。又考曾国藩清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贼酋分别处治筹善后事宜折》说：“据李秀成供……李世贤系李秀成堂弟，与之约定八月以前则掳江西之粮以救侍党之饥，八月以后全数回窜，图解长围，则掳宁国之粮以救金陵之饥等语。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曾国藩所引的话，便是这份手卷中语。又说：“李秀成之就擒也……臣二十五日甫至金陵亲讯一次，旋派候选道庞际云、候补知府李鸿裔、候补同知周悦修等鞠讯累日。”这份手卷的原藏者及加跋语的人便是庞际云^③，而写第四、五、六、七纸问辞答语的李鸿裔，在曾国

① 据李国瓌《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见《学风》第七卷第五期。

② 据庞际云跋说：“第四、五、六纸则李眉生廉访奉湘乡侯相之命，问辞供辞均已分晰注明矣”，案今检查原件，实为第四、五、六、七纸，庞际云跋语有误。又案眉生，李鸿裔字。李鸿裔后来官至江苏按察使，所以庞际云称他为廉访。李鸿裔是曾国藩的重要幕僚，李榕《致乔彦康》说：“犹忆家眉生在文正幕中，提兵调将，俨如戏剧中之穿八卦衣者。文正海趣其言”（见《李申夫尺牍》卷四）。

③ 庞际云，曾在曾国藩家教读，清同治三年三月入曾国藩幕。曾国藩清同治三年三月十七日记说：“傍夕庞省三际云来曹谈，昔年京师在余宅教读者也”（见《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后官至署理湖南巡抚。

藩奏章中也都可以考见。这份手卷所录忠王答语，出自清朝官员之手，不待说，是歪曲了忠王原语的立场的。但是，只要审慎地去对待这些地方，这份语录对考据太平天国历史是具有价值的，故在各纸上加上标题，附录在本书之后。

1963年8月21日罗尔纲志

第一纸 曾国藩写的问辞及庞际云注录忠王答辞

咸丰四年九月守田家镇系伪燕王秦日纲，所搜伪文在船上者极多，何以称燕王系孙日昌？岂秦日纲已革而后封孙日昌乎？

林绍璋于咸丰四年在湘潭战败，其人并无本领，其后何年得封章王？

曾天养与林绍璋同到湖南，死于岳州，其人是一好手，资格最深，何以比林绍璋权小？

林凤祥于五年死于连镇，李开芳死于冯官屯，林启容于八年死于九江，何以后来林凤祥又称求王，李开芳又称请王，林启容又称勤王，是何年追封的？

江西奏胡鼎文于二年三月死于饶州，镇江奏赖桂芳于今年四月死于丹阳，究竟此二人已死否？

幼东王 幼西王 懿王蒋有福 信王洪仁发 巨王洪和元廿餘岁 崇王洪利元十七八岁 元王洪科元 长王洪瑞元 见王洪现元 唐王洪璜元 同王洪珣元 次王洪锦元 定王洪钰元 汉王洪钊元以上无过十岁者 金王鍾万信廿多岁 凯王黄栋樑小 捷王黄文胜小 干王洪仁玕十七人在城内，洪仁玕在江西。

以上十八人，十六日破城时均在城内否？知其下落否？

古隆贤投诚之后，刘官方、赖文鸿现在何处？在湖州。

赖文光在陈玉成部下，赖文鸿系何人部下？李秀成部下。

向来并无义王、福王、安王之名，何以天义、天福、天安皆是封爵？

安庆合围之后，陈玉成屡次求救于李秀成、李世贤，何以未去救皖，仅杨辅清一人去救？

曾天养、罗大纲何以未追王爵？其事甚乱，无可说处。

陆制台建瀛、祥将军厚知其尸首下落否？^①不知。

第二纸 忠王手书答辞

胡以晄即是豫王，前是护国候，后是豫王。

秦日昌即是秦日纲，是为燕王。

第三纸 庞际云手录忠王答辞

林绍璋无大本领，只能吃辛苦，十年封章王。自湘潭败回革职，间二年，旋授指挥，升检点，升春官又府（副）丞相。六、七年翼王出师，留京办事。

曾天养与林绍璋位相等。曾为人老实，林聪明，样样晓得，能勤劳，故其权较重。

林凤翔（祥）、李开芳、林启容皆开国功臣，死后追封王，其子袭之，皆同治二年封。

胡鼎文死于饶州。赖桂芳是李秀成部下，并未死于丹阳，现在宜兴。

义王即石达开，本系翼王，后来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石不肯受。

王长兄安王，次福王，安、福两王因朝中不服，改封天安、天福。

安庆合围，陈玉成求救，无兵可拨。李秀成在湖北，不能回救，惟杨辅清在宁国府，是以就近赴援。

力王张朝爵在城内，想已死了。

李世忠是李秀成旧部至好，从前通信，去年到江北，李世忠兼劝降。

第四、五、六、七纸 李鸿裔手录问辞及忠王答辞

洋人帮守苏州、金陵，是自愿来，抑请之来？白齐文来金陵否？

^① 陆建瀛，清朝两江总督，祥厚，清朝江宁将军，都在太平天国攻克南京时被太平军杀死。

某军为贼所惮？某军为贼所轻？官兵某事好，某事不好？贼中某事好，某事办得不好？

黄文金在湖州是候伪天王溃围同窜否？浙军能战否？

李侍（世）贤、汪海洋等将以江西为窟穴乎？将回两广乎？其党众愿聚？愿散？

元年十月官军攻克严州，李世贤近在宁国，何以不见回救？^①

*

*

*

元年冬间，李秀成贼党北窜，揣其必深入皖省腹地，何以在巢县久住不进？二年春间，李秀成亲率其党由巢县猛攻石涧埠之后，由庐江、桐、舒以至六安，揣其必由皖入鄂，图解金陵之围，何以由六安折回，直奔江浦？是因雨花台克复否？是又无粮？

现在窜江之贼，算计非入粤，即入楚，何以久住抚、建不动？

以上问，以下供。

李酋供：军中探报与阵擒兵勇之言，皆不可信。剃头探子，两边讨好。军机密务，非兵勇所得与闻，即大帅左右之人，不告亦不得闻也。

洋人助贼自五年始。白齐文自撤兵后，即入南京，住李秀成家，甚相得。^②贼中初亦不解用洋枪洋炮，以其器精细不易用也。

鲍军之冲锋猛战，曾军之稳练不摇，多军之活变善战，皆贼中所惮。鲍军将好而兵不好，扎营站地势亦不如曾。左自乐平以后无能战矣，兵皆老病故也。^③兵忌老。

① 第四纸至此止。

② “白齐文自撤兵后，即入南京，住李秀成家，甚相得”这十九字，手卷上本写在“洋人助贼自五年始。贼中初亦不解”等字之旁。据问辞，这十九字应插在“五年始”下。兹为插入，并注明于此。白齐文，太平天国文书译作白聚文，美国人，初助清朝，任常胜军副领队。华尔死，任领队。嗣因索饷事，为江苏巡抚李鸿章撤职。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清同治二年）五月投奔太平天国。他去天京谒见李秀成，是这年初秋事。他的部下钟思（C. F. Jones）的《志愿陈述书》记其事说：“白齐文访问南京的目的是希望天王的大将忠王适当地安插他的军官和军队。在南京，太平军极友好地欢迎我们，招待我们住在忠王的一所王府中，款待非常周到。……我们在那里住了十五天，临行时，太平军极隆重地欢送白齐文。南京之行，白齐文并没得到预期的结果，虽然他极希望做一支军队的统帅，以便单独行动，但太平将领没有给他独立的统帅权，祇命他带领自己原有的军队”（见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③ 鲍军，指鲍超军队；曾军，指曾国荃军队；多军，指多隆阿军队；左，指左宗棠。

李非凤〈宿〉将，借洋鬼之力以成功。^①于希〈戏〉不免有微词。

贼不如官兵大处，官兵掳掠者诛，贼专以掳掠为生，失民心矣。^②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

侍逆各党之窜江西，乃李酋所使。八月以前，则就江西之粮，八月以后，仍复回窜，则徽、宁、句、漂一带秋稻熟矣。其意仍在回顾南京之粮，而不思窜楚窜粤也。

浙东暨严州失守之时，是伪天王不准侍酋回救，欲其近援南京。松江围攻将破矣，亦因伪天王撤李酋回援南京，故舍之而去。

胜负之事难言，能胜能败，乃是本领。若屡打胜仗而一败遂不复振，非好手也。

官军多杀两广人，则贼氛团结不散，军务永无了期。

元年冬之住巢县不进，因贼皆冻病（大雪）。二年春末夏初之由六安折回，是因雨花台克复调兵回援，且六安以西，无粮可掳，皆为捻子闹尽也。

伪天王不喜见人，不察阅军报，虽其子僭称幼主者，亦不得见。伪官人言，卅岁矣，未见过天王。^③

*

*

*

官兵制贼要害处是那几回？洋人能久住中国否？贼亦思打洋人否？羊栈岭〈岭〉之事？考试来人多否？玕王是甚么出身？贼中功名人多否？石达开

① 李，指李鸿章。

② 此处说：“贼不如官兵大处，官兵掳掠者诛，贼专以掳掠为生，失民心矣。”案《李秀成自述》大力宣扬太平天国军队的铁的纪律，指出：“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沓〈踏〉民家门口者斩右脚”的事实。他又强调说：“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李秀成在《自述》里也指出，太平天国是有不守纪律的军队的，但那只是到后期才出现，而且，只是那些加入太平天国的捻党和广东天地会队伍，以及一些受捻党和天地会影响的太平天国队伍。事实斑斑可考，证实李秀成的记载，何曾有“专以掳掠为生”的事！至于清朝军队，不但放纵抢劫以代粮饷，准许抢劫以鼓励士气，而且，以抢光、烧光、杀光的政策进攻太平天国，滔天罪行，记载俱在，那有“官兵掳掠者诛”的事！颠倒黑白，莫此为甚。这完全是改变了李秀成的原语，故特辨明于此。关于这一件事，请参看我写的《清朝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曾国藩奏报攻陷天京事考谬》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内）。

③ 第五纸至此止。考清咸丰元年九月十八日清钦差大臣赛尚阿奏说：“各处探谍均未见洪秀全之面，闻洪秀全终日卧藏，不肯见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死否？里下河何以不去？山东各匪，陕、滇各匪与发逆通否？城中窖藏金银能指出数处否？^①破城时城中尚有若干人？常州杀甚？金陵杀甚？十餘年来各省团练遇有能打仗者否？^②

*

*

*

洋人能算者言在中国只有十八年，不能久住也。官兵必能战胜洋人，惟宜陆战，不宜水战，宜与之硬杀，不宜斗巧，宜以中国土炮为主，以洋炮辅之，不宜尽用洋炮，盖洋炮之精者皆不肯售与中国也。洪秀全本广东滨海之人，素知洋人反覆，故不肯与之合夥。

川、豫、东三省之匪皆通发逆。滇、陕、甘三省之匪未与贼通。

城破时，城中不过三万人，除居民之外，贼兵不过万餘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③

伪玕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

里下河隔水太多，故至今未扰。

安徽应贼试者尚有三百餘人，南京应贼试者不过数十人而已。^④

① 这一条在手卷上已圈去，无疑是后来庞际云装裱时，觉得这是暴露反动统治者贪婪的丑态，所以才把它圈去的。以前的著录者都没有著录出来。1953年我得见原卷，始把它补录。

② 第六纸至此止。

③ 李秀成记天京陷落时，城中守军“不过万餘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这是考证当时事实的一条重要记载。在天京陷落后几天，镇江英国代理领事亚德金到南京视察，他给英外相罗塞尔的报告说：“我估计有一万人与清军五万人作战。”他的调查，还和实际情况相近。又常文煜译威尔生《常胜军》记天京陷落前，戈登在天京城外山颠瞭望城内的情况也说：“在城墙里面，多是宽阔的空地，并无栅堡。数英里之远，防御物没有人驻守。此处与彼处仅有一二兵士来往巡逻，离开接应的地方有数英里远，并没有一面旗帜飘扬在空中，一种死静状态笼罩全城”（第十五章见曾国藩）。这也说明了当时天京城大兵单的情况。但曾国藩为了虚报“战功”，在向清政府驰奏的《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里却虚报说：“城破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餘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当时天京城内太平军不过一万多人，能守城的不过三四千人，连居民合计起来也只有三万人。所以即使太平军全部阵亡，也不过万多人，而况城陷后保护幼天王冲出的有一千多人，从城上四面缒下的又有很多，太平军被杀的很少，哪里有曾国藩所说：“三日之间，毙贼共十餘万人”的事（详细考证见拙著《曾国藩奏报攻陷天京事考谬》）。曾国藩这一篇虚报，我们今天就可以根据李秀成这条谈话把它根本推翻去。

④ 第七纸至此止。

第八纸 庞际云跋

同治甲子六月，湘乡伯^①克复金陵，生擒忠酋李秀成。湘乡侯相^②自安庆移茆东下，李廉访鸿裔与际云实从，奉委会鞠。其忠酋手供一册，已进呈御览。其时对簿复有数纸，亦可备考。第一纸乃湘乡侯相手书，其中小注则际云随讯随录。第二纸乃忠酋口操土音，语不可解，际云令其自书者。第三纸乃际云手录之供。第四、五、六纸则李眉生廉访奉湘乡侯相之命，问辞供辞均已分晰注明矣。辛未^③八月装潢〈潢〉成卷，嘉平立春日^④际云谨识。

① 称曾国荃，曾国荃封威毅伯。

② 称曾国藩，曾国藩封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

③ 辛未，为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辛未。

④ 嘉平，腊月（十二月）的别称。考清同治十年立春日在十二月廿六日。同治辛未嘉平立春日，即同治十年十二月廿六日。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5097-1625-0



9 787509 716250 >

ISBN 978-7-5097-1625-0

定价：5800.00元（共22卷）

www.ssap.com.cn